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

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美】路康乐 著
王琴 刘润堂 译
李恭忠 审校

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

【美】路康乐 著
王琴 刘润堂 译
李恭忠 审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美］路康乐著；王琴，刘润堂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ISBN 978-7-300-1279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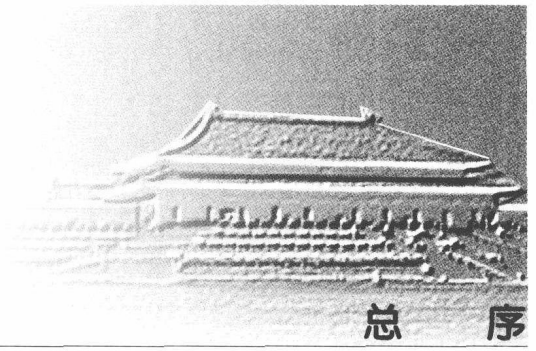
Ⅰ. ①满…
Ⅱ. ①路…②王…③刘…
Ⅲ. ①政治制度-历史-中国-1861—1928
Ⅳ. ①D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3138 号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满与汉
——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
［美］路康乐 著
王 琴 刘润堂 译
李恭忠 审校
Man yu H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398（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48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张	14.375 插页 2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90 000	**定　　价**	39.8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　序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3 000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译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15世纪、16世纪开始，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清朝从1644年到1912年共延续了268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18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大量记载，汲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以下简称“编译丛刊”）。

清朝建立之初，曾和世界各国保持一定程度上的接触。后来中国的大门一度被关闭而后又被强行打开，这期间，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队、探险家、科学考察队蜂拥而来，东方古国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惊奇。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他们记录下在华的所见所闻。这些记录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成为了解清代近三个世纪历史的珍贵资料。由于西方人士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的记载比较具体、广泛，比较注重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因而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的不足。“编译丛刊”将从中选取若干重要资料译介给国内的读者；对早年问世的具有开拓性、奠基性价值，但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的作品，我们也将同样给予关注；此外，对反映当代国外清史研究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的学术专著，“编译丛刊”也将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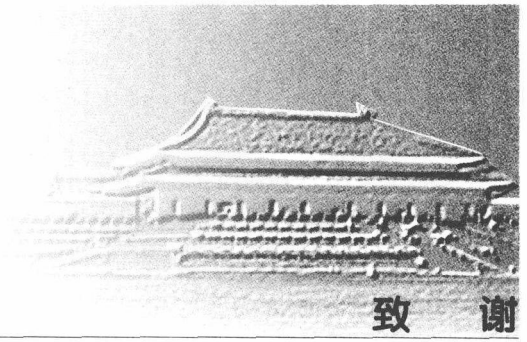
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有选择地介绍国外新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如西方历史学家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主要是强调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选题；又如提倡“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努力将社会精英的历史变成社会大众的历史，将千百年来隐藏在历史幕后的社会大众推上历史的前台。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研究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如社会史、人口史、民俗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会生态史、环境史、妇女史、城市史、家庭史等等，对于纂修清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些都将在“编译丛刊”的作品

中有所体现。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间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是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获得营养，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纂修清史必须排除闭关自守的文化排外主义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国外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因为它们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愿“编译丛刊”在新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广阔背景下，作为一座科学的桥梁、友谊的桥梁，为纂修清史做出更多的贡献。

于沛

2004 年 5 月



致　谢

在进行这项研究的过程中，我背负了很多“人情债”，很高兴现在可以在这里一并致谢偿还。首先要感谢的是这项研究所涉及的档案馆和图书馆以及其中的管理图书档案的工作人员，它们包括：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以及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和东亚图书馆、匹兹堡大学希尔曼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和清史研究所资料室、北京大学图书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图书馆，还有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佩里—卡斯塔纳达图书馆及其亚洲研究图书馆的凯文·林（Kevin Lin）和梅丽·贝林汉姆（Merry Burlingham）。尤其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及其前任所长戴逸先生，受他的邀请我于1982—1983年间在清史研究所做访问学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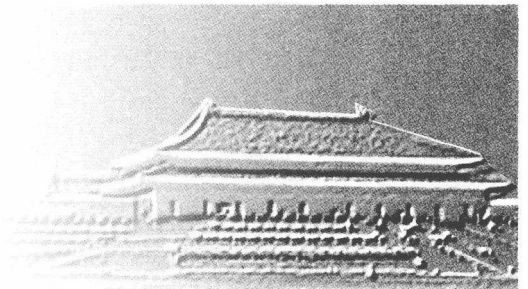
我也要感谢美国学术团体协会、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大学研究所和匹兹堡大学国际研究中心的财力资助。

还有如下一些人热心阅读了书稿并对全书或书中的部分内容

提出了建议：斯蒂夫·麦金农（Steve Mackinnon），司徒琳（Lynn Struve），斯蒂夫·哈瑞（Steve Harrell），贝特斯·巴特里特（Betsy Bartlett）和帕蒂·斯多纳罕（Patty Stranahan），以及华盛顿大学出版社的一位匿名评审人。他们的批评，结合华盛顿大学出版社负责本书的编辑的意见，使得这部书稿更加简洁、紧凑，也更加准确，读者也能因之受益。本书的一些不足之处，当然由我承担。

还有其他一些人为我提供了间接的帮助，其中包括：比尔·布雷斯特德（Bill Braisted），李文海，詹妮佛·罗兹（Jennifer Rhoads），苏赞尼·罗兹（Suzanne Kain Rhoads），阿特·罗森巴姆（Art Rosenbaum），戴维·斯特兰德（David Strand），已故孙毓棠，菲尔·伍德拉夫（Phil Woodruff），此外还有亚洲研究协会的西部和西南部会议的成员，他们年复一年，亲切和耐心地听我阐述这个难懂的课题。

但我最主要的帮助者和支持者是我的妻子帕蒂·斯多纳罕，她不仅对书稿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还给予了我不断的鼓励。没有她的热情与支持，完成这项研究还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



目 录

导言 …… 1

第一章 隔离与不平等 …… 11

反满缘由 …… 12

满人七宗罪 …… 13

满人和旗人 …… 17

隔离…… …… 32

……不平等 …… 39

两种人，两种文化 …… 48

甲午战争之后的改革尝试 …… 59

结语 …… 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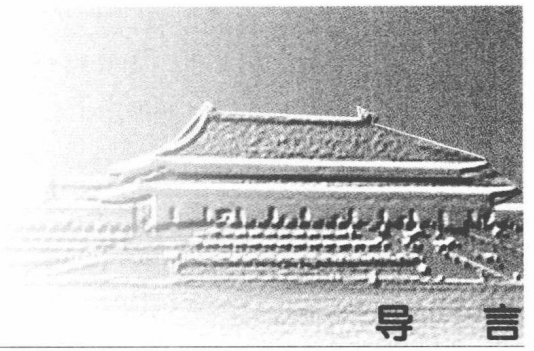
第二章 慈禧太后和“特权制度” …… 89

政变中惊醒 …… 90

满汉关系的变化 …… 93

军事和警政改革 …… 101

教育改革 …… 109
政治改革和 1907 年政治风暴 …… 114
恩铭被刺及其反响 …… 121
结语 …… 135
第三章 载沣和“满人权势” …… 153
慈禧太后的最后岁月 …… 154
犹豫与退却 …… 163
军事和政治的集权化 …… 174
资政院之争 …… 187
结语 …… 201
第四章 辛亥革命 …… 218
清廷的军事反应 …… 219
清廷的政治反应 …… 224
反满暴行 …… 231
南北和谈 …… 250
退位及其条件 …… 259
结语 …… 271
第五章 辛亥之后的皇室和满人 …… 290
民国初年的皇室 …… 291
民国初年的满人 …… 309
1928 年后的皇室和满人 …… 326
结语 …… 338
结语 …… 354
参考文献 …… 365
索引 …… 403



导言

1898年12月底，光绪皇帝（1875—1908年在位）自上而下推行宪政改革的百日维新遭到失败，梁启超对此极度失望。此后不久，他在日本创办了《清议报》，把这个刊物作为探究清朝政治改革新思想的一个论坛。可能与人们期望的不同，在《清议报》创刊号的社论中，梁启超的建议不是要提高中国民众的社会意识水平，或者改变清廷的专制制度，而是要“平满汉之界”。[1]

梁启超这种令人惊讶的观点基于一个社会进化论者对历史的理解。为了生存，种族之间必须互相竞争，“争种族”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驱动力。这种竞争不仅是世界各国间的普世法则，也发生在单独的国家中。在竞争中，只有“优种”生存下来，“劣种”不可避免被淘汰。当生命开始时，所有的种族都是平等的。为什么一些种族“发展”而变得优等，区别并淘汰了“劣等”种族呢？答案是“合种”。“数种相合而种之改良起焉，所合愈广，则其改良愈盛。”不融合的种族则面临着灭亡的危险。

梁启超把当时的中国与春秋时代的中国进行了一个对比。那时，周边的人民与中原的人民彼此视为异族，“互相猜而不相通，

无异于今之满汉也。自此以后，支那之所以渐进于文明，成为优种人者，则以诸种之相合也。为其相合，故能并存。”同时，大量其他种族因为没有互相融合而消失了。梁启超指出：

4 今犹有苗种、侗种、瑶种等与优种人错居而不相合。然其残喘殆亦不可以久矣。何也？不合则必争，争而必有一败，而胜败之数，恒视其优劣以为凭故也。今夫满人与汉人，孰为优种孰为劣种，不待知者而决矣。

诚然，在梁启超写作的时代，满人统治着汉人，但这是暂时的偏差。种族冲突不会在短时间内解决，可能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最终，智慧肯定会战胜野蛮。随着时间的推移，“优种”的汉人最终会战胜“劣种”的满人。

梁启超认为，在帝国主义的威胁下，满人统治者采取挽救危局的行动还不太迟，这不仅会影响满人，也影响着全亚洲。全球性的生存竞争演变为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竞争，结果还很难预料。整个黄种人的命运取决于中国的存亡，因为中国的人口占了黄种人的70%～80%。然而，中国却处于满人统治之下，前途堪忧。“世界之进化愈甚，则恃力者愈弱，恃智者愈强。……即使以数百年前满州强悍之人种，生于今日，犹不能安然独立于竞智诸强国间也。况如今之满人，强悍之气已失，蒙昧之性未改，而欲免朘削澌灭之祸，其可得乎？”尽管种族竞争的关键在于“合种族”，但是“宰治支那者宁忍置全种数百兆人于死地，听其永永沉沦，永永糜烂，而不以易其一日之欢愉富贵”。

梁启超悲叹满人统治者的鼠目寸光。“徒认汉人为异种，为不利于己。而不知更有异种之大不利者过此万万也。”考虑到灾难性的后果，梁启超断定如果不通过平满汉之界来变革，那么等待满人的是汉人和白种人的双重威胁。

抑压政策行之既久，激力所发，遂生大动，全国志士，必将有美利坚独立之事，有法兰西、西班牙革命之举。彼时
5 满人噬脐无及，固无论矣，即不然，守今日顽固之政体不及数年，必受分割。分割之际，会匪乘起，暴徒横行。政府之

威力，既不能行于地方，则民皆将任意报其所仇愤。其他吾不敢知，而各省驻防之满人，其无噍类也必矣。分割以后，则汉人满人虽同为奴隶，然汉人人数太多，才智不少，尚可谋联合以为恢复独立之事。满人则既寡且愚且弱，虽不遭报复于汉人，亦长为白种之牛马而已。且汉人之农者工者，其操作最勤，其价值甚廉，他日全地球力作之业，尚藉汉人为一转轮之钮，而南美洲、太平洋未开之地，皆赖汉人以垦之以实之，故汉土虽分割，而汉人仍可以有权力于世界之上，即受钳制，而终能以身存。若满人，则数百年来，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其全部五百万人，不能为士，不能为农，不能为工，不能为商，一旦分割，政权、财权、兵权三者，既归白种人之手，彼时欲求一饭之饱，一椽之安，可复得乎？然则满人所自以为得计者，正其自取灭亡之道，真所谓医渴而饮鸩者也。

梁启超的这篇短文非常引人注目，不仅是因为它有助于把社会进化论的概念和原理介绍给中国大众，而且这也是自从太平天国运动以来，第一篇理性批评清朝廷、满人和满汉关系的文章。此外，梁启超对五百万满人寄生虫式的生活方式（他们“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谴责，预示着共和革命者发动的反满宣传即将到来。梁启超关于满人“巨变”的预言，即如果朝廷拒绝以“平满汉之界”开始其他改革，就将会引起天下巨变，也在十余年后的辛亥革命中变成了现实。

本书包含了很多梁启超提出和涉及的问题。谁是满人，谁又是真正的汉人？那些清廷的反对者，尤其是义和团运动之后的共和革命者，对满人有什么样的批评？这些批评在多大程度上令人信服？也就是说，在满人统治中国二百多年之后，满汉在多大程度上、在哪些方面有显著的差别？清廷如何应对这些批评呢？是否如梁启超所迫切愿望的那样，平了满汉之界吗？至于满汉关系，清廷到底是有所作为还是无所作为，清廷因何导致社会精英与之分道扬镳并激发了辛亥革命？在辛亥革命期间和革命之

后，满人统治者和广大满人情况如何？一言以蔽之，在满汉关系这个棘手的、有争议的问题上，我们能从晚清朝廷适当或不当的处理方式上得到什么启示呢？本书同样关注族群关系和政治权力问题，它们与满汉问题有关，这在辛亥革命前十余年间尤其如此。

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早期的著作，尤其是中国历史学家的著作如萧一山的《清代通史》，无一例外地集中关注革命派，特别是孙中山。[2]此后，在20世纪60年代末，学者的注意力开始从革命家（他们通常在国外进行许多密谋行动）转移到非革命的改革家（他们主要在国内活动）身上。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在关于湖北和湖南的研究中称其为“城市改革精英”，1976年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例如侯宜杰关于晚清立宪运动的历史研究）则将他们看做反对封建制度的新兴“民族资产阶级”。[3]辛亥革命不再被视为革命家组织的一系列武装反抗和民众起义的最终结果，而是改革精英们对清廷的不满和疏远不断增长的结果。然而，与上一代正统历史学家的研究相比，这些修正主义者的研究通常不关注清廷。因此，我们不清楚朝廷究竟做了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才导致改革精英与之分道扬镳，致使他们放弃了对清廷而言至关重要的支持。没有他们的支持，这个王朝注定要灭亡。

关于清初统治者的研究成果相对丰富。相比之下，关于晚清的英文专著只有两本：芮玛丽（Mary Wright）关于同治中兴的研究和邝兆江（Luke Kwong）关于1898年百日维新时统治阶层间的钩心斗角的研究。[4]尽管慈禧太后在晚清政治中居于重要地位，也统治了很长的时间，但还没有关于她的研究专著出版。当然，
7 有许多不太可靠的通俗传记（人们通常可以追溯到1910年布兰德（Bland）和埃德蒙·白克浩斯（Edmund Backhouse，1872—1944）的作品）。[5]这种忽视，特别是对清王朝最后十年的忽视，在中国学者当中也很普遍。

当然，主要原因在于19世纪中央权力的式微和伴随而来的（普遍认为）清廷的软弱无能。因此，关于清末十年的研究，焦点

通常不是集中在慈禧太后或者其他朝臣如庆亲王奕劻身上，而是集中在表面上握有重权的封疆大吏，如张之洞和袁世凯（1859—1916）身上。关于他们，裴士丹（Daniel Bays）、拉尔夫·鲍威尔（Ralph Powell）、陈志让（Jerome Ch'en）、麦金农（Stephen Mackinnon）等人都有相关著作予以论述。[6]历史学家分析晚清朝廷时，其重点通常集中于这样一个或者两个主题上：慈禧太后开始尝试改变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以来的地方分权趋势；慈禧太后之后，因为年轻而缺乏经验的继任者载沣的无能，他短暂的摄政期在革命中终结。1909 年 1 月，这两个主题汇集成一点，当时载沣突然地、也可能是愚蠢地剥夺了袁世凯的全部政治和军事职位。对于自己的突然被解职，袁世凯既没有辩解也没有反抗，他的解职也解释了一个疑问：直至清朝灭亡前三年，朝廷可能并不像通常描述的那样软弱无能。

本书考察了慈禧太后和载沣如何处理梁启超在 1898 年提出、随后又成为革命派宣传攻势之靶子的满汉关系问题，从而为晚清朝廷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特别是 1907 年夏天满人巡抚恩铭的被暗杀，促使慈禧太后全面审视满汉关系问题。她（后来是载沣）试图通过缩小少数满人与多数汉人之间的大量差异来平息革命者的抨击。然而，他们同时还进行了加强中央集权和“强化皇权”的努力，这又大大削弱了他们改善满汉关系的成就。朝廷强化皇权的长期努力始于 1861 年恭亲王奕䜣被任命为军机处大臣——迄今为止，历史学家往往因为关注当时加强中央集权的趋势而忽略了这一点——最后在 1911 年 5 月，以备受指责的“皇族内阁”的出现而达到顶峰。这也是清廷方面令改革精英极度失望的关键决策之一，导致了他们在 5 个月后革命爆发时放弃了对朝廷的支持。本书也涉及了清廷对 1911 年 10 月的武昌起义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反应，以及清廷在为 1912 年 2 月清帝退位协议铺平道路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最后，本书讨论了革命之后皇室的命运，包括“末代皇帝”在 1924 年被逐出紫禁城，以及 1928 年清朝皇陵被人破坏却没有遭到惩处等问题。

关于广大满人民众，他们与汉人的关系是本书的另一个主题。

满人的历史和身份与八旗制度紧紧缠绕在一起。从清太祖努尔哈赤（Nurhaci）开始，旗人作为一种军事力量，在1644年入主中原、建立清朝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随后又作为职业军人驻防于全国各地。八旗制度创建之初的主要成员是满洲东部和北部的女真人（Jurchen），努尔哈赤的儿子和继任者皇太极（Hong Taiji）把女真人更名为“满洲”，不久以后本地区的其他民族成员，主要是蒙古和汉又加入了。然而，旗人不仅包括八旗士兵，也包括他们所有的男女老幼家属，他们统统被称为“旗人”。在八旗制度中，旗人资格是世袭的，旗人作为一个整体与其他大量人口区分开来，那些非旗人被称为“民”。旗人与满人的关系可能令人困惑。要通过英语把几个不同的汉语词汇——尤其是满洲、满人、满族——区别开来，这是很费劲的，因为这几个词汇都可以毫无争议地翻译成英语的“Manchu”。本书认为，旗人（皇太极的满洲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与义和团运动之后十年内的满人是同义的（梁启超在1898年称之为“满人”），本书也认为他们为满族的“族性”或者满族的“族群”确立了基础，在20世纪80年代，满族在人口数上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大少数民族（仅次于壮族）。本书展示了满人是如何从世袭的军事阶层——他们在清代主要是作为八旗制度的成员——转变成了今天的民族。相应的，如果满人被界定为旗人，那么汉人在很大程度上就等同于非旗人的“民”。

虽然满人作为“旗人”在关于清代前期的著作中占有非常突出的位置，但他们在19世纪早期的历史中却似乎消失了。[7]直到现在，也只有三本关于晚清满人的英语著作。一本是罗伯特·李（Robert Lee）的考察了汉人移民对满人家乡满洲的影响的著作；另一本是戴福士（Roger Des Forges）关于蒙古旗人锡良的政治传记；第三本是柯娇燕（Pamela Crossley）关于一个驻防杭州的满洲旗人家庭的历史研究著作（从18世纪90年代到清朝灭亡）。[8]

9 目前，研究晚清八旗制度的中文著作数量众多，但与研究清前期八旗制度的著作相比，也不过是沧海之一粟。这方面的代表性学者是陈一石、金启孮、汪宗猷和郑川水，他们的著作在本项研究

中经常被引用。

19 世纪初，满人成了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群体。人们普遍认为，他们被同化于大多数汉人的文化之中，因此不再被区别为一个单独的独立群体。这种观点部分基于这样的事实，即不可否认，八旗在 18 世纪作为一种有效的战斗力量已经日薄西山了，他们的位置被 19 世纪出现的各种其他军队——主要是汉人军队——取代了。由于满人身份问题与八旗制度紧密相关，制度的崩溃极易导致这样的结论：即构成八旗制度的满人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连同他们特殊的身份也失去了。可能基于文化保护的动机，中国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把研究重点放在了满人衰落的速度和程度上。例如，郑天挺把满人军事衰落的时间定位在满人入主中原后的第一代人那里：当 1673 年三藩叛乱发生时，八旗军队（包括汉军八旗）几乎不能参战，满人统治者只好利用绿营军队。同样，陈捷先指出了满人在语言方面的文化适应程度："现代语言学家估计，基本有三分之一的满语起源于汉语。"他断定："满人的母语与其早期文化的其他方面一样，不能抵抗汉语的同化。"并不只是中国历史学家宣称满人被融入汉文化中。芮玛丽在她很有影响的关于同治中兴的著作中直截了当地指出：当 1865 年一项关于满人可以自由"出旗"的谕令颁布后，"满人与汉人之间最后的重要隔离也基本被消除了"。[9]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梁启超在 1898 年年底仍会号召"平满汉之界"呢？义和团运动之后的十余年间，各种反满的宣传又怎么会有合理性呢？革命者们宣称满人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异族，是脱离被统治的大多数汉人的特权阶级。共和主义者不仅反对清廷，也反对全体满人。邹容在 1903 年出版且广泛传播的小册子《革命军》中，表达了这种激烈的反满情绪，号召"诛绝五百万有奇被毛戴角之满洲种"[10]。同样，1905 年，革命的领导组织—— 10
同盟会在宣布推翻清廷、建立民国的同时，也宣称要"驱逐鞑虏"，鞑虏当然是指满人。那些把满汉差异最小化的学者们一般认为革命者的反满言辞是纯粹的宣传，指出这些宣传内容空洞，没有实质。在一本辛亥革命论文集的精彩导言里，芮玛丽认为这样

的反满言辞是不重要的，没有根据的。芮玛丽重申了她早期的观点，即“满汉融合在19世纪中期已经达到了非常成熟的程度”，她总结说，“民族问题与革命不相关”[11]。

本书在如下两个方面反驳了芮玛丽的这些观点：19世纪中期以后满人的文化融合程度和“民族问题”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的相对重要性。文化融合的过程并不是只有一种方式。正如满人毫无疑问被“中国化”（更准确的说是“汉化”）一样，汉人在一定程度上（尽管还远远没有得到普遍承认）也被“满化”了。然而，不管文化的相互融合带来了什么累积效应，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满人与汉人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由此也证明了许多革命者对满人的批评是合理的。因此，如果所谓的满汉融合在世纪之交或者辛亥革命时根本没有完成，那么民族问题就不会与革命无关。革命肯定与大量满人有关，正如邹容所希望的那样，大量满人在革命中被抓和被杀。也正如通常描述的一样，共和国家的建立是伴随着流血过程的。

总之，清廷在解决满汉问题上的无能——它始于奕䜣1861年被任命为军机处大臣、芮玛丽引用的1865年关于八旗的谕令，一直到义和团运动后的清末新政——大大消减了社会精英对政府的信任，也为革命的成功创造了条件。即使这样，辛亥革命后的十余年间，这个问题依旧没有得到完全解决。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随着1924年皇帝被逐出紫禁城和1928年清皇陵被破坏，八旗制度才完全解体。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评论的三十年后，满汉之间的界限才完全被打破。

【注释】

[1]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1册，77～83页。Pusey，James Reeve（浦嘉珉），*China and Charles Darwin*（《中国与达尔文》），181～184页。

[2] Hsieh，Winston（谢文孙），*Chinese Historiography on the Revolution of 1911：A Critical Survey and a Selected Bibliography*（《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述评和书目选》）。萧一山：《清代通史》。

[3] Esherick，Joseph（周锡瑞），*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

[4] Wright, Mary Clabaugh（芮玛丽），*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Kwong, Luke S. K.（邝兆江），*A Mosaic of the Hundred Days: Personalities, Politics, and Ideas of 1898*（《百日维新的碎片：1898年的个人、政治和思想》）。

[5] Bland, J. O. P.（布兰德），Edmund Backhouse（白克浩斯），*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慈禧外传》）。关于对慈禧太后简要的学术研究，参见 Chung, Sue Fawn（钟苏芬），"The Much Maligned Empress Dowager: A Revisionist Study of the Empress Dowager Tz'u-his（1835-1908）"（《被诽谤的皇太后：对慈禧太后的修正研究》），in *Modern Asian Studies*（《现代亚洲研究》），1979，(13)，177～196页。

[6] Bays, Daniel H.（裴士丹），*China Enters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ang Chih-tung and the Issues of a New Age, 1895-1909*（《迈入20世纪的中国：张之洞与一个新的时代，1895—1909》）。Powell, Ralph L.（拉尔夫·鲍威尔），*The Rise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 1895-1912*（《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Ch'en, Jerome（陈志让），*Yuan Shih-k'ai*（《袁世凯》）。MacKinnon, Stephen R.（麦金农），*Power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Yuan Shi-kai in Beijing and Tianjin, 1901-1908*（《帝国晚期的政治与权力：袁世凯在北京和天津，1901—1908》）。

[7] Mark Elliott（欧立德）用几乎同样的词汇，类似地谈到了清朝灭亡时满人的消失。参见其 *Resident Aliens: The Manchu Experience in China, 1644-1760*（《外来居民：满洲人在中国之经历（1644—17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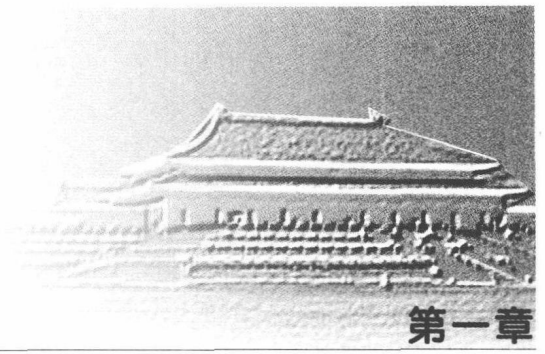
[8] Lee, Robert H. G.（罗伯特·李），*The Manchurian Frontier in Ch'ing History*（《清代满洲边疆史》）。Des Forges, Roger V.（戴福士），*Hsi-liang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Revolution*（《锡良与中国民族革命》）。Crossley, Pamela Kyle（柯娇燕），*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孤军：三代满族人和清朝的灭亡》）。

[9] 郑天挺：《探微集》，176页。Ch'en, Chieh-hsien（陈捷先），"The Decline of the Manchu Language in China during the Ch'ing Period（1644-1911）"（《清代满语的衰落》），in Walther Heissig（海西西）ed., *Altaica Collecta*（《阿尔泰学论集》），144页。Wright, Mary Clabaugh（芮玛丽），*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53 页。

[10] 邹容：《革命军》，1 页（Lust（拉斯特）译本，58 页）。

[11] Wright，Mary Clabaugh（芮玛丽），"Introduction：The Rising Tide of Change"(《绪论：高涨的变革潮流》)，in *China in Revolution：The First Phase，1900-1913*（《革命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21～23 页。



第一章

隔离与不平等

狭义上的“反满”，即中国占人口多数的汉人与“异族”满人之间的族群对立，主要是指在1899—1900年排外的义和团运动后的几年里，汉人对清廷的批评。[1]例如，邹容（1885—1905）在其1903年写成的小册子《革命军》中控诉，“不平哉！不平哉！中国最不平、伤心惨目之事，莫过于戴狼子野心、游牧贱族、贼满洲人而为君”[2]。当然，革命者从来不是狭隘或完全地反满。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提出了四个目标，首要目标就是“驱逐鞑虏”，其他三个目标是：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而且，在族群对立之外，革命者还提出了大量理由来为驱逐满人统治者正名：他们无能、腐败、专制、独裁，最重要的是不能抵御列强的侵略、保卫中华民族的利益。除了这些批评之外，革命者还一遍又一遍地声称，满人必须被驱逐，因为他们不是“中国人”。

但是，谁又是真正的满人呢？他们通常被描述为散居于中国东北部边境、与朝鲜接壤的女真部落的后裔，努尔哈赤（1559—1626）在16世纪90年代统一了这个部落，他的儿子和继任者皇太极（1592—1643）在1635年将其更名为“满洲”。实际上，满人

是一个更加广泛、更加异质化的族群；他们包括八旗的全部成员，而“满洲”仅仅是八旗中的一个（尽管是公认的核心）部分。八旗成员的整体和个人都被称为“旗人”。所以，满人身份问题不可避免地与八旗制度联系在一起。

12 革命者批评满人是异族，这种批评有效吗？清代（1644—1911）的满人在多大程度上，在哪些方式上，与汉人有明显的区别呢？尤其是按照芮玛丽的观点，她在《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中引用了清廷1865年的谕令，声称这消除了两个族群之间最主要的差异。这样，两个族群之间还有多大区别呢？

反满缘由

在具有革命思想的年轻知识分子中，反满是高度一致的呼声。他们很多人在义和团运动后的几年里聚集到日本学习。他们关注的焦点是帝国主义的威胁。随着列强入侵华北以镇压义和团运动，以及俄国于1900年占领满洲里，中国似乎已经处于被外国列强瓜分的边缘。国家的这种危险境地很容易被归罪于清廷和所有满人。1900—1901年间的《开智录》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清楚地说明了反帝国主义与反满之间的联系：“我国人日言为外人奴隶之耻而不知为满洲奴隶之耻，日言排外种而不知排满洲之外种。”[3]

义和团运动后的最初几年，最直言不讳的反满批评家是章炳麟（1868—1936）、邹容和陈天华（1875—1905）。章炳麟在三个人中年纪最大，坚持得最久，他和1898年的变法者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戊戌变法失败后，章炳麟和他们一样，不得不逃离中国。但直到1900年夏天，他才真正成为一个革命者。当时，由于对慈禧太后错误处置义和团运动感到忧虑，章炳麟首次公开对满人发起了攻击。他给那时香港兴中会新近创办的机关报——《中国日报》写了两份申明。在其中的一份中，他宣布自己剪掉了辫子——这条辫子把他和清廷联系在一起，并解释了为何这么做。后来，章炳麟又发表了其他抨击满人的文章，以之攻击保皇派。

比如1901年在东京《国民报》上发表了攻击梁启超（1873—1929）的文章，1903年在上海发表攻击康有为（1858—1927）的小册子。这些反满著作也使得他受“苏报案”的牵连，于1903年在上海被捕。1906年被释放后，章炳麟在东京加入了孙中山（1866—1925）的组织，在刚成立一年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中任编辑。[4]

第二位主要的反满批评家是邹容，他于1903年在上海出版了《革命军》，章炳麟为这本小册子写了充满溢美之词的序言。邹容早在一两年前还在日本当学生时，就写出了这本著作。由于锋芒毕露地批评清廷，他也因“苏报案”而被捕，并于1905年，在年仅20岁时死于狱中。可能正是由于他英年殉难，在义和团运动之后的十余年里，他的《革命军》成为反满著述中传播最为广泛的作品。[5]

最后一位是陈天华，他比邹容大10岁，著有《猛回头》、《警世钟》两本小册子。这两本书于1903年在东京出版，当时他在东京学习了大约一年时间。1905年，陈天华在东京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并为《民报》第1号撰写了文章。此后不久，为了抗议日本媒体对中国留学生爱国精神的诋毁，陈天华蹈海而亡。他未完成的小说《狮子吼》在他死后出版。[6]

革命者大量控诉满人的身份，但这些控诉大多不成系统。即使在措辞激烈的小册子如《革命军》里，他们对满人的抨击也通常散见于对清廷的更宽泛的谴责之中，比如批评清廷腐败、专制或者不能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然而，在义和团运动之后的几年里，当时一些革命文学作品对满人的各种批评可以概括为七宗罪。这些具体的罪状主要来自邹容、陈天华和章炳麟的著作，也包括这一时期的其他出版物。除了陈天华的《狮子吼》，所有这些作品在1905年年中同盟会成立之前就已经面世。[7]

满人七宗罪

第一宗罪，满人是异族，是不属于中国、不同于汉人的野蛮民族。1903年，张继在《苏报》上直截了当地声称：“吾怪满洲人

何也？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8]这种立场把反满的革命派和反帝的改良派区别开来，改良派最关心的是把帝国主义列强（而不一定是满人）从中国驱逐出去。在改良派看来，满人统治者和他们的臣民一样，都是“中国人”。而对于诸如张继这样的革命派而言，满人绝对不是“中国人”，和列强一样，满人也不应该待在中国。

14 革命者在称呼上用两种方式来区分满人与自己。一种方式是按照汉人的传统来称呼中原文化圈周围的各种“野蛮民族”。因此，邹容声称：

> 吾同胞今日之所谓朝廷，所谓政府，所谓皇帝者，即吾畴昔之所谓曰夷、曰蛮、曰戎、曰狄［东南西北的野蛮民族］、曰匈奴、曰鞑靼。其部落居于山海关之外，本与我黄帝神明之子孙不同种族者也。其土则秽壤，其人则毡种，其心则兽心，其俗则毳俗。[9]

通常用来指称和诋毁满人的其他类似标签是“东胡”（东边的蛮族），这是章炳麟常用的词语；还有“鞑虏”，这是同盟会会员的誓言，是把“鞑靼”和“虏”组合到了一起。“虏”是北宋时期用来称呼契丹（Khitan）的一个古老词汇。[10]在涉及自我称呼时，这些称满人为“蛮族”的革命者，通常称自己为“中国人”，如张继经常用“中国人”一词，梁启超在1898年《清议报》的评论里，使用了“支那”或者“支那人”一词，这是“Shina”的汉语读音，该词是日本明治时期对中国最普遍的称呼。[11]让人感兴趣的是，他们几乎从未自称为“华”和（或）“夏”，这是文明核心圈的人与周边异族比较时经常使用的传统词汇。

革命派把自己与满人区分开来的另一种方式，是利用梁启超翻译引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外来学说。根据他们对该学说的理解，如陈天华在《狮子吼》中举例说明的那样，世界人口按照位置和肤色被划分为五个大的人种：黄色人种、白色人种、黑色人种、棕色人种和红色人种；每个人种又可以依次被划分为若干小族，并进一步被划分为较小的群体，如民族和部落。这样，白种人生活在欧洲和北美，他们由三个种群构成：“阿利安种、条顿

种和斯拉夫种。”据邹容所言，与此类似，黄种人主要生活在东亚和东南亚，由两个种群构成：中国和西伯利亚。中国人种包括汉人——朝鲜人和日本人是汉人的亚种、藏族人和越南人；西伯利亚人种包括蒙古人、土耳其人和通古斯人，满人是通古斯人的一个亚种。[12]陈天华通常称满人为“满洲人”，而邹容和其他许多人 15
则通常使用梁启超宣传普及的“满人”一词。在这种情况下，广泛使用的自我称呼词汇是“汉人”，这也是梁启超的杰作。陈天华在《狮子吼》中重新表述了张继的口号：“中国者，汉人之中国也。”[13]今天广泛使用的“汉族”一词，在当时和“满族”一样，很少被用到。这些用来确定满人、汉人的词汇，其使用范围和使用的相对频率在本研究中逐渐变得明确。

第二宗罪，满人对汉人犯下了令人发指的大量罪行，尤其是在17世纪中期的征服过程中。他们的野蛮行径标志着满人成为汉人祖祖辈辈的敌人，尽管这些罪行发生在很久以前，但他们必须受到报复。这些罪行中最不可饶恕的是，满人统一中国时，对中原和南方许多城市里手无寸铁的市民进行了残忍的杀戮。邹容引用了那时新近再版的关于“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两地都在江苏）的史籍，称满洲军队为“纵焚掠之军”，“贼满人铁骑所至，屠杀掳掠”。根据章炳麟1903年的文章，这些暴行不应仅仅归因于一些单个的满人军官；相反，每个满人都负有责任，并应受到惩罚。因此，“汉族之仇满洲，则当仇其全部”[14]。

第三宗罪，通过把野蛮的习俗强加于汉人臣民身上，满人使中国趋于野蛮化。与以前异族征服者被汉人生活方式同化不一样，满人强迫汉人适应他们的风俗习惯，尤其是他们的男人发式和官服。正如邹容愤怒指出的：

> 拖辫发，著胡服，蹀躞而行于伦敦之市，行人莫不曰Pig tail（译言猪尾）、savage（译言野蛮）者，何为哉？又蹀躞而行于东京之市，行人莫不曰チセンチセンボツ（译曰施尾奴才）者，何为哉？嗟夫！汉官威仪，扫地殆尽；唐制衣冠，荡然无存。受抚吾所衣之衣，所顶之发，吾恻痛于

心。……辫发乎！胡服乎！开气袍乎！胡服红顶乎！朝珠乎！为我中国文物之冠裳乎？抑打牲游牧贼满人之恶衣服乎？[15]

16 第四宗罪，满人把自己上升为特权族群，凌驾于汉人之上。据邹容所言，“虽阅年二百有奇，而满自满，汉自汉，不相错杂。盖显然有贱族不得等伦于贵族之心”。也就是说，满人并不认为汉人与他们是平等的。为了举例说明满人与汉人混杂的失败，邹容提到了驻防。满人在各主要城市都有驻防军队，然而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军营里，在居住环境上与汉人隔离开来。在《狮子吼》中，陈天华指出，清朝禁止满汉联姻，也是另一种隔离满汉的手段。此外，革命派宣称满人生活在自己的独立世界里，统治着汉人，又排斥着汉人。为了回应梁启超早期的评论，陈天华在《猛回头》中声称：“（他们）要十八省的人，公养他五百万，至今不农、不工，只是坐食汉人。列位！这岂非是可恨之极吗？”[16]

第五宗罪，满人让汉人屈从于外族的军事征服。他们让旗兵分别驻扎于一些战略要塞，保持了对汉人的统治。陈天华在《狮子吼》中论及清初统治者对军队的周密部署：

> 看见女真因为分散，致被汉人所杀，把带来中国数百万满洲人，一半驻在北京，号称“禁军”；一半驻各省，号称“驻防”。

邹容也分析了各省驻军使用的“驻防”一词：

> 且试绎“驻防”二字之义，犹有大可称骇者。得毋时时恐汉人之叛我，而羁束之如盗贼乎？不然，何为而防，又何为而驻也？又何为驻而防之也？

正如《苏报》1903 年刊载的一篇文章中称，各省驻防的军队很明显的目的是“压制奴隶”。[17]

17 第六宗罪，满人至少从三个方面对汉人实行政治歧视。他们以人口有限的少数民族统治为数众多的汉人。在邹容看来，“世界只有少数人服从多数人之理，愚顽人服从聪明人之理，使贼满洲人而多数也，则仅五百万人，尚不及一州县之众”。与清廷自称

“满汉平等”相反，满人对汉人的歧视也是通过独霸高层统治而实现的。陈天华在《狮子吼》中指出：“朝中各官，满汉平分，重要的职任，都是满人执掌。”邹容还对京城的行政管理做了一个详细的分析，总结道：“是其出仕之途，以汉视满，不啻霄壤云泥之别焉。”满人对汉人的歧视还表现在职位的升迁方面，邹容指出：

> 故常有满汉人同官、同年、同署，汉人则积滞数十载不得迁转，满人则俄而侍郎，俄而尚书，俄而大学士矣。……即幸而亿万人中有竟登至大学士、尚书、侍郎之位者，又皆头白齿落，垂老气尽，分余沥于满人之手。[18]

最后是第七宗罪，满人虽然自称调和满汉，但是其实一直对汉人怀有敌意。作为证据，革命派反复引用梁启超在1900年一篇文章中引述的刚毅（1837—1900）的一则论断——刚毅是1898年之后慈禧太后的朝廷中保守派满人大臣的领袖，文中说“汉人强，满人亡；汉人疲，满人肥”[19]。邹容称刚毅的观点体现了朝廷一系列措施后的一条潜在规律，太平天国革命（1851—1864），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义和团运动，在每一次事件中，都是满人得到了所有的利益，而汉人做出了最多的牺牲。对于朝廷所推行的“富强”运动，邹容说：“故今日强也，亦满人强耳，于我汉人无与焉；故今日富也，亦满人富耳，于我汉人无与焉。”[20]对于革命者而言，正是满人的反汉立场导致了朝廷不能，其实是不愿抗击西方列强，捍卫中国的领土和主权。朝廷的政策还体现在刚毅的另一番著名言论中：“我家的产业，宁可以赠之于朋友，而不必畀诸家奴。”[21]如果真的让给邻邦，那么清朝不啻成为陈天华所谓的“外国人的朝廷”，汉人则成了邹容所谓的“野蛮人奴隶之奴隶”[22]。

18

满人和旗人

义和团运动之后的几年里，革命派对满人有许多称谓，“旗人”一词却显然不在其中。这很奇怪，因为毕竟有七分之四的满人都称自己是八旗子弟，正是八旗士兵在清朝占领中原的时候实

施了许多针对汉人的暴行（第二宗罪），正是他们让被征服的汉人处于各种驻防部队的持续镇压中（第五宗罪），正是大量旗人独立于汉人之外而享受了各种特权（第四宗罪），他们大大受惠于清廷对汉人的政治歧视政策（第六宗罪），因此在革命者看来，满人就等同于旗人，在满人自己眼中也是如此。正如一名清朝皇族后裔回忆的，“满人自称也被别人称为旗人”。或者如同李中清（James Lee）和罗伯特（Robert Y. Eng）所言：“八旗制度是统一满人、定义满人身份的主要体制。”[23]

八旗制度由清朝的创始者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一手创建，在推翻明朝（1368—1644）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到19世纪末，这一制度基本没有什么变动。努尔哈赤在1615年创立了八旗制度，将自己控制的散居于东北山区的女真部落分为八部，称为“旗”，每旗由一些“佐领”统率。20年后，皇太极给他的人民取了一个新名字“满洲”（来源于“满人”），他们于是成为“满洲八旗”。同时，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在东北南部的平原地区建立了自己的统治，控制并奴役了当地的汉人居民之后，就开始将汉人俘虏分配给八旗首领为
19 奴，这些汉人家奴被称为“包衣”（包衣，来源于满语booi，也就是家奴的意思），他们中的一些人被编入各旗，成为他们主人旗下的一分子。后来，到1642年，随着越来越多的汉人被皇太极招降或击溃，皇太极不再将汉人俘虏收为“包衣”编入各旗，而是将汉人单独组织起来，组成“汉军”八旗。同时，在1635年，皇太极为归附自己的东北西部和蒙古东部的蒙古人另行组建了八旗组织。虽然后来其他人民都按照八旗体制被组织起来，但在皇太极的继任者于1644年入主中原之时，八旗制度的基本组织结构已经定型，其中包含了三种族群成分：满洲人、蒙古人和汉军。每部分各有八旗，共同组成全部二十四旗的旗人队伍。[24]

八旗制度虽然结构简单，但在组成成分上却是完全异质。八旗成员除了由三个部分即满洲旗人、蒙古旗人和汉军旗人组成之外，还有其他很多重要的内部区别：上三旗和下五旗，新旗人和旧旗人，皇族后代和普通旗人，普通旗人和包衣奴隶，核心旗人和归附旗人，京师旗人（京旗）和各省驻防旗人，旗人士兵及他

们的家眷。

八旗制度中，每类八旗都是由不同颜色的旗帜来区分的（黄、白、红、蓝）。每种颜色分别有“纯色”和镶有红边或白边的“镶色”两种旗帜。八旗的地位等级次序由高到低为：镶黄，正黄，正白，正红，镶白，镶红，正蓝，镶蓝。前三种即镶黄、正黄、正白，组成了上三旗。他们都是早期由皇室直接统率的旗人。后五种组成了下五旗，他们是由其他王公贵族统率的旗人，直到雍正年间（1723—1735）才归由皇室指挥。上三旗比下五旗拥有更高的地位。[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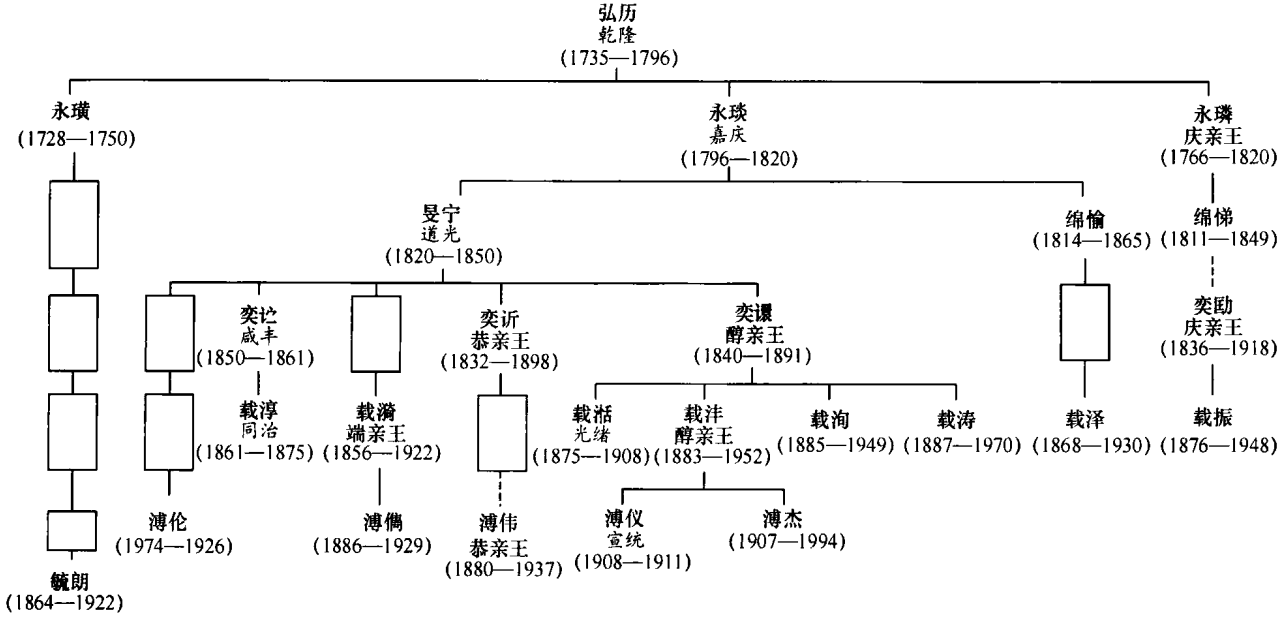
在三种不同族群的八旗成员中，满洲八旗在晚清时数量最多。根据辛亥革命后编撰的《清史稿》描述，京师旗人中53.5%的官员和士兵属于满洲八旗，31.8%属于汉军八旗，14.7%属于蒙古八旗。[26]但是，如果把各省的八旗军队都统计进来，汉军八旗的比率还要小很多。这是因为乾隆时期（1736—1795）允许部分汉军八旗“出旗为民”，此项措施对各省驻防旗人的影响明显大于对京师旗人的影响。所以，大体看来，约有60%的八旗士兵为满洲八旗，其他40%则为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两者大体上各占一半）。

满洲八旗不仅是最古老、数量最多的，而且毫无疑问也是享有最多特权的旗人。满洲八旗的地位高于蒙古八旗，而蒙古八旗的地位高于汉军八旗。[27]但是，正如整个八旗不是一个同质的整体，满洲八旗本身的构成也是多样化的。例如，满洲八旗的成员以早期的女真人为核心，此外还包括三十七支蒙古人，六支朝鲜人，一支俄罗斯人和一支番子。这些外族人和散居于满洲八旗中的一些蒙古人、汉人一起，共同构成了满洲八旗的整体。[28]满洲八旗中最大的区别是老满人和新满人的不同，这主要取决于他们纳入清朝统治的时间。老满人（“佛满洲”，“佛”是满语“老”的意思）是那些先辈们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就被编进八旗的人，他们主要来自建州女真或其他的女真部落；另一方面，新满人（“伊彻满洲”，“伊彻”是满语“新”的意思）则主要是清兵入关后，臣服于清朝统治的其他东北部落的后代，他们在顺治年间（1644—1661）和康熙年间（1662—1722）编入八旗，并向南移居

到黑龙江盆地，以抵抗俄国的领土扩张。新满人包括两支非女真通古斯语群——赫哲和库雅喇——他们生活在东北满洲和西伯利亚附近的群山和河流之间，以渔猎为生。还有四支混合了蒙古语和通古斯语的部落——达斡尔、索伦、鄂伦春、锡伯，他们生活在大兴安岭两侧，西至蒙古大草原，东至满洲森林。新满人与清朝统治者的联系更晚，也更疏远。新满人虽然比老满人地位低，但是他们拥有一定程度的自治，即使在新满人编入八旗之后，他们仍然由本部落和本氏族的首领来统率。[29]

老满人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皇族，他们包括两大部分的族系。
21 一部分是皇族宗室“爱新觉罗”，他们的祖先是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另一部分是努尔哈赤的叔伯和兄弟的后代，被称为“觉罗”。这两支皇族的后代数量增长很快。到了清末，约有两万九千人为直系皇族，另有两万人为旁系皇族。虽然这两支皇族分别编入了不同的八旗，但是所有的皇族后代，包括直系和旁系，都直接由宗人府统管，而不是由各旗首领统治。[30]皇族中最高贵的宗族被封为王公贵族，共有十二种级别，前四种爵位分别是：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除了八大“铁帽子王”世袭罔替，其他爵位并不世袭，每世递降一等。例如，三等贝勒的长子继承爵位，封为四等贝子，其他的儿子都封为九等“镇国将军”。[31]因此，只有极少数的皇族成员拥有爵位。

在义和团运动后，最显赫的皇族宗室成员，毫无疑问是庆亲王奕劻。奕劻出生于 1836 年，是乾隆皇帝之曾孙，属于皇帝直系后裔所在的下五旗之一的正蓝旗。其祖父永璘被封为庆亲王，于 1796 年嘉庆皇帝即位后受封。因伯父绵悌无男性子嗣，奕劻在 1850 年伯父去世后继承家业，然而受爵位世袭制度所限，此时他仅袭封为十等辅国将军。后因长期辅佐慈禧太后而受到赏识，他擢升很快。当 1884 年接替恭亲王奕䜣成为总理衙门负责人之时，他已经成为二等郡王，从而继承了家族的庆王爷头衔。十年后的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之际，他被封为一等亲王。到了 1908 年 12 月，宣统朝（1909—1911）之初，他已经达到爵位阶梯的顶峰，拥有了少见的世袭罔替之权。1911 年年初，朝廷组成内阁时，奕劻成



晚清皇族重要成员示意图

资料来源：李治亭：《爱新觉罗家族全书》，卷2.3。
注释：虚线表示收养的后代，楷体标注的为皇帝年号。

23 为第一任总理大臣。[32]义和团运动之后，在清朝皇族的旁系中最有名的人物或许是镶黄旗的良弼（1877—1912）。其先祖是努尔哈赤的弟弟，其祖父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时参与谈判和签订《南京条约》的伊里布。在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良弼是反对共和的主将。1912年1月底，正是他的被暗杀才使得朝廷最后决定退位。[33]

八旗中的第二类是蒙古八旗。他们大多是邻近东北的蒙古东部边界的游牧民族。蒙古旗人也分为老旗人和新旗人。这主要取决于他们是清朝入主中原之前还是之后归降的。蒙古的老旗人包括早期的追随者科尔沁部和察哈尔部。新旗人则是后来加入的巴尔虎部（Barga）、厄鲁特部（Olot）等。义和团运动后最有名的蒙古旗人是镶蓝旗的锡良（1853—1917），他在1911年时任东北三省的总督。[34]

八旗中的第三类是汉军八旗。[35]同样也按入旗先后分为老旗人和新旗人。老旗人是被皇太极俘虏的东北南部的汉族边民，新旗人则是在后来的战争，主要是1644年入主中原的战争和后来镇压三藩之乱（1673—1681）的战争中被虏俘的汉人（1644年之后被俘虏的其他汉人都被编入了绿营）。汉军八旗是八旗制度中地位最低的一个族群。在乾隆皇帝重新组织八旗时，正是新汉军八旗受到了最大的冲击。尽管汉军八旗在旗人中间地位最低，但他们依然是八旗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6]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汉军八旗中职衔最高的旗人是正蓝旗的赵氏兄弟：赵尔巽、赵尔丰。赵尔巽（1844—1927）在1911年接替蒙古旗人锡良成为东北三省的总督。辛亥革命后，他负责主持了《清史稿》的编撰。他的弟弟赵尔丰在辛亥革命时任四川总督，在革命中被杀。[37]

八旗制度中还有比汉军旗人地位更低者：包衣。皇帝的包衣属于上三旗，归内务府管理，主要在宫廷中服务。其他王公贵族的包
24 衣属于下五旗。严格地说，包衣并不是八旗中的一个独立成分，他们只归属于其主人所在的旗。因为包衣世代为奴，所以即使上三旗的包衣也不能和普通旗人相提并论。包衣在清初的统治中扮演着重要的中间人角色，但在晚清政治舞台上却并不重要。[38]

八旗制度为旗人提供了一个赖以为生的制度框架。所有的旗

人——男人、女人、小孩——都是二十四旗的成员。除了皇族和上三旗的包衣是由宗人府和内务府管理之外，其他的旗人都由各旗管辖。旗人的旗籍都是世代固定的，只有女人因为出嫁会随夫改变旗籍。[39]对于旗人而言，旗籍是仅次于世系和家族的身份标志。

八旗是按军事体制编排的。二十四旗分别由一名都统（从一品）和两名副都统（正二品）统管。都统、副都统基本上都是旗人，一般都由王公贵族或高官担任，但不一定是本旗的旗人，甚至不一定是本族的旗人。[40]每旗自主处理本旗事务，另由各旗代表组成“值年旗”，协调八旗间的事务。[41]八旗的都统衙门都设在北京。

对于旗人而言，八旗是两个基本的社会单位之一。因为不同颜色和族群的八旗享有不同特权，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个人的社会地位。八旗颜色和八旗族群也同样决定了旗人的居住地点，根据八旗颜色和地理方位的对应关系，旗人被分配了相应的居住地。与其他的汉人和蒙古人不同，在八旗制度下，黄色旗一般居于北部，白色旗在东部，红色旗在西部，蓝色旗在南部。于是在环绕紫禁城的北京内城中，两支黄色旗（最高贵的两旗）占据了北部城区，白色旗居于东部城区，红色旗在西部城区，蓝色旗（地位最低的两旗）在南部城区。[42]举例而言，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出身正红旗的满人文学家老舍（1899—1966）是在北京西城和西北部出生和成长起来的。[43]各旗按颜色配置，由此又形成了两翼。镶黄旗、两白旗和正 25
蓝旗组成了“东翼”（或者以面南方位称为“左翼”），而正黄旗、两红旗和镶蓝旗组成“西翼”（或“右翼”）。[44]各旗的族群划分是另一种次要的地域区分要素。在北京，八旗在内城的分布区还依照族群标准，进一步分为三个区域。于是，北京内城总共分成了 24 个居住区。各色的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散布于整个内城，但是都居住于独立的区域内。[45]这种以各旗颜色和族群为标准的空间分布也被各地的驻防旗兵所仿效。

八旗各旗分为不同的甲喇，甲喇一词来自满语 jalan，每一甲喇进一步分为不同的佐领。每个满洲八旗或汉军八旗各有 5 个甲喇，每个蒙古八旗则只有 2 个甲喇。每个甲喇由一个参领统率（正三品），参领和下级军官都由各旗内部任命。在满洲八旗中，每个甲

喇中佐领的数量为 14 个到 19 个，蒙古八旗中为 11 个到 15 个，汉军八旗中为 5 个到 9 个。[46]总计而言，八旗共有 2 000 多佐领。

相比于八旗，佐领是旗人更基本的社会单位。佐领中的成员身份与旗籍一样，都是世袭相传的，佐领的成员“共同居住在各旗指定的区域内”[47]。佐领是旗人身份认同的基本单位，如同对于大部分其他的中国人而言，县是身份认同的基本单位一样。正如一名汉人可以被称为“某省某县人氏”，而旗人则被称为“某旗某佐领人氏”。每佐领都由一名同样被称为佐领（正四品）的军官统率，并由一名骁骑校（正六品）协助。和汉民地方官被当地居民称为“父母官”一样，佐领对于佐领中的成员而言也是“父母官”。旗人由佐领统领在一起，佐领不像地方官那样定期轮换，所以很多时候，佐领的名字往往成为旗人区别身份的标志。例如，1904 年，满人正红旗第三甲喇的第十五佐领，常被称为“宜珍佐领”。[48]

最后，八旗组织最基本的单位是“旗兵”。每佐领都有一定数量的旗兵。根据张德泽的研究，在晚清时期，一个满洲八旗佐领
26 拥有约 260 名旗兵，蒙古佐领有 100 余人，汉军佐领约有 140 人。[49]佐领的主要职能之一是登记佐领中所有成员身份，提交给各旗的总部，并每三年提交给税务机构。登记簿中要记载每个旗人的姓名、年龄、职业地位、家庭关系等资料。此外，还要区分男丁的军事能力：未满 16 岁的为幼丁，16 岁到 60 岁的为壮丁，超过 60 岁的为退丁，有病的为废丁。这种登记的目的，是为了追踪记录佐领中那些符合新旗兵挑选条件的男丁，以补充年老退役或死亡的旗兵。[50]除了汉军八旗之外，人口登记的另一目的是帮助各旗的佐领向皇宫推荐合适的年轻女性以供服务。[51]

所有八旗的旗人，除了作为二十四旗之一的成员，还被指派到特殊地区居住，通常是军事驻防地，这主要依据八旗佐领所属的类型进行分配。所有旗兵都被登记到相应的服务机构。这些额外的从属关系也被用来进一步区分旗人人口。举个例子，老舍的父亲不仅仅是满洲正红旗的成员，也是京畿护军营的成员。直到晚清，朝廷依然以法令的形式规定了八旗制度中佐领的地域分布、驻防的规模和数量（除了 19 世纪末洋务运动中的一些创新之外），

以及服务机构的规模和责任。因此，1899 年颁行的《大清会典》和后来的《清史稿》中对八旗制度的描述，几乎与威妥玛（T. F. Wade）在 1851 年英文《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中的描述一致，后者主要基于 1812 年编修的《大清会典》。

习惯上，八旗佐领分为三类：外佐领、内佐领和驻防佐领。此外还有第四类附属性质的佐领。外佐领包括北京和周围地区的常住旗人，他们通常被称为驻京八旗，这类佐领数量最多，有 1 147 佐领。内佐领主要由包衣组成，俗称“包衣佐领”，主要居住于北京、直隶和奉天地区。据《清史稿》称，内佐领有 115 佐领。[52]驻防佐领是京外和各省的旗人，共有 817 佐领。这三种类 27
型的佐领总数约为 2 079 个，通常认为这些佐领构成了八旗军队的全部。但是，《大清会典》也指出有第四种佐领，他们由驻防边境的各种旗人组成，属于八旗旗人，但是通常不被计入各省的驻防旗人之列。对于这部分的佐领并没有详细的统计。

驻京八旗的士兵一般被分配到五种建立已久的军事机构中（按特权优先顺序）：亲军营、前锋营、护军营、骁骑营和步军营，这些驻防机构都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就已建立起来的。此后，清初又设立了一些新的军事机构：火器营、圆明园护军营、健锐营。在清末的洋务运动中又建立了一个新的京城驻防单位，当时的西方人称之为的“神机营”。所有这些军事单位，包括北京地区的其他驻防，共同担任了拱卫京师的责任。所以，90%的驻京八旗都驻扎在北京内城。其他的部队则主要分布在西北郊的颐和园地区。

根据不同的统计，驻京八旗的官兵数量有 125 000～150 000 人左右（见表 1—1）。在威妥玛的统计中，驻京八旗有7 305 名军官，90 333 名常规士兵，31 064 名养育兵，2 497 名工匠和其他人等，总数有 131 199 人。王锺翰根据 1849 年的一项资料，统计旗兵的数量为 149 425 人。1907 年，杨度引用的北京八旗机构提供的数字是 139 430 人。《清史稿》称驻京八旗的总数是 126 989 人。[53]基于以上各种资料，晚清的驻京八旗总数应该约有 130 000 名官兵。如果把 20 000 余人的包衣也统计进来（根据威妥玛和《清史稿》的数据），那北京地区的八旗总人数约为 150 000人。

表 1—1　　北京驻防八旗的组织和兵力

	威妥玛			《清史稿》			杨度	刘凤翰
	军官	士兵	总计	军官	士兵	总计		
驻京八旗								
亲军营	1 201	1 756	2 957	——	——	——	1 756	1 742
前锋营	160	1 764	1 924	230	1 668	1 898	1 764	1 764
护军营	1 199	14 075	15 274	1 502	14 081	15 583	15 975	15 975
骁骑营	3 340	65 437	68 777	——	——	——	80 538	75 427
步军营	575	23 012	23 587	——	——	——	21 238	23 122
火器营	297	7 814	8 111	——	——	——	——	——
内火器营	——	——	——	148	3 920	4 068	4 021	4 016
外火器营	——	——	——	145	3 700	3 845	3 797	3 797
圆明园护军营	350	6 108	6 458	336	6 408	6 744	6 508	4 108
健锐营	183	3 928	4 111	102	3 878	3 980	3 833	3 933
醇亲王园寝营	——	——	——	3	48	51	——	——
小计	7 305	123 894	131 199	6 680	120 309	126 989	139 430	133 784
八旗包衣								
上三旗	404	7 480	7 884	278	8 477	8 755	——	——
下五旗	212	9 705	9 917	918	10 740	11 658	——	——
小计	616	17 185	17 801	1 196	19 217	20 413	——	——
总计	7 921	141 079	149 000	7 876	139 526	147 402	——	——

资料来源：Wade，T. F.（威妥玛），“The Army of the Chinese Empire：Its Two the Great Divisions，the Bannermen or National Guard，and the Green Standard or Provincial Troops…”（《中华帝国的军队：旗兵或国家卫队，绿营或各省驻防》），in *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1851，(20)，254、308 页。《清史稿》卷 130，3 886～3 889 页。杨度：《杨度集》，425 页。刘凤翰：《清季自强运动与军事初期改革(1861—1895)》，346～347 页。

还有一些既不属于驻京八旗，也不属于包衣的旗人，他们一般归属于各地驻防佐领或者下属的八旗分遣机构。据《大清会典》记载，各地的驻防佐领有 817 个，被分为 91 个驻防部队，每个驻防部队都有一定数量的佐领和相应数量的官兵。[54] 如前所述，对于所有的附属佐领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各省的驻防部队在规模上也各有不同。大的部队均超过了 5 000 人，如盛京（7 031 人）、西安（6 588 人）、荆州（5 668 人）。小的部队，如直隶的顺义，只有 50 人。规模较大和较重要的各省驻防旗营都由“将军”（从一品）或副都统（正二品）统领指挥。小一些的驻防部队则是由城守尉（正三品）或防守尉（正四品）或防御（正五品）[55] 统领。较大驻防部队的指挥官通常还有权管辖附近一些小的驻防部队。另外在一些特殊的地区，情况还有所不同，如盛京将军可以管辖奉天的 24 个驻防部队。一般而言，驻防部队的统领通常为外派来的军官，而其下属则来自本部队。

和驻京八旗一样，各省的旗兵也分属不同的机构，主要包括骁骑营、前锋营、步军营等。骁骑营一般是基本的单位。和驻京八旗不同，各省的驻防部队没有亲军营和护军营，而且基本没有汉军八旗。因为乾隆时期大量汉军八旗旗人出旗为民，所以各省的驻防部队主要由满洲旗兵和蒙古旗兵组成。只有东北三省的驻防部队（尤其是奉天）以及广州、福州的部队有汉军旗兵。[56]

荆州位于湖北长江之畔，是历史上的战略要地，其驻防部队规模较大，也具有一定代表性。荆州驻防军于 1683 年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乱后设立，由 1 名将军统领，由 56 佐领组成，其中 40 佐领为满洲八旗，16 佐领为蒙古八旗，没有汉军八旗。将军之下有 2 名副都统，各负责管辖由颜色区分的八旗两翼。在 2 名副都统之下是 10 名协领（从三品），其中 8 名负责满洲八旗的各色旗，另外 2 名负责蒙古八旗的两翼。56 佐领各由 1 名佐领统率，其中 10 名佐领兼任协领之职。每佐领还设有 1 名防御和 1 名骁骑校。根据《大清会典》记载，荆州驻防除军官之外共有 5 668 名士兵，其中三分之二（约 3 800 人）为骁骑营中的马甲或领催，其他士兵包括 200 名前锋，700 名步兵，80 名炮兵，168 名工匠，720 名养育

30 兵。[57]作为八旗成员，他们也相应受北京各旗都统的管辖。与此同时，因为他们驻扎在各省，他们也接受各省驻防将军统领。于是，与驻京八旗相类，各省的旗兵基于不同的旗属、不同的地理位置以及不同的军队，也拥有多重的身份。

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最出名的来自地方驻防的旗人是铁良（1863—1938），他来自荆州驻防，满洲镶白旗人。铁良在1905年被擢升为军机大臣，是袁世凯的死对头，也是革命党人仇恨的对象。[58]

直到清末，各省的驻防旗兵是世袭的，也是固定的。[59]太平天国运动对各省驻防造成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破坏，杭州和南京的驻防旗兵损失大半，不得不从其他各省调配旗兵加以补充。杭州驻防的规模本来是2 216人，重组后的1865—1888年间实际规模为1 461人，他们来自乍浦、福州、德州、青州、江州、成都驻防。被破坏的地方驻防并不一定会完全补充到以前的规模。南京驻防原本有40佐领4 666人，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损失严重，后来从荆州驻防补充士兵，规模变为24佐领2 424人。[60]

各省驻防按地理位置大致分为四个地区：畿辅、东北、西北和其他地区（见表1—2）。[61]根据《大清会典》，畿辅旗兵主要驻扎在北京周围的直隶地区，分为25支驻防部队，共有14 238名士兵，编为54佐领。其中最大的一个驻防部队有2 100人，由1名副都统率领，位于北京北面的密云。在这一地区还有2支隶属于旗籍的大部队驻扎在长城以外：一支1 000人的军队驻扎于热河北部的木兰围场，由热河都统率领（《大清会典》没有明确记载这1 000士兵共有多少佐领）；另一支部队共有10 800人，由察哈尔人、厄鲁特人、巴尔虎人和其他蒙古人共同组成，编为120佐领，属于张家口的察哈尔都统管辖。最后，还有一支1 460人的部队负责护卫位于直隶的两处清朝皇陵：遵化附近的东陵（顺治、康熙、
31 乾隆、咸丰、同治五位皇帝的陵墓所在地）和易县附近的西陵（雍正、嘉庆、道光三位皇帝的陵墓所在地），但他们不被正式算作畿辅地区的驻防或附属部队。[62]

在东北（或满洲）的旗兵共有44支驻防部队，338佐领，

35 361 名士兵。其中 6 支驻防部队附有“水师营”，分布在奉天、吉林和黑龙江 3 个地区，分别由 1 名将军统领。在东北，约有超过半数的驻防旗兵集中于南部的奉天地区，其首府盛京（也被西方国家称作“谋克敦”（Mukden），满语“天眷盛京”之意，即现在的沈阳）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地方驻防军所在地。东北地区还有其他一些旗兵没有被计入驻防部队，主要包括三支大的附属军队：一支是布特哈（Buteha）八旗，由索伦（Solun）、达斡尔（Daur）、鄂伦春（Oreqen）等组成；另外一支是由厄鲁特、巴尔虎组成的游牧骑兵。这两支部队都驻扎在现今内蒙古地区的大兴安岭，由齐齐哈尔的黑龙江将军统率。第三支大的部队由日本海沿岸的赫 32
哲（Hezhe）和恰卡（Kiakar）等民族组成，归吉林三姓（现在黑龙江的依兰）副都统管辖。此外，还有两支部队也被算作东北旗兵：一支 700 人的部队驻守东北南部的柳条边，共有 20 支到 50 支分遣队，由十九门（边门）防御统领；还有 539 人的部队护卫奉天的清初皇陵（包括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陵墓）。[63]

西北地区的旗兵包括 8 支驻防部队，共有 15 642 名士兵，119 佐领，分布在从东部的宁夏到西部新疆—俄国边界的伊犁河谷的广阔地域。这 8 支驻防部队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河西长廊、新疆东部和新疆西部。西北地区最大的驻防部队位于伊犁河谷的惠远（又称 Kuldja，现在的新疆伊宁），共有 40 佐领，归伊犁将军指挥。此外，18 世纪中期由东北北部迁来的索伦和达斡尔旗兵，也由伊犁将军管辖。他们沿伊犁河南岸扎营，通常被视为伊犁驻防部队的一部分而不是八旗附属军。[64]

其他地区的驻防旗兵（不包括直隶）共有 39 879 人，306 佐领，组成 14 支驻防部队和 2 支水师。除了西南的云贵地区，在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所谓的每个“大区域”（macro-regions）中都有至少 1 支驻防部队，通常（并不总是）位于每一地区的核心城市。北京周围的 3 个大区域都有 1 支以上驻防部队。在华北平原，除了北京地区的驻京八旗，以及直隶的驻防部队，旗兵主要驻扎在 3 个地区：山东中东部的青州（今益都），山东西部大运河畔的德州，以及河南开封。在西北高原，旗兵也主要驻扎

在3个城市：西安、绥远（今呼和浩特）和太原。在中东部的长江下游地区，旗兵主要分布在四个地点：南京（或江宁），镇江（或京口）、杭州以及位于杭州和上海之间浙江海湾的乍浦。其余四个大区域都只有1支驻防部队。在长江中部地区，有荆州驻防；在长江上游地区，有成都驻防；在东南海滨有福州驻防；在华南的西江地区，有广州驻防。福州和广州的驻防部队都有附属水师。[65]

33 91支地方驻防部队的总兵力有110 000余人（见表1—2）。驻京八旗和包衣佐领的兵力约为150 000人。所有八旗士兵的总数约为260 000人（不包括附属部队）。其中约55%的兵力集中在北京，45%的兵力分布在各省（5%在京畿地区，19%在东北，6%在西北，15%在其他地区）。这与王锺翰对1849年清朝军队的统计结果相当吻合：149 425人（52%）在北京，52 552人（18%）在东

表1—2　　各省八旗的驻防和兵力

	驻防	佐领	军官	士兵	总计
清陵	——	——	402	1 999	2 401
畿辅地区	25	54	293	14 238	14 531
奉天	25	125	426	18 340	18 766
吉林	11	122	349	10 279	10 628
黑龙江	8	91	228	6 742	6 970
柳条边	——	——	20	700	720
西北地区	8	119	369	15 642	16 011
华北平原	3	26	93	3 323	3 416
西北高原	3	60	214	10 652	10 866
长江下游	4	104	304	10 272	10 576
长江中游	1	56	180	5 668	5 848
长江上游	1	24	75	1 990	2 065
东南沿海	1	18	61	2 720	2 781
华南地区	1	18	101	5 254	5 355
总计	91	817	3 115	107 819	110 934

资料来源：《大清会典》卷84，4b～8a；卷86，4b～8a。Wade，T. F.（威妥玛），"The Army of the Chinese Empire：Its Two Great Divisions，the Bannermen or National Guard，and the Green Standard or Provincial Troops…"（《中华帝国的军队：旗兵或国家卫队，绿营或各省驻防》），in *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1851，（20），315、321、324～325页。

北，85 219 人（30%）均匀分布在其他各地。如果算上大约 4 万人的八旗附属部队，就有大约 300 000 的旗兵，平均分布在北京和地方各省。这也是郑天挺和其他很多学者的观点。[66]

300 000 八旗士兵构成清朝八旗系统的主体，但是他们并非旗人的全部，因为八旗不仅是旗兵组成的军事组织，而且是包含着旗兵们众多家属在内的行政系统。除了八旗士兵的妻子儿女，八旗中还有很多人不是士兵。但人们常常错误地认为每一名成年的八旗男丁都是士兵。清朝时期，八旗人口不断增长，但是八旗军队的规模却没有什么变化。也并不是（与爱新觉罗·宗夔的回忆相反）每一个八旗家庭都会产生一名八旗士兵。八旗男丁中没有被选为旗兵或没有被雇佣（比如成为官员一类）的就成为“闲散”（满语称“苏拉”），也就是没有薪酬、闲散的旗人。[67]

旗兵家属中的这些闲散旗人逐渐增多，但是晚清到底有多少这样的旗人？不同的资料给出了颇为不同的答案。较为极端的说法是，根据 1904 年北京几个佐领的统计资料，约有 1/3 到 1/2 的成年旗人是“闲散”。在一个由俊桐觉罗掌管的满洲八旗佐领（可能是正白旗）中，128 名成年男丁中有 49 人（约 38%）为“闲散”；在另外一个由松华掌管的佐领（旗属不详）中，216 人中有 100 人为“闲散”（约 46%）；第三个例子是宜珍掌管的一个满洲正红旗佐领，168 名成年男丁中 79 人为士兵，其余 89 人据称为“闲散”（约 53%）。换个角度来看，这些佐领登记册中的数据表明，八旗士兵在整个八旗成年男丁中的比例约为 1/2 或 2/3。[68] 34

另一种极端说法来自一些权威人士的研究。虽然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但他们认为八旗士兵与成年旗丁之间 1∶2 的比例太高了。例如，《满族简史》中称，在皇太极时期，只有约 1/3 的成年八旗男子成为旗兵，到 18 世纪中期的乾隆年间，只有 1/8 的八旗男子被选为旗兵。王锺翰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到了 19 世纪 40 年代末，八旗士兵与成年男丁之间的比例已经降到 1∶15。[69]

还有一类资料，即东北地区的族谱，它们提供了介于以上两者之间的统计数据。根据奉天东部三个八旗家族即新宾的关（瓜尔佳）家、吴（乌苏）家和岫岩的王（完颜）家的资料，这三个

家族中只有约10%的男丁有资格当兵或做官。例如，在关家，从1644年到1825年的8代人中共有230名男性成员，其中只有24人当兵，7人做官，其他的199人（约87%）都是“闲散”。仅就19世纪初期的第8代而言，关家共有87名男性成员，其中只有3人当兵，84人为“闲散”。吴家12代人共有226名男性成员，只有23人当兵或做官。王家4代人中有123名男性成员，只有12人不是“闲散”。同样，根据对18世纪户口册的详细分析，在奉天一个位于盛京附近的八旗村庄道义，只有约10%的男性曾经当过兵或做过官。总之，这三个东北家族的族谱和道义屯的户口册一致表明，旗兵的数量大约只占八旗男性的10%。[70]

如果承认八旗士兵大致占男性10%的比例，而女性占旗人总数的一半，那么旗兵在旗人总人口中便仅占1/20（5%）。实际上，根据1910年奉天旗务处的资料，可以知道该省共有4.9%的旗人当兵或做官。[71]因此，如果占旗人总人口1/20的旗兵约有30万人，那么晚清旗人的总数应该约有600万。这个数字与梁启超、邹容和义和团运动后其他一些反满批评家的说法相去不远，他们普遍认为满人的总人口约为500万。如果这样的话，旗人在当时中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就略微大于1%。

35 隔离……

1865年7月23日，一道谕旨以9岁的同治皇帝（1861—1875年在位）的名义颁布天下，认可了山西巡抚沈桂芬（1817—1881）关于彻底改革八旗制度的奏请。这位巡抚建议：

> 嗣后旗人有愿出外营生者……准由该都统给照前往。如愿在外省落业，准其呈明该州县编为旗籍。……所有诉讼案件，统归该州县管理。如有不安本分滋生事端者，即由该地方官照民人一律惩治。其愿入民籍者，即编入该地方民籍。

基于这道重要的谕旨，芮玛丽（Mary Wright）认为：“在1865年，满汉隔离的最后屏障基本已经消除。”[72]然而，同治皇帝的谕

旨并没有产生芮玛丽所说的这种深远效果。这是因为这道谕旨根本没有被认真执行。于是，在1865年之后，满汉继续和以前一样隔离而且不平等。[73]

满汉隔离主要在四个方面体现出来：行政制度、职业、居住地、社会生活。

第一，满汉因“旗民分治”的行政体制而隔离。正如1865年的谕旨所指出：满人和汉人被区分为不同的类别，满人被登记为“旗人”，而其他的人（基本都是汉人）被登记为“民”。这种区分是世袭的，基本上也是永久的。从17世纪起，汉人不再被登入八旗系统。对于满人而言，他们基本不被允许离开八旗系统，除非有统治者的直接命令。例如乾隆皇帝曾下令让大量汉军八旗“出旗为民”。芮玛丽所引用的那道1865年谕旨确实使得旗人能够更容易离开八旗系统，因为它授权二十四旗的都统可以允许个体旗人“出旗为民”。然而，这道谕旨仅仅是允许——而非命令——旗人改变身份。没有什么证据表明有很多旗人要求或者被允许离开八旗。

由于不同的身份划分，旗人的管理也不同于汉人。汉人作为 *36*
“民”，处于从县级官员到省级大吏的各级地方行政机构的管辖之中，旗人则有单独的一套管理体制，他们受到从各地八旗“佐领”到北京各旗“都统”的管辖。总体而言，地方行政官员无权管理旗人，旗人官员也无权管理汉民。例如，在奉天东部的一个驻防城镇岫岩，有500名到600名旗兵，旗人都由驻防部队的军官指挥，并最终受盛京将军统辖。另一方面，汉民人口则由地方通判和奉天首府盛京的官员管理。一些涉及汉民和旗人的案件则需要驻防军指挥官和地方官员联合裁决。[74]鉴于此，1865年的谕旨至少消除了行政上的族群隔离，它使地方行政官员可以管理那些到地方定居谋生而又保持旗人身份者。然而，似乎没什么旗人选择“出旗为民”。所以，这种满汉隔离的分类和管理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

第二，满汉因职业身份而隔离。满人实质上构成了一个世袭的军事阶层，非旗籍的民人则被排除在外。旗人作为八旗体制的

一员，其主要责任就是在需要时作为八旗士兵出征，如果不当兵，旗人只能担任朝廷官员或者务农。所有旗人都被禁止经商或从事其他职业。[75]这一禁令不仅仅是针对旗兵，还包括所有的八旗成员。虽然1865年的谕旨明确允许旗人自谋生计，但是它似乎没有产生任何实际影响。19世纪末，满人依然处于古老而严格的职业限制中，这也使得他们和汉人隔离开来。

第三，满汉因居住地而隔离。有一半的旗人作为世袭的驻京八旗居住于北京，其余大部分旗人则作为91个驻防八旗不均衡地分布在全国各地。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各省，所有的旗人都被限制在相应的驻防地区。尤其是，没有驻防区首领的批准，旗人离开
37 驻防地不能超越一定的距离。在北京，这个距离被限制在40里（大约13英里）以内；在各省，则被限制在20里（尽管在东北这个距离是100里，约33英里）以内。这种限制同样适用于旗人居住地与驻防城市之间的距离。例如，三家子屯（今天属黑龙江富裕县）的旗人受黑龙江将军管辖，这个村子位于齐齐哈尔以北95里的地方，这个距离已经接近旗人被允许外出的最大限制。任何旗人没有经过允许冒险超越了这些规定的距离，就会被看做一个叛逃者。因此，满人没有汉人那样的迁徙自由。汉军镶红旗的候补知府济泰于1888年死于山东，他的儿子不得不请求旗主，允许他陪同父亲的灵柩回北京。山东巡抚在一封给旗主的信中提及了他的请求，称：如果死者的家庭是汉人，则没有必要申请批准这一行程。但是，这个年轻人是旗人。而迄今为止，每个旗人因公务离开北京，都被要求将其行程书面报告给各旗都统。[76]

除了在东北以外，在旗人驻防的城市中心，旗兵和他们的家属都居住在特殊的地区。这个特殊居住区被称为“满城”，按照与当地居民的空间关系可以分为四种类型。[77]一种类型是“连接的双城”，满人住在封闭的内城里，该城毗邻其他非旗人居住的外城。北京内城就是这种类型的唯一例子。当清军在17世纪占领了明朝首都时，他们驱逐了内城的所有居民，旗人占据了整个内城，把汉人和其他非旗人赶到南面的旧城墙之外，这就是外（或汉）

城。[78]第二种类型是“分开的双城”，旗人居住在一个新建的城区，这个城区靠近非旗人居住的城区，但两者完全分开。例如，在山西，八旗驻防位于18世纪30年代修建的绥远城，而汉人、蒙古人和其他人却居住在东北部大约一英里半的地方，即明代的归化城。这两座城市被当地人称为新城和旧城，今天属于内蒙古的 38
呼和浩特。第二种类型的满城还包括青州（山东）、宁夏以及19世纪60年代被破坏的乌鲁木齐（新疆）。[79]

欧立德（Mark Elliott）也描述了两种类型的满城，他贴切地称之为“城中城”，即满城位于已有城市的城墙之内。一种是较大的汉人城市中包含着一个完全被城墙围起来的独立城区，如开封和镇江。[80]另一种最普遍，满城没有完整的环绕城墙，而是和更大的汉城共享某一段城墙。城中城的满城占地面积各异。按照地图的描述，荆州的满城占据了整个城市的东半部；西安的满城位于东北部，占全城的1/3；广州的满城位于城西，占全城的1/4；在南京，满城占据了明皇城东南部的大部分区域；在太原，满城位于城市的西南角。[81]和在北京一样，满人在占据某一城市区域之前，总是要先清空这一地区原有的居民，之后再修筑一段内部城墙。与城市的防御城墙相比，这种城墙不够高大也不够坚固，但是可以明确将其中的居民和城市其他居民划分开来。但福州和广州的满城没有城墙，这些也是例外。[82]

原则上，满城是旗人专有的居住区域。在北京，汉人可以在白天进入满城，但是不能在其中居住。在呼和浩特，居住于归化旧城的汉人不能自由进入绥远的新满城。同样，在镇江，满人驻防是和汉人分开的。[83]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汉人也开始在满城中居住。在北京，一些汉人高官得到皇帝的优许，可以在内城居住。例如，张之洞（1837—1909）于1907年至1909年供职于军机处，他的府第就在地安门——皇城北门——外的白米斜街。[84]更为普遍的是，一些商铺店主成功地获准进入满城居住，这主要是因为旗人不能经商。在19世纪中期的北京，内城约有15 000户汉人商人家庭，此外有76 000户旗人家庭。[85]尽管不断有汉人涌入，但根据1908年到1910年一些零散的人口普查材

料，到清末满城的人口还是以满人为主，汉人只占很小的部分。在北京，直到1908年，414 528名内城人口中旗人依然占54%；在
39 成都，满城中的旗人家庭占53%；在西安占64%。[86]因此，汉人移民虽然改变了满城，但是并没有破坏满城的族群特性。

满城的另一个特点是，即使有了汉人居民，但与满城以外的主城区相比，其中的人口密度还是偏低。（北京是一个例外，内城人口稍多于外城人口。）[87]如上所述，位于内城的满城有时候占据了整个城市1/4甚至1/2的区域，但是其中居住的人口却相对很少。在广州，满城占据了1/4的城市区域，旗人的人口却还不到全城600 000人口的1/10，甚至还不到1/12。19世纪末的外国游人常常评价说人口稀少的满城风景宜人。有人赞美西安的满城“地域宽阔，空气清新，有美丽的花园和古老的大树”。在成都，满城占据了1/5的城区，有人写道，满城是这个城市中最美的地方之一，自然生长的花园和大片的树林犹如远郊村落。[88]关于成都的满城和汉城在人口密度和生活节奏方面的区别，李劼人（1891—1962）的小说《死水微澜》中有很生动的描述。这部小说创作于1935年，描写了清末时期的川西社会。成都的满城由低矮的城墙隔开，被称为“少城”，其余城区被称为“大城”：

> 果然一道矮矮的城墙之隔，顿成两个世界：大城这面，全是房屋，全是铺店，全是石板街，街上全是人，眼睛中看不见一点绿意。一进满城，只见到处是树木，有参天的大树，有一丛一丛密得看不透的灌木，左右前后，全是一片绿。绿阴当中，长伸着一条很宽的土道，两畔全是矮矮的黄土墙，墙内全是花树，掩映着矮矮几间屋；并且陂塘很多，而塘里多种有荷花。人真少！比如在大城里，任凭你走往哪条街，没有不碰见行人的，如在几条热闹街中，那更是肩臂相摩了。而满城里，则你走完一条胡同，未见得就能遇见一个人。而遇见的人，也并不像大城里那般行人，除了老酸斯文人外，谁不是急急忙忙地在走？而这里的人，男的哩，多半提着鸟
> 40 笼，挽着钓竿；女的哩，则竖着腰肢，梳着把子头，穿着长

袍，拖着一双没后跟的鞋，叼着长叶子烟杆，慢慢地走着；一句话说完，满城是另一个世界，是一个极消闲而无一点尘俗气息，又到处是画境，到处富有诗情的地方。[89]

总体而言，在成都这样的城市环境中，满人和汉人居住在分隔的世界里，因为满城中基本没有商铺和工坊，所以在经济上依赖于其他城区的供应。但是，除了商贸之外，这两个城区的人口很少互相联系。根据一名成都老居民的回忆，“在宣统以前，汉人很少进少城游览，旗下人也少到大城活动，彼此界限禁严”[90]。

那些没有生活在驻防城市的旗人，更加处于少数人地位。他们的居住地也都被隔离开来。居住在北京之外的直隶省的旗人，很早就与当地的汉民区分开来。17 世纪中叶，刚刚建立的清王朝在迁走北京内城已有居民的同时，也圈占了北京周围方圆 500 里（170 英里）的土地，逐走了当地的汉人农民，并将土地分给旗兵和包衣耕种。[91]尽管旗人土地禁止买卖，但很多汉人农民随后又迁回了当地，甚至还从旗人所有者手中重新获得了土地的控制权。可是旗人和汉民居住地还是一直分隔开的。在颐和园附近，火器营的士兵居住在围墙圈占的村落中，其村民全部为旗人。包衣在皇室或王公的土地上耕作，这些土地分布在直隶省的不同地方，如青龙县的肖营子，今天易县的周家庄，在这些地方旗人同样生活在独立的区域。这种少数民族聚居地在奉天地区也很普遍。例如，盛京北部的道义就主要居住着汉军八旗。[92]

关于满人隔离居住，最普遍的例子是在东北的中部和北部。较之北京周围 500 里地带更甚，这里完全是旗人领地，所有的非旗人都被禁止进入。这一区域位于柳条边的北部和东部。柳条边是一道高约 1 码的土堤，沿堤种植了很多柳树，土堤外侧是一条 3 码深的壕沟。这条边关由三部分组成，以盛京北部开元附近为中心向外延伸，把东北划分为 3 个不同的区域：柳条边南部是奉天的辽河平原，一直是汉民的耕作之地；西部是蒙古族的一片干旱大草原；东部和北部是吉林和黑龙江的森林地带，是满洲发源之地。如罗伯特·李（Robert Lee）所言，清朝统治者决定保护最后

41

这个区域作为“龙兴之地”和储兵之所，禁止汉民越过柳条边。[93]

清朝保持东北北部作为满人专属保留地的努力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一方面，柳条边不是长城，它只是一种象征性的隔离，很容易穿越，整个柳条边只设有19个边门，所有的交通出入都由此经过，每道边门只有15名或者更少的士兵防卫。此外，到了19世纪，柳条边逐渐衰落，不再发挥作用。英国领事官员谢立山（Alexander Hosie，1853—1925）在1896年观察到，柳条边的边门所剩无几，只保留了少量士兵防卫。罗伯特·李也提到，在此之前很久，柳条边已经被大量破坏，汉民从人口稠密的华北地区迁来，无视禁令，寻求土地开荒。另一方面，尽管柳条边被严重破坏，但是它的作用不会也不能因此被忽视。于是，尽管柳条边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被逐渐破坏，但在19世纪60年代的吉林和黑龙江，汉人移民还是很少。[94]实际上，正是清朝将汉人排除在东北北部这一政策的成功，使得俄国能够在1860年偷占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广阔地区。[95]当清朝开始允许汉人移民进入东北北部以阻止俄国人的进犯之后，其效果却受到地理上的限制。这一开放政策于1860年从松花江流域中部的拉林地区（在吉林）开始，1862年又开放了呼兰河流域（在黑龙江）。后来在1878—1882年间又扩展到牡丹江、图们江沿岸，以及乌苏里江（都位于吉林）上游，1896年扩展到通肯河流域（在黑龙江）。[96]虽然这些特殊的区域不再限制汉人移民，但在19世纪末，柳条边以外的东北北部许多地区仍然主要居住着旗人，但也不是只有旗人居住。

第四，满汉在社会生活方面也被隔离开来。尤其是，满人不能与汉人通婚。例如，居住在奉天东部的驻防城市岫岩的满人，在婚姻方面要遵守四“大忌”：不能与同姓人结婚，不能与同族人
42 结婚，不得与未成年人结婚，不能与汉人结婚。根据当地人的说法，禁止满汉通婚，这是“绝不可违反的王朝禁令”。其实这项禁令并没有写入大清律例中，但清朝历代统治者，包括雍正皇帝和慈禧太后都宣布其为国策。正如定宜庄所言，“旗人和汉民之间通

婚的禁令确实格外地严厉”。[97]

作为各方面的族群隔离所带来的累积效应，满人与汉人一般居住在隔离的地区并且彼此分隔。实际上，由于旗人与当地居民严格隔绝，以致旗人驻防地经常变成“语言孤岛”。例如在锦州，两个半世纪后，旗人仍然说着中国北方的标准方言（官话、普通话），也就是他们祖先被派遣到这里时所说的话，而不是说当地居民的方言。根据一份 1959 年的田野调查，在广州，“1911 年辛亥革命之前，所有满人都说普通话。尽管他们听得懂也会说广东话，但是他们通常不说”。同样，根据 20 世纪 20 年代初记者亨瑞·福兰克（Harry A. Franck）的记载，西安的满人“由于其北京方言而很容易被辨认出来”。[98]这种语言差别的持久性也为两个族群几乎互不影响提供了佐证。

……不平等

除了将满与汉隔离开来之外，清朝统治者还不平等地对待这两个族群。他们的政策并不像以前那样明确反对汉人，但是他们常常牺牲汉人的利益来袒护满人。因此，直到 19 世纪末期，旗人相比非旗人而言，在三大领域享受优待：司法、政治和经济。

在司法上，满人（作为旗人）与汉人（作为民）受到不一样的对待。例如，如果一名满人和汉人同样因审讯被押至公堂，汉人需要下跪，而满人则可以站着。[99]更重要的是，如果被认定有罪，满人受到的惩罚要比汉人轻。根据大清律例，满人可以选择用鞭刑替代杖刑，也可以用戴枷代替坐监甚至代替充军。在 19 世纪早期的一个案例中，一名黑龙江的满人在一桩男孩的命案中被判有罪，如果被告是一名汉人，将受到一百竹棍的杖刑，并被终身流放三千里（一千英里），但因为他是一名旗人，他受到的刑罚就可以被减为同样数量的鞭刑和戴六十天的枷锁。[100]1865 年的谕旨允许旗人出旗为民，这大大消除了满人和汉人间的这些不平等区别。因为这道谕旨明确指出，那些要求出旗为民的人，和那些到各省定居但是保留旗人身份的人，在法律上都将与汉民同等待

遇。但是，因为这一谕旨没有普遍执行，直到19世纪末，满人在司法上依然保持了特殊的地位。

在政治方面，满人在入仕、任职和任期方面都受到优待。在入仕方面，满人有四种途径比汉人更容易进入官僚系统内部。首先，旗人参加科举考试，他们可以有单独的比汉民更高比例的录取名额。因此，在1862—1894年间，三年一次的会试共选拔出4 457名进士，其中旗人为242人，约占5.4%。这个数字大大高于旗人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这其中就包括前面提及的旗人锡良和赵尔丰，他们都是1874年的进士。另外还有两名在义和团运动之后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旗人，一名是端方（1861—1911），1909年任直隶总督；另一名是那桐，在清末载沣摄政期间（1908—1911）任军机大臣。他们分别于1882年和1885年考中举人。[101]

其次，满人可以参加汉人不得参加的单独科举考试，考试要求低于汉人科举。满人只考翻译一科，获得同汉人科举同等级别的功名，只是前面加上“翻译”的前缀（如“翻译进士”）。正如这一名称所示，满人科举是一项翻译考试，满洲旗人和汉军旗人要将汉文译为满文，蒙古旗人将满文译为蒙文。他们一般被要求解说和翻译儒家经典“四书”。与科举相比，翻译科考试内容更简短，比如只包括了会试三项科目中的两项，录取比率也要高上好几倍。在19世纪早期，约有1/15的旗人通过了翻译考试成为举人，还有约有1/5到1/6的旗人通过会试。翻译科因为更简单，缺乏认可度，所以也不能真正吸引那些有能力的旗人学子。然而，对于旗人进入仕途而言，其实际待遇并不逊于科举考试。例如，在1907年取代袁世凯统领北洋新军四镇的旗人凤山（ —1911），就是通过翻译科取得举人头衔的。[102]

再次，满人还可以通过另一种翻译考试进入仕途，获得较低职位的官职，这就是“笔帖式”。这种考试相当简单，除了考取翻译科的人以外，其他满人也可以参加这一考试。但汉人依然被排斥在外。在义和团运动之后以笔帖式入仕的有广州驻防将军孚琦，他在1911年被暗杀，还有1911年的闽浙总督松寿。[103]

最后，还有其他一些满人无须通过任何形式的考试，也可以

进入仕途。他们通过父辈的“荫”护而获得官职，或者通过捐纳购买功名或职位。慈禧太后的心腹荣禄（1836—1903）就是以“荫生”身份开始仕途的。1852 年其父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阵亡，他于是获荫，并开始在工部担任主事，直到 1898 年他成为军机大臣，达到职位的顶峰。同样，进士赵尔巽的弟弟赵尔丰，是通过捐纳途径在广东盐政获得他的第一个职位的。[104]

当然，通过捐纳途径进入仕途并不是满人的专利。例如，袁世凯也是通过捐纳入仕的，购买了内阁中书科中书的虚衔。[105]然而，袁世凯这种非常规的入仕方式在晚清的汉人高官中算是个例外。在满人贵族中，这样的情况却很常见。

因为满人有更多的机会进入仕途，要求又更低，这就使得满人官员普遍比汉人的学识要低。整个清朝，担任总督的汉人，72.1%的人拥有进士或举人的功名，满洲旗人中这一数字为 33.9%，蒙古旗人和汉军旗人中就更低。因为同样的原因，满人开始其仕途要比汉人早 4 年到 6 年，汉人始任总督的平均年龄是 56 岁，而满人只有 49.5 年到 52.1 岁。[106]

在任职方面，与入仕一样，满人也比汉人有更多的优势。尤 45
其在京师，很多官府职位是专门留给满人的。在京师的行政系统中，朝廷把很多官府职位按优先顺序安排给六类人：皇族、满洲旗人、蒙古旗人、汉军旗人、上三旗包衣、汉人[107]，这被称为“官缺制”。在很多情况下，官僚机构中一半的高级职位都是留给前五类人的，另一半的职位则分配给了汉人，这就是著名的满汉共治的官僚体系，满人中的五大群体共同组成了满人这一半的政治结构。基于对 19 世纪中叶军机处、内阁和六部高层人事状况的详细分析，费正清（John Fairbank）断定，在中央官僚机构中，满人和汉人的官员职位大致相当。满汉共治的基本原则在都察院中也被遵守。[108]汉人和满人的官员数量基本平衡，这样也可被看做“一视同仁”的平等。实际上，在考虑官员的任命方面，清朝历代皇帝都标榜自己公正不倚。他们宣称这方面的指导思想是“满汉一家”。[109]但是因为满人只占中国总人口的 1%，但他们却占据了官场中一半的高级职位，和他们的人口数量相比，这明显

不成比例。

无论如何，满汉共治原则只是针对中央行政体系中的少数职位或高级职位。例如，这一原则不适用于总理大臣职位，这一职位居于各部的两名尚书之上，负责监察该部的运作。担任总理大臣职位的基本都是满人（在18世纪比在19世纪时更为普遍）。[110]更常见的是，满汉共治不适用于清朝九品官阶系列中的中低级官员队伍，这一部分的官员中，满人在数量上和比例上都远远超过了汉人。例如，在内阁中，24个中级职位的20个（约83%）都是由满人担任的（14名满洲旗人、4名蒙古旗人，2名汉军旗人），只有4个职位归汉人。六部中的职位也是如此。在户部，三个中层品级的141个编制内职位中，有97个（约69%）职位是由满人担任的（4个皇族、91个满洲旗人、2个蒙古旗人），其余44个（约31%）职位则由汉人担任。只有都察院和翰林院，是中央机构
46 中满人中级官员数量没有超过汉人的部门。[111]在最低三个品级的官员队伍中，满人占有惊人的优势。尤其是大量的笔帖式职位，基本被旗人所垄断。笔帖式的基本职责是翻译文件，包括将上呈给皇帝的各类奏折由汉文译为满文，此外，笔帖式也是抄写员和档案员。虽然职位低微，但笔帖式却是各个中央机构中数量最多的职位。在户部，满人笔帖式有141人，几乎是正式官员的一半。包括1名皇族，120名满洲旗人，4名蒙古旗人，和16名汉军旗人。[112]因此，满人几乎垄断了所有低级中央官职，完全将汉人排斥在外。

满汉共治的原则不仅没有贯彻到中央官僚机构的中下层，在一些特殊部门也没有实行。宗人府负责管理所有皇族成员，除了一些需要汉文知识的文书职位由汉人担任外，宗人府只任用皇族人员。内务府负责供应供应宫廷所需，只有上三旗的包衣可以在内务府任职。在负责处理边疆地区蒙古、回疆、西藏事务的理藩院中，旗人占据了所有161个职位。[113]当然，也没有汉人在八旗机构中任职。总体而言，根据陈文石对清朝14个中央重要部门中2 277个职位的详尽分析，有1 559个职位（约68.4%）只任命满人（1 255个皇族和满洲旗人，196个蒙古旗人，108个汉军旗

人），416 个职位（约 18.3%）只任命汉人，另外 302 个职位（约 13.3%）没有明确区分满汉。[114]

在中央系统之外，还有很多职位是只对满人开放的。较为典型的是边疆地区，尤其是东北的三个边疆区域——奉天、吉林和黑龙江——到 19 世纪末，仍处于地方行政管理之外。这三个区域都是由统领各地八旗驻防军的将军所管辖。由于清朝统治者一直将东北尤其是东北北部作为保留地，这里的民政事务主要也由旗人掌管。例如，全东北最重要的地方行政官员奉天府尹，一直都是由满人担任。在八旗驻防军所在地奉天东部的岫岩，1772 年到 1856 年，共有 46 名通判统治非旗人居民，其中 36 名为满人，只 47
有 10 名为汉人。甚至在 19 世纪晚期，当行政管理机构扩展到东北北部，以适应汉人移民大量涌入之际，地方长官还是满人为主。在黑龙江呼兰，负责管理汉人居民的一职从 1863 设置到 1905 年废除，从没有 1 名汉人担任过。[115]当然，和中央一样，各省的旗人管理机构也都由旗人担任官职。[116]

由于包括省在内的地方上的大多数职位并没有明确标明族群资格限制，所以满人也没能像在中央机构那样占据绝对优势。当然，满人官员所占的比例还是很大的。最显著的是各省行政机构中最高两级官员还是要求“满汉共治”。于是，在整个清朝，所有总督中满人占 57%，巡抚中满人占 48.4%；从任职时间来看，满人担任总督的时期占 61.6%，满人担任巡抚的时期占 51%。满人官员的任用比率一般是按职位的高低递减，尤其是按职位的重要性递减。各省的布政使和按察使，有 28%～29%是旗人，知府当中 21%是旗人。在县一级的官员中，旗人只有 6%。然而，按满汉的人口比例来看，即使是 6%的满人县级官员比例，也远远超过了满人占总人口的比例。[117]

满人一旦获得任命，他们就可以获得更优越的政治待遇，即他们的任期一般都比汉人的更长。例如，担任总督的满人平均任期是 5 年 5 个月。而汉人的任期要比之短 11 个月。在县一级的官员中，26.4%的满人（汉人为 20.9%）的任期超过 3 年。[118]满人官员比汉人官员任期更长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满汉的丁忧长

短不同。汉人官员的父母去世，他们需要离职还乡，丁忧 27 个月。而旗人在同样情况下只需丁忧 100 天，然后回来继续任职，或者立即接受新的委任。从 1796 年到 1908 年的 113 年间，各省八旗驻防的1 052名官员（如都统和副都统）中，只有 4 人是因为丁忧而离职。[119]

人们普遍认为（虽然可能是错误的），在 19 世纪 60 年代同治中兴期间和之后，满人在政治领域相对于汉人的优先待遇被大大削弱。这种观念部分基于如下无可争辩的事实：1851 年之后旗人担任省级大员的人越来越少，这是因为清廷开始认可在镇压太平
48 天国运动中崛起的汉人地方军系及其将领们的权力。于是，在整个清朝总督一级的大员中满人占 57%，但是在 1851—1912 年间，满人总督只占 34.6%。同样，满人在巡抚中所占的比例也从整个清朝的平均数 48.4%下降到清末 60 年的 22.2%。但是，在中央机构中，满汉的官职比例却没有相应的变化，朝廷在中央还是实行满汉共治。例如，1860 年总理衙门建立，作为军机处的附属机构负责处理日益增多的外交事务，其中的 42 名章京满汉各占一半。[120]

实际上，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朝廷不仅仅在中央机构的官职任命上继续倾向于满人，还在洋务运动中表现出对满人的更多青睐，在一些领域将汉人完全排斥在外。例如，1862 年建立的神机营和昆明湖水军学堂（1888 年建立）都是从驻京八旗中选拔人员。而同文馆（1862 年建立于北京，两年后分设于广州）招募的大部分学生也都是当地的八旗子弟。

朝廷在现代化进程中对汉人的排斥也体现在海军衙门这样的机构中。海军衙门建立于摧毁中国海军的中法战争（1883—1885）之后的 1885 年，和总理衙门的满汉平分秋色不同，海军衙门任用的官员几乎都是满人，只有最高级别的 5 名大臣基本是满汉共治，但是也是满人 3 名，汉人 2 名。海军衙门存在的十年里，供职于其中的 31 名章京只有 1 名是汉人。[121]

最后，满人在经济待遇方面也比汉人优惠得多。最明显的例子是八旗士兵的薪饷，它不仅可以养活旗兵，还足以养活所有旗

人人口。所有的满人都可以世袭获得朝廷给予的俸禄。大部分八旗士兵，尤其是驻防于中原地区的士兵，都可以获得两类饷银：每月的月俸和半年一次的粮食配给。这种俸禄根据旗兵所在的机构和职衔的不同也有差异。根据官方的正常标准，京畿地区最有声望的亲军营士兵一年可以收入 48 两白银（每月 4 两）和 22.2 担谷子；作为普通旗兵，骁骑营的士兵一年可以收入 36 两白银和 22.2 担谷子。当然，军官的收入会更高，例如驻京八旗的 1 名骁骑校平均每年收入 60 两白银（可能还有其他收入）和 72 担谷子。 *49*
相比而言，八旗驻防官兵的收入至少是汉人绿营军队标准的 2 倍。[122]

八旗士兵中的少数人口，尤其是在东北等人口稀少的地区，可以从分配的土地中获得部分收入，而不是获得配额的粮食。这被称为“随缺地”和“伍田地”，旗兵可以自己耕作土地或将土地租赁给他人。这些土地可以一直属于旗兵，直到退役或死亡后，才被归还给驻防军重新分配给他人。和军饷收入相类，土地的分配也需要按级别区分。在辽西走廊柳条边的白石嘴门，1 名驻防军官的年收入是 80 两白银和 19 英亩随缺地。1 名普通旗兵的年收入则是 24 两白银和 13 英亩随缺地。[123]经济优待还表现在，拥有土地的满人无须缴纳田赋。所有中原地区和东北中部和北部的旗人土地都是免税的，而东北南部的旗人土地只是象征性的少量收税，大大低于非旗人的土地。[124]为了保证旗人的经济独立，清朝禁止旗人和汉民之间进行田宅买卖（“旗民不交产”）。虽然在旗人土地相对稀少的中原地区，这一禁令经常被忽视甚至不时被破坏，但是在旗人土地相对丰富的东北地区，禁令还是被严格执行。这使得满人拥有大量土地，所以，在双城（以前属吉林，现归黑龙江）地区，1911 年的辛亥革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83%可耕作土地还是属于满人。[125]

八旗士兵除了享有银两、谷物、土地等形式的补贴外，还有其他形式的经济优待。满人在婚礼和丧葬时可以领取一定的津贴。如果他们在战争中立功后因病退伍，就可以在余生获得每月 1 两白银的抚恤金。甚至本人去世后，遗孀也可以获得一半的抚恤金，

遗孤也可以每月获得少量的资助。[126]

清廷的统治政策对满人的经济优待还体现在其他一些方面。例如，尽管满人有俸禄，但他们在遇到经济困难时，还可以向政府寻求救济和帮助。旗人，尤其是驻防于城市中心的大多数旗人，由于各种原因逐渐陷于贫困。他们游手好闲，入不敷出，负债累累。由于物价飞涨，他们固定的生活津贴已经难以应付生活消费的提高，于是他们不顾“旗人不交产”的禁令，将名下的旗田卖给汉民。更重要的是，旗人数量的激增已经超出了八旗体制的供给能力。清代八旗的组织体系并没有随各旗人口增长而扩大，旗人的就职机会因此变得越发稀缺。所以，到清末，如前文所述，可能只有十分之一的旗人有机会成为旗兵。由于只有旗兵有固定俸禄，而旗人除了当兵、入仕、务农之外，没有其他的就职机会，所以旗人的生计变得越来越艰难。[127]

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末，清朝历代皇帝采取了各种措施来解决“八旗生计问题”。早期的清朝皇帝赦免了贫困旗人所欠中央财政的债务。他们赎回那些转卖给非旗人的旗田，遣散了各省大部分的汉军，由来自北京的满族、蒙古族旗人充任。他们在八旗系统中新增了一些职位，如预备役军人等，以此增加旗人获得职业和收入的机会。他们把没有收入的旗人和旗人家庭从北京迁往东北，去耕种一些尚未开垦的土地。[128]其实，这些早期的措施最多只是减缓而不能扭转旗人日趋困顿的长期趋势。到19世纪末，旗人的经济处境进一步恶化。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朝廷本身也举步维艰，只好削减旗兵的军饷。对旗兵婚礼和葬礼的额外资助也变成了借贷性质，从旗兵的军饷中分期扣除。而军饷也已经缩减了30%～40%。[129]1865年的谕令允许旗人出旗为民，自谋生计，这对解决八旗生计问题而言，也是一次尝试，但却毫无效果。

在北京和中原其他城市的驻防军，士兵除固定军饷之外并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满人越来越陷入贵族贫民的处境中。正如老舍在《正红旗下》对童年生活的清晰回忆，作为驻防旗兵的一员，老舍父亲每月的军饷是3两银子，春秋两季领两次米粮。“北城外的二三十亩地（3英亩～5英亩）早已被前人卖掉，只剩下一亩

多，排列着几个坟头儿。”依靠父亲微薄的收入，他们不得不举债 51
度日。“虽然我们的赊账范围并不很大，可是这已逐渐形成寅吃卯粮的传统……领到饷银，便去还债。还了债，所余无几，就再去赊。”[130]这些贫困而高傲的旗人成为晚清小说中的重要形象。[131]

有人详细描述了19世纪末中国各地的满城，不仅包括满城宽敞、优美的环境，而且包括其中贫困、懒散的居民。英国领事官谢立山（Alexander Hosie）在19世纪80年代初访问了成都八旗驻防，他提到那儿的居民：“衣着邋遢、神情懒散。女人尤其显得衣衫破烂、不修边幅。这些人都依靠朝廷的资助为生，不劳而获。”经历丰富的旅行家伊丽莎白·肯道尔（Elizabeth Kendall）也提到1911年的成都，情况和谢立山的描述差不多：“游荡在街头路口的是一些身材高大的男女，四处都充溢着闲散的氛围。当我在成都的时候，他们正处于经济困顿期。”关于广州的满人居住区，美国牧师香便文（B. C. Henry）写道：“满人的城区和汉人的城区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的房屋更小，更贫穷，但四处都是疏忽、浪费、败落的情形。”[132]

居住在乡村的旗人受到的冲击要小于那些城里的旗人。一方面，他们没有城市中的那些奢侈生活；另一方面，他们能够自给自足，他们不会完全依靠旗兵的军饷和政府的补贴。在地广人稀的东北地区，很多旗兵都不居住在驻防部队所在的城镇，而是住在外面的村庄。朝廷允许他们在驻防军一百里范围内的区域居住。在村庄中，旗兵和他们的家人可以耕种田地，或是根据当地情况选择其他的谋生方式。例如：齐齐哈尔三家子屯的满人除了每名旗兵每年24两白银的收入，还可以在嫩江捕鱼。还有的满人从事农耕。根据人口资料重建数据，在18世纪晚期盛京以北汉军旗人驻防地道义屯，只有4%的人是士兵，3%是世袭的工匠，“大部的人都是耕作旗田的农民”。包衣们也通过耕作贵族的田产谋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包衣在满人中的地位很低，但他们的经济状况却要优于那些具有较多特权，却不能随便迁徙的城市旗兵。[133]

52 两种人，两种文化

在清朝初年，满汉是两种不同的族群，也有两种不同的文化。在清朝二百多年的统治过程中，满汉互相影响也互相融合。众所周知，满人经历了一个长期的“中国化”过程（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汉化”过程）。但是较少有人知道，汉人也经历了反向的“满化”过程。然而，这种互相的文化融合很不彻底。直到19世纪末，满汉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

从一开始，清朝的统治者就很担心满人会被人数众多的汉人臣民所同化。他们很敏锐地意识到了以前的征服者金朝（1127—1234）女真族的遭遇，而且满人也一直自称是女真族的后裔。皇太极在1636年训令手下官员，讲到文化适应的危险，他训诫众人要注意第15代女真皇帝金世宗（1161—1190年在位）的警示，吸取金朝灭亡的教训：

> 由于担心后代会仿效汉人习俗，金世宗就此颁布了禁令，并多次规劝他的臣民不要忘记太祖和太宗（王朝的建立者）。他还要求臣民遵循女真族的语言、服饰习俗，经常练习骑射，以准备战事。尽管有这些谕旨，金朝的后代还是忽视了他的忠告，很快忘记了骑射的传统。最终在哀宗时期亡国。[134]

一方面，清朝尝试劝导满人外的其他旗人接受老满人的文化习俗；另一方面，也努力保持满人的独立文化以免被汉人文化同化。

满人的生活方式归纳起来，称为“国语骑射”。[135]在清朝，国语指的是满语。它和汉语的拼写和语法都有很大的不同。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词尾变化，黏着法构词，无调性。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没有这些特点。满语文字由蒙古语字母变化而来，汉语是独立的象形字。清朝的统治者希望每一名旗人都能掌握满语——不仅仅是那些祖先为满人的老满人，而且是所有的八旗成
53 员。所以，旗人的学校都开设有满语课程。湖北的荆州驻防军要求“所有的旗人，无论个人的地位、背景如何，都需要学习满语

以巩固国家根基”。[136]朝廷还设置了翻译科，在旗人中选拔官员。那些满语成绩优秀的人可以获得奖金、奖赏、升迁机会，以及其他一些物质奖励。正如雍正皇帝曾经指出的，如果没有一些特殊的奖励措施，祖先的语言就难以传承下去。相反，那些在满语考试中表现不佳的人也要受到一定的惩罚。八旗军队每五年对所有士兵和官员进行一次满语口语测试。那些不过关的人需要重考。再次落败就要被解职。[137]锡伯族的祖先本是蒙古族，在清朝成为满人的一支。锡伯人本来使用蒙古语，在清代也学习和接受了满语作为自己的母语。[138]

但是，在旗人中推广和保存满语的措施往往不像在锡伯族中那样成功。正如几位皇帝所哀叹地那样，在 18 世纪早期，旗人中使用满语的情况就已经明显衰落，此后更是每况愈下。例如，嘉庆皇帝就抱怨，内务府的官员不精通满语，甚至在抄写文件时都还是一笔一笔、一字一字地摹写，不仅不能理解句子的意思，甚至不认识很多词语。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保存的大量奏折也证实了满语在旗人官员中的持续衰落：在清初，他们只写满文，清中期是满汉文并举，到清末，就只写汉字了。黑龙江呼兰的旗人地区虽远离汉人文化的中心区，但这里的档案也呈现了相同的变化。到 19 世纪末，呼兰只有 1%的满人认识满文。这 1%的满人中又只有不超过 1/5 的人会讲满语。差不多同一时期，东北南部盛京将军的官署中，据说当时唯一需要使用满语的场合是在给皇帝的奏折中祝“皇上万岁”。衙门中其他所有的公共事务都使用汉语。也是到那个时候，奉天旗人家庭的宗谱都开始用汉文而不是满文书写。在北京老舍的表兄福海“只会一点点满文，谈话，写点什么，他都运用汉语”。[139]

满人的语言融合虽然经历了很长时期，但并没有被完全同化。毕竟，福海还会“一点点满文”。旗人虽然使用汉语，但同时也没 54
有停止使用满文，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偏远地区的人。在新疆西部的伊犁河谷，那儿的锡伯族人广泛使用满文；东北地区也使用满文，尽管不那么普遍。在 1870 年的奉天，苏格兰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注意到一些年长的人依然说满文。他也

提到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有一些年轻人已经掌握了汉语，还会再接受满文学习。英国领事官谢立山在19世纪80年代到东北游历之后，声称“满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过去的语言了”，但是他也承认，在黑龙江和吉林一些边远地区，满文还在使用，这主要是一些封闭的鞑靼部落，没有什么汉人移民。甚至在中原地区，到19世纪末，满语也并不是死语言。在北京，虽然数量不多，但还有一些公文继续用满文书写。陈捷先承认：“满人保守的本能十分强烈，所以直到王朝的最后一年，史馆中的很多官方档案都是用满文书写的。”此外，旗人学校中也一直教授满文。当1862年京师同文馆开始招收旗人学员学习欧洲语言时，是否掌握满文成为录取的先决条件。广州同文馆同样规定，旗人学员在学习英文之外，还要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学习“清字清语”。因为旗人士兵有例行的满语口语考试，粗通满文的人在神机营中较为普遍，这是一支19世纪60年代组建的半现代化旗兵队伍，军官都能用满语向部下发号施令。实际上，北京神机营的倡建者恭亲王奕䜣在1878年还向其他部队推荐这一做法，以此作为向好奇的西方人保密的方法。[140]

从满人取名传统的演变，我们既可以看出满汉文化的融合，也可以看到满汉语言融合的限制。汉人的名字一般有三个字，包括单字的姓和双字的名。而满人的姓和名都是多字。而且，满人的姓包括两部分，世系的大姓前面挂一个小的族姓。例如，清朝皇族的小姓是爱新觉罗，是觉罗这个大姓下面的一支。满人很少在公共场合使用自己的姓，如向皇帝上奏时，他们通常只写自己的名。例如，荣禄的全名是瓜尔佳·荣禄，是瓜尔佳氏的成员。[141]

55 除了老满人之外，其他八旗成员也都接受并使用了满人式的名字。例如，义和团运动后的清朝官员端方，其祖先本是浙江的汉人，他们在明末迁居东北南部，成为满洲正白旗的成员。于是，他们将自己的“陶”姓改为满人化的姓“托活洛”。汉军八旗的成员常常将自己单字的汉姓加上后缀“giya”（汉语“佳”），变成类似满人的姓。于是，单字的汉姓“李”，变成双字满姓的“李佳”。[142]尽管有这样的例子，清朝统治者似乎并没有要求所有原

本是汉人的旗人都改成满人式的姓氏。正因如此，《红楼梦》（又名《石头记》）的作者曹雪芹（1715—1763）所在的包衣家庭，就一直保持了汉姓。同样的情况还有清末汉军八旗出身的赵尔丰、赵尔巽。但是，很多汉军八旗的成员都改成了满姓。例如，1901年被送往日本学习警务的7名汉军旗人中，有6名都是双字的满姓。同样，1906年京师大学堂的学员名单中，6名汉军旗人中有2名也是满姓。京师同文馆还有1名汉军八旗毕业生曾担任1902—1905年驻英使臣，汉名为张德彝，满名为德明（1847—1918）。[143]

总体而言，满人的名字和满语一样，经历了一个实质性的但并不彻底的文化融合过程。在最初的几代人中，满人都使用多个字的名字（如：努尔哈赤），这些名字在满语里都有一定的意义，但音译成汉语之后就有些莫名其妙了，而且，满人不会像汉人那样在名字中体现辈分。[144]但后来满人的名字也开始体现汉人的特点。皇族率先开始将名字缩短为两个字（例如雍正皇帝就名为胤禛），以使名字有汉语用词的意义，而且也开始在名字中体现辈分。到了光绪皇帝，所有和他同辈的男性名字都有一个“载”字。例如载湉（光绪皇帝），载沣（1883—1952，光绪皇帝的弟弟和后来的摄政王），载振（1876—1948，光绪皇帝的表弟）。与此相应，前一辈的皇族男性都用“奕”字（如奕劻、奕䜣、奕譞），后一辈的皇族男性则用“溥”字（如后来的宣统皇帝溥仪（1906—1967）和他的弟弟溥杰（1907—1994））。名字中的另一些特征还体现了更细致的世系规则，以将皇族直系亲属和其他旁支区别开来。因此，载湉的“湉”字和载沣的“沣”字都是水字旁，而载振的“振”字则是提手旁。因为载振是庆亲王奕劻的儿子，不是直系皇亲。[145]

56

在非皇族的满人中，名字的变化也大致相同。在奉天东部的岫岩，第7代和第8代的满人还给自己的儿女取多个字的满人名字，但音译成汉语却没什么意义。但是，他们也同时开始取双字、有一定字义的汉人名字，并遵循了辈分的规则。因此，瓜尔佳氏第7代的男子都有两个名字，一个满人名字，一个汉人名字，例如：多伦布/石满，德林布/石竹，特和布/石真。在家中和旗内，这些孩子用满人名字，但是在其他的场合，他们就使用汉人名字。

到了19世纪初，从第8代或第9代开始，岫岩瓜尔佳氏已经不再给儿子取满人名字，而是完全使用汉人名字。[146]

一些非皇族的满人也渐渐开始将自己多个字的满文姓氏，改为单字的汉文姓氏，以适应满汉文化融合的大趋势，汉军八旗就经常如此。[147]清朝统治者对这一现象有些不满，尽管是皇族率先接受汉人名字，并规定了皇族中的辈分用字。乾隆皇帝多次警告满人不要使用汉人姓氏，以免引起混乱。当祖先和政治地位都很显赫的钮祜禄家族也开始改用汉人姓氏“郎”字时，乾隆皇帝奚落他们“忘了根本”。（钮祜禄氏来源于满语 niohe，意思是“狼”，他们选择“郎”为汉人姓氏是因为“郎”和“狼”同音。）[148]

如果把名字的变化考虑在内，满人的汉化过程经历了二百多年。满人男性逐渐放弃了他们原来多个字的满人名字，而更偏好双字的汉人式名字。他们按汉字的字义取名，并依照了一定的辈分原则。尽管如此，直到19世纪末，满人姓名中的一个特点却始
57 终没有改变。除了赵氏兄弟这样出身汉军的人，其他的满人在大部分情况下都只称呼名字，而不用家族姓氏，例如奕劻、荣禄、刚毅、端方、锡良、铁良。在这一方面，满人和汉人还是有显著的不同。

除了“国语”之外，满人和汉人在生活方式方面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骑射。清代中期的几位帝王都反复强调骑射是“我满洲根本”，必须好好保持。嘉庆皇帝甚至在1820年命令吉林的旗兵在狩猎时不用火枪，而代之以祖传的弓和箭。不仅仅是老满人，而且包括八旗系统的其他成员——不仅是旗兵，还有普通的旗人——都被指望保持骑马和射箭能力。在驻京八旗的健锐营中，男孩子从7岁就开始接受骑射训练。旗人学校的学生，如荆州驻防的学校，骑射也是常规课程之一。旗人官员的选拔考试（如翻译科）中，应试者在笔试之前也需要接受一定的骑射测试。[149]

大部分旗兵的军事训练也都集中于骑射方面，这些训练既有常规的时间安排，也有不同的组织层次。例如，在驻京八旗的前锋营，士兵每五天进行一次立射练习（或者是一个月六次），一年在春秋两季进行两次骑射练习，每年还要和其他部队一起联合演

练，每三年要在北京南边的南苑皇家狩猎场进行大规模的骑射演习，约有两万旗兵参加这一演习。同样，在东北，整个驻防部队都要在农历的二月和八月进行长达一个月的野外骑射练习，每年冬天还要参加集体的远征狩猎。[150]

但是，保持满人军事传统的努力和保持满语的努力一样遇到了阻碍，日渐削弱。在19世纪末，清朝统治者最终克服了关于建立现代军队的犹豫，在北京组织了新式的“神机营”，并在各省驻防军中组织了洋枪队，用步枪和大炮替代了弓箭。但其余的旗兵直到19世纪末还在继续练习传统的骑射，但这样的练习已经变成一种毫无意义的形式主义。而且，皇帝自己也很长时间不再认真 *58*
练习传统骑射。嘉庆皇帝是最后一个每隔一两年就到木兰围场狩猎的皇帝。这个皇家狩猎场位于长城以北约100英里。但所有的皇家狩猎活动到1821年全部结束，1863年起，木兰围场也开放为耕地。在东北，吉林和黑龙江最后一次的年度狩猎活动是在1875年。[151]那些依靠旗兵固定津贴生活、被禁止从事其他职业的旗人为了打发时间，培养出各种各样与军事无关的兴趣，如遛鸟、斗蟋蟀、制鸽哨以及唱京剧。正如老舍提到的，那些旗人“生活的意义……就是每天要玩耍，玩得细致，考究，入迷”。晚清时期，与旗人相连的正是这些休闲活动，而不是骑射。[152]

随着满人骑射传统的衰落，八旗军队的作用也在日渐下降。18世纪50年代平定准噶尔之乱时，八旗士兵是最后一次作为主力军出现。在18世纪90年代镇压白莲教的战争中（1796—1804），旗兵已经不再是主力。此后，清朝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赖其他非旗人军队：先是绿营部队，接着是各地的民兵，后来是地方武装。然而，在19世纪中叶，旗兵并不是通常被描述的那样衰颓无力。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中，旗兵不可避免参与了大部分的战争，他们一直表现得很英勇。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广州、乍浦和镇江的旗兵驻防肩负起防卫边疆的重任。镇江的旗兵驻防主要由来自山东青州的旗兵增补而成。根据费伊（Peter Ward Fay）的描述，这些旗兵部队“在城墙被攀上、城门被推倒以后，还是艰苦而勇敢地战斗，既不投降也没有逃跑，而是在原地阵亡，

他们的努力推延了英国人占领这一地区的时间，最后，旗兵亲手了结了自己和家人的性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中，旗兵部队再次在广州和北京地区反击英法联军的战争中起到了重要的领导作用。例如，1858 年在天津和大沽抗击侵略者的斗争中，来自齐齐哈尔的旗兵就是僧格林沁（ —1865）部队的一部分。[153]

与此同时，关内地区的其他旗兵驻防还参与了长期的、甚至是更艰苦的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这些起义者号称顺应天命，要
59 消灭满人恶魔。在 1853 年 3 月，南京的驻防军连续 13 天抗击太平军，当最后南京被占领时，旗人为抵抗付出了巨大代价。正如简又文所描述的那样：

> 这些革命者沉浸于为血腥战争复仇的狂怒中，进行了残忍的大屠杀，只有几百人幸运地逃到了外城。在一个地方，数千满洲妇女被逮捕，赶出城门，被烧死、刺死和淹死。根据曾国藩（1811—1872）后来的调查，约有 3 万多人在这次对旗人的大屠杀中丧命。

（当曾国藩在 1864 年重新占领南京时，太平天国的成员也遭到了同样残忍的待遇。）在杭州，旗兵部队在 1860 年被太平军围攻两个月，困守孤城，最终在一年之后投降。城中的大部分旗人，约有 8 000 到 10 000 人，选择自尽以免落入太平天国的手中。附近的乍浦驻防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就已经被破坏，在这次战争中又被大批杀害。[154]

其他地方的旗人部队也参加了镇压太平天国和其他起义活动的战争，同样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位于北京东南部的沧州驻防军人数较少，但在 1853 年阻击太平天国北伐的战争中也损失了 200 多士兵。东北的驻防军被送往南方参战，同样遭受了巨大的伤亡。在吉林，根据吉林将军在 1865 年的描述，超过 10 000 旗人士兵在战争中身亡，而那些生还的士兵有一半已经伤残。在黑龙江，根据地方志记载：“发往关内约计 67 730 人，存活者十之一二。”在 19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初，西北六万七千七百三十驻防旗兵在镇压张格尔叛乱

和抗击阿古柏（Yacob Beg，1820—1877）的侵略中也遭到同样的重创。新疆驻防军的伤亡情况和南京、杭州驻防军差不多。[155]总体而言，旗兵在鸦片战争和清朝的各类战事中的作用都是不容忽视的。

清朝统治者努力不让满人被汉化的同时也采取了几项措施来推动汉人臣民“满化”。满人强加给汉人三项文化政策：剃发、易服、满文。第一项政策得到了广泛而严格的实施，后两项政策只是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作用。

满人男性的传统发式是留辫子，这是北方部族男性常见的发式，包括建州女真也是留辫子。这种发式是削去前面和旁边的头发，后面的头发留长，编成辫子。而明朝以来汉人的发式，都是将所有的头发束在头顶，扎成一个顶髻，并用马鬃做成的帽子固定住。清朝入主中原之后，下令所有的臣民按满人的方式剃发，违者处死。最初，很多汉人极力反对剃发留辫，认为这有违祖宗礼制，而且儒家传统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但清朝统治者将剃发看做归降的重要标志，不肯撤销或修改命令。1654 年，一名前明官员陈名夏声称他不赞成剃发，主张回归明朝的发式，顺治皇帝马上以叛逆罪将他处死（陈名夏也被指控贪污腐败）。1768 年，浙江和江苏发生了“剪辫”案。乾隆皇帝于是重申“剃发令”，称剃发留辫是立朝根本。清朝唯一可以免除剃发的是服丧者、小孩、和尚（和尚剃光头）和道士（道士留长发）。所有其他的汉人男子都被要求遵守剃发令（其他民族的男子，如新疆的维吾尔族人和西南的苗族，就只有首领需要剃发，普通百姓不用如此）。[156]经过最初的极力反对，汉人最终还是接受了满人的发式。太平天国“长毛”只是一个明显的例外。而且，到 19 世纪末，正如反满批评者自己也悲哀地承认的，长辫子已经成为中国的固有传统。[157]

60

官服是汉人“满化”的第二个方面。和发式一样，满人的服饰和明朝以来的汉人服饰也有很大不同。总的来说，明朝官员和士人的服装都是肥大、宽松，适宜于久坐之人。明朝官员的正式服装都很宽松，大袖长袍，腰间是环状硬腰带，帽子是双冠，后面带有两个突出的直立的帽翅。鞋子是足尖上翘的软履。士人的便服没有环形腰带，帽子也是以四方帽代替翅帽，衣服同样是宽大的连身长袍

61 (图 1、图 2)。[158]满人的服装却是窄身紧袖，体现了他们长期骑马的民族传统：紧身的衣服是为了保持身体热量；下身宽大，衣服前后和侧面四面开衩，以适应骑马的需要；喇叭长袖，袖端形为“马蹄袖”以帮助骑马者的手背抵御寒冷。连身长袍盖过了裤子，有时在衣服外面还罩有一个半身或四分之三身长的外套，称为“马褂”。清代官员的服饰和明朝官员的也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不戴腰环，穿硬底靴而不是软履。他们戴的帽子也按季节分两种不同的款式，但都没有突出的帽翅。一种是竹子制成的无帽沿的锥形凉帽，另一种是圆形的暖帽，帽沿上翻，多用动物皮毛制成。两种帽子都在帽顶饰有玻璃或宝石的顶珠。顶珠的颜色显示了官员的品级。五品以上的官员还要挂朝珠，一种由 108 颗珠子串成的长项链。顶珠和朝珠都是清朝的发明。清代的士人也穿着类似官服的长袍——喇叭长袖，腰以下开衩，头戴圆帽而不是明朝的四方帽（图 3、图 4）。[159]

图 1　着朝服的明代官员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39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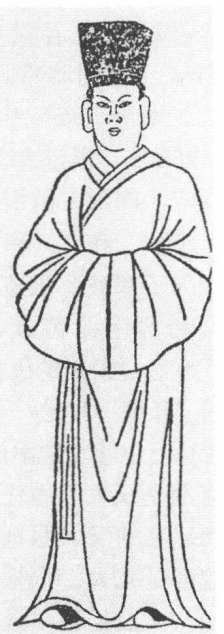


图 2　着便服的明代士人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401 页）

图 3　着朝服的清代官员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475 页）

图 4　着便服的两名清代士人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475 页）

清朝统治者要求汉人像接受辫子一样接受满人的服饰，在陈名夏之后约一个世纪，乾隆朝的刘震宇也因为建议改变官服样式，回归明朝服饰而被处决。[160]然而，对服饰的要求主要是针对官员和士人，而不是全体民众。于是，大部分汉人还是延续了他们明朝以来的穿着。但是，在有清一代，很多民众也逐渐接受了满人的服饰，开始穿长袍马褂。所以到了清末，不仅仅官员士人，大部分的普通民众都在服饰方面被“满化”了。[161]

汉人被“满化”的第三个例子，是清朝将满语和汉语作为两种官方语言。统治者要求许多官方文件同时用汉文和满文书写。正如陈捷先所统计，在整个清朝，“谕旨、奏折和所有官方档案，甚至是铁、石的铭文都用满文书写”。此外，清朝统治者还坚持一些汉人臣民必须学习满语。但是，语言的使用范围比服饰的范围更有限，只有少数官方精英需要使用满语。

有人建议满汉士人都学习满文，嘉庆皇帝却否定了这一提议。[162]在清朝，只有一些翰林院的成员——进士出身的士人精 *62*

英——被强制要求学习三年的满语课程。这一规定到19世纪早期依然实行。林则徐（1785—1850）在1811年中进士，作为翰林院的成员之一，他也曾经学习满语。[163]到了19世纪末，汉人官员似乎已经不再被要求学习满语。但是，由于清朝统治者一直以来在全国推广普及满语的努力，满语不可避免地对汉语产生了一定影响。一些满语词汇开始进入汉语中，尤其是政府行政管理中的一些特殊词汇。例如章京（满语“秘书”），笔帖式（满语“满人文书员”），甲喇（满语“旗人军队”），牛录（满语“旗人佐领”）。满人的印记同样体现在从北京到盛京的语言中，这两个城市都有大量的满人人口。当地的方言都杂糅了一些满语词汇，构词和语法方面都显示出了这一特征，根据斯蒂芬·瓦德雷（Stephen Wadley）的研究，这些方言受到了满语和阿尔泰语系其他语言的影响。[164]

清朝时期的文化变化不仅仅体现在满人的汉化，同时发生的，还有规模相对较小，结果也不甚明显的反作用过程：汉人的“满化”。到了19世纪末，并没有哪一种民族文化可以完全胜过另一种。尽管两个民族在二百多年中一直生活在一起，但人们依循的文化传统还是泾渭分明。

满人和汉人在女性的服饰上区别尤为明显。满人女子的典型穿着是“衣皆连裳”的长衫，而且，按照斯科特（A. C. Scott）的描述，满洲女子的头发是用铁丝、假发和装饰物精心盘在头顶。（这种头式被称为“两把头”，根据嘉瑞特（Valery Garrett）的说法，这是欧亚草原游牧民族的特色发式。）最后，满人女性不缠足，穿两三寸高的高底鞋。汉人女性的服装在这三方面都是完全不同的，按照明朝以来的习俗，汉人是上衣下裳，上身是一件四分之三身长的外衣，下身是裤子。头发在脑后盘成一个髻，或在两侧盘成两个髻，缠足，穿小巧的布鞋（图5）。[165]在清朝，汉人女性没有被要求改穿满人服饰。而且，和男性不同，汉人女性都没有效仿满人的衣着。同样，满人女性也没有模仿汉人的穿着。于是，直到19世纪末，满人和汉人女性都保持着各自的衣着习惯。

图 5　满人妇女和两名汉人妇女在查看一只缠足穿的鞋
（吴友如：《晚清社会风俗百图》，75 图）

满汉文化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不同。例如，在上书或面圣时，63
满汉的自称不同，满人自称“奴才”，汉人自称“臣”。乾隆皇帝曾经要求所有的官员都自称“臣”，但不知什么原因，这一命令没有发生作用。[166]满汉在礼仪上排尊位的位置不同。满人以右为尊，汉人以左为尊。[167]满汉在问候时也不一样。满人在问候尊长时跪右膝，双臂下垂，这在汉语中称为“打千”，戴维·霍克斯（David Hawkes）翻译的《红楼梦》中，称之为“满礼”。而汉人问候的方式是双手在胸前抱拳，作揖鞠躬。[168]

甲午战争之后的改革尝试

到 19 世纪末，满人和汉人依然保持着各自的文化特点，满汉区别最明显的证据，是 1894—1895 年中日战争清廷失败之后所提出的一些改革措施。当时，中国作为战败方割让了台湾岛，承受了各国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这样的让步打开了日本和西方列强

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大门。这些令人警醒的事件使得很多汉人精英意识到，中国很有可能被列强瓜分殆尽。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形，各种官员和士人都开始建议朝廷进行改革。其中一些方案远远超出了“洋务运动”的有限目标。

改革派很快得到了年轻的光绪皇帝的认可。光绪皇帝于1889年开始亲政，此前一直是慈禧太后摄政。1897年12月18日，在德国人夺取山东的胶州湾之后，光绪皇帝发布谕旨，要求所有了解军事事务的官员均可上书提出建议。[169]六个月后的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维新变法，拉开了百日维新的序幕。

1895年末，甲午战后的维新派在新科进士康有为的带领下，以“学会”为名，在北京组织了政治社团“强学会”。1896年8月还在上海出版了政治刊物《时务报》。在这次由下层发动的史无前
64 例的改革活动中，有一名出身皇族的满人表现积极，这就是1898年考中进士的寿富（1865—1900）。1897年5月，寿富在《时务报》上发表了题为《与八旗诸君子陈说时局大势启》的文章。在文中，他和很多有识之士一样，痛陈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威胁。但他不是从所有的中国人，而是从旗人自身的利益出发，分析被瓜分的危险。他指出，如果现在的朝廷能改革维新，八旗将延续自己的贵族统治。当然，其中暗示的是，如果中国被瓜分，清朝灭亡，旗人就将失去自身的特权地位。[170]同一年，寿富和康有为在北京组建“知耻学会”，其目的是唤起民众对于中国被日本打败的“知耻”意识。[171]

这些改革者所鼓吹的维新变革，在过去往往被视为“叛逆”。其中一条建议涉及清朝的服饰令。之前的士人和官员关于改变王朝服饰制度的建议，都有死罪的危险，乾隆朝的刘震宇也是因此被斩首的。然而，在1896年夏天，姜叔子在林乐知（Young J. Allen）创办的《万国公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斗胆建议废除满式官服。姜叔子指出，正是由于彼得大帝下令改革国家服饰，与欧洲其他国家保持一致，俄国才开始强大。日本的明治天皇也是效仿彼得大帝的改革，取得了同样的效果。这些改革，以及历

法的改变（从阴历改为阳历），都象征着皇帝实行激烈改革的决心，以及改革的效果将普及于广大民众的愿望，这有利于塑造“新国民”。姜叔子因而提出，如中国希望改革，为什么不从历法和服饰开始呢？在结论中，姜叔子也承认，他这样的普通民众不应该介入“礼制”的讨论，这是朝廷独有的特权。但是，他依然建议清廷学习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的经验。姜叔子并没有具体提出服饰要改革成何种样式，但无疑，他希望放弃满人服饰，像日本那样接受欧式服饰。[172]

康有为甚至更加激进，直接建议废除剃发留辫的法令。1898 65
年，康有为上呈给朝廷一部论述明治维新的《日本变政考》，暗示朝廷应当效法日本统治者实行变法。和姜叔子不同，康不仅提出改变服饰，还建议改变发式。他指出日本的官服已经改为西方的样式，日本天皇也剪短了自己的头发，暗示光绪皇帝也应该仿效。[173]（据说康有为在 1898 年还提交了其他三份关于满汉关系的更详细的奏折，但这些和《日本变政考》不同，被认为是事后伪造的。）[174]

关于满汉关系改革的更为全面的建议出现在 1898 年 9 月 5 日张元济（1867—1959）的奏折中。张元济祖籍浙江，1892 年中进士，1897 年在北京创办了通艺学堂，当时张元济刚刚在总理衙门任章京。在奏折中，张元济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改革建议，其中第二个方面就是“融满汉之见”，这样中国就可以统一为一个整体，共同反抗列强的入侵。张元济在他的奏折中提出了六条改革措施。[175]

第一，将关内的各种满洲和蒙古旗人都划归为民，并转由当地地方官管理，以结束满汉之间的行政隔离。只有皇族可以例外，因为他们地位尊贵，不能按普通民众对待。皇族继续由宗人府管理。第二，结束满人和汉人在社会和职业方面的隔离。融合满汉最好的方法是由皇帝下令“旗汉通婚”。他同时力劝皇帝撤销旗人从事商贸的禁令，让旗人可以自谋生计。同时，让那些不愿居住于驻防城市的旗人可以到别处居住，并作为普通平民由地方衙门统一管理。第三，建议结束“满汉共治”，他承认这一政策在王朝

初期保持对于王朝统治是有效的，但这也是导致旗人和汉人互相不合的根源。而且，这种措施已经不再对满人自身有利了。因为满人通常很早进入仕途，所以不能像汉人那样接受充分的教育，而且满人常常被分派到长城以外的边远地区任职，他建议以后对于满人和汉人采用同一种官员选拔标准。第四，建议逐步废除旗兵的固定津贴。现有旗兵可以足额薪饷，但是当旗兵职位空缺之时，就不再递补。第五，建议在北京和各省驻防旗营中设立劝工学堂，向闲散的旗人教授职业技能。第六，张元济建议改革的范围应限制在关内地区，而内蒙古、外蒙古、新疆和青海地区（大概还有东北），可以暂且保留现在的制度。

张元济是百日维新期间仅有的两名上书讨论满汉关系的人之一。另外一个人是在南京担任江宁布政使的袁昶（1846—1900）。袁昶的奏折没有公开发表，但正是这份奏折引出了1898年9月14日的一份重要诏书。袁昶显然在奏折中提出了令人头疼的八旗生计问题，提醒皇帝注意到旗人人口的增加，并把旗人的困顿归咎于禁止旗人从事商贸的禁令。之前的很多官员也曾提到这个问题：如嘉庆朝的松筠（1752—1835），道光朝（1820—1850）的富俊（1749—1834），同治朝（1862—1874）的沈桂芬等。而现在，中国将开始一场全面的革新，正应该放松这一禁令，使旗人可以向其他社会阶层（士农工商）学习一定的职业技能，自谋生计。于是，光绪皇帝要求户部借鉴嘉庆朝和道光朝的经验，制定相应的政策安置旗人。[176]

皇帝对于袁昶奏折的回应也引起了旗人，尤其是京师旗人的恐慌。朝廷似乎要停止给旗人提供俸禄，甚至可能——如果采纳张元济更为的激进建议——废除八旗制度、官缺制和满汉隔离。老舍的《正红旗下》写道：

> 在我降生（1899年）前的几个月里，我的大舅、大姐的公公和丈夫，都真着了急。他们都激烈地反对变法。……听说：一变法，旗人就须自力更生，朝廷不再发给钱粮了。

同样，在老舍的历史剧《茶馆》中，剧中的第一幕是1898

年，刚刚结束百日维新后的北京，一名旗人向旁人解释说，变法就是要“停发钱粮，自谋生计”。[177]

其实老舍的亲戚朋友不必如此烦恼。因为在光绪皇帝的诏书 67
颁布一周以后，这场改革就戛然而止了。9 月 21 日，慈禧太后担心变法会带来恶劣后果，于是囚禁了光绪皇帝，宣布重新摄政。光绪皇帝没有按照张元济的建议平满汉畛域。同样，也没有采纳姜叔子和康有为的意见，剪掉辫子和废除满人服饰。

结　语

八旗系统本来就是一种多成分、多族群的组织。努尔哈赤将建州女真统一并组织成八旗，后来皇太极将其更名为满洲。老满人是八旗制度中数量最多和最有特权的人，但他们不是八旗组织中的唯一族群。八旗中的满人还包括新满人，那些蒙古化了的通古斯人（如锡伯人）或者是通古斯化了的蒙古人（如达斡尔人），但其他还有一些朝鲜人、藏族人，甚至是俄国人。此外，在满洲旗人之外，八旗体系中还有其他两个重要的族群成分：蒙古旗人和汉军旗人。

尽管存在着这些内部区别，八旗对外还是一个统一的整体。除了一些例外——如 18 世纪 70 年代一些藏族人被并入满洲八旗，八旗系统的成员都以血缘出身为依据，不再对其他外人开放。如果不考虑他们的族群来源，那么所有的八旗成员都有共同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以区别于其他的中国人。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他们都自称或被别人称为“旗人”。旗人的基本任务是时刻准备拱卫皇帝和朝廷，因而八旗组织也是一个世袭的军事阶层。他们和其他非旗人的“民”有很大的不同。

最后，到 19 世纪末，旗人开始被称为满人。这些“满人”不同于皇太极时期的满洲，甚至也不是作为八旗体系之一部分的满洲八旗，而被看做所有八旗体系的成员，区别于汉人而被称为“满人”。总之，原本是一个多族群的军事组织（八旗），同时也是一种世袭的特权阶层（旗人），逐渐被视作（至少在其他非旗人看

68 来）一个族群（满人）。[178] 同样经过相似的过程，非旗人的“民”，相应的被称为“汉人”。例如，张元济在1898年的奏折中，“满人”和“旗人”就可以互换，它们同样都是相对于“汉人”而言的称呼。

光绪皇帝在1898年9月14日颁布的诏书有力地证明，芮玛丽的看法是不恰当的，她声称，满汉隔离的限制早在1865年就已经消除了。但如果同治皇帝允许旗人离开八旗体系“出旗为民”，自谋生计的谕旨已经被实施，那么他的继任者就没有必要在30年后颁布一道相似的诏书。同样，如果大部分满汉隔离的限制在1865年就不存在了，张元济那六条“平满汉畛域”的建议也是没有必要的。其实，同治皇帝的谕旨根本没有全面施行，所以，直到19世纪末，满汉依然是在很多方面都互相隔离的两个族群。

满汉之间依然存在的多种差异，也证实了义和团运动之后，很多革命者关于满人七宗罪的控诉有着合理性。虽然满人吸收了很多汉文化，但正如革命者指出的，满人是异族，在很多方面和汉人有明显的不同。例如，满人男子不用汉姓，女子不穿汉服，也不裹脚。满人还强迫汉人男子剃发，官员着满服。满人是少数的特权阶层，隔离于并凌驾于汉人之上，满汉在行政管理和居住区域方面都是分开的，满汉不通婚，满人有朝廷提供的固定俸禄，只能当兵，做官，在一些地方还可以务农。满人是一个世袭的军事特权阶层，分布于全国各地的驻防要塞中。满人还享有很多优待政策，在法律上更宽松，在官场中有更多的入仕升迁机会。总之，革命者的反满控诉并不仅是一种宣传策略，而是有着当时社会现实的基础。

然而，不仅仅是革命者，还有甲午战后的那些改革派如姜叔
69 子、康有为、张元济等人，最早提出了“满人问题”，并进行公开的讨论。而此前满汉关系还是一个禁忌话题。例如，陈名夏在1654年因为批评辫子发式而被斩首，乾隆朝的刘震宇也因为提出改革满人式的官服而被处死。但是，在19世纪90年代末，不仅仅姜叔子和康有为建议废除辫子，接受西式服装，张元济还力主结束满汉共治，鼓励满汉通婚。正如姜叔子所言，他们在提出这些

建议的时候也是如履薄冰，出言谨慎。所以，姜叔子和康有为分别建议废除辫子，虽然意见明确，但也是委婉提及，暗示光绪皇帝应该效仿明治天皇的例子。没有人敢直接要求解散旗人军队，虽然这支军事力量价值显然已经不大。[179]最接近于废除八旗制度的建议，就是张元济提出在八旗职位空缺时不再递补。尽管他们的方式谨慎，言辞也较温和，但这名甲午战后的改革者提出了太平天国运动以来对满汉关系的最严峻挑战。

【注释】

[1] 反满主义这个概念相比于高歌（Kauko Laitinen）提出的定义要严格一些，也特殊一些。他简单地把其界定为“中国为了推翻满人的辩解（宣传）”（*Chinese Nationalis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Zhang Binglin as an Anti-Manchu Propagandist*（《晚清中国的民族主义：反满宣传者章炳麟》），2页）。

[2] 邹容：《革命军》，5页（Lust（拉斯特）译本，65页）。

[3] 张枏、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60页。

[4] 骆宝善：《关于章炳麟政治立场转变的几篇逸闻》，载《历史研究》，1982（5），56～62页。张枏、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94～99、752～764页。关于章炳麟的反满主义，参见Wong, Young-tsu（汪荣祖），*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 Zhang Binglin and Revolutionary China, 1869-1936*（《寻找现代民族主义：章炳麟和革命中国（1869—1936）》），61～64页。也看参见Laitinen, Kauko（高歌），*Chinese Nationalis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Zhang Binglin as an Anti-Manchu Propagandist*（《晚清中国的民族主义：反满宣传者章炳麟》）。

[5] 关于邹容，参见Lust（拉斯特）译本对邹容《革命军》的介绍。

[6] 参见Young, Ernest P.（杨欧纳），“Problems of a Late Ch'ing Revolutionary: Ch'en T'ien-hua”（《清末革命问题：陈天华》），in Chün-tu Hsüeh（薛君度）ed., *Revolutionary Leaders of Modern China*（《中国现代革命领袖》），210～247页。

[7] 对于革命者的反满主义进行的一点不同分析，根据1905年以后《民报》中的一些文章，参见Gasster, Michael（高慕轲），*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ese Radicalism*（《中国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中国现代激进主义的诞生》），第3章。

[8] 张枏、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686页。

[9] 邹容：《革命军》，22页（Lust（拉斯特）译本，80页）。

[10] 参见Tao Jing-shen（陶晋生），"Barbarians or Northerners：Northern Sung Images of the Khitans"（《蛮族或北人：北宋时期的契丹形象》），in Morris Rossabi（罗萨比）ed.，*China Among Equals：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10th–14th Centuries*（《十至十四世纪的中国及其边邻》），84页注43。

[11] Laitinen，Kauko（高歌），*Chinese Nationalis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Zhang Binglin as an Anti-Manchu Propagandist*（《晚清中国的民族主义：反满宣传者章炳麟》），66、83页。关于"Shina"这个词汇，参见Fogel，Joshua A.（傅高义），"The Sino-Japanese Controversy over Shina as a Toponym for China"（《中日关于"支那"作为中国地名的论争》），in *Cultural Dimensions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Essays o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中日关系中的文化维度：关于19和20世纪论文集》），66～76页。

[12] 陈天华：《陈天华集》，107～108页。邹容：《革命军》，29～32页。

[13] 陈天华：《陈天华集》，153页。

[14] 邹容：《革命军》，17页（Lust（拉斯特）译本，76页）。张枏、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文集》，第1卷，754页。

[15] 邹容：《革命军》，20～21页（Lust（拉斯特）译本，79页）。

[16] 同上书，9页（Lust（拉斯特）译本，68页）。陈天华：《陈天华集》，57、117、118页。

[17] 陈天华：《陈天华集》，117页。邹容：《革命军》，8～9页（Lust（拉斯特）译本，68页）。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684页。

[18] 邹容：《革命军》，6～8页（Lust（拉斯特）译本，66～68页）。陈天华：《陈天华集》，118页。

[19]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5册，35页。

[20] 邹容：《革命军》，22页（Lust（拉斯特）译本，80页）。

[21] 这段著名的话究竟出自何人之口，尚有争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后被收入《戊戌变法》，第1册，290页，有删节）称是刚毅的话。邹容《革命军》第19页，称是慈禧太后的心腹荣禄之言。S. L. Tikhvinsky（提科维斯基）根据Lust（拉斯特）译本第95页注121，认为是奕譞（醇亲王）的话。Min tu ki（闵斗基）在《戊戌变法事迹》第383～384页中和梁启超一样

认为是刚毅的话。

[22] 陈天华：《陈天华集》，36页。邹容：《革命军》，5页。感谢陈巍昆帮助查找邹容的引文。

[23] 爱新觉罗·宗夔：《满族旧俗忆述》，见《广东文史资料》，第35辑，264页。Lee, James（李中清），Robert Y. Eng（罗伯特），"Population and Family History in Eighteenth Century Manchuria: Preliminary Results from Daoyi, 1774–1798"（《十八世纪满洲的人口和家庭历史：道义屯的初步考察，1774—1798》），in *Ch'ing-Shih Wen-T'i*（《清史问题》），1984，5（1），1～55页。Elliott, Mark（欧立德），*Resident Aliens: The Manchu Experience in China, 1644–1760*（《外来居民：满洲人在中国之经历（1644—1760）》），499～501页。感谢Robert Y. Eng（罗伯特）为我复印宗夔的文章。

[24]《大清会典》卷84，1a。Lee, Robert H. G.（罗伯特·李），*The Manchurian Frontier in Ch'ing History*（《清代满洲边疆史》），24～25页。Spence, Jonathan D.（史景迁），*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 Bondservant and Master*（《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2～9页。陈佳华：《八旗制度研究述略》，载《社会科学辑刊》，1984（5），109～116页。

[25] Brunnert, H. S.（布鲁纳特），Hagelstrom, V. V.（哈盖尔斯特罗姆），*Present Da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当今中国的政治机构》），97页。《历史档案》，1989（2），51、106页。

[26]《清史稿》卷130，3880～3889页。《大清会典》卷84，3a～4b；卷86，17b。

[27] 陈佳华：《八旗制度研究述略》，载《社会科学辑刊》，1984（5），114页。

[28]《大清会典》卷84，3a～3b。王锺翰：《清代八旗中的满汉民族成分问题（上）》，载《满族研究》，1990（3），37～42页。Wu, Wei-ping（武卫平），*The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the Eight Banners*（《八旗的发展与衰落》），22页注68。

[29] Lee, Robert H. G.（罗伯特·李），*The Manchurian Frontier in Ch'ing History*（《清代满洲边疆史》），14～16、33～34页。王锺翰：《关于满族形成中的几个问题》，见《满族史研究集》，8～10页。陈佳华：《八旗制度研究述略（续）》，载《社会科学辑刊》，1984（6），118～119页。吴志超：《略论"新满洲"》，载《满族研究》，1987（1），72、92～95页。

[30] 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169页。Brunnert, H. S.（布鲁纳

特），Hagelstrom，V. V.（哈盖尔斯特罗姆），*Present Da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当今中国的政治机构》），39～40 页。Naquin，Susan（韩书瑞），Evelyn S. Rawski（罗友枝），*Chinese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十八世纪中国社会》），116 页。Lee，James（李中清），Cameron Campbell（康文林），and Wang Feng（王丰）"The Last Emperors：An Introduction to the Demography of the Qing（1644－1911）Imperial Lineage"（《最后的皇帝：清代皇族人口统计》），in David S. Reher（戴维），Roger Schofield（罗杰）eds.，*Old and New Methods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历史人口统计学的新旧方法》），363 页注 13。Telford，Ted A.（特尔福德），Michael H. Finegan（芬根尼），"Qing Archival Materials from the Number One Historical Archives on Microfilm at the Genealogical Society of Utah"（《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关于清朝宗族社会微缩胶片档案》），in *Late Imperial China*（《晚期中华帝国》），1988，9（2），94～95 页。

［31］Brunnert，H. S.（布鲁纳特），Hagelstrom，V. V.（哈盖尔斯特罗姆），*Present Da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当今中国的政治机构》），16～27、41 页。

［32］Hummel，Arthur W.（恒慕义）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清代名人传略》），964～965 页。魏秀梅：《清季职官表·人物录》，224 页。沈云龙：《掌握晚清政柄之奕劻》，见《近代政治人物论丛》，第 1 册，70 页。《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 9 卷，149～156 页。

［33］《清史稿》卷 470，12、799 页。Hummel，Arthur W.（恒慕义）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清代名人传略》），387、598 页。

［34］Lee，Robert H. G.（罗伯特·李），*The Manchurian Frontier in Ch'ing History*（《清代满洲边疆史》），16、34～35 页。陈佳华：《八旗制度研究述略》，载《社会科学辑刊》，1984（5），114～115 页。关于锡良，参见 Des Forges，Roger V.（戴福士），*Hsi-liang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Revolution*（《锡良与中国民族革命》）。

［35］Pamela Crossley（柯娇燕）和 Mark Elliott（欧立德）分别将汉军八旗翻译为"Chinese-martial"和"Han-martial"，我觉得这都不够确切，偏离了汉语原来的意义。

［36］Lee，Robert H. G.（罗伯特·李），*The Manchurian Frontier in Ch'ing History*（《清代满洲边疆史》），35 页。王锺翰：《清代八旗中的满汉民族成分问题（下）》，载《满族研究》，1990（4），62～66 页。陈佳华、傅克

东：《八旗汉军考略》，见《满族史研究集》。Crossley，Pamela Kyle（柯娇燕），*The Manchus*（《满洲人》），7 页。

[37]《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 5 卷，98 页。

[38] Lee，Robert H. G.（罗伯特·李），*The Manchurian Frontier in Ch'ing History*（《清代满洲边疆史》），26 页。王锺翰：《关于满族形成中的几个问题》，见《满族史研究集》，14～16 页。Spence，Jonathan D.（史景迁），*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 Bondservant and Master*（《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6～18 页。《满族社会历史调查》，226 页。

[39] Crossley，Pamela Kyle（柯娇燕），*The Manchus*（《满洲人》），7 页。

[40]《大清会典》卷 84，1a。《满族社会历史调查》，85 页。Brunnert H. S.（布鲁纳特），Hagelstrom V. V.（哈盖尔斯特罗姆），*Present Da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当今中国的政治机构》），719～720 页。

[41]《大清会典》卷 86，20b～21a。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92 页。《满族社会历史调查》，85 页。Brunnert，H. S.（布鲁纳特），Hagelstrom，V. V.（哈盖尔斯特罗姆），*Present Da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当今中国的政治机构》），718 页。

[42] 郑天挺：《探微集》，172 页。Hummel，Arthur W.（恒慕义）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清代名人传略》），600 页。《满族社会历史调查》，84 页。中国的文化体制可以以北京的天坛为例看出来，南为红色，东为蓝色或蓝绿色，西为白色，北为黑色，中间是黄色。参见 Smith Richard J.（司马富），*China's Cultural Heritage*（《中国文化传统》），102 页。《北京名胜古迹词典》，152 页。另外，蒙古的文化体制中，南为红色，东为白色，西为黑色，北为黄色，中间是蓝色。参见 Atwood Christopher（阿特伍德），"National Question and National Answers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r，How do You Say Minzu in Mongolian?"（《中国革命中的民族问题和民族答案；蒙古语中的"民族"怎么说?》）in *Indiana East Asian Working Paper Series on Languages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1994，(5)，44 页。

[43] 胡絜青、舒乙：《记老舍诞生地》，见老舍：《正红旗下》，134～142 页。

[44] 郑天挺：《探微集》，172～73 页。马协弟：《浅论清代驻防八旗》，载《社会科学战线》，1986 (3)，194 页。

[45] 金启孮：《京旗的满族》，载《满族研究》，1988（3），65页。Rozman，Gilbert（饶济凡），*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292页。

[46]《大清会典》卷84，3a～4b。《满族社会历史调查》，85页。Brunnert，H. S.（布鲁纳特），Hagelstrom，V. V.（哈盖尔斯特罗姆），*Present Da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当今中国的政治机构》），722页。

[47] Rozman，Gilbert（饶济凡），*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292页。

[48] 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90页。Brunnert，H. S.（布鲁纳特），Hagelstrom，V. V.（哈盖尔斯特罗姆），*Present Da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当今中国的政治机构》），726～727页。傅克东、陈佳华：《清代前期的佐领》，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1），168页。

[49] 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90页。秦国经：《清代的八旗制度》，载《历史教学》，1981（4），15页。

[50]《大清会典》卷84，8b～9a。Lee，James（李中清），Robert Y. Eng（罗伯特），"Population and Family History in Eighteenth Century Manchuria：Preliminary Results from Daoyi，1774－1798"（《十八世纪满洲的人口和家庭历史：道义屯的初步考察，1774—1798》），in *Ch'ing-Shih Wen-T'i*（《清史问题》），1984，5（1），9～10页。Telford，Ted A.（特尔福德），Michael H. Finegan（芬根尼），"Qing Archival Materials from the Number One Historical Archives on Microfilm at the Genealogical Society of Utah"（《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关于清朝宗族社会缩微胶片档案》），in *Late Imperial China*（《晚期中华帝国》），1988，9（2），87～90页。《满族社会历史调查》，85页。

[51]《大清会典》卷84，12a～13a。也见Torbert，Preston M.（陶博），*The Ch'ing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A Study of Its Organization and Principal Functions，1662－1796*（《康雍乾内务府考》），72～77页。

[52]《清史稿》卷130，3887～3889页。实际上，所有的包衣佐领加起来，总共是105名。（*The Draft History of the Qing*（《清史稿》）中的统计是按各旗分散计算的。）但是，其中正蓝旗只统计有6名佐领，士兵却是2 704名，平均451名士兵才有1名佐领。与之相对，其他的七旗中都有11位到21名佐领，平均167名士兵就有1名佐领。可能正蓝旗共有16（而不是6）名佐领更可信，这样士兵与佐领的比例下降到1∶169，这与其他各旗的比例相当。调整后的包衣佐领总数为115名。

[53] Wade，T. F.（威妥玛），"The Army of the Chinese Empire：Its Two

Great Divisions, the Bannermen or National Guard, and the Green Standard or Provincial Troops…"（《中华帝国军队：旗兵或国家卫队，绿营或各省驻防》），in *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1851，(20)，254 页。王锺翰：《"国语骑射"与满族的发展》，见《满族史研究集》，205 页。杨度：《杨度集》，425 页。《清史稿》卷 130，3889 页。*The Draft History of the Qing*（《清史稿》）的统计中是将各部分的兵力统计起来，除了亲军营、步军营和骁骑营（36 118 人）之外，还有包衣佐领（20 413 人）二十四旗（70 272 人），奕谟的陵墓护卫队的 3 名军官和 48 名士兵。（这些数字总共是 126 854 人，相差 135 人。）需要指出的是《清史稿》的数字中包括了 2 万多人的包衣，而一般并不将包衣计算为旗人。如果不算包衣，《清史稿》中统计的驻京八旗人数应该是 106 500 人，步军营和骁骑营这两支最大的旗兵部队的人数计算，似乎和二十四旗的人数统计有重叠。

[54]《大清会典》卷 84，4b。

[55] Brunnert，H. S.（布鲁纳特），Hagelstrom，V. V.（哈盖尔斯特罗姆），*Present Da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当今中国的政治机构》），744～746 页。

[56] 马协弟：《驻防八旗浅谈》，载《满族研究》，1985 (2)，19～21 页。

[57]《大清会典》卷 84，5b；卷 86，7a。《湖北通志》卷 64，1a～2a。亦见潘洪钢：《辛亥革命与荆州驻防八旗》，载《满族研究》，1992 (2)，21 页。《大清会典》错误地称荆州驻防只有 1 名副都统，1899 年重新发布的《大清会典》中没有计算（和《湖北通志》不同）1815 年加入驻防军的 1 560 名士兵，根据《湖北通志》，荆州驻防的士兵总数是 7 228 人。

[58] 关于铁良，参见查时杰：《清末的宗社党》，载《"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1978，(5)，132 页。《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 8 卷，117～119 页。

[59] Elliott，Mark（欧立德），*Resident Aliens：The Manchu Experience in China，1644－1760*（《外来居民：满洲人在中国之经历（1644－－1760）》），178～190、204～209 页。

[60] 张宇天：《晚清旗营的变迁和没落述略》，见《满族论丛》，56～60 页。《杭州府志》卷 41，12b～13a。《江宁府志》卷 3，2a～3b。

[61] 关于各省驻防的建立和在中原地区的分布情况，参见 Elliott，Mark（欧立德），*Resident Aliens：The Manchu Experience in China，1644－1760*（《外来居民：满洲人在中国之经历（1644－－1760）》），第 2 章。也见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制度研究》，215～217 页。感谢定宜庄送给我专著的复印本。

[62]《大清会典》卷84，2a、2b、4b、8a；卷86，4b～5a、8a～8b。马协弟：《驻防八旗浅谈》，载《满族研究》，1985（2），20页。Wade，T. F.（威妥玛），"The Army of the Chinese Empire：Its Two Great Divisions，the Bannermen or National Guard，and the Green Standard or Provincial Troops…"（《中华帝国军队：旗兵或国家卫队，绿营或各省驻防》），in *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1851，（20），314～318页。Brunnert，H. S.（布鲁纳特），Hagelstrom，V. V.（哈盖尔斯特罗姆），*Present Da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当今中国的政治机构》），569、748、893、897、898页。

[63]《大清会典》卷84，2a～3a、4b～7a；卷86，5a～6a、7b～8b。马协弟：《驻防八旗浅谈》，载《满族研究》，1985（2），19～20页。傅克东：《八旗水师史略》，载《满族研究》，1986（1），19～20页。Wade，T. F.（威妥玛），"The Army of the Chinese Empire：Its Two Great Divisions，the Bannermen or National Guard，and the Green Standard or Provincial Troops…"（《中华帝国军队：旗兵或国家卫队，绿营或各省驻防》），in *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1851，（20），323～329页。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237～242页。奉天的125佐领的数目，是通过《大清会典》中列出的各驻防八旗的佐领数计算出来的。但是，这可能少计算了一些，至少在铁岭、兴京、抚顺、牛庄、盖州5个驻防中，就没有列1名佐领，显然是不准确的。而且，在熊岳驻防只有954名旗兵，可能只计算了1名佐领。

[64]《大清会典》卷84，2a～3a、5b～6a；卷86，7a～7b。马协弟：《驻防八旗浅谈》，载《满族研究》，1985（2），20页。Wade，T. F.（威妥玛），"The Army of the Chinese Empire：Its Two Great Divisions，the Bannermen or National Guard，and the Green Standard or Provincial Troops…"（《中华帝国军队：旗兵或国家卫队，绿营或各省驻防》），in *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1851，（20），321～323页。

[65]《大清会典》卷84，2a～2b、5b～6a；卷86，6a～7b。马协弟：《驻防八旗浅谈》，载《满族研究》，1985（2），20页。Wade，T. F.（威妥玛）"The Army of the Chinese Empire：Its Two Great Divisions，the Bannermen or National Guard，and the Green Standard or Provincial Troops…"（《中华帝国军队：旗兵或国家卫队，绿营或各省驻防》），in *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1851，（20），318～321页。

[66] 王锺翰：《"国语骑射"与满族的发展》，见《满族史研究集》，205页。郑天挺：《探微集》，173～174页。Lee，Robert H. G.（罗伯特·李），*The Manchurian Frontier in Ch'ing History*（《清代满洲边疆史》），32页。马

协弟：《驻防八旗浅谈》，载《满族研究》，1985（2），19页。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制度研究》，2页。刘凤翰：《清季自强运动与军事初期改革（1861—1895）》，见《清季自强运动研究讨论会文集》，346页。Elliott，Mark（欧立德），"Bannerman and Townsman：Ethnic Tens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Jiangnan"（《旗民和市民：十九世纪江南的民族张力》，in *Late Imperial China*（《晚期中华帝国》），1992，11（1），40页注8。

[67] 爱新觉罗·宗夔：《满族旧俗忆述》，见《广东文史资料》，第35辑，264页。《大清会典》卷84，9a。Brunnert，H. S.（布鲁纳特），Hagelstrom，V. V.（哈盖尔斯特罗姆），*Present Da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当今中国的政治机构》），732页。Lee，Robert H. G.（罗伯特·李），*The Manchurian Frontier in Ch'ing History*（《清代满洲边疆史》），28页。

[68] 八旗都统衙门档案，卷8，"旗务"。傅克东、陈佳华：《清代前期的佐领》，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1），168页。

[69]《满族简史》，100页。王锺翰：《"国语骑射"与满族的发展》，见《满族史研究集》，205页。

[70]《满族社会历史调查》，35页。张其卓：《满族在岫岩》，13～14页。Lee，James（李中清），Robert Y. Eng（罗伯特），Population and Family History in Eighteenth Century Manchuria：Preliminary Results from Daoyi，1774—1798（《十八世纪满洲的人口和家庭历史：道义屯的初步考察，1774—1798》）in *Ch'ing-Shin Wen-T'i*（《清史问题》），1984，5（1），12页。

[71] 郑川水：《清末满族社会特点初探》，载《学术月刊》，1982（2），61页。作者在1959年对北京满人的社会调查中，大大低估了晚清的旗兵和旗人的数量差距。他指出旗兵和旗人的数量比大约是1∶5（《满族社会历史调查》，85页）。刘凤翰的结论可能更接近实际，他估计19世纪中期每个旗兵要负担"十多个甚至是几十个家庭人口"（《清季自强运动与军事初期改革（1861—1895）》，见《清季自强运动研究讨论会文集》，352页）。

[72]《大清皇帝实录·同治实录》卷144，2b～3b。Wright，Mary Clabaugh（芮玛丽），*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The T'ung-chih Restoration，1862－1874*（《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53～54页。

[73] 罗友枝也描述了那些她称之为"被征服的士人"的地位是"隔离而不平等"（"Reenvisioning the Qing：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再观清代：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亚洲研究杂志》），1996，（55），832页）。

[74] 华立：《从旗人编查保甲看“旗民分治”政策的变化》，载《民族研究》，1988（5），97～106页。张其卓：《满族在岫岩》，6～7页。

[75] Wu，Wei-ping（武卫平），*The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the Eight Banners*（《八旗的发展与衰落》），103～104页。Wakeman，Frederic，Jr.（魏斐德），*The Great Enterprise：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洪业——清朝开国史》），468页。

[76] 马协弟：《八旗制度下的满族》，载《满族研究》，1987（2），32～33页。Lee，Robert H. G.（罗伯特·李），*The Manchurian Frontier in Ch'ing History*（《清代满洲边疆史》），31页。金启孮：《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三家子屯调查报告》，23～24页。八旗都统衙门档案，卷4，“旗务”，山东巡抚致汉军镶红旗都统信件，光绪十四年三月十五日。

[77] 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制度研究》，162～168页。S. Chang（章生道），“Morphology of Walled Capitals”（《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in G. William Skinner（施坚雅）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92页。关于不同的满城类型，参见 Elliott，Mark（欧立德），*Resident Aliens：The Manchu Experience in China，1644－1760*（《外来居民：满洲人在中国之经历（1644—1760）》），132～142页。

[78] 金启孮：《京旗的满族》，载《满族研究》，1988（3），63～65页。Wakeman，Frederic，Jr.（魏斐德），*The Great Enterprise：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洪业——清朝开国史》），477～479页。

[79] 马协弟：《浅论清代驻防八旗》，载《社会科学战线》，1986（3），194页。关于绥远和乌鲁木齐，参见 Gaubatz，Piper Rae（高贝贝），*Beyond the Greet Wall：Urban Form and Transformation on the Chinese Frontiers*（《长城以外：边境的城镇形成及变迁》），66～88、71～74页。关于青州，参见 S. Chang（章生道），“Morphology of Walled Capitals”（《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in G. William Skinner（施坚雅）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92页；Williamson，Alexander（韦廉臣），*Journeys in North China，Manchuria，and Eastern Mongolia*（《华北、满洲和蒙古东部游记》），第1册，104页关于宁夏，见黄光赟、陈金铭：《宁夏民军起义》，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500页。

[80] 关于开封，参见《河南通志》卷2，2b～3a。关于镇江，参见 Elliott，Mark（欧立德），“Bannerman and Townsman：Ethnic Tens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Jiangnan”（《旗民和市民：十九世纪江南的民族张力》），in *Late*

Imperial China（《晚期中华帝国》），1990，11（1），37页。

[81] Elliott，Mark（欧立德），*Resident Aliens：The Manchu Experience in China，1644-1760*（《外来居民：满洲人在中国之经历（1644—1760）》），133～139页。关于荆州地图，参见《荆州府志》。关于西安地图，参见*Shina shōbetsu zenshi*（《支那省别全史》），第7册，26页。关于广州，参见Rhoads，Edward J. M.（路康乐），"Merchant Association in Canton，1895-1911"《广州商会，1895—1911》，in Mark Elvin（伊懋可），G. William Skinner（施坚雅）eds.，*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两个世界中的中国城市》），98页。关于南京，参见《江宁府志》卷3，1b～2b；Spence，Jonathan D.（史景迁），*God's Chinese Son：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187页。关于太原，参见《阳曲县志》卷3，2b～3a。

[82] Wakeman，Frederic，Jr.（魏斐德），*The Great Enterprise：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洪业——清朝开国史》），477～479页。Elliott，Mark（欧立德），"Bannerman and Townsman：Ethnic Tens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Jiangnan"（《旗民和市民：十九世纪江南的民族张力》），in *Late Imperial China*（《晚期中华帝国》），1990，11（1），43页。

[83] Wakeman，Frederic，Jr.（魏斐德），*The Great Enterprise：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洪业——清朝开国史》），478页注158。戴学稷：《呼和浩特简史》，59页。Elliott，Mark（欧立德），"Bannerman and Townsman：Ethnic Tens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Jiangnan"（《旗民和市民：十九世纪江南的民族张力》），in *Late Imperial China*（《晚期中华帝国》），1990，11（1），43页。

[84] 金启孮：《京旗的满族》，载《满族研究》，1988（3），65页。《北京名胜古迹词典》，154页。

[85] 马协弟：《浅论清代驻防八旗》，载《社会科学战线》，1986（3），196页。Wakeman，Frederic，Jr.（魏斐德），*The Great Enterprise：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洪业——清朝开国史》），478页注158。Rozman，Gilbert（饶济凡），*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291～292页。Williamson，Alexander（韦廉臣），*Journeys in North China，Manchuria，and Eastern Mongolia*（《华北、满洲和蒙古东部游记》），第2册，322页，

[86] 王均：《1908年北京内外城的人口与统计》，载《历史档案》，1997（3），103页。《内阁官报》，宣统三年七月二十五、二十六日，539～541页。

[87] Rozman，Gilbert（饶济凡），*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292～293页。王均：《1908年北京内外城的人口与统计》，载《历史档案》，1997（3），103页。

[88] 关于广州，参见Rhoads，Edward J. M.（路康乐），"Merchant Association in Canton，1895－1911"（《广州商会，1895—1911》），in Mark Elvin（伊懋可），G. William Skinner（施坚雅）eds.，*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两个世界中的中国城市》），97页。关于西安，参见Keyte，J. C.（凯特），*The Passing of the Dragon：The Story of the Shensi Revolution and Relief Expedition*（《龙的消逝：陕西革命和救济的故事》），113页。关于成都，参见Kendall，Elizabeth（伊丽莎白·肯道尔），*A Wayfarer in China：Impressions of a Trip Across West China and Mongolia*（《一位旅行者在中国：穿越华西和蒙古的印象》），174页。

[89] 李劼人：《死水微澜》，211～212页，Hu zhihui（胡志辉）译本（略有改动）载*Chinese Literature*（《中国文学》），1981，（12），29页。满城的地图，参见陈一石、王端玉：《清代成都的"满城"与旗汉分治》，载《四川大学学报》，1981（3），78页。

[90] 陈一石、王端玉：《清代成都的"满城"与旗汉分治》，载《四川大学学报》，1981（3），72、75页。

[91] Wakeman，Frederic，Jr.（魏斐德），*The Great Enterprise：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洪业——清朝开国史》），469～471页。Ma Feng-ch'en（马丰琛），"Manchu-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Conflicts in Early Ch'ing"（《清初的满汉社会经济矛盾》），in E-tu Zen Sun（孙任以都），John De Francis（约翰·德弗朗西斯）eds.，*Chinese Social History：Translations of Selected Studies*（《中国社会史论著选译》），335～340页。

[92] Malone，Carroll Brown（麻伦），*History of the Peking Summer Palaces under the Ch'ing Dynasty*（《清朝北京颐和园史》），55～56页。《北京市海淀区火器营满族社会调查报告》，载《满族研究》，1988（1），89页。《满族社会历史调查》，226、232页。Lee，James（李中清），Robert Y. Eng（罗伯特），"Population and Family History in Eighteenth Century Manchuria：Preliminary Results from Daoyi，1774－1798"（《十八世纪满洲的人口和家庭历

史：道义屯的初步考察，1774—1798》），in *Ch'ing-Shih Wen-T'i*（《清史问题》），1984，5（1），8页。

[93] Lee，Robert H. G.（罗伯特·李），*The Manchurian Frontier in Ch'ing History*（《清代满洲边疆史》），78～79、183页。Edmonds，Richard Louis（理查德·路易斯·爱德蒙），*Northern Frontiers of Q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rontier Policy*（《清朝和日本德川幕府时期北部边疆政策的比较研究》），56～70页。

[94] Hosie，Alexander（谢立山），*Manchuria: Its People，Resources and Recent History*（《满洲：人口、资源和近代历史》）。Lee，Robert H. G.（罗伯特·李），*The Manchurian Frontier in Ch'ing History*（《清代满洲边疆史》），102页。Edmonds，Richard Louis（理查德·路易斯·爱德蒙），*Northern Frontiers of Q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rontier Policy*（《清朝和日本德川幕府时期北部边疆政策的比较研究》），78～81页。赵中孚：《清代东三省的地权关系与封禁政策》，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1，（10），299页。

[95] Fletcher，Joseph（傅礼初），"The Sino-Russian Relations，1800－1862"（《中俄关系，1860—1862》），in John K. Fairbank（费正清）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 10，*Late Ch'ing，1800－1911*，part 1（《剑桥中国史》，第10卷，晚清，1800—1911，上卷），332～333页。

[96] Lee，Robert H. G.（罗伯特·李），*The Manchurian Frontier in Ch'ing History*（《清代满洲边疆史》），103、119页。

[97] 张其卓：《满族在岫岩》，83～85页。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制度研究》，215～217页。郑天挺：《探微集》，59～61页。王钟翰：《清代八旗中的满汉民族成分问题（上）》，载《满族研究》，1990（3），42～45页，Yan，Yunxiang（阎云翔），*The Flow of Gifts: Reciprocity and Social Networks in a Chinese Village*（《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39页。

[98] 潘洪钢：《辛亥革命与荆州驻防八旗》，载《满族研究》，1992（2），27页。《满族社会历史调查》，199～200页。Franck，Harry A.（亨瑞·福兰克），*Wandering in Northern China*（《华北漫游》），374页。汪宗猷：《广州满族简史》，80～81页。谢谢Harry Lamley（哈瑞）提醒我注意汪宗猷的书，并借给我他手中的复印本。

[99]《满族社会历史调查》，87页。张其卓：《满族在岫岩》，7页。

[100] 陈一石、王端玉：《清代成都的"满城"与旗汉分治》，载《四川大学学报》，1981（3），74页。Bodde，Derk（布迪），Clarence Morris（莫里

斯），*Law in Imperial China, Exemplified by 190 Ch'ing Dynasty Cases*（《中华帝国的法律》），96、97、351～352 页。

［101］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33、39、51～52 页。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54、105 页。黄光亮：《清代科举制度之研究》，150～152 页。关于端方和那桐，参见魏秀梅：《清季职官表·人物录》，39、52 页。

［102］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202～210 页。Chu, Raymond W.（雷蒙德·朱），William G. Saywell（威廉·塞维尔），*Career Patterns in the Ch'ing Dynasty: The Office of Governor-General*（《清朝总督官缺之人事嬗递》），49 页。也见 Crossley, Pamela Kyle（柯娇燕），"Manchu Education"（《满洲人的教育》），in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中华帝国晚期的教育和社会，1600－1900》），351～352 页。关于凤山，参见魏秀梅：《清季职官表·人物录》，32 页。

［103］李红：《清代笔帖式》，载《历史档案》，1994（2），91 页。陈文石：《清代的笔帖式》，载《食货月刊》，1974（4），69～72 页。关于孚琦，参见魏秀梅：《清季职官表·人物录》，23 页。关于松寿，参见尚秉和：《辛壬春秋》卷 44，1a。

［104］关于荣禄，见 Hummel, Arthur W.（恒慕义）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清代名人传略》），405 页。刘凤翰：《武卫军》，23～31 页。关于赵尔丰，参见《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 5 卷，98 页。关于"荫生"，参见 Brunnert, H. S.（布鲁纳特），Hagelstrom, V. V.（哈盖尔斯特罗姆），*Present Da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当今中国的政治机构》），958 页。

［105］MacKinnon, Stephen R.（麦金农），*Power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Yuan Shi-kai in Beijing and Tianjin, 1901－1908*（《帝国晚期的政治与权力：袁世凯在北京和天津，1901—1908》），14～15 页。Hummel, Arthur W.（恒慕义）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清代名人传略》），950 页。Brunnert, H. S.（布鲁纳特），Hagelstrom, V. V.（哈盖尔斯特罗姆），*Present Da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当今中国的政治机构》），137 页。

［106］Chu, Raymond W.（雷蒙德·朱），William G. Saywell（威廉·塞维尔），*Career Patterns in the Ch'ing Dynasty: The Office of Governor-General*（《清朝总督官缺之人事嬗递》），49～50、68 页。

［107］陈文石：《清代满人政治参与》，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77，（48），551～553 页。

[108] Fairbank, John K.（费正清），"The Manchu-Chinese Dyarchy in the 1840's and '50's"（《19世纪40、50年代的满汉共治》），in *Far Eastern Quarterly*（《远东季刊》），1953（12），270页。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115～116页。

[109] Kessler, Lawrence D.（凯思乐），"Ethnic Composition of Provincial Leadership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清朝各省大员的种族构成》），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亚洲研究杂志》），1969，（28），493页。也见Elliott, Mark（欧立德），*Resident Aliens: The Manchu Experience in China, 1644-1760*（《外来居民：满洲人在中国之经历（1644—1760）》），369页。

[110] Bartlett, Beatrice S.（白彬菊），*Monarchs and Ministers: The Grand Council in Mid-Ch'ing China, 1723-1820*（《君与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35～41、242、374页注42。也见Sun, E-tu Zen（孙任以都），"The Board of Reven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十九世纪中国的户部》），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哈佛亚洲研究学报》），1962—1963，（24），177～179页。

[111] 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6、43页。Brunnert, H. S.（布鲁纳特），Hagelstrom, V. V.（哈盖尔斯特罗姆），*Present Da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当今中国的政治机构》），131～135、288、290～292页。陈文石：《清代满人政治参与》，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77，（48），568、570页。

[112] 李红：《清代笔帖式》，载《历史档案》，1994（2）。陈文石：《清代的笔帖式》，载《食货月刊》，1974（4）。Chu, Raymond W.（雷蒙德·朱），William G. Saywell（威廉·塞维尔），*Career Patterns in the Ch'ing Dynasty: The Office of Governor-General*（《清朝总督官缺之人事嬗递》），52页。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43页。

[113] 陈文石：《清代的笔帖式》，载《食货月刊》，1974（4），556～557页。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145～146页。也见Ning Chia（贾宁），*The Li-fan Yuan in the Early Ch'ing Dynasty*（《清初的理藩院》），32～33页。

[114] 陈文石：《清代满人政治参与》，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77，（48），572～575页。

[115] 同上书，552页。张其卓：《满族在岫岩》，7～8页。Lee, Robert H. G.（罗伯特·李），*The Manchurian Frontier in Ch'ing History*（《清代满洲边疆史》），128～129页。

[116] 魏秀梅：《从量的观察探讨清季驻防将军都统之人事嬗递》，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1，（10），194 页；《从量的观察探讨清季驻防副都统之人事嬗递》，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4，（13），396 页。

[117] Kessler，Lawrence D.（凯思乐），"Ethnic Composition of Provincial Leadership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清朝各省大员的种族构成》），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亚洲研究杂志》），1969，（28），509 页。李国祁、周天生：《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递现象之量化分析》，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74（2），302、305 页。也见 Chu，Raymond W.（雷蒙德·朱），William G. Saywell（威廉·塞维尔），*Career Patterns in the Ch'ing Dynasty: The Office of Governor-General*（《清朝总督官缺之人事嬗递》），38～39、66 页。

[118] Kessler，Lawrence D.（凯思乐），"Ethnic Composition of Provincial Leadership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清朝各省大员的种族构成》），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亚洲研究杂志》），1969，（28），509 页。李国祁、周天生：《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递现象之量化分析》，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74（2），319 页。

[119]《满族社会历史调查》，87 页。Brunnert，H. S.（布鲁纳特），Hagelstrom，V. V.（哈盖尔斯特罗姆），*Present Da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当今中国的政治机构》），979 页。Elliott，Mark（欧立德），"Bannerman and Townsman：Ethnic Tens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Jiangnan"（《旗民和市民：十九世纪江南的民族张力》，in *Late Imperial China*（《晚期中华帝国》），1990，11（1），61～62 注 120。Lui，Adam Yuen-chung（吕元骢），*The Hanlin Academy：Training Ground for the Ambitious，1644-1850*（《翰林院：雄心训练场，1644—1850》），109～110 页。魏秀梅：《从量的观察探讨清季驻防将军都统之人事嬗递》，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1，（10），224 页；《从量的观察探讨清季驻防副都统之人事嬗递》，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4，（13），427 页。

[120] Kessler，Lawrence D.（凯思乐），"Ethnic Composition of Provincial Leadership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清朝各省大员的种族构成》），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亚洲研究杂志》），1969，（28），502 页。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269 页。

[121] Rhoads，Edward J. M.（路康乐），"Self-Strengthening and Manchu-Han Relations（《洋务运动与满汉关系》）"，见郝延平、魏秀梅主编：《近

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王家俭：《中国近代海军史论文集》，216～221 页。钱实甫：《清季新设职官年表》，61 页。

[122] 郑川水：《论清朝的旗饷政策及其影响》，载《辽宁大学学报》，1985（2），77～78 页。罗炳绵：《总理衙门与满族本位政策》，见《清季自强运动研讨会论文集》，177 页。郭太风：《八旗绿营俸饷制度初探》，载《复旦学报》，1982（4），107 页。

[123] 衣保中：《试论清代满族士兵土地所有制的演变》，载《满族研究》，1987（4），29 页。王钟翰：《清代旗地性质初探》，载《文史》，1979（6），133 页。《满族社会历史调查》，206 页。

[124] 郑川水：《辛亥革命与八旗制度的崩溃——略论辛亥革命对满族的影响》，载《辽宁大学学报》，1982（1），34 页。Lee，Robert H. G.（罗伯特·李），*The Manchurian Frontier in Ch'ing History*（《清代满洲边疆史》），37 页。赵中孚：《清代东三省的地权关系与封禁政策》，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1，（10），298～300 页。

[125] 杨树森：《清代柳条边》，99 页。Lee，Robert H. G.（罗伯特·李），*The Manchurian Frontier in Ch'ing History*（《清代满洲边疆史》），79 页。《满族简史》，150 页。衣保中：《试论清代满族士兵土地所有制的演变》，载《满族研究》，1987（4），28 页。李贵连：《沈家本与中国法律现代化》，111～112 页。Yan，Yunxiang（阎云翔），*The Flow of Gifts：Reciprocity and Social Networks in a Chinese Village*（《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26 页。也见赵中孚：《清代东三省的地权关系与封禁政策》，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1，（10），293～294 页。

[126] 马协弟：《八旗制度下的满族》，载《满族研究》，1987（2），32 页。汪宗猷：《二百年来广州满族经济生活的变化》，见《广东文史资料》，第 35 辑，250 页。会议政务处档案，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九日。

[127] Wu，Wei-ping（武卫平），*The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the Eight Banners*（《八旗的发展与衰落》），第 6 章。

[128] 同上书，第 7～8 章。郑川水：《论清朝的旗饷政策及其影响》，载《辽宁大学学报》，1985（2），78～80 页。关于这一安置计划的最终结果，参见 Yan，Yunxiang（阎云翔），*The Flow of Gifts：Reciprocity and Social Networks in a Chinese Village*（《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24 页。

[129] 汪宗猷：《二百年来广州满族经济生活的变化》，见《广东文史资料》，第 35 辑，252 页。郑川水：《论清朝的旗饷政策及其影响》，载《辽宁大

学学报》，1985（2），79页。《满族社会历史调查》，89页。

［130］老舍：《正红旗下》，13、31～32、38、39、89页。

［131］Wu Wo-yao（吴沃尧），"A Bannerman at the Teahouse"（《茶馆中的旗人》），in *Renditions: A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Magazine*（《译言：中英翻译杂志》），1975（4），148～150页。也见Crossley，Pamela Kyle（柯娇燕），*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孤军：三代满族人和清朝的灭亡》），176～177页。

［132］Hosie，Alexander（谢立山），*Three Years in Western China: A Narrative of Three Journeys in Ssu-ch'uan, Kuei-chow, and Yün-nan*（《华西三年：四川、贵州、云南三次旅行记》），86～87页。Kendall，Elizabeth（伊丽莎白·肯道尔），*A Wayfarer in China: Impressions of a Trip Across West China and Mongolia*（《一位旅行者在中国：穿越华西和蒙古的印象》），174～175页。Henry，B. C.（香便文），*Ling-nam, or Interior Views of Southern China*（《岭南，或华南的内部观察》），46页。

［133］Muramatsu，Yuji（村松佑次）"Banner Estates and Banner Lands in 18th Century China-Evidence from Two New Sources"（《十八世纪中国的旗产和旗地——两种新例证》），in *Hitotsubashi Journal of Economics*（《一桥经济杂志》），1972，12（2），12～13页。金启孮：《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三家子屯调查报告》，23～25页。Lee，James（李中清），Robert Y. Eng（罗伯特），"Population and Family History in Eighteenth Century Manchuria: Preliminary Results from Daoyi，1774-1798"（《十八世纪满洲的人口和家庭历史：道义屯的初步考察，1774—1798》），in *Ch'ing-Shih Wen-T'i*（《清史问题》），1984，5（1），12页。《满族社会历史调查》，92页。关于边疆的满人经济状况一些矛盾的观点，参见Rigger，Shelley（任雪丽），*Voices of Manchu Identity，1635—1935*（《满洲身份的争论，1635—1935》），199～201页。

［134］Oxnam，Robert B.（安熙龙），*Ruling from Horseback: Manchu Politics in the Oboi Regency，1661-1669*（《马背上的统治：鳌拜摄政时期的满族政治，1661—1669》），36页，略有改动。

［135］关于更完整，但略有不同的关于满人生活方式的讨论，参见Elliott，Mark（欧立德），*Resident Aliens: The Manchu Experience in China，1644-1760*（《外来居民：满洲人在中国之经历（1644—1760）》），403～447页。

［136］张杰：《清代东北满族文化教育简论》，载《满族研究》，1995（2），31～32页。Elliott，Mark（欧立德），*Resident Aliens: The Manchu Experience in China，1644-1760*（《外来居民：满洲人在中国之经历（1644—

1760)》)，428～430 页。张国昌：《满族教育在清代》，载《满族研究》，1986 (3)，57～58 页。雷方圣：《荆州旗学的始末及其特点》，载《民族研究》，1984 (3)，57 页。

[137] Ch'en，Chieh-hsien（陈捷先），"The Decline of the Manchu Language *in China during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1)*"（《清代满语的衰落》），in Walther Heissig（海西西）ed.，*Altaica Collecta*（《阿尔泰学论集》），139～140 页。《东方杂志》，第 4 卷第 5 号，"军事"，33～34 页（光绪三十三年五月）。王锺翰：《"国语骑射"与满族的发展》，见《满族史研究集》，197 页。

[138] 吴元丰、赵志强：《锡伯族由科尔沁蒙古旗编入满洲八旗始末》，载《满族研究》，1984 (5)，66 页。

[139] Ch'en，Chieh-hsien（陈捷先），"The Decline of the Manchu Language *in China during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1)*"（《清代满语的衰落》），in Walther Heissig（海西西）ed.，*Altaica Collecta*（《阿尔泰学论集》），139～141 页。Hao，Yen-p'ing（郝延平），Kwang-Ching Liu（刘广京），"The Importance of the Archival Palace Memorials of the Ch'ing Dynasty: *The Secret Palace Memorial of the Kuang-hsü Period，1875－1908*"（《清代宫中档的重要意义：光绪时期的宫中密档，1875—1908》），in *Ch'ing-Shih Wen-T'i*（《清史问题》），1974，3 (1)，82 页。《满族简史》，184～185 页。李林：《从家谱中探讨满族文化发展》，载《满族研究》，1987 (4)，64 页。老舍：《正红旗下》，50 页。

[140] Williamson，Alexander（韦廉臣），*Journeys in North China，Manchuria，and Eastern Mongolia*（《华北、满洲和蒙古东部游记》），第 2 册，39 页。Hosie，Alexander（谢立山），*Manchuria: Its People，Resources and Recent History*（《满洲：人口、资源和近代历史》），26 页。Ch'en，Chieh-hsien（陈捷先），"The Decline of the Manchu Language *in China during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1)*"（《清代满语的衰落》），in Walther Heissig（海西西），ed.，*Altaica Collecta*（《阿尔泰学论集》），143 页。苏精：《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14、125 页。《洋务运动》，第 3 册，510 页。关于满语作为军事保密用语的早期历史，参见 Crossley，Pamela Kyle（柯娇燕），Evelyn S. Rawski（罗友枝），"A Profile of the Manchu Language in Ch'ing History"（《清史研究中之满语概述》），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哈佛亚洲研究学报》），1993，53 (1)，70～71 页。

[141] 爱新觉罗·瀛生：《谈谈满族人的姓名》，载《满族研究》，1985 (2)，56～58 页。关于苏完（Suwan）作为瓜尔佳（Guwalgiya）宗族的一支，参见 Crossley，Pamela Kyle（柯娇燕），*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孤军：三代满族人和清朝的灭亡》），39～46 页。

［142］爱新觉罗·瀛生：《谈谈满族人的姓名》，载《满族研究》，1985（2），56～59 页。刘庆华：《满族姓氏述略》，载《满族研究》，1983（1），69～70 页。王火：《清代八旗中高丽人名字的语言和民俗特征》，载《满族研究》，1995（2），47～49 页。关于端方的族姓，见 Hummel，Arthur W.（恒慕义）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清代名人传略》），780 页。

［143］Spence，Jonathan D.（史景迁），*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Bondservant and Master*（《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18～27 页。房兆楹：《清末民初洋学学生提名录初辑》，22～23、69～72 页。苏精：《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174～178 页。

［144］张其卓：《满族在岫岩》，142 页。

［145］Ch'en，Chieh-hsien（陈捷先），"The Sinification of Manchu Names：A Study of Personal Names in the Ch'ing Imperial House and Upper-Class Manchu Society of the Ch'ing Period"（《满人名字的汉化：清朝宗室和贵族名字的研究》），见《"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 1 期，5～12 页。爱新觉罗·瀛生：《谈谈满族人的姓名》，载《满族研究》，1985（2），59 页。

［146］张其卓：《满族在岫岩》，142 页。李林：《从家谱中探讨满族文化发展》，载《满族研究》，1987（4），67 页。也见何溥英：《满族他塔喇氏家谱中的汉文化因素》，载《满族研究》，1993（1），49～50 页。

［147］张其卓：《满族在岫岩》，142 页。Hummel，Arthur W.（恒慕义）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清代名人传略》），248 页。

［148］王锺翰：《清代八旗中的满汉民族成分问题（下）》，载《满族研究》，1990（4），60 页。刘庆华：《满人姓氏述略》，69 页。Ch'en，Chieh-hsien（陈捷先），"The Sinification of Manchu Names：A Study of Personal Names in the Ch'ing Imperial House and Upper-Class Manchu Society of the Ch'ing Period."（《满人名字的汉化：清朝宗室和贵族名字的研究》），见《"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 1 期，12～13 页。关于钮祜禄氏使用汉姓"郎"，见 Hummel，Arthur W.（恒慕义）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清代名人传略》），221 页。金启孮：《京旗的满族（续）》，载《满族研究》，1989（2），68、70 页。

［149］罗炳绵：《总理衙门与满族本位政策》，见《清季自强运动研讨会论文集》，167 页。荣铁耕：《清代北京的健锐营》，载《满族研究》，1987

(2)，36 页。雷方圣：《荆州旗学的始末及其特点》，载《民族研究》，1984 (3)，59 页。张敬媛：《满族的骑射》，载《满族研究》，1987 (4)，72～73 页。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52 页。潘洪钢：《辛亥革命与荆州驻防八旗》，载《满族研究》，1992 (2)，23 页。

[150] Elliott，Mark（欧立德），*Resident Aliens：The Manchu Experience in China，1644－1760*（《外来居民：满洲人在中国之经历（1644—1760）》），311～325 页。《大清会典》卷 87，1a～1b。张敬媛：《满族的骑射》，载《满族研究》，1987 (4)，72 页。《满族社会历史调查》，34、213 页。金启孮：《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三家子屯调查报告》，25 页。Lee，Robert H. G.（罗伯特·李），*The Manchurian Frontier in Ch'ing History*（《清代满洲边疆史》），68 页。

[151] 王锺翰：《"国语骑射"与满人的发展》，见《满族史研究集》，198、201～202 页。成堂福等：《木兰围场》，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 (2)，27、28 页。Lee，Robert H. G.（罗伯特·李），*The Manchurian Frontier in Ch'ing History*（《清代满洲边疆史》），68 页。也见 Menzies，Nicholas K.（孟泽思），*Forest and Land Management in Imperial China*（《清代森林与土地管理》），第 3 章。

[152] 老舍：《正红旗下》，24 页。

[153] Fay，Peter Ward（费伊），*The Opium War，1840－1842*（《鸦片战争，1840—1842》），342～344、352～353 页。张宇天：《晚清旗营的变迁和没落述略》，见《满族论丛》，56～58 页。《满族社会历史调查》，192 页。邹身城：《乍浦战役史实补遗》，载《历史教学》，1980 (8)，39～40 页。Elliott，Mark（欧立德），"Bannerman and Townsman：Ethnic Tens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Jiangnan"（《旗民和市民：十九世纪江南的民族张力》），in *Late Imperial China*（《晚期中华帝国》），1990，11 (1)，46～63 页。Waley，Arthur（亚瑟·威利），*The Opium War Through Chinese Eyes*（《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197～221 页。金启孮：《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三家子屯调查报告》，26 页。

[154] Jen Yu-wen（简又文），*The Taiping Revolutionary Movement*（《太平天国运动》），118、371～372、436、442 页。Crossley，Pamela Kyle（柯娇燕），*Orphan Warriors：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孤军：三代满族人和清朝的灭亡》），128～38 页。张宇天：《晚清旗营的变迁和没落述略》，见《满族论丛》，59～60 页。

[155] 张宇天：《晚清旗营的变迁和没落述略》，见《满族论丛》，60～61 页。Lee，Robert H. G.（罗伯特·李），*The Manchurian Frontier in Ch'ing*

History（《清代满洲边疆史》），116～117 页。马协弟：《驻防八旗浅谈》，载《满族研究》，1985（2），23 页。《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937 页。

[156] Kuwabara（桑原骘藏）：《中国辫发史》，载《东方杂志》，第 31 卷第 3 号，"妇女与家庭栏"，15～21 页。Wakeman，Frederic，Jr.（魏斐德），*The Great Enterprise：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洪业——清朝开国史》），648～650 页。Struve，Lynn A.（司徒琳），*The Southern Ming：1644－1662*（《南明史，1644—1662》），60～63 页。叶豪：《从"长毛"谈太平天国的发制》，载《南京史志》，1987（6），50 页。Hummel，Arthur W.（恒慕义）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清代名人传略》），95 页。Kuhn，Philip A.（孔飞力），"Political Crime and Bureaucratic Monarchy：A Chinese Case of 1768"（《政治犯罪和官僚君主制：1768 年的中国》），in *Late Imperial China*（《晚期中华帝国》），1978，8（1），88 页注 28。Naquin，Susan（韩书瑞），Evelyn S. Rawski（罗友枝），*Chinese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十八世纪中国社会》），82 页。关于突厥人的发式，见 Millward，James A.（米尔沃德），*Beyond the Pass：Commerce，Ethnicity and the Qing Empire in Xinjiang，1759－1864*（《越界：清代新疆的种族和商贸（1759—1864）》），271～275 页。谢谢 Don Sutton 提供关于苗族的信息，也谢谢 Robert Entenmann 给我参阅他两篇未发表的关于辫子历史的论文，最近的关于辫子的研究，见 Godley，Michael R.（迈克尔·戈德利），"The End of the Queue：Hair as Symbol in Chinese History"（《辫子的终结：中国历史上的发式象征》），in *East Asian History*（《东亚历史》），1994（8）。

[157] 例如，胡蕴玉：《发史》，见《满清野史》，第 1 辑，449～450 页。

[158] 郑天挺：《探微集》，83 页。Struve，Lynn A.（司徒琳），*The Southern Ming：1644－1662*（《南明史，1644—1662》），63 页。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378～413 页。Garrett，Valery M.（瓦纳瑞·嘉瑞特），*Chinese Clothing：An Illustrated Guide*（《中国服饰：插图指南》），11～14 页。

[159] 郑天挺：《探微集》，83 页。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449～484 页。Garrett，Valery M.（瓦纳瑞·嘉瑞特），*Chinese Clothing：An Illustrated Guide*（《中国服饰：插图指南》），31～32、42～45、65～74 页。Scott，A. C.（斯科特），*Chinese Costume in Transition*（《中国服饰转变》），5 页。

[160] 郑天挺：《探微集》，84～87 页。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365 页。谢谢黄彰健查找刘震宇的资料。

[161] Vollmer，John E.（沃尔曼），*Decoding Dragons：Status Garments*

in Ch'ing Dynasty China（《解码巨龙：中国清朝的身份性服装》），15～16 页。Garrett，Valery M.（瓦纳瑞·嘉瑞特），*Chinese Clothing：An Illustrated Guide*（《中国服饰：插图指南》），76～79 页。王云英：《试论清入关前的衣冠制》，载《辽宁大学学报》，1981（5），74 页。

[162] Fairbank，John K.（费正清），S. Y. Teng（邓嗣禹），"On the Types and Uses of Ch'ing Documents"（《清代档案的类型和使用》），in *Ch'ing Administration：Three Studies*（《清代行政三论》），45～54 页。Ch'en，Chieh-hsien（陈捷先），"The Decline of the Manchu Language in China during the Ch'ing Period（1644－1911）"（《清代满语的衰落》），in Walther Heissig（海西西）ed.，*Altaica Collecta*（《阿尔泰学论集》），137、141 页。也见 Crossley，Pamela Kyle（柯娇燕），Evelyn S. Rawski（罗友枝），"A Profile of the Manchu Language in Ch'ing History"（《清史研究中之满语概述》），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哈佛亚洲研究学报》），1993，53（1），65～80、91 页。

[163] Lui，Adam Yuen-chung（吕元聪），*The Hanlin Academy：Training Ground for the Ambitious，1644－1850*（《翰林院：雄心训练场，1644－1850》），66～67 页。Crossley，Pamela Kyle（柯娇燕），Evelyn S. Rawski（罗友枝），"A Profile of the Manchu Language in Ch'ing History"（《清史研究中之满语概述》），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哈佛亚洲研究学报》），1993，53（1），84～85 页。Waley，Arthur（亚瑟·威利），*The Opium War Through Chinese Eyes*（《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121 页。

[164] 爱新觉罗·瀛生：《满语与汉语的互相影响》，载《满族研究》，1987（1），67～72 页。关纪新、孟宪人：《满族与沈阳语、北京语》，载《满族研究》，1987（1），73～81 页。Wadley，Stephen A.（斯蒂芬·瓦德雷），"Altaic Influences on Beijing Dialect：The Manchu Case"（《阿尔泰语系对北京方言的影响：以满语为例》），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美国东方学会杂志》），1996，（16），99～104 页。

[165] Scott，A. C.（斯科特），*Chinese Costume in Transition*（《中国服饰转变》），29～33 页。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484～504 页。Garrett，Valery M.（瓦纳瑞·嘉瑞特），*Mandarin Squares：Mandarins and Their Insignia*（《补子：官吏和他们的标志》），30 页；*Chinese Clothing：An Illustrated Guide*（《中国服饰：插图指南》），56～61、84～93 页。

[166]《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952 页。《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 30，25b～26a。

[167] 金启孮：《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三家子屯调查报告》，35 页。

[168]《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952页。Crossley，Pamela Kyle（柯娇燕），*The Manchus*（《满洲人》），145页。Cao Xueqin（曹雪芹），*The Story of the Stone*（《石头记》），186、203页。

[169]《大清皇帝实录·光绪实录》卷412，14a～15b。也见Pomerantz-Zhang，Linda（琳达），*Wu Tingfang（1842-1922）：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伍廷芳（1842—1922）：近代中国的改革与现代化》），104页。

[170]《戊戌变法》，第3册，181～183页。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347～348页。也见Pusey，James Reeve（浦嘉珉），*China and Charles Darwin*（《中国与达尔文》），116～117页。

[171]《戊戌变法》，第3册，181～183页。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347～349、688页。也见Pusey，James Reeve（浦嘉珉），*China and Charles Darwin*（《中国与达尔文》），116～117页。Crossley，Pamela Kyle（柯娇燕），*Orphan Warriors：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孤军：三代满族人和清朝的灭亡》），166～167页。

[172]《戊戌变法》，第3册，200～220页。王尔敏：《断发、易服和改元——变法论之象征旨趣》，见《中国近代的维新运动》，60～62页。

[173] 黄彰健关于王尔敏论文的评论，见《中国近代的维新运动》，88页。Kwong，Luke S. K.（邝兆江），*A Mosaic of the Hundred Days：Personalities，Politics，and Ideas of 1898*（《百日维新的碎片：1898年的个人、政治和思想》），192～194页。

[174]《戊戌变法》，第2册，227～230、237～240、263～26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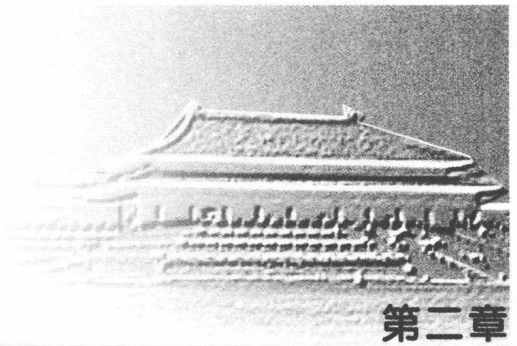
[175]《戊戌变法档案史料》，44～45页。关于张元济，见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245～251页。吴方：《仁智的山水——张元济传》。

[176]《大清皇帝实录·光绪实录》卷425，22a～22b。关于袁昶，见Hummel，Arthur W.（恒慕义）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清代名人传略》），945～948页。

[177] 老舍：《正红旗下》，58页（略有改动）；《茶馆》，18页。

[178] 也见Crossley，Pamela Kyle（柯娇燕），*The Manchus*（《满洲人》），7～8页。

[179] Powell，Ralph L.（拉尔夫·鲍威尔），*The Rise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1895-1912*（《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56页。



第二章

慈禧太后和“特权制度”

戊戌政变后，改革者们普遍将他们的失败归咎于满人。梁启超将愤怒直指协办大学士刚毅，因为他曾经宣称，宁愿将帝国赠与“友邦”，而不赠与“家奴”——这话很典型地代表了满人狭隘的族群偏见。这一阶段，正是梁启超写文章呼吁破除满汉族群隔离的时候。慈禧太后不顾非难，废止了光绪皇帝的很多改革措施。她的保守策略促使她很快选择了支持义和团运动，以反对西方人士和改革派的西化改革措施。当然，她拒绝延续光绪皇帝的改革，这也招致了越来越多的批评，这些批评认为，满人统治者是当时阻碍中国通过改革获得新生的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障碍。革命者对满人的指责越来越激烈，反满运动也在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日渐高涨，并在 1903 年春天的拒俄运动浪潮中达到一个高峰。由于反清的呼声日高，慈禧太后不仅被迫开始全面实施“新政”，还要面对改革者和革命者所提出的“满汉问题”。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不久，慈禧太后在满汉关系的处理上进行了一些相当温和的调整。但在 1907 年末，当安徽巡抚恩铭被刺杀后，慈禧太后被迫颁布了两项改革八旗制度的法令，其内容更甚于光绪皇帝九年前

70

颁布的相关法令。与此同时，慈禧太后新政的其他措施也影响着旗人，正如这些措施同样影响着广大的汉民。

政变中惊醒

光绪皇帝对于八旗制度的改革尝试，最终成了慈禧太后政变的牺牲品。慈禧太后在1898年9月22日重掌朝纲，清理了一批拥护改革的领头人，包括那些公开议论满汉关系的人。张元济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并被遣返上海；康有为被迫流亡海外。但是维新期间上书请谋旗人生计的袁昶，却没有受到牵连，相反，他被召到北京，派到总理衙门任职。但袁昶在两年之后也因直谏成为保守政治的牺牲品。因为抨击朝廷对义和团的支持，他在1900年7月被斩首。除了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在1898年所铲除的政治牺牲品几乎都是汉人。这一情形使得谣言四起，称慈禧太后的朝廷是"内满外汉"，对此，慈禧太后在10月8日的上谕中坚决予以了否认。[1]

71

另外，为了表示对旗人的尊重，慈禧太后搁置了光绪皇帝关于解决旗人生计问题的法令。这一法令取消了关于禁止旗人在八旗之外谋生的禁令，并任命奕劻等人去落实旗人的重新安置，作为长期的解决之道。1898年11月，当奕劻和他属下提交了一份关于重新安置京师旗人的奏折时，慈禧太后赞赏他们考虑周全，但声称还需要了解更多的情况才能实行。[2]此后，再没有任何针对旗人的相关政策或措施。1898年的法令遭遇了1865年法令同样的命运。虽没有被废除，但是也从未被落实。此外，慈禧太后鼓励驻京八旗进一步加强军事现代化。1898年12月，她同意了军机大臣荣禄"饬募万人，驻防京畿"的奏请，这就是主要由旗人组成的"武卫中军"。1899年6月，慈禧太后推荐载漪（端亲王，1856—1922）组织了"虎神营"，也有万人之众，其士兵全部是京师旗人。[3]

不久后，慈禧太后利用了那些希望以武力驱逐洋人的义和团团众，在这种仇外的情绪中，支持慈禧太后的大部分都是满人。其中一名是虎神营的统帅载漪，他的妻子是慈禧太后的侄女。1900年1月，载漪的长子溥儁（1886—1929）被立为同治皇帝的

皇位继承人（同治皇帝在1875年驾崩，没有留下子嗣），兼祧光绪皇帝之嗣。[4]另外一名支持者是大学士刚毅。当义和团团众于6月聚集北京时，他在朝廷和义和团团众间极力调停。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满人大员都支持义和团团众。铁帽子王之一善琦（肃亲王，1866—1922）就公开反对义和团团众，而总理衙门大臣奕劻对义和团团众的态度也是摇摆不定。[5]1900年6月20日，在经过一系列的廷议之后，慈禧太后正式向列强宣战。

图6　慈禧太后和宫廷女子，1903年。右边为光绪皇帝的皇后，后来的隆裕太后
（Bland（布兰德），Backhouse（白克浩斯），*China under the Empress*（《慈禧外传》），256页）

很多满人，尤其是北京和东北的满人，都参与到这一斗争中。 72
在北京，很多京旗士兵都加入了义和团攻击内城天主教堂和围攻使馆区的行动。载漪的虎神营士兵还击毙了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Baron von Ketteler）。[6]驻京八旗，包括后来抵御列强军队进攻北京的神机营（19世纪60年代组建）、虎神营和武卫中军，都参与了抵抗“洋人”的斗争。在这一过程中，这三支拥有半现代化装

备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7]在满人军队进行的这些英勇但无谓的抵抗中，老舍的父亲也失去了生命。另外一个受害者是具有改革思想的皇族人士寿富，他在1897年就撰文分析列强瓜分中国的危险。当侵略者向首都进发时，他选择了自杀殉国。[8]与此同时，在东北，俄国人趁机入侵，旗兵同样进行了英勇抵抗。随着俄国军队分五路向南进攻，驻防的旗兵部队也一支一支被击溃。人类学家史禄国（S. M. Shirokogoroff）曾在十五年后考察了黑龙江流域的瑷珲（现在的黑河）驻防处：

> 满洲人口……损失惨重，实际上现存的只是成千上万的难民，他们流离失所，纷纷南下。几个月后他们再次返回故居时，却只见一片灰烬瓦砾。哥萨克人（Cossacks）所到之处，焚烧村庄，掳掠牛马，使满人几乎损失了所有财物。[9]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一千名旗兵的护卫下仓皇逃往西安避难，八国联军在1900年8月14日进入了北京，他们在此据守了13个月。这一时期，奕劻和前直隶总督李鸿章（1823—1901）肩负起了与以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为首的洋人进行和谈的艰巨任务。和谈双方于11月中旬会面，负责为朝廷进行翻译的是满洲旗人荫昌（1859—1928），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同文馆，接受过德语训练，时任天津武备学堂总办。[10]列强在谈判中要求高额的赔偿，并要清廷“惩办祸首”。朝中一些支持义和团的大臣都被波及，载漪被发配新疆，永远监禁。刚刚去世的刚毅被追夺了全部官职。
73 载漪的儿子溥儁被废除大阿哥之位，逐出宫廷。[11]所有支持义和团的地方官员也都未能幸免。在绥远，有二百多名旗兵参与了围攻天主教堂的斗争，事后，绥远城将军和为首的驻防军官均被革职，归绥道（汉人）被朝廷下令“斩立决”。[12]与此同时，之前反对义和团和朝廷主战政策的人均被免罪。例如，袁昶在死后官复原职。[13]然而，慈禧太后自己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光绪皇帝也没能够重新掌握政权。虽然他不再被威胁自动退位。

得胜的列强还要求清廷派一名外交特使前往德国，为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之死致歉，这名特使还必须是朝廷的一等亲王。最

后被选定的特使是皇帝18岁的弟弟载沣，他于1891年继承了父亲醇亲王奕譞的爵位。载沣在荫昌的陪伴下前往德国，并于1901年9月4日代表清廷向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正式道歉。之后载沣游历了德国并参加了几次阅兵典礼，其中包括在但泽（Danzig）由威廉二世和他的弟弟亨利亲王（Prince Heinrich）亲自主持的阅兵典礼，在欧洲三个月的游历大大丰富了载沣的阅历。1908年，载沣被封为摄政王。[14]荫昌继续待在德国，先后两次担任驻德公使（1901—1906，1908—1910），后来还担任了兵部尚书。

在载沣会见德国皇帝的三天后，《辛丑条约》就签订了。十三天之后，即1901年9月17日，列强从京城撤走了大部分军队，只留下一小队人马保护使馆区。然而，俄国一直占据着满洲。清廷与俄国之间的单独谈判一直持续到次年4月，当时俄国同意分三个阶段在18个月内撤兵。[15]到1903年春，俄国拒绝履行先前做出的承诺，这激起了中国国内和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民族情绪，并进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俄国直到1905年日俄战争失败后才从满洲撤兵。此外，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于1902年1月7日返回京城。

满汉关系的变化

慈禧太后在到达京城之前，对改革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早在1901年1月29日，她以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具有转折意义的上谕，承认变革是不可避免的。上谕声称：

> 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图富强，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机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总之，法令不更，固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

> 参酌中西政要……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16]

此后不久，清廷就成立了政务处来筛选改革建议，并向朝廷进行推荐。六名京师大员被任命为督办政务大臣，其中有三名满人（奕劻、荣禄、昆冈（ —1907)），三名汉人（李鸿章、王文韶（1830—1908)、鹿传麟（1836—1910))。除了奕劻，其余都是军机处和内阁的要员。此外，两江总督刘坤一（1830—1902）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被任命为政务处参预。[17]

很快，官员们对于改革的建议纷至沓来。在接下来的六年时间里，为了对这些建议进行回应，慈禧太后进行了大范围的变革。由于一些新政措施又回到了 1898 年夭折的戊戌变法的老路上，慈禧太后被迫（明显不大情愿地）重新考虑对百日维新采取的严厉措施。在 1901 年 1 月 29 日的上谕中，慈禧太后坚称“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到 1904 年 6 月，在七十大寿之际，她被说服特赦所有参与变法的人，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却不在特赦之列，据说是因为他们罪大恶极而不能被特赦。另外，那些被罢官的人（如张元济）都官复原职，被关押的人也被释放。[18]然而，这并不是对 1898 年改革者的最终政治平反，因为对这批人直到清王朝覆灭还一直存在着争议。

尽管在义和团运动后的五年时间里，很多官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改革建议，但只有两人的建议涉及了敏感的满汉关系问题：湖广总督张之洞和山东巡抚周馥（1837—1921)。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张之洞努力阻止外国势力把其军事行动延伸到他的管辖范围内，但他的行动受到了清廷及其满人支持者的巨大阻挠。他把情
75 况告知了英国驻汉口的总领事法磊斯（Everard Fraser，1859—1922)。1900 年 12 月中旬，法磊斯总结了张之洞的观点：

> 他和我所见到的所有汉人官员一样，憎恨满人，因为他们把持中国，搜刮民脂民膏，他们不顾自己的才智是否胜任，总能升官发财。中国要想改革只有一法：废除满人一切特权，不论是旗人的俸禄还是仕途特权。

据法磊斯记载，随后，张之洞以旗兵军饷的结余来资助其他改革措施的实施。[19]七个月后，张之洞把这些想法合并整理成一份奏折（这就是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第二折）并和其同僚刘坤一共同呈递给朝廷。尽管这是一份联合奏折，但主要都是张之洞的意见。[20]

在奏折中，张之洞和刘坤一提出了十二项重要的改革措施，其中第九条是“筹八旗生计”。他们提到，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影响，旗人生计日益艰难。“溯查乾隆以至光绪年间满汉大臣言官屡有上疏筹及旗人生计者，大率皆以出外屯垦为言，特是荒地惟关东口北为多，内地罕有，且宦家兵籍亦未必皆习于农，故屯垦一说迄未能大加推行”。与1865年沈桂芬和1898年张元济提出的建议相类似，张之洞和刘坤一提出，只要旗人愿意，他们可以离开京城或其他驻防城市，成为普通的“民”。“自谋生理之人，其钱粮即行开除，不必另补……省出饷银饷米即以专充八旗广设学堂之费，士农工商兵五门随所愿习……所学未成不能营生之时饷项照旧给发。五年以后省饷日巨，学堂日增。十年以后充兵者可以御侮则不患弱，改业者各有所长则亦不患贫矣”。

两年后，张之洞因教育事宜进京面圣。1903年12月14日，他利用临行拜见慈禧太后的机会，再次劝说她“化去满汉畛域”。这次他提议八旗中的管理职位不应严格限制于满人，而应该向汉人开放；他还建议旗人和汉人在司法处置上应该一视同仁。[21]几个月后的1904年8月，当时另外一名讨论满汉关系的官员——巡抚周馥上奏朝廷，建议允许“没有固定居所的满人”读书或耕种，只要他们愿意，甚至可以从事商贸活动。他还提出，旗人虽然依旧受八旗规章约束，但还是应该接受地方行政当局的司法管理。[22]

慈禧太后对张之洞和周馥建议的反应是复杂而矛盾的。1903年接见张之洞之后，慈禧太后一方面坚持说只有无知之人才会认为清廷偏好满人，反对汉人。[23]另一方面，她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来缩小满汉之间的差异。这些措施包括允许满汉通婚，在八旗

系统内任命了几名汉人官员，以及逐步改变满汉共治的制度。

1902 年 2 月 1 日，慈禧太后颁布了一道允许满汉通婚的谕令。虽然声称“沦浃寰区满汉臣民，朝廷从无歧视”，但她承认“惟旧例不通婚姻”。根据这道谕令，禁止通婚的原因是：“入关之初，风俗语言或多未喻，是以著为禁令。今则风同道一，已历二百余年，自应俯顺人情，开除此禁，所有满汉官民人等，著准其彼此结婚，毋庸拘泥。”[24]但是，慈禧太后的谕令并没有产生即时效果。1907 年上半年，内阁学士那桐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李鸿章的孙子，即刚刚丧偶的李国杰（1881—1939），《北京女报》（一份具有改革思想的满人日报）称其为满汉高官间的首次联姻。这一时期的报纸只提到过两桩显赫的满汉家族间的联姻：一是端方的弟弟与一名道光时总督的曾孙女之间的婚姻，二是铁良和袁世凯的儿女联姻。这样的例子很少发生，所以具有很高的新闻价值。正如改革派 1905 年 2 月在上海的《东方杂志》评论的那样，虽然朝廷颁布了谕令，但在各旗兵驻防地，满汉通婚的情况并没有大量发生，“种界严筑壁垒，抑何毅力之坚强耶”。[25]

1903 年 12 月 29 日，慈禧太后在接见张之洞之后两周，采取了另一项平满汉畛域的措施。可能是因为张之洞的建议，慈禧太后废除了满人对八旗系统的职位垄断。她任命东北的一名汉人军官程德全（1860—1930）为黑龙江齐齐哈尔驻防的副都统。（当齐齐哈尔驻防的职位于 1905 年被废除时，程德全被提升为黑龙江将军。）另一名在地方驻防任职的汉人是李国杰，1907 年他与那桐的女儿结婚时，担任广州汉军驻防军的副都统。[26]汉人官员也首次在驻京八旗中任职。1906 年 1 月，冯国璋（1859—1919）担任陆军贵胄学校总办，同时他还署理蒙古正黄旗副都统。十个月后，京师的行政机构调整重组，一些去职的汉人高官被调往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中担任了品级相等的职位。[27]

77

慈禧太后也不再将东北作为满人的保留地。禁止汉人进入满洲的命令在 19 世纪晚期已经开始逐渐放宽，在义和团运动之后的几年里，尤其是考虑到俄国入侵的危险，这一禁令已经基本废除。而且，由于大量汉人移民从人口密集的华北地区涌入东北这片开

阔之地，“旗民不交产”的禁令在1905年被废除，虽然这一禁令在关内地区一直被普遍漠视。[28]实际上，朝廷自身为了尽力弥补国库的亏空，也开始卖掉东北一些土地的所有权。1906年，清廷在奉天辽西走廊的锦州地区设立了专门机构，负责测量附近的皇室土地以备出售；到1909年，清廷已经卖掉了超过20万英亩的土地。[29]最终，大量土地易主使得这一地区的地方衙门不得不彻底重组。之前，东北被划分为三个地区，每个地区由担任八旗驻防将军的满人来管理。1907年4月，朝廷把这三个地区改编为三省，裁撤三省的八旗驻防将军，建立一个新的行政管理体制，由东北总督统管，各省设巡抚，为一省之长。第一位东北总督徐世昌（1855—1939）是汉人，三位新的巡抚也都是汉人。代表满人利益的《北京女报》评论道，这些以前由满人垄断的地方要职，现在都任命了汉人，这证明了朝廷“对满汉并无偏见”。[30]

最后，慈禧太后在中央六部行政机构的基础上，批准新设四部，这样她就不再局限于满汉共治，但也并没有废除这一祖制。新设的第一部是外务部，在外国列强的坚持下于1901年7月设立。外国人长期以来对总理衙门的非正式性质表示不满，因为总理衙门仅仅是军机处下的非常设机构，他们要求总理衙门应该升级为 78
一个独立的部门。新的外务部在组织形式上与六部在两个方面有差异。外务部重新设置了总理大臣的职位并将其正规化，这一职权模糊的特别职位在18世纪被广泛用来监察各部的工作；总理大臣及会办大臣的职位高于各部尚书。此外，外务部只有一名尚书，一名左侍郎，一名右侍郎。当然这与满汉共治的模式背道而驰，因为之前各部都有两名尚书和两名侍郎，并在满人和汉人之间平均分配。另外三个部——商部、巡警部、学部——在义和团运动后设立，除了没有总理大臣，其组织形式与外务部完全一样。[31]

然而，慈禧太后对满汉共治的改变非常有限。政治组织结构上的变化仅限于新成立的四部。1905年秋，商部尚书载振建议，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应在其他中央机构中都废除满汉共治，“不分满汉”。[32]载振的建议回到了1898年张元济的思路上，但在当时是不可能实行的。而且，虽然在这些新的机构中不存在官缺的满

汉之分，但满汉尚书的比例分配也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例如，最初被任命为外务部2名大臣和3名尚书侍郎职位的是2名满人（奕劻和联芳）和3名汉人（王文韶、瞿鸿禨（1850—1918）、徐寿朋（ —1901））。其他三个新成立的部中，尚书和侍郎几乎是在满人（4名）和汉人（5名）之间平均分配。[33]因此，虽然满汉共治的形式已经被废除，但其精神仍然存在。

如果说新设立四个部的初始人事安排体现了汉人相对于满人的微弱优势，那么它同时也体现了亲王干政倾向的明显增强。因为在6名被任命的满人中，2名是亲王，即奕劻和载振。清前期，皇室亲王参与政务实属稀松平常。但是从18世纪二三十年代设立军机处之后，亲王参与政事的情况就不复存在了。1799年，嘉庆皇帝任命他哥哥成亲王永瑆（1752—1823）为军机大臣，但随后又取消了这一任命，他宣称让亲王到军机处任职“与国家定制未符”。[34]这样，从18世纪30年代到1861年，除了永瑆，只有一位亲王奕䜣在1853年到军机处任职，但他的任期（1853—1855）
79 与永瑆一样，也相当短暂。亲王不仅被排除在军机处之外，也不能参与六部事务。因此，根据钱实甫关于1830年到1860年职官情况的记载，在这三十年里没有一位亲王担任过六部的尚书或侍郎。[35]需要注意的是，禁令并未禁止皇室亲王在背后参与朝廷政务。这一禁令同样也不适用于那些不是亲王的皇族成员，实际上，正如前文所述，他们都被安排到京师官僚体系的“相应”职位中。

嘉庆皇帝所定下的百年成例，在同治中兴之初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首先被打破。1861年，奕䜣作为年幼皇帝的叔父，被重新任命到军机处。回头来看，我们就能明白这只是一种长期趋势的开始，这种趋势在载沣摄政期间为了重新强化帝制达到顶点。除了中间短暂的间断，奕䜣一直在军机处任职，直到1884年被慈禧太后罢职。接替他的是另一位亲王，即礼亲王世铎（1843—1914），他是一位铁帽子亲王，一直在军机处供职到1901年。而且，在两次情况下，有两位亲王也加入到军机处与世铎共事：第一次是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及战后的三年时间内，奕䜣加入了军机处；第二

次是载漪在1900年夏天义和团运动正盛之时入主军机处一个月。至此，禁止亲王进入军机处的禁令已经明显被违背了。[36]然而，皇室亲王仍然被排除在六部之外。他们被任命掌管总理衙门（奕䜣，后由奕劻接替）和海军衙门（奕譞），但是这两个部门与六部不同，是非常制机构。[37]

在义和团运动后的最初几年里，对清中期以来亲王不干政这一祖制的违背，在更广的范围内蔓延开来。当世铎于1901年8月被解除军机处职务时，祖制似乎得到了再次强调，因为留在军机处的满人荣禄仅仅是一名普通满人而非亲王，虽然他不久后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载沣。[38]然而，这一情形并没有持续多久。荣禄1903年4月去世后，奕劻随即继任，此后七年里他一直待在军机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违背祖制的行为从军机处扩散到其他各部。导致这种扩大的催化剂是外国势力，列强在《辛丑条约》中坚持不仅要把总理衙门正规化且升级为一个部，而且要让一位皇室亲王统领这个新部门。他们声称总理衙门一直都是由亲王领衔，所以也要由亲王继续接任。无论如何，1901年任命奕劻为外务部大臣开启了一个新局面，标志着皇室亲王第一次掌管一个法定的中央机构。两年后，当奕劻的儿子载振被任命为商部尚书时，禁令又一次被破坏。[39]

其他一些平满汉畛域的措施还包括满汉同等担任各省御史，同等荫袭，以及京师官员住所等几个方面的细小变化，这是慈禧太后在义和团运动后采取的一些改善满汉关系的措施。[40]相对于革命党人各种声势浩大的反满宣传，人们可以明显感到这些改革措施的数量之少、范围之窄和效果之有限。值得注意的是，慈禧太后并没有实施张之洞和周馥的主要建议，没有消除旗人和平民之间在官职上和法律上的阻隔，没有废除旗人的职业禁令，没有逐步削减旗兵军饷，更没有废除八旗制度本身。

由于慈禧太后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旗人的生计困境更加严重。一方面，占旗人大多数人口的京师旗人和东北旗人，在中日战争、中俄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中遭受了严重创伤，很多旗人家族和社区都被摧毁和破坏。另一方面，清廷的国库由于战争花费

和战后赔款而不断亏空，不仅没有能力帮助旗人恢复经济，而且不得不再次停止向旗人士兵发放军饷。正如柯娇燕总结的那样，“满人的生活每况愈下，由贫困而至潦倒”。因此，越来越多的满人不得不违背禁止出旗谋生的禁令。在北京，很多穷苦的旗人，包括那些饷银本就不多，还由于通货膨胀而大大贬值的旗籍士兵，不得不通过拉黄包车来维持日常开销。其他的很多旗人则成为小贩、工匠、零工和拾荒者。[41]

由于没有朝廷的统一指示，地方旗人官员采取了各种办法来解决旗人的生计问题。一种办法是把旗人重新安置于荒地上。在湖北，荆州八旗驻防决定派遣没有俸禄的旗人去耕种驻防地南部监利县和公安县的荒地。在山东，巡抚周馥打算把关山附近的荒地分配给青州和德州的旗人，让他们开垦耕种。然而，这些重新安置的计划并没有取得多大效果。周馥的继任者说，把旗人迁移
81 到关山附近荒地的计划根本没有实行。[42]另一种解决办法是将旗地出租给汉民耕种，通过收取租金来解决满人的各种开销。在江苏，江宁将军把靠近芜湖附近的万顷湖牧场变成“农垦地”出租给佃农，收取的租金用来接济南京和镇江的旗人寡妇和孤儿。在山东，作为把旗人迁移到关山的替代变法，巡抚杨士骧（1860—1909）提议把青州北部利津县和乐安县（今广饶县）六百顷（一万英亩）旗地出租给佃农。我们不清楚这些计划是否比重新安置的办法要成功一些。在万顷湖，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1907年年初的洪灾和1907年年底的抗租暴动，直到1908年佃农仍然没有向满人交纳租金。[43]还有一种办法是推进职业培训。在四川，成都将军设立了一个养蚕机构，鼓励旗人在满城内的闲置土地上种桑养蚕。在镇江，副都统成立了职业培训机构，向当地人传授染布织布和抽丝技能；他的上司江宁将军也成立了一个同样的机构来教导旗人妇女织布。[44]

总体来说，到1907年年初，慈禧太后的一些新政措施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既没有消除满汉之间的种种差别，也没有减轻旗人的经济困境。然而，新政的其他方面，尤其是军事和教育改革，确实对旗人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军事和警政改革

义和团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八国联军入侵，使得驻京八旗长期以来的衰败趋势走到了尽头。驻京八旗的基本使命是拱卫京城，负责皇帝的安全。旧的驻防编制——亲军营、前锋营、护军营——作为宫廷禁卫军严重失职，步兵营作为内城的治安部队也同样没有发挥作用。而且，驻京八旗创立的三支半现代化军营——神机营、虎神营、武卫中军——则在抵抗列强进攻的战争中被完全摧毁。在这场巨大的军事灾难后，清廷试图从事复兴驻京八旗这一艰巨的任务。最初的措施就是组织一支新的禁卫军，发展一支受过现代训练、装备现代武器的新式八旗军队，建立一支新式警察力量。地方八旗驻防也被鼓励进行类似的改革。这些 *82*
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满人的传统骑射技艺。

清廷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组建一支禁卫军。当1902年年初回到京城时，朝廷在武装力量方面没有选择余地，只能依靠汉军，因为八旗部队已经被击溃。清廷把希望寄托在武卫左军统领姜桂题（1834—1922）身上，他组织了一千名士兵组成宿卫营护卫宫廷。宿卫营后来变成了新军第六镇的一部分，在1905年清廷下令编练新军时，宿卫营的职责由新军第六镇各部轮流担任。[45]然而，依靠第六镇军队不过是权宜之计。其时，清廷很难组建一支新的现代八旗军队来及时承担起拱卫京师的职责。1902年12月6日，清廷颁布了一道上谕，选派驻京八旗中的三千名士兵前往袁世凯处受训。自从一年前升为直隶总督后，袁世凯已经着手在该省建立两个镇的“常备军”。到1902年10月，他已经组建了第一镇“常备军”，即北洋常备军左翼。此后不久，清廷就要求他承担训练驻京八旗士兵的任务。上谕指派六名满人大臣与姜桂题协商，选出旗兵派往袁世凯处。[46]

为了帮助自己完成训练任务，袁世凯请求朝廷让六名满人大臣中最年轻的铁良协助他工作。[47]铁良当时大约39岁，是来自湖北荆州驻防的满洲旗人，捐了一个生员。19世纪80年代后期，铁良

迁入京城，任海军衙门章京，后来成为直隶总督荣禄的幕僚。1901年，铁良与其他四十名中国人一起，被湖北政府派往日本，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接受了一年左右的步兵方面的学习。当1902年袁世凯请他协助练兵时，他刚刚回到国内。[48]这样，两人之间开始了一段长期而复杂的关系。1903年6月4日，朝廷设立京旗练兵处，两人的组合也步入正轨，袁世凯统领京旗练兵处，铁良会办练兵事宜。这一机构后来成为练兵处的样板，六个月后练兵处创立，以调整和规范全国所有的军事改革，并取代兵部成为军事决策部门。练兵处由袁世凯和铁良共同署理，但以袁世凯为练兵大臣总理练兵事务。[49]铁良于1903年秋返回日本参观军事演习，凤山和冯国璋陪同他一起前往，两人在旗兵事务中也将扮演重要角色。[50]

83

袁世凯的北洋常备军是这支新式旗兵的原型，他和铁良因此将部队定名为“京旗常备军”。其目标是编成一镇日本模式的军队，当时包括11 184名士兵和军官，下设两个步兵协，炮兵、骑兵各一标，工程兵、辎重兵各一营。袁世凯和铁良立即着手组建一个步兵协（或者半个协）。清廷的练兵决定下达后不久，1903年2月21日，为伦敦《泰晤士报》的莫理循（G. E. Morrison，1862—1920）提供新闻素材的埃德蒙·白克浩斯写道，铁良带着“1 400名体格强壮，品德优秀的年轻人”前往直隶首府保定，并在此进行了两年的训练。“总共约有10 000旗人（相当于一个镇的人数）将接受训练。我相信，到训练结束时，皇帝将有一支强大的卫队来拱卫京师”。[51]

旗兵的训练按部就班地进行，在三年内基本完成。1904年7月，袁世凯和铁良报告说他们组建了一个步兵协。随后的11月，半个协的兵力参加了北洋军在保定东南河间举行的中国第一次现代化军事演习。1905年7月，各省“新军”重新组成了一个三十六镇的全国军队编制，由于京旗常备军关系到朝廷安危，被编为陆军第一镇。同时，袁世凯的北洋军扩大到了五镇之众，组成了新军的第二镇到第六镇。尽管有了一个新名字，但陆军第一镇仅仅是一个“混成协”，因为其仍然缺少第二步兵协。1905年10月，第一镇作为一个混成协再次参加了在河间举行的北洋军秋季操练。[52]

一年后，当第二步兵协训练完成后，第一镇接近了规定的兵力。据英国军事专员乔治·佩雷拉（George Pereira，1865—1923）记载，第一镇仅仅缺少一个工程兵营和一个辎重营。西方对这支军队的实力看法不一。正如冯兆基所概括的，在佩雷拉看来，步兵营“在演习中非常优秀，受过良好训练”。美国专员亨利·伦纳德（Henry Leonard）不这样乐观，他认为：“军官和士兵在身体素质上都比汉军差。清廷治下满人只体现了经年养尊处优的印记。”然而，伦纳德承认第一镇装备了最新式的武器。步兵装备了 84
1903 式的日本步枪，其他各队也装备了新式日本武器。1906 年在河南北部的彰德地区进行的会操演习中，两支精锐之师——袁世凯的军队和张之洞的军队——相互进行对抗，在袁世凯的军队中，第一镇比其他镇提供了更多的兵力。[53]

除了高级指挥官，第一镇完全由旗人组成。据佩雷拉记载，百分之九十的普通士兵都来自京师八旗，其余的则来自直隶各驻防八旗——如山海关、保定和密云，这些驻防军都安排了一部分士兵与袁世凯的部队一起训练。[54]第一镇的统制为旗人凤山，他出身于汉军八旗，曾在 1903 年陪同铁良到日本参观军事演习。凤山在军务方面唯一的资历是在京师巡警厅担任过一个普通职位。可能是为了弥补凤山相对缺乏的军事历练，第一镇其他所有高级将官都是汉人军事专家。第一协和第二协的协统分别是曹锟（1862—1938）和何宗莲（1861—1931），正参谋官是王廷桢（1876—1940）。所有这三名高级将领都是天津武备学堂培养出来的；此外，王廷桢还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过。他们也是袁世凯的幕僚。[55]

随着第一镇在 1907 年具备了充足兵力，清廷最终得以将第一镇从北洋六镇中独立出来，并把拱卫京师的职责重新交给旗兵。正如早些时候兵部指出的那样，虽然第一镇并不是正式的禁卫军，但在组建一支新的独立禁卫军之前，第一镇将担负拱卫京师的职责。因此，1907 年 10 月，第一镇从保定的训练地转移到北京，承担起护卫皇帝安全的主要责任。[56]

通过组建第一镇来复兴京师八旗，这无疑是一种成功的尝试，

与此同时，清廷还采取了四项措施来促进军事教育。

首先，1903 年初，在袁世凯的要求下，清廷选派了一定数量“聪明能干”的士兵进入袁世凯新创办的保定武备学堂学习。[57]

其次，在京师地区设立一所武备小学堂，以满足大量旗人的需求。这所学校是 1904 年全国范围内设立的军事学堂的一部分，但与其他小学不一样（当时其他各省分别设立一所武备小学堂，都由各省当局直接管理），京师武备小学堂直接由练兵处控制。小
85 学堂学制三年，招收普通小学的毕业生入校学习。顺天府属京师辖区，按规定，当地汉人也可以被招入学校，但武备小学堂的学生绝大部分是旗人。1908 年，学校人数达到 404 人，其中四分之三都是旗人。毕业后，他们被分配到北洋新军六镇服役。[58]

再次，为“天潢贵胄”建立陆军贵胄学堂。[59]与京师武备小学堂一样，陆军贵胄学堂直接受练兵处管理。由于奕劻是练兵处总理大臣，他也就在名义上成为学校督学，但实际负责的是学堂总办冯国璋。冯国璋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拥有生员功名，那时刚成为袁世凯身边一名高级军官，主要负责军事训练和教育。他与铁良的关系很好，1903 年曾经陪同铁良前往日本。1906 年 6 月 15 日，陆军贵胄学堂开始运作。[60]陆军贵胄学堂大致相当于武备中学堂，学制五年，共招收了 120 名学生，年龄都在 18 岁至 25 岁之间。所有学生来自王公贵族、四品及以上的皇族和二品及以上的文武官员的子弟，都是精英群体。虽然学堂向满人和汉人都开放，但与京师武备小学堂一样，学生绝大多数都是满人。根据英国外交部的文献，冯兆基写道，1908 年的 120 名学生中，70 名属于皇族，23 名属于满人官员家庭，只有 27 名来自汉人官员家庭。在五年的学制被缩短到三年后，1909 年年中，第一届学生毕业。当时的《政治官报》列举了其中的 96 名学生，他们都获得高级或中级职衔，其中大多数都是满人的名字。[61]

最后，改善京师旗人教育，其计划是派遣学生出国留学。1904 年年初，练兵处提出了一个庞大的计划，即连续四年每年向日本派出 100 名军事留学生。计划包括每年派出京师旗人 6 名，直隶和江苏每年派出的人数也是 6 名。这些学生要先进入东京振武学校学习，

这是日本的一所预科军事学校，以便在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之前接受一些预备训练。[62]第一批中国留学生于1904年秋前往日本，随后几批陆续前往。结果，每年从振武学校毕业的中国留学生人数稳步增长，从1904年的49名增加到1907年的330名，大部分学生随即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其中至少包括了一部分京师旗人。这样，在1905年练兵处核准能够前往日本学习的108名候选人中，共有京旗练兵处推荐的16人（而不是当初计划的6人）入选。[63] 86

在创建陆军第一镇作为（可能仅仅是暂时的）一支新禁卫军的同时，朝廷也开始在京师筹建一支新的警察力量。以前，北京内城的司法和治安都是由步军统领衙门负责，与京旗其他军队一样，步兵营在义和团运动以及随后的八国联军侵华的混乱中土崩瓦解。1901年6月29日，当时京城仍然被外国势力所占据，避难西安的朝廷任命胡燏棻（　—1906）“掌管京畿军务”，胡燏棻是前顺天府尹，也是袁世凯的军事顾问。1902年年初，外国军队从京城撤走，胡燏棻提议在京城设立工巡局，得到了清廷的批准。胡燏棻设立的工巡局是在外国军队占领北京时设置的各种警察力量基础上合并和改编而成。正如名称所示，工巡局不仅要负责巡逻街道，还要负责修缮管理市政道路。工巡局的管辖范围是内城。后来，1905年8月又设立了外城工巡局。此后不久，内外城工巡局并入了巡警部。警察制度改革取得了较大的成功。据莫理循1911年记载，“警察部队很值得一提——这是一个由薪金丰厚、装备精良、受过良好训练的人员组成的部门”。[64]

北京内城工巡局是一个满人机构、人数超过三千，其中全部或几乎全部的人，都是从京旗中挑选出来的25岁以上的士兵（那些更年轻的男丁则为军队征兵而保留着）。[65]该局不仅普通士兵都是满人，就连最高指挥官也是满人，虽然该局最初的倡导者（胡燏棻）是一个汉人。第一位工巡局大臣是善耆，他是一位铁帽子亲王，1900年曾反对慈禧太后支持义和团的决定。[66]1904年1月善耆辞职之后，另一名满人大员那桐接替了他的位置。由于那桐把心思都放在了外务部会办大臣的职位上，工巡局实际上由皇族宗亲毓朗（1864—1922）负责。毓朗于1903年4月被任命为工巡

局总监，此前他曾前往日本学习了三个月警务和路政。[67] 1905 年工巡局并入巡警部，毓朗成为巡警部左侍郎。

工巡局的官员基本都来自警务学堂，与工巡局一样，警务学
87 堂肇始于义和团运动后八国联军占领京城之时。当时，日本人占领了内城北部地区，他们在川岛浪速（1865—1949）的指导下，组建了一支极有效率的警察部队。川岛浪速曾是一名日本陆军军官，于 1886 年来到中国。为了训练因陷入经济困境而大量进入安民公所的旗人，川岛浪速在 1901 年年初成立了一所警务学堂。当时奕劻（与李鸿章一起）代表清廷负责处理外国事务，对此留下了深刻印象。1901 年 8 月 14 日，当外国军队准备撤军时，奕劻与川岛浪速签订了一份三年、随后延长到五年的协议，让他继续管理这所学堂。这所全部由日本人担任职员的学堂开设两门警务课程，还开设了一个消防班。警务学堂的大部分学员都是从京旗中选拔出来的。[68] 作为警务学堂的总监，川岛浪速与工巡局，以及后来的巡警部保持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他与工巡局第一任大臣善耆成为终生至交。他还陪同毓朗这位工巡局总监前往日本学习。当巡警部于 1905 年成立时，川岛浪速被任命为首席顾问。[69]

作为与清廷合同的一部分内容，川岛浪速于 1901 年年底陪同一批旗人学生前往日本，并安排他们在东京弘文学院接受警务培训。这批学生包括二十六名满人和一名汉人，由 33 岁的皇室成员长福带队。义和团运动后的最初几年里，在派往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这批学生是规模最大的团队之一。[70] 1903 年 5 月，东京的中国留学生掀起拒俄运动，当时这批学生还留在日本。事实上，这批满人学生中有三个人，其中包括长福，也加入了军国民教育会，这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组织，反满宣传者陈天华也是其中一名成员。长福还向直隶和奉天的年轻八旗子弟发布了一封公开信，鼓励他们来日本“为国求学”。在当时的东京，长福与另一位皇室宗亲良弼（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是在政治上极为活跃的两名满人。他们也成了陈天华小说《狮子吼》中的人物原型。[71] 在发表反俄宣言后不久，长福回到京城，继续供职于外务部。后来，他成为资政院的成员。虽然长福自己没有从事警务工

作，但至少他在弘文学院的满人同学延鸿最终供职于巡警部。[72]

1906 年，川岛浪速对警务学堂紧密的个人控制结束了，当时他的合约期满，巡警部对学堂进行了改组，并更名为京师高等巡 88
警学堂。川岛浪速重新签订了一份三年合同，保留总监头衔，但其职责严格限制在教务方面，包括与留在学堂的日本教员进行联络。学堂的全面控制权转移到了一名中国总办的手中。[73]

总之，在义和团运动结束后的初期，有超过 14 000 名驻京八旗接受了各种军事教育。他们或在陆军第一镇和北京内城工巡局接受训练，或在京师武备小学堂、陆军贵胄学堂和警务学堂中接受教育，或被派往日本学习军事和警务。然而，新军和警察并没有取代驻京八旗之下的传统军事单位。例如，步兵统领衙门仍然存在，即使其主要职责由警察来承担。[74]同时，在各省驻防八旗中也进行了类似的军事和警政改革。

按照清廷 1901 年的上谕，许多驻防八旗仿效袁世凯在直隶的北洋常备军，把驻防旗军改编成新的军事部队。例如，湖北荆州驻防八旗组建了振威新军，据英国军事专员乔治·佩雷拉在 1907 年的记载，这支军队“在培训和操练方面基本与新军相同”。[75]此外，为了实行湖北巡抚端方在 1904 年年初订立的计划，荆州驻防八旗派出 1 000 名士兵与武昌新军一起接受训练。端方的想法是让荆州驻防的旗兵在武昌的军队中培训 3 年，然后回到荆州，接着派另一批旗兵前往武昌训练。当练兵处襄办铁良于 1904 年年底至 1905 年年初巡察华中地区时，他满意地注意到，几乎 10%（超过 800 名士兵和 20 名军官）的湖北常备军都来自他自己出身的荆州驻防。在 1900—1911 年，来自荆州的旗兵一直占湖北新军的 10%左右。[76]

一些驻防八旗也开始积极推进军事教育。根据练兵处 1905 年颁布的军事教育细则，三个独立的驻防八旗——察哈尔、荆州和福州——被授权建立自己的陆军小学校。察哈尔的学校在已有的“军事预备学校”的基础上改组而成，并于 1905 年开办。荆州的军事学校脱胎于振威新军的训练方案，并于 1906 年 3 月开办。学校招收了 90 名学生进行三年的学习，毕业后进入武昌当地的陆军 89
中学。1909 年陆军中学开办之后，700 名学生中有 40 余名来自荆

州驻防八旗。福州驻防八旗尽管被允许开办一所军事小学堂，但因为缺乏资金而没能建立起来。于是，福州驻防每年都要派十名学生到福建省开办的军事学校学习。根据1905年的规定，那些没有自己的军事小学校的驻防八旗，可以派遣一部分八旗士兵进入各省的军事学校学习，正如福州驻防八旗那样。[77]

还有一些驻防八旗直接派遣旗人前往日本学习。与积极进行其他改革一样，荆州驻防八旗在这方面也最为积极，原因可能与当地锐意进取的封疆大吏张之洞有关。张之洞在1907年年中之前一直担任湖广总督，升迁很快的满洲旗人端方在1901—1904年间担任湖北巡抚。到1904年年中，荆州驻防八旗已经派出了超过五十名旗人出国留学。其中，第一批的至少五名留学生（包括铁良和良弼）进入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78]按照1904年5月练兵处拟定的计划，每年将选派一百名学生到日本接受军事训练，十三个驻防省份分别推荐一名学生。到1905年年底，练兵处确定了一百零八名人选，其中十一名来自各省驻防八旗：盛京三名，荆州两名，热河、绥远、南京、杭州、福州、成都各一名，此外还有来自驻京八旗的十六名人选。[79]

最后，各省驻防八旗也进行了警政改革。1904年10月17日，在北京工巡局总监毓朗的建议下，据说清廷命令每个驻防八旗都要建立自己的警察力量。根据这一命令，西安驻防八旗于1905年把传统的步军部队改革为“警镇”。一年后，南京驻防八旗宣布组成工巡局在满城内巡逻。各省驻防八旗的人员也被派往日本学习警务，但是好像人数相对很少。其中一个是廷启，他由湖北省派往弘文学院，虽然他自己出身于江苏的镇江驻防。[80]

在京师和各省驻防八旗中进行的各种军事改革，也使得满人进一步疏远了传统的骑射技艺。或许是鉴于皇太极关于汉文化之侵蚀的警告，清廷还是在1901年坚持组织八旗进行传统的军事练习——把重点放在身体素质和骑射技艺上，但对绿营则废除了这些项目。然而，1905年7月21日，清廷最终还是取消了对于八旗骑射技艺的要求。朝廷解释说，以前的军官必须接受骑马和射箭的训练，但是近年来，战争技巧和军事技术都逐步发生了变化。

清廷命令兵部设计一套新的办法来挑选旗兵。1905 年 12 月 16 日，在一份内容丰富的奏折中，兵部建议从此以后旗兵的选择标准在于射击“快枪”的能力，而不是拉弓射箭的能力，清廷同意了这一建议。由于新的技巧不可能立即掌握，同时实弹射击花费甚为昂贵，兵部提出了一个过渡性的办法，即首先用中国制造、外国样式的“气枪”来测验旗兵，这种“气枪”据说在准确性和技巧上与“快枪”极为相似。在旗兵熟练掌握射击技巧之前，可以用三个月的时间来熟悉新式武器。[81]

兵部希望快速过渡到新的射击技巧这种预期可能太过于乐观了。执行新要求的期限延展了好几次。每五年，所有的旗兵都要进行一次军事检阅。1907 年 2 月，陆军部（由兵部改组而来）准备在年底进行例行阅兵时，发现虽然京师地区的一些军队声称已经准备好用仿制的“气枪”来接受检验，如火器营，但也有其他军队，如步军营，承认自己甚至还没有准备好用“气枪”应试，希望在下一个五年后再接受检阅。陆军部建议各省及京师，已经准备好的立即进行检阅，没有准备好的可以延长时间。但这次让步并没有让许多旗兵满意，大量京城旗兵声称他们既缺乏武器又没有进行训练，并请求将军事检阅延期。1907 年 5 月，陆军部承诺补充武器，增加训练，虽然不同意延期阅兵，但同意给予额外一年的时间进行训练，然后进行一次“补充”阅兵。然而，好像直到 1908 年 3 月，这些承诺的重新训练项目也没有开始。[82]

尽管广泛推行新技巧存在困难，但重要的是传统军事技术已经不再受到褒奖，作为旧式满人生活方式一部分的骑射毕竟被渐渐废弃了。据埃德蒙·白克浩斯（Edmund Backhouse）记载，在京城的满人中，1905 年 7 月宣布废除射箭比赛的法令并没有完全被接受，“没有什么改革曾激起了如此的愤怒”，甚至包括两个月后对科举考试的废除。[83]

教育改革

91

义和团运动后的清末新政也包括大范围的教育改革，京师八

旗和各省驻防八旗都参与其中。一方面，改革包括废除传统的考试体系（包括科举和翻译科），另一方面建立了不同层次的日本模式的学校，并教授现代课程。在京城和各省，原来的学校按照新的体系进行了重组，此外还新建了一些新式学校，其中包括为满人妇女兴办的学校。与军事和警政改革一样，朝廷鼓励这些学校的毕业生出国深造。尽管有这些改革，清廷还是坚持推行“国语”，以之作为满人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北京，各类旗人学校被重组，并建立了一些新的学校。为了响应1902年2月19日清廷发布的谕旨，原有的很多学校被合并成新的学校，八旗中的每一旗都设立了一所小学。1904年，整个教育体系重新规划后，这些八旗学校被定位为高级小学，并另外创办了十五所初级小学。上三旗的包衣、骁骑营、火器营也都有自己的小学。在各种小学之上设立了一所八旗中学和八旗高等学堂。[84]除了公办学校，私立学校也大量创办，从内城的旗人中招收学生。这些私立学校包括皇族恒昌1905年创办的崇实学堂、善耆1906年创办的嘉宪学堂。嘉宪学堂也接收汉人学生。[85]

1902年2月的谕旨在要求重建京师八旗学校的同时，也号召各省驻防八旗进行类似的教育改革。[86]与军事改革一样，荆州驻防八旗在教育改革方面也十分积极。在湖北巡抚端方的推动下，1903年荆州驻防八旗大范围地重组当地学校以适应新的教育体制。此前，荆州驻防八旗有56佐领，每佐领都有自己的官办学校，现在这些学校被合并成8所四年制启蒙学校，可能八旗中每一旗各有一所。每所学校约有135名学生，年龄都在7岁到11岁之间。荆州驻防八旗的10所慈善学校同样也被合并，转变为4所四年制初等学校，学生年龄在11岁到14岁之间。当整个教育体系在
92 1904年重组后，8所启蒙学校变成了初等小学，4所初等学校变成了高等小学。同时，辅文书院转变为四年制的中学，学生年龄在14岁到24岁之间。后来，又是在巡抚端方的督促下，荆州驻防创办了2所额外的学校——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和一所语言学校，这两所学校相当于中学程度，学制五年，目的在于拓宽驻防区旗人的职业机会。然而，荆州驻防并没有自己的高等学堂，其中学毕

业生被送到武昌的省立高等学堂。[87]其他各省的驻防八旗也进行了类似的改革，但力度和规模都没有荆州大。例如，杭州驻防八旗创办了4所初等小学，每所学校有70名到80名学生，梅青书院改为一所高等小学，接收从初等小学毕业的学生。[88]

对于京师和各省的旗人和非旗人来说，新式学校体系的最高学府是京师大学堂。这所高等学府创办于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但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被摧毁，1902年，京师大学堂重办，并进行了重组，京师同文馆也被并入，成了京师大学堂的译学馆。由于地处京师内城，京师大学堂与周围的旗人保持了一种特殊的关系。例如，为了给师范馆的毕业生提供实习的机会，京师大学堂创办了一所附属高等小学，学生来自于上三旗包衣创办的初等小学毕业生。虽然与旗人有这样的联系，但与京师同文馆一样，京师大学堂在随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所旗人学校，其中的满人学生可能不超过10%。例如，1907年毕业的105名学生中，只有9名学生是旗人，其中3名或者4名来自京籍八旗，其余的来自各省驻防八旗。[89]

与军事和警察学堂的学生一样，京师和各驻防八旗旗人学校的学生也有出国深造的机会。根据京师大学堂1906年毕业生名录统计，有4名京旗毕业生前往日本学习师范专业。早在1902年，荆州驻防八旗的2名满人学生就在东京弘文学院的师范专业学习。在大部分学生去日本留学的同时，来自伊犁养正学堂的12名满族和蒙古族学生于1903年被派往附近的阿拉木图学习俄语。[90]

与传统教育不同，一些新创办的学校也迎合了旗人妇女的学习需求。京城较著名的两所女校是箴宜女学堂和淑慎女学堂。根据参加1908年年底慈禧太后悼念活动的名单，箴宜女学堂的所有学生和淑慎女学堂的一半学生都是满人。[91]江苏镇江驻防八旗的新式学校中也有两所女校。[92]毫无疑问，最著名的旗人女校是1904年创办的杭州贞文女学，创办人惠兴是一个寡妇，她深受张之洞教育思想的影响，认为教育决定中国未来。贞文女学的资金来自当地旗人的捐助，学校为驻防八旗的妇女讲授基本的文化知识。然而一年后，学校因为资金困难而被迫关闭，当地八旗官员也拒绝提

93

供援助。惠兴深感绝望，为了抗议满人同胞的冷漠，她自杀了，为了妇女的教育而最终献身。这既羞辱了也刺激了杭州驻防八旗。在惠兴的悼念仪式上，她被褒奖为一名为进步而献身的英雄，被称为“我大清朝”、“我通古斯族”和“我东亚妇女”的楷模。[93]

惠兴的自杀在旗人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北京女报》发表了几则关于惠兴的报道。年轻的满人改革派金梁（1878—1962）来自杭州驻防八旗，和惠兴同属于瓜尔佳族，他与另一名满人贵林共同编写了一部关于惠兴的戏剧，并于 1907 年 5 月在一次募捐活动中在京城上演。此时，贵林和惠兴其他的支持者筹集到了足够的资金，并成功得到了懊悔不已的驻防八旗官员的支持，他们于 1906 年 4 月重新开办了这所女校，并且将其作为一所官方学校。为了纪念惠兴，学校被重新命名为惠兴女学堂。在 1907 年 5 月京城义演中，贵林作为女学堂的新任督办宣称学校已经有 6 名老师和 60 名学生。此后，贵林一直坚持经营这所女学，直到他在 1911 年的辛亥革命中被杀。至少贵林死后的几年，他的女儿还在继续坚持办学。最终，惠兴女学堂作为一所中学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94]

正如对惠兴的支持所显示的，《北京女报》一直是妇女教育的坚定倡导者。《北京女报》是一份满人主办的女权主义日报，创办于 1905 年 8 月，公开发行到 1908 年年底。现在还不清楚女报的出版人和编辑张展云本人是不是满人，但这份报纸的许多投稿人都是满人，其中一些人是男性。而报纸的读者显然主要是京师的旗人，尤其是旗人妇女。[95]例如，1905 年 11 月，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满人妇女的堕落》的文章，作者署名“长白之女”，长白山是与朝鲜接壤的山脉，满人正是起源于此。“长白之女”的文章批评了满人妇女姊妹自恃优于汉人妇女的思想。她写到，虽然满洲女子以不缠足为荣，但她们穿旗鞋，这与缠足并无多大区别。而且，她们涂脂抹粉堪比戏子，“我劝我们的满洲姐妹从此以后要不分满汉，一起工作以振奋我们的精神，唤醒我们二百万女同胞”。该报并不完全同意“长白之女”的观点，因为在这篇文章的后面加了一则简短的评论，对她不分满汉的呼吁持不同意见：“在我们看

来，正是在这些方面汉人女子确实比不上满人女子。”然而，该报同意她关于教育重要性的看法，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满人和汉人女子才能“文明开化”。[96]

虽然《北京女报》代表了满人的观点，但它主要还是一份倡导男女平等的日报。相对于满汉问题，该报更关注妇女问题，特别是女性教育、性别平等和女性独立。1908 年，该报发表了惠兴女学堂一名二年级学生的演讲，这是一名名叫佛英的满人妇女，她论述了为什么中国的父母亲无论族群都重男轻女。据她所言，一是因为女性不能拥有财产，这使得她们在经济上必须依附于男人；二是因为社会风俗，不管是汉人女子的三寸金莲还是旗人女子的高发髻和厚木屐，这些都束缚和“伤害了我们女性”。她所在的学校禁止学生涂脂抹粉、穿华丽的服饰和缠足，她为此感到骄傲，因为只有这样“女性才能成为人”。此外，她总结说，如果女性能够自己谋生，那么她们就真正自由了。[97]《北京女报》直言不讳对慈禧太后的赞美，据说后者资助了这份报纸。《北京女报》称颂其为中华女性第一人，1908 年慈禧太后归天后，则把她与中华传说中的英雄相提并论，称其为“女中尧舜”。[98]

在支持慈禧太后这一点上，《北京女报》与当时天津的《大公报》有很大差别，《大公报》是另外一份满人创办的主张改革的日报。满人英敛之（1866—1926）于 1902 年 6 月创办了这份报纸。他与清朝皇族结亲，并信奉罗马天主教。《大公报》支持许多改革理想，包括妇女教育，这与《北京女报》一样。但是由于在相对 95
安全的天津外国租界立足，该报严厉批评慈禧太后使百日维新夭折，并再三呼吁她还政于光绪皇帝。这样，虽然《大公报》由旗人创办，但与《北京女报》不一样，其关注的焦点不在旗人问题上。在民国时期，《大公报》成为中国最优秀的报纸之一。[99]

清廷明确表示承认新学，但同时又不希望教育改革损害满人的“国语”传统，正如当时的军事改革正在破坏满人的骑射传统那样。因此，一方面，学部在 1907 年春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求在八旗中的职位空缺时，应优先替补新式小学的毕业生。另一方面，在翻译科已经被废除的情况下，满语课程本应该随着新式学校的

建立而逐步淘汰，但由保守的蒙古旗人荣庆（1859—1916）统领的学部，却在1906年要求强化满语学习。学部声称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让“八旗子弟认识到国语满文的重要性”。学部规定，京城所有官办旗人学校必须开设一门满语课程，并建议各省驻防八旗也同样照办。[100]实际上，在荆州驻防八旗，新的学校体系中所有三个层次的学校都必须开设满语口语（“清语”）课程，语言学校还必须开设满文（“清文”）课程。[101]其他的驻防八旗也有类似的要求，但范围没有这么广。学部在1907年创办了满蒙高等学堂，以便中学毕业生能够在语言领域进行深造。[102]同时，陆军部宣布，所有的旗兵不仅要尽力掌握射击的新技巧，而且还要掌握满语。陆军部还明确规定，军官在测试士兵枪法的同时，也要和以前一样进行满语口语考试。那些不能用满语熟练回答的士兵要么重学满语，要么面临被解雇的处境。[103]

政治改革和1907年政治风暴

慈禧太后的清末新政起初只不过是洋务运动中各种军事和教
96 育改革的延伸，但最终导致了中国政体的深远变革，因为她于1906年9月被迫宣布自己支持立宪。清廷准备转变为一个君主立宪政体，因此对中央行政体制进行了大规模重组。这一过程中，满汉关系的中心问题“满汉共治”在很大程度上被改变了。这些政治改革也引起了铁良和袁世凯之间一场公开的激烈争论，这场争论带有满汉之争的寓意。

慈禧太后在1905年年中迈出了采用宪政的试探性的一步，当时明治日本取得了对沙皇俄国令人瞠目结舌的胜利，满汉官员们纷纷要求以日本为榜样，这让她感受到巨大的压力。7月2日，清朝三名实力派地方总督——袁世凯、张之洞和周馥联名上奏，提出在十二年之内建立立宪宪政。[104]虽然袁世凯、张之洞和周馥都是汉人，而满人在说服慈禧太后实行立宪的过程中也了扮演重要角色。事实上，据上海改革派张謇（1853—1926）说，在立宪这件事情上对慈禧太后影响最大的四个人中，有三个人都是满人。

他们是铁良（兵部侍郎兼练兵处大臣）、端方（闽浙总督）、载振（商部尚书）和与铁良共事于兵部的汉人徐世昌。例如，慈禧太后在一次上朝时宣称：“新政皆已举行，当无复有未办者。”端方却指出：“尚未立宪。”慈禧太后立即问：“立宪如何?”端方信心满满地回答：“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105]

这些陈情的结果就是清廷在1905年7月16日颁布了一道谕旨，哀叹以前的改革政令收效甚微，任命四名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以期择善而从”。四名大臣包括两名满人（皇室宗亲载泽（1868—1930）和总督端方）和两名汉人（户部右侍郎戴鸿慈（1853—1910）和刚从兵部侍郎擢升为军机处行走的徐世昌）。11天之后，在没有任何说明的情况下，商部右丞满人绍英也加入了考察队伍，这就打破了满汉人数的平衡。载泽是慈禧太后的侄女婿，代表了皇族的利益。 97
他是嘉庆皇帝的曾孙，袭封镇国公。（由于载泽的爵位为“镇国公”，外国报纸提到他时常常误称其为载泽“公爵”。）[106]

当五名考察宪政的大臣准备于9月24日离京时，他们遭到了刺客吴樾（1878—1905）的暗杀。吴樾是光复会成员，对清廷的排汉政策极为愤怒。根据吴樾一篇题为《暗杀时代》的告别书，他原来的目标是铁良，因为铁良一生唯一的目的就在于“控制和消灭我们汉人”，他对汉人的不信任让人想起了刚毅。正如刚毅几年前那样，铁良最近巡游华中地区，所到之处敲诈勒索，以供“他们满人”挥霍。吴樾声称，铁良组建京旗常备军的目的在于保护“宗室强匪”，而不是抵御外来入侵者，他认为铁良想方设法让满人垄断全国警察职位，而拒绝给汉人到日本学习警务的机会。煽动铁良采取这些排汉措施的是他年轻的满人同伙良弼。与铁良一样，良弼是皇室旁系亲属，来自于荆州驻防八旗，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铁良毕业后一年即1903年，良弼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并返回国内供职于练兵处，很快就与练兵处大臣关系亲密，他陪同铁良巡游了华中地区。据吴樾所说，关于“汉人强与弱、安与危”的所有事务以及练兵处“强满排汉”政策，背后主谋都是良弼。然而，在吴樾准备采取行动时，他把注意力从铁良身上转移到立宪考察团。对立宪考察团的出洋旅程所带来的广

泛弥漫的乐观情绪，他想泼一盆冷水。当考察团准备前往天津时，吴樾设法混过安全检查，并登上他们的火车。就在此时，火车启动，导致藏在吴樾身上的炸药提前引爆。他和几名旁观者当场被炸死。两名考察团的成员载泽和绍英受了一点轻伤。[107]

此次暗杀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加强了京城的安全戒备。颐和园的围墙加高了。[108]也就在这时，朝廷创立了巡警部，除了护卫国家安全外，还负责京城的警务。巡警部尚书由军机大臣徐世昌担
98 任，毓朗和赵秉钧（1865—1914）担任侍郎。毓朗负责内城工巡局的警务，赵秉钧则在天津为袁世凯组建了一支现代警察力量。京师地区的公务所和工巡局被组成两个京师警察局，分别负责内城和外城警务。[109]

富有戏剧性的是，吴樾的暗杀活动并没有对满汉关系造成任何直接影响。清廷当时并没有要求地方官员对“革命排满”的言论加以限制，直到两个月后，朝廷才发布限制排满言论的谕旨，这就不会与暗杀袭击事件联系在一起。[110]朝廷令人意外的冷处理，原因在于这次暗杀的反满目的在当时还不清楚。吴樾在爆炸中身亡，他的遗文《暗杀时代》及其告别书直到 1907 年才公开发表，当时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增刊《天讨》公布了这些资料。

吴樾的暗杀使得立宪考察行程拖延了两个月。徐世昌和还在养伤的绍英被排除于考察团之外，由顺天府尹李盛铎（前驻日大使，1860—1937）和山东布政使、汉军旗人尚其亨（他是慈禧太后的姻亲）取代。连同原来的三名大臣载泽、端方和戴鸿慈，这样考察团人员构成仍然是三名满人和两名汉人。考察团一行由三十八名随员陪同，于 1905 年 12 月初离开京城。考察团分成两路，一路由载泽率领，一路由戴鸿慈带队，先后游历了日本、美国、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111]

八个月后，立宪考察团返回国内，他们向朝廷建议仿行日本的立宪制度。考察团成员尤其主张创设“责任内阁”，根据明治日本的经验，他们认为责任内阁不会削弱反而会加强皇帝的权力，因为政治批评会转嫁给责任内阁和内阁总理大臣，而不会直接指向皇帝本人。这可能就是端方先前的意思，当时他向慈禧太后保

证，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112]

此外，载泽和端方还分别力劝慈禧太后改革满汉关系。在1906年8月23日的一份奏折中，载泽详细论述了代议制对最高统治者的好处，他表达了对普通旗人的忧虑，“如果实行立宪政府，则会损害满人的利益”。首先，载泽指出现在满汉差异已经极小了。在19世纪中期，主要是汉人官兵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捻军 99
起义和张格尔叛乱。最近，朝廷解除了满汉通婚的禁令，八旗内的职位也向汉人开放。其次，为了应对列强的压迫，中国需要团结而不是分裂。载泽反问，我们怎么能以整个国家的前途为代价来顾及满人的狭隘利益？载泽最后要求结束满汉共治和族群隔离。正如他的族人载振先前对朝廷的建议，只有以能力而不是族群背景来任命官员才是唯一正确之途。[113]

在9月1日的一份密折中，端方提出的建议要比载泽更为直接和详细。他从欧洲游历回来后，真切意识到了族群冲突对于一个国家政治稳定的影响。满汉关系类似于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他们的争斗分裂了哈布斯堡王朝。由于二百多年来满汉亲密共处，他们的语言、信仰和风俗已经大为接近，然而，以前的通婚禁令使得满汉之间仍然保留了一定的族群差异。因此，一些人趁机指责满汉权利不均。孙中山和革命派刊物的反清言论赢得和误导了大批听众。然而，镇压不是解决办法。在那些君主与民众对立的国家，君主或许能赢得首战胜利，但民众势必赢得最后的胜利，法国的情况正是如此。清廷一贯平等对待满汉，但在一些“小事”上满汉还有差距。革命党人抓住了这些事作为他们煽动反清的证据。端方总结说，现在需要对当前的问题进行两个方面的补救。一方面是通过实行立宪来燃起已被疏远的年轻人的希望，另一方面削弱革命党对族群不平等的指责。至于后者，端方提出了两项改革措施。与载泽一样，他呼吁“改定官制，除满汉缺分名目”，建议“将京师各衙门，悉依新设的外、商、学、警四部成例，除满汉缺分名目，所有堂官、司员，不问籍贯，惟才是用”。此外，他建议“撤各省驻防”（但显然不是驻京八旗），这似乎又回到了1901年张之洞的建议。他引用了最近的一个先例，即日本明治中

兴时期解散和停止供养武士阶层。[114]

到端方上奏时，慈禧太后已经于1905年8月25日任命载沣主持一个特殊的机构，参与者都是朝廷要员——军机大臣，新创办
100 的政务处官员，内阁大学士以及直隶总督袁世凯，要他们对立宪考察团的结论进行评论并提出建议。自从载沣1901年出使德国致歉后，这是他第一次承担如此重要的政治责任。他的儿子溥仪，也就是未来的宣统皇帝，刚于几个月前的2月7日降生。在仅仅召集了两次会议之后，载沣的机构于29日向朝廷提交了报告。三天后，即9月1日，慈禧太后发布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诏书，承诺实行立宪，但是没有说明立宪日期。这样就开启了中国预备立宪的时代。[115]

作为立宪的第一步，慈禧太后要求改革官制。9月2日，朝廷任命十四名官员（除了载泽和袁世凯其余都是中央大员）草拟官制改革计划，任命另外三名官员审定这些计划。十四人团体包括八名满人和六名汉人（载沣不在其列）。还有六名总督被要求派代表前往京城参与筹议。负责审定计划的三人小组包括一名满人和两名汉人：军机大臣奕劻、瞿鸿禨和大学士孙家鼐（1827—1909）。[116]

这两个团体的人商议了两个月。他们必须要解决的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要不要按照立宪考察团的建议，废除内阁和军机处，并代之以由一名强有力的行政首脑内阁总理领衔的“责任内阁”。另一个存在分歧的问题是，是否要削弱各省大员的独立裁量权，以此来加强中央集权。在这两个问题的争论中，袁世凯表现得极为活跃，他在前一个问题上与瞿鸿禨意见相左，在后一个问题上与铁良针锋相对。袁世凯赞成组建责任内阁，瞿鸿禨希望保持现存体制；袁世凯支持当前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划分，铁良极力主张限制各省大员的大权。这些争论都与满汉无关，因为满汉都卷入了这两个问题的两种不同意见之纷争。奕劻很有可能成为内阁总理的候选人，他赞成组建责任内阁的建议，因此他支持袁世凯而反对瞿鸿禨；端方自己就是封疆大吏，他站到了袁世凯一边，反对铁良中央集权的建议。[117]

这些激烈的争论在11月6日奕劻三人小组提交的报告中画上了休止符。这份报告由于没有什么实质内容，反而引人注目。报

告既没有谈到变更各省官制，也没有涉及废除各省驻防八旗，按照端方的提议，报告回避了用责任内阁代替内阁和军机处这个问题。报告提到的一项主要改革建议是废除中央机构核心部门的满汉共治和族群隔离。如同端方极力主张的（在他之前，张元济和载振都提出过），报告建议各部应该由一名尚书和两名侍郎署理（正如四个新创设的部那样），而不是沿袭在满汉之间平等分配两名尚书和四名侍郎的传统模式。报告还建议，禁止各部大臣兼任其他重要的现职，这样他们能够集中办理各自署理的政务。唯一例外的是外务部，根据《辛丑条约》的相关条款，外务部尚书需要任职于军机处。[118] 101

慈禧太后基本上同意奕劻三人小组提出的建议，下令中央各机构按照报告的提议进行改组。但是她把报告中含蓄的提法明晰化了，即各部大臣的任命“不分满汉”。此外，她认为不需要设立责任内阁。她让八旗体制和其他几个满人控制的机构保持不变，例如宗人府和内务府。她推迟了对各省官制的改革，只是在次年4月改变了东北地区的官制。[119]

慈禧太后掌握的清廷立即对军机处进行了重新洗牌。为了呼应奕劻等人的提议，即禁止各部尚书兼任其他重要职位，清廷解除了现任各部尚书的四名军机处大臣，包括户部尚书铁良。奕劻和瞿鸿禨留在军机处，他们两人担任着外务部的要职，而外务部是唯一不在此禁条之列的部门。为了替补他们的职位，清廷任命内阁大学士、满洲旗人世续（1853—1921）担任军机大臣，令人吃惊的是，职位较低的广西巡抚林绍年（1849—1916）也被任命为军机大臣。新的四名军机大臣在满汉之间平等分配。[120]

通过把传统六部扩大到十一部，清廷也重组了中央官制。[121] 除了外务部有两名会办大臣外，其他各部都由一名尚书和两名侍郎署理，他们的任命不考虑是满人还是汉人。然而，和义和团运动之后的最初几年里一样，在重要部门中，满汉共治的结束和族群隔离的消除，并没有导致满人在大臣要员中任职减少。相反，相比于满汉共治的旧制度，慈禧太后继续任命更多的满人，完全不顾满汉矛盾的现实。十三名各部尚书（包括外务部的两名会办 102

大臣）中有八名满人，汉人只有五名。八名满人是奕劻和那桐（外务部）、溥颋（度支部）、溥良（1854— ，礼部），荣庆（学部）、铁良（陆军部）、载振（农工商部）和寿耆（理藩院）。奕劻及其儿子载振也继续违背了清中期以来亲王不得干政的祖制。[122]革命党人很“愉快”地欢迎这些大臣的任命，因为这更加证实了他们对清廷本性上不值得信任的看法。汪精卫（1883—1944）在《民报》撰文，对那些寄希望于“满人立宪”的改革派们给予讽刺性的“祝贺”。[123]如此看来，清廷在人事任命上完全不会有其他的考虑。

同时，行政改革使得铁良与袁世凯之间的激烈竞争变得公开化。铁良是作为袁世凯的下属和同僚开始仕途的。在练兵处，铁良是袁世凯的副手，他们的儿女也结为连理。然而，1904 年到 1905 年间，铁良作为兵部侍郎高姿态地巡察华中地区，此时他已开始在朝廷步步高升，并与他以前的上司分庭抗礼。随即，他继续督办京旗常备军（不久后督办陆军第一镇）的训练，并被擢升为户部尚书，充任军机大臣。1906 年年中，他和袁世凯供职于同一机构，这个机构负责审定立宪考察团的结果并对行政改革提出建议。这时，铁良与袁世凯已经开始不和。铁良不仅主张限制各省大员如袁世凯的独立大权，而且反对创立一个强大的责任内阁，以免让可能排在奕劻之后充任内阁副总理的袁世凯独揽大权。在开始的对抗中，铁良稍占上风。虽然袁世凯设法缓议各省官制的改革，并把铁良排除在军机处之外，但他没能够推进内阁的创设。铁良虽然不再是军机大臣，但成了陆军部尚书。[124]

103

不久，即与张之洞的新军于 1906 年 10 月在彰德举行秋操后，袁世凯承认了自己在政治上的挫折。他放弃了对北洋六镇中的四镇的控制，包括主要由旗人组成的陆军第一镇，并把这四镇划归铁良的陆军部掌握。他只留下了自己两支旧部，即第二镇和第四镇。[125]铁良迅速巩固了对陆军的控制。他创办了京畿督练公所，并将其置于陆军部的管辖范围内，其目的在于统一指挥这四镇，他还让第一镇的统制凤山负责京畿督练公所。[126]凤山在第一镇统制的职位被何宗莲所取代，后者的第二协统领一职又由朱泮藻所代替。曹锟保留了第一协统领的职位。[127]

铁良的胜利很快就遭到挑战。次年夏天，在著名的“1907 年政治风暴”中，由于得到了奕劻的支持，袁世凯设法把他们的政治对手们赶下了台，这些对手包括军机大臣瞿鸿禨和林绍年在内，采取的手段是捏造他们与仍处于黑名单上的 1898 年维新派之间有关联。[128]袁世凯也直接或间接找铁良的麻烦。1907 年 5 月，袁世凯的同盟奕劻被任命为陆军部督办，地位高于铁良。7 月底，在一份关于用人的奏折中，袁世凯引用凤山作为一个反例，因为凤山是铁良任命到京畿督练公所的。他批评翻译科出身的凤山学识浅薄，作为一名军事统领也缺乏实战经验。在一次可能与此相关的人事变动中，袁世凯的下属段祺瑞（1865—1936）宁愿辞去第三镇统制的职务，也不愿意在凤山手下任职。最终，袁世凯于 11 月初通过陆军部督办奕劻，以谕旨的形式调离了凤山，把他调任到西安驻防八旗。[129]

与在 1907 年结束政治生涯的瞿鸿禨不同，针对自己受到的攻击，铁良开始设法还击。据说，他警告慈禧太后，如果不对袁世凯加以约束，满人的权威就会陷入危机。他好像并没有受到陆军部督办奕劻的过度限制，奕劻当时还担任外务部督办，可能是事务过多而无暇顾及。铁良为凤山的资格进行辩护，并说服朝廷撤销把凤山派往西安的决定，允许他“暂时”留在京城。他用曹锟取代了段祺瑞新军第三镇统制的职位，曹锟第一镇第一协统领的职位由李奎元（　—1925）替补。同时，1907 年 8 月 1 日，铁良上奏说，陆军第一镇兵力已经满员。10 月下旬，第一镇的一个混成协与其他三镇的混成协直接受陆军部节制，并且第一次不受袁世凯操控参加了 1907 年的秋操。也是在这个时候，陆军第一镇重新部署于京城，并作为禁卫军掌管京师安全。因此，与麦金农的结论完全相反，铁良夺取对袁世凯北洋军的控制权的努力绝不是“失败的”。[130]

104

恩铭被刺及其反响

在“1907 年政治风暴”中，7 月 6 日，安徽巡抚满人恩铭

(1846—1907) 被刺杀于首府安庆。刺客徐锡麟 (1873—1907) 和两年前的吴樾一样反满。吴樾的刺杀虽然发生在京师重地，但没有引起重大反响，而徐锡麟的暗杀却使满汉关系凸显出来。直到此时，对于批评者所抨击的满汉问题，清廷尚未采取相应措施来解决。确切地说，清廷只是解除了满汉通婚禁令，向汉人公开八旗体制中的一些职位，在中央的一些核心机构取消了满汉缺份名目。恩铭被暗杀使得消除更多满汉差异的建议纷至沓来，这导致清廷在 9 月和 10 月接连发布了两道重要的谕旨，要求对八旗制度和满汉关系进行彻底变革。

徐锡麟刺杀恩铭是一次内部起事行为。恩铭是在主持安徽巡警学堂毕业典礼时被刺杀的，刺客就是巡警学堂的会办徐锡麟。徐锡麟出身于浙江的一个富商家庭，1903 年春前往日本参观大阪博览会，此时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反俄情绪达到顶点。因此，他在政治上变得极为激进。和吴樾一样，随后他加入了光复会。通过亲戚关系——徐锡麟的表叔俞廉三曾经是恩铭的上司——他于 1906 年年底获得安徽巡警学堂会办的职务。在安庆就职后，徐锡麟与另一名表亲，浙江绍兴的激进女权主义者秋瑾 (1875—1907) 商议共同进行一次反清起义。然而，他们的密谋没有得以周密策划和实行。刺杀恩铭只是一个序幕，安庆起义很容易地被镇压了，而绍兴的起义根本没有实现。徐锡麟几乎当场被抓，经过短暂审
105 讯后，在当天晚些时候被斩首，他的心脏被挖出来祭奠死去的巡抚。绍兴的秋瑾也在六天后被杀害。[131]严酷和野蛮的惩罚使很多人都感到骇然，满人创办的天津《大公报》大声疾呼，“此等野蛮凶残行径，不期见于二十世纪之中国!”[132]

徐锡麟在审讯时坦然承认自己之所以刺杀恩铭，仅仅因为他是一名满人。恩铭是山海关外辽西地区的锦州驻防八旗的一名满洲旗人。1873 年中举，此后一直在仕途上稳步前进。1903 年，他被调往江苏，先后担任按察使、布政使，1906 年年初被擢升为安徽巡抚。[133]徐锡麟承认他对恩铭个人并无多大仇恨，也声称这名巡抚对汉人没有特别的敌意。徐锡麟的仇恨是针对整个满人：

> 满人虏我汉族将近三百年矣，观其表面立宪，不过牢笼天下人心，实主中央集权，可以膨胀权势，然实满人之妄想，以为一立宪即不能革命。……若以中央集权为立宪，越立宪，我汉人越死得快……我蓄志排满已十余年矣，今日始达目的，本拟杀恩铭，再杀端方、铁良、良弼，为汉人复仇。……尔言抚台是好官，待我甚厚，诚然，但我既以排满为宗旨，即不能问满人作官之好坏。至于抚台厚我，系属个人私惠，我杀抚台乃是排满公理。[134]

恩铭遇刺在满人官员中引起了巨大的不安。此前吴樾的反满目的直到几个月后才公开，实际上他的身份当时也不为人知。但这次事件中，徐锡麟坦然承认其族群复仇的渴望。他带有明显反满怒火的招供被广泛公开，例如，7月22日《北京女报》发表了他的供词，只是删除了他接下来要刺杀的几个目标——端方、铁良和良弼——的名字。[135]由于这件事与孙中山于5月初在广东发 *106*
动的一系列革命起义同时发生，一时间人心惶惶。据英国外交官记载，“全国上下的满人官员纷纷避居于防卫森严的衙门中”。在当时，可能没有人比端方更忧心忡忡，他被擢升为两江总督（是恩铭的上司），而且也是徐锡麟原本要刺杀的下一个目标。两年前吴樾的袭击已经搞得端方疲惫不堪，据说他把全家都送回了京城。虽然他自己还留在南京任上，但所到之处都由一队特殊护卫全程陪同。[136]

慈禧太后对徐锡麟的反满情绪也十分担忧。一个月后她接见外务部大臣吕海寰（1840—1927）时，据说仍然被徐锡麟的鬼魂纠缠不休。她向吕海寰强调，“悍匪徐锡麟声称满汉之间存在歧视，但是我们选任各省大员时并不存在什么偏见”[137]。更为关键的是，在恩铭遇刺的推动下，她在五周内连下两道谕旨。第一道谕旨在暗杀事件两天后的7月8日发布，再次要求臣民提出改革建议，这次的范围不再局限于有权向皇帝上奏的高级官员，而是扩大到低级官员和普通士人等更广的范围，他们都可以通过都察院或各省大员向朝廷进呈其改革思想。为了表示对立宪改革的诚意，

她解释说已于前一天下令对东北的地方官制进行改革。[138]

对于慈禧太后的转变，一开始应者寥寥，只有几个人提出了建议。然而，这几个人包括三名最有影响的总督：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端方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为了帮助完成立宪，他们力劝朝廷立即采取措施改善满汉关系。袁世凯于7月28日上奏，提出了十项改革措施，其中一条是“满汉必须融化也”。他注意到孙中山在海外华人中散布种种清廷密谋灭绝汉人的言论，激起了人们强烈的反满情绪。他也注意到了孙中山正在刺激满人对汉人进行复仇。他建议，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太后应该恢复半个世纪前成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所使用的策略：稳步行动、广纳贤才和行政改革。他极力主张，那些煽动排满之人和持有
107 “满汉偏见”的官员（可能是指铁良?）应被严惩。他还建议，应筛选最近几年其他人提出的平满汉畛域的大量建议以供朝廷采纳。虽然袁世凯在重新编练京旗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这是他第一次讨论满汉关系。[139]

三名总督中唯一的满人是端方，他一年前参加立宪考察归国后，呼吁慈禧太后平满汉畛域（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并废除各省驻防八旗（没有成功）。他于7月31日上奏，代陈安徽旌德县士人李鸿才的陈情书。虽然端方没有提出自己的建议，但他好像完全同意李鸿才在陈情书中的看法，这份陈情书收入了端方的奏稿集，好像是端方本人的一篇奏稿那样。与袁世凯一样，李鸿才注意到了最近革命派活动极为频繁，他们散布消息、出售公债、走私武器、与“盗匪”结盟，甚至“暗杀大员”。他强调，引起这些骚乱的主要原因就是所谓满汉差异，因此恢复秩序的唯一办法是化除满汉畛域。他说，朝廷必须下诏明示天下，其目的不在于重满轻汉，也不是以满防汉。他最后提出了（将在下面讨论）几项改善满汉关系的具体措施。[140]

当然，张之洞长期以来主张消除满汉差异。他于8月7日呈送其建议，令人奇怪的是，他的建议不是直接响应朝廷的谕旨，而是针对外务部的咨询而间接提出来的。关于日本和法国最近达成的协议对中国安全的影响，外务部征求他有何意见。张之洞回复说，除

了外交策略以外，“欲御外侮，须先靖内乱。当前，革命党甚为活跃，人心思乱”。唯一解救之法是清廷明诏天下，“化除满汉畛域”，并令内外臣工，各抒己见，立即执行。张之洞断言，“一旦谕下，则人心自定，乱党、莠民无可藉口”。[141]五天前，即8月2日，张之洞信任的下属，湖北布政使梁鼎芬（1859—1919）也上了一道类似的奏折。梁鼎芬对清廷废除满人在八旗机构的垄断地位感到满意， 108
他要求朝廷（在用词上几乎与张之洞的奏折一致）再向前一步，下旨“化除满汉畛域”。他解释说，这一问题是所有官员都欲言又止的，但如果由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说出来，就可以得到实行。[142]

梁鼎芬的奏折促使慈禧太后在8月10日发布了第二道谕旨。与一个月前的第一道谕旨不同，这道谕旨把焦点集中于满汉关系。慈禧太后再次坚持认为，清朝长期以来公平对待满汉，不论是官员还是臣民。最近也是如此，八旗的人事任命并没有区分满汉，怎么可能还存在偏见呢？为了回应张之洞和梁鼎芬的建议，她随即令“满汉畛域应如何全行化除，著内外各衙门各抒所见，将切实办法妥议具奏”。[143]

尽管慈禧太后的第一道谕旨所引发的反应仅仅是几道奏折，然而第二道谕旨却掀起了上奏热潮。上奏之人不分满汉之出身、官阶之高低。有政府要员，也有御史；有官员，也有士人。许多人征引革命派的宣传和行动作为清廷必须采取补救措施的理由。例如，黑龙江将军程德全是担任八旗职位的第一名汉人，他提到“暴徒”无视二百多年来清廷同等对待满汉这一事实，鼓吹反满和革命。让这些言论销声匿迹的唯一办法是开始立宪，包括化除满汉畛域。[144]许多上奏者强烈要求改革，然而也有少数人反对改革。他们的意见涉及了满汉关系的方方面面。有人关注主要具有象征意义的问题，也有人关注包括八旗制度本身在内的实质性问题，一些人再次提起在同治中兴、百日维新或义和团运动后初期讨论过的老话题，一些人则提出了全新的建议。[145]

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老问题是满人独特的取名习惯，他们一般不公开使用家族的姓氏，而只使用名字。御史贵秀建议，所有满人应采用汉人的取名方式，即在他们两个字的名字前冠之以姓

氏，正如许多汉军那样。（从名字判断，贵秀应该是一名旗人。如
109 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也没有按他所鼓吹的那样做。）上奏者提出的满汉关系中主要的一个象征性的问题，涉及满汉官员在上奏时自我称呼方式的差别。汉官自称为“臣”，满人自称为“奴才”。李鸿才（可能代表端方）谈到，满人自称为奴才，这是一种谦虚，即使是皇亲国戚也这样自称。内政部右侍郎赵秉钧建议，满人官员应该采用汉人官员的自称。另一个不只具有象征意义的老问题是满汉通婚仍然很少见，虽然 1902 年已经废除了满汉通婚的禁令。翰林学士郑沅要求朝廷采取更多措施来普及满汉通婚，作为消除满汉畛域的一种重要方式。郑沅认为，朝廷应该积极安排满汉大员之间的联姻，随着这样的习惯在贵族之间传播，低级官员就会主动仿效。[146]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官制中的官缺制。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因为朝廷一年前改革了中央官制，废除了核心机构的满汉共治，并承诺至少在京师各衙门重要职位任命方面“不分满汉”。几名上奏者极力主张，今后所有任职应完全不分满汉。李鸿才指出，1906 年中央官制改革没有在军机处、内阁和翰林院等处实行，这几个机构仍然存在官缺分满汉的做法，他建议这些机构应该尽快消除满汉差异以便与各部保持一致。吏部中层官员胡潜补充说，都察院还存在官缺分满汉的现象，而且各部的许多低级职位特别是笔帖式，仍然被满人垄断，这些现存的族群差别应该逐步废除。湖南举人李蔚然斗胆上奏，提出不仅笔帖式应被废除，就连满语本身也应被废除。在李蔚然看来：

> 国文国语，在列圣缔造之初，尚不能强天下臣民一体遵习，延至今日，即隶在旗籍者，亦未必人人谙习，久为具文，
110 无关要旨，徒于国人耳目中，悬一满汉分界之迹。[147]

尽管李蔚然和许多其他人都赞成通过变满人为汉人（例如使用汉人姓氏或者废除满语）来缩小满汉差异，然而也有一些上奏者提出了反对意见。贵秀建议，满语应成为所有学校的必修课，这样包括满汉在内的所有国人都能学习满语，以“保国粹跻国

风”，他提出汉人应模仿满人“即兵即民”的传统，以之为武力强国的手段。李鸿才同样极力主张朝廷重新颁布和强制执行 1902 年的禁止缠足的谕令——缠足是汉人妇女中的一种常见习俗，以使汉人的习俗与满人保持一致。[148]

上奏者提出清廷应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满汉在法律上的差别对待。对这一问题最为关心的官员是法部右侍郎沈家本（1840—1913），他从 1902 年起担任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建议，平息众怒的办法是确保司法的统一。当然，他指的是大清律例的规定，即允许犯罪旗人可以减刑。沈家本尤其恼火的是，仅仅五个月前，他所在的刑部还支持旗人减刑的权利。而他极力主张旗人与汉人在法律面前应一律平等。[149]

关于废除八旗制度，以前基本没有人敢提及，现在却有大量奏折直接主张部分或者全部废除八旗制度，以此作为化除满汉畛域的最终办法。程德全在两份单独的奏折中提出了四项改革措施：废除驻京八旗和各省驻防八旗，置旗人于地方官管辖之下，废除八旗佐领、都统和将军，消除满汉在法律上的差别并统一归为“国民”。端方以自己的名义上了一道长奏折，提出了类似的四项改革建议。首先，京旗和各省驻防八旗的所有旗人人口移交地方官管辖。其次，各省驻防旗兵应逐渐遣散，为每名遣散的旗兵提供十年的俸禄帮助他们找到新的谋生办法。再次，京旗应带薪重新安置于“满洲”地区，由于此前禁止汉人迁入，因此“满洲”地区人口相对稀少，并有大量耕地。最后，所有居官旗人应捐出其官俸的 10%，如此十年即可积累一定的资金，用于遣散各省驻防八旗和重新安置驻京八旗。[150]

赵秉钧认为，旗人这样的一个世袭军事阶层与中国追求的立宪政体相矛盾。他建议通过三个步骤来废除八旗制度。第一步，彻底核定旗人数目，确定领俸之人。第二步，向那些过去为朝廷做出了很大贡献的家庭授予特殊（而非金钱）荣誉。第三步，招募所有年富力强的旗人担任新军士兵、警察或宫廷杂役；年老和孱弱的领俸旗人可以支付薪水，直到他们死亡。年轻人则应被送到学校或工厂学习谋生技巧，经年之后，当他们拥有了一技之长

时，其俸禄自然停发。至于无薪（或者懒惰）之人，他们要么自谋生路要么被送往东北，在官府帮助下耕种旗地。[151]

在上奏者当中，对废除八旗制度引起的经济后果进行最深入分析的是熊希龄（1870—1942），他引用了明治时期日本遣散武士阶层的经验。[152]熊希龄 1895 年中进士，1898 年因为参加湖南当地的变法运动而被革职查办。1905 年他重入仕途，并陪同端方前往日本和欧洲各国进行立宪考察。熊希龄说：

> 然今之言化除满汉者，曰赐汉姓也，联婚姻也，不论官缺也，皆事之易于决议也。而办法之难，则惟撤驻防、改京旗两大端，事关于数十万满、蒙、汉军之身家性命，有非一朝一夕以解决者。

另一方面，如果不废除驻防八旗和重组驻京八旗，那么汉人将不信任满人，因为满人拥有比汉人更多的特权。而满人也会憎恨汉人，因为满人在经济上日渐穷困。

112 熊希龄还批评了当前三种用以解决遣散旗人经费问题的建议。第一个建议和端方的提议相似，即付给每名旗兵十年的遣散费。然而，每年所付的费用大约为一千万两白银，十年就是一亿两白银。1876 年日本武士阶层被废除时，明治政府花了两亿日元。由于旗兵“数倍”于日本武士，因此清廷不可能提供如此巨额的资金。事实既然如此，第二项建议即为旗兵提供带息债券，正如日本那样。但由于政府债券缺乏普遍的信誉，这等于“以实饷易空券”。第三项建议是把旗人安置于中国边疆的荒地上，分配给每个成年男丁几百亩土地，此后他们就能让自己和家人温饱无忧。这项建议以前试行过，但没有成功。如果现在能够成功，那么这第三项选择需要巨大的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运输、灌溉、市场和农具，所有这些目前都没有准备好。此外，三项建议都没有提到这样一个巨大的困难，即二百多年来旗人形成的依赖性。即使命令他们在经济上独立，他们也不会简单答应。

熊希龄随即提出了他自己的三点长期计划来克服各种困难：在全国建立工厂和职业学堂，教给年轻和强壮的旗人谋生技巧；把旗

兵遣散费的一半存入银行，他们获得带息债券，这也能养成旗人节省的习惯（这是模仿日本大隈重信的计划，即建立国家银行来解决明治时期贵族的生计问题）；另一部分遣散费则投资于兴建满洲和蒙古铁路，这使得移民这些地区变得容易。此外，根据熊希龄初步的乐观估计，每年的铁路股份分红相当于旗兵以前薪俸的一半。

当然，不是每个响应慈禧太后 8 月 10 日谕旨的上奏者都赞成化除满汉畛域，一些人坚决反对这种倾向。恩铭的继任者安徽巡抚冯煦（1843—1927）是一名汉人，他把对朝廷强满排汉的指责，归因于“外人利用此说以煽我革命党人”并随即趁乱钻空。冯煦说，不管如何，满汉不平等的言论没有根据。例如，包括皇族成 113
员在内许多满人经济上比汉人还窘困。朝廷要做的事情仅仅是选拔出优秀的官员，而不管他们是满人还是汉人。如果真如此，满汉问题会自行消失。然而，如果朝廷只是发布一些化除满汉差异的官样文告，那么这个问题就只好留给革命派去解决了。换句话说，需要加以处理的是官员们的胡作非为，而不是满汉差异。御史江春霖很有可能是一名汉人，他也持有同样的看法。江春霖明确反对许多改革建议，包括采用汉姓和废除八旗，他认为这些都是不必要的和无关痛痒的。他坚称差异和对抗（诸如满汉之间）是自然存在的和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共处一室。江春霖说，朝廷要做的是不偏不倚。他承认在许多“美缺”职位任命上，满人占有优势，这需要纠正，但他认为没必要废除满汉之界。实际上，他略带隐讳地总结道，如果满汉之界被废除，那么“疏者”（汉人?）不会感恩，而“亲者”（满人?）则会离散。[153]

不管 1907 年这些改革建议的呼声多么强、范围多么广，但满汉关系中还有一个方面是所有上奏的大臣都没有提到，哪怕是略微涉及：剃发留辫。义和团运动后的最初几年里，一些社会团体对发式和服式进行了修剪，但这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军队和警政改革时，满人发式不太适合日本式的新制服的问题立即凸显出来。新军中的士兵获得朝廷同意，剪短而不是剪除了辫子。警察也一样，他们被允许将辫子剪短三分之二。在京城，许多警察都是旗人，剪短辫子的命令于 1905 年年底颁布，据埃德蒙·白

克浩斯记录，“这一法令在当时引起了很多愤怒。在一个军营，士兵都拒绝服从命令，直到他们的上司剪短了辫子。街上的孩童称剪辫的士兵为洋鬼子，这也令他们恼怒不已”。随着军队和警察剪短了辫子，经常身穿马褂、头戴日式帽子的新式学堂的学生，同样对拖在背后的长辫子这种古怪装束感到愤怒（图 7）。学生们开始主动剪短甚至剪除了自己的辫子。1906 年 4 月，京城顺天中学堂的几个学生趁着改用新式军训帽的机会，剪除了自己的辫子，学堂督学警告他们，必须要等到朝廷颁布明确的法令才可以剪辫。虽然朝廷从来没有允许这样做，但是外务部大臣吕海寰 1907 年抱怨，新发式已经广为传播，特别是从国外回来的学生不顾一切地剪掉了辫子，改变了服饰。[154]

图 7　留辫子、戴军帽、着长袍马褂的男学生
（Lowe，H. Y.（卢兴源），*The Adventures of Wu：The Life Cycle of a Peking Man*（《吴氏探险记：一个北京人的生涯》））

学生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同时，民间的改革呼声也要求剪除辫子。上海的月刊《东方杂志》在1907年9月这一期的社论，把“易辫”列入了解决“满汉之争”和推进立宪的四项改革措施之中（其他三项改革措施是用汉姓、划旗为民和废除官缺）。[155]此时，来自朝鲜的一则广为流传的消息给辫子问题增加了紧张的氛围，即刚刚由日本占领者扶上台的朝鲜国王纯宗于8月16日剪去了自己的发髻，并下令让其臣民留日本式的短发。纯宗无奈颁布的发式谕旨对当时中国的报纸读者来说是一种沉痛的警告，即如果不及时变革，就会为此付出代价。正如《北京女报》评论的那样，“唉！当国家完全丧失时才知道改革！一切都太晚了！”[156]尽管国内外发生了这些事情，但在1907年夏天，却没有一名上奏者建议对满人强制推行的发式进行任何改变。这样小心只能归因于一种观念，即虽然满汉关系的很多方面都亟须改革，包括八旗制度本身，而辫子却不在其中之列。

对于7月8日和8月10日两道谕令所引发的立宪和满汉问题之争有很大贡献的，还有《大同报》这份新的政治性报纸，它于1907年6月25日创刊于日本，到9月底，已经发行了三期，每期的内容都超过一百页（1908年5月30日停刊之前又发行了四期）。与义和团运动后十年间在日本问世的其他很多中文期刊不同，《大同报》由满人创办，并主要关注该报所说的“满汉问题”。《大同报》的所有编辑人员都是满人，其中两名主笔是皇室成员恒钧和吉林的乌泽声，他们都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学生。[157]

与19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很多政治报纸一样，《大同报》反对中国人在列强威胁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普遍冷漠。乌泽声在创刊号的《大同报·序》中说，造成这种冷漠的原因在于中国两千余年来的“专制政体”，在这一政体下，统治者享有绝对的权力，而人民则丧失了责任感。然而，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立宪。实行立宪政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没有区别，都有责任管理国家事务。如果中国是一个立宪国家，外国势力再也不能仗势欺人。他们以前或许能够胁迫一两个政府官员，但却不能威胁一亿被唤醒的大众。因此，如果中国要免除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就必须变

成立宪政体并授权于民。乌泽声说，立宪政体与专制政体相比有什么区别？不是宪法，而是国会。国会为人民提供了一个表达政见的渠道，也可以培育人民的团结意识和政治觉悟。国会让人民承担起责任。没有国会，就不可能有“责任政府”。因此，《大同报》提出的四个目标中的前两个目标就是“建立立宪君主制”和“召开国会以创设责任政府”。[158]在这一点上，《大同报》与杨度（1875—1931）的观点极为类似，杨度当时也在东京，他是宪政讲习会的组织者和《中国新报》的主笔。《大同报》在其创刊号中刊发了杨度的贺词，他在其中表示，《大同报》的目标与他的目标完全一致，而且后来《大同报》还发表了杨度的长篇评论《国会与旗人》。[159]

《大同报》的其他两个目标是“满汉人民平等”和“统一满、汉、蒙、回、藏”，这两个目标都涉及了满汉问题。[160]恒钧在题为《中国之前途》一文中谈到，满汉问题起源于最近。直到1895年之后，满汉问题才浮出水面，当时忧心忡忡的人民要求朝廷进行改革，却激起了保守派的反对，这自然在许多汉人中引发了排满反应。[161]随即，义和团运动后反满情绪的高涨，又引起了一些满人的排汉反应。所以，满汉问题包括两个方面，即汉人中的反满和满人中的排汉。乌泽声在“满汉问题”这一长达五十页的文章中谈到，反满的最终目标在于共和主义，排汉的最终目标在于加强专制，两者都不想要立宪君主制。[162]恒钧和乌泽声都承认满汉之间存在着差别，但他们感到这种差别不在于不可改变的族群特征，而仅在于“责任和权利”的不同。例如，满人作为八旗制度中的成员普遍要服兵役，政府则给予他们一定的薪俸。另一方面，汉人被迫纳税，但是他们可以免除兵役。[163]

《大同报》主张，至少应该废除责任和权利方面的这些差别，这样满汉之间的平等能实现。更为重要的是，《大同报》赞成废除八旗制度本身。在“满汉问题”一文结尾，乌泽声以一个简短且富有深意的句子宣称，消除所有满汉差异的唯一办法是朝廷“废除特别制度来证明其绝对公正”。[164]杨度在《国会与旗人》一文中详细阐明废除八旗的理由。[165]最后，《大同报》关于满汉问题

的分析，其要旨在于从政治上而不是族群上来对中国进行定义。当然，它承认中国境内存在不同的族，主要是五族——“汉、满、蒙、回、藏”。这好像只是重复了乾隆皇帝时融合五族的观念，但却有一个重要的变化：现在，这些人群效忠的对象不再是大清帝国而是中国。恒钧否定了“中国应由汉人统治”这一排满观念。他也反对排汉者的类似概念，即“中国不属于汉人，而属于满人”。相反，他坚持五族成员都属于“中国人”。不管其族群有何差异，他们都是中国“国民”。[166]

我们还不清楚，《大同报》这些年轻且具改革思想的满人的呼吁，是否对1907年夏天的上奏者产生了很大影响，尽管其中的一些思想与熊希龄的观点很类似，后者同样要求废除八旗制度。不管如何，慈禧太后的朝廷把所有奏折都移交给督办政务处考虑。督办政务处创设于1901年，目的在于督办官制改革的各个方面，当时由八名成员组成：两名军机大臣（奕劻和鹿传麟），一名大学士（孙家鼐），两名尚书（学部尚书荣庆、陆军部尚书铁良），三名总督（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湖广总督张之洞和直隶总督袁世凯）。其中有三名满人，五名汉人。[167]为了让他们参与这些重要 *117*
的商议，张之洞和袁世凯这两名总督被调任京城，入值军机处并被委以中央部门的重要职位。张之洞成为学部督办，袁世凯任外务部尚书（取代了吕海寰）。（这些任命明显违背了1906年所定规则，即各部尚书不能担任其他重要职位。张之洞的督办职位虽不是尚书，但他与外务部和陆军部的奕劻一样，职位高于尚书。袁世凯在外务部的职位却是明显违背了规则。）[168]任命张之洞和袁世凯入值军机处，这是1907年政治风暴的另一方面，因为他们取代了6月份和8月份先后被罢免的瞿鸿禨及其同僚林绍年。扩充后的六人军机处——包括奕劻、载沣、世续、鹿传麟、张之洞和袁世凯，最终还是在满汉间平均分配。6月，载沣已经作为军机处行走进入军机处。[169]

从1907年8月底开始，大约在张之洞和袁世凯到达京城时，督办政务处大臣经常一起讨论改革满汉关系和实现立宪政府的各种建议。根据当时至少一份报纸的报道，在这些会议上，陆军部

尚书铁良强烈反对采取激进措施废除旗兵的俸禄和旗人的其他特权，因为这违背了开国先祖的意愿。[170]

一个月后，清廷在十天内先后颁布了两道谕令，决心彻底改变而不是废除八旗制度。第一道谕令颁布于9月27日，正如端方建议的那样，命令各省驻防八旗在十年内解散，旗人准备自谋生路。谕令要求各驻防八旗都统与相关的各省官员核实旗兵数目，并分配给他们足够的农田（连同工具等），这样他们能够自食其力养家糊口。官员们要先分配驻防单位的牧场和农田。自己没有农田或者农田数量不足的驻防八旗，要（以市场价格）从附近农民手中购买农田。每年大约10%的旗兵将得到土地，他们具有永久所有权，但不能出售和抵押给他人。当旗兵重新定居于被分配的
118 土地上时，他们的薪俸就会被停发，并从八旗官员的治理下转由当地官员管辖，从此之后他们与平民无异，包括缴纳同样田赋，受制于同样法律。遣散各省驻防八旗的费用来自度支部，也来自停发旗人薪俸的节余。第二道谕旨于10月9日颁布，涉及了满汉之间在习俗上和法律上的差异，例如服丧时间的长度和减刑。谕令要求礼部会同修订法律大臣起草一套礼仪和法典，以期适用于皇族以外的所有满人和汉人。[171]

这两道谕旨参考了恩铭遇刺后上奏者提出的许多建议。表面上看，通过遣散各省驻防八旗和消除满汉之间社会生活上和法律上的差异，这两道谕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八旗制度和满汉关系。然而，这两道谕旨并没有接受所有的改革建议。尤其是，谕旨没有采纳熊希龄要求解散驻京八旗的建议，而驻京八旗占了整个八旗人口的一半。谕令也没有废除许多中央机构中依然存在的官缺分满汉。最后，由于没人呼吁剪辫，谕旨自然没有对发式作出改变。事实上，为了回应吕海寰对逐渐蔓延的剪辫潮流的抱怨，清廷在1907年夏天重申了留辫的要求。而且，根据由满人（荣庆和铁良）统领的学部和陆军部的联名上奏，朝廷承诺要惩罚那些剪除了辫子的归国学生和士兵。[172]

同时，为了回应立宪改革派（例如《大同报》所代表的）逐步高涨的要求，慈禧太后以自己的名字发布了另外两道懿旨，明

确了她一年前所做出的创设立宪政体的模糊承诺。1907 年 9 月 20 日，她宣称她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两院制”议政体系。作为预备步骤，她命令立即设立资政院，任命四等王公溥伦（1874—1926）和年迈的大学士孙家鼐为总裁，让他们与军机处一起草拟一份关于资政院的详细计划。一个月后的 10 月 19 日，她又授权各省设立谘议局。[173]后来，她送溥伦前往日本直接学习立宪政府的相关知识。[174]

结　语

清末新政最初侧重于军事和教育改革，这也是“洋务运动”的思路。1906 年后，朝廷才超越这些旧有的范围，冒险进入政治改革这项前途未卜的领域。随着义和团运动之后数年内军事和教育体系的改变，满人也和普通民众一样接受了改革。他们组建了新的军队（京旗常备军，后来变成陆军第一镇）和新的警察力量（著名的内城工巡局）。他们创办新的军事和平民学堂，包括京城的陆军贵胄学堂和杭州驻防八旗的惠兴女学堂，他们还派遣学生出国留学，主要是派往日本。他们创办了自己的报纸和杂志（天津的《大公报》、京城的《北京女报》、东京的《大同报》）来表达自己对时事的看法。总之，在义和团运动后的改革中，满人是积极的参与者。

同时，虽然革命派对满人的指控往往有效，但义和团运动后的最初几年里，清廷避而不谈《大同报》所说的“满汉问题”。在 1907 年 7 月恩铭被刺杀的前夕，清廷废除了满汉通婚的禁令，但收效甚微。朝廷任命几名汉人官员到八旗和新设立的东北三省任职。它废弃了满人祖制中的骑射技艺，但没有废除“国语”。朝廷也没有废除官缺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很多官员的职位是给一些特殊族群保留的。只是在新组建的中央机构中，不再实行官缺制。一项对 1907 年夏天上奏者的改革建议进行的分析表明，直到慈禧太后统治结束的前一年，满汉之间仍然存在很多重要差异。

事实上，废除官缺制度是许多改革派建议的一种有效减轻满

汉差异的手段。但这又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它打破了高级官员之间的平衡状态，最终损害了汉人的利益，更有利于满人。以前，在满汉共治制度下，京城衙门的要职都是在两个群体间平等分配。然而，到1906年年底，当中央官制改革和满汉共治被限制时，十
120 三名各部尚书中有八名满人，只有五名汉人。一年后，即1907年年底，满人的优势更加明显：九名满人和四名汉人。满人是奕劻和那桐（外务部），善耆（民政部），载泽（度支部），溥良（礼部），荣庆（学部），铁良（陆军部），溥颋（农工商部）和寿耆（理藩院）。四名汉人是袁世凯（外务部），陆润庠（1841—1915，户部），戴鸿慈（刑部）和陈璧（1852—1928，邮传部）。[175]此外，王公参政的趋势也更加明显。1907年年底九名满人尚书中，三名是王公：奕劻、善耆和载泽。而一年前只有两名——奕劻及其儿子载振担任尚书（载振后来由于卷入一桩丑闻从农工商部被罢免）。军机处的这种趋势同样很明显，1906年年底，四名军机大臣中只有一名是皇室亲王，即奕劻；一年后，六名军机大臣中有两名亲王，即奕劻和载沣。[176]

在安徽巡抚恩铭于1907年7月被刺杀后，清廷才最终意识到满汉问题的严重性。这时，也只是这时，慈禧太后才发布了两道谕旨，要求对满人改革派乌泽声称之为“特权制度”的八旗制度进行重要改革，并消除满汉之间在社会生活上和法律上的差异。这些改革并没有废除八旗制度，也没有完全消除满汉差异。但它们比以前的任何改革措施更深入，包括百日维新期间的改革。1898年，光绪皇帝仅仅是要求废除旗人不准外出谋生的禁令，以及探讨重新安置旗人的可能性。这些命令曾使得旗人人心惶惶，也成为维新失败和光绪皇帝失去权力的重要原因。而现在，差不多正好十年后，慈禧太后又回到了他的意见上。

【注释】

[1]《大清皇帝实录·光绪实录》卷427，12a；卷428，6b、7a。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248页。Hummel，Arthur W.（恒慕义）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清代名人传略》），947页。

[2]《大清皇帝实录·光绪实录》卷430，20b～21a。

[3] 同上书，卷432，11b～12b；卷444，1a～1b。Powell，Ralph L.（拉尔夫·鲍威尔），*The Rise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1895-1912*（《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102～103页。刘凤翰：《武卫军》，67、86～88、335～345页；《袁世凯与戊戌政变》，108页。

[4] Hummel，Arthur W.（恒慕义）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清代名人传略》），393～394页。Bays，Daniel H.（裴士丹），*China Enters the Twentieth Century：Chang Chih-tung and the Issues of a New Age，1895-1909*（《迈入20世纪的中国：张之洞与一个新的时代，1895—1909》），64～65页。也见Chung，Sue Fawn（钟苏芬），“The Much Maligned Empress Dowager：A Revisionist Study of the Empress Dowager Tz'u-his（1835-1908）”（《被诽谤的皇太后：对慈禧太后的修正研究》），in *Modern Asian Studies*（《现代亚洲研究》），1979，（13），190～196页。

[5] Headland，Isaac Taylor（何德兰），*Court Life in China：The Capital，Its Officials and People*（《晚清宫廷见闻录》），161～163页。

[6] Crossley，Pamela Kyle（柯娇燕），*Orphan Warriors：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孤军：三代满族人和清朝的灭亡》），174～175页。Malone，Carroll Brown（麻伦），*History of the Peking Summer Palaces under the Ch'ing Dynasty*（《清朝北京颐和园史》），208页。Duiker（史丹福），*Cultures in Collision*（《文化冲突》），103、116页。

[7]《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00—1901》，272页。刘凤翰：《武卫军》，752～754页。

[8] 甘海岚：《老舍年谱》，1～2页。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349页。

[9] Tan，Chester C.（谭春林），*The Boxer Catastrophe*（《拳祸》），159～161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00—1901》，237～238、354、363、369页。Shirokogoroff，S. M.（史禄国），*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anchus：A Study of the Manchu Clan Organization*（《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4页。

[10]《大清皇帝实录·光绪实录》卷468，3a～3b。《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00—1901》，357、395、467页。关于荫昌，见苏精：《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171～172页。

[11]《大清皇帝实录·光绪实录》卷470，1b～2a；卷477，9b～11a；卷488，11b～12b。Tan，Chester C.（谭春林），The Boxer Catastrophe（《拳

祸》），216～222 页。

[12] 戴学稷：《呼和浩特简史》，75～79 页。

[13]《大清皇帝实录·光绪实录》卷 477，11a～11b。

[14] 载沣：《醇亲王使德日记》。Hummel，Arthur W.（恒慕义）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清代名人传略》），385 页。

[15] Tan，Chester C.（谭春林），*The Boxer Catastrophe*（《拳祸》），232 页。

[16]《大清皇帝实录·光绪实录》卷 476，8a～10b。

[17] 同上书，卷 481，4b～5a。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282 页。

[18]《大清皇帝实录·光绪实录》卷 476，8b～9a；卷 530，4b。吴方：《仁智的山水——张元济传》，82 页。

[19] Morrison，G. E.（莫理循），*The Correspondence of G. E. Morrison，1895－1912*（《莫理循通信集（1895—1912）》），155～156 页。Bays，Daniel H.（裴士丹），*China Enters the Twentieth Century：Chang Chih-tung and the Issues of a New Age，1895－1909*（《迈入 20 世纪的中国：张之洞与一个新的时代，1895－1909》），103 页。

[20]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 53，22a～24a。Bays，Daniel H.（裴士丹），*China Enters the Twentieth Century：Chang Chih-tung and the Issues of a New Age，1895－1909*（《迈入 20 世纪的中国：张之洞与一个新的时代，1895—1909》），108 页。

[21] 张秉铎：《张之洞评传》，273 页。

[22] 周馥：《周悫慎公全集·奏稿》卷 2，41a。

[23] 张秉铎：《张之洞评传》，273 页。

[24]《大清皇帝实录·光绪实录》卷 492，9b。

[25]《北京女报》，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十五日，2 页。《北华捷报》，1907－07－12，79～80 页；1908－05－30，545 页。《东方杂志》，第 2 卷第 1 号，“时评”，6 页（光绪三十一年一月）。关于李国杰，见魏秀梅：《清季职官表·人物录》，60 页。

[26] Lee，Robert H. G.（罗伯特·李），*The Manchurian Frontier in Ch'ing History*（《清代满洲边疆史》），140～141 页。魏秀梅：《清季职官表》，960、1057 页；《从量的观察探讨清季驻防副都统之人事嬗递》，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4，（13），427 页。

[27]《大清皇帝实录·光绪实录》卷553，3b；卷564，18a～18b。公孙訇：《冯国璋年谱》，7页。《满族社会历史调查》，85页。

[28]《满族简史》，150页。衣保中：《试论清代满族士兵土地所有制的演变》，载《满族研究》，1987（4），28页。

[29]《满族社会历史调查》，209页。《满族简史》，150～151页。

[30] Lee，Robert H. G.（罗伯特·李），*The Manchurian Frontier in Ch'ing History*（《清代满洲边疆史》），152～155页。《北京女报》，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3页。

[31] 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282～284、287～288页。Brunnert，H. S.（布鲁纳特），Hagelstrom，V. V.（哈盖尔斯特罗姆），*Present Da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当今中国的政治机构》），305页。

[32]《光绪政要》卷31，67a～69a。

[33] 魏秀梅：《清季职官表》，487～497页。

[34]《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597页。傅宗懋：《清代军机处组织及职掌之研究》，184页。Bartlett，Beatrice S.（白彬菊），*Monarchs and Ministers：The Grand Council in Mid-Ch'ing China，1723－1820*（《君与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144～148、37页注28。

[35] 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22页。Hummel，Arthur W.（恒慕义）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清代名人传略》），380页。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卷1696，10号，刘廷臣奏折，宣统三年九月八日。钱实甫：《清季重要职官年表》，见杨家骆等主编：《新修清季史卅九表》，54～72页。Rawski，Evelyn S.（罗友枝）*The Last Emperors：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清代宫廷社会史》）没有注意到清代中期的这一传统。

[36] 钱实甫：《清季重要职官年表》，见杨家骆等主编：《新修清季史卅九表》，47～50页。关于世铎，见Hummel，Arthur W.（恒慕义）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清代名人传略》），80页；《清末部分八旗都统履历》，37页。

[37] 钱实甫：《清季重要职官年表》，见杨家骆等主编：《新修清季史卅九表》，72～98页。钱实甫：《清季新设职官年表》，1～13、61页。

[38] 钱实甫：《清季重要职官年表》，见杨家骆等主编：《新修清季史卅九表》，50页。Hummel，Arthur W.（恒慕义）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清代名人传略》），385页。

[39] 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283页。钱实甫：《清季重要职官

年表》，见杨家骆等主编：《新修清季史卅九表》，99～104 页。钱实甫：《清季新设职官年表》，30～32 页。关于载振，见《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 9 卷，157～161 页。和钱实甫的记载不同，毓朗（1905 年任巡警部左侍郎）不是亲王。其父定郡王在 1907 年去世后，毓朗降袭为贝勒，而且，他只有九品官衔。关于毓朗，参见 Hummel，Arthur W.（恒慕义）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清代名人传略》），729 页；田原天南：《清末民初中国官绅人名录》，653 页。

[40]《大清皇帝实录·光绪实录》卷 532，15a。《东方杂志》，第 2 卷第 4 号，“内务”，62～63 页（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光绪朝东华录》，5684～5685、5699 页。

[41] Crossley，Pamela Kyle（柯娇燕），*Orphan Warriors*：*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孤军：三代满族人和清朝的灭亡》），175 页。《北京女报》，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十六日。《满族社会历史调查》，93 页。

[42]《东方杂志》，第 1 卷第 2 号，“实业”，18 页（光绪三十年二月）；第 1 卷第 6 号，“实业”，95 页（光绪三十年六月）；第 2 卷第 12 号，“军事”，384 页（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周馥：《周悫慎公全集·奏稿》卷 2，40b。

[43] 端方：《端忠敏公奏稿》卷 4，44a；卷 8，55b；卷 11，25a。《东方杂志》，第 2 卷第 12 号，“军事”，385 页（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第 4 卷第 9 号，“杂俎”，21 页（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北华捷报》，1907－09－20，676 页；1907－11－01，276 页。

[44]《东方杂志》，第 1 卷第 9 号，“实业”，160 页（光绪三十年九月）；第 3 卷第 8 号，“实业”，169 页（光绪三十二年七月）。端方：《端忠敏公奏稿》卷 7，12a～12b。郑川水：《论清朝的旗饷政策及其影响》，载《辽宁大学学报》，1985（2），80 页。

[45] 刘凤翰：《武卫军》，461～462 页。MacKinnon，Stephen R.（麦金农），*Power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Yuan Shi-kai in Beijing and Tianjin*，*1901－1908*（《帝国晚期的政治与权力：袁世凯在北京和天津，1901—1908》），129 页。《袁世凯奏折专辑》，319～320 页。《东方杂志》，第 2 卷第 4 号，“军事”，146～148 页（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吴兆清：《袁世凯练新军改军制及其历史地位》，载《历史档案》，1987（1），105～106 页。

[46]《大清皇帝实录·光绪实录》卷 507，6b～7a。Powell，Ralph L.（拉尔夫·鲍威尔），*The Rise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1895－1912*（《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140～143 页。

[47] 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21，4b～5a。

[48]《中国近代史词典》，582页。田原天南：《清末民初中国官绅人名录》，793页。查时杰：《清末的宗社党》，载《"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1978，（5），132页。MacKinnon，Stephen R.（麦金农），*Power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Yuan Shi-kai in Beijing and Tianjin*，*1901－1908*（《帝国晚期的政治与权力：袁世凯在北京和天津，1901—1908》），78页。房兆楹：《清末民初洋学学生提名录初辑》，48页。*Saishin Shina kanshin roku*（《最新支那官绅录》），392页。

[49]《大清皇帝实录·光绪实录》卷515，5a。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289页。Powell，Ralph L.（拉尔夫·鲍威尔），*The Rise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1895－1912*（《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166～167页。Fung，Edmund S. K.（冯兆基），*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The New Army and Its Role in the Revolution of 1911*（《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36～38页。

[50] 田原天南：《清末民初中国官绅人名录》，793页。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1188页。公孙訇：《冯国璋年谱》，6页。

[51] 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21，4b～5a。Fung，Edmund S. K.（冯兆基），*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The New Army and Its Role in the Revolution of 1911*（《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21～22页。MacKinnon，Stephen R.（麦金农），*Power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Yuan Shi-kai in Beijing and Tianjin*，*1901－1908*（《帝国晚期的政治与权力：袁世凯在北京和天津，1901—1908》），100页。Morrison，G. E.（莫理循），*The Correspondence of G. E. Morrison*，*1895－1912*（《莫理循通信集（1895—1912）》），202页。《东方杂志》，第1卷第1号，"杂俎"，1页（光绪三十年一月）。

[52]《大清皇帝实录·光绪实录》卷525，8b；卷532，13b～14a。Powell，Ralph L.（拉尔夫·鲍威尔），*The Rise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1895－1912*（《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204～209页。《东方杂志》，第2卷第8号，"杂俎"，59页（光绪三十年八月）；第2卷第12号，"军事"，386～387页（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军事》，3～4页。《光绪政要》卷31，69a～72b。

[53] Fung，Edmund S. K.（冯兆基），*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The New Army and Its Role in the Revolution of 1911*（《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33页。美国国务院档案，2106/2－5，undated

report "the Chinese Army"（中国军队），170～173 页。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 41，2a～8a。

[54] Fung，Edmund S. K.（冯兆基），*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The New Army and Its Role in the Revolution of 1911*（《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26 页。《东方杂志》，第 1 卷第 12 号，"军事"，452 页（光绪三十年十二月）。

[55] 章伯锋、李宗一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 1 卷，91 页。美国国务院档案，1518/38-29，Rockhill to State，7 Feb. 1907（1907 年 2 月 7 日柔克义致国务院的信）。Fung，Edmund S. K.（冯兆基），*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The New Army and Its Role in the Revolution of 1911*（《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33 页。关于曹锟，见《民国人物传》，第 1 卷，172 页。关于王廷桢和何宗莲，见田原天南：《清末民初中国官绅人名录》，35～36、196 页。关于这三人，见章伯锋、李宗一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 5 卷，370～371、442、518～519 页。

[56]《光绪朝东华录》，5429～5432 页。章伯锋、李宗一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 1 卷，91～92 页。

[57]《东方杂志》，第 1 卷第 1 号，"杂俎"，1 页（光绪三十年一月）。八旗都统衙门档案，"教育"，698 号，值年旗给汉军镶红旗的信函，光绪二十九年七月；铁良给汉军镶红旗都统的信函，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四日。

[58] Fung，Edmund S. K.（冯兆基），*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The New Army and Its Role in the Revolution of 1911*（《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63～66 页。《东方杂志》，第 1 卷第 12 号，"教育"，274～279 页（光绪三十年十二月）；第 2 卷第 6 号，"教育"，109～123 页（光绪三十一年六月）。郭凤鸣：《清末民初陆军学校教育》，78～86 页。

[59]《大清皇帝实录·光绪实录》卷 540，8a。《光绪朝东华录》，5300～5301 页。

[60] 八旗都统衙门档案，"教育"，698 号，值年旗给汉军镶红旗的信函，练兵处和兵部的奏折，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一日；值年旗给满人镶黄旗的信函，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东方杂志》，第 2 卷第 12 号，"教育"，321～332页（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第 3 卷第 6 号，"杂俎"，32 页（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大清皇帝实录·光绪实录》卷 549，13a～13b；卷 553，3b。《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 28，2a～2b。Brunnert，H. S.（布鲁纳特），Hagelstrom，V. V.（哈盖尔斯特罗姆），*Present Da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当今中国的政治机构》），713 页。关于冯国璋的背景，见《冯国

璋早期履历》，载《历史档案》，1995（1），59页。

[61] Fung，Edmund S. K.（冯兆基），*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The New Army and Its Role in the Revolution of 1911*（《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69～70页。《东方杂志》，第2卷第12号，"教育"，321～332页（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政治官报》，宣统元年九月四日，5～7页。

[62]《东方杂志》，第1卷第4号，"教育"，97～101页（光绪三十年四月）。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56～64页。Fung，Edmund S. K.（冯兆基），*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The New Army and Its Role in the Revolution of 1911*（《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71～72页。

[63]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63～64页。郭凤鸣：《清末民初陆军学校教育》，72～73页。《东方杂志》，第2卷第12号，"教育"，348页（光绪三十年十二月）。

[64]《大清皇帝实录·光绪实录》卷483，8a；卷494，13a～13b；卷498，8a。韩延龙、苏亦工等：《中国近代警察制度》，80～101页。Hunt，Michael H.（韩德），"The Forgotten Occupation：Peking，1900－1901"（《被遗忘的侵略：1900—1901年的北京》），in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太平洋历史评论》），1979，（48），513～514页。Morrison，G. E.（莫理循），*The Correspondence of G. E. Morrison，1895－1912*（《莫理循通信集（1895—1912）》），614页。

[65] Strand，David（戴维·斯特兰德），*Rickshaw Beijing：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北京人力车：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市民与政治》），69～70页。《东方杂志》，第1卷第10号，"内务"，135～136页（光绪三十年十月）；第3卷第8号，"军事"，134～135页（光绪三十二年七月）。

[66]《大清皇帝实录·光绪实录》卷498，8a、9a。白杰：《清末政坛中的肃亲王善耆》，载《满族研究》，1993（2），36～37页。关于善耆，见李治亭主编：《爱新觉罗家族》，第9册，213～214页。关于其家族，见Hummel，Arthur W.（恒慕义）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清代名人传略》），280～281页。

[67]《大清皇帝实录·光绪实录》卷524，2a；卷525，8b。沈云龙：《徐世昌评传》，24页。关于那桐，见《清外务部部分主要官员履历》，42页。关于毓朗，见《巡警部主要官员》，63、79页。

[68] Strand，David（戴维·斯特兰德），*Rickshaw Beijing：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北京人力车：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67 页。沈云龙：《徐世昌评传》，24 页。《"中央警官学校"校史》，11、17～20 页。Jansen，Marius B.（詹森），*The Japanese and Sun Yat-sen*（《日本人和孙中山》），138 页。韩延龙、苏亦工等：《中国近代警察制度》，233～238 页。王家俭：《清末民初我国警察制度现代化的历程（1901—1928）》，28、46、242 页。《有关川岛浪速的几件史料》，载《历史档案》，1993（4），66、67～71 页。

[69] Jansen，Marius B.（詹森），*The Japanese and Sun Yat-sen*（《日本人和孙中山》），138 页。白杰：《清末政坛中的肃亲王善耆》，载《满族研究》，1993（2），37 页。沈云龙：《徐世昌评传》，24 页。《有关川岛浪速的几件史料》，载《历史档案》，1993（4），67～68 页。Reynolds，Douglas R.（任达），*China，1989-1912：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新政革命与日本》），166 页的照片，其中善耆被误认为是奕劻。

[70] 王家俭：《清末民初我国警察制度现代化的历程（1901—1928）》，29、242～243 页。房兆楹：《清末民初洋学学生提名录初辑》，22～24 页。《苏报》，1903-06-12，1～2 页。关于弘文学院，见 Harrell，Paula（保拉·哈瑞），*Sowing the Seeds of Change：Chinese Students，Japanese Teachers，1895-1905*（《播撒变更之种子：中国学生和日本教师，1895—1905》），34 页。Huang Fu-ch'ing（黄福庆），*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晚清时期日本的中国学生》），103～105 页。

[71] 桑兵：《癸卯元旦留日学生排满演说史实考辨》，载《学术研究》，1984（3），75～76 页。杨天石、王学庄 编：《拒俄运动，1901—1905》，127～128页。陈天华：《陈天华集》，157 页。也见 Rankin，Mary Backus（冉玫烁），*Early Chinese Revolutionaries：Radical Intellectuals in Shanghai and Zhejiang，1902-1911*（《早期中国革命者：1902—1911 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

[72] 桑兵：《癸卯元旦留日学生排满演说史实考辨》，载《学术研究》，1984（3），76 页。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320 页。沈云龙：《徐世昌评传》，24 页。

[73]《有关川岛浪速的几件史料》，载《历史档案》，1993（4），69～70 页。王家俭：《清末民初我国警察制度现代化的历程（1901—1928）》，46 页。《"中央警官学校"校史》，20～23 页。

[74] 韩延龙、苏亦工等：《中国近代警察制度》，110～119 页。

[75] Fung，Edmund S. K.（冯兆基），*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The New Army and Its Role i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34 页。

[76]《东方杂志》，第 1 卷第 4 号，“军事”，183 页（光绪三十年四月）。《光绪政要》卷 31，10b～11a。Fung，Edmund S. K.（冯兆基），*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The New Army and Its Role in the Revolution of 1911*（《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115 页。也见苏云峰：《湖北新军（1896—1912）》，载《历史学报》，1976，（14），373 页。但是苏云峰估计在 1905 年驻防旗兵只占湖北常备军的 4%。

[77]《东方杂志》，第 1 卷第 12 号，“教育”，275～276 页（光绪三十年十二月）；第 2 卷第 6 号，“教育”，109～111 页（光绪三十一年六月）；第 4 卷第 9 号，“教育”，204～207 页（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关于荆州的学校，也见雷方圣：《荆州旗学的始末及其特点》，载《民族研究》，1984（3），58～59 页。周武彝：《陆军第三中学参加武昌起义经过》，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 7 集，11 页。

[78]《东方杂志》，第 1 卷第 7 号，“教育”，159 页（光绪三十年七月）。*Saishin Shina kanshin roku*（《最新支那官绅录》），392～393 页。房兆楹：《清末民初洋学学生提名录初辑》，8～9、48～49 页。

[79]《东方杂志》，第 1 卷第 4 号，“教育”，98 页（光绪三十年四月）；第 2 卷第 12 号，“教育”，348 页（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

[80] 同上书，第 2 卷第 1 号，“杂俎”，10 页（光绪三十一年一月）；第 2 卷第 10 号，“内务”，201 页（光绪三十一年十月）；第 3 卷第 4 号，“内务”，105 页（光绪三十二年四月）。房兆楹：《清末民初洋学学生提名录初辑》，24 页。

[81]《大清皇帝实录·光绪实录》卷 546，11a～11b。《光绪朝东华录》，5431 页。

[82]《东方杂志》，第 4 卷第 5 号，“军事”，28～30 页（光绪三十三年五月）；第 4 卷第 7 号，“军事”，63～65 页（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北京女报》，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2 页；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一日，4 页。

[83] Morrison，G. E.（莫理循），*The Correspondence of G. E. Morrison*，*1895-1912*（《莫理循通信集（1895—1912）》），345 页。

[84]《大清皇帝实录·光绪实录》卷 493，9b。庄吉发：《京师大学堂》，138 页。Brunnert，H. S.（布鲁纳特），Hagelstrom，V. V.（哈盖尔斯特罗姆），*Present Da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当今中国的政治机构》），717 页。《东方杂志》，第 1 卷第 10 号，“教育”，235 页（光绪三十年十月）。《北京女报》，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3 页。

[85]《东方杂志》，第2卷第6号，“教育”，157页（光绪三十一年六月）；第3卷第12号，“教育”，369页（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

[86]《大清皇帝实录·光绪实录》卷493，9b～10a。

[87] 端方：《端忠敏公奏稿》卷3，27a～29a、60a～61b。《东方杂志》，第1卷第7号，“教育”，157～159页（光绪三十年七月）。雷方圣：《荆州旗学的始末及其特点》，载《民族研究》，1984（3），58页。

[88]《东方杂志》，第3卷第3号，“教育”，55页（光绪三十二年三月）。

[89] Biggerstaff，Knight（毕乃德），*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中国最早的近代官办学校》），136～139页。庄吉发：《京师大学堂》，28～29、81～82、138、167～195页。房兆楹：《清末民初洋学学生提名录初辑》，69～139、145～153页。

[90] 房兆楹：《清末民初洋学学生提名录初辑》，26、136～139页。《东方杂志》，第2卷第6号，“教育”，101～103页（光绪三十一年六月）。Chou，Josephine Nailene（约瑟芬·奈兰·周），*Frontier Studies and Changing Frontier Administration in Late Ch'ing China：The Case of Sinkiang，1759-1911*（《晚清的边疆研究和变化中的边疆行政：1759—1911年的新疆》），298页。

[91]《北京女报》，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1～2页；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二日，2页；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二十六日，2～3页；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一日，1～2页。

[92] 端方：《端忠敏公奏稿》卷7，21b。

[93]《东方杂志》，第3卷第5号，“教育”，103～104页（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北京女报》，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3页。Crossley，Pamela Kyle（柯娇燕），*Orphan Warriors：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孤军：三代满族人和清朝的灭亡》），195页。郑云山：《杭州与西湖史话》，93～94页。

[94] 金梁：《光宣小记》，100页。《北京女报》，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4页；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1～2页。《时报》，1915-11-10，2页。郑云山：《杭州与西湖史话》，94页。

[95] Beahan，Charlotte L.（夏洛特·本汉），“Femin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Chinese Women's Press，1902-11”（《中国妇女出版物中的女性主义和民族主义》），in *Modern China*（《现代中国》），1975（1），408～410页。

[96]《北京女报》，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八日。

[97] 同上书，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十五日，1～2页；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十六日，1～2页。

[98] Beahan, Charlotte L.（夏洛特·本汉），“Femin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Chinese Women's Press, 1902-11”（《中国妇女出版物中的女性主义和民族主义》），in *Modern China*（《现代中国》），1975（1），408～409页。《北京女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1页。

[99] 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5集，1～32页。Boorman, Howard L.（包华德），Richard C. Howard（里查德·霍华德）eds.，*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词典》），第4卷，56～58页。Britton, Roswell S.（罗斯维尔·S·布立顿），*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中国期刊新闻，1800—1912》），117页。赵书：《辛亥革命前后的北京满族人》，载《满族研究》，1989（3），16页。

[100] 八旗都统衙门档案，“教育”，698号，值年旗给满人镶红旗的信函，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北京女报》，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八日，3页。《东方杂志》，第4卷第11号，“教育”，256～257页（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

[101] 雷方圣：《荆州旗学的始末及其特点》，载《民族研究》，1984（3），58页。

[102]《东方杂志》，第4卷第9号，“教育”，202～203页（光绪三十三年九月）；第4卷第11号，“教育”，256～257页（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王笛：《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的兴起》，载《近代史研究》，1987（3），258页。

[103]《东方杂志》，第4卷第5号，“教育”，33～34页（光绪三十三年五月）。

[104] Bays, Daniel H.（裴士丹），*China Enters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ang Chih-tung and the Issues of a New Age, 1895-1909*（《迈入20世纪的中国：张之洞与一个新的时代，1895—1909》），127～128页。裴士丹指出，这一奏折的文本没有查找到。

[105] 张謇：《啬翁自定年谱》，58页。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311～312页。关于铁良和张謇之间的联系，见Chu, Samuel C.（朱昌峻），*Reformer in Modern China: Chang Chien, 1853-1926*（《近代中国改革派：张謇，1853—1926》），61、65页。

[106]《大清皇帝实录·光绪实录》卷546，8a、15a。关于绍英，见魏秀梅：《清季职官表·人物录》，188页。关于载泽，见《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9卷，192～197页。

[107]《辛亥革命》，第2册，382～385、432页。《民国人物传》，第2卷，46～49页，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197～204页。

[108]《东方杂志》，第2卷第12号，“杂俎”，77页（光绪三十一年十二

月)。

[109] 王家俭:《清末民初我国警察制度现代化的历程(1901—1928)》,35～38页。《民国人物传》,第2卷,182页。Brunnert, H. S. (布鲁纳特), Hagelstrom, V. V. (哈盖尔斯特罗姆), *Present Da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 (《当今中国的政治机构》),339、501页。

[110]《大清皇帝实录·光绪实录》,卷550,16b～17b。

[111] 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59～60页。Sun, E-tu Zen (孙任以都),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al Missions of 1905-1906" (《1905—1906的中国立宪运动》), in *Journal of Modern China* (《近代史杂志》), 1952, (24), 253～257页。潘崇雄:《端方与预备立宪》,载《思与言》,第22卷第5期,433～436页。

[112] Sun, E-tu Zen (孙任以都),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al Missions of 1905-1906" (《1905—1906年的中国立宪运动》), in *Journal of Modern China* (《近代史杂志》), 1952, (24), 260～262页。

[113]《东方杂志》特刊,"奏议",4～7页(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在重印装订本中,这一特刊被错误放置在第5卷的最后,位于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卷后。)

[114]《辛亥革命》,第4册,39～47页。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1258页。奇怪的是,这一重要奏折没有出现在《东方杂志》的奏议合订本中。

[115]《大清皇帝实录·光绪实录》卷562,4b,8a～9b。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1248、1257页。Sun, E-tu Zen (孙任以都),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al Missions of 1905-1906" (《1905—1906的中国立宪运动》), in *Journal of Modern China*, (《近代史杂志》), 1952, (24), 266页。

[116]《大清皇帝实录·光绪实录》卷562,9b～10a。

[117]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121页。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313页。潘崇雄:《端方与预备立宪》,载《思与言》,第22卷第5期,438～439页。

[118]《光绪朝东华录》,5559～5561页。

[119]《大清皇帝实录·光绪实录》卷564,11b～14a。

[120] 同上书,卷564,14b～15a。关于世续,见《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9卷,198～201页。

[121] 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291～295页。

[122]《大清皇帝实录·光绪实录》卷564,15b～16a。钱实甫:《清季重

要职官年表》，见杨家骆等主编：《新修清季史卅九表》，105页。至少有一种资料（老吏（化名）：《奴才小史》，14b），称吏部尚书鹿传霖是汉军八旗。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还有其他的说法（如：Hummel，Arthur W.（恒慕义）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清代名人传略》），299页）称十三名各部尚书中有九名，而不是八名是旗人。但是，其他一些更为权威的资料，包括《清史稿》卷438第12387页指出鹿传霖是直隶本地人，并没说他是汉军八旗。

[123]《民报》，第10号，57～65页（1906-12-20）。

[124] MacKinnon，Stephen R.（麦金农），*Power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Yuan Shi-kai in Beijing and Tianjin，1901-1908*（《帝国晚期的政治与权力：袁世凯在北京和天津，1901—1908》），81～82、114页。李宗一：《袁世凯传》，152页。

[125] Powell，Ralph L.（拉尔夫·鲍威尔），*The Rise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1895-1912*（《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216页。MacKinnon，Stephen R.（麦金农），*Power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Yuan Shi-kai in Beijing and Tianjin，1901-1908*（《帝国晚期的政治与权力：袁世凯在北京和天津，1901—1908》），82、114～115页。

[126]《政治官报》，宣统二年八月二十五日，8～9页。《东方杂志》，第4卷第1号，“杂俎”，1页（光绪三十三年一月）。

[127] 章伯锋、李宗一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1卷，92页。

[128] MacKinnon，Stephen R.（麦金农），*Power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Yuan Shi-kai in Beijing and Tianjin，1901-1908*（《帝国晚期的政治与权力：袁世凯在北京和天津，1901—1908》），82～89页。

[129]《大清皇帝实录·光绪实录》卷571，13a。军机处宪政专题档案，144号，袁世凯奏折中的备忘录，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九日。侯宜杰：《袁世凯一生》，93～94页。Powell，Ralph L.（拉尔夫·鲍威尔），*The Rise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1895-1912*（《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218、251～252页。《东方杂志》，第4卷第11号，“杂俎”，27页（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

[130] 侯宜杰：《袁世凯一生》，94页。《东方杂志》，第4卷第11号，“杂俎”，28页（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大清皇帝实录·光绪实录》卷575，18a；卷581，15b～16a。章伯锋、李宗一 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1卷，92～93页。Powell，Ralph L.（拉尔夫·鲍威尔），*The Rise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1895-1912*（《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

250 页。《北华捷报》，1907-11-08，353 页。MacKinnon，Stephen R.（麦金农），*Power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Yuan Shi-kai in Beijing and Tianjin，1901-1908*（《帝国晚期的政治与权力：袁世凯在北京和天津，1901—1908》），116 页。

[131]《民国人物传》，第 1 卷，58～61 页。Rankin，Mary Backus（冉玫烁），*Early Chinese Revolutionaries：Radical Intellectuals in Shanghai and Zhejiang，1902-1911*（《早期中国革命者：1902-1911 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147～148、164～171、178～185 页。王道瑞：《新发现的徐锡麟刺杀恩铭史料浅析》，载《历史研究》，1991（4）。

[132] 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 5 集，8 页。

[133]《清史稿》卷 469，12783～12784 页。

[134]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 5 集，85～87 页。

[135]《北京女报》，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三日，3 页。

[136]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405/175，no. 80，8 月 21 日 Jordan（朱尔典）致 Grey（格瑞）的信函。美国国务院档案，215/66-67，1907 年 8 月 9 日柔克义（Rockhill）致国务院的信函。关于吴樾的炸弹袭击给端方留下的心理阴影，见 Morrison，G. E.（莫理循），*The Correspondence of G. E. Morrison，1895-1912*（《莫理循通信集（1895—1912）》），624、721 页；《北京女报》，光绪三十年七月四日，5 页。

[137]《北京女报》，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十日，3 页。《北华捷报》，1907-08-23，431 页。

[138]《大清皇帝实录·光绪实录》卷 574，8a～8b。

[139] 军机处宪政专题档案，144 号，袁世凯奏折中的备忘录，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九日。《大清皇帝实录·光绪实录》卷 575，16a～17a。这份重要的长篇奏折并没有在袁世凯的奏议集（《养寿园奏议辑要》）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的文件集中。

[140]《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915～918 页。端方：《端忠敏公奏稿》卷 8，37b～41a。

[141]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 85，35b～36b。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 6，5b～6a。

[142]《大清皇帝实录·光绪实录》卷 575，19a。吴天任：《梁节庵先生年谱》，223～225 页。

[143]《大清皇帝实录·光绪实录》卷 576，1a～1b。

[144]《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257 页。

[145] 关于各种改革措施的比较分析，见 Rhoads（路康乐），“Assassination of Governor Enming”（《暗杀恩铭对晚清满汉关系的影响》），in Etō Shinkichi（爱图），Harold Z. Schiffrin（史扶邻）eds.，*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中国的共和革命》），10～19 页。

[146]《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916、919～921、938 页。

[147] 同上书，916、952、954 页。

[148] 同上书，917、921～922 页。

[149] 同上书，940～942 页。

[150] 同上书，257、926～931、948～949 页。

[151] 同上书，937～938 页。

[152] 同上书，943～944 页。关于熊希龄，见 Boorman，Howard L.（包华德），Richard C. Howard（里查德·霍华德）eds.，*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词典》），第 2 卷，108～110 页。

[153]《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939～940、946～948 页。

[154]《东方杂志》，第 2 卷第 1 号，“杂俎”，7 页（光绪三十一年一月）；第 3 卷第 2 号，“内务”，79 页（光绪三十二年二月）；第 4 卷第 7 号，“内务”，347～348 页（光绪三十三年七月）。Morrison，G. E.（莫理循），*The Correspondence of G. E. Morrison，1895－1912*（《莫理循通信集（1895—1912）》），354 页。《北京女报》，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155]《东方杂志》，第 4 卷第 7 号，“社说”，117～119 页（光绪三十三年七月）。

[156]《北京女报》，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十四日，2 页。

[157] 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 2 集，518～533 页。《大同报》，第 1 号，19 页（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十五日）。杨度：《杨度集》，411 页。田原天南：《清末民初中国官绅人名录》，304、382 页。

[158]《大同报》，第 1 号，13～21 页（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十五日）。

[159] 杨度：《杨度集》，411～412 页。丁守和：《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 2 集，518～519 页。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370～373 页。

[160]《大同报》，第 1 号，20 页（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十五日）。

[161] 同上书，第 5 号，4～5 页（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162] 同上书，第 1 号，76、90 页（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十五日）。

[163] 同上书，第 1 号，19、97～99 页（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十五日）；第 5 号，7～9 页（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164] 同上书，第 1 号，100 页（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十五日）。

[165] 杨度：《杨度集》，435～459 页。

[166]《大同报》，第 1 号，55 页（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十五日）；第 5 号，1～3 页（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关于乾隆皇帝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统治者的自我定位，参见 Millward，James A.（米尔沃德），*Beyond the Pass：Commerce，Ethnicity and the Qing Empire in Xinjiang，1759－1864*（《越界：清代新疆的种族和商贸（1759—1864）》），268～271 页。张羽新：《清代前期各民族统一观念的历史特征》，35～37 页。谢谢罗友枝提醒我关注米尔沃德的研究。

[167] 钱实甫：《清季新设职官年表》，54 页。

[168]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1282、1284、1286、1288 页。见 Bays，Daniel H.（裴士丹），*China Enters the Twentieth Century：Chang Chih-tung and the Issues of a New Age，1895－1909*（《迈入 20 世纪的中国：张之洞与一个新的时代，1895—1909》），190～192 页。

[169] 魏秀梅：《清季职官表》，60 页。

[170]《北华捷报》，1907－08－30，520 页。

[171]《大清皇帝实录·光绪实录》卷 578，4b～5b；卷 579，2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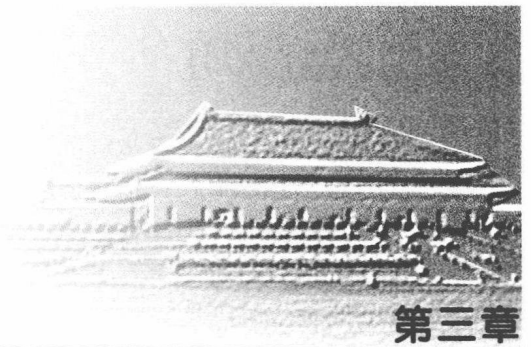
[172]《东方杂志》，第 4 卷第 7 号，“内务”，347～352 页（光绪三十三年七月）。

[173]《大清皇帝实录·光绪实录》卷 577，11b；卷 579，14b～15a。

[174]《北华捷报》，1907－10－18，153 页；1907－11－22，445 页；1907－12－20，720 页。

[175] 钱实甫：《清季重要职官年表》，见杨家骆等主编：《新修清季史卅九表》，106 页。

[176] 同上书，51 页。



第三章

载沣和“满人权势”

慈禧太后于1907年9月和10月两次颁布了关于各省驻防旗兵以及满汉关系的谕令，一年多以后，这位73岁的皇太后终于去世了，结束了她对朝廷半个多世纪的控制。在她的最后岁月里，她也曾努力推行这两个法令，但却没有机会看到其产生实效。于是解决满汉问题和其他事务的重任，落在了25岁的载沣肩头。由于在慈禧太后之前驾崩的光绪皇帝没有留下任何子嗣，慈禧太后选择了载沣的幼子溥仪继承大统，于是载沣就成了摄政王。这位前醇亲王以一名改革者的姿态开始了他的摄政生涯。但是，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最初那些良好的愿望全都化为泡影，因为他往往举棋不定（比如对满汉关系的处理），又不愿意顺应民意（比如屡屡与立宪派对抗）。而且，或许最糟糕的是，他不仅轻率地试图像慈禧太后那样加强中央集权，还想加强宫廷皇族的权力（例如组建一支由他直接控制的一个镇左右的新式宫廷卫队）。此外，在载沣摄政期间，他依然忽视了革命者的反满宣传活动，使清廷越来越成为满人的朝廷，这一趋势从18世纪中期以后就已经很明显了。

121

慈禧太后的最后岁月

慈禧太后在谕令中要求逐步解散各省的驻防旗兵，废除关于满汉隔离的各种法令，但这些措施实行起来有着相当的困难。她在对待立宪派的问题上也面临很多麻烦。立宪派为她关于设立议院的最新承诺而受到鼓舞，现在又开始鼓噪，要求尽快召开具有完全立法权的国会。在清廷宣布以 9 年为期实行“预备立宪”后不久，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而光绪皇帝自 1898 年之后
122 就被慈禧太后软禁。光绪皇帝驾崩之后，慈禧太后择定年幼的溥仪登基为帝，其父载沣被封为摄政王。

慈禧太后在 1907 年 9 月 27 日颁布的谕令要求逐渐解散各地的驻防八旗。就像光绪皇帝十年前颁布的谕令一样，这一谕令也在旗人中引起了大范围的不安。广州汉军八旗驻防副都统李国杰很快上奏提醒说，各省的驻防旗兵一旦知道自己不能继续领取饷银，肯定会变得混乱，他力谏朝廷慎重行事。副都统一向是旗人的职位，李国杰是最早担任这一职位的汉人之一。几个月后，热河都统廷杰证实，他的部队官兵在得知这一谕令后人心惶惶。

1908 年 1 月 18 日，成都的驻防八旗谣传说，朝廷将要颁布一道谕令立即停发军饷，并要求所有士兵自谋生计。这一消息马上引发了旗人的不安，并迅速演变成一场暴乱。数百名旗兵及其家属愤怒地聚集在绰哈布将军的官衙外，要求继续领取饷银。愤怒的人群捣毁了正堂的边门，还群殴了一名旗兵佐领。直到身为汉军八旗的四川总督赵尔丰赶到现场，向他们解释说一切都是谣言，旗兵的暴乱才平息下来。[1]旗人的焦虑并没有阻止慈禧太后推行改革的步伐。尽管广州的李国杰请求朝廷慎重行事，朝廷还是坚持了最初的立场。1907 年 9 月 30 日，朝廷重申了给旗兵分配土地以代替以往的军饷的方案，要求各省的地方官和驻防官员认真执行这一措施，同时要向所有受到影响的旗人解释这一谕令的正当意图，以减轻人们的担忧。1908 年 1 月 6 日，荆州驻防统领上奏质疑这一遣散政策的实施效果，但朝廷对此置若罔闻。[2]

然而，新政策的核心内容——在附近的农场重新安置八旗士兵——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尤其是在关内地区。一个接一个的驻防军报告说，基本没有什么土地可以用来安置遣散的八旗士兵；或者，即使有土地，通常也不适宜耕种。规模较小的河南开封驻防军声称，军队完全没有自己的土地或牧场。规模大得多的广州驻防军也面临同样的情况。在山东，青州和德州的驻防军有一些牧场，但是这些牧场要么不适宜耕作（如青州），要么已经被租赁出去（可能租给了汉人）。出租的土地也不能被收回，因为德州的军队还要依靠这些租金来改善军事装备。在成都，驻防军的土地共有 7 470 亩（约 1 250 英亩），但所有的土地都被出租，如果要收回这些土地，需要 20 万两白银的违约金。只有察哈尔和黑龙江的驻防部队说他们有合适的土地安置遣散的士兵，但都是在长城之外。很多不位于中原地区的驻防军也面临土地短缺。甘肃凉州和庄浪的驻防军分别在永昌和平番县有自己的牧场，但是这些土地很不适合耕作或居住。[3]

对于那些没有旗地来重新安置的地方，慈禧太后在谕令中要求驻防军以市场价购买附近农民的土地。但是这一权宜之计被证明同样不切实际。成都、青州、凉州等地的驻防军纷纷上报，当地的土地价格超过了他们的承受能力。例如，成都将军估算，他需要 2 万多亩（约 3 500 英亩）土地安置麾下的士兵。四川的土地价格为每亩 60 两～70 两白银，所以他一共约需要 130 万两银子，而他根本没有这么多钱。广州将军则暗示，即使他有足够的资金，也买不到足够的土地。他的军队共有 33 965 人，按每人 10 亩（1.7 英亩）的数量计算，周围的土地根本不够。（实际上，慈禧太后的谕令只是要给旗兵，而不是给所有的旗人分配土地，而广州驻防军只有 5 000 旗兵。此外，谕令中并没有规定分给旗兵土地的数量。）此外，北京 25 名满人领袖，在皇族成员文斌带领下，联合奏请朝廷，认为购买土地安置旗兵的措施会引起汉族地主的不满，对于缓和满汉矛盾将起到相反的作用。[4]

另一种措施是将各省的驻防军安置到边远地区。整个 19 世纪，都有人建议以此解决“八旗生计问题”，这次又有两三名官员

这样提议。直隶藩司增韫（蒙古旗人，　—1921）指出，虽然中原的土地昂贵而稀少，但是在边疆地区，土地却要便宜 500 倍～1 000 倍。署理宁夏驻防将军志锐（1852—1912）也建议，将驻防地区无地或少地的旗人迁到甘肃或黄河北部河套地区，以使这些人口稀少的地区得到发展。[5]然而，长途迁徙明显背离了朝廷谕令的初衷，谕令其实强调将驻防军的人口安置在邻近地区。政务处对于增韫和志锐的建议并没有积极回应。它宣称由于交通的困难，往西北移民是不现实的。但是，政务处也承认有另一个可行的方案，由于新建了铁路，可以将移民迁往东北地区，尤其是黑龙江省，因为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称那儿有大量未开垦的土地。但这种迁徙应该是完全自愿的，而非强制性的。[6]

由于大部分的驻防官员都认为 9 月份颁布的这个安置计划很不现实，他们开始寻求一些补救措施来实现这一目标，即让旗人经济独立，以推动地方驻防八旗的最终解散。在绥远，将军贻穀除了将 5 100 名旗人安置在附近并不怎么丰饶的 12 万亩（约 2 万英亩）土地上，还为驻防军采取了三种其他的经济发展措施。第一种措施是职业培训：建立工坊，教上百名年轻的旗人学习工作技能；设立织布制帽工厂，雇用 40 名孤儿、寡妇为军队生产衣帽。第二种措施是使军民接受教育：建立 18 所学校，包括一所中等军事学校和几所小学，这些学校共招收了 800 多名学生。第三种措施是军事服务：组建一个 120 人的部队，还计划组织警察力量。贻穀的措施并没有多少创新之处，这些措施只是将义和团运动后地方驻防八旗的各种改革加以系统化。然而，清廷还是命令将贻穀的措施转给其他驻防八旗作为参考。政务处认为“授田归农”是解决旗人生计问题的基本途径，也承认鼓励工业和发展教育同样重要。[7]

于是各地的驻防八旗仿效绥远将军贻穀的榜样，积极推行职业、教育和军事改革。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只是在以往措施的基础上稍微加以推进。山西太原的驻防八旗已经设置了一支常备军，并建立了一所高级小学，现在它计划为具备资格的旗人开设农业和工业培训课程（包括一个实验农场和工坊）。另外设有一个讲

堂，为那些不具备资格的旗人、孤儿、寡妇和旗人妇女提供一些基本的职业信息。河南开封的驻防八旗此前已经建立了工艺局和养蚕局以提供职业培训，有 800 余名旗兵接受了培训。现在，他们计划重新组织和扩大学校的规模，包括建立一所新的中学。热河驻防此前已将 1 000 余名旗兵（约占驻防军总数的一半）整编成 125
三支常规部队，现在计划将这些士兵重编为地方新军的核心力量。同样，热河驻防也筹划建立工坊，教那些没有编入部队的旗人如何织染。[8]

所有这些地方的改革措施都因为资金短缺而受阻。慈禧太后的谕令中本来承诺，安置旗兵的初期费用都由户部负担，可能由于重新安置被证明不切实际，朝廷后来几乎拒绝了所有要求中央提供财政援助的请求。朝廷虽然指示户部拨给绥远驻防 20 万两银子，察哈尔驻防 10 万两银子，但是政务处却隐晦地通知成都将军，各地驻防都要自己想办法解决财政问题。[9]由于资金短缺，改革进展缓慢。实际上，就在慈禧太后去世之前的 1908 年 10 月，据说她已经为此对军机处表示了不满。这时，朝廷下令让旗人“授田归农”已经一年有余，慈禧太后质问，为什么各地八旗驻防对谕令的执行几乎没有进展？[10]

慈禧太后掌权的朝廷在执行其他一些谕令时，还是颇有成效的，尽管这种效果依然很复杂。例如，她要求修订法律大臣和礼部分别废除满汉之间在法律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各种差别待遇。前者很快有了回复，后者却迟迟没有进展。三名修订法律大臣——包括沈家本（法部右侍郎）、俞廉三（前省级大员，他曾协助刺杀恩铭的徐锡麟获得安徽巡警学堂会办一职）、英瑞（满洲旗人，清末大理院正卿）——提出了两条法律改革建议。[11]其一，根据朝廷 9 月 27 日的谕令，在各省驻防解散后，将旗兵归为普通民人加以管理，这是沈家本最近上奏提出的方案。沈家本和他的两名同僚建议，这些旗人以后不仅在刑罚方面，而且在其他各个法律层面都应该和平民一体对待。而且，不仅是遣散之后的地方旗人，所有的旗人都应该和平民一样，接受正在建立的新的司法系统的裁决。唯一例外的是皇族，他们向来都由宗人府管理。但他们的

126 豁免权是暂时的也是部分的。他们暂时可以由大理院督理，而不受低一级的机构管辖。修订法律大臣的另一条建议同样得到了户部的支持，他们建议朝廷立即废除“旗民不交产”的禁令。他们指出，由于过去刑部和户部采取不一致的标准，因而这一禁令是否还有效，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无论如何，他们声称这一禁令对旗人很不利，因为这限制了旗人的经济机会。1908 年 1 月，朝廷批准了修订法律大臣的建议。[12]

表面上，这意味着满汉之间的法律差异被消除了。实际上，这体现了新的三级法律体制正开始发挥作用。满人逐渐和汉人受制于同样的司法程序。首先开始改变的是北京，1907 年 12 月在京师设立了京师高等审判厅。此外，在内城设立了三个地方审判厅。这些审判厅的规章都宣称对所有人开放，“无论旗汉官民”。[13]后来，当这一体制推广到有着旗人驻防的其他区域时，内政部建议这些城市的审判厅同样有权辖制当地的旗人。[14]

与修订法律大臣不同，礼部不同意任何改革。朝廷要礼部提出消除满汉习俗差异的措施，如，丁忧日期的长短，满人式的姓氏使用与否，在皇帝面前对自己的称谓语，妇女服装的样式，所有这些事项都引起了激烈反应。礼部的大臣对此争论不休。例如，对于丁忧的时限，皇族出身的尚书溥良支持采用满人的习惯守孝 100 天，另外两名同为汉人的礼部侍郎，却坚持不应改变汉人守孝 27 个月的习俗。[15]这一争论的结果，是礼部在当时没有提出任何改革措施。

在慈禧太后的最后岁月，她还要应付日益增多的政治改革派，这些人不满意朝廷在立宪改革上的拖延。1907 年秋天，慈禧太后下令成立资政院，也同意组建各省谘议局。但之后却再没有什么举措了。大概当时的官员正在考虑如何更好地继续下去。当他们
127 还在浪费时间时，朝廷却日益面对着来自下层的压力。三个激进团体组织了一次精心策划的运动，以推动改革的步伐。其中一个组织就是杨度的宪政讲习会，在杨度 1907 年 12 月从日本回国以后，这一组织从东京迁到湖南再到北京，并改名为宪政公会。另外一个组织是上海的预备立宪公会，以张謇、郑孝胥（1860—

1938）、汤寿潜（1856—1917）为首。第三个组织是梁启超在东京创建的政闻社，1908 年 4 月，其总部迁往上海（但是没有梁启超，因为他当时是不受清廷欢迎之人）。[16]具有改革思想的满人也进入了这三个组织。杨度的宪政公会就包括皇族成员恒钧，他是东京《大同报》的创刊主编，如前所述，该报与杨度有密切关系。张謇的预备立宪公会中有瑞澂（1863—1912），他是琦善（1790? —1854）的孙子。琦善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继林则徐之后在广州任钦差大臣。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时，瑞澂在武昌任总督。梁启超在北京的政闻社有长福，这名皇族成员在日本学习过警务，1903 年积极参与了东京中国留学生的拒俄运动。[17]

为了对朝廷犹疑不定的决策产生影响，这三个独立的组织统一起来，发起了一次历史性的游说行动。他们发现慈禧太后在 1907 年 7 月 8 日的谕令正好可以为他们的激进行为辩护，因为谕令中有向人们征求宪政改革的建议，这就为那些通常无权上奏的人打开了新的沟通渠道。这场运动在 10 月由杨度等人发起，仍以东京为运动的基地。他们派出四人代表团（包括恒钧）前往北京，向都察院呈递了据称代表着数千留日学生的请愿书，催促朝廷在一两年内建立“民选议院”以解决中国的内忧外患。关于开议院的益处，他们指出，议院将使满人和汉人拥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以消除满汉差异。议院也有助于中国五个主要的民族——“汉、满、蒙、回、藏”团结起来。当然，这些思想呼应了恒均在《大同报》社论中的观点。[18]在请愿活动之后，恒均没有返回日本，而是继续留在了北京。1908 年年初，他在北京创办了一份日报《中央大同日报》。和东京的刊物一样，这份日报也积极鼓吹宪政 *128*
和消除满汉差异。[19]（东京的《大同报》已经在该年 5 月底停止发行）。此时，杨度也已前往北京，和恒钧一起建立了宪政公会的分会。[20]

清廷希望将这次运动扼杀在萌芽状态，却没能取得成功。1907 年 12 月下旬，慈禧太后在一天之内颁布两道谕令，重申传统的禁令，不允许学生和普通民众插手国家政治事务。[21]这些谕令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请愿运动声势越来越浩大，此间报纸上

说，一些朝廷高官最终也在郑重考虑立宪问题。在1908年6月初，负责监管政制改革的宪政编查馆的成员，开始每天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当时居住的颐和园开会。[22]而且，他们现在讨论的不再是是否进行改革，而是何时进行改革。据说他们列出了长度不等的改革日程，从5年到20年不等。例如，资政院的两名总裁溥伦和孙家鼐提道，日本用了19年（1871—1890）才成功召开国会。[23]对于朝廷之外的立宪派改革者而言，别说19年，甚至5年都太长。张謇的预备立宪公会和梁启超的政闻社分别陈情宪政编查馆，敦促在两三年内召开国会。[24]

在7月底8月初，张謇的预备立宪公会开始主动协调此前无组织的请愿活动。结果，各种地方组织都发布了一系列言辞相似的请愿，并开始聚集于北京。到8月11日，这一活动达到了高潮，各省代表联合请愿要求提前召开国会。这些请愿者中有不少满人。来自八旗的代表团由皇族成员恒钧带头。直隶的代表团包括满人乌泽声，也来自《大同报》。吉林代表团由松毓带领，他在之前创立了吉林地方自治会。[25]

对于这一空前的社会风潮，清廷一方面严厉镇压，另一方面也做出了一定让步。在联合请愿之后几天，朝廷下令取缔梁启超的政闻社，并逮捕社团成员。因为该社“以研究时事为名，行煽动叛乱之实”。两个月之后的11月11日，清廷又解散了松毓的吉林
129 地方自治会，因为这个组织也参加了请愿活动。[26]但是，朝廷并没有对这次活动中的另外两个主要社团：张謇的预备立宪公会和杨度的宪政讲习会采取行动。相反，杨度还很快进入朝廷供职。早在4月，在大学士张之洞和袁世凯的联合举荐之下，杨度就被任命为宪政编查馆提调。直到清朝结束，他一直都是君主立宪制的大力支持者。[27]

杨度在朝廷供职似乎预示着，朝廷对于请愿活动中的一些要求也有一定的回应。8月27日，在联合请愿之后两周，慈禧太后以自己的名义第一次同意为实施宪政定下最后期限。她也同意了宪政编查馆提出的两份议案：《宪法大纲》和设立议院的九年计划。《宪法大纲》的指导原则就包括“融化满汉畛域”。九年计划

中，第一年（1908 年）的任务之一就是创建“变通旗制处”，这一机构的双重任务就是“筹办八旗生计，融化满汉事宜”。[28]当然，长达九年的立宪时间表让请愿者们非常失望，他们都希望在两三年内召开国会。但是，之前曾经提出在三年内召开国会的杨度却替朝廷辩解，希望大家能给朝廷一些谨慎行事的余地。[29]

慈禧太后宣布立宪时间表，这是她去世之前最后的重要举措之一，因为不到三个月后她就离开了人世，那一天是 11 月 15 日，也是她的侄子光绪皇帝驾崩后的第二天。两人的死亡从一开始就引起了很大的猜疑。年轻的皇帝和操控他的慈禧太后在一天之内相继去世，这实在太过巧合，令人难以置信。一直有传闻说 37 岁的皇帝是被谋杀的——或者，至少他死得太仓促——为的是不让他在慈禧太后死后重新控制政权并报复那些支持慈禧太后的人，尤其是那些在 1898 年变法活动中站在慈禧太后一方的人（例如袁世凯）。[30]由于慈禧太后控制下的清廷谋杀已成风气，所以这一猜疑很容易让人相信。确实，有两位学者仔细研究了皇帝的起居注，找到一些佐证：“1908 年的起居注中关于光绪的死亡有很大的疑问。官方的记载中，光绪在那段时间经常观看京剧演出，直到他驾崩之前几天，他的身体状况一直很好。”[31]然而，最近以来，研究者利用了光绪皇帝的原始医疗记录，包括各位医官的诊断记录和处方，相当令人信服地表明这位皇帝可能确实是因为生病而自然死亡，也是死于对外宣布的时间。至少在去世前一年，光绪皇帝就已经疾病缠身，到 1908 年春天，病情开始恶化，他的医官们都认为难以康复。在他去世前 5 天的诊断记录中，没有任何中毒之类的病情迹象。11 月 13 日半夜，光绪皇帝突然昏迷。到第二天晚间就在紫禁城驾崩。死亡原因是心肺衰竭。[32]总之，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实那些谣传：光绪皇帝实际上是死于慈禧太后之后，并且是因为政治原因而被谋杀。

当光绪皇帝病重之际，慈禧太后虽然病体虚弱，还是为他选定了皇位继承人。这种最后关头的重要决定在整个清朝都不少见。鉴于康熙皇帝在 18 世纪初期因为指定了皇位继承人反而麻烦不断的教训，后来的每位帝王都在临终之际才宣布由谁继承大统。和

之前的同治皇帝一样，光绪皇帝也没有子嗣。按照清朝以及儒家的传统，他的继承者应该来自下一辈的宗亲，也就是名字以“溥”字打头的皇室成员。慈禧太后至少考虑了四个候选人：溥伦，溥伟（1880—1937），载振一个不知名的儿子，还有就是溥仪。资政院的总裁之一溥伦是四人之中年纪最大的，在1875年，他就曾经被考虑作为同治皇帝的继承人。溥伟28岁，是奕䜣的孙子，1898年奕䜣去世后，他继承祖父爵位成为二等王公。载振那个不知名的儿子可能是溥忠（1897— ），他当然也是权倾一时的亲王奕劻的孙子，但是在四个人中间，他是和皇帝关系最远的宗亲。此外，两岁半的溥仪是载沣的儿子。[33]慈禧太后在和军机大臣商议之后，最终选择了溥仪作为皇位继承人。根据袁世凯向英国使团提供的信息，慈禧太后是在11月13日早上做出的决定，当时光绪皇帝的病情已经恶化。那天晚上，她颁布懿旨，宣布溥仪要送进宫廷抚养并接受教育，同时还册封溥仪的父亲载沣为“摄政王”。当光绪皇帝在第二天去世之后，溥仪就成为清朝历史上第十一位皇帝，继承同治皇帝，兼祧光绪皇帝。[34]

回头来看，慈禧太后选择溥仪继位、载沣摄政，这也是预先注定的。慈禧太后和溥仪的祖父奕谟关系相当不错，奕谟是慈禧太后的妹夫，1875年，慈禧选择奕谟的儿子载湉继承同治皇帝的皇位，当时引起很大争议，这使得慈禧太后一直觉得欠了妹夫一个人情。选择载湉继位违背了王朝传统，也不符合儒家规范，因为载湉和同治皇帝是同一辈的人。然而，这样的安排却使得慈禧太后可以恢复她实际上的摄政地位，并延长她对朝廷的控制。溥仪的父亲载沣生于1883年，比光绪皇帝小12岁，是光绪皇帝的亲弟弟。奕谟在1891年去世，载沣承袭了父亲的爵位，成为醇郡王。他第一次显身于政治舞台是在1901年，作为钦差大臣前往德国，向德皇致歉。第二年，他娶了荣禄的女儿为福晋，这位福晋在1906年2月生下长子溥仪。溥仪出生后不久，就成为光绪皇帝的首选继承人。实际上，在他出生之前，埃德蒙·白克浩斯（Edmund Backhouse）就向莫理循预言：“如果醇亲王意外有了儿子，肯定会继承大统。”[35]正是在溥仪出生以后，当时23岁的载沣开

始在政治上获得快速提升。6个月后他得到生平第一个实职，负责主持一个特别机构以评议立宪考察团的结论。1907年5月，他和大学士孙家鼐一起负责调查对奕劻和他的儿子载振腐败和滥用职权的指控。这次调查的结果是载振被免去了农工商部尚书的职位（对载振的弹劾可能也注定了他儿子失去入选皇位继承人的机会）。[36]一个月后的1907年6月19日，载沣被任命为军机处行走，并在1908年2月2日成为军机大臣。[37]换句话说，载沣在政治上的升迁，似乎也预示着溥仪最终将成为皇位继承人。

溥仪在他的自传中承认，慈禧太后选择他继位主要是因为他父亲，就像之前的奕譞，慈禧太后也希望载沣温顺驯良，使她可以继续“垂帘听政”。溥仪写到：“我不相信她在宣布我继承皇位的时候，会想到自己已经病入膏肓。”载沣的弟弟载涛（1887—1970）同样认为，载沣一向优柔寡断，选中他是因为他会顺从慈禧太后，使她能够像以前那样操控政权。[38]于是，在11月14日，当载沣的儿子被宣布为皇位继承人之后，慈禧太后在载沣一天前刚刚获得的摄政王头衔前加封“监国”二字，让他在儿子未成年之前掌管军政大权。但载沣的权力只能在慈禧太后的指导下实施。[39]这个时候，慈禧太后的身体状况却已经难以支持，到11月15日下午，慈禧太后与世长辞。

犹豫与退却

载沣在他的儿子作为宣统皇帝（图8）在位的三年期间一直摄政，除了最后的两个月。现在要由他来将慈禧太后在去世之前关于筹备宪政和改善满汉关系的承诺继续下去。摄政的最初两年，他在筹备宪政方面表现得相当不错，但满汉关系方面却乏善可陈。

慈禧太后的去世使载沣得以摆脱她对摄政权力的限制。1908年12月13日，在载沣摄政之后的一个月，他发布了一个长达十六条的《监国摄政王礼节总目》，详细规定了他作为摄政王的特权。其中第二条重申了他的权力，决定一切军政事务，包括对所有官员的任免赏罚之权。第五条称他作为摄政王拥有指挥国家所有海陆

图 8　约为 1908 年的载沣（怀抱溥杰）和溥仪
（Bland（布兰德），Backhouse（白克浩斯），
China under the Empress（《慈禧外传》），4 页）

军队的至高权力。但是，摄政王虽然位高权重，但他还必须和他的嫂子，光绪皇帝的遗孀隆裕太后在朝中共同分享一些大权。和她的姑母慈禧太后不同，隆裕太后（1868—1913）不能够“垂帘听政”。但是，根据十六条的《监国摄政王礼节总目》，载沣承认自己负责的一些重要和重大的事情需要由隆裕太后颁布懿旨来决定，但是只有他有权和隆裕太后商议这些事情。在 1912 年清帝退位谈判的最后阶段，隆裕太后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在此之前，她主要还是待在幕后。[40]

国内外对于载沣担任摄政王的最初反应都是很正面的。英国汇丰银行总办熙礼尔（E. G. Hillier）认为载沣是一个“认真的年轻人，诚实清白，为人正直，对自己的国家充满真挚的热情”。一名在北京的美国传教士教育家何德兰（Isaac Taylor Headland，1859—1942）也说载沣是“当时情况下最明智的人选”。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W. W. Rockhill，1854—1914）也对载沣印象不错。他认为载沣在1901年担任专使前往德国致歉时“表现了出众的能力和巨大的勇气”，在他任职军机大臣期间“判断明智，为政宽宏”。[41]

立宪派对载沣的期望很高，尤其是在载沣似乎（按照后来共和党人的说法）要为1898年的改革“翻案”时。载沣担任摄政王之后的第一个举措就是除掉袁世凯，袁世凯的军事支持曾是慈禧太后取得政变胜利的关键。据说，除掉袁世凯也是光绪皇帝临终的遗命。1909年1月2日，载沣以袁世凯患“足疾”为由，突然颁布谕令解除这位强势官员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一切职务。[42]在袁世凯解职之后，载沣又继续肃清了中央和地方机构中袁世凯的一批支持者。例如，徐世昌在2月份从重要的东三省总督职位调任邮传部尚书，在北京协办警务的赵秉钧3月份被解除内务部右侍郎一职。袁世凯在北洋军旧部中的影响也同样被逐渐消除。铁良担任陆军部尚书后，将袁世凯的很多旧属解职，代之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比如和袁世凯没有什么私人关系的吴禄贞（1880—1911）。[43]但是，袁世凯在朝中的最大靠山——奕劻所拥有的实权职位却并没能被解除。当御史江春霖在2月份参劾奕劻时，朝廷却宣布这一指控毫无根据，要求撤销这一弹劾。江春霖拒绝接受，于是被解职。奕劻的庆亲王爵位在载沣摄政之初就已经被封为世袭罔替，现在更是位高权重，前所未有。[44]

袁世凯和他的追随者被解职，是因为当时朝廷正着手为戊戌变法中的政治受害者平反。1904年6月，慈禧太后就发布谕令宽恕了所有在1898年事件中受牵连的人——除了康有为、梁启超（还有孙中山）。尽管有这样的谕令，一些官员，包括翁同龢（1830—1904，光绪皇帝的老师）和陈宝箴（1831—1900，湖南巡

抚），也未能完全免罪。在翁同龢和陈宝箴的支持者的要求下，载沣于1909年7月和1910年1月分别下令，恢复了他们两人生前的最后职位。[45]同样也有人希望朝廷赦免戊戌变法的主要领导人——康有为和梁启超，却没有成功。最初的反对意见来自张之
134 洞，他和袁世凯一样是反对变法的。张之洞是军机大臣，当时一份满人创办的反慈禧太后的报纸《大公报》，在1909年7月称他是康、梁复职的主要障碍。直到张之洞于10月6日去世之后，要求赦免康、梁的言论再次重提，但是载沣不能也不愿意推动1898年变法事件的最终平反。于是，康、梁始终没能在清朝复职。翻译家严复（1853—1921，当时是资政院议员）在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之后的一个月写信给莫理循，指出载沣在摄政初期没有特赦康、梁并允许他们返回国内，这是一个错误，因为这打击了立宪派改革者的热情。严复认为，如果载沣这么做了，那么“现在的一切都不会发生”。[46]载沣对戊戌维新中改良派的处置显示了他的优柔寡断。这也是他的哥哥载涛所说的为什么慈禧太后选择载沣作摄政王的原因。这一性格特点在他三年的摄政期间也表现得很明显。

如果说立宪派因为载沣在赦免康、梁的问题上优柔寡断而气馁，那么另一方面，他们也因为载沣坚持慈禧太后的九年立宪计划而感到振奋。载沣在执政不到三周之后的1908年12月3日，公开确认要执行这一计划。[47]1909年，按照计划所要求的，他下令各省组建谘议局。谘议局在那年夏天分两个阶段选出来，10月14日各省谘议局按期同时正式成立（除了新疆）。一年以后，1910年10月3日，各省谘议局召开第二年议会，载沣按照立宪计划正式成立资政院，召开了第一届议会。

1909年到1910年相继成立的谘议局和资政院中包括了相当数量的旗人，它们一旦成立，就为讨论满汉问题提供了另外一个平台。正如谘议局的决议草案中提到的，议会是在朝廷承诺“消除满汉差异，逐步废除八旗制度”的情况下召开的，那么，是否应该有一些特殊的规定来保证少数满人人口的利益？草案决定对关外和关内地区要区别对待。在东北三省，旗人和汉人可以同等对待，所以，在这些地区的谘议局，不需要特别为满人保留位置，

以之作为消除满汉差异的榜样。但是，旗兵驻防所在的关内各省，都要在谘议局中为旗人保留特别的位置。于是，直隶的 140 个议员席位中有 10 个特别席位是留给京师旗人的，还有两个位置留给 *135*
京畿地区最大的驻防部队——密云驻防。其他的省份也在谘议局中同样预留 1～3 个特别席位给当地的驻防八旗。按照规则，这些特别席位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但是，上海《东方杂志》的编辑孟森（1868—1938）批评这一制度不利于“旗汉渐生共同关系”，而且容易使人怀疑朝廷有意重组八旗制度。[48]

在关内各地，1909 年各省谘议局中驻防八旗议员的选举，和其他人群是基本相同的。无论是旗人还是汉民，投票和获选的教育和经济资格都是一样的。同样，八旗驻防的选举时间一般也和邻近区域相同。但是，旗人和汉民在选民和候选人的比率方面却有很大的差异。例如，在广东省，平均 1 556 人选举一名议员，但是在广东的驻防八旗，每 123 人就可以选举一名议员。[49]总之，满人在关内各地的代表比率是很高的。另一方面，在旗人和汉人选举程序相同的东北地区，谘议局中满人代表所占比例还是超过了满人的人口比率。从当时议员的名单中就可以看出，奉天谘议局的 53 名议员中有 7 名是旗人。同样，吉林的 30 名议员中的 6 名，黑龙江 30 名议员中的 5 名都是满人。[50]

最后，满人议员和汉人议员的社会背景都差不多。大部分都是士大夫精英。山东谘议局的 3 名满人议员，2 名来自青州驻防，1 名来自德州驻防，都是生员。同样，根据宪政编查馆没有公开的档案，河南谘议局 1 名来自开封驻防的议员就是 1 名举人。四川谘议局中来自成都驻防的 2 名议员都是举人，1 名出自科举，另 1 名出自翻译科。福建谘议局中 3 名来自福州驻防的议员，1 名是举人，1 名是翻译科举人，1 名是生员。直隶谘议局有 12 名满人议员，他们包括 1 名举人，6 名生员，1 名贡生，4 名低级的京官（3 名笔帖式，1 名知事）。[51]

1909 年 10 月各省谘议局召开第一次会议，很多议员充分利用 *136*
这个新的公共论坛，将满汉关系纳入他们的议题。山东谘议局考虑“通过职业计划减少满汉差异，提高旗人的谋生能力”。浙江谘

议局通过激烈争论，否定了将杭州驻防军的荒地改为市场的提案。直隶谘议局讨论并同意了不在其常设机构中为十二名满人议员保留特别位置，公开的理由也是“消除满汉差异”。[52]最为激烈的满汉论争发生在广东谘议局第一次会议中。这次争论的中心问题和浙江谘议局的情况差不多，是关于是否同意一些旗人在谘议局会堂前的校场上开辟一个市场。汉军八旗的崔镇是谘议局三名满人议员之一，他辩护说市场可以帮助旗人自谋生计；但另一些人却抱怨说这个市场阻碍了通往谘议局会堂的道路，应该被拆除；还有人提出，市场所在的校场属于公共地域，不应该只为旗人的利益服务，他们主张，这些公共场所中的私人设施有悖于现在朝廷实行的“消除满汉差异”的政策，他们明确警告说，如果驻防八旗坚持制造满汉隔阂，那中国的未来将不会如旗人所愿。最后，除了崔镇之外，所有 27 名议员都投票反对市场的设立。后来，驻防八旗的官员也同意把市场设在别处。[53]

尽管满人在各省谘议局中只有少数议员，但是相对于其人口比率而言却是很高的。在资政院中，满人的比例更高。根据规则，资政院 200 名议员中的一半席位由皇帝指定，另一半由各省谘议局推选。钦选议员由载沣在 1910 年 5 月确定，这些人来自 7 类人群，其中有 40 名满人议员，46 名汉人，还有 14 名其他人。40 名满人中包括 16 名宗室王公世爵（如奕劻那有失体面的儿子载振），6 名宗室觉罗，12 名满汉世爵中的 7 名，32 名部院衙门中层官员中的 11 名（其中 1 名是皇族成员长福，时任外务部郎中，他于
137 1901 年到日本学习警务，还曾经在 1907—1908 年参与梁启超的政闻社）。钦选议员中的 46 名汉人议员中包括 5 名世爵，21 名部院衙门中层官员，10 名硕学通儒（如法学家沈家本，翻译家严复），10 名纳税多额者。另外 14 人来自蒙古、回部和西藏，都是外藩王公世爵。各省谘议局所选出来的 100 名议员，可能只有 3 名满人（从名字来看），分别来自东北 3 个省份。而 200 名资政院议员中共有 44 名满人，包括资政院总裁溥伦。但正如杭州驻防一名具有改革思想的年轻的满洲旗人金梁略带苦涩地提到的，在资政院钦选议员中占有指定席位的七类人群并不包括八旗。这样，与在各省

谘议局不同，资政院中的旗人代表其实代表着其他选民。[54]

如果说载沣严格依循了慈禧太后制定的立宪时间表，那么他在贯彻慈禧太后关于“消除满汉差异”的承诺方面就远没有那么认真。慈禧太后在去世之前承诺朝廷会采取四个步骤来消除满汉差异：在九年计划中的第一年建立变通旗制处；逐步废除各省驻防旗兵的军饷，将旗兵及其家属安置在附近的农场，以此作为解决八旗生计问题的长久之策；逐步裁减各省驻防八旗，并最终完全废除八旗制度；最后，消除满汉在社会和法律方面的差异。

在处理满汉关系方面，载沣迅速迈开了似乎很有希望的第一步。1908 年 12 月 17 日，在执政一个月之后，载沣设置了变通旗制处，这也符合这一机构建立的最后期限。这个机构的主要目的就是在 1915 年之前“筹办八旗生计，融化满汉事宜”。为了通过军机处监督这一工作，他任命了溥伦、载泽、那桐和其他三名满人大员负责，并催促他们不得迁延误事。[55]然而，变通旗制处设立之后就基本没有什么活动。在设立之初，变通旗制处只是把原来一些消除满汉差异的建议重复了一遍。例如，把满人的姓改为类似汉人的姓，鼓励满汉通婚，给各类旗人机构发布命令要求上报最新的人口数据和田产统计。这些都是重新安置旗兵时所需要 *138*
的。据称它还督促各地的八旗驻防建立自己的变通旗制处，但此外就没有什么作为了。《东方杂志》密切关注立宪进程，在该报的报道中，变通旗制处连续几个月不见任何动静。据说，甚至摄政王也不止一次对变通旗制处的低效率感到失望。[56]

但是，如果说谁要为该机构的懈怠负责的话，那应该是载沣自己。因为在实行了慈禧太后关于改革满汉关系的四项改革承诺的第一项之后，他也阉割了其他三项措施的精华，使得该机构无所事事。1908 年 12 月 17 日，他发布谕旨设置了变通旗制处，这在旗人中间引起了一定的恐慌，很多人再次认为这是准备要停发旗人的钱粮。1907 年末，慈禧太后在面对同样的情况时立场很坚定。但是载沣却在类似的情形下退缩了。9 天以后，12 月 26 日，载沣发布了另一道谕旨，声称自己之前的命令不是很“清楚”。他会确保所有的旗人都可以继续领取朝廷发放的钱粮，他告诉他们

变通旗制处不是要限制旗人的津贴，而是要找寻供养旗兵、帮助旗人自强自立的方法。[57]

毫不意外，由于这些含糊的指令，变通旗制处并没有在解决长期以来的八旗生计问题方面发挥领导作用，这是慈禧太后承诺的四项改革中的第二项。后来，解决八旗生计问题还是成了各省旗人官员的责任。例如，南京驻防八旗将军清锐由于缺乏必要的资金，似乎想要自己推行慈禧太后的旗人政策。1909 年 4 月，他草拟了一套措施，结束了对旗兵的配给，命令他们开辟“农垦地”以自谋生计。然而，当这一消息传到其他驻防八旗时，引起了不小的骚动。杭州驻防八旗“绅学界”发了一份电报给清锐，指责清锐将国家“美善之政策”（“消除满汉差异”?）变成了“灭种之惨祸”。作为回应，清锐向这些批评者们保证，这些措施只是一个草案，实际上并没有发布。[58]

在其他地方，包括北京和各省驻防八旗，当地的八旗官员和个人采取了各种措施来解决旗人经济状况持续恶化问题，和之前
139 一样，这些措施往往包括职业教育、军事训练和重新安置。例如，在北京，度支部左侍郎绍英（曾为出洋考察宪政大臣之一，但因为吴樾的暗杀举动而受伤，未能成行）拨出一定的基金——包括农工商部的基金——为旗人妇女建立一所手工工场。这个工场建在内城的西南角，名为首善第一女工场，开办于 1909 年 1 月。它为旗人妇女提供两种免费课程教育，每种招收 80 名学员。一种是三年期的全面课程，招收 12～15 岁的女子；另一种是一年期的速成课程，招收 16～25 岁的女子。两类课程的毕业生都可以到其他职业学校授课，或者进入工场工作。[59]

地方的八旗改革中最系统也最有成效的是奉天，徐世昌和锡良任东三省总督时，任命杭州的旗人金梁担任旗务司使[60]，在金梁的管理下，旗务司在奉天的各驻防城镇建立了不同的工厂，提供一年期和半年期的教育课程，教授旗人各种职业技能。最大的一个八旗工艺厂在 1909 年年初设立于盛京，招收 500 名年轻旗人男子，另外还在锦州设立了一个分厂，训练了辽西走廊的数百名旗人。两年后，又建议在辽阳和牛庄设立另外两个附属工场，解

决当地的旗人生计问题。同时，盛京还建立了八旗女工传习所，指导了100余名妇女学习织布、编织、缝纫和织锦。这个传习所迅速取得成功，几个月后就安排了新的地址并扩大了规模。[61]在设立职业学校之外，金梁还建议在盛京创办八旗满蒙文中学堂，1910年春开始从旗人子弟中招收200名学员。[62]虽然军事改革并不是金梁的职责，但他还是找到理由征募和训练了一个标（团）的旗兵，名义上是提高盛京附近三个皇陵的护卫安全。金梁按新军的模式，要求招募的士兵必须是学校毕业生。他后来称这一批士兵是盛京地区训练得最好的部队。[63]金梁掌管的旗务司还鼓励旗人迁居：作为一个试验计划，盛京在1910年将300户旗人家庭迁往长白山区新设立的吉林安图县，给每户提供3间房屋，500亩（约80英亩）土地，还有耕牛、粮食、种子和迁移的路费。[64]最后，金梁的旗务司在1911年计划在盛京建立一个“八旗兴业银行”，但是，这个机构并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顺利将旗人的田产转化为资本。[65]

载沣在1908年12月26日颁布的那份更“清楚”的谕旨，再次体现了他对慈禧太后之前承诺的退缩。慈禧太后答应“解决八旗生计问题”，还承诺解散各省驻防八旗甚至是八旗制度本身。载沣这种态度引起了民众的焦虑。北京最具改革思想的报纸《中央大同日报》（和东京的《大同报》是同一批人创办的）在评论变通旗制处时，承认继续发给旗人钱粮是为了缓和旗人不满的一种政治需要，但也同时希望这一策略不会延缓废除八旗制度的计划。和东京的《大同报》一样，《中央大同日报》也主张废除八旗制度是推行宪政的先决条件。如果八旗制度不能迅速被废止，那么到了九年计划结束时，满汉差异也不能真正消除。[66]但是，这些批评意见并没有对变通旗制处产生什么明显的影响。

最后，对于消除满汉差异（慈禧太后四点承诺的最后一项），载沣的作为同样不尽如人意。例如，他继续并扩大了慈禧太后在东北的一些行政措施：废除了大部分现有的副都统职位，使得东北地区的旗人归地方行政系统管理，而之前，旗人都是由本系统的旗人官员管理。在东北三省的谘议局中，也并没有为旗人留出

特别位置。在处理满汉关系方面，东北为全国其他地区做出了一个示范。但是，在这一方面，载沣的行动也并没有超出慈禧太后已有的措施，因为在东三省进行的改革并没有扩展到关内地区，各省驻防八旗的职位都没有被撤销。[67]

另外一些实例中，载沣不仅没有超越慈禧太后的措施，甚至还有一些倒退。1908 年 1 月，慈禧太后同意了修订法律大臣的建议，将大部分旗人纳入新的司法管辖系统之中，与汉人适用同样的法律。载沣延续了这一重要的改革，但是并没有将这一措施适用于皇族成员。考虑到皇族成员的尊贵身份，慈禧太后也同意采取临时措施，将皇族成员作为特殊人群，其法律纠纷不像普通民众那样由地方上的审判裁决，而是由大理院直接裁决。然而在
141 1910 年年中，宗人府拒绝将皇族的管理权移交给大理院。载沣屈服于那些反对者，颠覆了慈禧太后的决议（也是他自己之前的决议），也就是没有同意修订法律大臣最初的方案。于是，皇族成员继续由宗人府管理。当然，他们的待遇和汉人不同，甚至和其他旗人也不相同。[68]

修订法律大臣对慈禧太后消除满汉差异的要求做出了迅速的回应，但是礼部却因为内部意见的分歧而迟迟不能做出决议。直到 1909 年 3 月 25 日，礼部就丁忧期限上奏时，依然没有达成统一意见。由于满汉通婚的禁令已被废除，满汉官缺名目之分一定程度上也已不复存在，八旗体系也即将改组，因而礼部尚书（不太确定地）断言，唯一尚存的满汉差异就是满汉丁忧期限的不同，汉人官员需要守孝 27 个月，满人却只要守孝 100 天。礼部的官员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满人出身的尚书希望统一为满人习惯，但是两名出身汉族的礼部侍郎却极力反对。最后，汉族官员的意见明显占据上风，因为礼部上陈的奏折中建议以汉族的习俗守孝 27 个月。载沣在同一天的谕令中批准了礼部的建议，命令此后所有满汉官员在丁忧期间都要去职守孝 27 个月。在新政策颁布之后，至少有三名满人官员按规定立即去职丁忧。[69]

然而，载沣再次做出了一个退缩的决议。在宣布满汉统一丁忧期限的谕令中，他又提出了一个变通的方法：所有重要职位的

官员可以申请例外免除，不必去职。结果，很多官员都在丁忧期间向朝廷申请不去职，并得到了允许。其中至少有一名官员是汉人（王士珍），其他的主要都是满人，包括那桐（军机大臣）和毓朗（京旗步军统领）。[70]这也表明载沣关于同意满汉丁忧期限的谕令，对大多数官员都没有产生实际作用。除了某些例外情况，大多数旗人官员利用了谕令的例外优遇，基本还是依循了满人的传统只丁忧 100 天，而大多数汉族官员依然和从前一样，去职丁忧 27 个月。

关于官员在奏折中的自称问题，载沣的立场同样前后不一。 142
1910 年 3 月 10 日，他向文武百官颁布谕令，无论京师、地方，满、汉，军、民，此后都统一按汉人的传统，自称为“臣”。他解释说，这一改变将在预备立宪期间消除不公，以示朝廷对平等一致的重视。和之前一样，载沣几乎立即提出了折中的办法。在颁布谕令的第二天，他又发布了另一道有点让人困惑的谕令，宣称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满员可以继续自称“阿哈”（满语意为“奴才”）。[71]虽然，满人官员从此以后大都自称为“臣”，而不再自称“奴才”，然而，满汉官员自称方面的区别始终没有完全消除。

总体而言，载沣在摄政的前两年间，一直在积极坚持慈禧太后的改革政策，如制定九年的预备立宪期，解决“八旗生计问题”以及“平满汉畛域”。在行动上，他的确也实施了四项具体目标的第一项，在 1908 年年底建立了变通旗制处（同样也遵守了立宪时间表的要求）。至于其他三项具体目标，载沣的作为却相当有限。他背离了慈禧太后关于停发旗兵军饷的明确初衷，他也明确表示无意解散各地驻防旗兵，更不用说废除八旗制度。在“平满汉畛域”方面他也少有作为。他最多只是延续了慈禧太后已经开始的几项改革，几乎没有什么自己的创新。最糟糕的是，他取消了一些慈禧太后已经开始的事业。由于这些“不作为”的情况，我们很难不同意载沣的批评者们对他的评价：他的最大问题在于优柔寡断，有时还因患得患失而自相矛盾，屈于形势。然而，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摄政王在他所关心的事情上，也果敢决断。

军事和政治的集权化

正如刺杀恩铭的徐锡麟和其他批评者所指出的，慈禧太后新政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加强军事和政治集权，扭转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半个世纪以来中央权力逐渐下移到地方的局面。慈禧太后加强中央集权的高潮是在1906年年底，当时直隶总督袁世凯被迫
143 将他亲自组建的北洋新军六镇中的四镇交由陆军部管理。然而，这一军权的转移虽然明显加强了中央集权，却并没有能够加强宫廷的权力。例如，朝廷的防卫还要依靠禁卫军，禁卫军以旗兵为主，属于陆军第一镇，受制于陆军部而不是由朝廷直接管理。在担任摄政王之后，载沣不仅打算加强中央集权，而且希望进一步强化帝制。

慈禧太后在19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强化帝制的努力，她打破了清中期以来不允许亲王参与朝廷政务的传统，但到了载沣摄政时期，这一倾向更加明显。载沣重组了最高军事管理层，新建了宫廷禁卫军，复兴了海军，将所有军权都直接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他很倚重满人大臣，尤其是皇族的弟兄。例如他那两个资历尚浅的同父异母弟弟载淳（1885—1949）和载涛都得到了重用。由于他对旗人如此倚重，以致很多当时的外交官和记者，以及后来的历史学者都称当时是“满人集团”和“满人专权”。但是载沣并没有被批评者或当时的暗杀风潮，包括对他本人的暗杀所阻挠。与在处理满汉问题上的犹豫不决相反，他在这个问题上却显得异常坚决。

和慈禧太后一样，载沣也一直试图加强中央集权，尤其是军权。1910年9月26日，他颁布谕令将北洋六镇统归陆军部管辖。而此前，通过铁良的汉军亲随凤山所掌管的京畿督练公所，陆军部只是在1906年从袁世凯手里接管了北洋军四镇（北京的第一镇和第六镇，东北的第三镇，山东的第五镇），直隶的第二镇和第四镇还是由当地的总督辖制，甚至在袁世凯被召回北京又很快被解职期间，情况依然如此。载沣在1910年谕令将北洋军六镇都交由

陆军部“直接指挥”。京畿督练公所被撤销，其长官凤山调任荆州驻防，后又调往广州驻防，不久被革命党人暗杀。[72]

然而，载沣不仅仅要重新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还包括宫廷的权力。根据慈禧太后颁布的《宪法大纲》，皇帝的特权之一就是要“统率陆海军及编定军制”。大纲还进一步指出：“君上调遣全国军队，制定常备兵额，得以全权执行。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73]

载沣摄政之后，他很快重申了皇帝（也就是他自己）的最高 144
军事统率权。1908 年 12 月 13 日，朝廷颁布的《监国摄政王礼节总目》十六条中重申了摄政王的权力和责任：

> 皇上有统帅全国陆海军之权，凡《宪法纲要》内皇上大权关系军事者，即属之于摄政王。其京外旗、绿各营，海、陆各军，应归摄政王节制调遣。[74]

他弟弟和他儿子后来证实，载沣一直很关注皇帝的军事统治权。早在 1901 年他出使德国致歉时，就考察了由德国皇帝直接统率的普鲁士军队体制。在德国的三周内（这也是他唯一的一次出国经历），他参观了几次阅兵典，其中一次还有威廉二世和亨利亲王参与，因而对德国皇族指挥和参与军事事务的情形留下了深刻印象。[75]

有了慈禧太后的《宪法大纲》赋予的大权，以及普鲁士顾问的劝说，载沣坚持应由朝廷掌管所有的军事力量。1909 年 7 月 15 日，载沣任命自己在皇帝亲政之前担任“大清帝国海陆军大元帅”一职。这一行为立刻招致了很多批评。军机大臣张之洞在去世之前还上书抨击摄政王将所有军权集中在自己手里。但是，《东方杂志》的编辑孟森则评论说这一任命是多此一举，因为在中国，君权在理论上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孟森还将载沣比作明代的武宗，一位不理朝纲、喜好玩乐、过度沉溺于军事的皇帝。[76]

为了帮助自己履行大元帅的职责，载沣还在同一天下令调整军事指挥结构，按照普鲁士而不再是法国的模式改革军谘处。军谘处成立于 1906 年 11 月，隶属陆军部，以冯国璋和哈汉章两名职

业军人为首。冯国璋是袁世凯的旧部，当时任陆军贵胄学堂总办。
145 而哈汉章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载沣按照普鲁士模式改革军谘处，使其由皇帝直接管辖，从而独立于陆军部，还比陆军部高一个等级。同时他还在军谘处设立了两名管理大臣，由两名几乎没有任何军事经验的王公毓朗和载涛担任。载涛是宗室亲王，却没有任何军事经验。毓朗曾任京师内城巡警厅丞，在 1907 年他父亲去世后，由九等爵袭升为三等王公，他也是获得恩准免于丁忧 27 个月的官员之一。载涛也是三等王公，他是摄政王同父异母的弟弟，他此前唯一的军事“经验”就是在冯国璋的陆军贵胄学堂旁听过。（为了让载涛有机会掌管军队，奕劻辞去了管理军谘处事务大臣的职务。）冯国璋和哈汉章仍然保留了职位，但是需要向两位亲王负责。载沣重组军谘处，是从霍亨索伦家族统治下的德国（Hohenzollern）和明治日本得到启发，这两个国家都在 19 世纪 70 年代改革了军事体制。[77]

重组军谘处的同时，载沣也制定了相关计划，希望新建立一支独立的、由他直接控制的禁卫军。由于在义和团运动中京师八旗驻防几乎完全瓦解，宫廷的安全护卫由北洋第六镇负责，后又改由第一镇负责，但他们只是在宫廷四周巡逻护卫。然而，虽然第一镇的士兵多为满人，却并不能成为永久的宫廷禁卫军。早在 1905 年 12 月，兵部就明确表示，应该在陆军第一镇之外建立一支新的宫廷禁卫军。在此后的三年中，不断有报道说慈禧太后准备组建一支禁卫军。[78]但却一直没有动静，直到载沣摄政之后的 1908 年 12 月 25 日，作为摄政王的最初举措之一，他下令组建一支新的禁卫军。[79]

与来自陆军第一镇的禁卫部队不同，新的禁卫军独立于陆军部，直接由摄政王掌控。载沣还设立了禁卫军训练处，专门监管禁卫军的组建。最初是由毓朗和载涛这两位王公，以及陆军部尚书铁良共同负责，六个月后，毓朗和载涛又被任命为军谘处的管理大臣。毓朗的不足和载涛的缺乏军事经验都已经在上文提及，只有铁良真正通晓军务。然而，尽管铁良有着丰富的军事背景，
146 但他对满人利益的倡导也使得他受到一些反满革命者如吴樾和徐

锡麟的特别憎恨。但他担任禁卫军训练大臣还不到两个月，1909年2月19日，即以负责复兴海军的名义被调往海军衙门。奕劻的二儿子载搜（1887—1933）以九等爵袭镇国将军的身份，接替了铁良的位子。但是他并没有特别的才能。结果，筹建禁卫军的任务主要由毓朗和载涛负责。1910年以后，毓朗到军机处任职，不再继续负责禁卫军训练处的工作[80]，载涛就全权负责了。

禁卫军训练大臣之下还有六名官员负责各项工作，以弥补两位主管王公在军事经验上的不足。职衔最高的是溥侗（1871—1952），他是资政院总裁溥伦的弟弟，九等爵袭镇国将军，他似乎也只是个虚职。两年后，溥侗因为与任职于海军部的严复一道创作了新的国歌而获得一定的（也是短暂的）名望。其他五名官员中，徐致善和田献章都是科举出身，哈汉章、章遹骏和文华则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五个人之前都曾经在陆军部或军谘处任职。所以，他们与训练大臣不合，除了溥侗以外都有较为丰富的军事经验，其中也只有溥侗和文华是满人。[81]

禁卫军训练大臣们很快制定了计划，按照北洋军的模式组建一支一镇规模的部队。他们还提出了一份为期两年的时间表，将禁卫军的训练分为四个阶段，每半年为一个阶段，分别组建一个步兵标（团）和一个骑兵营。如果一切顺利，这一计划将立即实施，并在1911年1月完成。[82]摄政王特别下令禁卫军全部从旗兵中招募。但这一举措立即招致了很多批评，例如1909年1月的《顺天时报》就指出，组建一支完全由旗人组成的禁卫军与“平满汉畛域”的政策背道而驰。禁卫军训练大臣不顾非议，决定从北京的旗兵部队和旗兵驻防中招募士兵，普通士官都从满人为主的陆军第一镇中选拔。但是，要求所有统领官的选任都不分满汉。[83]

禁卫军训练大臣坚持了两年的时间表，但是最后却没能坚持族群成分上的标准。根据铁良和陆军部的安排，第一阶段招募的步兵标和骑兵营都来源于陆军第一镇，该镇官兵基本被抽调殆尽（第一镇随后以新招募的旗兵补充缺额）。[84]1909年年底到1910年年初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禁卫军训练大臣效仿袁世凯和铁良

组建陆军第一镇的做法，直接从京师旗人中招募士兵。他们在京师的旗兵部队和旗兵驻防中宣布了他们的招募要求，并请相关机构提供符合要求的候选名单。入选的要求是：17 岁至 25 岁之间，身高合格，家世清白，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无犯罪记录。[85]但是，由于越来越难以吸引到足够的旗人，到 1910 年下半年，组建计划的第四阶段，也是最后阶段，禁卫军训练大臣不得不修改了最初的计划。他们以一视“同仁”的名义，宣布禁卫军也招募旗人之外的士兵。禁卫军的第四步兵标都是来自京师、奉天、直隶和山东的汉人，新组建的一个骑兵营来自内蒙古的蒙古牧民。[86]结果，虽然禁卫军在组成上仍以满人为主，但已经不再是摄政王最初构想的那样是纯粹的满人军队了。

禁卫军的军官也有几种不同的来源。北洋六镇的军官是其中之一。在募兵的第一阶段，陆军第一镇不仅为禁卫军输送了士兵，也提供了军官。之后，经讨论扩大了军官的选拔范围，旗人和非旗人都在其中。即使这样，大部分通过笔试的军官显然都来自北洋六镇。其中很大部分还是出自陆军第一镇。1910 年 6 月，考选出 22 名禁卫军营级军官，10 名来自陆军第一镇，其他 12 名来自第二、第四和第五镇。[87]归国的军事留学生是军官人选的另一个来源。1909 年年底，禁卫军任命了 18 名毕业于国外军事院校（可能是日本）的学生担任协都统，同样，一年后，禁卫军训练大臣载涛从 100 名归国军事留学生中选出了 20 名在禁卫军中任职。[88]第三个来源是国内军事学堂的毕业生。1909 年 7 月陆军贵胄学堂的第一批学生毕业，适逢禁卫军组建之际。在 98 名毕业生中，有 10 名直接进入了禁卫军。[89]（第二年，陆军贵胄学堂招收了第二批学员，共有 240 名学员接受为期 5 年的训练。继冯国璋之后担任学堂总办的是大学士那桐的弟弟那晋。接替奕劻担任管理大臣的是另一名王公载润（1878—1963）。）[90]

禁卫军的军官和士兵不同，在挑选的时候没有考虑族群身份。但实际上，在选拔时还是倾向于满人。进入禁卫军的 10 名陆军贵胄学堂毕业生，从名单上看都有着满人式的名字，1910 年从陆军第一镇考选出来的 10 名军官也都有这个特点。同样，1909 年年底

进入禁卫军的外国军事学堂的毕业生，以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世铭为首，他可能就是一个满人。虽然世铭最终没有任职，但看起来这 18 名留学生很可能都是满人。按照晚清军事指挥官恽宝惠的回忆，禁卫军中大部分连、排级别的军官都是满人。[91]

满人在禁卫军的高级指挥官中也占有绝对优势。因为摄政王载沣本人就是禁卫军名义上的最高统领，禁卫军并没有设置统制官，职位最高的官员就是满人良弼和汉人王廷桢，他们担任了禁卫军两个协的协统。良弼是宗室旁支，出自湖北荆州驻防，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良弼曾担任陆军部尚书铁良的助手，被吴樾等革命者认为是铁良尊满排汉政策的幕后主谋。1907 年，良弼担任陆军部军学司司长。1909 年，良弼被任命为禁卫军步兵第一标标统，随后又任第一协协统。王廷桢可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他于 1902 年毕业于骑兵科，回国后成为陆军第一镇正参谋官，在禁卫军中，他最初担任马标标统，随后在 1910 年年底担任新组建的第二协协统。两人中，良弼的影响力更大。这不仅仅是因为良弼担任第一协协统，地位比王廷桢更高，更重要的是良弼是皇族成员，和禁卫军训练大臣载涛有密切的工作关系。良弼在 1910 年陪同载涛到日本、美国和欧洲等地考察陆军，历时五个月。作为载涛的顾问，他对禁卫军和军谘处都有着重要影响。[92]在良弼和王廷桢之下还有五名标统，三名是满人。四个步兵标分别由忠和（关忠和）、崇恩（也称崇林）、扎拉芬、田献章 *149*
统领，只有田献章不是满人，他是禁卫军最初的训练官员，他统领的步兵标都是由汉人士兵组成。王廷桢升任协统之后，接任马标标统的是华振基，可能也是名汉人。[93]

两年之后，禁卫军在 1911 年年初编制完毕，这仅仅比原定计划晚了两个月。3 月 26 日，禁卫军的两协兵力在南苑（京师南面的一所皇家花园）的临时营地进行了一次全镇规模的阅兵。秋操之后，禁卫军就会迁到畅春园固定扎营。根据当时美国军事专员的描述，禁卫军的步兵和炮兵装备精良，唯一不够完善的是骑兵。骑兵有一标四营，人员已经完全配备，但蒙古骑兵组成的第三营尚未装备完毕。9 月 16 日，辛亥革命爆发前不到一个月，禁卫军

正式接受校阅，在德胜门外的北郊校场上举行了场面盛大的典礼，摄政王以禁卫军统制的名义，亲自检阅了军队。载沣很满意禁卫军的状况，嘉许禁卫军训练大臣载涛和载搜迅速组建军队的成绩。他同时也赞扬了军官和士兵们的良好表现，向他们强调了禁卫军独特和重要的地位。他说，禁卫军和新军不同，不仅要保卫国家，还要效忠皇帝。实际上，那时候的禁卫军已经从陆军第一镇手中接过了护卫宫廷的重任。[94]

作为海军的统帅，载沣也有意复兴海军。在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中溃败以后，李鸿章的舰队作为海军的核心力量已经被完全摧毁，载沣的父亲所领导的海军衙门已经被解散。在接下来的十来年，中国实际上没有海军。虽然还有一些战舰，但却没有海军编制。直到载沣摄政之后，他才开始复兴海军的计划。1909年2月19日，因为内务部尚书善耆的奏折（他曾经帮助筹建京师警察力量），摄政王专门设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筹划复兴海军。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善耆、度支部尚书载泽、陆军部尚书铁良以及广东水师提督萨镇冰（1859—1952）等四人，奕劻依然负责总稽查。（铁良正是因此不再担任禁卫军训练大臣，以便更好的关注海军建设。）[95]

150

7月15日，在筹划委员会上奏的六天之后，载沣宣布自己担任全国海陆军大元帅，并重组军谘处，同时还设立了筹办海军事务处，作为筹设海军部的重要一步。他任命三等王公载洵和萨镇冰担任筹办海军大臣。萨镇冰是福州船政学堂的毕业生，后留学英国。萨镇冰被选中，也是因为他之前曾在善耆的委员会中工作过，在海军事务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不久以后，他从广东水师提督升任海军提督，调往上海。另一方面，载洵从未在善耆的委员会中供职，也没有任何海军事务的相关经验。和载涛一样，他担任这一职务仅仅因为他是摄政王的弟弟。[96]筹办海军事务处成立一个月后，和陆军部一起向朝廷递交了一份复兴海军的七年计划。两名筹办海军大臣也开始出国考察海军事务。他们于1909年年底前往欧洲，1910年年底前往美国和日本。从日本回国之后，载洵和萨镇冰建议将筹办海军事务处改为与陆军部地位相同的海军部。

1910年12月4日，朝廷下令成立海军部，任命载洵为海军部尚书。[97]

载沣在海军改革方面的主要成就，是统一了中国各地分散的舰队。筹办海军事务处成立后不久，就将现存的军舰整编成巡洋、长江两支舰队。随后，1910年12月，筹办海军事务处变成了海军部，萨镇冰负责统制这两支舰队，总部仍设在上海。[98]巡洋舰队有4艘巡洋舰：英国制造的海圻舰，排水量4 300吨，编制439人；德国制造的海筹舰、海琛舰、海容舰，排水量都是2 950吨，编制均为279人。这些军舰都订购于中日战争之后的1896年，在1898—1899年运抵中国（中国还曾从英国购进第5艘巡洋舰海天舰，在1907年从上海出发后遇雾触礁沉没）。[99]萨镇冰和两支舰队的统领都是汉人，但还是有一些满人在这些巡洋舰上担任领导职务（主要是洋务运动期间“昆明湖海军学堂”的毕业生）。[100]载沣在中国海军现代化建设方面最显著的成就，可能就是1911年海圻舰具有历史意义的环球航行。海圻舰赴伦敦参加了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加冕典礼，之后又前往纽约，率队的巡洋舰队统领还觐见了美国总统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此后还驶往古巴首都哈瓦那，宣慰当地侨胞。[101]

载沣倚重皇族亲贵和满人重臣以强化帝制，加强军事集权，这给同时代的外交官、政府官员、新闻记者，以及后来的历史学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Jordan，1852—1925）称之为“满人特权”。在一封1909年3月16日的信件中，朱尔典称：“在清帝国的各种议事机构中，满人特权已经有了明显的复苏。”而且，载沣没有任何融合满汉和消除满人特权的举措。朱尔典担心载沣受到了“秘密顾问团”——载沣的弟弟载洵和载涛，堂兄载泽（时任度支部尚书），以及宗室铁良（陆军部尚书）——的影响，朱尔典称他们是“内军机处”。1909年8月的《北华捷报》也以类似的口气讨论“满人党”的无上权力：“虽然号称平满汉畛域，但朝廷的最高职位都逐渐被满人占据。”张之洞在去世之前（按裴士丹的说法）也同样提醒摄政王要注意身边的满人派系。历史学家陈志让称之为“满人集团”，认为这是1905

年由铁良组织的，“企图在朝廷和军队中壮大满人的力量”。[102]

和朱尔典的评论不同，“满人特权”并不是载沣的新政策，而是慈禧太后1906年重组中央官僚机构以来的趋势的延续和扩大。之前，由于满汉共治原则，中央机构中满人和汉人高级官员的人数基本相同，但到1907年年底，满人已经在中央的13个尚书职位（包括外务部的2个尚书职位）中占有绝对多数，满人有9名，汉人只有4名。但是在军机处的6个职位中，满人和汉人基本相等。载沣摄政期间比慈禧太后任用了更多的满人，尤其是在军机处。在1910年8月重组军机处之后，满人和汉人的比例是3∶1（3名满人是奕劻、那桐和毓朗；唯一的汉人是徐世昌，他曾任东三省总督，也曾是袁世凯的支持者，后来成功摆脱了袁世凯的不利影响）。在当时的14名中央各部尚书职位中，满人也增加了1名，共10名，而汉人只有4名。[103]

当然，满人集团内部也很难团结一致，载沣在官员任命方面可能更倾向于满人，但他并非毫无区别地喜欢所有的满人。慈禧太后提拔起来的两个旗人官员——端方和铁良——在载沣摄政期
152 间就不是很顺利。当端方在1909年6月由两江总督升任直隶总督时，他的任命被作为载沣搞“满人特权”的又一证明。朱尔典注意到，从曾国藩1868年任直隶总督以来，一直都是汉人担任此职（这名英国驻华公使可能弄错了，还是有两名满人荣禄和裕禄（1844？—1900）曾在1898—1900年间任直隶总督）。[104]但是，不到5个月后，端方由于沉迷于一些现代化设备而被抨击。当时，曾任广州驻防副都统的汉族官员李国杰上疏弹劾，称端方在慈禧太后的葬礼上有三处仪礼失当：他同意下属用相机拍摄葬礼过程；他乘坐轿子横冲神路，而其他哀悼者却都步行；他还在陵墓四周攸关之处架设电报线。端方随即被免职（汉人官员陈夔龙（1856—1948）接替了他的职位）。[105]和袁世凯一样，端方离职之后赋闲在家，在北京专注于发展教育，收藏古董，也因此被称为艺术鉴赏家。据说，他后来重新任职一事也遭到隆裕太后的反对。不知何故，她是朝廷中首先坚持罢免端方的人。直到1911年5月，端方才被重新启用，被任命为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106]这一

任命也让他最终丧命。

陈志让认为铁良是清末满人集团的发起人和领袖，但铁良也同样失去了他在慈禧太后当政期间积累起来的权位。在载沣担任摄政王之后，铁良依然担任陆军部尚书，但同时又担任了另外两个军事职务：禁卫军训练大臣以及善耆重建海军委员会中的成员。甚至朱尔典也在1909年3月声称铁良是满人“内军机处”的成员。但铁良对军权的掌控，却也被毓朗和载涛这两名在军谘处任职的皇族王公所削弱了。1909年8月，铁良称病，请求辞去陆军部尚书的职务，但直到第二年3月才被批准。接替他的职位的是另一名满人荫昌，他是载沣出使德国致歉时的随行翻译，当时正担任驻德公使。1910年9月，铁良离开北京，赴任不甚重要的江宁将军一职。[107]

铁良是慈禧太后加强中央集权时期的重臣，但是他没有亲王 *153*
的身份以迎合载沣强化帝制的努力。正如朱尔典所说，他只是一名普通的满洲旗人，而非宗室成员。这也是为什么铁良会感到和摄政王以及他的核心圈子有些疏远。因为载沣依靠的主要并非全体满人，而是皇族宗室，尤其是其中的直系王公。这种对宗室王公的依赖也不是始于载沣，在慈禧太后统治期间，从19世纪60年代初以来，就有越来越多的王公担任了军机大臣和各部的尚书、侍郎。这和清朝中期以来不允许王公参与政治的传统是相背离的。载沣只是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过程，而且最终走到了作茧自缚的地步。慈禧太后在位期间的1907年，13名各部尚书中有3名是宗室王公；到1910年载沣摄政期间，14名各部尚书中有4名宗室王公（奕劻、善耆、载泽、载洵）。同样，慈禧太后在位期间，6名军机大臣中有2名宗室王公；载沣摄政期间，4名军机大臣就有2名宗室王公。在各位王公中，载沣最倚重的是奕劻、善耆、载泽、毓朗，特别是他的两个弟弟：24岁的载洵和20岁的载涛，他俩分别被载沣安排去掌管海军和陆军。（载涛和其他人不同，既不是军机大臣，也不是尚书，但是他担任军谘处管理大臣，也是禁卫军训练大臣的首领。）1910年1月，上海的《时报》报道：“皇族的权力大规模扩张，以前只有庆亲王（奕劻）和他的儿子，现在则有

三位贝勒：载洵、载涛和毓朗。”御史江春霖也曾上奏，提醒摄政王不要过度依赖自己的兄弟。[108]

王公们之间也并不比满人之间更为团结。虽然朝廷内部的派系斗争并不明显，但它们的确存在。此前“帝党”和“后党”的斗争并没有因为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去世而完全消除，在摄政王当政之时还依然存在。一方是载沣、载洵和载涛，他们都是光绪皇帝的兄弟。善耆因为反对过慈禧太后对义和团的政策，或许可以归属于这一派。另一方是慈禧太后的支持者，包括隆裕太后（慈禧太后的侄女）、载泽（隆裕太后的妹夫）和奕劻。[109]

载沣重用宗室王公的恶果之一，就是使他们成为革命党人的
154 暗杀目标。第一次暗杀直指筹办海军大臣载洵，在1910年年初他从欧洲返回的路上，就遭到了革命党人的一两次暗杀。1月末，在他坐上哈尔滨前往北京的火车不久，东北当局拘捕了一名可疑的革命党人熊成基（1887—1910），熊成基坦陈他参与了1908年安徽安庆一次未成功的兵变，他骄傲地承认那次兵变意在发动一场“政治革命”，但是他否认自己从庇护地日本回来是为了刺杀载洵。尽管熊成基坚持无意参与刺杀载洵，他还是在一个月之后被处以极刑。他说他到满洲的目的只是为了与俄国人做生意，显然他说了实话，但崇拜他的传记作者坚持认为事实不是这样。鉴于他在安庆兵变中扮演的确定无疑的角色，他们认为他在载洵经过时在场，这并不仅仅是一种巧合。当时的报纸也持这种看法。例如，《东方杂志》报道了他的被捕和死刑，而且征引了一则未经确认的消息，说他曾告诉长春的一个同伙（此人随后背叛了他）他前往哈尔滨的唯一目的就是刺杀摄政王的弟弟。[110]

不管熊成基在哈尔滨的目的何在，由汪精卫领导的其他革命党人正在北京等待着毫发无损的载洵。汪精卫是孙中山的亲密支持者，他对1907—1908年间中国同盟会在南方发起的系列革命的失败感到灰心失望，于是他与他之前的吴樾一样，重新走上了暗杀的道路。他和其他几名在日本的志同道合的革命派组建了一个暗杀团，旨在刺杀北京的满人大员。1909年秋，暗杀团成员之一黄复生（1883—1948）打头阵，在北京外城创办了一家照相馆作

为从事暗杀活动的前哨。汪精卫和其他几名成员随后而来。由于载洵即将到达北京，他们决定在火车站用炸弹炸死他。然而，当时正值黄昏，这位贝子到达时，汪精卫未能从一群大员中分辨出载洵。这样，载洵可能是第二次幸免于难。[111]

失望的暗杀者在对包括奕劻在内的其他几名可能的目标进行通盘考虑后，选择了摄政王本人作为他们的新目标。载沣每天都要从内城北部的官邸前往紫禁城，在这条道路上动手就成为他们的计划。载沣对这条经过鼓楼的宽阔大街再熟悉不过了，而且沿途都护卫森严，然而碰巧这条道路因破损需要修补，他被迫绕道而行。刺客们在他绕道的小桥下埋了一罐炸药，打算在他经过时引爆。不幸的是，当他们在4月2日夜进行最后准备时，炸药被发现了。警察查出炸药是由当地工厂生产，最终追查到他们的照相 155
馆。汪精卫和黄复生这两名留在北京的革命党人因此被捕获。[112]

汪精卫坦然承认，他以前是《民报》的编辑，此次来北京就是要做一些“惊天动地”的大事。对于摄政王本人和普通的满人，他没有特别的敌意；与1907年的徐锡麟不一样，他没有详细论述满汉关系。事实上，他供词中唯一涉及满人问题的，是他向满人和清朝皇帝保证他们在共和政体内的前途，当然前提条件是他们和平移交权力。他向满人承诺，他们会与普通民众一样受到平等对待；他警告清朝皇帝，与其把政权拱手让给外国势力，不如移交给汉人。他把安南和朝鲜被外国势力推翻后其君主的命运，与日本内部革命后幕府将军的命运进行了对比。在法国人和日本人统治下，安南的阮氏国王和朝鲜的李氏国王都被“弃如敝屣”，而日本的德川幕府将军放弃权力后则受到尊敬。汪精卫没有讨论满汉关系，而是把焦点集中于清朝立宪无用论，以及中国持续面临着的外国势力瓜分危险。他以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为先例，坚持认为真正的立宪只有在革命后才能实现。汪精卫也质疑立宪改革派的幼稚信念，这些人热衷于并相信议会的效力，以为议会是抵抗专制帝制的堡垒。[113]由于当局的强制审查，汪精卫的供词与徐锡麟不一样，没有公开。即使这样，一些关于暗杀失败的消息仍见诸报端。[114]

鉴于载沣这个暗杀目标位高权重，汪精卫和黄复生受到特别宽大的对待。他们没有被判处死刑，而不到两个月前熊成基则被处死。相反，新成立的大理院在4月29日判处他们终身监禁。[115]从所有文献来看，内务部尚书善耆主导了这次相对较轻的判罚。可能是为了收集情报，也可能是为了讨好他们，善耆几年来一直与各种反对派团体保持秘密联系。他与被逐的君主立宪派康有为和梁启超也保持着很好的关系，这两人在1907年曾经寻求他的帮助以反对袁世凯和奕劻，并试图恢复光绪皇帝的权力。善耆也与革命党人进行接触，尤其是通过在日本留学时加入同盟会的程家
156 柽（1872—1914）。据冯自由和宋教仁后来的叙述，1908年或1909年，善耆派遣程家柽到日本，为同盟会的领导人提供了很大一笔钱以收买他们。革命党人也像康、梁那样试图说服这位亲王为他们工作。1909年，东京同盟会的领导人章炳麟邀请善耆加入同盟会，并劝说他仿效俄国的克鲁泡特金亲王（Prince Kropotkin）来领导即将到来的革命。章炳麟也向善耆保证，革命不是要进行种族杀戮，而仅仅是“还政于我们汉人”。章炳麟表示（正如他曾于1907年在《民报》副刊《天讨》里主张的那样），满人可以“返回”到满洲，他们在那里可以维持自己独立的、纯为满人的“帝国”，当然他们的帝国要附属于中原的汉人共和政体。[116]

汪精卫和黄复生被捕后，善耆在两名囚犯被判刑前至少与他们进行了两次谈话，当时善耆领导的内务部监管着京师警察局。汪精卫的供词深深打动了他，他与汪精卫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对话。根据黄复生的回忆，肃亲王善耆说他长期以来都是《民报》的忠实读者。他告诉汪精卫，三民主义太狭隘了，他建议改成“五族大同”，这是满人刊物《大同报》提倡的一个类似概念。汪精卫表示他不愿意评判《大同报》的立场，善耆称赞他面对死刑之时依然忠于他的信念。后来，可能是顾虑1907年处死徐锡麟和秋瑾引起的消极效果，也可能是在同朝为官的程家柽的影响下，善耆劝说载沣太过于严酷的惩罚会起到相反的效果，会激怒革命党人从而引发新的叛变，也会引起立宪改革派不必要的反感。摄政王因此同意减轻对汪精卫和黄复生两人的处罚，判他们两人终身

监禁。[117]

六个月后，也即 1910 年 10 月 6 日，载洵再次成为暗杀的目标。这次暗杀发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奥克兰，当时他即将结束在美国的海军考察之旅。这名想成为刺客的人叫邝佐治，他是在美国出生的美籍华人，当时 31 岁。受革命党人“种族问题”宣传的煽动，他决定采取这次行动。后来在审判中，他解释说自己希望通过暗杀摄政王的弟弟而“救国”，他认为载洵从国外购买军舰的目的不是为了强国而是要镇压革命党。他和一名同伴计划当华人团体的领导们在奥克兰码头欢迎载洵时射死这名海军大臣。然而，当时现场护卫森严，在他拔出手枪前就被美国侦探发现并解除了他的武装。随后他在美国法庭受审，这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例如，他的反满宣传出现在《东方杂志》上，他关于共和革命即将到来和不可避免的预言也见诸报纸。1911 年 1 月 13 日，他被指控为犯有蓄意谋杀罪并被判处十四年监禁。[118]

最后，在邝佐治刺杀载洵两个月后，又发生了另一起暗杀满人亲王的事件。这次的目标是奕劻，汪精卫曾经也把他作为暗杀目标，但由于护卫森严而放弃。1910 年 12 月 3 日，奕劻从紫禁城返回内城北部的官邸时，一个或几个人向他开枪并向他的马车扔了炸弹。马匹受惊，护卫不知所措，在混乱中刺客（们）得以逃脱。虽然这次暗杀努力失败了，但同样引起了广泛关注。[119]然而，没有人宣称对这起袭击负责。

资政院之争

载沣加强对陆海军的控制，创建新的、由朝廷控制的禁卫军，这些努力到 1910 年后期基本获得了成功。与此同时，他也遭到了一些批评，尤其是来自当时相对自由的新闻界的批评，但这不足以阻止他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慈禧太后的九年预备立宪时间表一致，1910 年 10 月 3 日，各省谘议局召开了第二届会议，资政院也在北京开院。载沣参加了资政院的开院典礼。与以前的习惯不一样，议员们在他致辞时不再跪在他面前，而是站着。[120]从此，载

沣面临着与以前不同的环境。开院之时，贝子溥伦为资政院总裁，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取代去世的大学士孙家鼐）为资政院副总裁。此次会议持续了三个月，议员们在许多问题上与摄政王意见相左，比如，是否尽快推进国会的召开，如何让军机处像“责任内阁”一样履行职责，是否（再次）赦免领导 1898 年戊戌变法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如何应对来自下层要求剪辫这一空前的风潮等等。为了处理这些争议，载沣采取了坚决的甚至是强硬的姿态，正如他在加强帝制权力方面的表现那样。资政院最终在 1911 年 1 月休会，但摄政王并没有因此获得轻松，因为他于 5 月提名的内
158 阁名单引起了最大的争议。所有这些问题在 1910 年年底和 1911 年年初浮现出来，有些矛盾更加直接地指向满汉问题。

摄政王与资政院之间产生分歧的第一个问题，是由当时如火如荼的速开国会运动所引起的。资政院本身仅仅是一个咨询机构，不具有立法权，根据方案，具有立法权的国会要到九年期限的最后一年（1916 年）才能选出来。自从 1907 年颁布九年预备立宪方案以来，政治改革派就一直游说朝廷缩短立宪时间表，正如他们以前迫使清廷首次颁布了这一时间表那样。自 1909 年秋各省谘议局第一次会议召开以来，一年时间内，包括满人组织在内的改革派分别在 1909 年 11 月和 1910 年 6 月发起了两次全国性的请愿活动，请求朝廷加快组建国会的步伐。然而，载沣草率地回绝了这两次请愿。在应对第二次请愿活动时，他提醒请愿者资政院还有不到四个月就要开院，婉拒了请愿要求。[121]

资政院开院典礼并没有让立宪政府的鼓吹者们得到满足。6 月被拒后，他们在 10 月发起了第三次请愿活动，这一次直接向资政院本身而不是以前的都察院提交呈文。他们要求在第二年召开真正的国会，同时组建“责任内阁”。如同满人刊物《大同报》那样，他们声称，“唯有责任内阁才有立宪政府……唯有国会才有责任内阁”。10 月 22 日，在“国会万岁！大清国万岁！大清国立宪政体万岁！”的一片欢呼声中，资政院一致同意请愿要求，并在随后重拟一份奏折呈达御前。[122]

同时，由东三省总督锡良领衔的各省大部分大员联名电奏军

机处，表示全力支持资政院的奏折。他们以明朝最后一任皇帝迁延不决导致王朝覆灭为例，警告清廷不要无谓地拖延。在通电上签名的包括九名总督中的四名，巡抚当中只有两名没有签名；满人当中既有签名的，也有未签名的。锡良和瑞澂（湖广总督）是四名在通电上签字总督中的两名，而长庚（陕甘总督）、赵尔巽（四川总督）和松寿（闽浙总督）是五名拒绝签字总督中的三名。然而，反对锡良通电的最强硬人物是两名汉人总督：直隶总督陈夔龙和两江总督张人俊。锡良要求同时组建国会和内阁，陈夔龙 159
则建议两者分开组建。他以明治日本为例，日本国会是在内阁设立之后才召开的。陈夔龙向皇上建议，次年（1911 年）任命“责任内阁”，国会的召开可以延至 1913 年，即资政院即将届期解散的那一年。与此同时，资政院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履行国会的部分职能。[123]

在作出决定之前，载沣向筹办政务处征求意见。据公开的报道，筹办政务处承认，清廷无法再坚持既定的九年预备立宪方案，并倾向于陈夔龙的建议。国会请愿者们对这样的新闻报道感到很沮丧，他们立即加强游说活动，要求国会不能迟于 1911 年召开。他们不同意一年之内难以拟定所需的章程的这一理由，鉴于外国的威胁和国内的财政困境，他们质疑中国能否付得起延迟三年召开国会的代价。锡良和支持他的其他各省大员也赞同陈夔龙引用明治日本作为先例。根据他们对日本近代史的了解，正是佐藤忠财阀政府在 1885 年任命内阁之时没有召开国会，才引起了一场广泛的自由民权运动，这场动乱直到 1890 年议会召开才得以平息。[124]载沣不顾这些最后的请求，接受了陈夔龙和筹办政务处的折中方案。11 月 4 日，他同意国会提前至 1913 年召开，并在此前的某个时候任命内阁。他坚持预备立宪工作不能再加快了。在另一份谕令中，他要求内务部和各省当局向请愿者通报他的决定，并命令请愿者自行解散。两天后，他任命资政院总裁溥伦和度支部尚书载泽这两名宗室王公负责起草宪法；一个月后，他要求宪政编查馆修改立宪时间表。[125]

载沣的让步没能安抚国会请愿者们。他们并没有放弃，而是

组成了同志会，宣布将继续倡导加快国会召开的步伐。资政院也非常不满意，11 月 10 日上奏朝廷，对几年时间这一模棱两可的说法表示质疑。[126]对延迟召开国会反应最强烈的是奉天的市民，他
160 们几个月前目睹了日本吞并了他们的邻居朝鲜。他们声称，唯有立即召开国会才能使奉天免遭贪婪的帝国主义的侵蚀。由于得到总督锡良的批准，他们选出一个代表团前往北京直接陈情。12 月 20 日，代表团抵达天津，几千名当地支持者也加入其中，他们行进到陈夔龙的衙署前，要求他电告清廷于次年召开国会。这名直隶总督同意把他们的陈情上奏朝廷，但与锡良不一样，他不同意陈情的内容。载沣对此的反应是再次坚持国会不能立即召开，理由是复杂的预备立宪工作需要时间。这道谕令公布后，未能平息很多狂热学生的不满，他们聚集在一起，计划进行进一步的抗议活动。直隶总督陈夔龙派出士兵和警察驱散了学生的集会。摄政王不仅同意陈夔龙诉诸武力，他还指使内务部尚书和京旗步军衙门同样采取强硬措施，必要时把东北请愿者直接遣送回家。载沣说，他已经没法再忍耐下去了。[127]到这时，速开国会的鼓吹浪潮才逐渐停止下来。

同时，10 月份就何时召开国会发生最初的冲突之后，围绕资政院要求摄政王承诺组建的内阁必须是“责任内阁”这一问题，载沣与资政院又起波澜。载沣于 11 月 4 日宣布国会要到 1913 年才能召开，资政院开始强势提出要求，即资政院本身不应仅仅是一个咨询团体，而且应是一个实权立法机构，四人组成的军机处作为内阁的雏形必须对资政院负责。资政院还利用了这一时期关于三个省谘议局的争议事件，来要求实现权力。

最初的争论肇始于湖南，巡抚杨文鼎未经省谘议局的同意就擅自签订了一份公债协议。资政院投票以 3∶2 通过，支持湖南省谘议局的反对意见，并要求朝廷命令湖南巡抚把公债协议提交给省谘议局来决定。载沣于 11 月 8 日作出回应，认为杨文鼎没与谘议局协商是一个“失误”，但由于公债协议已经得到了度支部尚书的批准，因此应该生效。许多资政院议员非常愤怒，他们认为杨文鼎的“公然滥用权力”竟然被减轻为“失误”。他们要求帮助载

沣草拟答复的军机处大臣来资政院亲自解释他们的行为，出于政治上的谨慎，他们没有攻击摄政王本人。但军机大臣——奕劻、毓朗、那桐和徐世昌——没有理会这个要求。[128]

事情过去不到两周，资政院又与军机处在其他两个省的问题 161
上发生了争执。一个是云南省，当时总督未经省谘议局的同意就抬高了盐价；另一个是广西省，巡抚擅自允许其他省的学生进入该省高等警察学堂，而无视省谘议局只让本省学生入学的要求。11 月 20 日，资政院就这两个问题上奏，与以前湖南公债协议的情况一样，他们支持省谘议局，反对地方大员。载沣的朝廷没有立即接受资政院的建议，而是颁布了一道谕令，把这些问题分别提交给盐政处和民政部，征求他们的意见。由于资政院的请求被忽视，他们再次被激怒。许多人抱怨政府行政机构蹂躏“立法机关之独立”。他们投票弹劾整个军机处在草拟谕令中扮演的角色。[129]

弹劾军机大臣加剧了资政院与摄政王之间的冲突。载沣立即设法缓和这种冲突，但没有成功。11 月 25 日，根据盐政处和民政部的建议，载沣采纳了资政院最初关于这两件事情的建议。[130]而且，他把谕令直接交给了资政院，希望这会改变资政院的弹劾计划。事实上，一名朝廷命官（外务部官员蒙古旗人文溥）说，由于朝廷最后已经按照资政院的要求行事，弹劾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另一名朝廷命官（陆宗舆（1876—1958），一名“硕学通儒”）也质疑是否确有必要因为这两件事进行弹劾。然而，大多数人指出，这不仅是军机处无视资政院的问题。他们声称，资政院应该警惕任何“不负责任”的表现，以便为将来的国会树立一个好榜样。资政院因此投票决定重新起草一份修正奏折，指责军机处“不负责任”。这份修改的奏折经过讨论于两周后达成一致，奏折并没有弹劾军机处，而只是抱怨其权力不明确。奏折声称，资政院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代表责任和立法职能，军机处在执行政任时却不尽职。朝廷需要一名内阁总理来保护皇帝免于批评，且能把政府团结在统一的领导之下。奏折要求载沣赶紧任命内阁来清晰界定军机处的职责。[131]

162 最后，当四名军机大臣因此联名提出辞职时，载沣告诫资政院做好自己的事情。他反对军机大臣辞职，并于12月18日谴责资政院侵犯了君主大权，而后者是《宪法大纲》中明确规定的。他声称，军机处是否“负责任”和是否组建“责任内阁”完全取决于他。资政院一时难以做出适当的回应。在12月19日的会议上，一些议员看到无法改变局面愤而决定辞职，试图以此捍卫资政院的尊严和完整。其他一些人则呼吁在最后集体辞职之前，应该再次弹劾军机大臣，这一次以个人名义而不是集体名义进行。通过投票表决，102名议员愿意进行最后一次弹劾的尝试。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天，资政院似乎有了另一种想法。12月26日，大多数议员甚至表示要放弃行动，以免导致资政院被解散。这种对失败的焦虑遭到了新闻媒体的抨击，资政院的议员们再次改变了主意。12月30日，资政院上书进行弹劾。但载沣对他们的行为置之不理。资政院并没有像很多议员所担心的那样被解散，议员们的奏折被搁置起来，既没有公开发表，也没有得到实施。由于这样不置可否的处置，随着资政院三个月的会期在不久后结束，这次论争也消失于无形。[132]

在这次围绕速开国会和弹劾军机处的激烈争论中，资政院也讨论了其他一些悬而未决的事情，比如赦免康有为和梁启超。之前由于很多人的努力，清廷已经为1898年变法中几乎所有获罪的维新派“翻案”，但还有康、梁和被处死的“戊戌六君子”没被洗脱罪名。同志会作为此前的国会请愿者，也领导了这次新的行动。他们向摄政王的弟弟和军谘处大臣载涛求情，载涛一直被认为是同情改良派的。同志会认为，11月4日的谕令将国会的召开提前到1913年，所以政党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请求朝廷解除关于政治组织的禁令。此外，他们还请求将因1898年变法而被迫流亡海外的改革者召回国。在一封对民众的公开信中，他们特别提到康有为和梁启超应该被赦免。作为资政院的钦选议员，陈宝琛（1848—1935，一名“硕学通儒”）也向朝廷上奏，请求赦免1898年的改革者。陈宝琛指出，现在采取措施正是合适的时机，因为
163 目前的开国会风潮正是始于百日维新。他还声称，都察院握有先

帝关于赦免“戊戌六君子”的手谕。1911 年 1 月 3 日，资政院上书请求赦免 1898 年百日维新中所有的获罪者，包括死去的“戊戌六君子”。一名议员称，恢复他们的政治地位有利于“破除满汉之见”，以示朝廷的宽宏大量。但这次奏折再次被载沣搁置。[133]

摄政王和资政院的最后一次论争是关于男子发式和官员服饰。资政院的矛头直指满汉关系。20 世纪初，外交官、学生、工人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有机会前往海外，中国也开始了工业化的历程，很多改良派和革命者一样开始反对留长辫和宽袍大袖。革命者之所以反对，是因为这些都是汉人屈服于满人统治的标志。改良派则抱怨，满人强加而来的这两点已经不符合西方影响下的现代世界潮流。由于意识到时代的变化，义和团运动后的朝廷已经在士兵和警察（但不包括学生）中调整了发式要求。因为采用了新式军服，士兵和警察被允许剪短（而不是剪除）辫子。但是直到 1909 年年底，除了革命者和一名临时的新闻评论员，很少有中国人敢提倡剪辫子或改官服。

公开讨论辫子和服饰问题并倡导改革的高官是两名汉族改良派：驻美公使伍廷芳（1842—1922）和江西提学使汤寿潜，他们分别在 1909 年年底为此上奏。伍廷芳声称，自己是代表居住在美国的七万中国人发言，他们因为辫子而被美国人视为古怪，而且在操作机器时还会增加很多危险。美国的华人请求伍廷芳向朝廷请愿，废除辫子，并接受西式的服装。伍廷芳在他的奏折中，对美国华人的请求并不是完全赞同：他同意剪辫子的要求，但是不赞同改变服饰。他认为没有必要改变中国当时的服饰，因为这种衣服较便宜，也适合四季穿着。他指出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就保留了本国服饰，只是在一些正式场合穿着西式衣服。但是，辫子没有任何保留的价值，通过它来表示对皇帝或国家的效忠，这只是一种当年的时尚，但时尚已经改变了。西方人也曾经留过辫子，但是已经不再保留了。由于中国人越来越多的效仿西方，剪辫趋势已经不可阻挡。所以朝廷最好主动下令。伍廷芳的建议被称为“剪发不易服”。[134]另一方面，汤寿潜（他是张謇预备立宪公会的成员之一）提出八项改革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剪发易服。他指出，

官员们的长袍和长辫，在外国人看来一样十分可笑，宽大的长袖也会在乘坐交通工具时带来不便。他请求摄政王在官员士人中树立典范，剪去长辫，改穿西式服装。其他的民众可以依照喜好选择是否跟从。[135]

伍廷芳和汤寿潜的奏折所产生的影响是迟滞的。因为朝廷当时并没有对他们的奏折做出任何回应，直到几个月后，奏折的内容才被人们知晓。这些建议随后被公开发表，激起了长达一年的关于清朝的发式服饰规定的争论。1910 年春，当汤寿潜的奏折被公开时，上海的《时报》刊登了一系列的漫画讽刺“辫子的作用”（图 9、图 10）。[136]但是，这年 8 月公开发表的伍廷芳奏折引起了更大的影响。因为这时正是摄政王具有改革思想的弟弟——载涛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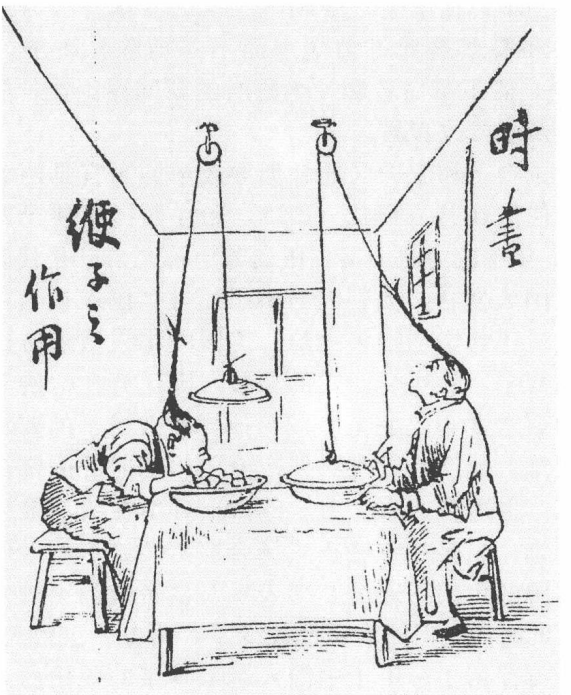


图 9　辫子之作用（一）
（《时报》，宣统二年三月四日，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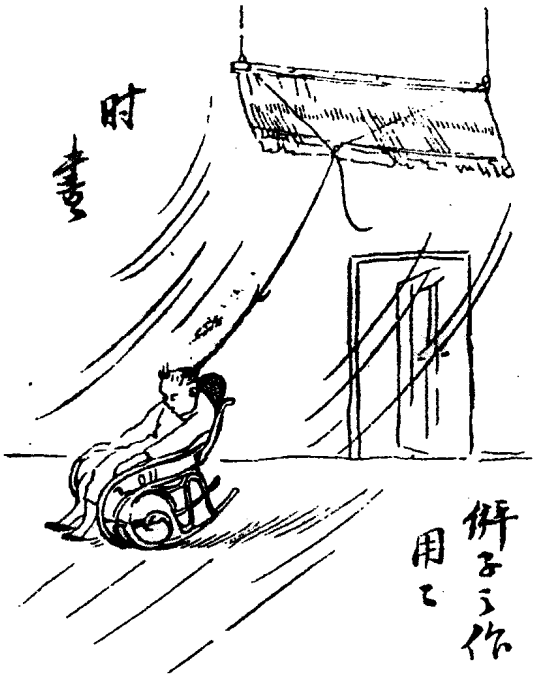


图 10　辫子之作用（二）
（《时报》，宣统二年三月六日，2 页）

海外考察五个月后回到国内之时。载涛被普遍认为对于剪发的建议颇为认同。[137]根据《时报》的报道，到 9 月中旬，北京到处都是关于剪发的议论，压过了其他一切话题。《时报》还指出，新任陆军部尚书荫昌已经剪去了长辫，而没有受到任何处分。人们惊讶地发现，那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留着短发出入公共场合。早在 1906 年到 1907 年，很多学生就已经开始剪去长辫以求改变。当长沙的湖南武备学堂的学生要求剪去辫子时，他们就以陆军部尚书荫昌的事例为自己辩护。[138]

关于剪发和易服的风潮也遭到了一些反对。一些人指出这样的行为有违“祖宗礼法”，前军机大臣世续在被告知剪去长辫并不会导致亡国时，反驳道：“虽然中国不会灭亡，但是大清国是必定

要亡了。”[139]但是，主要的反对者并不是满人守旧派，而是一些汉族的商人和制造业主，他们从经济而非政治的角度考虑，更为
165 关心服饰而不是发式。商人们担心一旦发式改变，服饰也会随之改变。一旦西式服装被广泛接受，进口的羊毛就会代替本土的丝绸成为服装的主要原料。当铺的老板也担心手中会囤积大量的传统服装、鞋帽，而不再有人愿意赎出。在杭州，丝绸商、鞋帽商和当铺老板在1910年9月25日聚首商议，公开表示他们极为关注易服对相关商业的影响。武昌的总商会也表示了同样的担忧。他们的意见被农工商部尚书以奏折的形式上达朝廷，指出任何发式或服饰的改变都会波及经济，产生破坏性的影响。[140]

到10月初资政院召开会议时，虽然关于剪发易服的风潮已经声势浩大，但资政院并没有在三个月的会议期间把它作为讨论的议题。12月2日，在讨论是否弹劾军机处时，资政院投票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审核一份要求剪发易服的条陈。这个委员会可能考虑了商人们的需求，决定从最初的议案中删除“易服”的要求。12月15日，在经过一番讨论后，资政院以102票对28票通过了修正议案。议案中包括三点内容：第一点是下令所有的官员、士兵、警察、学生剪辫，其余民众可以选择是否剪发；第二点是清廷对国内外的礼仪服饰进行全面考察，并保证如果将来要易服，只是对官员的制服加以改革，而日常的便服不会受到影响，新服饰所用的材料也必须全部采用国内的产品；第三，请摄政王和皇帝仿效日本明治天皇和战国时期赵国的武灵王，率先垂范，接受外国的礼仪惯例。这一议案在通过之后，将被送到另一个委员会，重新撰写为奏折上呈给朝廷。[141]

在资政院修订奏折内容之前，载沣自己已经卷入了争论之中，他没有搁置这份奏折，而是让它引起了更激烈的争论。之前对于农工商部的奏折，载沣已经在12月21日抢先颁布了谕令，声称满人服饰的规定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不容有任何改变。除了士兵和
166 警察之外（他们的制服已经做了更改），所有的人（尤其是官员和学生）都应该依循成例。[142]奇怪的是，这个谕令中只提到了服饰问题，这一点在资政院的议案中也已经先行搁置，而对于发式是

否也属于“成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五天以后，资政院再次上奏，请求废除“辫子”。载沣在12月30日对此做出的答复有些简短和含糊：“前经农工商部具奏，已降旨明白宣示中外矣，著仍遵前旨办理，此奏应即毋庸议。”[143]但是之前的谕令并没有提及“辫子”。根据一些最新的报道，摄政王自己是愿意改变发式的，但是却被度支部尚书载泽和其他人劝阻了。但是，正如1911年1月25日《时报》上的评论所指出，摄政王对剪辫问题的逃避是因为他对两方面都不认同。反对辫子的人呼吁他关注民众的呼声，支持辫子的人则认为辫子代表了“民族根本”。报纸抱怨说，朝廷根本没有一个明确的政策。一些人认为，载沣的沉默就是默许剪辫行为，只要继续保持传统的服饰；另一些人则说，没有载沣的明确认可，剪辫就依然是违法行为。大家各自为是的判断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混乱。朝廷每天都在强调中央集权，却并没有好好利用手中的大权。[144]

由于缺乏明确和清楚的指示，剪辫运动更加热烈地继续进行。伍廷芳从美国回国后一直住在上海，他自己于1911年1月14日剪去了辫子。第二天，他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公开的大型典礼，30个理发师为人们剪去了300条到1 000条长辫，周围有几千人围观和欢呼。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到剪辫运动中。在南京，据说一些擅长剪短发的日本理发师接待了大批学生顾客。在北京，在蒙古族学校和藏族学校中，很多学生也已经剪去了辫子。[145]剪发浪潮的高涨使得学部大臣唐景崇在1月中旬下令，要求全国所有的学校立刻停止剪辫行动。[146]正是这次学部的命令，而不是三周以前朝廷的谕令，才最终使得剪发的浪潮渐渐平息。

在1911年年初的剪发运动平息之后，公众的注意力又转到“责任内阁”的问题上。资政院谴责军机大臣不负责任的议案，已经因为1月11日资政院休会而被搁置。六天以后，载沣批准了一 *167*
个新的立宪时间表，这是宪政编查馆在他的授意下制定的。在这个新的时间表中，设立内阁的时间是1911年，颁布宪法的时间是1912年，召集两院制议会的时间是1913年。朝廷还要求变通旗制处继续筹办八旗生计问题，但是一个新的满人政治团体——八旗

宪政会，抨击了变通旗制处毫无作为。这让变通旗制处颇受挫败，也没有采取具体的措施。[147]5 月 8 日，根据新的立宪时间表，摄政王突然宣布根据 1906 年秋天讨论形成的纲要重组中央机构。军机处、内阁、政务处都被废除，代之以一个新的责任内阁，内阁由一名总理大臣和一到两名协理大臣，以及十名各部（礼部和吏部没有列入其中）尚书组成。摄政王关于君主掌握军事大权的理念也有所体现，和日本的明治天皇一样，陆军部尚书和海军部尚书都直接对皇帝负责，而不是对总理大臣负责。[148]

对于那些希望通过实施宪政而开启政治新局面的改良派而言，这样的内阁让他们十分失望。载沣所任命的新内阁基本上是旧制度的延续。虽然被资政院弹劾，四名军机大臣中的三名还是被任命为新内阁的首脑。奕劻担任总理大臣，那桐和徐世昌担任协理大臣，唯一没有被任命为新内阁成员的前军机大臣是毓朗，但他还是保留了在军谘处（此时改为军谘府，职责不变）的重要职位。此外，十名内阁成员中有九名都是各部现任尚书（外务部是梁敦彦（1872—1924），替换了邹嘉来（1853—1921）），总理大臣奕劻继续在外务部担任外务部总理大臣。新的中央机构中满汉高级官员的比例和以前基本一样。1911 年春成立的内阁中有 9 名满人，4 名汉人。这和之前军机大臣和各部尚书中满汉官员 11∶5 的比例大致相当。这次重组最主要的不同是宗室王公任职的数量大大增加。1910 年秋天中央最高机构中有四位王公，但 1911 年春的重组
168 机构中有五位王公。总理大臣奕劻，民政部善耆，财政部载泽，海军部载洵，农工商部溥伦。（溥伦曾任资政院总裁，但是在第一次颇为混乱的会议后不久就被朝廷免职，由世续担任。世续是一位保守的前军机大臣，朝廷希望他不会偏向资政院一边。）[149]

载沣这次人事任命也不是完全出人意料，早在六个月以前，《时报》就已经预测了这个结果。[150]但是，这对于改良派无疑是一次打击，他们特别反对王公占优势的政治格局。这次新内阁被称为“皇族内阁”。《东方杂志》在 5 月号中用了整页的篇幅，以“政界之亲贵”为标题刊登了专题照片。这立刻使人们更为关注皇族在载沣政府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些照片（图 11）包括：奕

图 11　“政界之亲贵”，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依次为：奕劻，载涛，载洵，溥伟，毓朗，溥伦
（《东方杂志》，第 8 卷第 2 号，1911 年 4 月。
感谢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

勋、载洵、载涛、溥伦、毓朗、溥伟（禁烟大臣）。《时报》也同样抱怨，13名内阁成员中，只有4名是汉人。几乎所有的重要职位都由亲贵担任。在7月初，《时报》警告说，这样的任命会让革命党人多了反满的理由，革命党人一直宣传反满主义，如果总理大臣是皇族，他们又有理由指责朝廷尊满排汉。来自上海的立宪派领导人张謇也私下感慨地说，朝廷中，陆军、海军以及最高的政治职位都完全掌握在亲贵手中，这不合于祖宗传统。[151]

然而，大多数批评并没有太多关注新内阁中的满人数量和亲贵数量，而是将矛头直指担任了内阁总理大臣的奕劻（这也是《时报》在7月的评论重点）。在任命新内阁的四天内，北京的谘议局联合会就召开会议表达了他们的失望。[152]6月中旬，联合会通过都察院向朝廷递交请愿书，指出任命亲贵担任总理大臣有违宪政的基本原则，君主立宪制的总理和内阁应该使君主隔离于党派政治之外，否则，就会是难以解决的两难局面。如果亲贵领导内阁，而内阁随后被推翻，那就会危及君权。另一方面，如果因为内阁是亲贵领导就不被推翻，那么这就不是宪政体制了。联合
169 会还指出载沣任命奕劻为总理大臣（其他王公担任各部尚书）与本朝先祖制定的“亲王不入军机处”的政治传统相违背。但这些指责并没有提及自从1861年奕䜣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后，这一传统就不断被打破了。相反，他们选择嘉庆皇帝1799年取消任命弟弟永瑆为军机大臣的例子，指出清中叶以来关于亲王不得参与政治的禁令不仅适用于以前的军机处，更适用于现在的新内阁。最后，他们要求免除奕劻内阁总理大臣的职务，由其他非皇族亲贵的高官担任此职。[153]虽然联合会的上书中并没有特别指出新的总理大臣应该是汉人，但是张謇、汤寿潜和上海的其他改良派人士，都力谏载沣效仿慈禧太后在50年前面对太平天国运动时的行为，任命一名有经验、有学识的汉人高官。他们心目中的人选是被免职的袁世凯，袁世凯和端方不同，他一直没有被召回重新任职。[154]

载沣拒绝重新考虑，他对谘议局联合会的请愿书置之不理，并指责了另一名官员，山东巡抚孙宝琦（1867—1931），他也递交了一份内容相似的奏折，反对亲贵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政治。（孙宝

琦和其他批评者不同，他和奕劻是姻亲，也是少有的满汉联姻。他的奏折激起了新闻界关于权谋的猜疑，认为这或许是奕劻自己加强政治地位的手段。另一方面，孙宝琦在此前也曾反对过摄政王，他在此前的一份奏折中也讨论了剪辫易服的好处。[155]

摄政王的不回应并没有唬住谘议局联合会，他们在6月底再次递交了请愿书，指出任命一名亲贵担任内阁总理大臣已经引起国外人士的嘲笑和国内人士的失落。请愿书再次重复了之前的批评，认为这次任命有违君主立宪的基本要求，并再次请朝廷任用亲贵以外的人担任内阁总理大臣。不久，资政院联合会又发布了长篇公开声明，表示了对六大公共事务的担忧，包括外国贷款和铁路干线国有化问题。这个声明也抱怨朝廷不回应关于内阁总理大臣任职问题的两次请愿。声明断言，新内阁和之前的军机处并没有什么区别，而资政院还曾数次弹劾军机处。“名义上，这是内阁，但实质上还是军机处。名义上是宪政体制，实质上还是君主政体。”联合会呼吁依照“君主立宪制中亲贵不能入内阁”的原则成立“完全内阁”。7月5日，载沣最终回应了联合会的请愿，但他的回答和12月资政院弹劾军机处时的答复一样。根据《宪法大纲》，摄政王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坚持，任命官员是朝廷的特权，不容破坏。[156]

当然，资政院联合会不满意这样的答复，但是此后关于内阁的抱怨很快就被另外的风潮所掩盖。载沣在5月份作出两个决定：铁路干线国有和向外国贷款修建铁路。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骚动。众所周知，反对铁路干线国有和向国外大笔贷款的运动席卷全国，到9月初，四川已经发生了全省的起义。最后，当湖北的新军前往长江流域镇压革命，很快引发了武昌起义，并成为1911年革命的发端。

结　语

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始于摄政王多尔衮（1643—1650为摄政王）的掌权，最后又终结于另一个摄政王载沣。载沣因为慈禧太后而

获得权力，她考虑到自己可能比光绪皇帝更长寿，于是想再找一个幼年的皇帝和顺从的父亲，以便她可以继续垂帘听政。在溥仪被立为光绪皇帝皇位继承人后第二天，慈禧太后就突然离世，这使得年轻毫无经验的载沣突然进入一个复杂而迅速变动的政治局面中。这是任何人，包括慈禧太后自己都难以把握的局面。

171 在某些方面，载沣延续和扩大了慈禧太后的一些政策。正是慈禧太后削夺了袁世凯北洋新军六镇中四镇的军权，将其划归陆军部管辖。载沣则完成了对剩余两镇的军事控制，同样，也是慈禧太后开始平满汉畛域，并承诺任命官员时不分满汉，她在中央机构中开始任用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满人。载沣延续了她的很多措施。于是，摄政王在1911年5月任命满人为主的内阁，和慈禧太后在1906年年底重组中央机构时主要任用满人的做法，并无多大区别，当然在程度上还是不一样。

在其他方面，载沣的措施还超过了慈禧太后。比如慈禧太后想要削弱袁世凯的军权，加强中央集权，使得中央的统治胜过日益增长的地方自治。载沣延续了这一政策，例如，他重组了海军，也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但是载沣还有更多的考虑，他不仅强调中央政府的利益，更强调朝廷君主的利益；他不仅要加强中央集权，更要加强君权。这一目标也是慈禧太后意图的体现。她在当政期间，笼络并栽培了越来越多的皇族亲贵在朝廷最高机构中任职。载沣同样延续了这一策略，并在1911年5月任命“皇族内阁”时达到高潮。但是载沣也进一步深化了慈禧太后的措施。例如他将慈禧太后设立的附属于陆军部的军谘处独立出来，并由朝廷直接控制。同样，虽然陆军第一镇以满人居多，但是载沣依然不满意于由其直接护卫宫廷，因为陆军第一镇由陆军部控制。于是载沣另外组建了一支由自己直接领导的禁卫军。可以说，禁卫军的建立是载沣摄政期间最重要的政绩之一。这些加强君权的努力，都是从日本明治天皇和德国两位威廉皇帝的成功之道中得到的启发。

但是，载沣缺乏慈禧太后在政策方面的稳定性。一方面，他很有决断，很强硬，甚至有些顽固。所以，他罢免了袁世凯，后

者当时是奕劻之外第二位最有权势的官员。尽管被多方游说，他还是拒绝赦免康有为和梁启超。此外，他也拒绝重新考虑任命内阁。另一方面，摄政王也优柔寡断，容易屈服于外来压力。所以他对慈禧太后 1907 年年底解散各省驻防的谕令并没有彻底实施，而且，由于恩准很多满人官员免除丁忧的要求，他可以说是嘲弄了自己关于满汉官员遵守一致的丁忧时期的谕令。

由于这样的左右摇摆，载沣也没有解决什么满汉问题。他之前最主要的功绩就是延续了慈禧太后的政策，要求所有旗人（宗室除外）和汉人一样受制于同样的法令。在这一方面，载沣消除了满汉在法律上的差异。但是，另一种形式的满汉差异依然存在。1911 年，八旗制度并没有被废除，也没有被重新改组。载沣领导下的变通旗制处也一直没有什么作为。满人依然被界定为旗人，而其他大部分的汉人则被界定为汉民。除了在东北，旗人依然接受八旗官员的管理，而不是和汉民一样接受地方衙门的管理。八旗士兵也继续获得朝廷的固定军饷。旗人都居住在独立的“满城”中，和汉民隔离开来。虽然朝廷不再禁止满汉通婚，但是大部分旗人还是不愿意和汉人联姻。满人遵守着和汉人不同的社会习俗。满人女性不缠足，穿旗装，梳旗头。满人男性在公开场合都自称名，而不称姓。总之，在 1907 年巡抚恩铭被暗杀后，关于满汉关系的大讨论将所有的满汉差异都推向高潮。这些满汉差异是慈禧太后承诺要消除的，但是直到四年后辛亥革命的前夕还依然存在。 *172*

满汉差异继续存在，很多汉族革命者对于满人的仇恨就依然存在。企图刺杀摄政王的汪精卫由于缺乏对满汉关系的愤怒而显得反常。更为典型的是邝佐治，和暗杀恩铭的徐锡麟一样，他一直困扰于“种族问题”。1910 年，邝佐治试图刺杀摄政王的弟弟，就是希望中国能从满人的压迫中解放出来。汉人内心对满人的持续憎恨最后在 1911 年 4 月 8 日爆发出来，当时广州驻防将军、满洲旗人孚琦，被东南亚的海外华工温生才（1870—1911）枪击身亡。温生才在 1 周后被处决，他反复声明，他杀死孚琦只是因为后者是满人，他希望通过这样的行动来为四亿汉人同胞复仇。他还号召其他人继续这一复仇行动。[157] 6 个月后，温生才实现了他的

愿望，他和吴樾、徐锡麟为之自我牺牲的革命终于爆发了。

【注释】

[1]《大清皇帝实录·光绪实录》卷578，7b。《政治官报》，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9～10页；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11～13页。英国外交部档案，FO 405/182，no. 166，1908年6月4日Jordan（朱尔典）致Grey（格瑞）的信中，对1908年5月事件的概述。

[2]《大清皇帝实录·光绪实录》卷578，7b～8a；卷581，10a～11a。《政治官报》，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6～7页。

[3]《政治官报》，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10～11页；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12～14页；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6～8页；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三十日，12～13页；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六日，5～6页；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二日，5～8页。会议政务处档案，卷149，1059号，成都将军绰哈布奏折，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4] 会议政务处档案，卷149，1059号，成都将军绰哈布奏折，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政治官报》，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十二日，10～12页；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二日，5～8页。

[5]《政治官报》，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十日，5～9页；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4～15页。

[6] 同上书，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8～10页；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4～15页。

[7] 同上书，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一日，7～12页；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5～6页。《大清皇帝实录·光绪实录》卷581，16b。

[8]《政治官报》，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9～11页；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1～13页；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4～15页；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三十日，12～13页。

[9] 同上书，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一日，7～12页；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六日，5～7页；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5～6页。

[10]《东方杂志》，第5卷第10号，“记载”，115页（光绪三十四年十月）。

[11] 关于修订法律大臣对于法律的修订和编撰，见Brunnert，H. S.（布鲁纳特），Hagelstrom，V. V.（哈盖尔斯特罗姆），*Present Da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当今中国的政治机构》），174页。钱实甫：《清季新设职官年表》，57页。

[12]《光绪朝东华录》，5794～5795、5813～5814 页。沈家本：《沈寄簃先生遗书（甲编）·文存》卷 1，11a～14b。李贵连：《沈家本与中国法律现代化》，110～113 页。

[13]《东方杂志》，第 5 卷第 2 号，“内务”，101～108、135 页（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光绪朝东华录》，5769～5770 页。《政治官报》，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七日，19 页（重印修订本第 579 页）。侯宜杰：《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的杨度》，载《近代史研究》，1986（6），110 页。关于新的宫廷体制，见 Brunnert，H. S.（布鲁纳特），Hagelstrom，V. V.（哈盖尔斯特罗姆），*Present Da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当今中国的政治机构》），758～761 页。

[14]《时报》，宣统二年八月二日，2 页。

[15] 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 6，8a～8b。

[16] 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348～356、365～373 页。

[17] 同上书，350～352、367 页。章开沅：《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323 页。关于瑞澂，见魏秀梅：《清季职官表·人物录》，193 页。Hummel，Arthur W.（恒慕义）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清代名人传略》），128 页。

[18]《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609～617 页。侯宜杰：《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的杨度》，载《近代史研究》，1986（6），103 页。

[19]《东方杂志》，第 5 卷第 1 号，“教育”，42～43 页（光绪三十四年一月）。《大同报》，第 7 号，69～94 页（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一日）。关于《中央大同日报》，见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588 页。

[20]《北京女报》，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六日，3 页；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十二日，2～3 页。侯宜杰：《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的杨度》，载《近代史研究》，1986（6），104 页。

[21]《大清皇帝实录·光绪实录》卷 583，5b～7b。

[22] 杨度：《杨度集》，811～812 页。关于政治机构，见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285～286 页。

[23]《北华捷报》，1908-07-04，26 页。《政治官报》，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十五日，4～5 页。

[24]《东方杂志》，第 5 卷第 7 号，“记载”，10～11 页（光绪三十四年七月）。李守孔：《政闻社之成立与停闭》，见《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07》，631 页。

[25] 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384～385 页。《东方杂志》，第 5 卷第

7号，“记载”，2页（光绪三十四年七月）；第5卷第8号，“记载”，35～38、61～62页（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关于松毓，见《东方杂志》，第5卷第2号，“内务”，141页（光绪三十四年二月）。

[26]《大清皇帝实录·光绪实录》卷594，12b～13a。李守孔：《政闻社之成立与停闭》见《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07》，632页。《东方杂志》，第5卷第10号，“记载”，95～96页（光绪三十四年十月）。

[27] 杨度：《杨度集》，811页。侯宜杰：《杨度二题》，载《近代史研究》，1986（6），237～244页。杨度的传记概要，见Boorman Howard L.（包华德），Richard C. Howard（里查德·霍华德），*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词典》），第4卷，13～16页。

[28]《大清皇帝实录·光绪实录》卷595，1a～3a。《政治官报》，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二日，5～18页。

[29] 侯宜杰：《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的杨度》，载《近代史研究》，1986（6），106～107页。

[30] 见Hummel，Arthur W.（恒慕义）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清代名人传略》），733页。

[31] Hao，Yen-p'ing（郝延平），Kwang-Ching Liu（刘广京），“The Importance of the Archival Palace Memorials of the Ch'ing Dynasty：*The Secret Palace Memorial of the Kuang-hsü Period，1875－1908*”（《清代宫中档的重要意义：光绪时期的宫中密档，1875—1908》），in *Ch'ing-Shih Wen-T'i*（《清史问题》），1974，3（1），88～89页。

[32] 朱金甫、周文泉：《从清宫医案论光绪帝载湉之死》，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3）。

[33]《北华捷报》、1908－12－19，697页。关于溥伦和溥伟，见Hummel，Arthur W.（恒慕义）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清代名人传略》），378、383页。关于溥忠，见李治亭主编：《爱新觉罗家族全书》，第2册，357页。

[34] 萧一山：《清代通史》，2488～2493页。英国外交部档案，FO 405/183，no. 127，1908年11月14日Jordan（朱尔典）致Grey（格瑞）的信。《大清皇帝实录·光绪实录》卷597，9a、10a。

[35] Morrison，G. E.（莫理循），*The Correspondence of G. E. Morrison，1895－1912*（《莫理循通信集（1895—1912）》），308～309页。

[36]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1274页。天嘏：《满清外史》，70～71页。

[37]《大清皇帝实录·光绪实录》卷573，10b；卷586，1b。

[38]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载涛：《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见《晚清宫廷生活见闻》，79页。

[39]《大清皇帝实录·光绪实录》卷597，10a～10b。

[40]《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3，5b～11b；卷25，7a。载润：《隆裕与载沣之矛盾》，见《晚清宫廷生活见闻》，76～77页。

[41]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405/190，no.58，1909年1月5日Hillier（赫利尔）致Addis（阿迪斯）的信。Headland，Isaac Taylor（何德兰），*Court Life in China：The Capital，Its Officials and People*（《晚清宫廷见闻录》），171页。美国国务院档案，14911/40—52，1908年11月17日Rockhill（柔克义）致国务院的信。

[42]《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4，24b。载涛：《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见《晚清宫廷生活见闻》，80～81页，关于袁世凯被解职的更多情况，参见侯宜杰：《袁世凯一生》，101～103页。

[43] 李宗一：《袁世凯传》，158页。

[44] 沈云龙：《掌握晚清政柄之奕劻》，见《近代政治人物论丛》，第1册，74～76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0》，36～37、42～43页。《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3，33a。

[45] 关于翁同龢，见《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14，8a；《东方杂志》，第6卷第7号，“记载一”，331页（宣统元年六月）；Hummel，Arthur W.（恒慕义）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清代名人传略》），861页。关于陈宝箴，见《国风报》，第1卷第3期，127～129页（宣统二年二月一日）。

[46] 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5集，8页。Bays，Daniel H.（裴士丹），*China Enters the Twentieth Century：Chang Chih-tung and the Issues of a New Age，1895-1909*（《迈入20世纪的中国：张之洞与一个新的时代，1895—1909》），59～61、211～212页。《北华捷报》，1909-10-16，134页。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150～151页。Morrison，G.E.（莫理循），*The Correspondence of G.E.Morrison，1895-1912*（《莫理循通信集（1895—1912）》），653～654页。

[47]《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2，16b～17b。

[48]《政治官报》，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六日，7页。《东方杂志》，第6卷第6号，“记载一”，298页（宣统元年五月）。

[49]《东方杂志》，第6卷第7号，“记载1”，351页（宣统元年六月）。

关于广东的选举程序，参见 Rhoads，Edward J. M.（路康乐），“The Assassination of Governor Enming and Its Effect on Manchu-han Relations in Late Qing China”（《暗杀恩铭对晚清满汉关系的影响》），in Etō Shinkichi（爱图），Harold Z. Schiffrin（史扶邻）eds.，*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中国的共和革命》）。

[50]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248～252 页。

[51]《东方杂志》，第 6 卷第 7 号，“记载一”，351 页（宣统元年六月）。宪政编查馆档案，“考察筹备宪政”，19 号。

[52]《东方杂志》，第 6 卷第 13 号，“记载一”，480、482 页（宣统元年十二月）。英国外交部档案，FO 405/199，no. 26，附 1，“浙江省谘议局讨论事项”。

[53]《时报》，宣统元年十一月一日，5 页。宪政编查馆档案，“考察筹备宪政”，28 号，两广总督袁树勋和广州将军增祺的奏折（日期不明），宣统元年三月二十二日。

[54]《政治官报》，宣统元年七月十一日，6 页。Brunnert，H. S.（布鲁纳特），Hagelstrom，V. V.（哈盖尔斯特罗姆），*Present Da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当今中国的政治机构》），167 页。《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 34，1a～3a；卷 35，3b～4a。军机处宪政专题档案，448 号，金梁请愿书，宣统三年四月三日。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313～320 页。

[55]《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 3，17b～18b。《政治官报》，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二日，17 页。

[56]《中央大同日报》，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日，3 页；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四日，3 页；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3 页；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3 页。《顺天时报》，宣统元年三月二十二日，4 页；宣统元年四月十二日，4 页；宣统元年八月五日，7 页。

[57]《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 4，7a～7b。

[58]《东方杂志》，第 6 卷第 5 号，“记载一”，227～228 页（宣统元年四月）。《顺天时报》，宣统元年三月三日，7 页。

[59]《北京女报》，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1～2 页。赵书：《辛亥革命前后的北京满族人》，载《满族研究》，1989（3），15 页。

[60] 金梁：《光宣小记》，121～122 页。Crossley，Pamela Kyle（柯娇燕），*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孤军：三代满族人和清朝的灭亡》），193 页。

[61]《政治官报》，宣统元年三月九日，5～7页；宣统元年十二月十三日，9页；宣统二年四月五日，16页；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4～15页。姜相顺：《近代沈阳满人的经济生活和民族资本的发展》，载《满族研究》，1987（3），34页。

[62]《政治官报》，宣统元年十二月十三日，8页。

[63] 金梁：《光宣小记》，143页。

[64] 同上书，139～140页。《顺天时报》，宣统二年五月二十五日，7页。

[65]《政治官报》，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5页；宣统三年闰六月十三日，第13版。《时报》，宣统三年六月十七日，2页。

[66]《中央大同日报》，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九日，2页。

[67] 章伯锋编：《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等年报》，见杨家骆等主编：《新修清季卅九表》，59～61、105～106、151～152页。《政治官报》，宣统二年三月二十六日，12～13页。

[68]《顺天时报》，宣统二年四月三日，7页；宣统二年六月十七日，7页。《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36，37a～38a；卷37，10a。

[69]《政治官报》，宣统元年闰二月五日，6～10页。《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9，6a～6b。《东方杂志》，第6卷第4号，“记载一”，163页（宣统元年三月）。

[70]《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9，6a～6b。《东方杂志》，第6卷第4号，“记载一”，163页（宣统元年三月）。

[71]《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30，25b～26a；卷31，1a。关于“阿哈”作为“奴才”的含义，见Norman，Jerry（罗杰瑞），*A Concise Manchu-English Lexicon*（《简明满英词典》），7页。

[72]《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41，17b～18a。《政治官报》，宣统二年八月二十五日，8～9页。

[73]《政治官报》，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二日，9页。

[74]《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3，7a～7b。

[75] 载涛：《禁卫军之建立与改变》，见郑怀义、张建设：《末代皇叔载涛沉浮录》，237页。Aisin-Gioro（爱新觉罗·溥仪），*From Emperor to Citizeni*《我的前半生》，21页。张国淦：《清末禁卫军》，见章伯锋、李宗一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1卷，23页。根据载涛的说法，他哥哥对于皇帝军事大权的兴趣是在1905年4月德国亨利亲王（Prince Heinrich）回访中国时得以加强的。但是当时访问中国的德国亲王不是亨利，而是弗雷德里

希·利奥波德（Friedrich Leopold），见《北华捷报》，1905-04-14，61页。

[76]《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14，20b～21b。Bays，Daniel H.（裴士丹），*China Enters the Twentieth Century：Chang Chih-tung and the Issues of a New Age，1895-1909*（《迈入20世纪的中国：张之洞与一个新的时代，1895—1909》），213页。《东方杂志》，第6卷第7号，"记载一"，332～333页（宣统元年六月）。关于武宗，见Goodrich（傅路德）、房兆楹编，*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明代传记辞典》），311～312页。Huang，R.（黄仁宇），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万历十五年》），96～99页。

[77]《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14，21a～25b；卷15，7b。Brunnert，H. S.（布鲁纳特），Hagelstrom，V. V.（哈盖尔斯特罗姆），*Present Da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当今中国的政治机构》），184页。《政治官报》，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三日，4～8页。钱实甫：《清季新设职官年表》，60页。Powell，Ralph L.（拉尔夫·鲍威尔），*The Rise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1895-1912*（《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246～265页。郑怀义、张建设：《末代皇叔载涛沉浮录》，33～35页。《北京女报》，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4页。关于日本的先例，见Hackett，Roger F.（汉克特·罗杰），*Yamagata Aritomo in the Rise of Modern Japan，1838-1922*（《山县有朋与现代日本发展（1838—1922）》），82～83页。Presseisen，Ernst L.（普瑞森·尔斯特），*Before Aggression：Europeans Prepare the Japanese Army*（《侵略之前：欧洲人造就的日本军队》），59～67页。

[78]《北华捷报》，1907-06-26，228页。《北京女报》，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十六日，3页；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3页。

[79]《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4，3a。

[80] 同上书，卷4，3a；卷7，34b～35a；卷14，21b；卷38，36b。张国淦：《清末禁卫军》，见章伯锋、李宗一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1卷，23页。钱实甫：《清季新设职官年表》，60页。

[81]《顺天时报》，宣统元年闰二月二日，7页。禁卫军训练处档案，卷1，奏折，未注明日期。张国淦：《清末禁卫军》，见章伯锋、李宗一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1卷，23页。田原天南：《清末民初中国官绅人名录》74、315页。*Saishin Shina kanshin roku*（《最新支那官绅录》），392～393。关于溥侗，见Morrison，G. E.（莫理循），*The Correspondence of G. E. Morrison，1895-1912*（《莫理循通信集（1895—1912）》），768～769页。《顺天时报》，宣统三年八月十七日，7页。忻平等：《民国社会大观》，

35 页。

[82] 禁卫军训练处档案，卷 1，回应光绪谕令的一些奏折和备忘录，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三日。吴兆清：《清末禁卫军》，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2），13～14、20 页。Powell，Ralph L.（拉尔夫·鲍威尔），*The Rise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1895－1912*（《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294 页。Fung，Edmund S. K.（冯兆基），*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The New Army and Its Role in the Revolution of 1911*（《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21～22 页。

[83]《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 4，3a。《顺天时报》，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2 页。禁卫军训练处档案，卷 1，回应光绪谕令的一些奏折，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三日。吴兆清：《清末禁卫军》，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2），19 页。

[84] 禁卫军训练处档案，卷 1，回应光绪谕令的一些奏折，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三日；卷 3，“日报表”，宣统元年四月。《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 16，20a。吴兆清：《清末禁卫军》，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2），19 页。《顺天时报》，宣统元年五月三日，7 页；宣统元年八月四日，7 页；宣统元年八月十三日，7 页。

[85] 吴兆清：《清末禁卫军》，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2），19 页。

[86]《政治官报》，宣统二年九月三十日，4～5 页。《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 41，18b。

[87] 禁卫军训练处档案，卷 3，宣统元年七、八月“日报表”。《时报》，宣统二年五月十三日，2 页。

[88] 禁卫军训练处档案，卷 3，宣统元年十月十六、二十五日“日报表”。美国总参谋部档案，6238/4，1910 年 11 月 30 日军情月报告。

[89]《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 21，21a。《政治官报》，宣统元年九月四日，5～7 页。

[90]《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 17，29b～30a；卷 28，2a～2b。《时报》，宣统二年一月二十九日，2 页；宣统二年二月八日，3 页。《内阁官报》，宣统三年七月二十九日，375～376 页。关于载润，见李治亭主编：《爱新觉罗家族全书》，第 3 册，171～172 页。

[91]《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 21，21a。《时报》，宣统二年五月十三日，2 页。禁卫军训练处档案，卷 3，宣统元年十月十六、二十五日“日报表”。*Saishin Shina kanshin roku*（《最新支那官绅录》），397 页。恽

宝惠：《辛亥冯国璋接统禁卫军后的活动》，见《文史资料选辑》，1960（9），119页。

[92]《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21，34a。吴兆清：《清末禁卫军》，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2），20页。梁旭毅：《良弼传》，28～30页。田原天南：《清末民初中国官绅人名录》，35～36页。关于载涛的军事旅程，参见《国风报》，第1卷第6期，67页（宣统二年三月一日）。

[93] 载涛：《禁卫军之建立与改变》，见郑怀义、张建设：《末代皇叔载涛沉浮录》，239页。张国淦：《清末禁卫军》，见章伯锋、李宗一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1卷，23页。恽宝惠：《辛亥冯国璋接统禁卫军后的活动》，见《文史资料选辑》，1960（9），119页。吴兆清：《清末禁卫军》，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2），20、22页。

[94] 美国总参谋部档案，6283/8，1910年4月20日军情月报告。《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59，19a～19b。《东方杂志》，第8卷第8号，“中国大事记”，13页（宣统三年八月）。《顺天时报》，宣统三年六月十八日，7页；宣统三年六月二十一日，7页；宣统三年七月二十五日，7页。吴兆清：《清末禁卫军》，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2），20～23页。

[95]《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7，34b～35a。白杰：《清末政坛中的肃亲王善耆》，载《满族研究》，1993（2），38页。

[96]《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14，9a～12a、21b～22a。关于萨镇冰，见田原天南：《清末民初中国官绅人名录》，766页。《中国近代史词典》，615～616页。

[97]《东方杂志》，第6卷第9号，“记载”，253～254页（宣统元年八月）。林献炘：《载洵萨镇冰出国考察海军》，见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846～849页。《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44，3b～4b、9a。

[98] 林献炘：《载洵萨镇冰出国考察海军》，见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846页。《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44，9b～10a。

[99]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171～172、850～852、893、898页。

[100] 严寿华：《海容等舰在辛亥革命中经历》，见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706页。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444、591～592、597页。

[101] 林献炘：《载洵萨镇冰出国考察海军》，见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849页。

[102]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405/190，no. 150，1909年3月16日 Jordan（朱尔典）致 Grey（格瑞）的信。《北华捷报》，1909-08-21，413～414页；1909-08-28，477～478页。Bays，Daniel H.（裴士丹），*China Enters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ang Chih-tung and the Issues of a New Age, 1895–1909（《迈入20世纪的中国：张之洞与一个新的时代，1895—1909》），214页。Ch'en, Jerome（陈志让），*Yuan Shih-k'ai*（《袁世凯》），60页。

[103] 钱实甫：《清季重要职官年表》，见杨家骆等主编：《新修清季史卅九表》，51、109页。我把海军部也纳入了分析，虽然它是在此后几个月才建立的。

[104]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405/191，no. 33，1909年7月15日Jordan（朱尔典）致Grey（格瑞）的信。钱实甫：《清季重要职官年表》，见杨家骆等主编：《新修清季史卅九表》，138～160页。

[105]《东方杂志》，第6卷第12号，"记载"，437页（宣统元年十一月）。《政治官报》，宣统元年十月十四日，9～10页。

[106]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405/191，no. 153，1909年11月26日Jordan（朱尔典）致Grey（格瑞）的信。《顺天时报》，宣统二年七月二十三日，7页。《时报》，宣统二年一月八日，2页。《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53，4b。

[107]《北华捷报》，1909-08-07，328页。《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31，11b；卷40，7a。《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8卷，110页。

[108]《时报》，宣统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2页。《东方杂志》，第7卷第4号，"文件一"，49～50页（宣统二年四月）。

[109] 章开沅：《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332、337页。白杰：《清末政坛中的肃亲王善耆》，载《满族研究》，1993（2），38页。

[110] 朱兰亭、徐凤晨：《熊成基谋刺载洵辨析》，载《近代史研究》，1988（6）。吕鉴：《关于熊成基烈士的新史料》，载《历史档案》，1982（3）。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187～194页。《东方杂志》，第7卷第2号，"记载三"，45～46页（宣统二年二月）。冯自由的书错误地称熊成基试图刺杀载涛。

[111]《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0》，87～88页。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卷中，230～235页。

[112]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卷中，235～238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0》，88～89、104～106页。《东方杂志》，第7卷第3号，"记载一"，47～48页（宣统二年三月）。金祥瑞：《我是怎么侦破谋炸摄政王一案的》，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8集，469～474页。

[113]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卷中，238～245页。也见《清末汪兆铭被捕后的供单及有关史料》，载《历史档案》，1983（2）。

[114]《东方杂志》，第7卷第3号，“记载一”，47～48页（宣统二年三月）。

[115]《清末汪兆铭被捕后的供单及有关史料》，载《历史档案》，1983(2)，21页。《时报》，宣统二年三月十六日，2页。《北华捷报》，1910-05-13，374页。

[116] 章开沅：《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317～340页。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251～254页；第6集，50～51页。白杰：《清末政坛中的肃亲王善耆》，载《满族研究》，1993(2)，38页。也见《辛亥革命》，第2册，290页。

[117]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卷中，246、251～254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0》，108～109页。

[118]《东方杂志》，第7卷第11号，“记载三”，359～361页（宣统二年十一月）。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287～289页。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1910-10-07。

[119]《东方杂志》，第7卷第12号，“记载一”，169页（宣统二年十二月）。

[120] Farjenel，Fernand（法杰勒），*Through the Chinese Revolution*（《透过中国革命》），21页。

[121] 李守孔：《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与辛亥革命》，见吴相湘主编：《中国现代史丛刊》，第3册，321～338页。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393～405页。《时报》，宣统元年十二月十四日，2页。《东方杂志》，第7卷第1号，“文件一”，17～20页，（宣统二年一月）。《顺天时报》，宣统二年六月八日，4页；宣统二年六月九日，4页。《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36，28a～30a。

[122]《东方杂志》，第7卷第11号，“记载一”，143～151页（宣统二年十一月）。《时报》，宣统二年九月二十五日，2页。

[123]《东方杂志》，第7卷第11号，“记载一”，151～157页（宣统二年十一月）。Des Forges，Roger V.（戴福士），*Hsi-liang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Revolution*（《锡良与中国民族革命》），171～172页。

[124]《东方杂志》，第7卷第11号，“记载一”，154～156页（宣统二年十一月）。

[125]《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43，2b～5b、6b；卷44，9a～9b。

[126]《东方杂志》，第7卷第11号，“记载一”，158～159页（宣统二年十一月）。李守孔：《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与辛亥革命》，见吴相湘主编：《中国

现代史丛刊》，第3册，346页。

[127]《东方杂志》，第7卷第12号，“记载一”，178～180页（宣统二年十二月）。《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45，11a～11b、14b～16a。《国风报》，第1卷第32期，109～110页（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128]《东方杂志》，第7卷第11号，“中国大事记补遗”，85页（宣统二年十一月）；第7卷第12号，“中国大事记补遗”，104～106页（宣统二年十二月）。《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43，15b～16a。

[129]《东方杂志》，第7卷第11号，“中国大事记补遗”，85～86页（宣统二年十一月）。《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43，30b～31a。

[130]《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43，34a。《东方杂志》，第7卷第11号，“中国大事记补遗”，86页（宣统二年十一月）。

[131]《国风报》，第1卷第30期，89～90页（宣统二年十一月一日）。《东方杂志》，第7卷第12号，“记载一”，170～174页（宣统二年十二月）。《北华捷报》，1910-12-16，660页。

[132]《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45，1a～2a。《东方杂志》，第7卷第12号，“记载一”，174～177页（宣统二年十二月）。英国外交部档案，FO 405/204，no. 89，1911年1月31日Jordan（朱尔典）致Grey（格瑞）的信。

[133]《东方杂志》，第7卷第11号，“记载三”，326～327页（宣统二年十一月）。《国风报》，第1卷第32期，92～93页（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顺天时报》，宣统二年十二月四日，7页。

[134]《东方杂志》，第7卷第8号，“文件一”，98～100页（宣统二年八月）。《北华捷报》，1910-08-05，309～310页。Pomerantz-Zhang，Linda（琳达），*Wu Tingfang（1842－1922）：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伍廷芳（1842—1922）：近代中国的改革与现代化》），186～188页。

[135]《东方杂志》，第7卷第3号，“文件一”，40～41（宣统二年三月）。《北华捷报》，1909-12-08，660页。

[136]《时报》，宣统二年三月四日，2页。以及下列等等。

[137]《北华捷报》，1909-11-13，364页。英国外交部档案，FO 405/199，no. 162，1910年4月“Summary of the Peking press”（《北京出版概略》）。《时报》，宣统二年三月十七日，2页。

[138]《时报》，宣统二年八月九日，2页；宣统二年九月七日，3页。

[139]同上书，宣统二年七月二十七日，2页。

[140]《时报》，宣统二年八月二十一日，2页；宣统二年八月二十四日，3页；宣统二年九月二日，3页。《东方杂志》，第7卷第9号，“记载三”，261页（宣统二年九月）。《政治官报》，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7～8页。

[141]《时报》，宣统二年十一月三日，2页；宣统二年十一月七日，2页；宣统二年十一月九日，1页；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页；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5页。

[142]《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45，10b～11a。

[143]《时报》，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2页。《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45，20a。

[144]《时报》，宣统二年十二月三日，2页；宣统二年十二月九日，2页；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页。

[145]《北华捷报》，1911-01-20，148～149、158～159页。《时报》，宣统二年十二月六日，3页；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二日，2页。

[146]《时报》，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七日，2页。《顺天时报》，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4页。

[147]《东方杂志》，第8卷第1号，“中国大事记”，4页（宣统三年二月）。关于八旗宪政会，见《国风报》，第1卷第29期，81页（宣统二年十月二十一日）；《时报》，宣统二年十月二十九日，1页。

[148]《东方杂志》，第8卷第4号，“中国大事记”，2～3页（宣统三年五月）。《北华捷报》，1911-05-13，391、436页。

[149]钱实甫：《清季重要职官年表》，见杨家骆等主编：《新修清季史卅九表》，110～111页。

[150]《时报》，宣统二年十月五日，2页。

[151]《东方杂志》，第8卷第1号（宣统三年二月）（台湾重印版19 069页）。《时报》，宣统三年四月十二日，1页；宣统三年四月十四日，1页。李守孔：《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与辛亥革命》，见吴相湘主编：《中国现代史丛刊》，第3册，358页。张謇：《啬翁自定年谱》，66页。

[152]《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1》，246～24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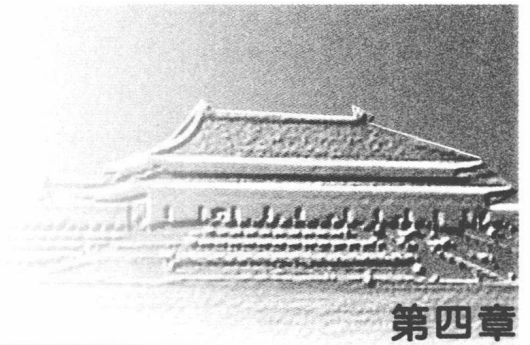
[153]《东方杂志》，第8卷第5号，“中国大事记”，7～9页（宣统三年六月）。

[154]张謇：《啬翁自定年谱》，66页。

[155]《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54，23a～23b。《北华捷报》，1911-06-24，833页。《时报》，宣统二年十二月九日，2页。

[156]《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577～579页。《国风报》，第2卷第14期，70～73页（宣统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55，11b～12a。

[157] 岭南半翁（化名）：《温生才刺杀广州都统兼署将军孚琦》，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2编第13册，699～703页。



第四章

辛亥革命

173

辛亥革命始于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结束于四个多月后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的退位。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满人对中国长达286年的统治。宣统皇帝的父亲醇亲王载沣利用手中掌握的大权，对开始的起义在军事上采取了相当有力的回击，但是他随即深陷于资政院第一届会议以来还没有解决的大量政治问题。革命爆发后的一个月内，载沣被迫放弃了有争议的“皇族内阁”，屈从于要求尽快召开国会的高涨热潮。同时，革命在湖北以外的各个地方迅速蔓延，并吞没了其他各省的各个旗人社群。由于无论在言辞上还是在行动上，这场革命都被赋予了反满的色彩，因此受革命波及的各地驻防八旗似乎都面临着族群灭绝的威胁，而且他们需要自己去面对和应付。一些驻防八旗得以相对安全地在革命风潮中保存下来，而其他的则没有这么幸运。清廷最终认识到了抗争也是徒劳，不得不立即召回袁世凯，将清朝的前途交付到他的手上。代表北京的袁世凯与南方的革命力量进行谈判。但这些谈判只是导致了清帝的退位。

清廷的军事反应

武昌起义在10月10日晚上打响，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被述说得最多的事件，但是在大量欢呼性的叙述中很难看到关于清廷对这场起义及随后的革命战争应对情况的只言片语。事实上，在载沣摄政初期，他和两个弟弟就对朝廷的陆军和海军倾注了很多心血，而陆海军也在革命开始的三周显现出了自身的实力。他们对革命军展开了一场有效的反击，并于11月1日从起义军手中夺回了汉口，使这场反击达到了一个高潮。 174

北京的统治者在10月11日下午就知道了武昌的这次起义，他们又花了一天的时间才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内阁协理大臣那桐正在接待一些外国使臣，当时法国驻华公使告诉了他这一消息。那桐撇开宾客，迅速来到总理大臣奕劻的家里，这里已经聚集了其他内阁成员和高级官员。在这里，他们浪费了整个白天和晚上，当然伴随而来的是更多的坏消息。[1]到12日早上，整个武汉三镇——武昌、汉口、汉阳——都已经落入了革命军之手。大部分湖北新军都背叛了，其中黎元洪（1864—1928）是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他被说服加入起义队伍，并被推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不久军政府就囊括了绅商两界的知名精英。当时仅有两个营和张彪统率的第八镇还效忠于清廷，他们撤退到刘家庙（刘家祠堂），这个村子位于北京至汉口铁路终点站以北的六英里处。同时，在长江中一艘炮艇上的避难处，湖广总督瑞澂，这位具有改良思想的满人——他以前是张謇立宪派中的一员——电奏清廷，“请派大员，多带劲旅赴鄂剿办”。[2]

摄政王（自称大元帅）立即命令陆海军驰援武昌。他的主要顾问是军谘府的载涛、毓朗，海军部大臣载洵，陆军部大臣荫昌，所有的人都是满人。除了荫昌，所有的人都是王公。根据他们的建议，10月12日，载沣让荫昌掌握军事大权，带领两队新军增援湖北。载沣直接指挥改编后的海军——海军提督萨镇冰统领的巡洋舰队、程允和统领的长江舰队——尽快从上海挺进长江。[3]两天

后，载沣试图谋求袁世凯的帮助，但没有成功。1909 年 1 月，北洋新军的创建人袁世凯被朝廷以莫须有的足疾为名，勒令回到家乡河南北部的彰德（今安阳）养病。此后曾有大量把他召回朝廷的建议。最近的一次，是在“皇族内阁”争议纷飞的时候，一些批评内阁之人将袁世凯看做取代奕劻成为总理大臣的最佳选择。
175 直到那时，摄政王仍然对这些建议装聋作哑。但现在，他被迫发布谕令，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取代被撤职的瑞澂），并授权他与陆军部大臣荫昌和海军提督萨镇冰一道，拥有联合指挥权。然而，袁世凯声称自己的足疾尚未痊愈，拒绝接受任命。但是从袁世凯在隐居地的个人电报资料来看，他当时曾向清廷提出了一些人事方面的建议，被清廷迅速采纳了。[4]

让荫昌统领军队对抗湖北的革命军，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选择。荫昌是满洲旗人，他兼理外交和军事两重事务。作为京师同文馆的一名早期毕业生，荫昌是第一个出国（德国）留学的中国人。19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荫昌曾任李鸿章的天津武备学堂总办。还在义和团运动善后事宜的谈判中当翻译，并随同载沣去德国谢罪，担任两任出使德国大臣（他甚至与一个德国人结婚）。1910 年，荫昌成为陆军部尚书，当时他的前任铁良因为被宗室王公毓朗和载涛抢走了风头而心灰意冷，于是辞去了陆军部尚书的职务。在批评者的眼里，荫昌是一个很好的外交官，而不是一个好的职业军队指挥官，因为他的指挥官生涯大部分都是在衙门中度过的。禁卫军第一协统领良弼认为，荫昌在军事指挥方面的声誉依靠的是他的外交经验，而这是靠不住的。但是，作为在职陆军部尚书和一名满人，荫昌成为一名前线指挥官，也是当时朝廷合乎逻辑的选择。[5]

14 日，载沣和他的顾问们决定了由哪几支军队随荫昌前往湖北，以及如何调度他们手中的其他军事力量。由于最近朝廷对全国军队进行了重新集中和改编，陆军部已经直接控制了新军第一镇到第六镇（也就是以前袁世凯的北洋军）。摄政王也亲自指挥新的禁卫军，还不到一月前，他刚刚参加了禁卫军的校阅仪式。恰好，这七支军队中的五支，与来自第十二镇的一个混成协，刚被

集结到北京东部的滦州（今滦县），准备在10月17日开始年度军事演习。载沣立即取消了军事演习，迅速把这些军队重组为三军。第一军由荫昌统领前往湖北，这支军队由第四镇和来自第二镇和第六镇的两个混成协组成。禁卫军和第一镇的士兵基本上都是满人，这两支部队被编为第三军，负责守卫京城，他们被召回到北京，置于摄政王弟弟载涛的麾下。载涛曾负责禁卫军的组建，也 176
是军谘府大臣。余下的军队，包括驻扎滦州的第十二镇混成协和其他两支在外地的部队——山东济南的第五镇和吉林长春的第三镇——组成了第二军。军谘府正使冯国璋统领第二军，他们是荫昌第一军的后援。[6]载沣的这一安排是要让主要由满人组成的第三军留守京畿，而主要由汉人组成的第一军则被派往前线，这明显带有“以汉人对抗汉人”的味道，这也正是清廷一直以来被革命者谴责的一个政治方针。

荫昌率领着这支两万五千人的军队，以非凡的速度从模拟战场滦州向真正战场武汉进发。他们坐火车通过北沈线（滦州位于京沈线上），然后转到京汉线，六百多英里的行军仅花了大约四十个小时。第一分遣队士兵早在10月13日就已向南方进发，两天后第二十二步兵团一部开始到达汉口北郊。[7]荫昌自己在15日离开北京。他经过河南北部时，停下军队前去与袁世凯协商。袁世凯在一两天前拒绝了联合指挥的提议，他警告这名满人统领不要轻视革命军。17日夜里，荫昌的军队到了河南南部的信阳，他停下来等待其主要力量第四镇的会合。[8]就在等待之时，清军在18日遭受了一点小挫折，革命军对位于刘家庙张彪的小股部队进行了出奇不意的打击。[9]然而，张彪的大部队撤退到滠口北部不远处，清军需要重新集结。协统王遇甲率领的第四镇也于21日到达滠口，两天后，荫昌把他的指挥部推进到了离汉口仅四十五英里的孝感。同时，随着长江舰队的到来，萨镇冰也到达武汉，随他而来的是巡洋舰队第一巡洋舰“海琛号”（其舰长荣续是满人），还有一支大约由十支炮艇和鱼雷艇组成的小舰队。[10]

在10月21日前后，清朝的陆军和海军都做好了向武汉革命军反击的准备，然而直到10月27日攻击才正式开始。攻击的延迟后

来证明对清王朝来说代价是昂贵的，甚至可能是致命的，因为在延迟的六天时间里，革命的浪潮席卷了湖北全省，并于22日席卷了湖南长沙和陕西西安，24日席卷了江西九江。为什么会出现这
177 一致命的延迟？可能由荫昌的过分谨慎和他作为一名战场指挥官的经验缺乏。也可能，正如大家所言，由他的下属犹豫不决，其下属大部分都是袁世凯的旧属，他们在等待其首领从放逐中归来。[11]当然，当革命军在武汉悬挂上革命旗帜，当革命军的同情者在其他省份纷纷起义时，清廷开始了召回袁世凯的努力。据一份广泛转述的材料（很难证实），在袁世凯拒绝了总督的任命之后，内阁大臣奕劻派遣协办大臣徐世昌前去与其老上司袁世凯秘密协商。20日徐世昌在彰德拜访了袁世凯，他后来报告说袁世凯坚持清廷必须答应六条要求，才愿意回朝廷效力。其中两条是袁世凯必须被赋予对陆海军的最高指挥权，而不是联合指挥权，以及必须保证他得到足够的资金。这份材料很难查证核实。[12]无论如何，载沣让步了。10月27日，他发布了一道谕令，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全权指挥在湖北的陆军和海军。根据袁世凯先前的建议，荫昌被召回到京畿，表面上是他作为陆军部尚书要集中指挥，实际上是让冯国璋代替他指挥第一军；载沣命令段祺瑞接替冯国璋统领第二军，并让袁世凯全权指挥冯国璋和段祺瑞。冯国璋以前是陆军贵胄学堂总办，时任军谘府正使，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他和段祺瑞都是袁世凯的幕僚。摄政王告诉荫昌在返回京畿之前等待袁世凯的到来。[13]

可能不是巧合，清廷在武汉的反击正好开始于10月27日，这一天也是袁世凯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的日子，但是荫昌仍然在战场指挥军队。对于清朝的前途命运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在陆地上，王遇甲率领的第四镇和王占元（1861—1934）率领的来自第二镇的混成协，以及从长江驰援而来的萨镇冰的舰队，沿着京汉铁路两边从滠口向南挺进。尽管遭受了顽强抵抗，但是清军仍然把革命军赶回了汉口。到第三天晚上，他们小心翼翼地绕过了长江码头附近的外国租界区，到达了铁路的终点站。这是北洋军的第一次实战，他们表现得很好。根据拉尔夫·鲍威尔的估计，

“使用的战略是同时代西欧各国曾使用的。在清廷海军舰队（萨镇冰的舰队）的枪炮掩护下，保皇派部署了一队散兵，散兵后面跟着一支密集编队的军队。当散兵利用掩护向前挺进时，他们得到了主力炮火的支持”。10 月 30 日，当部队占领汉口后，荫昌才把 178
第一军的指挥权交给冯国璋。当他带着清朝渴望已久的胜利返回京城时，在信阳遇到了袁世凯，当时袁世凯已经接受了钦差大臣的任命，并向南朝着湖北前线进发。[14]

当冯国璋从荫昌手中接过指挥大权时，汉口还有一片区域没有收复，那就是华界，这一地区沿着汉江一堵围墙与汉阳隔离开来。一些革命军在华界的拥挤角落中寻找避难处，而其他人则继续喝着酒，一副散乱而毫无抵抗力的样子。冯国璋忽视了袁世凯之前要他谨慎推进的建议，继续前进并开始攻击华界。不管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插柳，他确实这样做了。清廷的炮兵猛烈炮轰，立即将华界变成了一片火海。根据很多描述，当时的华界变成了一个“大熔炉”，一个“绝对的地狱”，之后则是“一片焦土”。两周后，来自红十字会的两个西方医生报告说，这个城市的四分之三已经被完全焚毁，虽然相对来说只有少数人失去了生命，但大部分人都变成了难民。冯国璋焚毁汉口的荒唐举动，立即在新近重新召集的资政院内引起了一股政治怒潮，并使清廷取得的胜利变得暗淡无光。然而，这次攻击也确实迫使坚守共和的革命军撤离了这个城市。11 月 1 日，随着最后的革命军撤离到汉阳，清廷又完全控制了汉口。[15]

然而，袁世凯没有因为清廷在汉口的胜利而乘胜追击。当时，革命军处于混乱和守势，但朝廷的军队数量多，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能够比较容易地收回汉阳和武昌。举例来说，海军统领萨镇冰就相信清廷在武汉能够取得全面胜利。但是，袁世凯声称北方的军队已经筋疲力尽，需要休息。为了让自己在与清廷的谈判中取得最大权力，袁世凯让冯国璋停下进攻的步伐。[16]

然而，汉口的胜利，以及之后在汉阳和武昌的胜利，都不足以挽救清廷的命运，这一切都来得太晚了。在 10 月 27 日到 11 月 1 日之间，也就是汉口被收回的期间内，对于清廷而言，整体局势

变得更加糟糕。革命的浪潮已经从湖北蔓延到长沙、西安和九江，开始在另外三个省份的三个城市扩展开来：山西太原、云南昆明和江西南昌（再次）。10月29日山西的起义尤其具有威胁，因为
179 太原靠近京城。此外，同时发生的还有滦州的“兵谏”，在这次抗议中，直隶新军的军官要求清廷在政治上进行广泛革新。这些威胁从东到西不断发生，载沣统治的清廷最终意识到革命的爆发不仅是一个军事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

清廷的政治反应

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和12天后按计划重新召集的资政院，使得春天以来陷入沉寂的大量政治争议再次活跃起来，尤其是反对“皇族内阁”和要求速开国会的呼声越来越高。和以前一样，摄政王极不情愿地做出让步。然而，到了10月末，由于整个军事局势开始恶化，摄政王没有选择，只好屈服于长期存在的彻底改组政府的要求。然而，涉及满汉关系的其他一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反对奕劻内阁和赞成召开国会的怒潮在经过了几个月的沉寂之后再次爆发。10月16日，江苏巡抚程德全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这是应上海立宪派张謇的要求草拟的，呼吁清廷采取两项基本改革措施来获得民心，并阻止当前的“政治革命”演变成“种族革命”。一是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贤能之人组成新内阁，并完全对皇帝负责；二是加紧颁布承诺的宪法，摄政王已经将宪法的颁布日期从1916年提前到1912年。赋闲在彰德老家的袁世凯，也声称给了清廷同样的建议。根据当时媒体关于徐世昌拜访袁世凯的报道，当徐世昌在10月20日见到他时，袁世凯不仅要求给予他在湖北的军事全权和为他提供充足的补给，而且要求清廷对四个政治问题做出让步，即“明年即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宽容参与此次事件诸人，解除党禁”。[17]

10月22日，第二届资政院会议如期召开，汉军旗人李家驹（1870— ）取代生病的世续成为资政院总裁。一些自第一届会议

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依然是会议的主题。10 月 26 日，资政院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立即成立“完全责任内阁”，国会从 1913 年提前到 1912 年召开，在皇帝颁布宪法前，资政院可以“会议” 180
由溥伦等人即将起草的宪法草案。3 天后，资政院提交了三份请愿书，提出了更多的新要求。第一份是要求成立责任内阁的请愿书，坚持皇亲国戚不仅不能成为内阁总理，也不能成为内阁大臣。这个要求与君主立宪的基本原则相一致，也符合清王朝的“祖制”（也就是嘉庆皇帝以来“亲王不干政”的祖制）。第二份是关于起草宪法的请愿书，要求在宪法颁布之前，其起草工作不仅要在资政院大会上“会议”，而且要经过资政院的“协赞”。其结果要形成一份皇帝和臣民之间的共同“信条”，而不是如明治日本和沙皇俄国的宪法那样形成一个法令，因为与会代表普遍认为那样的法令是不完善的。第三份请愿书除了要求废除党禁之外，还要求赦免卷入武昌事变诸人，以及从 1898 年戊戌变法以来的所有政治犯（如康有为和梁启超）。[18]

到这个时候，摄政王载沣还是对于深化政治改革的要求充耳不闻。他将程德全的奏折“留中”，不予理会。载沣在满足袁世凯对军权和财政支持的要求时，对袁世凯提出的四条政治要求也没有任何回应。同样，他对资政院 10 月 26 日的建议也视而不见。很难相信载沣在 10 月 29 日对资政院的要求变得更有耐心，只是在这一天，资政院得到了不期而遇的一个重大支持力量，即不远之处爆发的“滦州兵谏”。

发起“兵谏”的是张绍曾（1879—1928），他是留在滦州的第二十镇统制，军事演习被取消之后，他就率部驻扎在离北京东部九十五英里远的滦州。对于这名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张绍曾为什么会选在这个时候威胁说要兵变，学者们意见不一。一些人认为，他同情革命，希望解除当时受荫昌攻击的武昌革命军的军事压力；其他人认为他是一名立宪主义者，他想利用武昌起义给清廷施压，迫使其进行改革。[19]不管动机如何，张绍曾和他的两名同僚和两名下属，于 10 月 29 日向清廷提交了一份联合请愿书。他们指出，武昌起义迄今的三周内，朝廷仅仅在军事上做出回应， 181

但并没有作出从根本上纠正错误的尝试。在他们看来，这个根本原因是政治方面的。他们坚持认为，镇压只会激起更汹涌的革命怒潮，要求进行政治上的改革，并提出了一个“十二政纲”。声称这些改革有助于消除“种族差异”而无损“皇威”。[20]

滦州兵谏者们提出的“十二政纲”与同一天资政院提出的三份请愿书大致相同，但是在某些问题上意义更加深远。这份“十二政纲”要求组织责任内阁，皇族不得担任内阁大臣或内阁成员；宪法草案由国会而不是资政院来“议决”；特赦政治犯。政纲还要求立即在当年“立开国会”，而不是第二年。政纲与资政院提出的请愿书的最大不同在于，通过民选产生的国会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只有国会具有修改宪法和选举总理大臣的最高权力。[21]为了引起摄政王的注意，也为自己的要求增加砝码，张绍曾拒绝执行朝廷要他带领军队从滦州奔赴南方的命令。[22]

京畿东边发生的这次滦州兵谏与西边太原的革命起义遥相呼应，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清廷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来自太原的威胁尤为严重，因为革命军很容易从太行山的娘子关冲出来，立即驰骋于华北平原，并夺取北京至汉口铁路上的战略要地石家庄，这不仅会威胁到布置在汉口的清军，而且会威胁到北京的朝廷。为了应对山西的危机，摄政王任命保定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取代被刺杀的山西巡抚，派他带领军队前往石家庄，以阻止任何起义军向北京推进。[23]一周后，吴禄贞却神秘死亡。

因此，尽管在汉口取得了胜利，但载沣却受到了来自滦州和太原的军事威胁，所以，他被迫向呼声越来越高的政治改革作出让步。10 月 30 日，在收到资政院三份请愿书和张绍曾的兵谏书后的第二天，清廷以皇帝的名义颁布了一道“罪己诏”作为回应。在诏令中，这名 5 岁的小男孩被迫承担因革命的爆发及迅速蔓延而受到的指责。针对内阁众口一词的批评，皇帝承认在任命内阁时不够慎重，以致任用了过多的皇族成员。他许诺，“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贯行宪政”。先前的光绪皇帝曾颁布了几道法令来“化除旗汉”，但最终不了了之，而他发誓要让这几道法令生效。[24]

182

除了让皇帝对当前的麻烦承担责任并承诺要有新的开始之外，载沣最终同意了资政院再三要求的大部分内容，尤其是最近的三份请愿书。首先，他命令负责起草宪法的溥伦按照《宪法大纲》来修宪，并在宪法以皇帝名义颁布之前为会议提供宪法内容供其“审议”。然而，“审议”并不是资政院要求的“协赞”。第二，载沣同意在内阁中任用皇族“懿亲”与君主立宪政体及“我朝祖制”互相矛盾。他承诺只要军事政治形势稍微好转，清廷就会指派适当人士组成“责任内阁”，并且此后不会再在内阁中任命“亲贵”。第三，摄政王同意宽恕三种人：“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先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以及此次乱事被协自拔来归者，皆赦其既往”。尽管摄政王没有明确解除党禁，但他承诺保护所有合法的活动和停止随便的暴力拘捕。[25]载沣并没有谈到国会提前召开问题，可能这并没有在资政院最新的提议之中，

10月30日颁布的法令处理了与资政院关系的一些问题，但这并没有让滦州兵谏者感到满意。实际上，载沣在一开始就对“十二政纲”不屑一顾，他声称这些意见已经包含在之前的几个法令中了。[26]但张绍曾并不满意，11月1日他再次电奏清廷，提交另一份请愿书。关于内阁，他要求清廷不要等到局势稳定后才废除皇族内阁。据张绍曾所言，只要内阁保持不变，国内的骚乱就不会沉寂。他重复了以前的要求，要求内阁总理必须通过“常规选举”。关于宪法，他要求1908年的《宪法大纲》必须被完全废除，不能成为新宪法的基础，同时他要求由国会而不是溥伦负责起草新宪法。[27] 183

可能是张绍曾第二份请愿书的结果，更可能是因为袁世凯在湖北前线的拖延不决，清廷没有等到时局稳定下来，就开始调整“皇族内阁”了。11月1日，也是张绍曾提交第二份请愿书的这一天，奕劻的责任内阁提出辞职。针对皇帝的罪己诏，奕劻和他的两个协理大臣那桐和徐世昌声称，是他们而不是皇帝应该对日益严重的危机负责。他们要求免除自己的职务，以便能够迅速任命一名贤能之人来组织一个“责任内阁”。在另一份奏折中，除了奕劻外的其他四名皇族内阁大臣——载泽、载洵、溥伦、善耆——

也同样请辞。载沣立即接受了这些人的辞职请求。同时，他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并授权他组成一个“责任内阁”。袁世凯想保留在湖北前线海陆军大元帅的职位，称只要解决了武汉的问题就立即来京。袁世凯表示了适当的谦虚，几次辞谢了对他的任命。由于袁世凯在接受任命和抵京日期方面悬而未决，奕劻的内阁还像以前一样继续着。与此同时，其他的皇族高官也放弃了他们的职位。摄政王的弟弟载涛是军谘府两名首脑之一，他在 11 月 1 日辞职，其职位被荫昌所取代。荫昌虽然是旗人，但不是皇族成员。虽然载涛好像是自愿辞职，但他在军谘府的同僚毓朗却拒绝这样做。十天后，毓朗被解职，接替者是前协理大臣徐世昌。[28]

第二天，也就是 11 月 2 日，载沣接受了张绍曾第二份请愿书中的另一主要要求，即拟定宪法的程序问题。先前，摄政王委托溥伦领衔的委员会承担草拟宪法的任务，并提交给资政院“会议”；现在，为了回应张绍曾的请愿书，他授权资政院而不是溥伦来草拟宪法。在这道谕令中，载沣称赞了张绍曾及其同僚“爱国之诚，实深嘉许”。载沣还指出，袁世凯取代奕劻成为内阁总理大臣，将满足他们组建新内阁的要求。载沣明确表示，希望他的努力能够满足滦州兵谏者的要求。[29]

然而，张绍曾仍然不满意。11 月 3 日，他提交了第三份请愿书，表达了对朝廷没有完全回应他原来的“十二政纲”的灰心失望，尤其是关于内阁和宪法方面。他指出虽然“皇族内阁”已经辞职，但内阁总理仍然是由皇帝任命，而不是由选举的国会任命。对于起草宪法的新安排，他也不满意，他认为应该由将来的国会起草宪法，而不是由现在的资政院起草。资政院是朝廷的一个机构，并不能代表整个国家。如果宪法的起草缺少了国民的参与，那仍然是一部皇帝的法令。张绍曾要求立即组成一个“临时政府”（他好像认为这就是一个国会），并且立即在军事上停火。他直率地表示，“如果（朝廷）不能召集国会，不能颁布宪法，不能选举内阁总理，那么就不能解决根本问题”。[30]

相反，对于载沣在政治改革上做出的回应，资政院没有像张绍曾那样失望。正相反，资政院的成员（至少是仍然在场的大约

九十名资政院议员）对摄政王把起草新宪法的任务交给他们感到欢欣鼓舞。11月2日，他们召开会议，对载沣的谕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有人欢呼“皇帝万岁！大清万岁！”而且，他们以极快的速度完成他们的任务。当意识到起草一部完整的新宪法需要很长时间时，他们在11月3日补充宣布，“十九信条”将作为新宪法的基础，并会在随后颁布。他们要求清廷印制“十九信条”，并在清朝太庙里颁布并宣誓接受。资政院说，这将会团结民众和保护皇室。载沣的清廷确实按照资政院的要求做了。清廷立即宣布了“十九信条”，并承诺随后在太庙里宣誓，最终载沣于11月26日完成宣誓。[31]

虽然张绍曾反对把制定宪法的任务委托给不是选举产生的资政院，但是“十九信条”几乎实现了兵谏的所有目的。“十九信条”的很多条款与张绍曾“十二政纲”的内容在用词上都是一样的，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十九信条”能够在一两天之内起草出来。“十九信条”承认皇帝至高无上，但在很多方面限制了皇帝对宪法和国会的权力。皇帝能够指挥陆海军，但没有国会的同意不 185
能对内使用军队。皇帝不能以谕令制定法律。资政院“议决”的这部宪法，之后只能由国会修改。国会议决每年的预算，缔结国际和约。国会选举总理大臣，总理大臣提名其他内阁成员。“十九信条”重申了新的宪法禁止皇族担任内阁大臣，也禁止他们担任各省高级职位。国会未开之前，资政院将承担这些职责。[32]

国会的召开还是没有提前到1913年前。虽然资政院对“十九信条”普遍感到满意，但还是向摄政王施压，要求尽早召开国会。11月5日，载沣做出回应，他授权资政院尽快制定国会组织和选举的所必需的条例。他保证，一旦这些条例通过和选举举行，他就召开国会。[33]这样，由于摄政王的“十九信条”和立即召开国会的承诺，滦州兵谏结束。到现在，张绍曾的要求只有一条——宪法的起草应由选举出来的国会完成而不是资政院——没有得到满足。11月5日，张绍曾被解除了第二十镇统制的职务，表面上给予了他一个更好的职位：侍郎衔的宣抚大臣，前往长江一带抚慰革命军。四天后，他离开了滦州。[34]

与此同时，资政院要求载沣兑现10月30日的承诺，即特赦政治犯。这时，羁押的一名最著名的政治犯是汪精卫，他是摄政王的暗杀者，被关在北京。11月2日，以及两天后的11月4日，资政院成员询问为什么没有释放汪精卫，据称汪精卫的供词中并没有“狂妄言语”，仅仅表达了“激励立宪精神”的愿望。11月6日，载沣命令立即释放汪精卫，命令他返回家乡广州。[35]汪精卫被释放后留在了北京，在随后的革命军与清廷的谈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从政治上来说，武昌起义后的第一个月，大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皇族内阁”、宪法起草、召开国会等等问题上。然而，尽管被其他问题所掩盖，满汉关系问题还是继续在资政院被提出。
186 10月27日，资政院议员牟琳（来自贵州）对变通旗制处颇有微词，他声称其在建立的三年里，在消除满汉差异方面毫无作为，现在的满汉矛盾较之以前更为严重。另一名资政院议员王季烈同样要求消除满汉差别，尤其是姓名方面。11月2日，来自四川的资政院议员高凌霄提出了“融合满汉”的建议，以“化除满汉界限”。高凌霄提出了几项具体的改革建议，其中没有一项具有新意，也没有一项被实施：旗人应该加上汉人式的姓；满人妇女应该采用汉人妇女的“普通”服装，以便容易推进满汉通婚；各省驻防八旗应该被取消，满城可以开放给所有人居住；驻防八旗的军官和强壮的兵丁应该合并到其他军事编制中，而老弱的兵丁应给予一次性补贴。另一名湖南的资政院议员黎尚雯，提出了把剪除辫子增加到改革建议的列表中，但高凌霄拒绝修改。资政院大多数议员都赞成高凌霄的解决办法。看来即使到这个时候，剪辫仍然具有争议，以至于被列在其他所有的改革措施之外。[36]

对于改善满汉关系的请求，载沣统治下的清廷继续采取回避态度。一方面，小皇帝在10月30日的罪己诏中，承认其先皇光绪皇帝颁布了几道不详细的法令来“化除旗汉”，他现在许诺要立即实行这些法令。另一方面，在11月4日另一道同样以他名义颁布的谕令里，皇帝又回到了朝廷关于满汉政策一直不偏不倚的传统表述上。他列举了清廷做出的巨大让步，因为中国从集权走向立

宪要经过一个困难的转变。他坚持只有少数人在传播“种族革命”的谬论。他否认清廷过去实行过歧视汉人的政策，“同在九州之近，何有畛域可分”。他还指出舜是来自东边的夷人，禹是来自西边的羌人，但他们“皆中夏之圣帝”。[37]最后，载沣没有采纳资政院议员高凌霄提出的改革建议，当然也没有主动再次提及辫子的问题。

总体来说，到11月上旬，清廷被迫做出了大量重要的政治让步，尤其是取消了有争议的奕劻内阁，并以一个没有皇族参与的内阁取代，这使得载沣三年来加强皇权的努力化为泡影，也使得慈禧太后五十年来愈演愈烈的皇族干政趋势画上了句号。然而，在革命爆发以来的四周内，清廷仍然没有采取措施来减轻和消除让满汉处于隔离状态的巨大分歧。对于清廷来说，“种族革命”或许仅仅是诽谤性的言论，但对于各省驻防八旗来说，这就是对他们生命的威胁。

反满暴行

载沣在11月初采取的政治让步或许能够平息滦州兵谏，但并不能阻止革命的蔓延。清廷尽管从革命军手中夺回了湖北汉口，并派遣吴禄贞沿着山西边缘的太行山开辟了第二战线，但是清廷也逐渐丢失了其他阵地，因为越来越多的城市投向了革命党一边，尤其是在华中和华南的很多地区。众多的城市在1911年11月上旬加入了革命阵营，包括杭州（11月5日）、镇江（11月7日）、福州（11月8日）和广州（11月9日）。其他的城市紧随其后，成都（11月27日）、南京（12月2日）、荆州（12月17日）和伊犁（1912年1月7日）。连同10月下旬起义的西安和太原，所有这些地方都是聚集了大量满人的八旗驻防城市。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经过了一个缓慢的开始后，迅速聚集了巨大的力量，以至于人们很容易忽略革命带来的暴力。革命是普遍的，但绝对不是不流血的。然而，革命的这一特点几乎在所有的回忆录中被最小化了。革命的最大牺牲品就是八旗驻防城市中的

旗人。尽管革命派和立宪派进行了十年的批判，清廷也反复作出改革的许诺，但直到革命爆发时满汉之间的隔阂依然没有明显减轻。与1910年汪精卫供词中的柔和观点不同，共和主义者的反满言辞并没有明显的缓和。结果，革命中的反满暴力持续高涨，最先开始于武昌，后来席卷了西安、太原、镇江、福州和南京的驻防八旗。此外，荆州八旗被围困了几乎一个月，尽管最终没有发生大杀戮，但其间的伤亡也是不计其数。其他驻防八旗虽然相对而言没有太多人员伤亡，但也一直面临着灭绝的威胁。那些驻防城市之外的少数旗人，也面临着同样的威胁。

反满暴行首先发生于革命初期。当然，武昌不是八旗驻防城市。然而，由于义和团运动后的新政改革，一大批满人移居到湖北的省会。自1904年始，湖北地方官和荆州驻防将军安排了一千名旗兵前往武昌与新军一起训练，湖北新军的十分之一都是八旗士兵。大部分旗兵好像集中于张彪统制的第八镇的第三十步兵标（团）。该标第一营四个队中的两队和第二、三营中四个队中的各一个队，都是由满人官员所统领。第三十一标第二营的一个队也是这种情况。每个队的士兵人数大约为一百五十人，如果这五个队全部由旗人组成，那么他们的数量占整个湖北旗兵的四分之三。剩下的旗兵分布于满人控制的军警队伍或散布于湖北新军的其他部队。武昌城外的湖北讲武学堂也有几十名来自荆州驻防八旗的学生。[38]

第三十步兵标第一、三营的三个队和军警队伍承受了革命反满暴动的最初攻击，因为他们的军营位于武昌城内的军火库旁，于是成为革命队伍在10日晚上的直接攻击目标（另外两个由满人官员统领的部队驻扎在武昌城外和汉口）。[39]革命军推进到军火库，并用军火库的武器武装了自己，他们当时的一个口号就是“杀戮满官旗人！”尽管第三十步兵标的旗人士兵基本上没有抵抗，但很多人还是被杀死了。主要由满人组成的军警的兵营也被侵占和摧毁，至少十名旗人士兵被杀死。到第二天早上，旗人的尸体堆满了邻近的街道。[40]

10月11日宣告成立的湖北军政府，好像下定决心要为此前被

满人官员湖广总督瑞澂及督练公所军事参议官铁忠杀害的三名革命者复仇。湖北军政府公开宣称，其目标在于“兴汉灭满”。结果，武昌四大满姓家族（扎、包、铁、布）都被杀害，其财产也被没收。武昌旗人聚会和住宿的八旗会馆被完全摧毁。最后，10月12日，湖北军政府总部和省谘议局，都遭到了一股由效忠清朝 189
的汉人军官所率领的旗人士兵的攻击，这次攻击导致了此后对武昌幸存满人的大规模血洗。革命军在大街上随意拦下行人，仅仅因为他们看起来或者说话声音与众不同，并强迫他们接受盘查以此来检查他们是不是满人。根据李廉方的记载，“那些头后部扁平的人被要求读666（六百六十六），如果他们读niu而不是读liu，那么他们就会被砍头”。（满人的扁平头可能是因为婴儿时期使用了一种特别的摇篮，口音问题则体现了他们与其邻居汉人的隔离。）没有通过这种测试的人都被杀害了。

> 一个将要被杀害的旗人妇女可怜地哀求：“我们是无罪的，我们也憎恨我们的祖先，因为他们虐待汉人。”另一位老妇人哀求：“杀死我们这些没用的妇女和孩子，你们能得到什么呢？为什么不释放我们以显示你们的宽宏大量呢？”士兵们虽然有所触动，但不敢回应，还是将她们杀死了。

熊秉坤（1885—1969）是辛亥革命的领导人之一，他证实反满暴力在10月12日到达了顶峰，当时许多满人被抓起来杀死了。那天的杀戮如此骇人听闻，以至于一百余名绅商联合起来，一致要求湖北军政府阻止其士兵进入民宅搜索满人。军政府却以军事需要为借口拒绝了其请求。[41]

据说，直到在汉口的11名外国领事干涉之后，军政府才下令停止这种恐怖统治下的杀戮。13日，考虑到革命军曾要求在反对清廷的最初战斗中保持中立，外国领事请他们停止对满人的大肆杀戮。革命军勉强同意了，但明显极不情愿。正如他们当时的一份公告解释的那样：“他们（满人）夺取了我们的土地，剥夺了我们的权力。现在，为了复仇，我们完全应该尽我们最大可能灭绝他们，这样才能缓解我们同胞被压抑了很久的仇恨。”然而，文告

继续说这种野蛮行为如果继续下去，将受到外国势力的嘲笑。因此，湖北军政府按照外国领事的要求，颁布了一道命令禁止对“旗人”的进一步复仇。法令要求人们把有间谍嫌疑的满人移交给军政府审讯。另一道法令警告说，被发现窝藏满人的任何人都要被斩首。[42]

190 可能是因为10月13日的公告，也可能因为革命军已经巩固了对武昌的控制，反满暴行的高潮渐渐平息。到此时，已经有几百名满人被杀害了。一名军政府的代表巡视了武昌，他估计不下四五百名“旗人”在革命爆发后的头三天被杀。满人尸横遍野，而且可能引起疾病传播，最终他们的尸体还是被掩埋了。路透社的一名通讯记者14日到了武昌，“发现到处都是满人尸体”，他估计有八百人被杀。曹亚伯声称总共四百名“旗人士兵”在起义中被杀死，另外三百名“旗籍人员”被逮捕并被关押在武昌监狱里。大约一百名关押犯在1912年春天被释放，革命成功后，他们安全返回荆州。但有七名旗人士兵因为被过早地释放，却在回家的途中被杀害。武汉三镇的其他满人尤其是革命爆发之处刚好不在武昌城内者，都有幸得以逃脱。[43]所有满人高官都安然无恙，包括湖广总督瑞澂、湖北布政使连甲、湖北督练公所军事参议官铁忠都逃脱了，尽管李廉方在统计时把维持治安的义务警察也算作满人，但他得出结论说：“被捕的和牺牲的满人并没有一般记录里描述的那么多。”周锡瑞的描述可能更接近真相，他说对于武昌的旗人而言，“那差不多就是屠杀”。[44]

第一个经历大规模反满暴行的八旗驻防城市是西安，这里出现了旗人与革命军之间最血腥的冲突场景。1911年，西安驻防八旗的人数可能有两万人。他们居住在西安城东北的满城内，满城四周都是高高的围墙，防御很坚固。[45]10月22日，革命的浪潮席卷到陕西，当时新军的支持者劝说陕西新军督练公所委员张凤翔（1881—1958）加入他们的队伍，并开始起义。武昌的新军驻扎在城内，可以从城里开始起事。但陕西的新军混成协驻扎在西安城外大约一英里远的地方，而军火库——在武昌军火库是革命军的首要目标——位于西安城内（但在满城外）。22日中午，革命军分

散成小股力量潜入西安城，没有被把守着西城门和南城门的满人士兵识破。革命军随即在军火库集合，并轻松地从目瞪口呆的防守军手中夺取了军火库。革命军用储藏于军火库的毛瑟枪和曼利夏步枪武装了自己，迅速占领了西安城的大部分地方。革命军唯一没有立即占领的地方就是满城。当时满城的统领将军文瑞下令紧闭城门，并在城墙上部署了士兵。[46] 191

第二天早上，革命军对满城发起了猛攻，新军统领张凤翙带领一队人从南面攻击，哥老会首领张云山（1877—1915）带领另一队人从西面发起攻击。驻守满城的旗兵大约有两千人（相当于驻防城市规定兵力的三分之一），由于19世纪90年代的改革，他们都接受过现代军事训练，但他们当时的装备却很简陋，荣禄在十五年前购买的三千支现代步枪被廉价卖出去了。这样，相比于革命军的现代步枪，满城的军队只能使用旧式的前膛枪和过时的后膛枪与之抗衡。然而，八旗士兵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战斗持续了一整天。终于，张凤翙沿着满城南城墙发现了一处薄弱位置，同时张云山也成功攻克了西城两座城门中的一座。然而，当时天色已晚。为了避免在黑暗中伤及自己人，革命军决定第二天早上再发起最后的攻击。[47] 与此同时，革命军以“秦陇复汉军”的名义发布了一份简短的通告，称各省纷纷起义要求“排除满人”，这是顺天意、合民心。通告发誓要保护市民、商人、外国人，并尊汉人和回人为一家，但保护对象中却没有满人。这也被看做后来陆续发生的杀戮事件的通行证。[48]

第三天，10月24日，西安的满城沦陷了。随着革命军从南面和西面潮水般涌入，他们把捕获的所有居民看做潜在的敌人，不由分说地进行了杀戮。一名英国的传教士J. C. 凯特（J. C. Keyte）几个月后调查了当时的场景，据他所言：

> 无论长幼，男女，甚至小孩子，都同样被杀……房子被抢光烧光，那些希望躲过这场风暴的人最终也被迫暴露。革命军在一堵矮墙后，放了一把无情的大火，把鞑靼城焚烧殆尽。那些试图逃出来进入汉城的人，一出现在大门，就被砍

倒在地。两名新军的年轻军官后来回顾时承认："没有必要杀死这么多旗人士兵及其家属。"[49]

杀戮极其残忍和彻底。据凯特记录：

> 当满人发现抵抗徒劳无益，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跪在地上，放下手中的武器，请求革命军放他们一条生路。当他们跪下时，他们就被射死了。有时，整整一排都被射杀。在一个门口，十到二十人的一排旗人就这样被无情地杀死了。

一些旗人试图逃走，但是和武昌一样，对他们而言要逃过检查太困难了。

> 他们的服饰、五官和语言使他们能够被辨认出来。他们偏爱红色和黄色，他们使用白色衬里，高领窄袖……他们的腰带，他们的鞋子，所有这些都暴露了他们的身份。旗人妇女不缠脚是一个致命的区别。她们的头饰和衣服或许可以改变，但却没法掩饰她们天然的大脚。

和武昌一样，被怀疑的满人要进行一个发音测试，然而，如凯特所言，"对其他省的汉人来说，这常常意味着一件危险的事情，特别是直隶省"，因为他们都说北京口音的标准汉语。许多旗人看到逃脱无望，就自杀了。一些人烧毁了房子，也把自己烧死其中；其他人割断自己的喉咙；还有一部分人跳到深井里，直到井里塞满了尸体和垂死的旗人。长安县县令德锐杀死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后，试图放火烧死自己；放火未果，他抓起一把刀刺死了自己。满城将军文瑞跳井淹死了，他的主要部下，驻防八旗的两名副都统也自杀了。[50]

三天后，也就是10月25日，革命军下令停止暴行。[51]根据凯特的统计，到此时，整个牺牲人数"不下万人，他们为了避免更悲惨的命运，要么是被杀死，要么自杀"。如果八旗驻防城市的人口是两万人，那么一半人都死了。而且，满城被大规模抢劫一空。那些从杀戮中幸运活下来的旗人被召集在一起。存活下来

的有钱人，如陕西提法司锡桐和劝业道光昭被敲诈勒索；小女孩 193
被绑到富人家里当佣人和女婢；而年轻妇女则被迫成为穷苦汉人士兵的妻子，因为他们没钱结婚；其他人则被驱逐出西安城自谋生路。[52]

山西省会太原是第二个经受革命怒火的八旗驻防城市。作为一个较小的驻防城市，太原满城仅有 644 名旗兵，由守尉增禧统领。这个小小的满城位于太原城西南的一个角落，四周都由高墙阻挡。西安沦陷后一周，10 月 29 日早上，革命席卷到了山西，当时山西的新军公然抗命，拒绝向南挺进以阻止邻省陕西革命势力的蔓延。抗命的军队冲进了太原城，杀死了巡抚和新军混成协的统领（他们都是汉人），然后向满城进发。他们把大炮置于城墙上，并开始向城下还在熟睡的满人开炮射击。满人仅仅进行了短暂而个别的抵抗，守尉投降了。结果，不超过二十名到二十五名满人被杀死。然而，活下来的满人不是逃走就是被驱逐。满城被抢劫一空，据两个当地的外国人说，满城“完全被焚毁了”。[53]

接下来满人被杀害较多的满城是镇江。镇江位于江苏，是江苏的对外通商口岸，京杭大运河与长江在此交汇。镇江有 1 692 名旗兵驻防，由具有皇族身份的副都统载穆统领。与武昌、西安和太原的情况不一样，镇江的反满暴行并不是发生在革命期间，而是发生在 11 月 7 日镇江城“光复”后。三天前，上海失守后，镇江的精英和商人与副都统进行谈判，以此来阻止南门外的两个新军步兵标起义并对城市发起攻击。这次谈判导致 11 月 6 日在自治政府衙门召开了一次公开会议，载穆同意投降并献出驻防城市，但必须要保证城市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此后，旗兵向自治政府交出了武器和弹药。这样，在新军于 7 日起义前，驻防城市的满人军队已经解除了武装，城市也参加了革命。此外，新成立的镇江军政府采纳了当地精英的建议，同意给旗兵提供三个月的定量供给，并帮助他们找到可能的工作。[54]

不幸的是，由于一系列的误会，新政府对于投降驻防城市的宽容政策没有持续下去。11 月 9 日，攻击南京的共和军队被击退， 194

退回到镇江进行重组，于是他们就把失利和愤怒发泄到当地的满人身上，而没有意识到这些满人已被允诺得到保护。当撤退的军队被命令停止暴行时，已经有二十名到三十名满人被杀害，满人的军营也遭到洗劫。副都统载穆感觉受到欺骗而自杀了，而其他旗兵试图开火炮轰革命军的阵地，但并没有取得成功。军政府随即取消了早先的宽仁政策，并驱赶其余的旗人离开满城。而且，一旦满人离开了满城这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就会被起义士兵和装成士兵的强盗抓捕。最后，在地方自治团体的要求下，军政府颁布了一道新的法令，要求不准伤害旗人。到此时，满人已经被驱逐出镇江，而且大量旗人被杀死。[55]

另一个驻防城市福州继镇江之后第二天“光复”。福州的驻防旗兵数量大约为 2 200 人，几乎所有的旗兵在近几年都接受过一些现代军事训练。驻防八旗的统领是福州将军朴寿，另一名满人官员闽浙总督松寿与他一起治理福州。[56]武昌起义以来的三到四周内，尤其是革命开始蔓延到中国东部时，朴寿和松寿一起采取了几项预防措施。一方面，他们通过把军火从军营搬出城外的方式，尽力解除当地新军第十镇的武装。另一方面，他们给每一名超过 13 岁的旗籍男人配备了一支外国步枪和三百发子弹，给每一名旗籍妇女配备了一把剑。这些措施导致了一些令人担忧的关于满人最终意图的谣言。据说，他们组织了一个由五百旗人组成的由协领文楷统率的“杀汉团”，他们安置了大量大炮，把地雷埋在满城内，如果受到攻击，他们准备把福州其余地方及其汉人居民一起毁灭，与他们同归于尽。[57]

由于紧张状态持续升温，福州城的精英（与前面的镇江一样）进行最后的努力来避免流血事件。11 月 7 日下午，也就是邻省浙江宣布和平拥护共和后两天，福建谘议局同意了一份具有相似意图的提议，即福建省发布一份“独立和自保”宣言，并且成立新政府。谘议局要求闽浙总督松寿第二天认可新的机构，并要求福州将军朴寿命令旗人移交他们的武器和军火。作为回报，谘议局
195 承诺“此后满汉宜不分区别”，并“满人之俸禄，仍照旧支给”。驻防八旗的统领朴寿拒绝了这份提议。[58]

当天晚上，第十镇的士兵起义反对满人。尽管他们的长官作了提前预防，他们还是设法获取了私运到城外的军火。由于得到了武器装备，他们顺利向前进发，毫不困难地占领了于山炮台，从这里他们能够炮轰下面的满城。和西安一样，福州的旗人没有放弃抵抗。由文楷统领的“杀汉团”的几百名满人士兵，试图重新夺回于山的大炮，但没有成功，且遭受了重创。其他的旗人带着复仇的情绪用煤油攻击比邻而居的汉人，使这片地区处于一片火海之中。起义军与满人之间的战斗持续到第二天早上。到 11 月 9 日下午，好像满人感到了厌倦，他们提出了和平的请求，并同意停火。然而，停火并没有进行，因为 10 日早上大约一百名满人士兵孤注一掷，对革命军阵地发动了最后的攻击。当然，他们被击退了。顽抗到底的朴寿在队伍中被发现，他被抓获并拘留在于山，据他的侄子说，由于朴寿攻击抓捕他的人并辱骂他们是违抗命令的强盗，因此他被杀死了。他的尸体被剁成四块，遗弃在山边。随着朴寿的死，满人的抵抗也结束了。同时，在战斗的三天内，许多其他旗人失去了生命。一些人由于抵抗革命军或者防御满城而被杀，其他人自杀了，不愿意被俘虏。闽浙总督松寿吞金自杀，镶黄旗协领定煊自缢而死，驻防八旗捷胜营队官郎乐额和他的十几名家属给自己身上浇上油并烧死了自己，几百名其他旗兵和他们家属投井或者跳入闽江淹死了。[59]

然而，当革命军 11 月 11 日占领了满城后，与西安的情况不一样，他们极其宽容地对待战败的满人。他们为受伤的满人提供医疗救治。他们对那些被杀死的满人进行了适当的埋葬处理。他们甚至还为松寿举行了追悼会，允许福州将军朴寿的家属找回其散失的尸骨。他们同意释放许多被抓获的驻防八旗军官，其中包括“杀汉团”的组织者文楷。最后，尽管他们没有同意谘议局保证的继续不定期为旗兵提供薪水（这是满人抵抗势力提出的请求），不过他们为几百名旗兵每人提供了一两银子和一些大米，让这些旗人在外面自谋生路之前能够解决温饱问题。[60] *196*

南京城在 12 月 2 日失守时，满人没有这么幸运。太平天国运动后南京的驻防八旗位于城市东南角，有 2 424 名官兵。南京

驻防八旗的统领是铁良，他是前军机大臣和陆军部尚书，他与摄政王加强皇权的计划发生了冲突，在1910年9月被贬出京城。他与两江总督张人骏、江防营统领张勋（1854—1923）共同治理南京。

武昌起义爆发后的几周时间内，南京当局采取了一系列与福州类似的预防措施。一方面，他们把张勋率领的训练松散但忠于清王朝的军队调入城内，加强自己的防御力量。另一方面，他们解除了当地新军第九镇的武装，并将其重新布置于城南二十英里远的地方，因为新军的可靠性值得怀疑。[61]然而，随着革命在江苏省蔓延，尤其是上海在11月4日失守，南京城满汉之间的紧张氛围高涨。铁良的“兴满反汉”本来就众所周知，这也极大增加了汉人的忧虑。和福州一样，南京城谣言四起，据说满人把大炮架于城墙之上，把地雷埋在通往驻防区域的道路上，并誓言与南京城同归于尽。尽管铁良进行了公开否认，但他的话已经难以让人相信。实际上，这些谣言如此大范围地传播，以至于当时的英国外交官和后来的一些历史学家都承认这些谣言是真的。[62]同时，南京的满人对六十多年前太平天国的所作所为仍然心有余悸，据一名汉人电报报务员回忆：

> 满人天天哭泣，尤其是妇女，因为既没有缠足，服装又和汉人不同，更加发愁，纷纷向估衣铺购买汉人妇女衣服，打扮成汉人。男子也都改名换姓，充作汉人。[63]

在这节骨眼上，与镇江和福州的精英人士一样，南京的精英设法从中斡旋，试图找到一个和平的解决办法，但没有成功。11月6日，江苏谘议局副议长与两江总督张人骏进行了会
197 谈，力劝他放弃清廷利益，宣布江苏省独立，这样能避免与革命军发生军事冲突。两江总督倾向于这样的操作方式，但是他受制于江防营的汉人统领张勋，而不是一些材料所说的铁良。[64]张勋撇开张人骏和铁良，他控制着南京城的防御，并立即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嫌疑犯，这样持续了两天。据肯德（Percy Horace Kent）记录：

搜捕革命党人的行动变成了对学生和不留辫者的搜寻，对那些带有白色起义徽章的人的搜捕，或者其他一些根本不着边际的想象。8日晚上，据说四百名嫌疑犯被处决，他们的头悬挂在自己的家门上。[65]

残忍的张勋与革命军对峙了一个月。11月7日，革命军被击退，撤退到镇江，在此重新集结和等待援军（此时他们攻击了不幸的镇江驻防八旗）。由于南京日益孤立无援，革命军赢得了时间。两周半后，他们返回了南京，并聚集了大约三万兵力，来对抗张勋两万左右的军队（包括两千旗人士兵）。11月24日，革命军开始集中火力大范围地猛攻南京，目的在于夺取南京城周围几座山上的炮台。尽管张勋的军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革命军于25日占领了北部的幕府山，12月1日占领了南面的紫金山。最终，张勋只好求和。12月1日，他向革命军提出了三个要求：允许他带着江防营离开南京，允许张人骏和铁良返回北方，当地的旗人不得受到伤害。革命军愿意两江总督和驻防八旗统领离开，也愿意饶恕当地的满人，但不同意张勋带着整个江防营离开。然而，在这天晚上，张勋和他的两千军队偷偷逃出了南京城，渡过长江，沿着津浦铁路向北撤退，并驻扎在江苏北部的徐州。张人骏和铁良也设法逃脱了，他们逃亡上海，躲在日本人的炮艇里。[66]革命军在12月2日占领了南京。

然而，此后还是发生了对南京满人的大杀戮。与西安和福州不同的是，被杀的满人并没有战斗在对抗革命军的最前线。在南京，主要的对抗者是张勋和他的军队，而他们都是汉人。由于首 198
领们的突然离开，南京的满人没有任何防备，于是成了革命军满腔怒火的牺牲品。12月3日，革命军队，尤其是苏良弼指挥的军队，进入了满城并实施了暴行。据另一队的一名士兵回忆，苏良弼的军队随心所欲地“焚烧、杀戮和抢劫”。据一名到访的法国学者费尔南多·法杰勒（Fernand Farjenel）记录，“革命军放火焚烧（满城），团团围住着火的房子，开枪射死了每一个试图从火中抢出自己财产的鞑靼人。那些空手逃出来的人侥幸保住了性命”。由

于对革命军的怒火感到恐惧，一些旗人用他们的头去撞邮箱和钢柱，以图自杀。其他的满人聚集在军火库旁，引火自焚，引起了巨大的爆炸，整个南京城都在摇晃，爆炸的浓烟遮蔽了天空，并持续了一整天。混乱的秩序直到这天晚些时候才恢复，当时革命军的总司令发布了一份公告，宣称将确保投降满人的安全。苏良弼被捕，他率领的虎狼之师也被解散了。然而，“不计其数”的旗人已经被杀死，满城几乎成了一片“焦土”。1912 年 3 月，法杰勒发现，“鞑靼城连一块直立着的石头都没有留下。我们在残垣断壁中进行搜寻，除了焦土和瓦砾，什么也没看见，每一间房子都被完全夷为平地”。只有两个微笑的带有底座的石狮子还留在了此前的衙署外面。[67]

南京的胜利通常被描述为辛亥革命当中最后的重要战役。[68]的确，这使得革命军与清廷全面休战，直到次年 2 月清廷退位。尽管休战了，但革命军与满人之间的另一个主要军事冲突直到两周后才结束，这就是持续一个月之久的荆州战役。荆州位于武昌的上游。荆州将军连魁统领驻防八旗，1911 年驻防力量为 2.7 万人。满城位于东部，占据了半个荆州城，人口大约占荆州总人口的一半。[69]除了京城，在关内地区没有其他地方有如此众多的满人。

虽然荆州战役直到 11 月 19 日才打响，但驻防八旗感受到的压力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不断增加。10 月 18 日，当地新军指挥官唐牺支带领革命军起义并占领了宜昌，由此逐步扩大自己的影响。到 11 月 5 日，他们控制了整个宜昌府，只有荆州和邻近的沙市通商口岸不在他手里。[70]在此期间，劝说驻防八旗参加革命的努力没有取得成功。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在 10 月 26 日向连魁发了一份电报，保证旗人会受到优待，前提是他率领的八旗将士向即将到达的革命军缴械。满人将和汉人受到同样的对待，他们的私人财产也会得到保护。随后革命军向荆州驻防八旗呼吁，解释说虽然他们“排满”，但他们的目的“不过推翻政府，并非剪灭旗人”。荆州副都统拒绝了军政府的请求，他们的答复质疑黎元洪承诺的诚意和政治动机。荆州驻防同意黎元洪“改革政府”的意图，但

当清廷在11月3日同意了“十九信条”时，他们质问黎元洪为什么还要坚持叛变。他们谴责在武昌发生的杀戮满人的暴行，很多受害的满人都是从荆州驻防八旗派去的。怀孕的妇女和襁褓中的婴儿都不由分说地被杀死，他们质问杀死这些妇女和婴儿与“改革政府”有何关系。他们声称，荆州的“旗兵”与汉民和平共处了二百多年，他们彼此融洽相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消除了多方面的（没有详细说明）种族差异。革命军应该撤回宜昌，并等待革命的结果。[71]

当唐牺支和革命军于11月19日对荆州发起攻击时，驻防八旗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其中至少包括一个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步兵标（团）。他们最初把防线布置于城外十英里或者更远的地方，但是在一周的战斗中，旗兵遭受了巨大的人员伤亡，他们节节败退，被迫向荆州撤回。到11月26日，旗兵被围困于荆州城内。27日，连魁和他的下属向清廷请求紧急增援，此前他们已经两度向朝廷求援。他们说，荆州被包围了。由于武昌和宜昌被革命军控制，他们的食物供给被切断了。他们的军火也消耗殆尽。他们要求最近在汉口取得胜利的清军迅速驰援。和以前一样，没有援军赶来。驻防八旗开始征用城内居民的物品，包括用做燃料的木制品。[72]

满人在革命军的围困之下抵抗了两周。他们扣押荆州城西部的汉人作为人质，以此来保卫自己。大约十天后，在当地一名天主教神父马塞尔（Marcel Sterkendries）的调解下，荆州的汉人说服了满人官兵让他们离开，但不能带走个人财产。然而，汉人从荆州城撤走，使得革命军开始肆无忌惮地炮轰满人。12月9日，革命军用大炮猛轰荆州城十个小时，导致大量人员伤亡。八旗将士的战斗决心开始崩溃。当时恒龄是主要的抵抗派，他是两名副 200
都统之一。由于受到攻击的驻防八旗耗尽了弹药、食物和木柴，幸存者聚集在恒龄处请求他投降。失去了将士的支持，这名副都统于12月10日自杀了。将军连魁随即要求和解。在天主教神父、日本领事和沙市海关税务司的调停下，双方在随后的谈判中达成了六点协议。对于满人来说，他们同意缴械投降，同意移交公共

用地和公共财产，服从湖北军政府。相应的，革命军要承诺保护旗人的生命和私人财产，向贫困的旗人提供六个月的粮食供应，允许旗人进革命党人的学校。根据这份协议，连魁于12月13日前往天主教堂投降。四天以后，唐牺支和革命军秋毫无犯地进入了荆州城。和西安、镇江和南京不一样，他们没有向幸存的满人报复。[73]

中国其他地方也有四个驻防八旗——杭州、广州、成都和伊犁——直接经历了革命，但与其他驻防城市不同，这些地方的革命相对和平，基本没有发生流血事件，但遭受的痛苦却并没有减少。在杭州，11月3日浙江省谘议局副议长和一些市民代表前去拜见浙江巡抚、蒙古旗人增韫，他们强烈要求增韫发布一道抢先独立的通告，拆除隔离着满城与杭州城的内墙，将旗人一律视作汉人对待。增韫拒绝后，新军在革命大潮的声援下于当天晚上发动了起义。由于驻防协领贵林坚持抵抗，劝说驻防八旗投降的努力付之东流。贵林是满洲旗人，四年前他因鼎力支持妇女教育和惠兴女学堂而声名鹊起。然而，当革命党人于5日从吴山炮台开始炮轰满城时，驻防八旗的署理都统德济放弃了抵抗，他要求新的军政府不伤害旗人，并继续或者暂时为旗人士兵提供日常的供应。由于没有达成一致的解决办法，驻防协领贵林私藏了大量军火，希望以此继续战斗。两天后，他被俘获了，并被处死。而增韫和德济得到了很好的保护。[74]

201 广州自从孙中山在1895年领导一次失败的起义以来，就成了革命活动的中心。最近的1911年4月，这里就发生了广州将军孚琦被暗杀的一幕。孚琦的继任者是凤山，这名汉军旗人在1907年曾被卷入铁良和袁世凯争夺北洋新军控制权的斗争。当凤山于10月25日到达广州准备上任时，却被革命党人暗杀。广州旗人有足够的理由害怕革命军，因为革命党人开始集结于省会城市。一些满人赞成拿起武器保卫自己并把城市里的其他人作为人质，而大多数旗人赞成与当地精英合作，抢在革命军攻击之前宣布自治。这些谣传在11月9日变成了现实，当时在省谘议局召开了一次大规模集会，宣布广东从清廷统治下独立，并支持共和。会议通过

了十条协议，其中之一规定“所有旗满人，一律同汉人一样看待”。第二天，革命军占领了这个城市，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也没有发生更多的流血事件。[75]

成都的革命或许可以说是开始于夏季的保路运动，但直到11月27日才宣布拥护共和。与广州和其他省会城市一样，这份通告的产生源于清廷官员与当地精英的谈判。四川总督赵尔丰自身是汉军旗人，他要求“不能仇恨满人”和“保证旗人的生计”。地方精英欣然承诺旗兵在没有固定职业之前继续给他们提供薪水，“满人和蒙古人、回人，与汉人一样一视同仁，没有任何区别”。[76]相应的，赵尔丰于11月27日发布了四川省自治的通告，同意成立新政府，并由谘议局议长蒲殿俊（1876—1934）和陆军第十九镇统制朱庆澜（1874—1941）一起领导新政府。这名前四川总督由于对保路运动者极为严厉，因此名声不佳，但他还是被允许留在成都，继续督理藏边事务。然而，事实证明新的政权没有能力控制各种革命的“民军”，尤其是当所有军队涌入成都，并要求支付薪水之时。12月8日，随着财政不济，一些士兵发动兵变并把蒲殿俊和朱庆澜驱逐出去。当秩序恢复后，陆军小学堂总办尹昌衡（1886—1953）接管了新政府，并成为四川军政府都督。两周后，也就是12月22日，尹昌衡指控前四川总督赵尔丰密谋反革命，将 202
其拘捕并杀头，以“平息四川人对他的愤怒”。[77]后来，成都驻防八旗顺应时势，愿意缴械投降。都督尹昌衡与成都驻防八旗将军玉昆进行了谈判，玉昆保证满人投降交出武器，而尹昌衡同意军政府为旗人提供生计帮助。[78]

清帝退位以前最后一个“光复”的八旗驻防城市是远在新疆的伊犁。伊犁革命于1912年1月7日夜里爆发，与其他地方一样，革命的导火线是当地新军的兵变。从惠远（今伊宁）城外的驻地，革命军很容易向前推进并占领了城市东部的“旧满营”，包括伊犁将军志锐的衙门。但是，革命军遭遇了来自城市西部“新满营”的锡伯八旗兵的顽强抵抗。新八旗营不会轻易放弃抵抗，当这一事实越发明显时，革命军同意前任伊犁将军广福努力进行调解。在当地商会的大力帮助下，广福安排旗兵交出武器，而革命军则

停止战斗。革命党人随即把广福选为新伊犁军政府的第一任都督。广福在都督位置上待了几个月，虽然大权由革命军和新军统领所掌握。由于革命的安抚作用，只有少数满人被杀死，其中具有改革思想的伊犁将军志锐也被处死了。[79]

驻防八旗的旗人不是唯一受到反满暴力威胁的人，那些在中国中部和南部许多地方担任官职的满人也同样面临着暴力的威胁。死于革命的最高职位的满人官员是端方，他由于在慈禧太后的葬礼上违背礼制而于1909年被罢去直隶总督的官职，此时才获得政治上的解放。端方从重庆前往成都接替赵尔丰担任四川总督，11月27日他在途中停留于资州，他带领的从湖北派遣来的新军宣布起义并拘捕了他。据一些资料记载，端方声称自己虽然是满人，但他的祖先却是汉人，因此他请求宽恕并要求恢复汉人身份。端方也声称自己为官正直，应该得到宽恕。与1907年的总督恩铭一样，拘捕端方的人承认他是一名公正的官员，但坚持他们拘捕端
203 方不是因为私人恩怨而是基于“种族仇恨”。最后，他们杀死了端方及其弟弟。[80]

在各省和地方任职的大量满人都遭遇到了相似的暴力行为。一些人在抵抗起义中被杀死，如陕西凤翔知府德祜，湖北天门知县荣濬。一些人在加入革命之后被杀害。例如，云南顺宁知府琪璘，他遵从了云南省的自治公告，尽管如此，当反叛的部队占领城市之后还是杀死了他并对他实行了剖腹。其他的旗人有的自杀了，这些人中包括湖北安陆知府桂荫，福建汀州知府来秀，陕西白河税官荣麟。另一名自杀者是海军官员吉升，他是海容号巡洋舰的第一大副，在巡洋舰队起义并于11月上旬前往九江后，他跳入长江自杀了。这样的反满暴行蔓延到了旗人官员的家属身上。当知府德祜被杀死时，他两个年幼的儿子也未能幸免。（湖南）嘉禾知县钟麟自杀之前，把妻子绑在床上烧死了。湖北宜昌五名旗人妇女被杀死，她们的鲜血溅满了当地衙门的大门。[81]

然而，不是所有的旗人官员都在革命中死亡或被杀死。很多人在革命军占领之前都设法逃走了。这些人中包括江西九江分巡

道，湖南衡州知府和攸县知县，以及大约四十名居住于苏州八旗会所的候补官员，其他被革命军抓获的官员都被宽恕和释放了。在江西南昌，五名旗籍男人和女人被抓住了，他们投降了当地军政府，最终被逐出了江西省。同样，九江的巡洋舰队起义之后，海容号和海琛号的两名满人舰长（分别为喜昌和荣续）被送到了上海。和端方一样，喜昌舰长请求宽恕，声称自己并不是纯粹的满人，说自己的祖先是汉人，祖姓是何。在一些案例中，满人最终被允许留在原地方。湖南永顺知县春梁就是这样的例子，他由旗人重新划归为汉人，并改用汉姓吴。[82]

总体上说，满人以各种方式对辛亥革命做出了回应。一些驻防城市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两个驻防城市——宁夏和绥远，都位于北部边境——实际上都成功击退了革命军。[83]另外，最有效的抵抗发生在荆州，他们与湖北革命军对峙了三周半时间。西安、福州、杭州和伊犁也进行了反击。另一方面，太原、镇江、广州、南京和成都这些驻防城市没有进行抵抗（南京实际上进行了抵抗，抵抗来自张勋率领的汉人而不是来自旗人）。在一些驻防城市中，当地精英由省谘议局和（或）商会代表，在革命军和旗人之间进行调解。这种情况发生在镇江、广州、成都和伊犁，这导致权力和平移交到新政权手中。而在福州、杭州和南京，调解却没能阻止双方发生冲突。 204

反满暴行的范围也各不相同，但和抵抗的程度没有明显的关系。广州和成都驻防八旗没有进行抵抗，但却遭受了严重的暴行。在其他几个进行抵抗的驻防八旗——最明显的是福州、杭州、荆州和伊犁，一旦战争停止，杀戮也基本停止。总体而言虽然少数高官被杀死——如杭州的驻防协领贵林、成都的四川总督赵尔丰和伊犁将军志锐，但是一旦旗人向革命军投降，他们就不会受到伤害。另一方面，西安、太原、镇江、南京的驻防八旗，以及驻扎武昌的旗兵，都遭受了极为严重的反满暴行。武昌、西安和太原的旗兵进行了抵抗，而镇江和南京的旗兵没有抵抗。不管有没有挑衅，上述五个地方的满人被杀、被逼自杀或被驱逐了，他们的住宅遭到了抢夺和焚毁。行凶者不加区别，不仅把目标对准旗

兵，而且对准了他们的亲属，包括妇女和孩子。他们基本是杀戮的牺牲品。很明显，对于很多革命军来说，其反满的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华丽的辞藻。

很多旗人通过装扮成汉人的方式来自救，但这通常是徒劳的。这也清楚地显示了在革命时期，满人和汉人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些非常明显的区别。满人很容易被分辨出来，因为他们的住处，他们的语言（不是满语，而是北京官话），他们的姓氏习惯；对于旗人妇女来说，她们的服饰和大脚更是惹眼。1911 年 10 月下旬《时报》刊载的三张系列漫画，描述旗籍妇女穿上汉人妇女穿的上下两件衣服（宽松的上衣和裤子）而不穿她们的旗袍，摘下她们精美的金丝边头巾，剪掉自己的长发并盘髻，最终削平她们的厚鞋底，甚至尝试着缠脚，以此混入汉人的队伍（图 12、图 13、

图 12　旗人改装图（一）
（《时报》，宣统三年九月六日，
附录。感谢交通大学图书馆）

图 14)。[84]比较明显的是武昌、西安和南京，这些隐匿努力通常都收效甚微。

最终，反满暴行很大程度上局限在中国南部、中部和西北部，这里的革命军最活跃。华北和满洲的驻防八旗——三分之二的旗人居住在这里，但革命军的势力相对较弱小——几乎完全被宽恕。毫无疑问，如果革命继续下去，不断蔓延，他们也会暴露在反满暴行的威胁之下。然而在 1912 年 1 月伊犁恢复由汉人统治之时，清廷（现在由袁世凯代表）正积极设法与革命军和谈，不久清帝退位，革命结束。 205

图 13　旗人改装图（二）
（《时报》，宣统三年九月六日，
附录。感谢交通大学图书馆）

图 14　改装后之旗人
（《时报》，宣统三年九月七日，
附录。感谢交通大学图书馆）

南北和谈

到 1911 年 11 月上旬，革命爆发后前三周所引发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平息。显然，此时革命并不容易继续进行下去，因为载沣控制下的清廷极力应对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挑战。尤其是，朝廷的第一军在荫昌和之后的冯国璋率领下，已经从革命军手中重新夺回汉口。载沣也批准了“十九信条”，这基本上满足了君主立宪派多年来的政治改革要求。但是，革命也显然得到了全国各地和各种社会团体的支持，并不会被轻易击溃。此时，革命党人及其在新军和各省谘议局中的同情者，已经把自己的控制范围从湖

北武昌扩展到了其他五个省的省会城市。因此，清廷和革命党人陷入了僵局，双方谨慎地进行谈判，寻求打破僵局的办法。这些试探性的谈判在12月中旬上海的正式会谈中达到高潮。

11～12月，袁世凯在北京的地位逐步稳固。11月1日，袁世凯接到接替奕劻内阁总理的任命时，他还在湖北前线，但他辞谢了这一任命。为了满足立宪改革派对责任内阁的要求，袁世凯坚持他的任命应该来自国会而不是皇帝。资政院（在“十九信条”中资政院被授权代行国会权力）的九十二名留下的成员被迫于11月8日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清廷第二天批准了资政院的决定。[85]此时，袁世凯才接受了任命。在两千名护卫的保护下，袁世凯于13日下午到达了北京。同时，皇帝的一道谕令授予他京畿 *206*
地区的军事全权，统率京畿地区的所有部队。唯一不受其领导的是清廷控制下的禁卫军，载沣仍然是其名义上的统帅。[86]

一旦在北京就职，袁世凯就开始不断削弱载沣和清廷，进一步扩张自己的权力。11月22日，他说服清廷授予他决断大部分事务的权力（除了涉及皇室的事情），这是以前皇帝所拥有的特权。尤其是，所有的奏折和陈情从此以后都被移交到内阁而不是皇帝那里。同时，袁世凯获得允许，他及其内阁其他成员可以不参加每日例行的朝见。[87]12月6日，在光绪皇帝遗孀隆裕太后的大力支持下，袁世凯策划了摄政王的辞职，要求其为过去三年清廷的过失负责。在自己的要求下，载沣保留了以前的醇亲王头衔，并且从皇室得到每年五万两白银的退休金，但此后不能“参与任何朝廷事务”。隆裕太后仿效慈禧太后，从载沣手中接管了处理朝廷事务的权力，但没有为年幼的皇帝安排一名新的摄政王。[88]最后，袁世凯成功地从清廷手中夺去了对禁卫军的控制权。12月9日，在袁世凯内阁的要求下，清廷颁布了一道谕令，免去了载沣弟弟载涛禁卫军训练大臣的职务（自从禁卫军设立开始，载涛就担任此职），任命袁世凯的老部下、第一军的指挥官冯国璋取代前摄政王担任禁卫军的指挥官（在湖北前线接替冯国璋的是袁世凯的另一名部下段祺瑞）。另一道谕令解除了年轻有为、在日本受过训练的皇族良弼禁卫军第一协统领的职务，把他安排到军谘处这个听

起来显赫却没有实权的地方任职。冯国璋于12月21日正式担任禁卫军统领。[89]袁世凯不仅重新获得了对北洋军队的控制权，而且对清廷加强中央军事集权的努力给予了沉重的打击。

同时，袁世凯代表清廷寻求与革命党人的军事停火以及可能的政治谈判。袁世凯并没有在清廷取得汉口胜利的基础上趁势而进，反而命令他的军队在11月4日停止向汉阳进发。同时，他派部下刘承恩（湖北当地人）写信给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劝说黎元洪接受“和平策略”，解决当前危机，给清廷一次改革的机
207 会。一周后，革命党人没有回应，他派自己的私人秘书蔡廷幹（1861—1935）与刘承恩一道前往武昌，和黎元洪进行私人会面。冯国璋当时还是湖北前线的清军指挥官，他不同意清廷与革命军进行这些表面上的接触。[90]

袁世凯也得到了汪精卫的支持，汪精卫是同盟会的领导人，他因为1910年企图刺杀摄政王而被关押。1911年11月6日，汪精卫被释放，他并没有返回南方加入革命队伍，而是留在北京并迅速与杨度取得了联系。杨度曾经鼓吹宪法和八旗改革，后来成为深得袁世凯信任的一名政治幕僚。早在几年前，汪精卫就与杨度在日本相识，当时他们都是日本法政大学的学生。可能基于“与袁世凯结盟推翻清廷”的策略，汪精卫和杨度于1911年11月15日以国事共济会的名义联合发表了一份声明，声称汪精卫代表“民主立宪派”，杨度代表“君主立宪派”。虽然两人对政体的形式持不同意见，但都承认立宪政府和民权。他们号召清廷与革命军之间停止战争，以免外国势力插手中国的事情，并建议召开临时国民会议在两种宪政体制中进行选择。[91]

又花了三周的时间，清廷和革命军最终达成了停火协议。最初，革命军对和谈并不感兴趣，因为在遭受了汉口挫折后，他们又重新占据了优势。到11月下旬，长江及其以南的省份都宣布支持革命，正如北方的陕西和山西一样。但11月底，他们遭到了两次军事上的挫折。在湖北，黎元洪和黄兴（1874—1916）没能守住汉阳，冯国璋统领的第一军在11月27日重新占领汉阳；在山西，太行山沿线的革命军在曹锟军队的攻击下不得不后退，最终

曹锟于12月12日重新占领了军事要地娘子关，由此大大减轻了革命军对京畿地区的军事威胁。革命军一方遭受了这些军事上的挫折，而清廷一方也于12月2日失去了对南京的控制，因此两者形成了僵持局面。12月1日，武昌的革命军已经与袁世凯的代表团达成了一个三天的停火协议。12月7日，即载沣辞职后的一天，清廷同意与革命军进行一次正式谈判。[92]除了荆州和伊犁，辛亥革命的军事斗争基本上结束了。

在12月中旬正式于上海举行谈判之前，双方即已经亮出谈判 208
立场。正如杨度和汪精卫的声明所言，要么是君主立宪制，要么是民主（或共和）立宪制。到11月，清廷已经采取了措施主动从专制政体向立宪政体转变。例如，同意“十九信条”形式的第一宪法，同意选举出来（不是任命）的内阁总理统领“责任内阁”，授权内阁主要大臣处理几乎所有的政府事务。袁世凯的使者在11月上旬与黎元洪的试探性会谈中，声称这些改革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革命的要求。正如刘承恩告诉黎元洪那样，“朝廷仍拥帝位之虚名……大权均操之汉人”。[93]

面对革命军关于种群歧视的控诉，清廷试图以坚持君主立宪制来应对。在11月上旬发布的两道谕令中，清廷依然否认种族差异的存在——例如坚持认为“满汉皆朝廷赤子”——并谴责革命党人试图煽动族群仇恨的怒火。其中的一道法令在11月10日颁布，这似乎是由于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三天前在石家庄被暗杀这起骇人听闻的事件所引起的。[94]吴禄贞率领第六镇第十一协和主要是满人的第一镇第三标，奉命攻打山西的革命军，以减轻京畿地区西面的军事压力。这名政治上趋向于独立的统领迅速成为袁世凯和满人上层的眼中钉。一方面，吴禄贞公开批评袁世凯在湖北对革命军的战争（尤其是“残忍”地焚毁了汉口的汉城），并威胁说经过石家庄时要中断南下的铁路供给线；另一方面，吴禄贞还秘密与山西的阎锡山（1883—1960）和革命军合谋，反对朝廷。11月7日，吴禄贞两个不满的部下在石家庄火车站的战地指挥部枪杀了吴禄贞。回想起来，背后的指使人应该是袁世凯而不是满人，因为袁世凯担心吴禄贞会阻止他前往北京接受内阁总理职位。

然而，当时的新闻报道几乎众口一词地谴责第一镇的满人士兵。[95]11月10日的这道谕令虽然没有提到吴禄贞死亡的背景，但似乎想要缓解汉人关于满人强硬态度的普遍忧虑。曹锟取代了吴
209 禄贞的职位，他一个月后成功击退了阎锡山和革命军。

袁世凯作为内阁总理，他尽力支持清廷关于种族公平的言论，并处理了满汉关系中两个有争议的问题，即“皇族内阁”和辫子。虽然奕劻及其内阁成员在11月1日提出了辞呈，但直到16日袁世凯组阁，他们才被取代，而袁世凯的内阁与其前任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新内阁不仅不是由皇族亲王所统领，而且内阁成员根本没有皇族成员。（正如外国使团指出的那样，任命一个非亲王来担任外务部领导违背了《辛丑条约》，但是他们最终同意了这种变化。）[96]与奕劻内阁二比一的满汉人员构成不同，袁世凯十人内阁中只有一名满人担任内阁成员（理藩院的达寿，他的责任是管理中国边疆的非汉人）。[97]此外，与之前载沣控制下的清廷不同，袁世凯内阁积极回应资政院提出的修改发式的新提案。11月下旬，资政院再次投票通过了一项法案，强制要求官员、士兵、教师、学生剪发，而其他人则不受约束。12月7日，新内阁已经取代清廷成为各项政务的决策者，内阁同意废止清廷关于“剃发留辫”的谕令，但是不以任何强制性方式推行剪辫，相反，它允许所有人可以选择是否剪辫，如官员和平民都可以“自由剪发”。据说包括外务部所有的二百名高官在内，许多清朝官员立即剪掉了他们的辫子，但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做。[98]举例来说，袁世凯一直把辫子留到了清王朝结束之时。

当然，革命党人并没有被清廷向君主立宪制转变这种垂死挣扎举动所感动。他们要求实行“民主”政体，这意味着推翻清廷，结束专制统治，并建立共和国。在11月11日与袁世凯的两名谈判代表的会谈中，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质疑满人统治者的诚意，并对袁世凯这么信任清廷感到惊讶，因为袁世凯在1909年受到很不公正的对待。他告诉刘承恩和蔡廷幹，“满人贼也，我主也。我被贼劫掠，妻孥财产，悉为贼有”。黎元洪和革命党人坚持满人改革派做得还不够，他们应该自觉离开。然而，为了使革命迅速取

得胜利，共和主义者中的温和派愿意向袁世凯、清廷皇室和普通 210
满人作出重要让步，前提条件是他们赞成建立共和国。早在 11 月 11 日与刘承恩和蔡廷幹会谈时，黎元洪就声明，如果袁世凯脱离清廷，他的政府就准备承认袁世凯为共和国总统。[99]

革命党人也承诺，如果清廷退位并支持共和，就会得到优待，虽然这种承诺的态度有些模糊。在 11 月 11 日的会谈中，黎元洪告诉袁世凯的代表，朝廷所有人员的俸禄和人身安全都能得到保证；他还要求袁世凯转交一封写给当时摄政王载沣的信，在信中他再三强调“如果清廷退位，则保证其王位、俸禄和优待”。黎元洪随后于 11 月 23 日公开承诺“优待清廷皇室”，以此换取清廷对共和政体的支持。[100]上海的革命党人并不总是与湖北的革命党人意见一致，但也同样保证如果清廷退位的话，会得到优待。11 月 11 日，这一天武昌的黎元洪向袁世凯作出了承诺，而上海的四名主要领导人——伍廷芳、张謇、唐文治（1865—1954）、温宗尧（1876—1946），他们都是最近才从君主立宪制转向民主立宪制的——也向载沣发了一封电报，主张现在中国已经不能再实行君主立宪制了，呼吁他仿效古代圣贤尧舜让位的美德。如果清廷退位，“中华民国将优待皇室，以使其安富尊荣”。[101]

革命党人在对待普通满人民众方面也表达了类似的亲切愿望。上海的四名领导者也表示要“安全满旗”。三天后，为了回应一些外国传教士（特别是李佳白（Gilbert Reid，1857—1927））关于继续战争和优待满人的言论，伍廷芳和温宗尧用英文联合发布了一份公开信《致我们的外国朋友》，信中他们再次宣称要“保证皇室成员的生命和财产，所有满人都不例外”。尤其是，他们承诺“满人可以充分享受公民权，享有完全的平等与自由，并拥有其土地和财产”[102]。

这些非正式和间接的表示，为双方同意于 12 月上旬在上海正式谈判铺平了道路。12 月 7 日，当时受隆裕太后控制的清廷授予内阁总理袁世凯“全权”，要他任命一名代表与南方革命军“讨论 211
国内局势”。袁世凯任命唐绍仪（1860—1938）为他的全权代表，唐绍仪是与他相交甚久的同僚，也是一名资历丰富的外交谈判专

家。随同唐绍仪的代表团成员还有杨度和汪精卫，他们在几天前刚刚解散了国事共济会，因为当时南北双方显然都不愿意让一个国民会议来决定国家局势。聚集于武昌的革命军任命伍廷芳为他们的谈判代表，温宗尧作为他的副手一同前往。[103]

清廷于12月7日同意与南方军进行谈判，此前一天摄政王载沣被迫辞职，这让大量皇室成员深感忧虑。尤其是任命唐绍仪作为他们的谈判代表，更使他们寝食难安。在革命爆发后的两个月内，唐绍仪表现出对清王朝缺乏忠诚，这很令人担忧。据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所说，唐绍仪曾在11月中旬“与庆亲王密谈了几个小时并试图说服他，让清廷体面地退位，这样可以很容易达成协议”。12月初，根据内阁刚做的决定，他剪掉了辫子。溥伦这位贝子曾经在奕劻的内阁中担任农工商部尚书，他对来访的美国金融专家司戴德（Willard Straight）说，“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代表政府参加上海和谈是很不幸的事情”，并对袁世凯本人产生了很大的怀疑。由于关系到切身利益，这些满人亲贵坚持唐绍仪的代表团不仅要有来自各省的人，还要扩大范围把一名旗人代表纳入其中。汉军旗人、来自杭州驻防的章福荣因此被任命为代表团成员。[104]

在武昌与黎元洪会面之后，唐绍仪率领代表团于12月17日到达了上海，并立即与革命党人进行了会谈协商。唐绍仪与伍廷芳在租界内的市政厅里进行了一系列公开会谈。然而，通过汪精卫（他到上海后就被任命为南方议和团的顾问）的调解，唐绍仪也与伍廷芳以及其他一些革命党人到共同熟人的家中进行秘密会谈。晚上的这些会谈才是真正进行的谈判。白天在市政厅的会议仅仅是一种形式，他们在公开场合重复的不过是双方代表私底下达成的协议。[105]

12月18日下午正式谈判开始时，双方谈判的态度已经基本明
212 确。革命军的底线是建立共和政体，这当然包括清朝及其君主政体的终结。然而，正如各种共和政团一个月以来解释的那样，如果袁世凯能够安排清廷退位，他们就会让他成为共和国的总统。而且，如果皇帝能够主动退位，革命军将会优待清廷和普通满人以作为回报。另一方面，清廷（虽然不一定是袁世凯本人）的要

求是继续保持清朝的统治和君主政体，即使大部分权力被限制在宪法的框架内。这样，争论的焦点就集中在一个主要问题和两个附属问题上。主要问题是继续保持当前的君主立宪政体还是建立一个共和政体。如果一致同意建立共和政体，附属问题是如何让清帝退位以及对清廷和旗人采取什么样的优待。

在君主政体和共和政体之间进行选择，这个主要问题在谈判中早就被提出来而且迅速被决定下来。在12月20日举行的第二次公开谈判中，共和派代表伍廷芳坚持清廷已经完全没有信任可言，因为其在管理统治上再三失败，并且国人现在已经做好了实行“共和宪政”的准备。他保证，如果清廷退位，皇室成员和普通旗人都会得到供养。正如唐绍仪传达的那样，伍廷芳努力减轻清廷对于革命军打算从中国版图的十八个省份中“尽逐满人”的忧虑。伍廷芳再三保证，“我等非恨满人”，事实上，“改革之后，满人与汉人必无歧见”。唐绍仪没有进行任何努力来争论是否继续君主政体这个问题，这使清廷谈判代表团（包括旗人章福荣）的许多成员感到失望，但并不感到惊奇。相反，唐绍仪告诉伍廷芳，他本人同意建立共和政体是应对革命危机唯一的和平方法。但是，唐绍仪提出，至于采取君主政体还是“民主”政体，这要由“国民会议”来决定，这样使得杨度和汪精卫早先提出的被放弃的提议再次被摆上桌面。这样的一个会议毫无疑问会倾向于实行民主共和政体，但可以让清廷更容易接受。唐绍仪要求休会一周，他将利用这段时间来说服袁世凯和清廷。[106]

可以理解，清廷对它的谈判代表在上海所持的调和姿态深感忧虑。清廷陷入绝望之中，要求袁世凯（他仍表示希望实行“有限君主政体”）去试探实行君主立宪制的英国和日本驻华公使，看 213
看这两个国家是否愿意插手，去反对中国实行共和政体。虽然日本对此事感兴趣，但英国并不支持。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还通过外交手段，支持唐绍仪由国民会议决定政体的想法。[107]同时，一周的休会时间到了。12月27日，唐绍仪发电报给袁世凯，迫切要求尽快给一个决定。孙中山此时也结束了几年的放逐生活，并于两天前回到上海，这给谈判带来新的复杂因素。而且，唐绍仪和

伍廷芳达成的停火协议在31日就要到期了，唐绍仪怀疑共和派在没有决议的情况下是否能接受这样一个宽限。如果谈判失败战争继续，他警告说，“没有人能够预测宗社能够保全还是毁灭”。他劝说这名内阁总理颁发命令，召集一个临时性的议会来决定实行何种政体。[108]

12月28日，袁世凯及其内阁上了一道奏折，奏折内容包括了唐绍仪电报的主旨，并要求与朝廷面谈。他们再三强调了唐绍仪的观点：即使提议召开的国会按照有利于共和政体的方向做出了决定，它也会深感圣恩，全力优待皇室。另一方面，如果谈判结束战争重新开始，就不能确保君主和贵族的安全。这不是内阁能够决定的问题，需要朝廷做出裁决。隆裕太后立即召集了一次正式的廷议，至少八名王公大臣（载沣、奕劻、善耆、载洵、载涛、溥伦、载泽和毓朗）和袁世凯及其内阁参加了这次会议。正如在奏折中所陈述的一样，内阁再次要求清廷同意唐绍仪的提议。否则，一旦战争继续，朝廷只能用宫廷收入来支付军费开支。如果朝廷不这样做，内阁也无法继续履职。面对如此无奈的抉择，许多王公都默不作声。只有与袁世凯共事多年的奕劻表示支持内阁的计划，而两名王公——前军机大臣毓朗和前度支部尚书载泽表示反对。经过五个小时毫无结果的争议之后，隆裕太后自己做出了决定，即同意唐绍仪的提议。她以自己的名义发布了一道懿旨，对“十九信条”没有能够平息政治上的争议感到失望。她授权内阁召集临时国会，来决定实行君主政体还是共和政体。[109]由于十四个省现在都控制在革命军手中，临时国会将如何做出决定，这根本没有任何悬疑。

214 随着唐绍仪让清廷体面地退位，清廷做出了有条件的屈服，从20日以来暂停的上海正式谈判于29日重新开始。在这次谈判以及随后两天的附加会议上，唐绍仪和伍廷芳同意将停火协议推迟到这个月底之后。他们都同意组成“国民会议”（而不是“临时议会”）来决定中国将来的政体，由于当初没有议定，他们还讨论了国民会议开会的地点和时间。伍廷芳要求立即于1月8日在上海召开国民会议，而唐绍仪说他还要和袁世凯协商，因为袁世凯想要

会议在北京举行，同时他怀疑会议是否能够这么快举行。[110]最后，在没有唐绍仪任何公开意见的情况下，伍廷芳提出了关于优待条款的两个清单，各包括五项条款，涉及对清朝皇帝、满人和其他非汉人将来的处理办法。关于清帝之待遇：以待外国君主之礼待之，退居颐和园，优给岁俸数目由国会定之，陵寝及宗庙听其奉祀，保护其原有私产。关于满、蒙古、回、藏之待遇：一律与汉人平等；保护其原有之私产；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八旗生计以前原有口粮暂仍其旧；从前营业之限制、居住之限制一律蠲除；所有王公等爵概仍其旧。[111]

这样，到1911年12月最后一天，清廷只能同意退位。作为回报，革命军详细阐明了之前关于优待皇帝和满人的承诺。只剩下最后一道程序需要履行：召开国民会议来正式批准由君主政体转变为共和政体。一般都认为这只需要几天的时间。

退位及其条件

然而，清廷并没有在六周之后退位。由于两个意想不到的障碍导致退位拖延，一个是袁世凯设置的障碍，一个是顽固的满族保皇派设置的障碍。于是举行了一次附加的谈判，焦点集中在退位协议的条款上。谈判的结果是，清廷和满人最终受到的待遇甚至要比唐绍仪和伍廷芳当初达成的协议好得多。

对于唐绍仪和伍廷芳达成的协议，清廷很不愿意接受。这一 *215*
协议也在支持双方的政治力量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对。一方面，包括孙中山在内，革命党人中的激进分子对伍廷芳对清廷做出如此巨大的让步感到愤怒。他们尤为不满的是，伍廷芳同意唐绍仪提出的由国民会议决定中国将来政体的提议。他们拒绝继续等待，1911年12月29日，也就是孙中山到达上海后第四天，支持共和政体的各省代表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他们采取了标志着新的一年开始的阳历，正式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定都南京。[112]另一方面，清廷的支持者大部分都是满人，他们对唐绍仪的做法也极为不满，怀疑唐绍仪是否忠诚于清廷，认为他

根本没有坚定地代表君主政体。12 月底，清廷的支持者在北京成立了君主立宪赞成会。大部分成员都是满人。赞成会把总部设在八旗先贤祠，后来君主立宪赞成会改成了众所周知的宗社党，致力于保护朝廷的“宗庙社稷”。[113]

内阁总理袁世凯表面上对保皇派表示同情，1 月 2 日他立即解除了唐绍仪谈判代表的职务，指责他超越了自己的权限，并拒绝承认唐绍仪和伍廷芳达成的协议。北方的十五名将领赞同他的行动，其中包括冯国璋这名刚到任的禁卫军统领，他们联合发电报给袁世凯，声称坚定地支持君主立宪政体。他们发誓将竭尽全力战斗到死，号召朝廷贵族尽自己的责任，拿出自己的私人财产来支付继续战争需要的经费，包括他们存在北京各外国银行的三千万到四千万两白银。[114]

与保皇派不一样，袁世凯与其说关心君主政体的命运，毋宁说更关心自己的前途。他并不是对唐伍协议本身感到愤怒，而是对他亲眼所见激进革命党人的背信弃义感到怨恨。袁世凯宣称，建立中华民国违背了唐伍协议中“中国将来的政体由即将举行的国民会议来决定”这一条款。袁世凯想知道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是否背弃了之前的一再承诺：如果他确保清廷退位，革命军就保证让他当总统。后来孙中山打消了他的担心，声称如果他能够结束清廷的统治，那他自然会让位。[115]

对自己将来的地位了然于胸后，袁世凯再次改变了态度。他重新开始与革命党人谈判，再一次劝说清廷退位。随着唐绍仪被
216 解职，上海面对面的正式会谈结束了，随后的谈判在袁世凯本人与伍廷芳之间以电报的形式进行，伍廷芳虽然与孙中山的民国政府存在分歧，但仍然是首席谈判代表。唐绍仪虽然被解职，但仍然作为袁世凯的非官方代表供职于上海。[116]唐伍协议构成了新一轮谈判的基础。共和派明确表示，如果清帝退位，他们仍然准备优待清廷和满人。1 月 10 日，据新闻报道，他们把协议的原文发电报给北京，这一协议在实质上与伍廷芳先前提供给唐绍仪的协议几乎完全相同。新的提议与原来提议唯一的不同点是：要求皇帝退位后隐居到长城外的热河，而不是颐和园。[117]

对于袁世凯来说，他同意激进革命党人的意见，认为通过国民会议来决定实行君主政体还是共和政体是没有必要拖延的。他现在对清廷施压，要求其接受革命军的提议立即退位。到1月中旬，袁世凯似乎说服了清廷按照他的提议马上退位。1月14日，袁世凯的一名秘书（可能是蔡廷幹）通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说隆裕太后将在几天内发布一道谕令，宣布清帝退位并让袁世凯暂时代管政府。16日早上，袁世凯个人给隆裕太后递了一道秘密奏折，声称民意不可违，清廷已经完全失去了民心。他警告说，停止抵抗才能避免法国大革命路易十四的命运。[118]巧合的是，好像为了强调革命威胁的直接性，袁世凯本人在离开紫禁城返回官署的途中，在一次未遂的暗杀计划中几乎被杀死。同盟会的三名当地会员因此被捕且被处以绞刑。[119]

在隆裕太后的主持下，清廷于第二天即1月17日召集会议来讨论袁世凯这道令人担忧的奏折。奕劻和溥伦都赞同内阁总理含蓄的建议，认为不要等到召开国民会议才退位。奕劻是亲王中袁世凯的支持者，他评论了革命党人提出的条款；而溥伦虽然先前对唐绍仪持怀疑态度，但他也认可袁世凯的判断，即清廷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已经没有希望。即使召开国民会议，最终的决定也会反对清廷，因此，接受革命党人优待清廷以作为退位回报的承诺，这是慎重之计。在这次朝会上，其他王公都沉默不语。只有蒙古喀尔喀亲王那彦图（1873—　）同意继续抵抗。那彦图的理 *217*
由似乎是担心俄国会利用清廷退位的机会，煽动蒙古从中国版图独立出去（事实上后来确实如此）。由于那彦图的担心，会议没有按照袁世凯的奏折行事，决定要推迟两天。[120]

由于清廷的谨慎，袁世凯和共和派继续完善退位协议的条款。1月18日，伍廷芳提出了一份协议修正案，这份协议与12月30日和1月10日的前两份协议非常相似。主要的变化在于与皇帝有关的四条附加条款。第一条规定皇帝被称为“让皇帝”，且头衔可以世袭。第二条允许皇帝在搬到颐和园之前仍然“暂时”居住在紫禁城，删除了隐退到偏远之地热河的提议。第三条明确了将由国会决定的皇帝每年的津贴不少于三百万两白银。第四条是一个

新条款，共和国要完成在建的光绪皇帝陵墓，奉安典礼仍如旧制。[121]

双方对伍廷芳的草案都不是完全满意。一些激进革命党人对伍廷芳对清廷的让步再次表示担心。对于继续使用“皇帝”称号并可以世袭，皇帝居住（如果仅仅是暂时）在紫禁城，共和政体要负责埋葬前皇帝，孙中山和黄兴都颇有微词。伍廷芳回答说，孙中山本人先前同意使用“让帝”或“清帝”一词作为皇帝将来的称呼，无论如何，这个称呼只是一种仪式而没有实际意义。伍廷芳还解释说，到这个冬天结束，皇帝就会从紫禁城搬到颐和园。至于光绪皇帝陵墓的修建，根据朝代更替的惯例，继位者都为退位者修建了陵墓，共和国也应该这样做。清廷的代表唐绍仪同样反对“让帝”一词作为皇帝将来的称呼，可能是因为这个词不够尊贵。[122]

伍廷芳希望快速推进双方做出决定，他随即对协议进行了两项最后的修改。为了满足唐绍仪的要求，他把君主退位后的称呼改为“清帝”。为了满足激进革命党人的要求，经过唐绍仪的同
218 意，他改为皇帝称呼不再“相传不废”，而代之以仅仅是“仍存不废”，也就是说这个头衔不能传之后代。这些变化被合并到协议之中，经过孙中山的批准，伍廷芳于 1 月 20 日把协议送给袁世凯。[123]

然而，当伍廷芳的新协议呈达御前时，清廷的态度变得异常强硬，这导致了退位之路的第二道障碍。不进行任何抵抗就下台，甚至不需要通过国民会议来投票决定政体就退位，这激起了一些宗室王公及其外围支持者迟到的异议。他们把愤怒发泄到奕劻身上，因为奕劻在 1 月 17 日廷议上同意革命军的提议。1 月 18 日早晨，君主立宪赞成会的代表前往奕劻的官邸，大声谴责他支持共和主义。第二天，赞成会发布了一份措辞激烈的控诉，指控这位老亲王被“叛贼”收买了。这种胁迫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在第二天 19 日的朝会上，奕劻否认他以前支持清廷退位。后来，他和先前同样支持退位的溥伦要求请假几天。[124]

早日退位的主要障碍来自北京的两支主要由满人组成的军队，

即第一镇和禁卫军，这两支军队中的许多人都是君主立宪赞成会的成员。1月中旬，禁卫军第一协的士兵发表声明，批评革命军无视朝廷做出的政治让步，并宣称他们将坚持君主立宪政体，誓死效忠，他们甚至要求到湖北前线帮助“剿除叛贼”。同时，禁卫军的士兵几乎每天集会来宣泄他们的愤怒和沮丧。在背后煽动士兵不满情绪的是两名在日本受过训练的保皇派人：良弼（前禁卫军第一协统领）和袁世凯的夙敌铁良（前南京驻防八旗将军，刚返回京城），他们曾经负责组建和训练这两支军队。据莫理循所说，两人都与“日本人往来甚密”，众所周知，日本人对共和主义态度冷淡，因此两人在“满人中积极灌输对袁世凯的不信任”。[125]

冯国璋是袁世凯任命的禁卫军统领，他坚持要事先知晓情况，但没有限制自己部队的保皇活动。[126]实际上，他自己与士兵一样，带有君主立宪的思想。虽然冯国璋在袁世凯的军队中开始戎马生涯，但他后来成为陆军贵胄学堂总办，并供职于宗室王公毓朗和载涛统领的军谘处。他率领第一军在湖北前线取得了两次胜利——收回汉口和汉阳，他不同意袁世凯对湖北革命军的议和措施。为了表示对冯国璋的感谢之意，清廷授予他男爵头衔，冯国璋对此深感圣恩浩荡。与唐绍仪不一样，冯国璋没有剪辫。最终，冯国璋成为十五名北方将军中的一员，他们在1月2日宣布支持清廷。冯国璋还是北京的同志联合会的创始人之一，这个组织的目的在于促进君主立宪政体。[127]

在朝大臣中，最直接反对退位的是奕䜣的孙子溥伟，他世袭恭亲王的爵位。在写给君主立宪赞成会的一封公开信中，溥伟解释说，17日举行第一次廷议时他正在休假，新闻报道的一些参加廷议的王公拥护共和主义，对此他感到极为愤怒。他发誓要在下一次廷议中据理力争。他确实如其承诺的那样做了。19日，溥伟与袁世凯的内阁大臣针锋相对，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袁世凯本人没有参加。虽然没有受伤，但他可能还没有从暗杀的阴影中恢复过来。）内阁大臣带来了袁世凯的一份奇怪的新提议，要求在天津附近建立一个临时政府。溥伟坚持应该进行不屈不挠的军事抵抗。他说，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对清廷的威胁比现在还要

严峻，但清廷与他们战斗了近二十载，在目前的形势下，朝廷就不应该有任何与“叛军”谈判或者建立新政府的念头。他质问，如此大费周折召回袁世凯，难道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在遇到一点麻烦时寻求和平吗？袁世凯的外务部副大臣胡惟德（1869—1933）以外国势力反对战事重开来辩驳，溥伟不屑一顾，坚称这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并怀疑列强是否会真的干涉。包括毓朗、载泽、载涛以及蒙古亲王那彦图在内的其他几位王公都站在溥伟一边，极力反对低三下四地投降。然而，可能是隆裕太后的疑虑，廷议再次没有结果而休会。[128]

在1月22日举行的早朝上，溥伟再次敦促实行武力抵抗政策。他根据冯国璋的陈述，宣称如果军队（大概是禁卫军和第一镇）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完全有能力保卫清王朝。隆裕太后忧虑重
220 重，担心如果清廷战败，革命党人优待的提议就不再会摆上桌面。溥伟对革命党人是否会履行协议的条款表示怀疑，不管怎样，从敌人那里接受这样一个提议是一种耻辱。与其退位，毋宁死。他的观点得到了载泽、那彦图和善耆的支持。廷议再次没有结果。[129]

溥伟和其他拒不妥协者显然相信，如果清廷抵抗失败，仍可逃离京城并在其他地方找到避难所，最近的几十年里清廷已经两次避难了。1900年陷入义和团运动困境中，朝廷逃到了西安，不过这次西安已经于10月下旬控制在共和党人手中，看来西安是不可能了。然而，还有几个可能的避难地。一个是甘肃，陕甘总督长庚正在集合保皇力量。另一个避难地是清廷在关外的热河行宫，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皇帝曾于此避难。新的热河都统锡良到任大约一个月，正在准备迎接朝廷的到来。第三个可能的避难地是东北，这是满族的发源地，那里的总督是被刺杀的赵尔丰之兄赵尔巽。据说，赵尔巽同意筹措资金，训练足够的士兵组成二十营军队来“营救皇帝”。在奉天，支持保皇和坚持抵抗的幕后人物是满人改革派金梁，《时报》称其为“良弼第二”。[130]

然而，组织一支对抗之师或者准备一个避难之地需要时间。这或许能解释溥伟为何转变为折中态度，这名武装反抗的坚定拥护者在廷议上逞一时口舌之快，但之后在1月22日会见李佳白时，

溥伟表示，他并不是如此反对退位本身，而是反对以这种低下的方式退位，如果接受这样的方式，那么整个朝廷就完了。他告诉这名美国传教士，他想拥护原来的方案，即唐绍仪和伍廷芳提出的由国民会议来决定实行何种政体。据李佳白记载，溥伟认为：

> 朝廷已经做出了很大让步。如果要进一步让步，清廷就不应该是屈服于压力，而是顺应民意……应该有一个代表会议来表达人民的意愿。如果会议这样决定，退位就会合情合理。[131]

当然，召集一个大规模的代表会议将为清廷争取到一些宝贵的时间。

顽固派最终成功地拖延了几乎要在1月中旬实施的退位。1月 221
24日，隆裕太后虽然个人仍存疑虑，但她还是颁布了一道谕令，内容基本上包含了溥伟会见李佳白时所表达的观点。与英国驻华公使所希望的正好相反，隆裕太后没有同意袁世凯的立即退位提议。她也没有采用伍廷芳20日提出的退位协议。相反，她又回到了12月底的决定，提出中国的政体要由国民会议来决定，她要袁世凯与共和派就会议的时间和地点进行谈判，自从唐绍仪与伍廷芳谈判中止后这个问题就被搁置了。[132]

清廷最后没有采纳袁世凯的建议，这让他大为光火，他立即策划了一场运动来向清廷施压，要朝廷推翻所做出的决定。1月25日，他自己对隆裕太后的谕令作出回应，警告她可能出现的后果。如果国民会议举行，极有可能坚持批准通过他与共和派谈成的任何退位协议条款。如果是这样，他“不敢预知”会议是否会如共和派先前承诺的那样优待朝廷。总而言之，正如其他人已经指出的那样，相比于让变化无常的国民会议来决定，接受共和派目前的协议并立即退位是极为明智的。[133]

袁世凯的军政支持者同样严厉批评清廷的顽固派。1月26日，四十余名清廷将军和军官，联合北洋第一军统领段祺瑞，向袁世凯内阁以及各位皇室亲王宗室王公发去电报，对清廷在退位问题上的拖延感到不满，他们谴责载泽和溥伟的阴谋诡计。他们说，

召集国民会议需要几个月时间，期间军事叛变、民众起义、盗贼行为，甚至外国势力干涉和参与都会发生。如果战争爆发且清廷战败，就很难保证“皇室尊容，宗藩生计”。即使召开会议，十有八九也会选择共和政体。因此，为什么不让国家避免几个月的混乱呢？为什么不在会议做出决定之前建立一个共和政体呢？十五名将领在两周半前还信誓旦旦要为君主立宪制誓死效忠，但现在只有两名没有改变态度：一名是禁卫军统领冯国璋，另一名是满洲的张作霖（1875—1928）。[134]

222 袁世凯的文官支持者也开始背弃清廷。11月底曾经自称为君主制支持者的杨度，1月26日又在北京组织成立了共和促进会。该会的领导人中包括满人改革派出版物《大同报》前主编乌泽声，他们严厉批评宗室王公从头到尾都在拖延误事。当人们想要君主立宪制时，王公们坚持君主专制政体；现在，人们要求民主共和政体，王公们总是慢半拍，又拥护君主立宪制。杨度的共和促进会警告说，如果皇帝不退位，革命军会放弃他们协议中的承诺。[135]实际上，这时共和党人正好进行了这样的威胁。1月27日，伍廷芳通知袁世凯，清廷如果不宣布立即退位，目前的停火协议在29日早上就会到期，20日递交的优待协议就会作废。[136]

反对立即退位的顽固派们不顾袁世凯及其支持者的警告和革命党人的威胁，强硬地坚持了两到三天。由于冯国璋及其统领的禁卫军重申他们对清廷的效忠，顽固派们毫无疑问底气更足了。冯国璋显然没有加入段祺瑞支持共和主义的阵营中，禁卫军的士兵在1月底公开重申他们对“君主立宪政体”的承诺。[137]满人顽固派的气焰最终被打压下来、退位的障碍被清除，这得归功于良弼被暗杀。良弼和铁良对于煽动禁卫军负主要责任，1月26日晚，他在与另一名保皇派满人善耆会面之后回家的途中，被一名革命党人暗杀（可能是袁世凯暗中策划了这一事件）。几天后，良弼伤重不治身亡。良弼的被暗杀，加上段祺瑞的威胁电报，使得包括禁卫军在内的顽固派屈服，他们的理想轰然倒塌。铁良仓皇逃出京城。[138]

这时相继进行了一系列廷议，来讨论如何应对段祺瑞。让国

民会议来决定国家政体这个以前宣布的计划被永久废弃，武装抵抗的想法也被排除了。然而，亲贵们仍然没有商议出替代的办法。隆裕太后必须做出决定。载沣和奕劻与袁世凯进行了频繁接触，根据他们两人的建议，隆裕太后“全权”委托内阁总理处理与革命党人的事情。她在2月2日的廷议上宣布了自己的决定，并在第二天以谕令的方式颁发。（溥伟和载泽两名坚持抵抗的亲贵缺席了 223
这次廷议，而袁世凯自从两周前在鬼门关走了一回后，第一次回到了紫禁城。）在给袁世凯的谕令中，这名皇太后说，不能为了“皇族的荣光和尊崇”而使广大民众陷入痛苦的泥潭。对于宗室、皇族、旗人、蒙古人、回人和藏族人将来的待遇，她要袁世凯提前安排好。[139]

袁世凯终于大权在握，他继续与革命党人就退位协议问题进行谈判。朝廷对伍廷芳20日提出的协议不满意，例如，清廷反对在文献中使用“退位”一词。[140]因此，袁世凯与隆裕太后密切协商之后，自己草拟了一份退位协议，并于2月3日提交给革命党人。[141]袁世凯的提案与伍廷芳的最终版本相去甚远。总体来说，袁世凯的协议增加到三部分，而不是伍廷芳版本的两部分。在伍廷芳的版本中，第一部分涉及的是皇帝。考虑到清廷的敏感，袁世凯版本省去了所有“退位”的提法。涉及皇帝一律都用“大清皇帝”，而不是简称为“清帝”。皇帝的头衔相传不废，而不是仍存不废。皇帝每年的津贴至少为四（而不是三）百万两白银，举行各种仪式还需要额外的专款。皇帝可以选择居住在紫禁城或者颐和园，而不是必须搬到颐和园。最后，增加了一条伍廷芳版本中没有的新条款，皇帝可以继续使用大小官员、仆役、守卫，尤其是禁卫军，在一条单独的条款中规定要确保禁卫军的规模和薪俸不能改变（增加这一条款明显是要减少对禁卫军士兵的控制，这样就能减轻皇室对将来的担心）。

袁世凯协议的第二部分单独涉及了如何对待皇族，对此伍廷芳的版本中没有特别提及，只是将其包含在非汉人贵族的范围中。协议指出，皇族的头衔继续保留并可以世袭，他们的“公权”与国民同等。但皇族免除兵役之义务。最终，第三部分涉及了如何

对待满、蒙古、回、藏，除了增加了两个条款外，其他大致与伍廷芳版本相同。其中一条是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官兵俸饷，仍旧支放；王公中有生计过艰者，应设法拨给官产，
224 作为世业，以资补助。另外增加的一条是，满、蒙古、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信仰自由。

由于袁世凯现在提出的协议与共和党人两周前拟定的协议存在较大的差异，伍廷芳把袁世凯草拟的提案带回南京，让孙中山及其共和政府过目。2月5日，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同意用袁世凯的版本取代伍廷芳的版本，并以其作为下一轮谈判的蓝本，但要求进行一些修改，一方面要增加一些条款，另一方面要恢复伍廷芳协议中的条款。[142]改变最多的是涉及皇帝的这一部分，一些地方进行了实质上的修改，一些地方只是进行词语上的修改。在实质修改方面，共和党人在袁世凯版本的正文中增加了一款序言，宣布“清朝皇帝要承认共和政体”，并具体阐明皇帝享受的“优待”要由袁世凯尚不承认的中华民国来授予。他们反对原文中皇帝头衔可以世袭的规定，如伍廷芳协议中要求的那样，他们坚持只有现皇帝在退位后可以保留头衔。他们名义上同意了袁世凯要求把皇帝的津贴从三百万增加到四百万，但将货币单位从白银变为元，这样津贴数目基本保持不变。他们拒绝承担额外的特殊礼仪费用。

临时参议院也拒绝允许皇帝选择自己的居住地，与伍廷芳一样，他们坚持皇帝必须退居颐和园，虽然他能够“暂时”待在紫禁城。他们同意袁世凯关于皇帝仆役和侍卫的附加条款，但是坚持不能招用太监进入皇宫。他们同意继续保留禁卫军，但他们要求这支军事力量必须受制于陆军部，而不再由朝廷单独掌控。至于修辞语句上的变化，一处是坚持君主被简单称呼为“清帝”，而不是威严的“大清皇帝”，这也是伍廷芳的想法。另一处是文件中依然使用对清廷的退位称呼，虽然改以相对缓和的“逊位”取代伍廷芳的“退位”一词。在文件的剩余条款中，南京的临时参议院接受了把涉及皇亲国戚的内容作为一个增加的单独部分，但在为其他非汉贵族提供福利方面，他们只愿意承担模糊的责任。他

们直接反对皇亲国戚和非汉贵族的头衔和爵位可以世袭。然而，他们同意继续向旗兵提供薪俸，直到长期存在的八旗生计问题得以解决。

一天后，伍廷芳将修改后的退位协议原文致电给袁世凯，袁世凯随后呈给隆裕太后和清廷。清廷发现南京协议版本的许多条 225
款是可以接受的，但反对缩减皇帝津贴的数量以及其他几项变化，包括一些用词上的改变。袁世凯要求伍廷芳在南京草案的基础上进行一些修改。他建议至少在新的货币单位实行之前，皇帝四百万两白银的津贴首先以“两”为单位支付。他继续坚持皇帝应该被称呼为“大清皇帝”，而不是简称为“清帝”，而且这个头衔可以世袭。他要求删除令人反感的“逊位”一词，或者用“致政”取代。他也反对把禁卫军的控制权由清廷移交到陆军部。在袁世凯的煽动下，冯国璋和段祺瑞达成了一致，因此北方的将领们也发电报给伍廷芳表示反对，他们也反对皇帝头衔的不可世袭，包括反对“逊位”一词。[143]

2月9日，伍廷芳按照临时参议院授予他的有限权力，回复了袁世凯，他愿意就袁世凯要求的一些而不是所有内容进行修改。一方面，他同意了袁世凯坚持皇帝拥有“大清皇帝”的头衔，接受了袁世凯的建议，即皇帝的津贴一开始以“两”为单位支付，其后再以“元”为单位支付。另一方面，他不愿意删除“逊位”一词或者用“致政”代替，虽然他建议使用“辞位”代替（带有主动下台的含义）“逊位”（与“退位”一样，带有一定的强迫意味）。共和派坚持皇帝头衔不能世袭以及必须移居到颐和园，对此他没有改变自己的态度。对于禁卫军的控制权移交到陆军部这一要求，他也没有妥协。[144]

伍廷芳提醒袁世凯和清廷，这已经是共和派能够对清廷做出的最大限度的让步了，共和派中的激进人士认为这些让步已经超过了他们的忍受范围。广东的军政府和省议会都勃然大怒。都督陈炯明（1878—1933）在2月8日发了一份通电，反对保留皇帝的头衔以及皇帝留在京城，该省议会反对禁卫军继续存在，如果这些条款不能加以改变，就要求恢复军事斗争来反对清廷。资深革

命党人谭人凤（1860—1920）同样一肚子怨气，认为承诺给予皇帝优待是完全没必要的，也是不明智的。上海新成立的社会党在2月10日主持了一次公开会议，对伍廷芳和南京临时参议院的懦弱
226 行为进行了强烈谴责。[145]伍廷芳承认这些条款已经非常宽容慷慨，但并没有违背共和主义的原则。他告诉黎元洪，为了确保清帝早日退位，他愿意修改这些条款。与他一起参与谈判的同僚汪精卫，以同样的理由回应了陈炯明、广东省议会以及革命派阵营中的其他批评者。[146]

由于清廷退位变为可能，袁世凯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预防那些仍持反对意见的人可能在京城引发的骚乱。他把禁卫军和陆军第一镇调离京师，并用陆军第三镇、第二十镇和江苏姜桂题的汉军取代他们。他命令冯国璋（他已逐渐接受了共和的不可避免）抚慰禁卫军。冯国璋来到禁卫军新的营地畅春园，召集了所有的军官和士兵，耐心地向他们解释退位协议的条款，包括禁卫军继续存在的条款。他告诉他们，内阁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来保护宗室。[147]结果，禁卫军的士兵在2月初宣布他们不再反对清廷退位。几乎同时，君主立宪赞成会承认共和趋势不可阻挡，承诺一旦朝廷作出行动，协会就解散。[148]

清廷承认大势已去，随着隆裕太后颁布了三道谕旨，清廷于1912年2月12日退位了，这一天离农历新年还差五天。第一道是退位谕旨，由张謇代表革命党人起草，袁世凯进行了修改。谕令中，隆裕太后承认清廷已经失去天命，因此她“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袁世凯在未经革命军同意的前提下增加了一款附加条件，根据这一条件，隆裕太后“全权”委托袁世凯组建一个临时共和政府，并命令他与“民军”协商，以期重新统一南北。谕旨结尾，隆裕太后希望“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第二道谕旨呼吁京城和各省官员在关键的过渡时期，保持和平与秩序。第三道谕旨批准了伍廷芳和袁世凯五周时间以来努力达成的退位协议。[149]

退位协议的最终版本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众所周知
227 的优待条件，涉及“大清皇帝”。协议规定，大清皇帝“辞位”之

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皇帝岁用四百万两白银，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皇帝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皇帝辞位后，侍卫人等、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照常留用，唯以后不得再招阉人；皇帝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德宗光绪皇帝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最后，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退位协议的其他两部分包括清皇族和满、蒙古、回、藏各族。关于优待清皇族方面，清王公世爵，概仍其旧；清皇族对于中华民国国家之公权及私权，与国民同等；清皇族私产，一体保护；清皇族免当兵之义务。关于满、蒙古、回、藏，规定他们与汉人平等，保护其原有之私产，王公世爵概仍其旧，满、蒙古、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还规定王公中有生计过艰者，设法代筹生计；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最后，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

三道谕旨既下，中国从君主制而入共和制。当然，革命党人对袁世凯最后的策略大为光火，因为袁世凯获清廷之授权来组建新政府。自始至终，他们都强调会接受袁世凯为总统，但应由他们而非清廷授权。然而，尽管怀疑其动机，他们还是履行了承诺。2月13日，清廷退位次日，孙中山辞职，15日，临时参议院一致 *228*
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当天，孙中山和许多随从一行拜谒南京朱元璋陵墓，他庄严地向明朝开国之君宣布，他们为被清廷征服的明朝复仇了，最终在268年之后，结束了“东胡”统治中国的耻辱。[150]

结　语

武昌起义后四个月又两天，清廷退位。清朝的统治轰然倒塌，

这并不意味着清廷对革命所做出的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回应是失败的。相反，在革命爆发后的几天内，清廷向湖北派去了强大的军队，并于11月底收复了武汉三镇中的两镇；清廷还在山西开辟了第二条反对革命军的战线，并最终把革命军赶出了山西首府太原。在政治上，通过履行“十九信条”的一些条款，清廷从专制政体变成了君主立宪制。由资政院选举的内阁总理袁世凯几乎执掌了全部行政管理权，这在以前是为清廷皇室所独揽的。清廷最后也废除了引起争议的辫子。如果在几个月和几年前做出这些让步，他们可能在与革命军的对峙中占上风。然而，到1911年11月和12月才做出这些让步，一切都太迟了。在一个接一个的各省首府中，由地方谘议局议长和新军指挥官分别代表的政治乡绅和军事精英，毫不犹豫地把前途押在了革命军身上，这注定了清廷的厄运，导致其很快崩溃。

这场革命为时虽短，却不可能不流血。根据最近的研究，这似乎只是一个“不超过1 000人至2 000人死亡”的“小事件”。[151]但这与事实相去甚远，西安的旗人死亡数量就是这个数字的几倍。在革命中死亡和受伤的人数很不均衡，大部分都是满人，他们是暴烈的民族主义的牺牲品，而这一民族主义是革命派十多年来一直鼓吹的意识形态的主要成分源泉。由于革命党几近成功，其中的一些人缓和了言论中的民族因素，正如汪精卫1910年所表现得那样。因此，到革命爆发时，对于在日本进退两难的
229 满人学生来说，老牌的革命宣传家章炳麟为他们吃了颗定心丸，他声称革命军无意杀满人来报复其祖先在扬州犯下的滔天罪行。[152]另一方面，血淋淋的言论和民族主义绝没有消失。例如，1911年11月初，上海军政府宣布，“实行光复重任，通过杀尽满人以泄汉人胸中仇恨”。在清廷退位前，孙中山提到满人时仍然贬称为“虏”，当时他把北伐军命名为“讨虏军”。[153]事实上，他几天后在明孝陵还把满人贬之为“东胡”。在这样煽动性言论的刺激下，一些革命军毫不令人意外地实行报复杀戮。同时，许多满人害怕革命党人会像他们宣称的那样“反满”，于是被迫自杀以免落入残忍的敌人之手。从许多不幸的满人例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

看到这一点。很多满人尽力把自己打扮成汉人，虽然经过长期大范围的文化融合，但他们还是保留了某些身份特征——例如居住地、语言、服饰和女人的脚，这些直到1911年仍然继续隔离着满人与汉人。直到退位协议最终规定废除对旗人居住地和职业的限制，这一现象才销声匿迹。

最后，正如一些激进的革命党人抱怨的那样，标志着革命成功的退位协议对满人过于优待。革命军没有抓捕或废黜宣统皇帝（他退位时才刚6岁），而是允许他保持以前的头衔，继续居住在重重宫殿中的一间，他们甚至给予他及其皇室一笔巨大的年津贴。当记者莫理循知道清廷想要四百万两白银的岁银时（据估计这个数字超过当时中国年度财政收入的1%），他认为这是一个“十分荒谬的数字”。莫理循几乎算不上一个共和同情者，但他认为一百万两白银就已经足够多了，因为清廷自身才给予前摄政王五万两白银。[154]然而，革命党人居然同意了这一巨大的数目。他们还承诺为八旗士兵提供至少一段时间的每月薪俸。退位协议中的这些条款是革命党人与清廷持续三个多月讨价还价的结果，革命军作为胜利者并没有欺负落败的清廷。唐绍仪和伍廷芳12月在上海进 230
行的公开谈判，只不过是一种公关策略，随后袁世凯与伍廷芳展开的拉锯谈判才是真正的全部内容。共和党人最终的慷慨大度，从表面上看好像与他们长期坚持反对“鞑虏”的言论不一致，实际上，他们这么做主要是希望避免拖延不决的军事斗争和可能出现的外国势力干涉。在他们看来，这只是用了很小的代价说服清廷退位和尽早接受现实。

【注释】

[1] 尚秉和：《辛壬春秋》卷3，4a。《东方杂志》，第8卷第9号，“革命战事记”，20页（宣统三年九月）。

[2] Dutt，Vidya Prakash（都德），“The First Week of Revolution：The Wuchang Uprising”（《革命第一周：武昌起义》），in *China in Revolution：The First Phase，1900－1913*（《革命中国：第一阶段（1990—1913）》），395～413页。Esherick，Joseph（周锡瑞），*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178～192 页。《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 61，24b～25a。

[3]《顺天时报》，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二日，7 页；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三日，7 页。《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 61，25a～25b。

[4]《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 61，34a～34b、73b～75a；卷 62，3a～4a、8b～9b。Kent，Percy Horace（肯德），*The Passing of the Manchus*（《满洲人的消逝》），101～102 页。侯宜杰：《袁世凯一生》，117～120 页。

[5] 章伯锋、李宗一编：《北洋军阀（1921－1928）》，第 6 卷，543 页。金梁：《光宣小记》，153 页。

[6]《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 51，10b～11a；卷 53，4b～5a；卷 57，20a；卷 61，28b～29a、34b～35a。《顺天时报》，宣统三年六月九日，7 页。丁士源：《梅楞章京笔记》，见吴相湘编：《中国现代史丛刊》，第 5 册，256～257 页。罗正纬：《滦州革命纪实初稿（节录）》，335～239 页。美国总参谋部档案，6 780—42，“1911—1912 年中国革命记录”。

[7]《北华捷报》，1911－10－21，141 页。《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 61，28b、70a。《东方杂志》，第 8 卷第 9 号，“革命战事记”，21 页（宣统三年九月）。

[8]《顺天时报》，宣统三年八月二十六日，7 页。《北华捷报》，1911－10－21，146、152 页。《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 61，69b～70b。Kent，Percy Horace（肯德），*The Passing of the Manchus*（《满洲人的消逝》），134 页。丁士源：《梅楞章京笔记》，见吴相湘编：《中国现代史丛刊》，第 5 册，258～259 页。丁士源（1879—1945）是陆军部的高级官员，随荫昌南行。他的详细记载具有很强的资料性，但奇怪的是这些资料的日期常常不准确，例如，他说荫昌 13 日离开北京，15 日抵达信阳。

[9] 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140b～144a。

[10] 尚秉和：《辛壬春秋》卷 3，6a。《北华捷报》，1911－10－28，217 页。《东方杂志》，第 8 卷第 9 号，“革命战事记”，21 页（宣统三年九月）。陈春生：《辛亥革命海军反正纪实》，见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697 页。张怿伯：《辛亥海军举义记》，见《辛亥革命》，第 7 册，471～472 页。

[11]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191 页。萧一山：《清代通史》，2648 页。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 1 册，77 页。

[12] 侯宜杰：《袁世凯一生》，120～121 页。关于徐世昌拜访袁世凯和袁世凯提出六项要求的事，虽然很多研究者都有相同的讨论，但是对于这一重要情节的可信度却一直受到置疑，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很多研究

者，包括侯宜杰，在提及这一段时都没有注明资料来源。第二，一些提到资料来源的研究者，其材料也不能支持这一情节。例如陈志让 *Yuan Shih-k'ai*（《袁世凯》）第 86 页引用的资料来自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而陶菊隐的叙述并没有确实的根据。陈志让还提及了张国淦的《辛亥革命史料》（106～110 页），但是张国淦的书中对徐世昌的拜访和袁世凯的要求都没有参考文献。另外一些文章（如，王寿南：《辛亥武昌起义后清廷之困境与清帝退位》，载《"国立政治大学"学报》，1986（4），86 页）提到了李廉方的《辛亥武昌首义记》（145b），李廉方确实提到袁世凯的六项要求，但是却没有说明确的时间，也没有将其和徐世昌的拜访联系起来。第三，载涛对"徐世昌秘密拜访袁世凯"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当时，我从没听说徐世昌要去彰德"（《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见《晚清宫廷生活见闻》，82 页）。另一方面，当时的报刊确实报道了关于徐世昌拜访袁世凯，以及袁世凯提出要求的新闻，但是，当时报刊的消息并不都有确定可靠的来源，例如《时报》（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七日，2 页）报道了徐世昌在某位亲王的陪同下，前往彰德拜访袁世凯，力劝他不要辞去总督的职位。《顺天时报》（宣统三年八月三十日，7 页）报道袁世凯上呈了一个密折提出八点要求，并要求自己要拥有全权。

[13]《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 62，14a～14b、28a～28b、38a～38b。

[14] 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153b～158a。王树枏：《武昌战纪》，见《辛亥革命》，第 5 册，231～232 页。Kent，Percy Horace（肯德），*The Passing of the Manchus*（《满洲人的消逝》），139～145 页。Powell，Ralph L.（拉尔夫·鲍威尔），*The Rise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1895-1912*（《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323 页。《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 62，55b～56b。丁士源：《梅楞章京笔记》，见吴相湘编：《中国现代史丛刊》，第 5 册，267 页。

[15] 尚秉和：《辛壬春秋》卷 3，6b。侯宜杰：《袁世凯一生》，122 页。沈云龙：《北洋之"狗"——冯国璋》，载《传记文学》，1976，28（5），49 页。《北华捷报》，1911-11-04，294 页；1911-11-11，355、357、358 页；1911-11-25，508、511 页。《东方杂志》，第 8 卷第 9 号，"革命战事记"，23～24 页（宣统三年九月）。Kent，Percy Horace（肯德），*The Passing of the Manchus*（《满洲人的消逝》），148～156 页。

[16] 尚秉和：《辛壬春秋》卷 24，3b。《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 63，6b～17a。

[17] 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271～273 页。张謇：《啬翁自定年

谱》，70 页。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145b。侯宜杰：《袁世凯一生》，120～121 页。

[18]《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1》，735～736、754～758 页。《顺天时报》，宣统三年九月七日，7 页；宣统三年九月八日，7 页。

[19] 关于张绍曾兵谏动机的不同观点，参见董方奎：《论“滦州兵谏”和“士官三杰”》，载《历史研究》，1981（1），57～72 页；杜春和：《张绍曾与“滦州兵谏”》，载《近代史研究》，1985（3），259～279 页。

[20]《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1》，753～754、803～805 页。张绍曾的奏折文本的日期很奇怪的标为宣统三年九月十三日（1911 年 11 月 3 日）。另外张国淦的《辛亥革命史料》第 197～198 页中关于该奏折的节选本中，日期却是正确标注的。

[21] 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198～199 页，转自 Fung，Edmund S. K.（冯兆基）*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The New Army and Its Role in the Revolution of 1911*（《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第 218～219 页的翻译文本。

[22] 杜春和：《张绍曾与“滦州兵谏”》，载《近代史研究》，1985（3），259 页。《北华捷报》，1911-11-04，285 页。

[23] 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202～203 页。

[24]《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 62，49a～50b，译文见 Kent，Percy Horace（肯德），*The Passing of the Manchus*（《满洲人的消逝》），160～161 页。

[25]《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 62，50b～53b，译文见 Kent，Percy Horace（肯德），*The Passing of the Manchus*（《满洲人的消逝》），162～164 页。

[26]《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 62，55a。

[27]《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1》，779 页。

[28]《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598～600 页。《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 63，1a～2a、5a；卷 64，2b。

[29]《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 63，5b～6a。

[30]《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1》，807～808 页。

[31]《北华捷报》，1911-11-04，296 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1》，805～806 页。《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 63，10b。

[32]《东方杂志》，第 8 卷第 9 号，“中国大事记”，8～9 页（宣统三月九日），译文见 Kent，Percy Horace（肯德），*The Passing of the Manchus*（《满

洲人的消逝》），169～170 页。

[33]《北华捷报》，1911－11－11，358 页。《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 63，23a。

[34]《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1》，830～831 页。杜春和：《张绍曾与"滦州兵谏"》，载《近代史研究》，1985（3），275 页。

[35]《顺天时报》，宣统三年九月十三日，7 页；宣统三年九月十五日，7 页；宣统三年九月二十五日，5 页。《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 63，27a。《清末汪兆铭被捕后的供单及有关史料》，载《历史档案》，1983（2），21～22 页。

[36]《顺天时报》，宣统三年九月七日，7 页；宣统三年九月十三日，7 页；宣统三年九月二十日，2 页。

[37]《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 63，16a～8a，译文见 Kent，Percy Horace（肯德），*The Passing of the Manchus*（《满洲人的消逝》），171～173 页。

[38] 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77a～80a。Fung，Edmund S. K.（冯兆基），*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The New Army and Its Role in the Revolution of 1911*（《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205～206 页。贺觉非、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史》，191 页。王缵成：《辛亥首义阳夏光复纪实》，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 2 集，29 页。周武彝：《陆军第三中学参加武昌起义经过》，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 7 集，14 页。

[39] 见 Fung，Edmund S. K.（冯兆基）*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The New Army and Its Role in the Revolution of 1911*（《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第 228～229 页的地图。贺觉非、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史》，201 页。

[40] 李剑农：《武汉革命始末记》，见《辛亥革命》，第 5 册，171 页。Esherick，Joseph（周锡瑞），*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181～182 页。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73、75 页。周武彝：《陆军第三中学参加武昌起义经过》，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 7 集，15 页。

[41]《时报》，宣统三年八月二十八日，3 页；宣统三年九月八日，3 页。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109b～110a。贺觉非、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史》，212 页。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85 页。Kent，Percy Horace（肯德），*The Passing of the Manchus*（《满洲人的消逝》），92 页。熊秉坤：《武昌起义谈》，见《辛亥革命》，第 5 册，94 页。李剑农：《武汉革命始末记》，

见《辛亥革命》，第5册，174页。关于满人的扁平头，参见Crossley，Pamela Kyle（柯娇燕），*The Manchus*（《满洲人》），20页。

[42] 杨霆垣：《记鄂军政府的初期外交活动》，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7集，47页。《顺天时报》，宣统三年九月八日，4页。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110a。贺觉非、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史》，226～227页。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政变》，100～101页。我还不能确定美国和英国的外交资料中关于维护满人的领事干涉。

[43] 杨霆垣：《记鄂军政府的初期外交活动》，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7集，47～48页。《北华捷报》，1911-10-21，143页。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政变》，33页。《顺天时报》，1912-04-09，4页。王缵成：《辛亥首义阳夏光复纪实》，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集，29页。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113a～113b。

[44] 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110a。Sherick，Joseph（周锡瑞），*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182页。

[45]《内阁官报》，宣统三年七月二十五日，539～540页。英国外交部档案，FO405/208，no.65，1911年12月29日Jordan（朱尔典）致Grey（格瑞）的信。

[46] 朱叙五、党自新：《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4～8页。Keyte，J.C.（凯特），*The Passing of the Dragon：The Story of the Shensi Revolution and Relief Expedition*（《龙的消逝：陕西革命和救济的故事》），第1～5章。尚秉和：《辛壬春秋》卷43，5a。

[47] 朱叙五、党自新：《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8～10页。尚秉和：《辛壬春秋》卷4，1a；卷43，5a。Keyte，J.C.（凯特），*The Passing of the Dragon：The Story of the Shensi Revolution and Relief Expedition*（《龙的消逝：陕西革命和救济的故事》），9页。《陕西通志稿》卷44，43b～44a。

[48] 郭孝成：《陕西光复记》，见《辛亥革命》，第6册，46页。郭希仁：《从戎纪略》，见《辛亥革命》，第6册，65页。

[49] Keyte，J.C.（凯特），*The Passing of the Dragon：The Story of the Shensi Revolution and Relief Expedition*（《龙的消逝：陕西革命和救济的故事》），42页。朱叙五、党自新：《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10页。

[50] Keyte，J.C.（凯特），*The Passing of the Dragon：The Story of the*

Shensi Revolution and Relief Expedition（《龙的消逝：陕西革命和救济的故事》），43～45 页。尚秉和：《辛壬春秋》卷 4，2b、3b。

[51] 郭孝成：《陕西光复记》，见《辛亥革命》，第 6 册，41～42 页。Keyte，J. C.（凯特），*The Passing of the Dragon*：*The Story of the Shensi Revolution and Relief Expedition*（《龙的消逝：陕西革命和救济的故事》），48 页。郭希仁：《从戎纪略》，见《辛亥革命》，第 6 册，69 页。

[52] Keyte，J. C.（凯特），*The Passing of the Dragon*：*The Story of the Shensi Revolution and Relief Expedition*（《龙的消逝：陕西革命和救济的故事》），32～33、44、48、53～55 页。英国外交部档案，FO 405/208，no. 149，附件 2，1911 年 12 月 1 日 A. G. Shorrock（索瑞克）致 Jordan（朱尔典）的信。尚秉和：《辛壬春秋》卷 43，5b。《北华捷报》，1911-03-23，772 页。朱叙五、党自新：《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 5 集，10、12 页。

[53] 尚秉和：《辛壬春秋》卷 6，1a～2b。薛笃弼：《太原和河东光复的片段》，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 5 集，169～171 页。姚以价：《辛亥太原革命军记录》，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 2 编第 4 册，266～268 页。《北华捷报》，1911-11-25，518～520 页。Keyte，J. C.（凯特），*The Passing of the Dragon*：*The Story of the Shensi Revolution and Relief Expedition*（《龙的消逝：陕西革命和救济的故事》），174～175、179 页。

[54] 张立瀛：《镇江光复史料》，见《近代史资料》，1957（6），76～77 页。吴次藩：《镇江光复回忆》，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 4 集，263～267 页。许崇灏：《辛亥镇军起义克服南京经过记》，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 2 编第 4 册，247～250 页。郭孝成：《江苏光复纪实》，见《辛亥革命》，见第 7 册，20 页。《时报》，宣统三年九月二十六日，3 页；宣统三年十月五日，4 页。

[55] 张立瀛：《镇江光复史料》，见《近代史资料》，1957（6），78 页。吴次藩：《镇江光复回忆》，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 4 集，267～268 页。林述庆：《镇军援宁记》，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 2 编第 4 册，42、44 页。《时报》，宣统三年九月二十六日，3 页；宣统三年十月五日，4 页。

[56] 刘通：《辛亥福建光复回忆》，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 4 集，460 页。尚秉和：《辛壬春秋》卷 44，1a～3a。魏秀梅：《清季职官表·人物录》，15、204 页。

[57] 《时报》，宣统三年十月一日，3 页。郭孝成：《福建光复记》，见《辛亥革命》，第 7 册，280 页。尚秉和：《辛壬春秋》卷 15，1a。刘通：《辛

亥福建光复回忆》，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460页。

[58]《时报》，宣统三年十月六日，3页。郭孝成：《福建光复记》，见《辛亥革命》，第7册，280～281页。尚秉和：《辛壬春秋》卷15，1a～1b。《东方杂志》，第8卷第9期，"革命战事记"，18～19页（宣统三年九月）。

[59]《时报》，宣统三年十月一日，3页。郭孝成：《福建光复记》，见《辛亥革命》，第7册，281页。刘通：《辛亥福建光复回忆》，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461～463页。尚秉和：《辛壬春秋》卷15，1b～2b。郑权：《福建光复史略》，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2编第2册，318～319页。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卷1736，2号，金旭的奏折，宣统三年十二月十二日。《顺天时报》，宣统三年十二月十九日，7页。高时良：《福建省革命史话》，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2编第4册，363、365页。

[60]《时报》，宣统三年十月一日。《顺天时报》，宣统三年十月二十三日，4页；宣统三年，十二月十九日，7页。高时良：《福建省革命史话》，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2编第4册，365页注2。刘通：《辛亥福建光复回忆》，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463页。郭孝成：《福建光复记》，见《辛亥革命》，第7册，281页。尚秉和：《辛壬春秋》卷15，2a～2b。郑权：《福建光复史略》，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2编第2册，319页。

[61]蔡宏渊、刘晓宁：《辛亥南京光复——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见《辛亥革命在各地》，165～166页。Kent，Percy Horace（肯德），*The Passing of the Manchus*（《满洲人的消逝》），241页。

[62]尚秉和：《辛壬春秋》卷13，3b～4a。英国外交部档案，FO 405/205，no.494，1911年11月23日Jordan（朱尔典）致Grey（格瑞）的信。Fung，Edmund S. K.（冯兆基），*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The New Army and Its Role in the Revolution of 1911*（《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222页。

[63]马涯民：《南京光复见闻琐记》，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258页。

[64]尚秉和：《辛壬春秋》卷13，4a。Kent，Percy Horace（肯德），*The Passing of the Manchus*（《满洲人的消逝》），241～242页。Fung，Edmund S. K.（冯兆基），*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The New Army and Its Role in the Revolution of 1911*（《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222页。

[65] Kent, Percy Horace（肯德），*The Passing of the Manchus*（《满洲人的消逝》），245页。尚秉和：《辛壬春秋》卷13，5a。

[66] 蔡宏渊、刘晓宁：《辛亥南京光复——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见《辛亥革命在各地》，167～172页。Kent, Percy Horace（肯德），*The Passing of the Manchus*（《满洲人的消逝》），247～252页。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234～235页。尚秉和：《辛壬春秋》卷13，6a～6b。郭孝成：《江苏光复纪实》，见《辛亥革命》，第7册，17页。

[67] 许崇灏：《辛亥镇军起义克服南京经过记》，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2编第4册，40页。Farjenel, Fernand（法杰勒），*Through the Chinese Revolution*（《透过中国革命》），106页。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237页。尚秉和：《辛壬春秋》卷13，6b；卷45，11b～12a。《顺天时报》，宣统三年十月十六日，7页；宣统三年十一月四日，4页。《时报》，宣统三年十月十八日，4页。

[68] Fung, Edmund S. K.（冯兆基），*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New Army and Its Role in the Revolution of 1911*（《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223页。

[69] China, Maritime Customs（中国海关），*Returns of Trades, 1911*（《1911年贸易统计报告》），第2卷，270页。

[70] Esherick, Joseph（周锡瑞），*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195～196页。李一：《荆宜施鹤光复记》，见《辛亥革命》，第5册，253页。潘洪钢：《辛亥革命与荆州驻防八旗》，载《满族研究》，1992（2），23～24页。

[71] 渤海寿臣：《辛亥革命始末记》，344页。李一：《荆宜施鹤光复记》，见《辛亥革命》，第5册，262～267页。《顺天时报》，宣统三年十月十六日，2页；宣统三年十月十七日，2页。

[72] 李一：《荆宜施鹤光复记》，见《辛亥革命》，第5册，254～257页。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卷1718，8～10号，连奎等奏折，宣统三年九月六日、九月二十八日、十月七日。

[73] 李一：《荆宜施鹤光复记》，见《辛亥革命》，第5册，257～259页。China, Maritime Customs（中国海关），*Returns of Trades, 1911*（《1911年贸易统计报告》），第2卷，270页。尚秉和：《辛壬春秋》卷3，13b；卷42，7b～9a。渤海寿臣：《辛亥革命始末记》，681～682页。

[74]《东方杂志》，第8卷第9号，"革命战事记"，17～18页（宣统三年

九月)。郭孝成:《浙江光复记》,见《辛亥革命》,第7册,135～136页。尚秉和:《辛壬春秋》卷14,1a～2b;卷44,4a～5a。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238～239页。许炳堃:《杭州光复之夜的一次官绅紧急会议》,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165～166页。

[75] 林家有:《辛亥革命前后广州满汉民族关系史料》,见《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史料专辑》下册,210～217页。舒仲玑:《辛亥革命时广州八旗军投诚经过》,见《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史料专辑》下册,219～223页。汪宗猷:《二百年来广州满族经济生活的变化》,见《广东文史资料》,第35辑,47～54页。大汉热心人:《广东独立记》,见《近代史资料》,1961(1),437、438、441、442、450页。

[76]《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1》,1003～1004页。这里有一份日期为11月21日的文件,颇令人好奇和怀疑,文件中驻防汉军八旗请求他们要比满人得到更加仁慈的待遇,并要求被允许投降,即使其他满人不同意投降。他们声称他们的祖先加入八旗制度是迫不得已,他们现在希望恢复他们的汉人身份。参见《时报》,1912年1月7日,4页。然而,这份文献可能让人质疑,因为成都驻防仅仅由满洲八旗和蒙古八旗组成,而没有汉军八旗。

[77] 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史》,341～353页。邱远应:《赵尔丰发动"成都兵变"说质疑》,载《华中师院学报》,1982(5),127～133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1》,1120～1121页。

[78] 尚秉和:《辛壬春秋》卷2,17a。马协弟:《刘显之先生与〈成都满蒙族史略〉》,载《满族研究》,1989(1),46页。钱安靖、周锡银:《辛亥革命时期四川少数民族反帝、反封建、反奴隶制的英雄斗争》,见《四川保路风云录》,118页。熊克武等:《蜀党史稿》,见《辛亥革命史丛刊》,第2辑,179页。王右瑜:《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前后见闻》,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73页。《时报》,1912-01-29,3页。

[79] 广禄:《广禄回忆录》,2～9页。杨逢春:《伊犁辛亥革命概述》,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510～517页。林竟:《伊犁革命始末记》,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2编第5册,429～431页。周轩:《志锐初论》,54页。《时报》,1912-03-09,3页。

[80] 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卷1711,3号,请愿书,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九日。渤海寿臣:《辛亥革命始末记》,696～698页。Hummel, Arthur W.(恒慕义)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清代名人传略》),780～781页。

[81] 尚秉和:《辛壬春秋》卷24,3a;卷42,4b～5b、6b～7a;卷43,

6a、9a。卷44，3a～3b、16b。卷45，4b、8a。渤海寿臣：《辛亥革命始末记》，692～693页。杨庆贞：《海容、海筹、海琛三舰参与辛亥革命经过》，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102页。《北华捷报》，1911-11-11，360页。Esherick，Joseph（周锡瑞），*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195页。

[82]《北华捷报》，1911-11-04，283页。《时报》，宣统三年九月二十一日，4页；宣统三年十月八日，3页；宣统三年一月二十一日，4页。渤海寿臣：《辛亥革命始末记》，303、334页。严寿华等：《长江舰队响应辛亥革命的回忆》，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7集，58页。

[83] 黄光箕、陈金铭：《宁夏民军起义》，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500～503页。荣祥：《略谈辛亥革命前后的家乡旧事》，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237～242页。

[84]《时报》，宣统三年九月六、七日，附录。

[85]《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1》，907页。《北华捷报》，1911-11-11，366页。《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63，38a。

[86]《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1》，936页。《北华捷报》，1911-11-18，437页。《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64，6a。

[87]《内阁官报》，宣统三年十月三日，95～96页。

[88]《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66，1a～2b。英国外交部档案，FO 405/208，no.40，1911年12月20日Jordan（朱尔典）致Grey（格瑞）的信。

[89]《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66，8a～8b。梁旭毅：《良弼传》，31～32页。《顺天时报》，宣统三年十一月三日，7页。

[90] 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278～279页。郭孝成：《议和始末》，见《辛亥革命》，第8册，65～67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1》，984页。

[91] 黄中兴：《杨度与民初政治（1911—1916）》，91～93页。杨度：《杨度集》，538～542页。

[92]《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1》，1028～1029页。《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66，5b。

[93] 郭孝成：《议和始末》，见《辛亥革命》，第8册，65～66页。

[94]《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63，16a～18a、41a～41b。

[95] 李惠民：《吴禄贞殉难新探》，载《中国近代史》，1989（1）。张国

淦编：《辛亥革命史料》，202～208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1》，781～783、851～866页。《辛亥革命》，第6册，375页。《时报》，宣统三年九月二十一日，2页。《北华捷报》，1911-11-11，361、363、366页。《东方杂志》，第8卷第10号，"中国大事记"，1页（1912年4月）。关于吴禄贞政治立场的矛盾解释，参见董方奎：《论"滦州兵谏"和"士官三杰"》，载《历史研究》，1981（1），57～72页；吴忠亚《吴禄贞是"立宪派"吗?》，载《历史研究》，1982（3）。

[96]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405/208，no.123，1912年1月13日Jordan（朱尔典）致Grey（格瑞）的信。

[97]《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64，12b～13b。钱实甫：《清季新设职官年表》，112页。这些人物容易让人感到误解。因为其中五名被任命者（例如萨镇冰和张謇）当时并不在北京，袁世凯任命了另外的"执行"大臣。五名执行大臣中三名是满人：绍英、寿勋和熙彦。因此，实际上，袁世凯内阁中十名大臣中有四名是满人。

[98]《北华捷报》，1911-11-25，509、512页。Williams（卫理），*China Yesterday and To-day*（《中国的昨天与今天》），478～479页。《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65，2b；卷66，5a。《顺天时报》，宣统三年十一月一日，7页。

[99] 郭孝成：《议和始末》，见《辛亥革命》，第8册，66～67页。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279～280页。《北华捷报》，1911-11-25，511～515页。

[100] Morrison，G. E.（莫理循），*The Correspondence of G. E. Morrison，1895-1912*（《莫理循通信集（1895—1912）》），661～666页。《北华捷报》，1911-11-25，505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1》，986页。

[101] 伍廷芳：《伍先生公牍》卷1，1a。张存武：《伍廷芳与辛亥革命》，见《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6辑，102、110～111页。Pomerantz-Zhang，Linda（琳达），*Wu Tingfang（1842-1922）：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伍廷芳（1842—1922）：近代中国的改革与现代化》），205～206页。

[102] 伍廷芳：《伍先生公牍》卷1，1a。《北华捷报》，1911-11-18，445页。张存武：《伍廷芳与辛亥革命》，见《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6辑，102～104页。Pomerantz-Zhang，Linda（琳达），*Wu Tingfang（1842-1922）：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伍廷芳（1842—1922）：近代中国的改革与现代化》），203页。

[103]《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66，5b。朱英：《唐绍仪与辛亥南北议和》，载《广东社会科学》，1989（2），73～74页。杨度：《杨度集》，542～543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1》，1052、1059～1060页。感谢朱英为参考唐绍仪的文章提供了方便。

[104] 刘厚生：《张謇传记》，192页。Sigel，Louis（路易斯·圣戈），"Revolution by Diplomacy：A Re-examination of the Shanghai Peace Conference of 1911"（《外交革命：1911年上海和平会议的再审视》），in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远东史研究集刊》），1979，（19），119、120、133页。张樾生：《追记八旗代表章福荣所谈南北议和的一鳞半爪》，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427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1》，1086页。

[105] 刘厚生：《张謇传记》，182、192～195页。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292页。Sigel，Louis（路易斯·圣戈），"Revolution by Diplomacy：A Re-examination of the Shanghai Peace Conference of 1911"（《外交革命：1911年上海和平会议的再审视》），in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远东史研究集刊》），1979，（19），131～132页。Pomerantz-Zhang，Linda（琳达），*Wu Tingfang（1842－1922）：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伍廷芳（1842—1922）：近代中国的改革与现代化》），211页。

[106] 伍廷芳：《共和关键录》，第1编，9～16页。

[107] 英国外交部档案，FO 405/205，no. 575，1911年12月22日 Jordan（朱尔典）致 Grey（格瑞）的信；no. 588，12月24日 Jordan（朱尔典）致 Grey（格瑞）的信；no. 590，12月26日 Charge Yamaza（亚马扎）备忘录，伦敦；no. 595，12月26日 Jordan（朱尔典）致 Grey（格瑞）的信；no. 597，12月26日 Grey（格瑞）致 Jordan（朱尔典）的信；no. 613，12月28日 Jordan（朱尔典）致 Grey（格瑞）的信。

[108] 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293页。

[109]《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51～52页。《顺天时报》，宣统三年十一月十日，7页；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一日，7页。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294页。《北华捷报》，1911－12－30，870页；1912－01－06，25页。《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67，11b～12a。

[110] 伍廷芳：《共和关键录》，第1编，16～30页。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294～295页。

[111] 伍廷芳：《共和关键录》，第1编，18、21页。

[112] Pomerantz-Zhang，Linda（琳达），*Wu Tingfang（1842－1922）：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伍廷芳（1842－

1922)：近代中国的改革与现代化》)，215～216 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2A》，18 页。关于孙中山的选择和就职，参见 Esherick（周锡瑞)，"Founding a Republic，Electing a President：How Sun Yat-sen Become Guofu"(《创建共和，选举总统：孙中山怎样成为国父》)，in *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中国的共和革命》)，129～152 页。

[113]《顺天时报》，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7 页；宣统三年十一月十八日，2 页；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九日，2 页。《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 8 卷，123 页。查时杰：《清末的宗社党》，载《"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1978，(5)，126～130 页。白杰：《清末政坛中的肃亲王善耆》，载《满族研究》，1993 (2)，39 页。

[114] 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296～297 页。朱英：《唐绍仪与辛亥南北议和》，载《广东社会科学》，1989 (2)，78～79 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2A》，20～21 页。

[115]《顺天时报》，宣统三年十一月十八日，7 页。Ch'en，Jerome（陈志让)，*Yuan Shih-k'ai*（《袁世凯》)，96 页。英国外交部档案，FO 205/208，no. 177，1912 年 1 月 22 日 Jordan（朱尔典）致 Grey（格瑞）的信。

[116] Pomerantz-Zhang，Linda（琳达)，*Wu Tingfang (1842－1922)：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伍廷芳（1842—1922)：近代中国的改革与现代化》)，219～220 页。

[117]《北华捷报》，1912－01－13，101 页。《时报》，1912－01－16，2 页。这份提议并没有出现在伍廷芳的《共和关键录》里。

[118] 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297～300 页。英国外交部档案，FO 405/208，no. 67，1912 年 1 月 12 日 Jordan（朱尔典）致 Grey（格瑞）的信。Morrison，G. E.（莫理循)，*The Correspondence of G. E. Morrison，1895－1912*（《莫理循通信集（1895—1912)》)，700 页。尚秉和：《辛壬春秋》卷 26，16a～18b。

[119]《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2A》，91～97 页。

[120]《顺天时报》，宣统三年十二月一日，7 页；宣统三年十二月五日，7 页。尚秉和：《辛壬春秋》卷 26，18b～19a。Morrison，G. E.（莫理循)，*The Correspondence of G. E. Morrison，1895－1912*（《莫理循通信集（1895—1912)》)，703 页。

[121] 伍廷芳：《共和关键录》，第 1 编，72～74 页。

[122] 同上书，第 1 编，72～80、83～84 页。

[123] 同上书，第 1 编，81～82 页。

[124]《顺天时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日，7页；宣统三年十二月五日，7页。梁旭毅：《良弼传》，32页。Morrison，G. E.（莫理循），*The Correspondence of G. E. Morrison，1895－1912*（《莫理循通信集（1895—1912）》），703页。《北华捷报》，1912－01－27，231、233页。

[125]《顺天时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2页；宣统三年十二月五日，7页。《时报》，1912－01－25，3页。廖宇春：《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2编第2册，455页。Morrison，G. E.（莫理循），*The Correspondence of G. E. Morrison，1895－1912*（《莫理循通信集（1895—1912）》），706～707页。

[126]《顺天时报》，宣统三年十二月五日，7页。

[127]恽宝惠：《辛亥冯国璋接统禁卫军后的活动》，见《文史资料选辑》，1960（9），119～120页。张一麐：《故代理大总统冯公史状》，见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卷4，17a～17b。沈云龙：《北洋之"狗"——冯国璋》，载《传记文学》，1976，28（5），49页。廖宇春：《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2编第2册，450、455、457、461页。金梁：《光宣小记》，153～154页。《时报》，1912－01－25，3页。

[128]《顺天时报》，宣统三年十二月六日，7页。尚秉和：《辛壬春秋》卷26，19a～19b。溥伟：《让国御前会议日记》，见《辛亥革命》，第8册，111～112页。萧一山：《清代通史》，2717～2718页。《北华捷报》，1912－01－27，231～232页。溥伟和萧一山都把这次会议的时间弄错了。溥伟说在17日召开的会议，而萧一山说在20日召开的会议。

[129]尚秉和：《辛壬春秋》卷26，19b。溥伟：《让国御前会议日记》，见《辛亥革命》，第8册，112～114页。《顺天时报》，宣统三年十二月五日，7页；宣统三年十二月六日，7页。溥伟再次弄错了会议的时间。

[130]万向春、邓祥麟：《新伊革命史略》，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2编第5册。梁旭毅：《良弼传》，32页。Des Forges（戴福士），*Hsi-liang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Revolution*（《锡良与中国民族革命》），183～184页。《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69，9a～9b。《顺天时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日，4页。《时报》，1912－02－21，5页。

[131]《北华捷报》，1912－02－03，301页。

[132]《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69，13b～14a。

[133]同上书，卷69，14b。

[134]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304～306页。李守孔：《段祺瑞与辛亥革命》，见《"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6期。

[135]《顺天时报》，宣统三年十二月九日，7页。杨度：《杨度集》，543～544页。

[136]伍廷芳：《共和关键录》，第1编，87页。

[137]《顺天时报》，宣统三年十二月十日，7页。《时报》，1912-02-10，2页。

[138]梁旭毅：《良弼传》，32页。常顺：《赖臣被炸追记》，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2A》，131～138页。《顺天时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日，7页。Morrison，G. E.（莫理循），*The Correspondence of G. E. Morrison，1895－1912*（《莫理循通信集（1895—1912）》），716页。

[139]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309、311页。《顺天时报》，宣统三年十二月十二日，7页；宣统三年十二月十四日，7页；宣统三年十二月十六日，7页；宣统三年十二月十七日，7页；宣统三年十二月十九日，7页。

[140]伍廷芳：《共和关键录》，第1编，87～88页。

[141]同上书，第1编，94～96页。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311～313页。

[142]《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2A》，188～190页。伍廷芳：《共和关键录》，第1编，96～98页。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313～314页。关于银元的兑换比率（80两白银＝100元），参见杨学琛、周远廉：《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367页。

[143]伍廷芳：《共和关键录》，第1编，107～112页。《顺天时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日，7页；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7页。

[144]伍廷芳：《共和关键录》，第1编，113～114页。

[145]同上书，第1编，117～118、127～128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2A》，214页。《时报》，1912-02-11，5页。

[146]伍廷芳：《共和关键录》，第1编，127页。《时报》，1912-02-13，1～2页。

[147]《顺天时报》，宣统三年十二月十三日，7页；宣统三年十二月十四日，7页；宣统三年十二月十五日，7页；宣统三年十二月十六日，7页。恽宝惠：《辛亥冯国璋接统禁卫军后的活动》，见《文史资料选辑》，1960（9），119～120页。张一麐：《故代理大总统冯公史状》，见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卷4，17b。廖宇春：《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2编第2册，462页。

[148]《时报》，1912-02-05，2页。《顺天时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

日，7页；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7页；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7页；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5页。

[149]《大清皇帝实录·宣统实录》卷70，13b～19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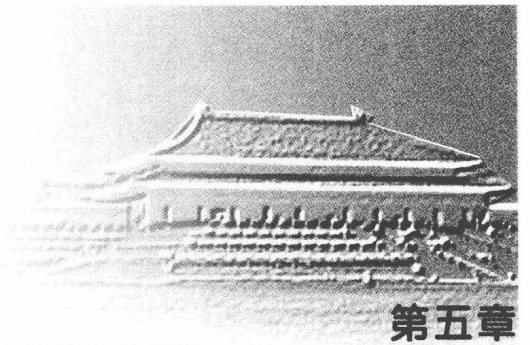
[150] Ch'en, Jerome（陈志让），*Yuan Shih-k'ai*（《袁世凯》），105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2A》，241～242页。

[151] Rummel（拉梅尔），*China's Bloody Century: 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中国的血腥世纪》），41页。

[152]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254～255页。

[153]《顺天时报》，宣统三年九月二十一日，4页。《北华捷报》，1911-10-28，227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2A》，224页。由于清朝的审查，《顺天时报》中关于满人报道的材料被删除了。

[154] Morrison, G. E.（莫理循），*The Correspondence of G. E. Morrison, 1895-1912*（《莫理循通信集（1895—1912）》），770页。关于国家税收的估算，参见Robert Bredon（罗伯特·布里顿）在1912年3月2日《北华捷报》第554页的报道。



第五章

辛亥之后的皇室和满人

231 新共和政体的支持者们满腔热情地希望由此开启一个民主宪政和国家独立的新时代，但却迅速跌入了失望的深渊。正如杨欧纳（Ernest P. Young）所描述的那样，袁世凯统治下的“自由共和国”不久走向了又一个独裁政府，甚至还两次尝试恢复帝制。[1]第一次尝试发生在 1915 年到 1916 年之间，袁世凯试图当新皇帝；第二次尝试发生在袁世凯死后的 1917 年，目的是恢复清朝的统治。两次尝试都没有成功，共和国的颜面得以保存。然而，此时中国进入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无序状态，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军阀混战时期，这一状态持续了十年时间，直到国民党 1927 年到 1928 年获得政权后才结束。

如果革命的政治愿望只得到短暂实现，那么反满的目的何在呢？革命者以前控诉满人七宗罪，认为自己现在能够纠正或消除这些罪状。然而，由于他们渴望革命有一个快速且成功的结果，革命者也承诺旗人以及清朝皇室将会得到保护和优待。这似乎是一个矛盾的结果，再加上那个时代的政治动乱，新政权一方面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清除满人的罪行，另一方面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履

行退位协议中保证的优待呢？换句话说，在民国前期（1912—1928）和随后的政权下，皇室和旗人在新的时代如何生活？“满”这一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如何变化？

民国初年的皇室

革命党人以七宗罪为理由，要求推翻清统治者，但为了避免陷入长期的战争，他们妥协于一个谈判协议。为了让清朝从专制政体转变为共和政体，他们在优待条款中答应优待退位的皇帝。 232
虽然因协议太过慷慨而激怒了一些革命党人，但直到溥仪 1924 年被逐出皇宫，甚至在此之后，协议基本上有效。

在中华民国的头两年，当总统袁世凯在以前由革命党人和立宪改革派建立的“自由”政治框架内（包括《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选举产生的两院制议会，两院制议会取代了革命党人的临时参议院）活动时，新政权尽力去履行退位协议的义务。事实上，对于皇室在某些方面的优待要超出以前所作的承诺，如没有要求皇帝离开紫禁城。原先认为皇帝只是暂时留在宫内，在不太确定的“日后”，皇帝就会搬到西北郊的颐和园。伍廷芳公开宣称这不会晚于当年冬天，但是，随着春天的到来，袁世凯提出由于 1912 年 2 月 29 日曹锟的第三镇在京城发动兵变而引起骚乱，从而同意皇帝延期搬出紫禁城（他用同样的借口拒绝了临时参议院把政府迁到南京的要求）。在随后的几个月中，虽然关于皇帝准备搬到颐和园的报道屡现报端，但皇帝仍然留在宫中。可能袁世凯发现与其让皇帝移到郊外，还不如在身边更容易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2]

退位后的清皇室仅仅占据了以前京城的一小部分。以前，宫殿群不仅包括紫禁城，还包括周围的皇城，如北面的景山（也称为煤山）、西面的三海和南部的社稷坛和太庙。退位协议允许皇室仅仅留在紫禁城，其余宫殿则移交给民国。因此，1903 年 1 月 1 日，皇室把天安门南边的御路向公众开放，而这条路以前是与外界封锁而隔绝的。两个月后，皇室移交了三海，包括南海的瀛台，此地在 4 月成了新的总统府并一直延续到 1925 年。也是在 1903

年，民国政府把社稷坛改为中央公园，成为一个可以付费参观的公共场所。（在国民革命军胜利后，为了纪念孙中山而更名为中山
233 公园）。然而，毗邻的太庙由于与皇室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仍然控制在皇室之手，但是限制性地向公众开放，景山的情况也一样。[3]

在紫禁城内部，皇室放弃了南面的一半，也即“外朝”。这样，在新国会草草选举后，袁世凯的总统就职典礼于1913年10月10日在清朝皇帝登基的太和殿举行。外朝的其他建筑也割让给了民国，包括靠近午门的文华殿和武英殿，这两个地方是文武百官等待皇帝召见的地方。不久之后，1914年，文华殿和武英殿——连同附近的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变成了一个公共博物馆即古物陈列所，陈列着沈阳（以前的盛京）和热河宫殿里的珍品。皇室只留下了乾清门北面的“内廷”，还有外朝三大殿边上的一些建筑。紫禁城北面围墙处的神武门取代了南面的午门，成为皇室的正式入口。除了这些还控制着的建筑，皇室还控制着颐和园，或许有一天还要搬到这个地方。[4]

如其承诺的那样，民国对待前朝皇室的礼仪和仪式，其规格与对待外国君主一样。溥仪被称为“大清皇帝”，隆裕太后也得到了同样的待遇，这名太后自从摄政王载沣退位后便把持朝政。因此，1913年2月15日，正值隆裕太后45岁寿辰，袁世凯派他的秘书长梁士诒（1869—1933）去宫内向其贺寿。当时隆裕太后坐在龙椅上，梁士诒鞠躬三次，并向“大清隆裕皇太后”进呈祝贺公函。一周后，隆裕太后撒手西归，袁世凯内阁命令全国的官署降半旗，所有文武百官服丧27天。由于隆裕太后去世，在溥仪未成年期间，朝廷的大权由四名太妃掌握——包括同治皇帝的三名妃子和光绪皇帝的一名妃子。[5]

皇室与新政权之间的协调人是前军机大臣世续，当时他与溥伦是内务府大臣。因此，世续代表皇室参加了袁世凯于1912年3月10日举行的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六个月后，孙中山和黄兴来北京游览，世续和溥伦代表皇室欢迎他们。溥伦为两名革命领导
234 人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同时世续陪同他们游览了紫禁城和颐和园。

一年后袁世凯的总统就职典礼在太和殿举行，这次轮到溥伦代表皇室。在迎宾队列中，溥伦被安排到外交使团的旁边，似乎皇室与外国使团的地位相同。[6]

新政权也努力履行对清皇室的财政承诺。主要的责任是每年四百万两白银（后来是元）的津贴。向袁世凯追讨这笔款项是内务府大臣世续的责任。[7]尽管民国政府财政困难，但还是支付了大量津贴，虽未一次性付清。例如，1912 年 4 月财政部支付了 150 000 两白银，10 月支付了 600 000 两白银，12 月支付了200 000 元。《北华捷报》在 1913 年年初评论说，民国政府一直遵守了关于皇室津贴和尊严的承诺。袁世凯于 1913 年 4 月签订了一份有争议的善后大借款条约，目的之一就是要支付皇室的巨额花费，从 4 月到 10 月的六个月估计就支付了 2 777 777 元。[8]对皇室的另一项义务是完成光绪皇帝的陵墓。这是一笔更大的费用（虽然是一次性的），也是善后大借款的主要用途，数目为 4 611 537 元。陵墓的修建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而中断，又在 1913 年春天恢复动工。尽管有人抱怨费用超支，陵墓最终还是完成了，光绪皇帝在 1913 年 12 月 13 日正式下葬。[9]

最终，袁世凯政府从皇室手中接管了禁卫军，并将其置于陆军部控制之下，但如当初承诺的保存了其组织的完整性。尽管一些革命党人坚决反对，但禁卫军还是没有被解散。因此，善后大借款的另一个用途是预先支付陆军部 1 243 196 元以养活禁卫军，它是京城规模最大的军队之一。袁世凯在革命胜利一周年纪念时检阅军队，三千名士兵组成的禁卫军分遣队规模居第二位，仅次于袁世凯拱卫军的六千名士兵。除了当初基本上都由汉人组成的第四步兵协外，禁卫军仍然是一支满人军队。至少，当初征募新兵时，都是从京旗中挑选出来的精英。正如《北华捷报》北京通讯记者 1912 年 10 月所言，除了很多重要满人军官被汉人取代外，禁卫军的组织和构成几乎没有变化。而且，军中的士兵仍然主要是满人。事实上，即使在军官中，满人势力依然强大。1913 年关 235
忠和是第一协统领，他以前统率第一步兵标，第二步兵标的统领是崇林（或崇恩）。因此，禁卫军的八名或者十名高级将领中，有

两名是满人。[10]

民国初年，禁卫军继续负责保护皇帝的安全，并保留了其有特色的“禁卫军”之名。1913 年，主要由汉人组成的第四步兵协被派往张家口与蒙古盗匪作战，其余各协的大部分士兵仍旧驻守在西北郊畅春园的新营地。崇林第二步兵标的特殊职责是把守通往紫禁城的大门，包括已向公众开放的大门。[11]然而，禁卫军除了继续与皇室保持紧密联系外，也日益演变成冯国璋的军队，冯国璋依靠这支军队在仕途上不断高升。1911 年 12 月摄政王载沣辞职后，冯国璋就成为禁卫军的统领。即使 1912 年 9 月冯国璋被任命为直隶都督，其禁卫军统制的职位被第一协统领关忠和的前任王廷桢取代，但他仍然是这支军队的最高统帅。尽管冯国璋只是带了 100 名士兵前往天津，但他仍然对整个禁卫军保持着最高权威。至少在 1913 年的两次特殊情况下，他还返回北京处理禁卫军事务。[12]由于冯国璋几年来一直与清廷保持着密切关系，且极为关心皇室的利益，这在退位危机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因此禁卫军受朝廷和冯国璋的双重节制并不显得冲突。

清皇室为了自己的利益尽量对民国表现出热情和喜欢的态度，而与一些清廷追随者从事恢复帝制的活动保持距离。皇帝退位后的开始几个月，报纸上充斥着反革命阴谋的故事，其中大部分被归结于宗社党的头上。宗社党的头目据说包括以前坚决反对清廷向共和派投降的满人。当清廷退位时，他们大部分逃离了北京，避难于外国在中国划分的势力范围内。善耆去了旅顺（西方称为亚瑟港），这是日本在奉天关东的租借地；溥伟去了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青岛；铁良去了日本在天津的租界。他们躲在租界里，努力重整旗鼓，准备重新开始反对民国的斗争并恢复清王朝。保皇派在满洲和北京极为活跃，这两个地方的许多满人可能会支持他
236 们的目标。早期的复兴阴谋中，野心最大的是善耆（肃亲王），他与日本的川岛浪速勾结在一起，十年前在组建北京警察时他就与川岛浪速一起合作过。1912 年，善耆和川岛浪速试图在紧邻满洲的内蒙古建立一个日本的保护国，这样溥仪能在那里复位。然而，建立詹森（Marius B. Jansen）称之为“第一满洲国”的努力

最终失败了，当时日本政府对这件事失去了兴趣并转而支持袁世凯。善耆撤回旅顺，1922 年死于此地。善耆从来没有接受过民国。[13]

在北京，禁卫军由于直到最后还在反对清廷退位，因此被怀疑抱有恢复帝制的情绪。1912 年 4 月，崇林第二协的四十名或更多的士兵占领了前共和派创办的《中华日报》的办公地，强行将报社的编辑押到他们的兵营，因为这份报纸拒绝撤销一些对旗人的充满敌意的评论。这一事件立即引发了一场谣言，即禁卫军正在与保皇派密谋一次武装起事。这迫使禁卫军发布了一份声明来澄清谣言和宣誓忠于民国。事实上，没有证据表明保皇派曾与禁卫军有过深入接触和密切联系。[14]

然而，袁世凯政府警告皇室要限制其追随者。大约在 1912 年 3 月底，隆裕太后曾因此下令宗社党解散。她担心宗社党的活动会导致优待条款被取消以及外国势力的介入。她命令皇族亲贵离开外国避难所返回北京。[15]虽然隆裕太后的谕令没能阻止保皇派，但至少向共和派表明了保皇派的活动与皇室无关。

自由共和政体不久就让步于独裁。在袁世凯总统任期的第一年和之后一半的统治期内，他是在前共和革命党人不情愿的支持下执政的。但革命党逐渐怀疑袁世凯的专制野心。1913 年夏天，随着袁世凯 3 月参与了刺杀宋教仁（1882—1913）和一个月后试图不与国会商议而擅自进行善后借款，革命党人最终起义反对他，这就是所谓的二次革命。然而，袁世凯很快镇压了他的对手并迫使孙中山等人逃离中国。从此以后，袁世凯逐步加强专制。1913 年 11 月，他解散了国民党；1914 年 1 月，他解散了国会；1914 年 5 月他用《中华民国约法》取代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赋予了自己最大权力。

在袁世凯独裁的 1914 年到 1915 年间，对清朝皇帝的优待条款 237
得以尽力保留。事实上，袁世凯命令一个委员会起草新的协议，把一条明确的条款补充进去，以使优待条款和其他两个优待文件“永不变更其效力”[16]，这赢得了皇室的感激。然而，1914 年 12 月 26 日，袁世凯自己开始对优待条款进行了大幅修改，并强加给

皇室一个补充协议，即《善后办法》。[17]他当时为什么会采取这一行动，目前还不是很清楚。皇室可能卷入了宋育仁（1857—1931）试图恢复清朝这一众所周知的阴谋，这或许是直接原因。《善后办法》第一条就提醒皇室的地位处于共和政体内："清皇室应尊重中华民国国家统治权，除优待条件特有规定外，凡一切行为与现行法令抵触者，概行废止。"

从《善后办法》的其他条款判断，颁布《善后办法》的更主要原因在于皇室在过去三年里一些有意或无意的小过错的积累。因此，第二条要求清皇室对于政府文书及其他履行公权私权之文书契约，通行民国纪年，不适用旧时年号（例如宣统）。第三条规定，清皇帝告谕及一切赏赐，但行于宗族家庭及其属下人等，其对于官民赠给，以物品为限，所有赐谥及其他荣典，概行废止（例如，允许骑马进入紫禁城）。第四条，政府对于清皇室，照优待条件保护宗庙陵寝及其原有私产等一切事宜，专以政府内务部为主管之衙门。第五条，清皇室应确定内务府为主管皇室事务总机关，应负责任，其组织另定之。第六条，新编护军专任内廷警察职务。第七条，清皇室所用各项执事人等，同属民国国民，因此，但遇宫中典礼及其他礼仪，进内当差人员所用服色，得从其宜。总之，相比以前，善后条款主要是更加明确地界定了皇室相对于共和国的权限。

其他方面，袁世凯作为独裁者对待皇室和在自由共和时一样。他自己居住在皇城的瀛台，他允许皇帝留在紫禁城内廷，而不是努力让他搬到颐和园。此时，代表皇室与袁世凯政府打交道的还是溥伦和世续。1914 年 4 月，他们与载沣、绍英一起设宴款待修
238 改优待条款的委员会成员，感谢他们把优待条款与民国的存在永久绑定在一起。袁世凯后来把溥伦增补到参政院中。更重要的是，袁世凯继续支付皇室每年的固定津贴。例如，1915 年 11 月，财政部支付了皇室 700 000 元，几乎占了当年津贴额的五分之一。[18]

除了《善后办法》，在袁世凯独裁期间影响皇室的另一个变化是大部分禁卫军被调离京师，而且这支军队从皇帝侍卫逐渐变成了冯国璋的个人军队。1913 年 7 月，冯国璋从天津被派往长江下

游镇压二次革命，事后他被任命为江苏都督。1914 年 1 月，由禁卫军统制王廷桢亲自统率的禁卫军第一混成旅也在南京与冯国璋汇合。随后，禁卫军的另一支分遣队第四步兵团也被派往江苏并驻守苏州。除了基本上都是汉人的苏州第四步兵团，江苏的其他禁卫军士兵和以前一样主要是满人，第一协统领也还是关忠和。留在京城的唯一禁卫军是第二步兵团，虽然远在京城，但冯国璋仍然控制着这支军队。这支禁卫军的任务也没变化，依然是拱卫宫廷。[19]

袁世凯在 1915 年到 1916 年的总统任期内逐步走向君主政体。这是恢复君主政体，而不是恢复清王朝。然而，皇室和其他满人都希望扮演他们被指派的角色。这场运动的早期拥护者是来自地方的乌泽声和恒钧，他们两人是晚清满人改革派刊物《大同报》的主编，前者是来自吉林的代表，后者是来自满人的代表。另一名是第一协的关忠和，还有许多驻守南京的禁卫军（非满人）将领。当袁世凯的心腹散播舆论，制造出一派普遍支持的景象时，皇室也加入进来。1915 年 12 月，溥伦也极力劝说总统顺从民意称帝。袁世凯表示了适当的谦虚，最后还是同意了。他宣布，中华民国将于此年改为中华帝国。12 月 16 日，皇室向袁世凯表示了祝贺。然而，当溥伦向袁世凯隆重磕头时，他或许已经超越了皇室赋予他的权限。[20]

在复辟帝制时期，皇室担心的主要是优待条款的前途，这也是世续询问的内容。这些条款会无效吗？袁世凯政府回答，虽然 239
政体变了，但优待条款不会变。12 月 16 日，为了报答皇室的支持，袁世凯宣布他计划草拟中的新宪法将加入《中华民国约法》的第六十五条，也就是说退位协议永远不变。[21]然而，皇室意识到随着重建君主制的临近，至少有一条是要发生变化。由于袁世凯已经称帝，作为皇帝居住在其他地方是不合适的，因此皇室离开紫禁城的最后期限到了。如同当初要求的那样，皇室可以移居到颐和园，或者可能与袁世凯互换而搬到南海。[22]然而，在新宪法草拟和皇室离开紫禁城之前，袁世凯的称帝计划在一片反对声中很快破灭了。反对之人既有军队官员，也有文官，其中大部分

是他以前的拥护者。袁世凯的一个重要政敌是冯国璋，虽然冯国璋的禁卫军部下先前曾签名发布了一份支持恢复君主制的请愿书。[23]1916 年 3 月 22 日，袁世凯匆忙下令恢复共和，此后不到三个月，他便撒手人寰了。

袁世凯称帝努力的失败和随后的去世所引发的直接后果，就是国家层面的政治权力在黎元洪（袁世凯的继任者）、段祺瑞（总理和当时的陆军总长）和冯国璋（南京的禁卫军统领，重开的国会选举他取代黎元洪）三人之间分配。作为新当选的副总统，冯国璋应当前往北京，但为了承认他的独立权力，他被特许留在江苏，并继续担任江苏都督的职务。[24]这三人都是军人，相互之间的关系很紧张。黎元洪和段祺瑞为了总统和总理的权力长期斗争，而段祺瑞和冯国璋之间的敌对在 1911 年到 1912 年退位危机中就已经突显，现在他们开始把袁世凯的北洋军分为皖系和直系两个对立的派系。

由于袁世凯的死亡，皇室失去了最有影响的保护伞，但他的继任者并没有打破现状的想法。黎元洪总统任期内，侵害到皇室利益的一个变化是新召开的国会（1912 年到 1913 年选举产生，但被袁世凯解散）决定草拟新宪法。1916 年 9 月，宪法草案浮出水面，只字未提退位协议，袁世凯的《中华民国约法》中保证退位
240 协议永远不变的第六十五条被删除了。皇室及其外部支持者，包括副总统冯国璋和前军机大臣徐世昌，匆忙游说国会把这条保证重新加入宪法的最后版本里。徐世昌声称，不这么做就会造成优待条款被废除的疑虑不安。虽然他们进行了努力，但 1917 年 5 月颁行的新宪法仍然没有重申这一条款。[25]

尽管这种游说活动的失败意味着高层对皇室的支持开始走下坡路，但并不意味着袁世凯后的继任者拒绝承认退位协议的继续有效，徐世昌担心的正是这一点。相反，黎元洪政府好像更加忠实地遵守优待条款。它没有强制皇室遵守其不久前向袁世凯做出的搬出紫禁城的承诺，它继续尊崇和体面地对待皇室。1916 年 10 月 10 日，这是袁世凯下台后的第一个共和革命纪念日，黎元洪授予包括世续和亲王载涛在内的很多人特别荣誉。溥伦原本可能与

世续相当，但因为他与前总统的亲近甚至是阿谀关系，他已经失去了皇室的信任。溥伦于 1926 年在北京逝世。[26]

一年后张勋突然复辟帝制，黎元洪的总统任期结束了。张勋在辛亥革命期间固守南京，他从未接受共和政体。他的军队从南京撤退后，驻扎在江苏北部的徐州。由于他不允许士兵剪辫，因此他的军队被称为“辫子军”。1917 年 7 月，张勋被召集到北京调停黎、段之间不断升级的“府院之争”，当时黎元洪解除了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务。6 月 16 日，张勋身着清朝官服，在内廷养心殿按礼仪拜见了 11 岁的溥仪。两周后，他统领的徐州军队与几名保皇派（全部是汉人，如康有为）联合起来，宣布恢复大清帝国，并强迫共和总统黎元洪把权力移交给复辟的宣统皇帝。张勋自命为议政大臣。他向一名记者解释，共和政府形式不适合中国，只有恢复帝制才能救国家于水火。[27]

在张勋的极力主张下，年幼的皇帝在同一天颁布了九道上谕，阐明了新政权的方针。国体是“君主立宪政体”，对于晚清限制“满人优势”和缩小满汉差异的改革措施一律采纳，因此，“懔遵本朝祖制，亲贵不得干预政事”，“所有以前一切满蒙官缺，已经裁撤者，概不复设”。虽然上谕没有明确谈到优待条款和附加的《善后办法》，但皇帝的复位从逻辑上意味着这些条款都被取消了。溥仪不再被限定在紫禁城内廷的划定区域内，例如，7 月 1 日他在外朝的中和殿第二次召见了张勋。上谕宣布以宣统的年号来纪年（宣统九年），使用阴历而不是阳历。然而，上谕间接提到了优待条款中的一条，上谕明确指出，拨给皇室的经费“仍照所定每年四百万元数目”。[28]

241

相比于一年半前袁世凯恢复君主制，张勋复辟清朝的努力更不成功。张勋也得不到其他军事将领的支持。南京的冯国璋再次反对，虽然其禁卫军大部分都是满人，而且被普遍怀疑赞成恢复清帝。第一协统领关忠和是一名旗人，他承认他的军队作为禁卫军自然会有这样的想法。为了平息南京城的这种普遍忧虑，冯国璋和禁卫军统制王廷桢暂时解除了士兵的武装，并把他们派遣到长江对面的浦口。他们还发布让公众安心的王廷桢和关忠和的联

合声明，即禁卫军反对复辟，并且把反对意见提交给了皇室的载沣。然而，不是远在南京的冯国璋，而是近在天津的段祺瑞平息了张勋复辟。段祺瑞组织了“讨逆军”，轻松击败了张勋，7月12日张勋仓皇逃亡荷兰驻华公使馆避难。清朝复辟只持续了12天。[29]

张勋的失败使得政治局面比以前更为混乱，当时有两个政权宣称代表中国。北方，派系斗争中的军阀先后登台。副总统冯国璋（直系）最先到北京就任总统，取代了被张勋强迫辞职的黎元洪，但冯国璋很快发现，由于段祺瑞（皖系）对张勋的胜利，实际上是段祺瑞掌握着实权。1918年10月，段祺瑞强迫冯国璋在缩短的任期结束后隐退，用前军机大臣徐世昌取代他担任总统。然而，段祺瑞对北京政府的控制也只持续到1920年7月，当时，曹
242 锟于1919年在冯国璋死后接替其在直系的位置，并率领直系在斗争中取胜，在所谓的直皖战争中，曹锟得到了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支持，击败了段祺瑞并结束了皖系军阀的统治权。然而，随后的两年，这两名取得了对段祺瑞战争的胜利者又开始了他们之间的权力争夺。最终，1922年4月，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曹锟与权力日益扩张的属下吴佩孚（1874—1939）击败了他们的前同盟张作霖，把他赶回了满洲南部。一直到1924年，曹锟和吴佩孚联合控制着北京。同时，南方的其他军阀于1917年年初反对段祺瑞，他们在广州建立了对抗性政府，其名义上的政府首脑是孙中山，但也是断断续续地担任。1923年3月，孙中山最终巩固自己在广州的地位，在苏联的帮助下，他改组了国民党，并通过自己的武装建立了独立的革命政权。

由于皇帝卷进了张勋复辟事件，这导致许多人要求取消优待条款以示对皇室的惩罚，这样的要求是1912年以来的第一次。他们认为如果没有皇室的积极合作，张勋不可能复辟成功，因此皇室与张勋这名将军一样有罪。7月7日，复辟期间被流放到天津的60名国会议员，其中大部分都是激进的革命党人，他们提出了后张勋时代的九项改革措施，其中一条就是要取消退位协议：

> 就民国来说，优待条款是一种表示格外开恩的姿态。历

史上没有其他被赶下台的统治者曾经享受过这种待遇，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理由对他们予以优待。既然皇室反叛政府，这些优待自然应被取消；如果还继续保留，就等同于奖励叛乱者。必须考虑到这种恶劣的后果。

四名全面参与退位协议谈判的人——不仅共和派方面的代表（伍廷芳、温宗尧和汪精卫），而且皇室方面的代表（唐绍仪）——都无条件地同意这一点。他们在复辟失败后发了一份电报，宣称“今既叛国，当然取消”。甚至，据说是冯玉祥（1882—1948）带头的许多北方将领，发布了一份电报并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取消民国优待清室条件，四百万元经费，停止缴付；取消宣统名义，永不准再以帝号名称号召满蒙，应即贬溥仪为平民；所有宫殿朝庙及京内外清室各公地府园，尽归国家公用之地；惩办 243
此次之诸元凶，以遏奸邪之复萌。”[30]

皇室自身也预料到其鲁莽地与张勋合作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它甚至草拟了溥仪宣布退位的谕旨。幸运的是，段祺瑞政府选择把皇帝描述为张勋阴谋中一个被动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无辜的受害人。事实上，张勋的行为确实更多的是出于忠于清朝而非恢复满人特权。基本没有什么满人参与复辟。大量任命到复辟朝廷的官员中，只有五六名是满人，其中包括前陆军部尚书铁良，其他大多数都是汉人。溥伟等保皇派一直没有参加复辟。内务府大臣世续鉴于局势的多变，从一开始就拒绝加入，他还多次拒绝溥仪的召见。考虑到这些情况，段祺瑞对皇室格外仁慈。他拿走了皇室为溥仪准备的退位谕旨，并进行了大量“修改”。7 月 17 日颁布的这道谕旨把全部罪过推到了张勋身上，把年幼的皇帝描述成完全无辜且无助的样子。鉴于在过去六年里，优待条款使皇室受到了极好的对待，谕令明确希望这种待遇能继续下去。[31]

从 1917 年到 1924 年，在冯国璋、段祺瑞和曹锟统治时期，优待条款一直保持有效。在溥仪莽撞地进入紫禁城外朝后，北方的军阀们允许他回到其习惯的内廷，他们没有强迫他搬到颐和园。他们也承认他作为清朝皇帝的地位和头衔。他们还邀请皇室代表

参加共和国的典礼，如参加 1918 年 10 月徐世昌的总统就职典礼。同样，他们派遣民国代表参加皇室的典礼，例如，他们派遣荫昌参加了 1922 年溥仪的婚礼，荫昌是前陆军部大臣，虽然他是一名满人，但成为袁世凯及其继任者的高级军事顾问。溥仪在自传中回忆，荫昌首先“以对外国君主之礼正式祝贺。他向我鞠躬以后，忽然宣布，刚才那是代表民国的，现在奴才自己给皇上行礼。说罢，跪在地下磕起头来”。然而，当皇室越界时，军阀们毫不犹豫
244 地将它驳回。1921 年 10 月，曹锟提醒内务府，根据 1914 年的《善后办法》，皇室人员在与民国官员交往时必须使用阳历来标注其公文。[32]

用庄士敦（Reginald F. Johnston）的话来说，皇室无须“恳切地请求共和政府”，北方军阀就继续保留了对皇室的津贴，虽然不是完全付清每年四百万元的数目。1922 年溥仪结婚时，曹锟的财政部写信向内务府官员致歉，说经费实在困难，以致优待岁费不能发足，现在为助大婚，特意从关税款内拨出十万元来，其中两万，算是民国贺礼。

换句话说，其他的八万元算是给皇室的津贴。但是，庄士敦称，民国拒绝履行一份协议，这份协议是关于 1914 年从沈阳和热河运来并在紫禁城外朝古物陈列所展览的七万余件皇家器物的。1916 年签订的这份协议规定这些珍宝是皇家私产，只要财政允许，就按照专家的估价由民国购买这些珍宝，同时这些珍宝被看做民国向皇室借用。后来估计，这些珍宝的价值大约为三百五十万元。据庄士敦记载，民国没有支付一分一毫。[33]由于皇室的高消费和日益缩减的收入，内务府逐渐被迫出售和抵押其他众多皇室珍宝。[34]

最后，如优待条款所保证，北方军阀在 20 世纪 20 年代继续保持禁卫军为一支独立的军队。禁卫军的士兵仍然主要是满人。1917 年年中，禁卫军统领冯国璋表示，“一半的士兵都是旗籍”。然而，这支军队遭受了军阀政治的变迁兴衰之苦。张勋复辟时禁卫军驻扎于南京，1917 年年中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成为总统，禁卫军返回北京。禁卫军是冯国璋军事力量的中坚，连同第十五

师成为冯国璋总统卫队的一部分。最近两次复辟帝制的过程中，皇室烙印一直困扰着禁卫军，此时为了摆脱这种皇室印记而进行的明显努力，是禁卫军被更名为陆军第十六师，这使得禁卫军的名号与国家军队的其他各军一致（然而，在非正式场合，第十六师仍然被称为禁卫军）。王廷桢继续担任第十六师师长，第一旅旅长依旧是关忠和，不过被更名为第三十一旅。即使一年后冯国璋被迫从总统职位上退下来，第十六师仍然与他保持着密切的接触。1919 年 12 月冯国璋死后，第十六师被调至察哈尔，王廷桢被任命为察哈尔都统。王廷桢自己在第二年夏天直皖战争中大权旁落，当时直系的曹锟和奉系的张作霖联合击败了段祺瑞的皖系。王廷桢作为冯国璋的旧部应该是获胜的直系军阀的一部分，但他明显打错了算盘，转变立场支持皖系。因此，他被剥夺了第十六师师长的职务，而由奉系将军邹芬接管。两年后，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邹芬适时倒戈支持直系，使得奉系被击败。尽管第十六师又一次成为直系的中坚力量，但还是被解散“重组”，占绝大多数的满人士兵被“遣散”。然而，1922 年察哈尔禁卫军的大部被遣散并没有影响到北京的步兵第二团，1924 年它仍然守护着皇宫大门。[35] 245

北方军阀对清皇室的迁就使得批评声四起，尤其是 1922 年 8 月曹锟取得对张作霖战争胜利后，当时 1917 年被解散的旧国会重新在北京组建。至少在两次公开场合，国会的少数激进派极力主张取消优待条款。国会议员邓元彭对溥仪 1922 年 12 月婚礼的豪奢仪式感到极为愤怒，当时整个京城都充斥着黄色的龙旗和其他皇室标记，他把这种情形比做张勋复辟，并认为这等同叛乱。1924 年年初，另一名国会议员李燮阳同样建议废除退位协议。据这些批评者说，皇帝自己最近的行为充分证明取消协议是合理的。溥仪不仅在 1917 年勾结张勋颠覆民国从而违背了 1912 年的优待条款，而且在张勋 1923 年 9 月死后对其进行追封而违背了 1914 年《善后办法》的第三条。另一个在 20 世纪 20 年代激起众怒的原因，是内务府为了弥补皇室的巨大花费而出售和抵押了皇室珍宝。北京大学的考古学会公开发表声明，谴责前海军大臣、溥仪的叔叔载洵毁灭了国家财产。皇室坚持认为，按照优待条款的规定，这 246

些珍宝都是皇室私人财产的一部分，它可以随意处置。另一方面，批评者宣称这些珍宝属于中国人。同时，广州的南方政权与北方保守的政权不一样，北方政权曾是张勋复辟过程中皇室的同谋，而南方政权则表示退位协议无效。孙中山政府要求终止优待条款，废除溥仪的地位，降为普通平民。[36]

同时，皇室内部正在发生重要变化，溥仪快速成长起来。1918 年 11 月，溥仪 12 岁，段祺瑞政府安排英国外交官庄士敦当溥仪的家庭英语教师。庄士敦对这位皇帝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例如，大约在 1921 年，他说服溥仪剪去了辫子，这让皇室的几乎每个人都效仿剪去了辫子。1922 年 12 月，溥仪不到 17 岁，他与两名满人女子结婚，婉容（1906—1946）成为他的妻子，文绣（1909—1953）成为他的妃子。此后不久，在庄士敦的鼓励下，他开始坚持亲自管理皇室事务。1923 年 7 月，由于怀疑太监偷盗和出售宫中宝物中饱私囊，溥仪把几乎所有的一千多名太监逐出皇宫，只留下了大约一百名太监照顾后妃。[37]

1924 年，溥仪准备重组内务府，自从 1922 年 1 月世续死后，绍英成为内务府大臣。1924 年春，溥仪用张謇立宪派成员郑孝胥取代绍英管理内务府，这是清朝历史上首名汉人出任内务府的职位。与庄士敦一样，郑孝胥赞成在皇室进行大范围改革。他们两人都建议溥仪搬到颐和园，部分原因是为了平息对优待条款日益高涨的反对之声。如果皇室最终履行优待条款的承诺而离开紫禁城，那么共和政体可能倾向于尊重协议的其他条款。郑孝胥派庄士敦负责整修颐和园，为迎接新主人的到来做好准备，他则安排溥仪巡游颐和园。然而，皇室离开紫禁城的可能性极大地影响了内务府的既得利益，最终内务府的旧势力占了上风。仅仅三个月后，郑孝胥被迫从内务府辞职，绍英则官复原职。皇室搬到颐和园的计划被废弃。[38]

247

皇室不久就因其强硬的态度而付出了代价。1924 年年底，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曹锟和吴佩孚的直系被打败，当时吴佩孚的得力部下冯玉祥倒戈支持张作霖和奉系。冯玉祥的军队把吴佩孚赶出了北京，强迫曹锟辞去总统，以黄郛（1880—1936）的“代

理内阁”取代了曹锟。次年，冯玉祥和张作霖联合控制了北京。冯玉祥虽然是一个北方军阀，但他长期对皇室仍然盘踞于京城中心感到不满。七年前，张勋复辟事件后，冯玉祥就曾率领一群北方将领，要求撤销优待条款，削除溥仪的帝位，降为平民。现在，冯玉祥控制下的“代理内阁”指出，皇室曾有充足的时间（十三年）履行搬离紫禁城的承诺，但却没有行动。冯玉祥迅速单方面改变了皇室与民国的关系。11 月 5 日，即他进入北京两周后，他的一名部下和二十名士兵强行闯入紫禁城内廷，向他们所说的“溥仪先生”下达了冯玉祥的最后通牒，要求他在三小时内离开皇宫。冯玉祥还把一套“修订”的优待条款强加给溥仪。修订条款要求“宣统皇帝”永远放弃皇帝头衔，与中华民国的普通公民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民国把皇室每年的津贴从四百万元减少到五十万元（除此之外，划拨二百万元一次性付清的特别费用，为北京的穷人开办工厂，优先支付给旗人）；皇室离开紫禁城，可以去他们想去的地方定居，民国仍然负责他们的人身安全；民国继续为皇室宗庙和陵墓提供军事保护；民国也将保护皇室的私人财产，但接管其所有公有财产。[39]

溥仪没有选择，只能离开紫禁城，此后不久他的两个妻子和两个活着的太妃跟着离开。他先去了紫禁城北部其父亲载沣的住处，随后去了北京使馆区的日本驻华公使馆，最后于 1925 年 2 月去了天津的日本租界。[40]清朝皇室的其他成员也离开了京城。载沣也居住在天津，奕劻的大儿子、世袭了庆亲王爵位的载振（从 1918 年以来）也到了天津。[41]庄士敦返回英国外交部。同时，由于溥仪被逐出紫禁城，禁卫军第二步兵团作为皇家侍卫的任务最终结束。与两年前第十六师其他各部的结果一样，他们也被迫复员和遣散了。[42] *248*

溥仪和皇室的被逐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尤其是在南方的前革命党人和激进的共和派中，他们中的一些人从一开始就反对退位协议。绍英和其他内务府成员曾经问过孙中山的意见。当时孙中山的身体每况愈下，在 1925 年 3 月去世前两个月，他最后一次到北京游览，看到皇室仍没有履行优待条款和附加的《善后办法》

中的条款：皇室仍然住在紫禁城，仍然采用皇帝年号纪年，仍然没有停止追封授爵（追封非满人如张勋），赞同张勋改变国家政体的做法。孙中山总结说，皇室已经失去了道义上或者法律上的支持。章炳麟在十五年或二十年前就被称为民族主义者，他对冯玉祥表示了祝贺，因为“清酋”早就该逐且早就应该“夷为平庶”。事实上，章炳麟对冯玉祥的修订条款也有意见，认为仍然对皇室太过仁慈，尤其是承诺保护溥仪相当可观的私人财产。还有一群人同样认为冯玉祥做得还不够，他们是北京的反对清室优待大同盟的成员，据庄士敦所说，这个组织迫切要求“完全废除‘优待协议’的最后残余，包括1924年11月强加给皇室的‘协议’，以及对包括皇帝本人在内的所有‘君主制主义者’实行严惩甚至执行死刑”。[43]

然而，也有少数人批评冯玉祥做得太过分了。一些人对溥仪被逐的方式颇有微词。让人意外的是，持这种批评意见的人中有一个是唐绍仪，1917年他联合伍廷芳和其他几名参与优待条款谈判的人，宣称皇室由于串通张勋，应该自己废除优待条款。现在，唐绍仪谴责冯玉祥的强制行为是“不择时，不公平和不道德也”，因为他使用武力来对付年轻的手无寸铁的溥仪。唐绍仪主张，如果退位协议要改变，也应该通过谈判来解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杰出知识分子胡适（1891—1962）同样很恼火，认为优待条款的
249 修改伴随着“军事胁迫”，他称这是“中国共和政府最丑恶的行为！”[44]

一些人对驱逐溥仪这件事情本身表示反对。这部分人除了保皇派和前朝旧臣外，还包括几名实权派人物，如段祺瑞和张作霖。自从四年前在直皖战争中失利后，段祺瑞隐居天津，但由于1924年直系势力削弱，他成为临时执政。1917年，段祺瑞曾对皇室勾结张勋给予了特别宽恕，此时他发电报给冯玉祥批评他的行为。他认为优待条款是民国政府与皇室之间达成的具有强制力的正式条约。在他看来，溥仪的被逐不仅违背了民国向皇室所做出的承诺，而且也会削弱民国将来在与外国的外交谈判中的信誉。段祺瑞个人给溥仪传话，表示愿意“竭尽全力”支持皇室。此时冯玉

祥的盟友张作霖也同意段祺瑞的忧虑。这些反对驱逐事件的人要求恢复原状。11 月 8 日，一群清朝旧臣在前直隶总督陈夔龙的带领下，电告段祺瑞和张作霖，要求立即恢复最初的优待条款。这包括让溥仪返回紫禁城（或者至少是颐和园），承认他的皇帝头衔，全额支付给他每年四百万元津贴。1925 年 2 月，段祺瑞召集了所谓的“善后会议”来决定将来的政府政策，大量保皇派和满人群体联合向民国请愿，要求“保护溥仪”。然而，由于冯玉祥仍然控制着北京，这场活动没有结果。不管个人感情怎样，张作霖和段祺瑞在当时不愿意也无力反对冯玉祥。[45]

虽然溥仪被逐出了皇宫，但正如章炳麟抱怨的那样，冯玉祥没有完全废除优待条款，他只是进行了“修改”。根据新协议，民国承诺给予皇室每年五十万元津贴，区别对待皇室私产（进行保护）和公产（进行没收）。冯玉祥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履行了这些调整后的承诺呢？显然没有支付给溥仪一分一毫，这大概是因为前朝皇帝在日本人中寻求政治庇护而放弃了他的要求。但是，冯玉祥的北京政府还是努力清点皇室的巨额财产，来确定哪些是私产哪些是公产。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后不久，由民国方面和皇室任命的人联合组成了“清室善后委员会”，对皇室的财产进行彻底调查。 250
11 月 9 日，该委员会封锁了紫禁城内廷并开始清查财产，九个月后完成了任务。区分了皇室的私产和公产后，在没有任何补偿的情况下，政府没收了公产，包括内廷的所有宫殿及其大量艺术珍宝。这些公产变成了 1925 年 10 月开放的故宫博物院（抗日战争后，故宫博物院兼并了早期在外朝建立的古物陈列所）。[46]这个时期民国还接管了颐和园。最后，冯玉祥的北京政府确实保持了清朝皇帝陵墓的安全。

冯玉祥对北京的控制只持续了一年，此后他与张作霖不稳定的联盟破裂。1925 年年底，张作霖联合吴佩孚（为了报一年前冯玉祥出卖他的一箭之仇）对抗前盟友并击败了冯玉祥。由于冯玉祥暂时避难于苏联和段祺瑞被免职，张作霖接管了政权并在随后的三年里控制了北方政府。皇室的支持者这时满心喜欢，因为据说张作霖不同意溥仪被逐出紫禁城，他现在有能力改变冯玉祥的

所作所为。因此，1926 年 7 月，包括上海康有为在内的许多保皇派请求张作霖的盟友吴佩孚恢复优待条款。然而，让他们和溥仪感到气愤的是，张作霖并不打算答应他们的要求。对于 1926 年的这次请愿，张作霖的内政部最后决定，溥仪的皇帝头衔永远被剥夺，而且民国指派为公产的所有皇室财产也永远丧失了，这两样都不应该归还给他。[47]

张作霖不仅没有恢复原来的优待条款，他甚至对冯玉祥“修订”条款中的相关规定也很漠视，即保护清朝陵墓。张作霖摄取政权后，清朝陵墓的安全毫无保障，尤其是位于北京八十英里处的遵化清东陵。1926 年秋天，奉系军阀的一队士兵砍伐了东陵的树木，将其作为木材出售。1926 年到 1927 年冬天，一名奉系将领因追赶一名本地盗匪，暂时驻军于东陵的偏远建筑内并毁坏了这些陵墓。次年春天，盗贼闯入了同治皇帝妃子的陵墓，挖出棺材，
251 偷走了陪葬的珠宝，抛弃了其尸体。几名罪犯被抓住并移交给遵化县政府，但是他们都没有受到惩罚。[48]

1928 年年中，随着孙中山的继任者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1887—1975）完成北伐，张作霖最终被逐出北京，军阀混战时代也结束了。那些长期以来要求取消原来优待条款的国民党人，根本没有进行任何努力来遵守冯玉祥的“修订”条款。对于居住在天津日本租界的溥仪，他们没有支付过一分津贴，而且他们也没有保护过清陵。事实上，他们对清皇的亵渎远远超过了张作霖的军队。1928 年 7 月，靠近北京的由孙殿英（1889—1947）担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正在遵化进行操练，尤其是谭温江的第五师，他们用大炮炸药轰开了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的陵墓，并洗劫一空。其他的十二座陵墓虽然没有被抢掠，但在很大程度上被破坏了。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成为盗贼的目标，可能是因为他们在位时极尽奢华，因此陪葬品数目巨大且价值连城。被盗的物品装了二十多辆卡车，估计价值超过了一亿元。这些物品迅速在北京的古玩市场被出售。[49]

溥仪和他的支持者对国民政府的愤怒不仅因为士兵亵渎皇陵的行为，也包括政府随后对此事缓慢迟疑的处理态度。清朝皇室

派出一个由前度支部尚书载泽领导的代表团，前往盗墓现场进行调查和修补，他们要求国民政府派军队保护陵墓，并抓住罪犯进行惩罚。作为回应，国民党派调查人员前往遵化的清东陵，并派兵保护易县的清西陵，他们还保证召集军事法庭来审理此案，第十五军师长谭温江是主要的嫌疑犯。从那以后，再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军事法庭一拖再拖，逢场作戏，最后也不了了之。[50]

1928 年清东陵的被洗劫以及四年前溥仪被逐出紫禁城，标志着 1912 年退位协议承诺对清朝皇帝的“优待”就此完结。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优待条款的优厚程度和优待条款的持续时间。然而，退位协议中还包括关于满人待遇的承诺。民国初年是否认真公平地履行了这些承诺呢？

民国初年的满人

辛亥革命胜利本身就破除了革命者关于满人七宗罪中的两宗罪。在革命中对旗人的暴行，大大抵消了满人祖先在清初对汉人所犯下的残暴罪行（第二宗罪），而被废黜的皇室再也不能实行以前的排汉政策（第七宗罪），其他的五宗罪则需要早期的民国来清除。

满人的第三宗罪是把自己的习俗——辫子、满语和官服——强加给汉人来奴化中国。新政权立即着手将满化的情况颠倒过来。清廷原来要求男子剃发留辫作为臣服的证据，这一发式必然成为革命的首要对象。[51]尽管几年来政治和社会改革派公开呼吁剪除辫子，但直到革命进行了两个月后，留辫要求才被明令废除。即使到此时，清廷也只是允许而不是强制其男性臣民剪除辫子而留西式（和日式）发式。革命党人对这种最后时刻的、毫无诚意的措施十分不满，他们坚持全体的强制性的剪辫。因此，在武昌起义和清帝退位之间的四个月时间里，在革命者掌权的地方，他们颁发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剪除辫子，这是忠于新政权的一个标志。例如，1911 年 12 月中旬，江西新政府要求所有官员和成年男性在接到命令后五天内剪去他们的辫子。[52]

让共和派忧虑的是，他们普遍的强制性剪辫政策并不总是受到欢迎。不是因为人们反对革命，而是因为经过二百多年后，人们已经把满人的发式看做传统文化的一个完整组成部分。因此，剪辫命令经常被漠视。规定的短暂期限很不现实，也没有达到目的。当主动服从命令的要求没有实现时，革命政府通常开始采取强制措施。在浙江，嘉兴和杭州的地方官员派出手拿大剪的士兵，剪去他们看到的留辫之人的辫子。他们在城门驻扎这样的“剪辫队”，抓住那些来自乡村的粗心农民强行剪辫。[53]这些强制措施只会让他们的政策更加不受欢迎。商人为了抗议而关门歇业，农民
253 拒绝给城市提供农产品，很多男人都躲避着那些挥舞着剪刀的士兵。[54]

然而，革命军不愿逐渐过渡到新式短发。1912 年 3 月 5 日，孙中山在袁世凯接替临时大总统的前五天，发布了一道全国范围内的强制剪辫令。他解释说，既然满人统治已经结束，现在是清除旧残渣而成为新国民的时候了。大城市的大部分人都已经这么做了，但他承认一些偏远地方仍有“不在少数”的人没有行动。因此，孙中山命令各省军政府颁布公告，要求管辖范围内的成年男性必须在二十天内剪除辫子。[55]

虽然袁世凯从来没有取消孙中山的命令，但他自己好像恢复了之前他说服清廷采纳的宽松政策。他本人在 2 月 16 日悄悄剪去了辫子，这刚好是清廷退位后的第四天，但他没有让其他人效仿自己。例如，禁卫军统领冯国璋六个月后才剪掉辫子。然而，教师和学生是例外，据《时报》记载，1912 年 5 月，教育总长蔡元培（1868—1940）命令他们要么剪辫要么回家。另一方面，经过革命过程中最初的强制阶段后，剪辫在实际生活中变成了一件自愿的事情。1912 年 10 月底，临时参议院讨论并最终否决了让剪辫成为民众实行“公共权利”的前提这一提案，“公共权利”包括了即将来临的国会选举投票权。总统袁世凯把这件事情移交给各省当局，要求他们要靠说服而不是强制来处理这一问题。1914 年 6 月，自由共和政体终结，袁世凯的独裁政府在北京推行了一场强制性的全体剪辫运动。这或许标志着辫子作为官方认可的发式的

终结。[56]

即使这样，满人的发式也没有完全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消失。政治和社会保守派继续钟情于辫子。一些政治精英——不仅有满人也有汉人——为了表示对已亡清朝的永久忠诚，他们拒绝改变自己的发式。1917 年复辟帝制的张勋就留着辫子，他还要求自己部队的士兵也留辫子。另一名著名的保皇派王国维（1877—1927）仍然留着满人发式，直到 1927 年 6 月自杀身亡。此时，清朝皇帝自己已经剪掉了辫子。此后，政治保守派再也没有坚持旧发式的 254
有力理由了。[57]另一方面，社会保守派依然坚持留辫，因为他们视其为传统的一部分。他们一般集中在中原地区的内地省份，尤其是集中于乡村农民。例如，1922 年河南留辫仍然很普遍，当时冯玉祥成为督军，他提出了十点改革计划，把剪除辫子列入其中（同时禁止妇女缠足）。几乎同一时期，四川军务督办杨森（1884—1977）也要求废除辫子，当时“中国西部的乡村地区留辫子的人不在少数”。然而，到 20 世纪 30 年代，尽管在如安徽某处集镇这样一些偏远地方能偶现辫子的踪迹，但辫子已成为极为稀罕之物了。[58]中国男人的发式已经完全“去满化”。

伴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来的另一个变化，是废除了与汉语一样作为官方语言的满语。政府公文不再需要用满汉两种语言书写。满语从新政权发行的硬币上消失了。安徽、黑龙江等地的民国学校也禁止教满语。[59]“国语”一词在清朝是指满语，现在被重新指定为普通话。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二百多年来居于优势地位的满语对民国的语言没有任何影响了。虽然只有相对很少的满语词汇进入了汉语词典，但是一些语言学家指出，由于“语言变迁”这一过程，北方普通话——中国其他地区语言的样板——的语法结构在一些重要方面（通常不被承认）是从满语转化而来的。[60]

最后，除了剪除辫子和去除官方语言满语，民国也废弃了满人朝廷旧式的服饰而采用新的官服，一些剪辫的支持者也提倡这么做。清朝官员是外着上紧下松的长衫，外加“马褂”，戴圆帽，佩朝珠。民国的服饰借用了西方的或受西方影响的日本服饰。当时的照片充分表明孙中山（例如，1912 年 1 月在他的总统就职典

礼上）和其他文官头领喜欢西装、领带和大衣，而袁世凯和随后的军阀喜欢军服。孙中山最终提出了两种服装样式的混合，被称
255 之为“中山装”。这种服装在后来与共产党干部密切相关，以至于在西方被称为“毛式服装”（Mao suit）。[61]

与剪辫强加给所有男性不一样，服饰上的去满化被限定在男性官员范围内。普通男子不需要废弃满人服装，因为清朝统治二百多年以来，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装束。因此，在中华民国头二三十年里，中国男人不分长幼都身着改版了的满服，宽袖长衫，穿或不穿马褂。著名的长袍在城市里一直持续到国民政府时代，当时长袍被西式的长裤和衬衣取代；在乡村地区，长袍持续的时间更长。官服的去满化并没有阻止中国妇女后来对旗袍的喜爱，迄今她们仍没有放弃这一满人服装。正如其名字一样，旗袍起源于旗人。直到清朝结束后，许多汉人妇女仍然穿着明朝服装，即过膝的外套罩在裤子外面。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革命后的十年中，城市里的中产阶级汉族妇女开始摒弃这种旧式的外套加裤子装束，而喜欢上了被抛弃的满人单件长袍服饰（但他们没有吸收精美的头饰和厚底鞋，这些是满人服饰的显著特征）。到 20 世纪 30 年代，起源于满人的旗袍变成了国民政府时期妇女的正式服装，且被广泛视为中国妇女的“民族”服装。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后，旗袍与同样起源于满人的男人长袍才被男女皆宜的中山装（或“毛式服装”）及其变体所取代。[62]

总之，关于革命党人控诉满人的第三宗罪，即满人强加给汉人的习俗——辫子、满语和官服——在民国初年被全部废除了。然而，在普通汉人男女的服饰和汉语语言方面，仍然存留有满人习俗的一些痕迹。

满人的其他四宗罪是，革命者指责满人是异族蛮夷而非中国人（第一宗罪），他们是特权少数族群，并凌驾于汉人之上（第四宗罪），以军事侵略来镇压汉人（第五宗罪），从损害汉人利益的政治差异中获益（第六宗罪）。然而，在三项退位协议的最后一项
256 “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中，共和党人也对满人做出了三项承诺：与汉人平等，八旗生计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

仍旧支放，一律蠲除旗人营业居住等限制。总统袁世凯在 1914 年 5 月颁行的《中华民国约法》第六十五条中发誓，“满、蒙、回、藏各族”待遇条件与退位协议中的其他条款都会“永不变更其效力”，1915 年恢复君主制前夕他又重申了这一誓言。[63]虽然袁世凯之后的军阀继任者从未重复这一承诺，但也没有否定。由于民国统治者们要惩罚或者纠正满人的四宗罪，同时又要履行对普通满人做出的三项承诺，因此随着旗人地位和身份在中国社会的变化，他们与新政府的关系也必然改变了。

根据革命者指控的满人第四宗罪，满人把自己上升为特权族群，凌驾于汉人之上，且隔离于汉人。作为证据，对满人的控诉征引了如下例子：旗兵享受朝廷俸禄，旗人职业的限制，旗人与非旗人之间隔离而居，满汉通婚禁令。根据退位协议，民国政府立即废除了以前对旗人职业和居住的限制，但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某些地区仍然在向旗兵发放薪俸。

只要还在发放军饷，八旗制度就会继续存在且发挥作用。总统袁世凯多次考虑如何处理这个延续了几个世纪的旧制度。1912 年 10 月，袁世凯内阁讨论重组八旗。两年后，据说政府决定废除二十四名副都统职位——每名副都统都统领一满八旗或蒙八旗或汉八旗，而代之以监察旗务的特别官员。[64]然而，这些考虑都没有结果。因此，虽然清廷被推翻，但袁世凯及继任军阀继续向二十四个八旗的高级职位以及旗务处派驻官员。例如，1912 年 12 月 22 日，袁世凯任命溥伦为满洲镶红旗副都统，两周后又任命他和其他几人担任旗务处官员。正如前面两种任命那样，任命到八旗中的人经常是满人，包括如溥伦一样的皇室亲贵。然而，为了符合义和团运动之后的改革措施，民国初年，并非所有的八旗官员都是满人，因此，镶红旗溥伦的继任者就是一名汉人段芝贵（1869—1925）。一些全国性八旗职位的任命一直延续到 1924 年上半年，而一些地方八旗职位（如奉天辽阳驻防八旗的军事统领）的任命则至少持续到 1919 年。[65] 257

八旗制度与以前一样继续发挥着管理旗人事务的职能。例如，1914 年 5 月，一名叫钟禄的人被控犯有贪污罪从而导致满人镶蓝

旗都统被解职，他自己也被判伤害罪而被本旗关押，“严加看管”。[66]由于八旗制度依然是管理旗人的有效体制，1915 年年底，袁世凯的支持者还呼吁八旗的旗人支持恢复君主制，这样二十四个旗被要求分别派遣一名代表到国会选举袁世凯为皇帝。[67]然而，民国时期八旗制度的主要职能和存在原因，是在分配退位协议承诺的津贴中发挥作用。[68]

由于新政权定都北京，因此很难忽视满人的存在。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满人占整个城市人口的 20%～25%。[69]因此，民国初年的政府在北京认真遵守了退位协议，继续向八旗旗兵提供粮食和饷银。据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一些老满人回忆，旗兵在民国初期都能领到钱粮，数量与清朝时相比没有变化。但大约在 1913 年到 1914 年，袁世凯的共和政体结束时，旗兵的米粮就停止发放了。此后，他们只能领到以银元支付的饷银，后来逐渐用铜币取代了以前的银元。此外，袁世凯 1916 年死后，饷银的数量进一步缩减。然而，到 1918 年 7 月冯国璋当总统时，据满人正红旗当月的账簿显示，北京好几万旗人的饷项仍然由政府支付。单正红旗一个旗就有 8 400 人在薪俸册上。饷银以银两为单位登记造册，但折合成银元支付，420 名下士级别的士兵每月各领取最多的 3.8 两银子，几个最近成为寡妇的人各领取最少的 0.5 两银子。1 534 名普通士兵每月各领取 2.1 两银子。然而，此后不久，饷银的发放更加不固定，只是在二十四名副都统的再三要求下才发放。最终，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饷银被严格限定在农历的三个重要节日发
258 放——一月、五月和八月——每次饷银总计不超过十个贬值的铜元。[70]

但在地方各省的驻防八旗中，民国政府并没有很好地履行继续给旗兵分发军饷的承诺。各省驻防的情况不一样，主要取决于每个驻防八旗对革命的反应，但所有驻防的军饷都没有持续多长时间。那些激烈反抗革命到底的驻防城市——显然包括西安、太原、福州、镇江和南京——军饷立即停发，幸存下来的旗人只好自谋生路。那些通过谈判而和平移交权力的驻防城市，旗兵通常能领到一些形式的政府补助，这经常是谈判协议的一部分，但从

来都不会超过几个月。在成都，共和派继续支付了旗兵最多一年的军饷。[71]在荆州，政府保证向穷困的旗人提供六个月的“善款”，但实际上只提供了三个月的数目。当这笔款项不够时，他们拨发了另一笔 20 000 元的救济金。[72]在杭州，在支付了原来答应的两个月饷银后，政府同意再支付三个月的 9 000 元军饷。[73]在广州，政府一开始同意每月拨付 73 000 元，同意保持受过现代军事训练的这支八旗分遣队的完整。但是仅仅三个月后，这支部队就被解散，每名士兵上缴一件武器即支付 10 元的遣散费。1912 年 4 月起，每名士兵一个月的生活费只有 8 分。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和军阀龙济光（1867—1925）的到来，即使这点微薄的饷银也在 1913 年春停止发放。[74]最后，那些没有直接经历革命的驻防城市，一些新的官员至少继续给旗人提供饷银，另外一些官员则没有提供。据副都统绰哈泰 1912 年 11 月所言，密云、察哈尔、热河和绥远驻防八旗仍然能领到饷银，但他自己所在的宁夏驻防八旗已经不能领到饷银了。甘肃的凉州和庄浪驻防八旗的饷银持续到 1914 年。[75]

一旦旗人的饷银终结，八旗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因此，在许多地方，八旗制度在革命爆发后的几个月时间内就崩溃了。到 1913 年 12 月，陆军总长段祺瑞告知总统袁世凯，各省的许多旗兵都解散了，只有京城和一些地区如青州、太原、宁夏、凉州和伊犁，八旗或多或少地保留下来。[76]北京驻防八旗的饷银也最终停止发放了，虽然到 1924 年年底还没有停发，但随着冯玉祥把溥仪逐出紫禁城以及民国对清廷津贴的终结，京旗的军饷也废除了。也就是在这时，八旗制度最终完结了，也没有再任命官员到八旗中。例如，京旗的步军统领衙门在 1924 年 10 月 5 日就被废除了。[77]

259

继续向八旗提供饷银并非长远之计，最初也是打算持续到新政权提出新的解决“八旗生计问题”的办法。民国初年尝试着解决这一问题，但也并不比清朝的办法更成功。袁世凯在成为临时大总统后不久，内政部设立了筹办八旗生计处，代替了清末的变通旗制处。在筹办八旗生计处的鼓动下，袁世凯政府于 1914 年 1

月向政治会议（暂时取代被解散的国会的准立法性质机构）提出建议，中国向国际银行团签订一个500万英镑的长年借款合同，以此为庞大的旗人安置计划提供资金。这一建议要求把京旗的8万满人迁移到满洲、察哈尔、绥远和新疆的荒地，用每年向旗人发放的900万元饷银作为贷款的担保。重新安置旗人算不上一个新思路，结果也与以前没有任何不同。政治会议担心贷款会给中国增加更多的债务，没有进行周详的统计就决定这项计划是不成熟的；政治会议要求对北京及其周围的旗人数量进行统计，同时也要求对用来安置旗人的北方周边可利用土地进行登记造册。筹办八旗生计处一直没有什么新的举措。正如一个满人在1914年年底抱怨的那样，筹办八旗生计处存在了三年，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成绩。[78]

与以前一样，民国初期也进行了其他大量非官方努力来解决旗人生计问题，办法是为旗人提供职业培训。在北京，满汉官员1909年创办的北京首善第一女工厂继续向旗籍妇女传授纺线、缝纫和织布技术。然而，这家工厂的变迁历史也表明了民国政府对满人的利益越来越没有兴趣。1912年，工厂设立了六个部门，雇佣了300多名妇女，设置了一所女子小学。袁世凯亲自关照该校，批准由政府捐资。整个20世纪前十年，连续几届民国政府每年都
260 捐助2万两白银来支持这家工厂，但1923年后这种捐资停止了。冯玉祥把溥仪逐出紫禁城一年后，他在“修订”版退位协议中提出一次性支付200万元来开办和资助工厂，以解决北京的穷人生计问题，优先解决那些“旗籍困难人群”。这笔公共划拨的经费如何花出去，并不清楚。首善第一女工厂只有依靠私人的慈善捐助才得以勉力维持（至少维持到1929年）。[79]

在一些省的驻防八旗城市，民国政府也进行了类似的努力来帮助旗人自给自足。最雄心勃勃的计划当数荆州，黎元洪的湖北军政府在1912年春任命胡鄂公（1884—1951）作为他的特使前去解决荆州两万旗人的生计问题。胡鄂公是一名受过日本教育的荆州当地官员，他的计划是要把最穷苦的旗人遣送到湖北省其他地方，所需资金部分由公共基金提供，部分则强迫当地富裕满人捐

助。他们每人得到30元的动身费，此后他们就自食其力且不再返回荆州。这项计划开始于1912年10月，当时1 500名旗人坐船顺流而下被遣送到武汉三镇，600人安置于武昌，500人安置于汉口，400人安置于汉阳。不幸的是，由于他们没有一技之长而不能在当地谋生，很多人都离开了。不久，大部分旗人都秘密回到了荆州，在这里也不比以前好多少。[80]诸如成都的其他一些驻防城市也建立了类似荆州的机构来帮助旗人适应新的境况。[81]与北京和荆州一样，这些地方的努力通常都收效甚微。而诸如广州等其他城市则没有采取任何努力来改善旗人生计。

由于旗兵的饷银缩减或废止，且民国初年政府没能提出一项长期计划，旗人没有选择，只好自谋生路。退位协议最终废除了以前旗人选择职业的限制。然而，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对于突然而来的自由显得手足无措。东北的旗人或许是最幸运的，这得益于这里的八旗制度基本没有被破坏。过去，他们通常生活在驻防城市之外的偏远乡村，通过耕种、狩猎和捕鱼维生。他们既不懒散，也不依靠旗兵的饷银度日，与北京和其他驻防城市的旗人完全不同。[82]

在北京，即使20世纪前十年旗兵的饷银仍然照发，但许多满 261
人很难适应这前所未有的放任自由的境况。那些应招加入晚清新军的旗人通常能够保留自己的职位。如前所述，直到1922年解散之前，禁卫军四个步兵团中的三个都主要由满人组成。陆军第一镇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也是这样。在何宗莲的统率下，陆军第一镇在革命时期被调离京师而驻防于察哈尔和张家口。1914年兵变时，第一师（第一镇）仍主要由旗人士兵组成，兵变后不久师长何宗莲被蔡成勋（1871—1946）所取代，1922年蔡成勋及其第一师被调往江西。四年后，当时成为军阀孙传芳（1885—1935）军队一部分的江西第一师被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击败和解散。[83]除了进入军队，北京的许多旗人继续供职于警察机构。据戴维·斯特兰德（David Strand）记载，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10 000名警察中，“四分之三以上都有旗人身份”。[84]对于读过书的满人，包括废止满语作为官方语言而被解雇的许多笔帖式来说，他们还有机会作

为“中文秘书”受雇于各类外国使馆。例如，在英国驻华公使馆，20世纪30年代中文秘书处的所有职位都由满人担任。[85]

然而，北京的许多旗人既没有一技之长也没有工作的动力。与满洲的旗人不一样，他们不能克服依赖性，这种依赖习惯是清廷长期以来禁止他们选择职业所造成的。甘博（Sidney D. Gamble）在20世纪前十年对北京进行的社会调查证实了老舍笔下对其讲究而懒惰的亲戚的描述。甘博记载：

> 长年来依靠政府施舍度日使得大部分满人不能自谋生路，现在他们绝大部分宁愿挨饿也不去工作。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他们在自己赚钱糊口之前甚至愿意卖掉房屋的砖瓦。

甘博也证实了满人名声在外的奢侈习惯。通过对家庭预算的调查，他发现相比汉人，满人会把更多的收入花费在奢侈品上，也比汉人更容易入不敷出。不幸的是，“愿意工作的满人能找到的职位大多是那些没有技术含量的职业，对于过去生活得很舒适的
262 他们来说，这意味着竞争激烈、收入微薄、生活水平低下和穷困”，实际上，“大部分满人都极为贫穷”。[86]

在以前驻防八旗城市中的满人，境况也和京城满人差不多。他们由于经济困境和缺乏职业技术所迫，不得不从事低技术、重体力、低收入的工作。幸运的满人是那些读过书并居住在如广州、福州等通商口岸的满人，他们能在外国领事馆、外国人经营的海关和邮局工作。然而，大部分满人只能勉强糊口而已。根据一项粗略估计，广州20%的满人过得很舒适，60%的满人作为小贩和劳工只能勉强度日，还有20%打零工或乞讨的满人几乎不能维持生计。[87]而且，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存活下来。对于各省的满人来说，辛亥革命后的第一个冬季尤为艰难。尽管当地政府和社会精英努力分发稀粥和棉衣，但许多无家可归的旗人要么饿死要么冻死了。[88]

同时，满人与汉人的隔离制度在民国时期也最终瓦解。1912年4月13日，总统袁世凯表示慈禧太后1902年的谕旨没有改变社会现状，并下令不再禁止满汉通婚。[89]满城作为以前受保护的满

人居住地，到现在也被废除了。退位协议解除了对满人居住地的限制，虽然承诺保护满人的私人财产，但这意味着他们的公共财产将会被没收。因此，在那些驻防城市，民国政府迅速占据了巨大且人口稀少的满人居住地区，没收了以前非私人的所有土地和房屋。正如前面所述，在京城，他们占据了大部分紫禁城，只给皇室留下了（直到 1924 年）紫禁城后面的一小部分；他们还接管了包括皇城在内的整个内城。在福州，当地政府于 1912 年废弃了旗人的地契并要求换发新地契，因为满城现在是新政权的财产。[90]在杭州，政府拍卖了旗人的土地，并开始把旗地转变成今天仍然熙熙攘攘的商业中心。据一名西方记者报道，早在 1913 年，关于旧满城的计划已经公布……大量建筑被出售……商会购买了西湖旁边的许多建筑。少量留给满人的建筑正在迅速消失，修路的标志到处可见。[91]

在很多地方，以前用来隔离满人与其驻防城市的城墙被清除了。西安满城的南城墙在 1912 年被摧毁，代之以两边都是洋货店的宽阔马路。荆州、杭州和成都的内城城墙在 1912 年或 1913 年被拆除。北京是个例外，内外城之间的城墙一直完好地保存至 20 世纪 50 年代共产党人领导的“大跃进”。[92] 263

然而，尽管满汉之间法律上的族群隔离在革命中终结，但事实上的族群隔离仍然存在。袁世凯 1912 年颁布的支持满汉通婚的法令，显然并不比十年前慈禧太后颁布的谕令更有效。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在安徽、黑龙江，满人（包括汉军）之间通常通婚，而很少与汉人结婚。[93]而且，旗人仍然倾向于集中居住于以前满城的旧址，虽然他们不再严格地与汉人隔离开来。根据甘博的调查，20 世纪前十年，北京内城的十个警区中，满人集中居住于其中五个警区内。尤其是，大量满人居住在包括皇城在内的两个警区，还有“数量众多的满人”居住于北部和西北部的三个警区。换句话说，不再受排挤的汉人则大量涌入了东部和南部的五个警区。在广州，绝大部分满人继续居住在旧城西部这块以前被限定的地区。[94]

总之，关于革命党人控诉的第四宗罪，革命后的满人仍然在

一定程度上与汉人隔离，但他们显然不再是以前清廷统治下享有特权的阶层。尽管在革命爆发前满人就长期经历着经济困境，但随着新政权完全取消了旗兵的饷项，他们的境遇越发糟糕。当北京最终取消了旗兵的饷银时，地方也立即取消了饷银。满人迅速跌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在公众意识里，他们逐渐等同于贫穷和简单劳动，非常类似于居住在上海的苏北人。与上海的苏北人一样，满人垄断了北京拉黄包车这一营生。这种职业被视为低人一等，身份低微。[95]

正如革命党人把旗人从高高在上的特权族群驱赶下来那样，他们也成功地根除了满人的军事权力——满人的第五宗罪。八旗
264 制度创立之时是军民合一的体制。革命后，虽然八旗制度至少在北京是得以保留以处理分配旗兵饷银这一日常事务，但民国政府迅速剥夺了其军事职责。1912 年 5 月，袁世凯政府的陆军总长段祺瑞告知八旗士兵，他们应该放弃射击训练，因为民国所有的军事人员都必须来自陆军，他命令二十四旗的副都统交回晚清陆军部配发的一万支或者更多支步枪，当时清廷已经用步枪射击训练取代了射箭。[96]因此，和晚清不同，民国初年的八旗士兵已经不再承担任何军事职能。

革命党人也结束了满人以前在政治领域以牺牲汉人利益所享有的优待（第六宗罪）。在整个清代，由于满汉共治和官缺制导致旗人在中央政府的任职比例失调。虽然义和团运动后，清廷按照其宣布的任职“不分满汉”的目标作了一些改革努力，但直到民国时期才完全废除满汉共治和官缺制。因此，虽然满人在政府中的任职没有完全消失，但其优势迅速降低。袁世凯当上总统时，据说他希望至少有一名旗人在他的共和国内阁中任职（当他还是清朝内阁总理时，他任命的内阁也包括了一名满人）。袁世凯任命的满人是曾任职于北京内城工巡局的荣勋，到 1906 年 6 月去世之前，荣勋一直担任内务次长。荣勋去世后十年，另一名供职于北方政府内阁的满人是恩华，他是来自镇江驻防八旗的一名受过日本教育的蒙古旗人，1924 年他担任司法次长一职。[97]

然而，在内阁这一层次之下，政府的几个机构继续保留了一

些满人官缺。在1924年八旗制度被完全废除之前，八旗体系中的许多要职都由满人担任。同样，继清朝理藩院之后的蒙藏事务院的副总裁几乎也是由旗人担任。[98]为了编撰《清史稿》而于1914年创立的机构，由前东三省总督汉军赵尔巽担任总裁，其他人选还包括满人金梁。1927年赵尔巽死后，金梁奉命加快修史步伐，要赶在蒋介石国民革命军到达北京之前完成，以免修史工作受阻。[99]

令人意外的是，在从专制政体转向共和政体的过程中，左右逢源的一名满人竟然是荫昌，他是受过德国教育的前陆军部尚书，曾指挥清军对革命进行了最初的反击。1912年9月，袁世凯任命荫昌接替冯国璋为总统府侍从武官长，国民党的许多成员对此深感不安。然而，国民党的军事领袖人物黄兴则为荫昌辩护并支持他的发展。虽然在革命时期，清朝保皇派良弼曾对荫昌的资历提出质疑，然而黄兴称赞他“洞悉军务，国际知名”和“具世界性眼光”。黄兴说，荫昌率领清军攻打革命军，那只是他的分内之事，无论如何，应该为攻占汉口所致的流血事件和毁灭该城负责的是冯国璋而不是他。荫昌作为一名民国官员的政治生涯在袁世凯倒台之后仍在继续，他曾担任许多高级军事顾问的职务，直到1928年去世。他经常代表民国与皇室交涉，如1922年他参加了溥仪的婚礼。[100] 265

最后，虽然革命军控诉满人的第一宗罪，即满人是异族蛮夷而不属于中国，但事实上新政权并没有驱逐他们。但也有很多事例表明在革命过程中，有许多旗人被集体赶出家园。民国接受了满人在中国的存在，甚至在退位协议中承诺满人与汉人一样平等对待。协议正式承认满人是五个主要民族中的一个，而这五个民族共同组成了中华民国。“五族共和”这一概念并不是什么新思想，隆裕太后就曾在她的退位诏书提到这一想法。“满、汉、蒙、回、藏五族共和”也是满人改革派刊物《大同报》1907年提出的一个目标。事实上，“五族共和”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乾隆皇帝，他自认为是一个多民族帝国的统一者和统治者。然而，在民国时期，满人不再是清朝统治时期的上等阶层。他们的地位被降低了，至

少与汉人和其他几个主要民族平等。正如1912年3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五条宣称的那样，“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101]

中华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其中五个主要民族一律平等，
266 这可以从“五色旗”体现出来，“五色旗”是袁世凯根据临时参议院的建议于1912年6月采用的国旗，且一直是国家的象征，直到国民党取代了北洋政府。五色旗由五条等宽的水平长条组成，每种不同的颜色（红、黄、蓝、白、黑）分别代表了“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102]同样的民族平等思想也被表述为“五族一家”，这也是民国初年不断重复的话题。作为对“满汉一家”旧思想的重要扩充，“五族一家”这种思想在1912年得到了不同的重要人物的拥护，如隆裕太后、袁世凯和孙中山。例如，当朝廷满人大员敦促隆裕太后拒绝袁世凯改大清门为中华门的提议，认为这是共和派对皇帝权限的无理侵犯时，隆裕太后回答说：“五族本为一家。为什么要区分你我呢?”[103]

成功实现公开承诺的民族平等后，新政权要求废除近来非常普遍的反满作品和活动。例如，革命期间反满的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作品既包括清廷禁止的旧作品，如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也包括一些新作品，如由二十名无能满人和贪污太监的简略自传构成的《奴才小史》，还有《贪官污吏传》，这两部书都是由一名叫“老吏”的人在1912年5月编辑和出版的。同月，袁世凯颁布总统令，禁止所有反满文学作品，认为这些作品“与共和政体的原则相违背”且伤害了“满汉间的团结感情”。禁令宽泛地把目标对准了那些“仇视满人或诽谤前清”的书籍。袁世凯政府也再三警告个人和地方团体，不要非法没收旗人的私人财产，如果已经发生了这种事情，必须把侵占的财产归还给物主。湖北当局在1912年发布了一个类似公告，要求辖区内人民不要歧视满人和蒙古“旗人”。[104]事实上，民国不再禁止满人参加县知事选拔的考试。例如，1914年8月进行的第三次考试中，830名通过的人中有12人（1.4%）是“旗籍人”，其中有一个就是京籍旗人。[105]

然而，虽然民国初年好像致力于公正的目标，但满人发现很 267
难消除革命党人以前抨击他们的“非我族类”的恶名。例如，满人声称在民国第一届国会中，唯独他们被拒绝给予足够的代表名额。1912 年，为了在年底选出立法机关，临时参议院草拟了选举法，分配给各省一定的名额，蒙古、西藏和青海也都有名额。满族同进会的领袖指责说，按照这种按地域分配名额的规定，他们中几乎不可能有人能获选，因为他们在各省的人数都不占优势（蒙古人在蒙古就占优势）。他们要求“旗人”被给予特殊的非地域选举名额，同样，教师和华侨也应该给予类似的选举名额。临时参议院引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五条款，即所有人民不分种族一律平等，拒绝了满人特别对待的要求。临时参议院强调，在某些地方如北京和东北，旗人的数量足够多，即使按照地域分配名额也能当选。事实上，选举出来的两院制国会共 862 名成员，至少 3 人名字上听起来像满人——2 名来自奉天的参议员（延荣和富元）和 1 名来自直隶的众议员（皇族成员和前《大同报》主笔恒钧）。即使这样，这与蒙古的 54 个名额或西藏的 20 个名额也相去甚远（不是两地所有的名额都由蒙古人和藏族人所占据）。旗人代表问题在 1914 年再次被提出，当时一个新的立法机构将取代被袁世凯解散的国会。虽然这个机构没有提出正式方案，但满人再次感到不安，因为讨论中的计划没有包括给予满人特殊的名额。正如一名名叫子伟的旗人在新的满人政治刊物《旗族月报》中抱怨的那样，中国其他四个民族都能够表达和实践自己的政治观点，只有“旗族”注定处于沉默和被动状态。[106]

尽管满人没有在国会中获得特殊代表，但这显然不能归因于他们没有努力。主导这次运动的满族同进会成立于 1912 年春，主要目的是在民国初年新的多民族环境中代表满人的利益。在写给“八旗老幼”的一份声明中，满族同进会消除了一些人表达出来的恐惧，这些人认为成立这个组织只会煽动起反满情绪。该会声称， 268
其他四个民族都建立了自己的代表组织，只有满人没有采取这种政治行动。如果满人想要自救，他们也必须联合起来。满族同进会成立时，会长是晚清京官熙彦，其四大任务是：复兴满人精神，

争取满人权利，增长满人学识，筹划满人生计。在北京，这一个知名的满人代表机构至少持续到 1929 年。该会还曾在东北奉天设有分会。[107]另一代表满人的声音是上面提到的《旗族月报》，这是一份 1914 年在北京发行的月报，由罗万章编辑。这份报纸致力于它所说的“旗族”事务，1914 年 11 月 5 日该报第六期专门考察了长期以来的八旗生计问题。

在民国初年，不仅满人整体而且个人都遭受到了歧视和偏见。尽管有着退位协议中的承诺和民国政府的三令五申，但大部分满人无力抵抗当地政府随时随地非法没收他们的私人财产之举。只有像与奕劻关系紧密的前布政使志森这样，拥有政治和财力资源的人，才能够引起总统袁世凯和他的内阁的注意。志森坚持要收回自己在 1912 年被浙江政府没收和拍卖的药房，三年来他几乎都在努力，结果也只获得部分成功。[108]此外，满人还发现，很多汉人雇主如果知道或者怀疑某人是满人，就会拒绝雇用他们。例如满人的姓名基本是不常见的双字，因为革命后许多满人仍然遵循旧制，不用族姓只用他们自己的名字。1914 年，12 名通过县级官员选拔考试的旗人，其中 9 人都是这样满人式的名字。[109]

为了尝试避免这样的歧视，许多（虽然不是全部）满人寻求消除他们身上这种明显的非汉人出身标记。他们主要利用退位协议中的规定，即允许他们自由“入籍各州县”（也就是地方行政当局），这样就能改变他们的身份和姓名。北京的八旗制度延续到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满人出旗者需要向内政部提出申请，如果内政部同意了其请求，就会通知申请者原来所在的旗，以及将要入籍
269 的州县。1913 年 3 月 2 日这一天，政府公报记录了六条来自内政部的命令，同意旗人要求改变其身份和姓名的请求。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来自步军统领的一名警察，名叫凌寿，他请求从镶蓝旗达崇阿部的“旗”转变为直隶宛平县的“民”；在同一请求中，他也要求用“关”作为他的姓，并且把自己的名改为德寿。内政部同意了这一请求，并饬令镶蓝旗和宛平县知照。满人改名字通常是在原来名字上加一个汉姓（如关），但如凌寿一样，有时候也会采用一个全新的名字。[110]

值得注意的是，户籍的改变是从“旗”变为“民”，而不是从“满”变为“汉”。满族作为一个民族的概念在当时肯定存在，第三份的退位协议就把满族视为汉族之外四大民族中的一个。满族同进会的名称中“满族”这个词也是一个证据。但在很大程度上，满人在自我认同以及被他人认同时，还是作为八旗制度的成员而不是一个民族群体。因此，民国初期，对满人最普遍的称呼不是“满族”或者“满人”（由于某些原因，“满人”这个词在革命后的使用情况已经不如革命前广泛），而是“旗人”或其变体，包括新造的“旗籍人”和“旗族”一词。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在1929年到1930年游历了整个满洲，发现：

> “满人”一词在交谈中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几乎从不使用，在书写中也很少用到……最通用的词汇是“旗人”，这既包括汉旗，也包括满旗。相应的，非旗人的称呼就是“民”。[111]

当然，只要八旗制度继续存在（一直延续到1924年），就可以理解满人等同于八旗成员。

除了改身份和用汉姓，满人还尝试用其他方式来隐藏其出身以被视作汉人。一些人放弃他们的世袭定居地（如满城），居住于汉人之中并和汉人一起工作。例如，京旗三个守卫营中的一个营 *270*
共有100多户旗人，他们在当地一直居住到清朝结束，但只有20户居住到20世纪40年代末，其他的人都迁走了。满人也不再遵守满人习俗和穿满人衣服，他们藏起家谱，在一些地方，由于口语被当地人排挤，于是改变语言（例如，由普通话变为当地方言），他们甚至与非旗人通婚，通常是满人女子嫁给汉人男子，因为满人男子太穷了而不具有吸引力。总之，他们至少在外人面前不承认自己是满人。燕京大学的社会学家于1928年对附近的一个属于京旗守卫营的村庄进行调查，他们发现2 437名居民中承认是满人的不到3%。“我们怀疑一些满人可能在调查中隐瞒其出身，因为满人通常不喜欢人们知道他们是满人。”民国初年，许多满人认为，他们只有放弃满人身份，才能融入民国社会。当时，北京的一名医生是满人瓜尔佳氏，政府没有什么明显理由，只因为他是

满人，就拒绝颁给他医生执照。他向内政部提出请求，要求改变身份由旗人变为民，并且用三个字的汉人姓名（李承荫）。变更在1916年被批准，他马上获得了执照。[112]

总之，民国政权对满人的政策是不一致的。一方面，政府必须信守承诺，按照退位协议中的规定继续提供旗兵饷银，至少在北京几乎一半的旗人靠饷银生活，直到1924年冯玉祥上台才彻底停发饷银。很明显，对于清朝没能解决的八旗生计问题，民国政府也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另一方面，新政权在消除革命党人控诉的满人七宗罪过程中，并没有如退位协议中承诺的那样平等公正地对待满人，满人自己大约也是这样认为的。新政府废除了满人的特权地位，废除了八旗制度和驻防八旗，结束了满汉隔离的状态，把满人从中国社会的特权位置赶下来。然而，对于满人来说，其代价是受到普遍的歧视，民族认同感被侵蚀，似乎面临着被汉人逐渐同化的命运。

271

1928年后的皇室和满人

溥仪1924年被逐出紫禁城和清东陵1928年被盗挖，这两件事正好与北京旗兵最后停发饷银相吻合。从此以后，清皇室和普通满人完全靠自己了。在民国初年之后三个不同政权——国民政府、日本扶植的“满洲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下，他们会遭遇什么样的处境呢？

大体上来说，蒋介石和国民党不重视溥仪，他自1925年后一直居住在天津的日本租界。1931年末日本侵占了中国东三省，并提议让溥仪担任傀儡政府的元首，国民党才对溥仪有了兴趣。为了劝阻溥仪与日本合作，蒋介石派他的特使，当时任职于国民党监察院的前清官员高友唐去拜访溥仪。根据高友唐的公开记录和溥仪的自传，高友唐带去了一份令人惊异的建议，即蒋介石承诺把溥仪安排在北京或者上海，并支付其所有费用，如果溥仪真诚地支持国民政府，他就会恢复优待条款和皇室每年的津贴，任命满族代表到政府最高机关，保证将来所有政治机构中将按照蒙古

和西藏的同样标准安排满族代表。虽然蒋介石的提议包括恢复优待条款，但这只是部分恢复，因为没有提出让溥仪回到紫禁城或者颐和园，也没有承诺恢复他的皇帝头衔。然而，溥仪怀疑蒋介石是否能履行他的承诺。他提及，国民党不管军事法庭的审判结果，一直没有对盗挖清朝陵墓的犯罪士兵进行惩罚。[113]溥仪最终决定投靠日本人，而国民党也没有和他进一步交涉。

日本人想要一个清廷皇室成员来领导伪满洲政权，但溥仪不是唯一的人选。日本人以前与善耆合作过，因此善耆是合乎逻辑的选择，但他在1922年就死了。另一名自荐的候选人是溥伟，他与善耆一样激烈反对清帝退位，后来他成了反对共和的保皇派。溥伟开始避难于德国（后来是日本）在青岛的租界地，青岛于1922年回归中国后，他搬到日本在南满关东的租界地大连。1931 272
年9月野心勃勃的关东军占领了沈阳，溥伟满心欢喜地急切自荐，希望领导“满洲独立运动”。他于10月到了沈阳，在这里他召集了大规模的市民集会，领导了一个原先受日本支持的团体，大声疾呼要与日本人合作进行“满人治满”。他还祭奠了附近的满族先祖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陵墓。然而，日本人不久告诉溥伟他们另有安排，并迅速把他送回了大连。这和1908年的情况一样，当时他们两人都是继承光绪皇帝皇位的人选，结果他被排除在外而溥仪继位。六年后，溥伟去世。[114]

溥仪拒绝了蒋介石的请求后，于1931年11月中旬秘密离开了天津，前往旅顺与关东军谈判合作的条件。溥仪及其支持者希望不仅恢复君主政体，而且要恢复清王朝。但日本人只同意恢复君主政体，而且希望有所延迟。“满洲国”在1932年3月1日举行成立典礼，当时以共和政体的形式出现，溥仪成为“执政”。只是在二周年纪念时，“满洲国”才变成了“满洲帝国”，溥仪这才当上了“皇帝”。[115]在为新政体选择名字和成立时间时，日本人深思熟虑，利用了这个地区与满人和清朝的传统历史联系。尤其是，“满洲国”曾是皇太极改国号为“清”之前使用的名字，而且3月1日也被认为是清朝的吉日。[116]

然而，日本人为恢复清王朝设定了很多限制。“满洲国”都城

不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建都地沈阳，而是定都于吉林长春（改名“新京”）。他们不用晚清的龙旗而用五色旗作为“国旗”，这种五色旗可以追溯到民国初年。1932 年溥仪就职时，日本人不准他祭祀沈阳城外的清朝陵墓，而与他同族的溥伟则在几个月前祭祀了清陵；日本人只允许溥仪经过陵墓时让火车短暂停留，这样他不下车就能“跪拜其祖先的灵魂”。最明显的是，溥仪 1934 年“登基”时，日本人让他成为“满洲帝国”皇帝而不是大清皇帝，用康德年号取代了原来的宣统年号。此外，日本人让溥仪在公开的“登基”典礼上身着军事制服，只有在一个较早的天坛祭天仪
273 式上允许他穿清朝龙袍。最后，1937 年日本人占领北京时，他们没有让溥仪返回紫禁城或者让他把“帝国”从满洲扩大到关内。[117]

虽然清王朝没有恢复，但“满洲国”吸引了清朝皇室的几名成员来效劳。最著名的是溥仪的弟弟溥杰，日本人让他在 1937 年与裕仁天皇的堂妹结婚，如果溥仪死后没有子嗣，他们显然是想让溥杰继承帝位。另一名加入“满洲国”的皇族是宪均，他是强烈反对共和政体的善耆的第十二子，负责一所军事医院。爱新觉罗家族的其他成员都没有在满洲与日本人合作，其中包括溥仪的父亲载沣和叔叔载涛。虽然他们去“满洲国”看过他，但都没有留下来。[118]

在溥仪“登基”11 年之后的 1945 年，随着其后台日本的战败，溥仪作为“满洲帝国”康德皇帝的统治也画上了句号。当他得知裕仁天皇投降后，匆忙发布了自己生命中的第二道退位诏书，并准备逃往东京。但是，他被苏联军队俘虏并带到苏联，在那里他被关押了 5 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哈巴罗夫斯克。1946 年 8 月，作为一名在押犯，他在东京战犯审判中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了 8 天。1950 年 6 月，苏联把溥仪遣送回中国，共产党人把他关押了 9 年。与他一同被关押在辽宁抚顺的还有其他几名与日本人合作过的清朝皇族成员，包括他的弟弟溥杰、善耆的儿子宪均和溥伟的一个名叫小固的儿子。他们都要接受思想改造。[119]

1959 年 10 月 4 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典的特赦令的一部分，溥仪被释放。随后，他自被逐出紫禁城 35 年之后

第一次回到北京。一开始他被安排在植物园工作。1961 年，他被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成为一名“文学和史学工作者”。他的责任是整理从晚清到民国初年的历史资料；另一项任务是把他在监狱中写下的供述进行修改和补充，写一部自传。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于 1964 年出版，英文名字是《从皇帝到平民》（*From Emperor to Citizen*）。溥仪死于 1967 年 10 月 17 日，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去世时他 61 岁，没有子嗣。[120]

当然，共产党人不会承认 1912 年优待条款的有效性，但是他 274
们对一些健在的清朝皇族成员却出人意料地尊重，尤其是那些与溥仪不一样、与“满洲国”保持距离的人。这种对前朝的宽大可能是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一方面，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国民党政权有很大区别，因为国民党憎恨清廷，所以采取了强硬的政策。这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始几年里，共产党给予了溥仪的叔叔载涛突出的（可能是名义上的）政治待遇。载涛在其兄载沣摄政时期，与载洵一道把持了晚清朝廷（载洵 1949 年去世，载沣 1952 年去世）。在载沣摄政时期，载涛比他哥哥更具开放思想，在民国时期，他没有参与任何复辟帝制的活动或者“满洲国”政权。因此，在共产党政府，他的声誉相对较好。可能考虑到他在载沣摄政时期较早地参与了军事事务，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马政局顾问，他在西北大草原上度过了一段时间。1950 年 6 月，载涛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1954 年，他作为满人被北京直辖市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此后，他作为人大代表周游了全国，去看望大量满人群体，例如，1956 年 5 月他参观了广州的一个满人小村。他于 1959 年和 1964 年分别被选为第二、三届人大代表。1970 年 9 月，载涛去世。[121]作为官方承认的政府与满族之间的中间人，载涛的身份与袁世凯任总统期间溥伦的情况并不一样。

“文化大革命”后，载涛的侄子溥杰也开始扮演类似的角色，尽管他过去是一个罪犯。1960 年，溥杰在抚顺监狱被释放，他也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他的哥哥溥仪一年前被释放。次年，他和他的日本妻子及岳母，还有满族小说家老舍一

起与周恩来总理合影（图 15）。1978 年溥杰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3 年、1988 年和 1993 年，他连续三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随着 87 岁的溥杰在 1994 年年初去世，皇室与继来政权之间长期且往往是紧绷的关系最终完结。[122]

图 15　1961 年周恩来总理和满族代表。第一排左起：溥仪（第二），老舍（第三），载涛（第四），周恩来（第六），溥杰（第八）
（《人民画报》，1979（8），39 页）

与此同时，1928 年后在国民政府、日本扶植的“满洲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下，大量满人的情况又是怎样呢？一般来说，每
275 个政权及“满洲国”都根据其整体的民族政策来对待满人。国民党拒绝承认民国初年的多民族社会而赞成民族同化论。民国初年承认中国存在五个主要的民族，满族是其中的一个，并声称所有民族一律平等；而国民党则宣称中国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拒绝满族成为一个单独的民族。他们的民族同化政策可以追溯到孙中山，尽管孙中山本人在这一问题上明显是个两面派。1912 年年底，孙中山会见北京的满人时，他向他们表示自己很赞同当前盛行的“五族一家”的概念。十二年后，在他与共产党合作时，他与改组

后的国民党都承认中国存在许多民族，并如民国初年那样承诺平等对待各族。然而，在这两次表态之间，1921 年 6 月孙中山在其《三民主义》中声称，民族主义只不过实现了推翻“满清”部分，只有创造一个新的“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实现。这种民族观模仿了美国的民族思想，认为“汉族是中心，满、蒙、回、藏其他四个民族要被我们融合”。因此，中华民族基本上等同于“我们汉族”。[123]

蒋介石的民族政策是坚定的民族同化。在 1943 年第一次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中，他坚持中国人是由单一民族构成的，他也称这个单一民族为“中华民族”，并认为这是“多数民族融合”这一长期历史演进过程的产物。而且，继孙中山之后，蒋介石把中华民族等同于汉族。在解释匈奴和古代中国其他民族的消失时，他把他们融入中华民族的这一过程形容为“汉化”。与匈奴一样，满人入主中原后也经历了“种族同化”：“辛亥革命以后，满族与汉族，实已融为一体，更没有歧异的痕迹。”简单地说，根据蒋介石的看法，满族已经完全被融合，他们不再作为一个单独的实体而存在。他们变成了单一的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基本等同于汉族。[124]

由于满人不被承认为一个独特的群体，因此他们没有受到国民党的特殊关照就不足为奇了。与对溥仪一样，国民党唯一关注 276
满人的时候是 1931 年年底。蒋介石在请求溥仪不要与日本人合作的同时，承认满人是一个独立群体，并在国民党政权的各种行政和协商机构中按照蒙古人和藏族人的配置给予满人特殊的代表名额。然而，国民党没能阻止溥仪去关外，因此这一提议也被撤销了。国民党也没有涉及满人的经济困境。他们定都南京，因此与其前几个政权不一样，不必每天面对大量仍然生活在旧都的穷困旗人。虽然南京也曾经是一个驻防城市，但满人数量不多，而且在革命中基本上被清除了。因此，南京政府对满人的政策是“眼不见，心不烦”。

由于国民党的民族同化政策，相比于民国初年，单个满人隐藏其民族身份并融入汉族变得更加紧迫，正如国民党政权所宣称

的那样。国民党时期最著名的作家之一老舍当时不承认自己的满人身份，或者不把任何满人特征的人物放入他当时写的小说中，原因可能就在于此。[125]国民党政权垮台后不久，1953 年人口普查表明，不到 250 万人（这只是晚清时期估算的满人数量的一半）认为自己是满人，原因可能也在于此。如此短的时间范围内消失了巨额人口，这还有别的解释吗？尽管很多满人在共和革命中被杀死，还有更多满人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饿死，但其他满人则是把自己变为汉人而消失了。

国民党政府在 1938 年指责日本人利用“民族自决”的阴谋来分裂和征服中国，“满洲国”的日本人对此感到很恼火，于是公开宣扬多民族的民族政策。因此，“满洲国”诚恳地向其辖境内的不同族群做出了承诺，保证种族平等和融洽。最终，“满洲国”采用了五色旗为“国旗”，与民国初年一样，象征着五个主要民族的团结统一。然而，“满洲国”的五个组成民族与民国初年的五个民族稍有不同，他们是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人和朝鲜族，用日本人及朝鲜族取代了回族和藏族。与蒋介石不一样，日本人不仅重新肯定满族是五个主要民族之一，而且在“满洲国”中把满人置于优越位置。例如，“满洲国”“国旗”的四分之三都是黄色，
277 代表满族，剩下位于左上方的四分之一分为四色条纹，代表其他四个民族。而且，据 F. C. 琼斯（F. C. Jones）记载，日本人“通过恢复满语和满文来努力促进满人的民族意识”。他们甚至尽力笼络远在新疆的说满语的锡伯族人，1939 年的一份“满洲国”刊物称其为“被遗忘的满人”，锡伯族人被描述为“极度渴望回到他们的故地，忧伤地凝望着满洲方向”。然而，“满洲国”的满人数量较少，不到总人口的 3%，原因部分在于汉人在新近几十年里大量移民到这里，还有一些原因是许多满人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汉人的生活方式。“满洲国”杂志《当代满人》声称，中国北方的满人还保留了“他们在房屋、服饰和发式上的民族特征”。[126]

据琼斯记载，日本人为了回应溥仪“满人治满”的信条，也“努力恢复满人对‘满洲国’的管理”。然而，在最初被任命的政府高级官员中，只有两个人的名字看起来像满人的。一名是满洲

旗人熙洽（1884—1952），他1911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自其毕业返回国内，20余年来一直活跃于东北军界，他当时是“满洲国”政府的“财政总长”兼“吉林省省长”。另一名满人是贵福，他是“满洲国”的一名“议员”。保皇派金梁自1926年以来一直在沈阳工作，他当时是“东三省博物馆馆长”和《清史稿》的编修，1931年他逃离东北前往北京，由于退休而身无分文，他只有靠出卖书法作品来维持生活。1962年金梁去世。[127]金梁的出走标志着“满洲国”在吸引普通满人方面的全面失败。

1949年共产党掌权后，奉行多民族政策。共产党宣称自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于1952年正式承认满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50多个少数民族之一，满族人口占当时整个国家人口7%左右。由于满族大量融入了汉族文化，因此他们作为一个独特群体的身份，需要对斯大林那个已被普遍接受的“民族”定义进行一个相当宽松的解释。斯大林认为，“民族”有四个共同的主要特征：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思想倾向或文化。20世纪50年代中期，田野调查者发现，除了锡伯族和黑龙江上游的少量原居民，他们所到之处几乎所有满人都不能读或者写满语。满人也没有聚 278
居于任何一个地域。他们也缺乏共同的经济生活。而且，他们的思想倾向与汉人几乎没有任何不同。然而，共产党发现，清朝的八旗制度是既能把满人与汉族和许多其他民族区分开来，又能把满人统一成一个独特整体的一个关键因素。正如20世纪50年代对北京满人进行田野调查的作者们解释的那样：

> 可以肯定，“八旗制度”与“满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从满族的构成这一立场来看，二者又是不可分离的。进入八旗的蒙古人、汉人和其他民族，连同他们的政治身份和经济利益都要受到八旗制度的同样约束。经过长时间的战争和谋生，他们的生活习俗、使用的语言甚至他们的思想都在很大程度上与八旗满人一样了。[128]

换句话说，清朝对八旗制度下所有人员进行的“满化”政策，把共同的生活、语言、思想强加给了所有八旗成员，这样就满足

了斯大林“民族”定义的三个标准，只缺共同的地域这一标准了。

晚清和民国初年把满人视为旗人的概念形成了共产党对满人进行定义的基础，只是词语发生了变化。原来的“旗人”一词被废弃，但这个词汇并没有消失，尤其是在民间话语中依然存在。阎云翔于 1991 年在黑龙江双城县的一个旗人村子里做田野调查，据他的描述，满族和汉族仍然互相称对方“旗人”和“民人”。[129]晚清时期开始使用并在国民党时期极为盛行的一个词语是“满族”，在正式出版物中几乎强制性使用这一术语。相应的，与之对应的词语是“汉族”。

共产党通常把满人等同于清朝旗人的后代，但有两个例外。第一个例外是，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的后代可以恢复他们祖先原来的民族身份，只要他们愿意。因此，广州许多汉军八旗的后代要求被划为汉族，而成都一名名叫刘显之的前蒙古镶白旗人则把
279 自己视为蒙古人。也有许多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的后代选择登记为满人。例如，据 20 世纪 50 年代另一名田野调查者的记载，锦州地区 22 638 名“满人”中，只有 10％的满人是满洲八旗的子孙，其余全部都是汉军八旗的后代。[130]

第二个例外是，清朝八旗制度中五个新的满人群体被正式承认为独立的民族，独立且区别于主要的满人群体。关于居住在嫩江及其支流地区的达斡尔族，人类学者费孝通描述了这一民族认定是如何做出的。因为他们东靠黑龙江，毗邻通古斯族而居，又因为他们在清初被合并到了八旗之中，根据满人通常等同于旗人这一原则，似乎达斡尔族被划为满族无可非议。或者，因为他们西临内蒙古，毗邻蒙古族而居，又因为他们说的语言与蒙古语很相近，他们被划为蒙古族也是正当的。或者，他们可以被视为一个既不是蒙古族也不是满族的独立群体，因为一方面，他们说的蒙古语与通行的蒙古语差别很大，另一方面，不管他们居住位置怎么靠近，也不管八旗成员的身份，“坚决反对被说满语的人所同化”。最后，政府决定将达斡尔族区别于满族和蒙古族，构成一个独立的民族。[131]除了达斡尔族，辽宁和新疆的锡伯族、内蒙古东北部的鄂温克族（以前叫索伦族）和鄂伦春族、黑龙江北部的赫

哲族，他们都被划为不同的民族。

据 1953 年的人口普查，满族人口为 2 418 931 人，居中国少数民族的第七位，排在壮族、维吾尔族、回族、彝族、藏族和苗族之后，蒙古族之前。曾作为清朝八旗一部分的其他五个少数民族人数极少，达斡尔族 44 100 人，锡伯族 19 000 人，鄂温克族 6 200 人，鄂伦春族 2 200 人，赫哲族是中国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只有 450 人。六个与满人相关的群体共计 2 490 881 人，只占晚清旗人的一半左右。[132]

除了正式承认满族，共产党还给予他们其他各种认可和支持，而这是民国初年和国民党都拒绝给予的。尤其是，他们在国家政府机构中规定了满族代表。例如，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280*
会召开时，1 200 多名代表中有 18 名满族代表（包括载涛）。[133]为了扭转近代以来的反满偏见，共产党试图删除让满族人感到反感的某些词语。因此，1956 年 2 月，国务院命令书籍和报纸出版单位不要用“满清”来称呼满族人。这个词是革命党人和后来的国民党（包括孙中山）为了称呼旧满人政权而使用的词语，后来就用于整个满族人群。许多满族人反对把满族这一群体与清王朝的统治者联系在一起。[134]

总之，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新政权对待满族的态度应该让满人感到满意。举例来说，老舍不像在国民党时期那样隐藏自己的满洲旗人身份。从 1954 年到 1964 年，他一直用自己的真名舒舍予，而不是笔名，他作为北京的满族代表参加过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的汉姓来自原先的满姓舒穆禄的第一个字）。1961 年与周恩来总理的合影照片中，老舍——还有皇族的载涛、溥仪、溥杰——就代表了满族。相比于以前的沉默寡言，老舍开始以满族人为素材进行写作。1957 年创作的剧作《茶馆》中，主角是北京的两名旗人，而他 20 世纪 60 年代初创作的、直到 1966 年去世很久以后才出版的小说《正红旗下》是一部自传体小说，描写了他 1899 年出生以来的北京满人家庭和亲戚。[135]由于其他旗人及其子孙也不再隐藏他们的民族身份，前几十年发生的满族人口急剧下降趋势得以终止并开始回升。根据 1982 年人口普

查，满族人口已经上升到4 299 159人，几乎是1953年的两倍。那时，满族人口数量超过藏族但仍排在壮族、回族、维吾尔族、彝族和苗族之后。以前附属于清朝八旗制度的其他五个少数民族人口也大大增加，从71 950增加到202 594人。然而，1982年，满族、达斡尔族、锡伯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和赫哲族的总人口数仍然比晚清500万旗人的数量略少一些。[136]

直到20世纪80年代，满族有一个方面受到的待遇不如其他少数民族。这就是满族是十一个较大的少数民族中唯一没有建立大规模自治区域的民族。在这种自治区域，少数民族可以自由地实
281 行和保存自己的生活方式。1956年和1957年，满族被批准在黑龙江和河北建立一些“民族乡”，其中的大部分在1958年被解散或者被并入了人民公社。最主要的原因是，满族与其他主要少数民族不一样，他们在地理分布上很不集中。据1982年人口普查，大部分满族人居住于辽宁、吉林、黑龙江东北三省以及河北省和北京。具体来说，46%的满族人在辽宁，12%在吉林，21%在黑龙江，换句话说，79%的满人在“满洲”。另外9%的满族人在河北，3%在北京，剩下9%的满族人散居于其他省份，尤其是曾经的清朝驻防城市。然而，所有省份满族人的人数只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即使满族人口众多的辽宁省，人数也只占辽宁省总人口的5.6%，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据何溥英在1987年的研究，共产党领导人在20世纪50年代“极为关心”满族人高度自治问题，但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作者没有透露，这个问题当时没有解决。[137]

直到“文化大革命”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历史”障碍才终于得以克服，满族最终被允许在比乡更高一级的行政区实行自治。因此，1985年和1986年设立了5个满族自治县，其中三个县在辽宁东部：新宾县（满族人口占总人口的52.8%）、岫岩县（71.7%）和凤城县（54.5%），其他两个自治县在河北北部：青龙县（51.6%）、丰宁县（48.6%）。到1994年，建立了另外8个满族自治县——辽宁5个县，河北2个县（其中一个是围场，是一个满族蒙古族联合自治县）。同时，340个民族自治乡也建立起来。

例如，其中一个民族自治乡是河北北部遵化县东陵乡，这里41.3%的人是满族人，他们是守卫清东陵的驻防八旗的后代，国民党军队曾于1928年盗挖了清东陵。在这些地方，最明显表示他们自治的是公共建筑上的标记均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138]

20世纪80年代也见证了空前的满族历史和文化热。很多由满族人写的关于满族的出版物迅速增加。其中最有分量的是1985年创办的学术期刊《满族研究》。其他的出版物包括对一些满族群体的人类学个案研究，如关于黑龙江省富裕县三家子屯村的《满族 282
的历史与生活》和辽宁省满人自治县的《满族在岫岩》，这两本书分别在1981年和1984年公开出版。1985年出现的另一部人类学著作是《满族社会历史调查》，这是关于20世纪50年代各个满族群体的田野调查选编。稍欠学术性且更加个人化的研究是金启孮研究北京及其周边地区满人的两组系列论文，连载于1985年到1989年的《满族研究》，这两组系列论文主要针对民国初年的满人，并描写了金启孮作为一名京籍旗人自己的亲身经历。另一部类似的著作是1990年出版的汪宗猷所著的《广州满族简史》，汪宗猷生于当地驻防八旗满洲镶红旗家庭。

满族文化热的另一个表现是满人试图保护和恢复满语。满族人群体长期以来停止写满文和说满语。20世纪80年代，唯一使用满语的一个较大群体是新疆西部伊犁河谷的锡伯族，尽管他们的祖先属于清朝的八旗体系，但他们还是被承认为一个独立于满族的民族。在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锡伯族人甚至以满文的变体锡伯文发行了一份报纸。[139]为了挽救逐渐式微的满语，1985年九名满族人和一名蒙古人创办了北京满文学院，这是一所“业余学校”（学生在业余时间才参加学习），大约150人报名，超过半数的学生是满族人，大部分年龄在20岁和30出头。学院的第一个班级是两年制，毕业于1987年。[140]然而，可能由于满文的使用范围比较有限，满文没有能够和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壮文等少数民族文字一起出现在人民币上。

最能表明20世纪80年代满族欣欣向荣状态的是人口的巨额增加，从1982年的4 299 159人增加到1990年的9 821 180人。1982

年以前的三十年里，满族人口增长了近 78%，而随后的八年里则增加了 128%多！尽管 1952 年到 1982 年间，满族人口的年增长率为 2%，但 1982 年到 1990 年间，年增长率则达到了 10.9%。在官方认可的五十六个少数民族中，满族在这一阶段是人口增加速度第四快的民族。因此，满族成为中国人口第二的少数民族，排在
283 彝族、维吾尔族、苗族甚至回族之前。只有广西的壮族仍然是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过去附属于满洲八旗的五个少数民族——锡伯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和赫哲族——也超过了平均增长水平，1990 年，这五个少数民族人口总数达到 331 729。他们和满族加起来总人口超过了 1 000 万，大概相当于此时中国总人口的 1%。[141]与其他大多数少数民族一样，满族不需要执行政府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满族人口的剧增不能归因于人口增长率（例如，汉族人口的年增长率才 1.3%）。这种人口激增主要是因为满族人不断增强的民族认同。与以前的老舍一样，他们先前被看做汉人，现在他们想承认其满人身份。清朝被推翻后满族人口下降了 50%，这要归因于民国初年反满导致的歧视政策和国民党政府采取的民族同化政策；20 世纪 80 年代满族人口增加了 128%多，这或许是因为政府的多民族政策和文化自主。例如，李承荫这名北京医生曾于 1916 年要求从旗人变为民，而他的女儿利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宽松氛围正式恢复满族身份（虽然不是她原来祖先的满姓）。[142]由于这种个人恢复满族身份不断累积，20 世纪 80 年代满族最终恢复了在 1911 年及以后所有失去的人口数量。这是自辛亥革命以来，满族人口在数量上第一次超过了晚清时期。

结　语

清廷和八旗制度的历史并没有在辛亥革命中结束。虽然逐渐式微，但清皇室和八旗制度又存在了十多年，因为民国初年的几任政府进行了认真但逐渐递减的努力来遵守和执行让革命获得相对容易成功的退位协议。虽然民初的财政都十分艰难，但每任政府都继续如承诺的那样资助皇室和旗人。对于皇室来说，除了在

1917年与张勋进行了妄想式的合作外，也很努力遵守退位协议的规定。虽然皇室继续居住在紫禁城的内廷显然违背了协议，但这也是在共和政权自愿同意的情况下发生的。随着冯玉祥把溥仪逐出紫禁城并剥夺了他的皇帝头衔，以及随后国民党军队破坏了清 284
皇陵，民国与皇室和旗人的这种暂时妥协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最终结束。当时，八旗制度内的人事任命也停止了，给旗兵的饷银和清廷的津贴都停发了。当日本人扶植“满洲国”时，皇室的成员而不是清王朝本身过上了一种时间并不长的“新生活”。然而，对于普通旗人来说没有第二次机会了，他们不仅要在经济上努力赚钱糊口，而且在精神上也要努力适应新的环境。由于他们的努力，他们在1949年后从清朝统治下的世袭军事阶层转变为一个民族，“旗人”转化成了“满族”。

【注释】

[1] 关于“自由共和国”，参见 Young, Ernest P.（杨欧纳），*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 Liberalism and Dictatorship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袁世凯与民初之自由与独裁问题》），第4章。

[2] Ch'en, Jerome（陈志让），*Yuan Shih-k'ai*（《袁世凯》），106～107页。《北华捷报》，1912-03-16，729页；1913-01-25，262页；1913-02-22，563页；1913-03-01，645页。《顺天时报》，1912-04-07，7页；1912-04-30，7页；1912-08-31，5页；1912-10-16，7页；1912-12-21，5页。《时报》，1913-04-25，4页。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389页。

[3]《顺天时报》，1912-12-24，5页。《时报》，1913-01-07，3页；1913-02-22，3页；1913-04-07，2页；1913-04-09，2页。Bredon, Juliet（裴丽珠），*Peking*（《北京纪胜》），84、119、134页。Gamble, Sidney D.（甘博），*Peking: A Social Survey*（《北京社会调查》），61、236～237页。Johnston, Reginald F(庄士敦)，*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紫禁城的黄昏》），178、305页。也见 Shi, Mingzheng（史明正），“From Imperial Gardens to Public Parks: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Spac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Beijing”（《从皇家园林到公园：二十世纪初北京城市空间的转变》），in *Modern China*（《现代中国》），1998（24），219～254页。

[4] 伍廷芳：《共和关键录》，第1编，72页。《时报》1913-10-11，2～3页；1915-10-24，3页。忻平等编：《民国社会大观》，952页。Bredon,

Juliet（裴丽珠），*Peking*（《北京纪胜》），89 页。Bonner，Joey（波纳），*Wang Kuo-wei：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王国维传》），276 页注 33。Johnston，Reginald F.（庄士敦），*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紫禁城的黄昏》），169～172、175、300～302、357 页。

[5]《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3A》，143、174 页。Aisin-Gioro（爱新觉罗·溥仪），*From Emperor to Citizen*（《我的前半生》），80 页。杨学琛、周远廉：《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376～377 页。《时报》，1913-03-10，2 页；1913-03-11，2 页。溥杰：《清宫会亲见闻》，见《晚清宫廷生活见闻》，36～47 页。

[6]《时报》，1912-03-11，2 页；1912-09-15，2 页；1913-10-11，2～3 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2B》，243～244 页。《顺天时报》，1912-09-13，2、7 页。《北华捷报》，1913-10-18，184～185 页。

[7]《时报》，1912-03-24，2 页；1912-05-26，2 页；1912-08-14，2 页；1912-11-24，2 页。《顺天时报》，1912-06-13，7 页；1912-09-29，5 页；1912-12-03，5 页；1912-12-21，5 页。

[8]《顺天时报》，1912-04-09，7 页；1912-06-13，7 页；1912-10-26，7 页；1912-12-03，5 页。《时报》，1912-04-20，2 页。《北华捷报》，1913-03-01，609 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3A》，500 页。

[9]《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3A》，501 页；1913B，637～638 页；1915，716 页。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57 页。《时报》，1913-01-28，2 页；1913-11-14，2 页；1913-12-16，2 页。

[10]《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3A》，500 页。《时报》，1912-10-17，3 页；1913-01-09，3 页；1913-10-11，4 页。《顺天时报》，1912-04-03，7 页；1912-05-02，2 页。《北华捷报》，1912-10-19，178 页。吴兆清：《清末禁卫军》，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2），22 页。

[11] 美国总参谋部档案，6283-11，“Casual Military Notes”（临时军事记录），1912 年 5 月 4 日，附件 2。《时报》，1912-02-23，2 页；1913-01-07，3 页；1913-01-09，3 页；1913-10-20，2 页。《顺天时报》，1912-09-11，5 页；1912-10-20，5 页。吴兆清：《清末禁卫军》，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2），22 页。载涛：《禁卫军之建立与改变》，见郑怀义、张建设：《末代皇叔载涛沉浮录》，241 页。

[12]《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2B》，239 页。《顺天时报》，1912-09-28，7 页；1912-11-24，7 页。《时报》，1913-06-27，2 页。

[13] 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33～40 页。Jansen，Marius B.（詹

森），*The Japanese and Sun Yat-sen*（《日本人和孙中山》），137～140 页。查时杰：《清末的宗社党》，载《"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1978，（5），132～139 页。宪均：《肃亲王善耆的复辟活动》，见《晚清宫廷生活见闻》，308～315 页。

［14］《顺天时报》，1912-04-18，7 页。1912-04-19，2 页；1912-05-25，5 页；1912-05-26，5 页；1912-05-28，5 页。《时报》，1912-4-20，3 页。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3～8 页。

［15］《顺天时报》，1912-04-04，7 页；1912-04-06，7 页；1912-04-07，7 页；1912-05-26，7 页。《时报》，1912-04-07，2 页。《东方杂志》，第 8 卷第 11 号，"中国大事记"，7 页（1912 年 5 月）。

［16］《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4A》，554～556、588～589、606、704～710 页。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383～384 页。《时报》，1914-04-28，2 页；1914-05-01，4 页。

［17］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64～64、384 页。Johnston，Reginald F.（庄士敦），*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紫禁城的黄昏》），98～100 页。

［18］《时报》，1914-04-28，2 页；1914-05-01，4 页；1915-11-15，1 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4B》，719 页。

［19］《时报》，1914-02-08，2 页；1914-02-23，5 页；1914-11-30，4 页；1915-02-19，2 页；1915-05-24，5 页；1915-08-30，6 页；1915-09-08，4 页；1915-12-25，5 页。载涛：《禁卫军之建立与改变》，见郑怀义、张建设：《末代皇叔载涛沉浮录》，240 页。章伯锋、李宗一编：《北洋军阀（1912- 1928）》，第 6 卷，370 页。吴兆清：《清末禁卫军》，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2），22 页。

［20］《时报》，1915-08-27，2 页；1915-09-05，2 页；1915-09-08，4 页；1915-09-15，4 页；1915-09-22，3 页；1915-12-18，2 页；1915-12-27，2 页。Ch'en，Jerome（陈志让），*Yuan Shih-k'ai*（《袁世凯》），174 页。Young，Ernest P.（杨欧纳），*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Liberalism and Dictatorship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袁世凯与民初之自由与独裁问题》），215、222 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5》，927 页。Johnston，Reginald F.（庄士敦），*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紫禁城的黄昏》），120～121 页。

［21］《时报》，1915-10-13，2～3 页；1915-10-21，2 页。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385 页。

[22]《时报》，1915-09-26，2页；1915-09-29，3页；1915-12-15，2页。《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9卷，199页。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389页。

[23] Boorman，Howard L.（包华德），Richard C. Howard（里查德·霍华德）eds.，*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词典》），第2卷，16～17页。

[24]《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6》，636、664页。

[25] 同上书，513～521、725页；1917，40、320页。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385～387页。Johnston，Reginald F.（庄士敦），*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紫禁城的黄昏》），105页。

[26]《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6》，597页。章伯锋、李宗一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6卷，543页。

[27] 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212、223～225页。

[28]《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7》，490～491页。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223～225页。

[29]《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7》，555～556页。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246、262、267～268、339～343页。

[30] 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327、329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7》，581～582页。Sheridan，James E.（奚瑞丹），*Chinese Warlord：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中国军阀：冯玉祥传》），注释66。冯玉祥：《我的生活》，510页。

[31] Aisin-Gioro（爱新觉罗·溥仪），*From Emperor to Citizen*（《我的前半生》），94～96页。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227、320、326～330页。《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9卷，200页。忻平等：《民国社会大观》，701～702页。

[32] Johnston，Reginald F.（庄士敦），*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紫禁城的黄昏》），142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8B》，373页；1921B，627～628页。Aisin-Gioro（爱新觉罗·溥仪），*From Emperor to Citizen*（《我的前半生》），120页。

[33] Aisin-Gioro（爱新觉罗·溥仪），*From Emperor to Citizen*（《我的前半生》），114、119页。Johnston，Reginald F.（庄士敦），*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紫禁城的黄昏》），224～225、300～302页。Bonner，Joey（波纳），*Wang Kuo-wei：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王国维传》），276页注33。庄士敦在第330页中用汉语复述了这一文献。然而，在胡平生的《民国

初期的复辟派》却没有涉及这一协议。

[34] Aisin-Gioro（爱新觉罗·溥仪），*From Emperor to Citizen*（《我的前半生》），114页。

[35]《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7》，555、733、903页。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268页。载涛：《禁卫军之建立与改变》，见郑怀义、张建设：《末代皇叔载涛沉浮录》，240～241页。章伯锋、李宗一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1卷，12、104页；第6卷，370～371页。

[36] 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387～388页。Aisin-Gioro（爱新觉罗·溥仪），*From Emperor to Citizen*（《我的前半生》），123、141～142页。Boorman，Howard L.（包华德），Richard C. Howard（里查德·霍华德）eds.，*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词典》），第1卷，72页；第3卷，81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22B》，161页；1924B，839～840页。Bonner，Joey（波纳），*Wang Kuo-wei：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王国维传》），201～204页。Johnston，Reginald F.（庄士敦），*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紫禁城的黄昏》），142～143页。

[37] Johnston，Reginald F.（庄士敦），*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紫禁城的黄昏》），163～167、231～232、273～274，337～340页。Aisin-Gioro（爱新觉罗·溥仪），*From Emperor to Citizen*（《我的前半生》），113～121、132～136、141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23B》，77页。

[38] 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390、395～397页。Aisin-Gioro（爱新觉罗·溥仪），*From Emperor to Citizen*（《我的前半生》），139～142页。Johnston，Reginald F.（庄士敦），*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紫禁城的黄昏》），354～361、366～367页。

[39] 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407～412页。冯玉祥：《我的生活》，509～510页。Aisin-Gioro（爱新觉罗·溥仪），*From Emperor to Citizen*（《我的前半生》），144～149页。Johnston，Reginald F.（庄士敦），*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紫禁城的黄昏》），389～391页。

[40] Aisin-Gioro（爱新觉罗·溥仪），*From Emperor to Citizen*（《我的前半生》），148～169页。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410～411、416～425页。

[41] 杨学琛、周远廉：《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405、412页。

[42] 载涛：《禁卫军之建立与改变》，见郑怀义、张建设：《末代皇叔载涛沉浮录》，241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24B》，759页。

[43] 吴相湘：《清帝退位与出宫经过》，见《晚清宫廷与人物》，118～119页。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413、462页。Johnston，Reginald F.（庄士敦），*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紫禁城的黄昏》），439～442页。

[44] 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414～415页。Johnston，Reginald F.（庄士敦），*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紫禁城的黄昏》），405～406页。Aisin-Gioro（爱新觉罗·溥仪），*From Emperor to Citizen*（《我的前半生》），157页。最近研究同样批评溥仪的被逐，参见喻大华：《"清室优待条件"新论：兼谈溥仪前往东北的一个原因》，载《近代史研究》，1994（1），172～176页。

[45] 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414～416、420页。Aisin-Gioro（爱新觉罗·溥仪），*From Emperor to Citizen*（《我的前半生》），153页。Johnston，Reginald F.（庄士敦），*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紫禁城的黄昏》），410～411页。冯玉祥：《我的生活》，510～511页。关于"善后会议"，参见Boorman，Howard L.（包华德），Richard C. Howard（里查德·霍华德）eds.，*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词典》），第3卷，334～335页。

[46] 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425～427页。忻平等：《民国社会大观》，952页。Shi，Mingzheng（史明正），"From Imperial Gardens to Public Parks：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Spac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Beijing"（《从皇家园林到公园：二十世纪初北京城市空间的转变》），in *Modern China*（《现代中国》），1998（24），238～239页。

[47] 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463～467、546页。Lo，Jung-pang（罗荣邦），*K'ang Yu-wei：A Biography and a Symposium*（《康有为：传记与专题》），248～249页。

[48] 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442～443页。

[49] 同上书，443～449、453～454页。Crossley，Pamela Kyle（柯娇燕），*Orphan Warriors：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孤军：三代满族人和清朝的灭亡》），210页。

[50] 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449～457页。Aisin-Gioro（爱新觉罗·溥仪），*From Emperor to Citizen*（《我的前半生》），194～196页。

[51] 总体情况，参见程巍昆：《民初"剪辫热"述论》，载《社会科学研究》，1987（3），71～77页。

[52]《时报》，宣统三年九月八日，3页；宣统三年十月二十六日，4页。

[53]《北华捷报》，1911-12-16，738页，1911-12-23，806页。《顺天

时报》，宣统三年十二月三日，4 页。

[54]《时报》，1912-01-01，3 页；1912-01-02，3 页。《顺天时报》，1912-07-17，7 页；1912-07-19，7 页。

[55]《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2A》，312 页。

[56] Morrison，G. E.（莫理循），*The Correspondence of G. E. Morrison，1895-1912*（《莫理循通信集（1895—1912）》），742 页。恽宝惠：《辛亥冯国璋接统禁卫军后的活动》，见《文史资料选辑》，1960（9），119～120 页。《时报》，1912-05-06，2 页。《顺天时报》，1912-10-31，5 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2B》，443～444 页。Young，Ernest P.（杨欧纳），*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Liberalism and Dictatorship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袁世凯与民初之自由与独裁问题》），204～205 页。

[57] Bonner，Joey（波纳），*Wang Kuo-wei：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王国维传》），208、214 页。

[58] Sheridan，James E.（奚瑞丹），*Chinese Warlord：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中国军阀：冯玉祥传》），113、116 页。Franck，Harry A.（亨瑞·福兰克），*Roving through Southern China*（《穿越华南》），551 页。Cochran，Sherman（高家龙），Hsieh，Andrew C. K.（安德鲁），*One Day in China，May 21，1936*（《中国的一天：1936 年 5 月 21 日》），73 页。

[59] Shirokogoroff，S. M.（史禄国），*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anchus：A Study of the Manchu Clan Organization*（《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第 4 章，148 页。

[60] Wadley，Stephen A.（斯蒂芬·瓦德雷），"Altaic Influences on Beijing Dialect：The Manchu Case"（《阿尔泰语对北京方言的影响：以满语为例》），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美国东方学会杂志》），1996，（16），99～104 页。

[61] Esherick（周锡瑞），"Founding a Republic，Electing a President：How Sun Yat-sen Become Goufu"（《创建共和，选举总统：孙中山怎样成为国父》），in *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中国的共和革命》），148 页。Finnane，Antonia（安东篱），"What Should Women Wear? A National Problem"（《女人应该穿什么？一个民族问题》），in *Modern China*（《现代中国》），1966（22），101、107 页。Fitzgerald，John（费约翰），*Awakening China：Politics，Culture，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23～25 页。

[62] Finnane，Antonia（安东篱），"What Should Women Wear? A Na-

tional Problem”（《女人应该穿什么？一个民族问题》），in *Modern China*（《现代中国》），1966（22）。忻平等：《民国社会大观》，595～588 页。Garrett（瓦纳瑞·嘉瑞特），*Traditional Chinese Clothing*（《香港和华南的中国传统服饰，1840—1980》），15～20 页。关于长袍和旗袍在民国时代的发展演变可以参见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537、539～540 页。

[63]《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5》，942～943 页。

[64]《顺天时报》，1912-10-10，7 页。《时报》，1914-11-13，2 页。

[65] 佟佳江：《清代八旗制度消亡时间新议》，载《满族研究》，1994（5），101～105 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2B》，70 页；1924A，77 页。

[66] 佟佳江：《清代八旗制度消亡时间新议》，载《满族研究》，1994（5），107 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4A》，793～794 页。

[67]《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5》，775、903～907 页。

[68] 佟佳江：《清代八旗制度消亡时间新议》，载《满族研究》，1994（5），107 页。

[69] Gamble，Sidney D.（甘博），*Peking：A Social Survey*（《北京社会调查》），99 页。

[70]《满族社会历史调查》，89、124～129 页。

[71]《顺天时报》，1912-11-16，4 页。也可参见《满族简史》，179 页。

[72]《时报》，1912-04-09，3 页；1912-05-09，3 页。

[73]《顺天时报》，1912-07-14，5 页。

[74] 汪宗猷：《二百年来广州满族经济生活的变化》，见《广东文史资料》，第 35 辑，64～65 页。舒仲玑：《辛亥革命时广州八旗军投诚经过》，见《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史料专辑》下册，223 页。

[75]《顺天时报》，1912-07-12，5 页；1912-11-23，3 页。《时报》，1912-11-15，2 页。《满族简史》，179 页。

[76] 佟佳江：《清代八旗制度消亡时间新议》，载《满族研究》，1994（5），104～106、108 页。《时报》，1913-12-20，2 页。

[77]《满族社会历史调查》，89 页。佟佳江：《清代八旗制度消亡时间新议》，载《满族研究》，1994（5），104 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24B》，789 页。韩延龙、苏亦工等：《中国近代警察制度》，352 页。

[78]《顺天时报》，1912-04-18，2 页；1912-08-18，7 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4A》，648 页；1914B，530、971 页。《时报》，1914-02-03，4～5 页；1914-02-25，3～4 页。《旗族月报》，第 6 期，“时评”，

1～3 页（1914 年 11 月）。

[79]《顺天时报》，1912-04-21，2 页；1912-08-07，5 页。《议事报》（北京），1929-02-18，7 页。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407 页。Zhou Qiuguang（周秋光），"Modern Chinese Educational Philanthropy: Xiong Xiling and the Xiangshan Children's Home"（《近代中国的慈善教育业：熊希龄和香山慈幼院》），in *Republican China*（《中华民国》），1993，19，（1），61 页。非常感谢戴维·斯特兰德（David Strand）把《议事报》分享给我。

[80]《时报》，1912-05-09，3 页；1912-12-25，3 页；1915-10-02，5 页。《顺天时报》，1912-06-09，7 页；1912-11-10，4 页。《国民新报》（汉口），1918-05-20。对于爱德华·麦克考德（Edward Mccord）提供便利引用《国民新报》的材料，我深表谢意。

[81] [82]《满族简史》，179 页。

[83]《时报》，1914-07-01，5～6 页。章伯锋、李宗一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 1 卷，92 页。

[84] Strand，David（戴维·斯特兰德），*Rickshaw Beijing: 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北京人力车：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市民与政治》），72～73 页。也可参见《北京市海淀区火器营满人社会调查报告》，载《满族研究》，1988（1），89～93 页。

[85] Coates，P. D.（高斯），"Documents in Chinese from the Chinese Secretary's Office，British Legation，Peking，1861-1939"（《英国驻华公使馆中文秘书处中文文献，1861—1939》），in *Modern Asian Studies*（《现代亚洲研究》），1983，（17），239～255 页。

[86] Gamble，Sidney D.（甘博），*Peking: A Social Survey*（《北京社会调查》），273～274 页。

[87] 汪宗猷：《二百年来广州满族经济生活的变化》，见《广东文史资料》，第 35 辑，65～68 页。《满族社会历史调查》，194 页。

[88]《时报》，1912-12-31，2、4 页。

[89]《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2A》，441 页。

[90] 美国国务院档案，893.52/8—10，福州领事约翰·福勒（John Fowler）1912 年 9 月 12、24 日，10 月 2 日。

[91]《北华捷报》，1913-11-08，450 页。《时报》，1913-09-16，5 页。郑云山等：《杭州与西湖史话》，94 页。

[92] 朱叙五、党自新：《陕西辛亥革命回忆》，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 5 集，9 页。《北华捷报》，1912-08-10，416 页。《顺天时报》，1912-08-

02，4 页。《成都城坊古籍考》，100 页。曹子西、于光度：《北京通史》，第 10 卷，190～191 页。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与上海的文化精神》，194～199 页。感谢 Mingzheng，Shi（史明正）提供这两卷北京的资料。

[93] Shirokogoroff，S. M.（史禄国），*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anchus：A Study of the Manchu Clan Organization*（《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71 页。

[94] Gamble，Sidney D.（甘博），*Peking：A Social Survey*（《北京社会调查》），272～273 页。《满族社会历史调查》，191 页。

[95] Strand，David（戴维·斯特兰德），*Rickshaw Beijing：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北京人力车：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市民与政治》），30～31 页。Honig，Emily（韩起澜），"Politics of Prejudice：Subei People in Republican Era Shanghai"（《政治偏见：共和国时期的上海苏北人》），in *Modern China*（《现代中国》），1989（15），245～246 页。潘洪钢：《辛亥革命与荆州驻防八旗》，载《满族研究》，1992（2），24～25 页。

[96]《顺天时报》，1912-05-25，2 页。

[97]《时报》，1912－04－17，2 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2B》，783～788 页；1916，409 页。章伯锋、李宗一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 6 卷，493～494、507 页。

[98]《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2B》，784 页；1914A，1021～1022 页；1914B，983 页；1917，478、1119 页；1920，486 页。

[99] Boorman，Howard L.（包华德），Richard C. Howard（里查德·霍华德）eds.，*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词典》），第 1 卷，141～142 页。Crossley，Pamela Kyle（柯娇燕），*Orphan Warriors：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孤军：三代满族人和清朝的灭亡》），208～209 页。

[100]《顺天时报》，1912-09-29，7 页。章伯锋、李宗一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 6 卷，543 页。

[101]《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2A》，327 页。

[102] 忻平等编：《民国社会大观》，32～35 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2A》，500、517、552～553 页。

[103]《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2B》，325 页。也可参见该书 1912A，441 页以及赵书：《辛亥革命前后的北京满族人》，载《满族研究》，1989（3），16 页。

[104]《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2A》，534～535 页。《顺天时

报》，1912-06-04，2页。《时报》，1912-09-02，3页；1914-03-24，5页。

[105]《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4B》，306～325页。

[106]《顺天时报》，1912-04-16，7页；1912-05-07，7页；1912-06-29，5页；1912-09-25，7页。《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2B》，484～485页。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531～566页。《旗族月报》，第6期，"论说二"，1～4（1914年11月）。关于富元，参见田原天南：《清末民初中国官绅人名录》，567页。

[107]《顺天时报》，1912-04-30，5页；1912-05-22，2、4页。《议事报》，1929-02-18，7页。

[108]《时报》，1912-07-17，3～4页。1914-03-27，5页；1914-04-03，5页；1915-01-15，3～4页；1915-01-16，4页；1915-01-17，4页。

[109] 赵书：《从一张洪宪元年批示看当时北京满族状况》，载《满族研究》，1986（3），32页。

[110]《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3A》，200～201页。

[111] Lattimore，Owen（拉铁摩尔），*Manchuria：Cradle of Conflict*.（《满洲：冲突之源》），62页注2。关于"旗族"作为满人的一个标签，参见滕绍箴：《满洲满人名称辨析（续）》，载《满族研究》，1995（4），51～52页。

[112] 荣铁耕：《清代北京的健锐营》，载《满族研究》，1987（2），36页。汪宗猷：《二百年来广州满族经济生活的变化》，见《广东文史资料》，第35辑，70、77～82页。Hsu，Leonard S.（伦纳德），*Study of a Typical Chinese Town：What Survey Revealed in Ching Ho，North China，Which Was Taken as Example*（《中国典型城镇研究：以清代华北的调查为例》），4页。赵书：《从一张洪宪元年批示看当时北京满族状况》，载《满族研究》，1986（3），32页。

[113] 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485～486页。Aisin-Gioro（爱新觉罗·溥仪），*From Emperor to Citizen*（《我的前半生》），228页。

[114] 宪均：《肃亲王善耆的复辟活动》，见《晚清宫廷生活见闻》，311、314页。Aisin-Gioro（爱新觉罗·溥仪），*From Emperor to Citizen*（《我的前半生》），176页。美国国务院档案，893.44，Consul J·W·Ballantine，大连，1922年12月8日。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476～477、553页。Scotland，Tony（托尼·苏格兰），*The Empty Throne：The Quest for an Imperial Heir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空缺的皇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时的皇室后裔寻找》），68页。

[115] 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487～493页。Aisin-Gioro（爱新

觉罗·溥仪），*From Emperor to Citizen*（《我的前半生》），239～247、273～276 页。Jones，F. C.（琼斯），*Manchuria Since 1931*（《1931 年以来的满洲》），40～42 页。

［116］关于“满洲国”名字的历史根源，参见 Johnston，Reginald F.（庄士敦），*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紫禁城的黄昏》），450～451 页。Wakeman（魏斐德），*The Great Enterprise*（《洪业——清朝开国史》），176 页。关于 3 月 1 日的象征意义，参见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490 页。Jones，F. C.（琼斯），*Manchuria Since 1931*（《1931 年以来的满洲》），40 页。根据琼斯的说法，3 月 1 日是清朝 1644 年定都北京的纪念日，也是清朝早期历史的重要日子——包括 1616 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的日子，皇太极 1636 年改国号为清的日子。顺治继承皇位进入北京，并在 1663—1664 年登基为中国的皇帝——按阴历或阳历都是三月的第一天。

［117］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482 页。Johnston，Reginald F.（庄士敦），*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紫禁城的黄昏》），450 页。Jones，F. C.（琼斯），*Manchuria Since 1931*（《1931 年以来的满洲》），41～42 页。Aisin-Gioro（爱新觉罗·溥仪），*From Emperor to Citizen*（《我的前半生》），273～276 页。

［118］Aisin-Gioro（爱新觉罗·溥仪），*From Emperor to Citizen*（《我的前半生》），276～277、289～290、372 页。宪均：《肃亲王善耆的复辟活动》，见《晚清宫廷生活见闻》，315 页。金启孮：《京旗的满族》，载《满族研究（续）》，1990（4），36 页。《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 8 卷，206 页。郑怀义、张建设：《末代皇叔载涛沉浮录》，92～94、150 页。

［119］Aisin-Gioro（爱新觉罗·溥仪），*From Emperor to Citizen*（《我的前半生》），319～330、340、361、372 页。

［120］同上书，466～467、472、478～480 页。王庆祥：《毛泽东、周恩来与溥仪》，337～347 页。

［121］郑怀义、张建设：《末代皇叔载涛沉浮录》，105～194 页。汪宗猷：《二百年来广州满族经济生活的变化》，见《广东文史资料》，第 35 辑，180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长编》，第 1 卷，408 页；第 2 卷，348、355 页。

［122］Aisin-Gioro（爱新觉罗·溥杰）：《我的家庭和我自己》，载《中国画报》，1979（8），38～41 页。杨学琛、周远廉：《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440～441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长编》，第 4 卷，901～905 页。*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1994－03－02，B9。关于溥仪的后人问题，参见 Scotland，Tony（托尼·苏格兰），*The Empty Throne：The Quest for an*

Imperial Heir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空缺的皇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时的皇室后裔寻找》）。

[123]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560～562 页。Deal，David M.（戴维·迪尔），"The Question of Nationalitie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二十世纪中国的民族问题》），in *Journal of Ethnic Studies*（《民族研究学报》），1984，12（3），25 页。《三民主义词典》，64、436～437 页。关于孙中山的广州政府在 1925 年如何对待当地满人，参见 Fitzgerald，John（费约翰），*Awakening China：Politics，Culture，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183～184 页。

[124] Benson，Linda（琳达·本森），*The Ili Rebellion：The Moslem Challenge to Chinese Authority in Xinjiang，1944－1949*（《伊犁革命》），12～15 页。Deal，David M.（戴维·迪尔），"The Question of Nationalitie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二十世纪中国的民族问题》），in *Journal of Ethnic Studies*（《民族研究学报》），1984，12（3），25～28 页。蒋介石：《中国之命运》，119～120 页。Chiang（蒋介石），China's Destiny（《中国之命运》），3～13 页。《三民主义词典》，64 页。

[125] 舒乙：《再谈老舍先生和满族文学》，载《满族研究》，1985（1），62 页。Vohra，Ranbir（沃拉），*Lao She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老舍和中国革命》），162 页。

[126] Deal，David M.（戴维·迪尔），"The Question of Nationalitie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二十世纪中国的民族问题》），in *Journal of Ethnic Studies*（《民族研究学报》），1984，12（3），26 页。Jones，F.C.（琼斯），*Manchuria Since 1931*（《1931 年以来的满洲》），5、55、59 页。"The Tungus Race in Manchoukuo"（《满洲国中的通古斯人》），in *Contemporary Manchuria*（《当代满族》），1999，3（2），65～72 页。

[127] Jones，F.C.（琼斯），*Manchuria Since 1931*（《1931 年以来的满洲》），59 页。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490 页。Aisin-Gioro（爱新觉罗·溥仪），*From Emperor to Citizen*（《我的前半生》），256 页。Crossley，Pamela Kyle（柯娇燕），*Orphan Warriors：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孤军：三代满族人和清朝的灭亡》），208～213 页。关于熙洽，参见章伯锋、李宗一 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 6 卷，547～548 页。李治亭主编：《爱新觉罗家族全书》，第 3 册，217～218 页。

[128] 赵书：《建国前后的北京满族人》，载《满族研究》，1992（2），35 页。Moseley，George（莫斯利），*The Party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Chi-*

na（《中国的党派与民族问题》），29 页。Heberer，Thomas（托马斯·海贝勒），*China and Its National Minorities：Autonomy or Assimilation?*（《中国与少数民族：自治还是同化?》），30 页。《满族社会历史调查》，81 页。

[129] 赵书：《北京城区满族生活琐记》，见《北京文史资料》，第 55 辑，207 页。Yan，Yunxiang（阎云翔），*The Flow of Gifts：Reciprocity and Social Networks in a Chinese Village*（《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26、32～33 页。

[130] 马协弟：《清代广州满族述略》，载《满族研究》，1988（1），65 页；《刘显之先生与〈成都满蒙族史略〉》，载《满族研究》，1989（1），43 页。《满族社会历史调查》，204～205 页。

[131] Fei Hsiao Tung（费孝通），"Ethnic Identification in China"（《中国的民族识别》），in *Toward a People's Anthropology*（《迈向人民的人类学》），69～71 页。

[132] Banister，Judith（班尼斯特），*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中国变化中的人口》），322～323 页。

[133] 杨学琛、周远廉：《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425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长编》，第 1 卷，407～411 页。

[134] 汪宗猷：《二百年来广州满族经济生活的变化》，见《广东文史资料》，第 35 辑，74～75 页。何溥英：《新中国成立后的满族发展》，载《满族研究》，1987（4），90 页。

[135] Vohra，Ranbir（沃拉），*Lao She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老舍和中国革命》），162～163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长编》，第 1 卷，408 页；第 2 卷，348、355 页。

[136] Banister，Judith（班尼斯特），*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中国变化中的人口》），322～323 页。

[137] Moseley，George（莫斯利），*The Party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China*（《中国的党派与民族问题》），161～162 页。乌拉熙春：《满族的语言和文化》，载《满族研究》，1992（2），52 页。赵书：《"文革"前后的北京满族人》，载《满族研究》，1993（1），52 页。《中国 1982 年人口普查资料（电子计算机汇总）》，表 27。何溥英：《新中国成立后的满族发展》，载《满族研究》，1987（4），91 页。

[138] 何溥英：《新中国成立后的满族发展》，载《满族研究》，1987（4），91 页。赵焕森、唐学凯：《蓬勃发展的宽城满人自治县》，载《满族研究》，1994（4），42 页。张佳生：《我读〈丹东满族〉》，载《满族研究》，19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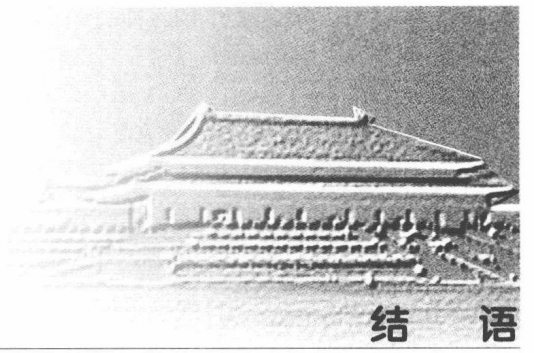
(4)，40 页。Stary（斯达里），Giovanni，Nicola Di Cosmo（狄宇宙），Tatiana A. Pang（庞晓梅），Alessandra Pozzi（亚历山大·波齐），*On the Tracks of Manchu Culture*，1664－1994：350 *Years after the Conquest of Peking*（《满族文化的轨迹，1664—1994：占领北京之后的 350 年》），71 页。《河北省遵化县东陵乡》，载《满族研究》，1989（1），76 页。

[139] 佟加、庆夫：《新疆锡伯族的语言和文字》，载《满族研究》，1991（3），87～96 页。阎向东：《新疆锡伯语保存之原因》，载《满族研究》，1990（2），67～72 页。

[140]《人民日报》，1986－05－12。《中国日报》，1987－07－16，第 5 版。

[141] 张天路：《中国少数民族社区人口研究》，附录 2。

[142] 赵书：《从一张洪宪元年批示看当时北京满族状况》，载《满族研究》，1986（3），32 页。



结　语

285

中国的民主革命是期望值日益上升的革命的典型例子。清朝的统治在1911—1912年的革命中被推翻，不是因为它如1898年那样拒绝改革，而是因为它的改革步伐不够快。在清朝最后的统治期间，由于在外国列强的干涉下镇压了义和团运动，久经历练的慈禧太后认识到了改变的必要。她由此发起的“新政”改革激进而广泛，以至于被认为是一场自我革命。所以，任达（Douglas R. Reynolds）在其著作中称之为“新政革命”。这一革命在时间上早于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可能在效果上也超过了辛亥革命。[1]正如任达和其他人所描述的那样，新政包含了教育改革和海外留学，重组陆军、海军和警察部队，行政和政治变革，还包括计划将两千余年的专制统治变为君主立宪政体。当新政在全国上下推行时，这次全面的改革在中国的城市民众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五百万满人作为之前的特权阶层，是受新政冲击最大的群体。于是，驻京八旗和各省的驻防八旗都建立了新式学校，中国第一批留日学生中就有不少满人，驻京八旗的一部分被重新组织成为陆军第一镇以及北京警察的一部分，满人也被选入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

义和团运动后的改革所产生的基本后果，是清廷不曾预料到

也不愿意接受的，这就是中国城市精英的政治化。他们大胆地要求在政府中获得更多的权力，无论是在君主立宪政体还是后来的共和政体。当时很少有满人拥护共和主义，但他们中并不缺乏对政体改革的批评者。满人参与了中国民族主义者第一次大规模的大众示威运动，即1903年的拒俄风潮；出版了政治期刊如《北京女报》、《大同报》等，支持各种改革者的言论；参加一些政治组 286
织，如梁启超的政闻社；参加了1909—1910年敦促朝廷立即召开国会的游说运动。所以，义和团运动后的改革与后来的革命运动不同，它从不“排汉”，也并不“反满”。

正是由于清末朝廷的无能与民众期望的高涨，使得清廷的改革只能让知识精英和政府当局愈加对立，也最终促成了革命的成功。在这一方面，朝廷有很多的不足之处。最突出的一点，是朝廷坚决反对成立民众一致呼吁的责任内阁和召开国会。但最终，朝廷还是颁布“十九信条”，接受了这些要求。此时已经是革命爆发三周以后，也是驻扎于滦州的军事将领威胁要发兵北京之后了。到这时，这些努力无疑是太少也太迟了。实际上，与改革者对朝廷的疏远同样重要的还有清廷重新加强帝制的努力，以及在消除满汉矛盾方面的失败。

清末朝廷重新加强帝制和重新强化集权之举同时进行，这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都是为了扭转19世纪中叶以来大大加速的地方分权进程，因为当时朝廷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其他一些起义时，不得不依赖曾国藩、李鸿章等一些地方大员和他们的武装。义和团运动后的一段时期，朝廷在取得了一些胜利之后，开始着手收回之前放弃的一些政治、军事权力。最显著的是，朝廷首先成功剥夺了李鸿章的继任者袁世凯的军权。袁世凯一手组建了北洋六镇新军，但朝廷却将其中四镇调拨到陆军部尚书铁良的麾下。接着，又将袁世凯以及与他同样位高权重的张之洞从他们根基所在的天津和武昌调往北京。最后，在慈禧太后去世之后，又将袁世凯解职。所有这些举措都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也是以牺牲各省当局和其他一些地方利益为代价的。1911年5月，清廷宣布将全国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同样是集权化的努力。但是，

众所周知，这一举措激起了各省士商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在四川，这直接导致了5个月后武昌革命的爆发。

强化帝制也同样充满争议，因为这不是为中央政府而是为宫廷争取更多的权力。这似乎是摄政王载沣的主要施政目标，他明
287 显是想仿效德国的威廉二世。在载沣掌权的三年中，他下令和监督组建了另一支新军——禁卫军。这支军队直接受命于宫廷而不是陆军部。载沣让自己的两个兄弟载涛和载洵领导陆军和海军。他自己则挂上了陆海军大元帅的头衔，统领全国的军队。载沣将军队的人事权力由陆军部转归朝廷。在回应立宪派的要求时，他指定了一个由奕劻领衔的内阁，还包括4名皇族亲贵。这些亲贵在载沣摄政期间，拥有极高的政治权势，这在媒体对新召集的资政院的争论那里有着明显的体现。

强化帝制的举措并不是始于载沣，早在半个世纪前的1861年，奕䜣被任命为军机大臣时就开始了。但是，载沣却将这一点做到了极致。奕䜣的任命常常被认为是同治中兴取得成功的关键。但是同时，这也预示着对一个多世纪以来王朝传统的背离——自军机处于18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创建以来，从没有皇族亲王成为军机大臣，或者成为各部尚书。从另一方面看，亲王参政也标志着对清朝最初统治时期的做法的回归，在清朝初期艰难的环境中，皇族亲王都要参与日常决策。于是，从1861年奕䜣开始，直到1911年（除1901—1903年的短暂中断以外）总是有一个皇族亲王成为军机大臣。进而，从1901年奕劻被任命为外务部总理大臣，他儿子载振在两年后成为商部尚书开始，清中期以来关于皇族不得担任各部尚书的禁令也被破坏了。这些先例都是在慈禧太后统治时期发生的。这也为载沣组建以奕劻为总理大臣的“皇族内阁”铺平了道路。

朝廷加强集权和强化帝制的努力的后果是复杂的。强化帝制只在短时期内取得成功，很快就因为革命而毁于一旦。在武昌起义之后不久，朝廷被迫作出让步。载涛和载洵不再在陆军部和海军部任职，对奕劻和内阁中其他皇族亲贵的任命也被撤销，资政院选举投票结果让那时新近被召回的袁世凯领衔组建新一届内阁，

载沣也辞去了摄政王的职位。朝廷几乎将所有的大权都让给了袁世凯和他的内阁。最后，在皇帝退位的时候，朝廷掌管的禁卫军也归于陆军部管理。另一方面，强化帝制虽然明显失败，但加强 288
中央集权的积累效应还是持续到了共和政府的前几年。它奠定了袁世凯在任期内作为强权领袖的制度基础。直到 1916 年袁世凯去世之后，地方分权才重新占据了优势。

导致知识精英疏远朝廷和革命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朝廷再三承诺消除“满汉差异”，却没有成功。这些差异正是共和革命者控诉清王朝的主要理由，比如，梁启超 1898 年在《清议报》和《大同报》上的文章。然而改革者对“满汉差异”的抨击也和一些广泛传播的观点相矛盾。正如蒋介石、芮玛丽等很多权威人士所述，满人充分吸收了汉文化，以至于到了晚清，他们已经不再和汉人有明显的区别。但他们的推论也有明显的矛盾，认为种族（满族）问题和 1911 年革命并不相关。在清朝 268 年的统治中，满人不可否认吸收了很多汉文化（同时，在较弱的程度上，满人也对汉文化有很深的影响）。满人长时间沉溺于令人愉悦的城市环境中，被各种汉人围绕，几乎所有满人都最终背离了老满人生活方式中的两个中心元素：“国语骑射”。但无论是在满人眼中还是在汉人眼中，满人从没有完全失去他们的独立身份。八旗制度完整地保持到王朝的末期，同样保存下来的还包括那些特定的文化元素，如男人的名字、女人的服装和天足，所有这些都使得满汉有明显区别。革命者的排满宣传正是基于这些稀少但持久的满汉差异（有时也是基于一些生理因素）。

晚清朝廷承认满汉差异的现实，也努力尝试采取措施。在三个不同的时期——1865 年，1898 年，1907 年——清廷都宣布了法令，废除对旗人在职业上和居住上的限制，要求解散各地的驻防旗兵。然而，三个法令（包括 1902 年消除满汉通婚的禁令）都没有真正实行。例如，直到清朝灭亡之前，旗人没有选择居住地的自由，也不能随便择业。其实，清朝的灭亡并不完全是载沣的过错，慈禧太后也同样有责任。

当革命最终爆发时，清朝虽已日薄西山，但还是倍感意外。 289

虽然清朝被推翻已经毫无疑问，但投降这个概念也绝不是无条件的和毫无尊严的。清帝退位协议最终是清廷与共和党人认真谈判的结果，袁世凯是居中调解人。因此，溥仪在革命后的命运有戏剧般的巨大差异。与其他被罢黜的同时代的君主和独裁者相比，他没有像之前的法国路易十四（Louis XVI）或几年后的俄国尼古拉二世（Czar Nicholas）那样被监禁或是被处死，也没有像1922—1924年土耳其革命后的穆罕默德六世（Sultan Mehmed VI）被永远流放远离祖国。他甚至没有被强迫放弃其宫殿而移居他处，而日本最后一位幕府将军德川庆喜的城堡被明治皇帝所占据，只能隐居到静冈。[2]尽管北京的军阀政治频繁更迭，但1912年签订的优待条款在后来十多年里或多或少保持有效。直到1924年，溥仪才被逐出紫禁城。即使在这时，协议的其他部分也没有被废除，直到1928年破坏清东陵的国民党军队没有受到处罚，才宣告了优待条款的最终结束。

清朝的八旗制度也是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才结束，从而加速完成了满族从一个军事阶层向一个民族的转变过程。英语单词“Manchu”包含了许多不同汉语词义，从满洲、满洲人、满人、满族到旗人、旗籍人、旗族，这一情况使得什么是“满”这个问题变得复杂，在整个研究过程中这是极为明显的。尽管这些词语都是指满人，但其含义在一定的社会或者历史背景下或多或少存在着差异。“满”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变化，这也有助于对“汉”做出界定。

有清一代，满人身份问题不可避免与八旗的历史和组织交织在一起，这导致了“满”的含义开始呈现出三个递进层次。首先，从最窄和最初的意义上说，“满”就是满洲，他们是分布在东北各地的女真人的后代，努尔哈赤在16世纪90年代统一了女真各部，并于1615年将女真组织成了八旗。1635年，皇太极改女真为满洲，这个词是从汉语“满洲”音译而来的。为了区别于后来增加的满洲旗人，他们也被称为佛满洲。他们及其后代是八旗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在清朝历代皇帝眼里，佛满洲是最受器重和信任的八旗队伍，皇帝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他们的“国语骑射”的生活方式构成了满文化的核心。其次，从较

290

广泛（和稍后）的意义上来说，“满”就是八旗满洲。他们不仅包括佛满洲，也包括伊彻满洲，清朝在1644年进入中原后，附近的通古斯族和通古斯化的蒙古人加入了满洲旗人，他们被称为伊彻满洲。最后，在最广泛意义上说，“满”就是旗人，尤其是当其与汉人相提并论时。从清朝统治者的各种声明来看，显然当提到满汉时，相对汉而言的“满”，通常不仅仅意味着佛满洲甚至八旗满洲，还包括所有八旗成员。皇太极在1635年和1642年分别组建了两个新的八旗，前一个八旗由蒙古人组成，后一个八旗由汉人组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满”包括所有三个不同的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以及包衣。由此，满人就等同于那些二十四旗的后代，这样他们就被官方归为旗人，而主要由汉人组成的非旗人则被归为“民”。由于清朝皇帝和官员使用这两套基本上可以相互替换的词汇——满/汉和旗/民，因此正如“旗”对应于“满”一样，“民”几乎也就等同于“汉”。

正如本研究主张的那样，如果满人等同于旗人，那么他们在清朝大部分时间内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职业身份。从出身来说，旗人是一个多族群的构成。他们不仅被分为三个不同族群，而且满洲八旗也分为佛满洲和伊彻满洲，伊彻满洲又分为不同的群体。总体来说，旗人在族群、语言和文化方面缺乏佛满洲的那种同一性。后来的清朝统治者努力满化所有旗人，要求他们都要学习和吸收佛满洲的“国语骑射”传统，最终，作为旗人的满人与汉人的主要区别不在于族群或者（一些人指出的）政治地位，而在于职业。[3]八旗制度组建之初主要承担军事职责。八旗的核心成员是旗兵，他们是清朝征服汉人的主要战斗 291
力量，并在此后承担保护和维持清王朝统治的重任，他们分布在北京、东北、中原的大量战略要地和北方边境的90多个驻防城市。除了极少数人能担任官职或在一些情况下从事耕种外，旗人被禁止从事其他职业，以便更好地保持战备状态。作为回报，清廷向旗人拨付钱粮。然而，八旗不仅包括旗兵，还包括他们的家属和大量其他亲戚和附属成员。清朝末期，旗人数量总计为五六

百万，旗兵和旗人的比例大致为1∶20。每一个旗人（不管是旗兵还是附属成员）都属于一个牛录，且由牛录额真和八旗副都统所管辖。最后，八旗成员的身份是世袭的，并在入主中原后向外人关闭了进入八旗的大门。旗人与非旗人之间的通婚一直被禁止，而且也很少发生。简单来说，作为旗人的满人在职业上变为一个世袭军事阶层，这与日本德川幕府时期的武士阶层很类似。

满人从一个职业身份向一个民族的转变，始于19世纪90年代后期和20世纪初这具有转折意义的十年。在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士人和官员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下，开始不再把“国”（country）视为一个文化概念，而是作为“民族—国家”这样一个政治和地域范畴的概念。中国人是发轫于华北平原内部的文明人，并自称为“华”和/或“夏”，其他人则是发轫于诸如东夷和北狄的各种“蛮族”。众所周知，最具代表性的是梁启超对中国的重新界定，把“中国”的概念从一种文明（实际上是一种和唯一的文明）转向一个地域国家（许多国家中的一个）。作为这种定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梁启超也把满人重新界定为一个种族。根据梁启超1898年末关于满汉关系的文章，正如黄种人和白种人间生死攸关的“种族冲突”一样，在中国，黄种人内部的两个小群体“满汉”间同样存在这种冲突。提到满和汉时，梁启超没有使用传统的文化概念（如夷狄和华人），而赞成两个全新的概念，即“满人”和“汉人”（尽管这两个概念来源于已有的“满汉”组合词，但作为
292 独立的词汇来使用以前还不常见）。梁启超进而把满人等同于旗人，他认为这“五百万”旗人在两个世纪以来一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

梁启超对满和汉的概念进行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重新界定，这一定义在当时颇为流行。清末民初，满汉差异主要表现在种族方面，而不是过去的职业或文化方面，但旧的概念及其相关词汇依然在延续。因此，1905年的刺客吴樾、1907年的满人改革派刊物《大同报》和1912年的退位协议都称满为“族”或者“民族”。然而，“满族”这个组合词很少用来指称“满”，尽管这一词语在当时已经存在（该词主要出现在20世纪前十年和20年代满人主要

的活动组织“满族促进会”中)。[4]相反，在清末民初，用来指称“满”的两个最常用的词是“满人”和“旗人”。如邹容一样的革命派倾向于使用梁启超倡导的“满人”，而清朝官员则倾向于使用“旗人”。“满人”一词在革命前更为普遍，“旗人”在革命后更流行。除了这些概念，还有其他常用的词语，尤其是在义和团运动后的共和改革派中。例如，陈天华几乎一直使用“满洲人”，这个词既可以被翻译为“满洲八旗的人”(“满洲”是指“满洲八旗”)，也可被翻译为“满洲的人”(“满洲”是指中国东北这一地区)。其他人也从中国丰富和古老的文化词汇中寻找各种对“满”的称呼。章炳麟喜欢贬称满为“东胡”和“虏”，而其他人把“满”贬为“鞑靼”和“鞑虏”。简单说来，即使大多数人认为“满”应被视为一个民族，但还是没有关于如何称呼“满”的统一说法。

关于谁是满人这一问题，清末民初的普遍看法都遵循梁启超的观点，即他们等同于八旗的所有成员，换句话说，就是旗人。这样，义和团运动后十年时间里，革命党控诉满人的七宗罪实质上就是对他们作为八旗成员的指责。把满人等同于旗人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当然许多八旗成员本身也把自己等同于旗人。尽管民国政府承认“满”是一个民族，但仍延续清朝的惯例，将他们 293
归类为旗民，只有少数满人正式请求改变自己的身份。(这种改变不是从“满”变为“汉”，而是从“旗”变为“民”。)为什么随后满人如此广泛地被称为“旗籍人”，原因就在于此。事实上，一群政治上活跃的满人在1914年提出用“旗族”作为他们的另一个称呼。尽管这一概念把旧的含义(作为旗人的满)和新的含义(作为民族的满)结合起来，但却没有流行开来。

虽然在如何称呼“满”上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但关于“汉”的称呼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根据梁启超的观点，“汉”在清末民初被普遍界定为“汉人”。例如，革命党倾向于把满人划分为“蛮夷”，但很少使用相对应的“华”和/或“夏”来称呼自己，相反，他们几乎一直称自己为汉人(让人颇感意外的是，民国成立时选择了使用“中华”这一名称作为国名)。关于谁是“汉人”，仍然遵循了梁启超的看法，在关于中国的种族竞争论述中，他仅仅集

中于两个竞争者——满和汉。因为满等同于五百万旗人，汉自然就是其余大量中国人口，按照旗/民二分法，他们就是四亿非旗人的“民”。

最后，满人的合适地域是哪儿？清末民初他们应居于何处？义和团运动后十年时间里，中国在革命党人心目中的概念是个单一的民族国家。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它包括中原地区，居住在这里的人几乎都是汉人，而且应该由汉人统治着这里。正如陈天华声称的那样，“中国属于汉人”。由于中国被如此界定，因为满人不是汉人，他们在中国就没有一席之地，根据同盟会的宣言，他们应被“驱逐”。章炳麟不止一次地表示，满人合适的避难之所应该是他们的老家东北，他们可以在那里创建他们自己的民族国家，正如后来日本人打着满人的名义所试图做得那样。另一方面，清朝把中国视为一个多民族帝国，其中汉人居住的中原只不过是一个地区而已。以这种观点来看，清帝国也包括满洲、蒙古、回疆和西藏，这些地方连同中原地区都处于平等地位，且都臣服于皇帝。对这些不同地区的人实行不同的管理。汉人由普通官僚系统管理，满人由八旗管理，蒙古人、回人和藏人由理藩院管理。乾
294 隆皇帝征服了突厥斯坦并将其置于清王朝统治之下，他对于自己作为五个民族的统治者和统一者甚为得意。义和团运动后十年间，满人改革派在《大同报》重申了乾隆皇帝的思想，他们试图“统一满、汉、蒙、回、藏为一体”。

到清朝统治在 1912 年被推翻之时，共和派放弃了他们以前“中原属于汉人”的狭窄定义。例如，他们没有把满人驱赶到东北，而是允许他们留在原来的地方。相反，他们恢复到清朝把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这一更为广泛的定义。新政权批准了隆裕太后的退位诏书，宣布自己是清王朝合法的继承者，因此也继承了清王朝所有辽阔的疆土和多民族的人口（不是所有人都服从这一决定，正如外蒙古的蒙古人就拒绝把他们对清王朝的效忠转移到民国）。革命党人以前关于中国只存在满汉两个斗争民族的观点，被中华民国（而不是清王朝）由五个民族组成这一观点所取代。这一观点重复了清朝的思想，并通过民国初年的五色旗得以

体现。此外，在谈到四个非汉民族——“满、蒙古、回、藏”——时，退位协议清楚地表示他们都是单独的民族，并承诺他们会受到与汉人同样的对待。至少这是民国初年的目标，尽管对于满人来说，现实远不是这样。

民国初年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一思想经过蒋介石短暂的否定后又被共产党再次肯定。蒋介石和国民党继承了共和革命党人的观点，坚持中国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居住在其领土上的是实质上等同于汉人的“中华民族”。虽然他们称“满”为满族，好像是一个单独的实体，但他们认为满族要完全被“我们汉人”同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声称自身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随着民族学者对中国人口进行了比以前更细致和更精确的区分，官方认可的少数民族数量也从5个激增到56个。例如，民国初年大量回人集中居住于西北地区，被看做一个民族。共产党治理下，根据语言和文化差异，他们被划分为十个单独的群体，“回”这一词汇渐渐用来指称说汉话的穆斯林，现在他们被叫做“回族”。然而，对汉族没有进行类似的细分，因为政府拒绝承认诸如客家人和苏 295
北人这种独立群体为一个正式民族。相反，与梁启超一样，共产党把占中国总人口93%的汉人看做一个巨大的没有区别的群体。[5]

与汉族不一样，但与回族相同，满人在共产党治理下也增加了不同种类。民国初年，根据八旗制度下的一致成员身份，满人属一个民族，但现在变成了六个：锡伯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和满族。正如与晚清一样，其祖先在八旗中的身份再次成为确定满族民族特征的依据，但现在其他五个民族也分享了这种身份依据。虽然“旗人”在一些地区仍然被用来指称“满”，但基本上都被“满族”这个词所取代，这也结束了清末民初以来对“满”称呼的混乱。简单来说，旗人完成了其身份的转变，从清朝时期的世袭军事阶层，到清末民初共和革命党人和其他人称呼为“满人”这一更加宽泛和模糊的群体，最终在共产党治理下被官方界定为“满族”。

【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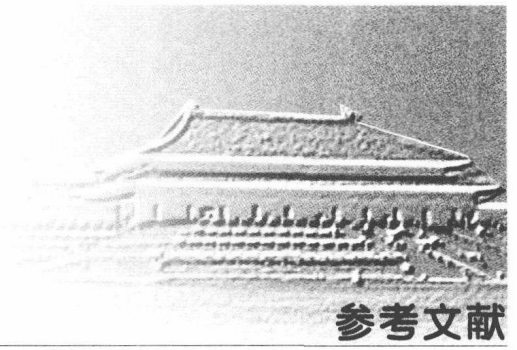
[1] Reynolds, Douglas R. (任达), *China, 1989-1912: 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 (《新政革命与日本》)。

[2] 关于奥斯曼王朝的命运，参见 Kinross, Lord (金鲁斯爵士), *Ataturk: A Biography of Mustafa Kemal, Father of Modern Turkey* (《阿塔图尔克：现代土耳其之父穆斯塔法·基马尔传》), 42、45、46 页。关于日本德川幕府，参见 *Kodansha Encyclopedia* (《讲谈社日本百科全书》), 第 4 卷, 171 页；第 8 卷, 57 页。

[3] 关于以政治地位来界定满人或旗人的不同观点，参见 Rawski, Evelyn S. (罗友枝), "Ch'ing Imperial Marriage and Problems of Rulership" (《清代皇帝的婚姻和统治问题》), in *Marriage and Inequqlity in Chinese Society* (《中国社会中的婚姻和不平等》), 180 页; Rigger, Shelley (任雪丽), "*Voices of Manchu Identity*, 1635 - 1935" (《满洲身份的争论, 1635—1935》), in *Cultural Encounters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中国少数民族边疆的文化遭遇》), 191 页。

[4] 关于"满族"一词出现于清末民初，参见滕绍箴：《满洲满族名称辨析》，载《满族研究》, 1995 (4), 50～53 页。

[5] 参见 Gladney, Dru C. (杜磊), *Muslim Chinese: 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中国穆斯林》)。Constable, Nicole (郭思嘉) ed., *Guest people: Hakka Identity in China and Abroad* (《客家人：中国和海外客家人的身份认同》)。Honig, Emily (韩起澜), *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 1850-1980* (《苏北人在上海 (1850—1980)》)。



参考文献

爱新觉罗·溥仪著，W. J. F. Jenner（詹纳尔）译. 我的前半生. 北京：外文出版社，1964—1965

爱新觉罗·瀛生. 满语与汉语的互相影响. 满族研究，1987（1）：67～72

——. 谈谈满族人的姓名. 满族研究，1985（2）：55～60

爱新觉罗·宗夔. 满族旧俗忆述. 见：广东文史资料，第35辑，263～274

爱新觉罗·溥杰. 我的家庭和我自己. 中国画报，1979（8）：38～41

Atwood，Christopher（阿特伍德）. "National Questions and National Answers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Or，How Do You Say *Minzu* in Mongolian?"（《中国革命中的民族问题和民族答案；蒙古语中的"民族"怎么说?》）. *Indiana East Asian Working Paper Series on Language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1994，（5）：35～73

白杰. 清末政坛中的肃亲王善耆. 满族研究，1993（2）：36～39

Banister, Judith (班尼斯特). *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 (《中国变化中的人口》).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Bartlett, Beatrice S. (白彬菊). *Monarchs and Ministers: The Grand Council in Mid-Ch'ing China, 1723-1820* (《君与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Bays, Daniel H. (裴士丹). *China Enters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ang Chih-tung and the Issues of a New Age, 1895-1909* (《迈入20世纪的中国：张之洞与一个新的时代，1895—1909》).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8

Beahan, Charlotte L. (夏洛特·本汉). "Femin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Chinese Women's Press, 1902-11" (《中国妇女出版物中的女性主义和民族主义》). *Modern China* (《现代中国》) 1975 (1): 379～416

北京名胜古迹词典. 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

北京女报. 北京，1905—1909。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有收藏

北京市海淀区火器营满族社会调查报告. 满族研究，1988 (1): 89～93

Benson, Linda (琳达·本森). *The Ili Rebellion: The Moslem Challenge to Chinese Authority in Xinjiang, 1944-1949* (《伊犁革命》). Armonk, N. Y., and London: M. E. Sharpe, Inc., 1990

Biggerstaff, Knight (毕乃德). *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 (《中国最早的近代官办学校》).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1

Bland, J. O. P. (布兰德), and Edmund Backhouse (白克浩斯). *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慈禧外传》).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11

Bodde, Derk (布迪), and Clarence Morris (莫里斯). *Law in Imperial China, Exemplified by 190 Ch'ing Dynasty Cases.*

(《中华帝国的法律》). Reprint,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3

渤海寿臣. 辛亥革命始末记. 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

Bonner, Joey (波纳). *Wang Kuo-wei: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王国维传》).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Boorman, Howard L. (包华德), and Richard C. Howard (里查德·霍华德), eds.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词典》).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1971

Bredon, Juliet (裴丽珠). *Peking* (《北京纪胜》). Reprint,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Britton, Roswell S. (罗斯维尔·S·布立顿).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 (《中国期刊新闻，1800—1912》). Reprint, Taipei: Ch'eng 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66

Brunnert, H. S. (布鲁纳特), Hagelstrom, V. V. (哈盖尔斯特罗姆). *Present Da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 (《当今中国的政治机构》). Revised by N. Th. Kolessoff; trans. A. Beltchenko and E. E. Moran. Reprint, Taipei: Xinyue Tushu Gongsi, 1964

蔡鸿源，刘晓宁. 辛亥南京光复——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见：辛亥革命在各地，161～174. 北京：文史出版社，1991

Cao Xueqin (曹雪芹). *The Story of the Stone* (《石头记》). Trans. David Hawkes. Vol. 1. Baltimore: Penquin Books, 1973

曹亚伯. 武昌革命真史. 上海：上海书店，1982 年重印

曹子西等. 北京通史. 北京：中国书店，1994

Chang Sen-dou (章生道). "The Morphology of Walled Capitals" (《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 in G. William Skinner (施坚雅)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75～10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常顺. 赍臣被炸追记. 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 6 集，389～391

陈春生. 辛亥革命海军反正纪实. 见：张侠等编. 清末海军

史料，696～704. 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

陈佳华. 八旗制度研究述略. 社会科学辑刊，1984（5）：109～116；（续），1984（6）：113～120

陈佳华，傅克东. 八旗汉军考略，见：王锺翰主编. 满族史研究集.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陈天华. 陈天华集. 刘晴波，彭国兴编.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陈文石. 清代的笔帖式. 食货月刊，1974，（4）：65～76

陈文石. 清代满人政治参与.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77，（48）：529～594

陈一石，王端玉. 清代成都的“满城”与旗汉分治. 四川大学学报，1981（3）：71～78

Ch'en，Chi'eh-hsien（陈捷先）. “The Decline of the Manchu Language in China during the Ch'ing Period（1644 -1911）”（《清代满语的衰落》）. in Walther Heissig（海西西）ed. *Altaica Collecta*（《阿尔泰学论集》），137～154. 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1976

——. “The Sinification of Manchu Names：A Study of Personal Names in the Ch'ing Imperial House and Upper-Class Manchu Society of the Ch'ing Period”（《满人名字的汉化：清朝宗室和贵族名字的研究》）. 见：“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 1 期，1～20

Ch'en，Jerome（陈志让）. *Yuan Shih-k'ai*（《袁世凯》）. 2nd ed.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成堂福，布尼阿林，袁丽坪. 木兰围场. 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2）：27～32

程巍昆. 民初“剪辫热”述论. 社会科学研究，1987（3）：71～77

四川省文史馆编. 成都城坊古籍考.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Chiang Kai-shek（蒋介石）. *China's Destiny*（《中国之命运》）. Trans. Wang Chung-hui（王宠惠译）. Reprint，New York：

Da Capo Press, 1976. (也见蒋介石:《中国之命运》)

China, The Maritime Customs (中国海关). *Returns of Trade Reports, 1911* (《1911年贸易统计报告》). Shanghai, 191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八旗都统衙门档案

——. 会议政务处档案

——. 禁卫军训练处档案

——. 军机处录副奏折档案

——. 军机处宪政专题档案

——. 宪政编查馆档案

Chou, Nailene Josephine (约瑟芬·奈兰·周). *Frontier Studies and Changing Frontier Administration in Late Ch'ing China: The Case of Sinkiang, 1759-1911* (《晚清的边疆研究和变化中的边疆行政:1759—1911年的新疆》).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76

Chu, Raymond W. (雷蒙德·朱), and William G. Saywell (威廉·塞维尔). *Career Patterns in the Ch'ing Dynasty: The Office of Governor-General* (《清朝总督官缺之人事嬗递》).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4

Chu, Samuel C. (朱昌峻). *Reformer in Modern China: Chang Chien, 1853-1926* (《近代中国改革派:张謇,1853—1926》).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5

Chung, Sue Fawn (钟苏芬). "The Much Maligned Empress Dowager: A Revisionist Study of the Empress Dowager Tz'u-his (1835-1908)" (《被诽谤的皇太后:对慈禧太后的修正研究》). *Modern Asian Studies* (《现代亚洲研究》), 1979, (13): 177～196

Coates, P. D. (高斯). "Documents in Chinese from the Chinese Secretary's Office, British Legation, Peking, 1861-1939" (《英国驻华公使馆中文秘书处中文文献,1861—1939》). *Modern Asian Studies* (《现代亚洲研究》), 1983, (17): 239～255

Cochran, Sherman (高家龙), and Andrew C. K. Hsieh (安德鲁), with Janis Cochran, trans. and eds. *One Day in China: May 21, 1936* (《中国的一天:1936年5月21日》).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Constable, Nicole (郭思嘉), ed. *Guest people: Hakka Identity in China and Abroad* (《客家人：中国和海外客家人的身份认同》).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6

Crossley, Pamela Kyle (柯娇燕). "Manchu Education" (《满洲人的教育》). in Benjamin A. Elman (本杰明·艾尔曼) and Alexander Woodside (伍思德) eds.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600 - 1900* (《中华帝国晚期的教育和社会，1600—1900》), 340 ~ 37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 *The Manchus* (《满洲人》). Cambridge, Mass., an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 1997

——. *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 (《孤军：三代满族人和清朝的灭亡》).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 and Evelyn S. Rawski (罗友枝). "A Profile of the Manchu Language in Ch'ing History" (《清史研究中之满语概述》).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哈佛亚洲研究学报》), 1993, 53 (1): 63~102

大汉热心人. 广东独立记. 见：近代史资料，1961 (1)，435~471

大清皇帝实录. 台北：华文书局，1964 年重印

大清会典. 台北：中华书局，1964 年重印

戴学稷. 呼和浩特简史. 北京：中华书局，1981

大同报. 东京，1907—1908。北京大学图书馆有收藏，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有缩微胶卷

Deal, David M. (戴维·迪尔).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itie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二十世纪中国的民族问题》). *Journal of Ethnic Studies*, 1984, 12 (3): 23~53

Des Forges, Roger V. (戴福士). *Hsi-liang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Revolution* (《锡良与中国民族革命》). New He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丁士源. 梅楞章京笔记. 见：吴相湘编. 中国现代史丛刊，第5册，235～285. 台北：文星书店，1964

丁守和主编. 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987

定宜庄. 清代八旗驻防制度研究.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董方奎. 论“滦州兵谏”和“士官三杰”. 历史研究，1981(1)：57～72

东方杂志. 上海，1904—1912. 台北：商务印书馆，1971年重印

光绪朝东华录. 台南：大东书局，1968年重印

杜春和. 张绍曾与“滦州兵谏”. 近代史研究，1985(3)：259～279

端方. 端忠敏公奏稿. 台北：文海出版社重印

Duiker, William J.（史丹福）. *Cultures in Collision: The Boxer Rebellion*（《文化冲突：义和团运动》）. San Rafael, Calif.: Presidio Press, 1978

Dutt, Vidya Prakash（都德）. “The First Week of Revolution: The Wuchang Uprising”（《革命第一周：武昌起义》）. in Mary Clabaugh Wright（芮玛丽）, ed.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革命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 383～416.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Edmonds, Richard Louis（理查德·路易斯·爱德蒙）. *Northern Frontiers of Q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rontier Policy*（《清朝和日本德川幕府时期的北部边疆政策的比较研究》）.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1985

Elliott, Mark（欧立德）. “Bannerman and Townsman: Ethnic Tens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Jiangnan”（《旗民和市民：十九

世纪江南的民族张力》. *Late Imperial China*（《晚期中华帝国》），1990，11（1）：36～74

——. *Resident Aliens：The Manchu Experience in China，1644－1760*（《外来居民：满洲人在中国之经历（1644—1760）》）. Ph. D. dis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1993

Esherick，Joseph W.（周锡瑞）. "Founding a Republic，Electing a President：How Sun Yat-sen Become Guofu"（《创建共和，选举总统：孙中山怎样成为国父》）. in Etō Shinkichi（爱图）and Harold Z. Schiffrin（史扶邻）eds. *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中国的共和革命》），129～152. Tokyo：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1994

——.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

Fairbank，John K.（费正清）. "The Manchu-Chinese Dyarchy in the 1840's and '50's."（《19世纪40、50年代的满汉共治》）. *Far Eastern Quarterly*（《远东季刊》），1953，（12）：265～278

——. and S. Y. Teng（邓嗣禹）. "On the Types and Uses of Ch'ing Documents"（《清代档案的类型和使用》）. in idem，*Ch'ing Administration：Three Studies*（费正清编：《清代行政三论》），36～106.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

方汉奇. 中国近代报刊史.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房兆楹. 清末民初洋学学生提名录初辑.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

Farjenel，Fernand（法杰勒）. *Through the Chinese Revolution*（《透过中国革命》）. Trans. Margaret Vivian. New York：Frederick A. Stokes Company，1916

Fay，Peter Ward（费伊）. *The Opium War，1840－1842*（《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New York：W. W. Norton & Company，1976

Fei Hsiao Tung（费孝通）. "Ethnic Identification in China"（《中国的民族识别》）. in idem，*Toward a People's Anthropology*

(《迈向人民的人类学》), 60～77. Beijing: New World Press. 1981

冯国璋早期履历. 历史档案, 1995 (1): 59

冯玉祥. 我的生活——冯玉祥自传. 香港: 博文出版社, 1974 年重印

冯自由. 革命逸史.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53、1965 (第 1～5 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第 6 集)

——.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 台北: 世界书局, 1954

Finnane, Antonia (安东篱). "What Should Women Wear? A National Problem" (《女人应该穿什么? 一个民族问题》). *Modern China* (《现代中国》), 1966 (22): 99～131

Fitzgerald, John (费约翰).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Fletcher, Joseph (傅礼初). "The Sino-Russian Relations, 1800－1862" (《中俄关系, 1860—1862》). in John K. Fairbank (费正清)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1 (费正清编. 剑桥中国史. 第 10 卷. 晚清, 1800—1911, 上卷), 318～3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Fogel, Joshua A. (傅高义) "The Sino-Japanese Controversy over Shina as a Toponym for China" (《中日关于"支那"作为中国地名的论争》). in idem, *Cultural Dimensions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Essays o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中日关系中的文化维度: 关于 19 和 20 世纪论文集》), 66～76. Armonk, N. Y., and London: M. E. Sharpe, 1995

Franck, Harry A. (亨瑞·福兰克). *Roving through Southern China* (《穿越华南》). New York and London: The Century Co., 1923

——. *Wandering in Northern China* (《华北漫游》). New York and London: The Century Co., 1923

傅克东. 八旗水师史略. 满族研究，1986（1）：19～25

傅克东，陈佳华. 清代前期的佐领. 社会科学战线，1982（1）：164～173

傅宗懋. 清代军机处组织及职掌之研究. 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67

Fung, Edmund S. K.（冯兆基）. *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New Army and Its Role in the Revolution of 1911*（《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 Canberra: Austr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80

Gamble, Sidney D.（甘博）. *Peking: A Social Survey*（《北京社会调查》）. New York: George H. Doran Company, 1921

甘海岚. 老舍年谱.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高时良. 福建省革命史话. 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2编第4册，357～365

Garrett, Valery M.（瓦纳瑞·嘉瑞特）. *Chinese Clothing: An Illustrated Guide*（《中国服饰：插图指南》）.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Mandarin Squares: Mandarins and Their Insignia*（《补子：官吏和他们的标志》）.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Traditional Chinese Clothing in Hong Kong and South China, 1840 - 1980*（《香港和华南的中国传统服饰，1840—1980》）.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Gasster, Michael（高慕轲）.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ese Radicalism*（《中国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中国现代激进主义的诞生》）.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9

Gaubatz, Piper Rae（高贝贝）. *Beyond the Great Wall: Urban Form and Transformation on the Chinese Frontiers*（《长城以外：边境的城镇形成及变迁》）.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Gladney, Dru C.（杜磊）. *Muslim Chinese: Ethnic National-*

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中国穆斯林》）. Cambridge: Council on the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1

Godley, Michael R.（迈克尔·戈德利）. "The End of the Queue: Hair as Symbol in Chinese History"（《辫子的终结：中国历史上的发式象征》）. *East Asian History*（《东亚历史》）, 1994, (8): 53～72

公孙訇. 冯国璋年谱.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Goodrich, L. Carrington（傅路德），房兆楹编.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明代传记辞典》）.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China, F O 405. Microfilmed ed. 英国外交部档案 FO 405 微缩胶卷

关纪新，孟宪人. 满族与沈阳语、北京语. 满族研究，1987 (1): 73～81

广禄. 广禄回忆录. 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

光绪政要. 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 年重印

郭凤鸣. 清末民初陆军学校教育. 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8

郭太风. 八旗绿营俸饷制度初探. 复旦学报，1982（4）：103～107

郭廷以. 近代中国史事日志. 台北：正中书局，1963

郭孝成. 福建光复记. 见：辛亥革命，第 7 册，280～283

——. 江苏光复纪实. 见：辛亥革命，第 7 册，1～33

——. 陕西光复记. 见：辛亥革命，第 6 册，38～50

——. 议和始末. 见：辛亥革命，第 8 册，65～68

——. 浙江光复记. 见：辛亥革命，第 7 册，135～149

郭希仁. 从戎纪略. 见：辛亥革命，第 6 册，60～103

国风报. 上海，1910—1911；台北：汉声出版社，1975 年重印

Hackett, Roger F.（汉克特·罗杰）. *Yamagata Aritomo in the Rise of Modern Japan, 1838－1922*（《山县有朋与现代日本发展（1838—1922）》）.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韩延龙，苏亦工等. 中国近代警察制度.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

杭州府志，1898

Hao，Yen-p'ing（郝延平），and Kwang-Ching Liu（刘广京）. "The Importance of the Archival Palace Memorials of the Ch'ing Dynasty：*The Secret Palace Memorial of the Kuang-hsü Period，1875－1908*"（《清代宫中档的重要意义：光绪时期的宫中密档，1875—1908》）. *Ch'ing-Shih* Wen-T'i（《清史问题》），1974，3（1）：71～94

Harrell，Paula（保拉·哈瑞）. *Sowing the Seeds of Change：Chinese Students，Japanese Teachers，1895－1905*（《播撒变更之种子：中国学生和日本教师，1895—1905》）.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贺觉非，冯天瑜. 辛亥武昌首义史.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

何溥英. 满族他塔喇氏家谱中的汉文化因素. 满族研究，1993（1）：76

——. 新中国成立后的满族发展. 满族研究，1987（4）：90～96

Headland，Isaac Taylor（何德兰）. *Court Life in China：The Capital，Its Officials and People*（《晚清宫廷见闻录》）. New York：Fleming H. Revell Company，1909

河北省遵化县东陵乡. 满族研究，1989（1）：76

Heberer，Thomas（托马斯·海贝勒）. *China and Its National Minorities：Autonomy or Assimilation?*（《中国及其少数民族：自治还是同化?》）. Armonk，N. Y.，and London：M. E. Sharpe，Inc.，1989

河南通志，1914

Henry，B. C.（亨利）. *Ling-nam，or Interior Views of Southern China*（《岭南，或华南的内部观察》）. London：S. W. Partridge and Co.，1986

Honig，Emily（韩起澜）. *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Subei People in Shanghai，1850－1980*（《苏北人在上海（1850—

198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The Politics of Prejudice: Subei People in Republican-Era Shanghai"(《政治偏见:共和国时期的上海苏北人》). *Modern China*(《现代中国》), 1989, (15): 243～275

Hosie, Alexander (谢立山). *Manchuria: Its People, Resources and Recent History*(《满洲:人口、资源和近代历史》). Boston and Tokyo: J. B. Millet Company, 1910

——. *Three Years in Western China: A Narrative of Three Journeys in Ssu-ch'uan, Kuei-chow, and Yün-nan*(《华西三年:四川、贵州、云南三次旅行记》). 2nd ed. London: George Philip & Son, 1987

侯宜杰. 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 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的杨度. 近代史研究, 1988 (1): 88～114

——. 杨度二题. 近代史研究, 1986 (6): 236～244

——. 袁世凯一生.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2

——. 预备立宪是中国政治制度近代化的开端. 历史档案, 1991 (4): 104～111、127

Hsieh, Winston (谢文孙). *Chinese Historiography o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 Critical Survey and a Selected Bibliography*(《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述评和书目选》).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1975

Hsu, Leonard S. (伦纳德). *Study of a Typical Chinese Town: What Survey Revealed in Ching Ho, North China, Which Was Taken as Example*(《中国典型城镇研究:以清代华北的调查为例》). Peiping: The Leader Press, 1929

胡絜青, 舒乙. 记老舍诞生地. 见:老舍. 正红旗下, 134～142.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1

胡钧. 张文襄公年谱. 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7 年重印

胡平生. 民国初期的复辟派. 台北:学生书局, 1985

胡蕴玉. 发史. 见：满清野史，第 1 辑，449～470. 台北：文桥书局，1972 年重印

华立. 从旗人编查保甲看“旗民分治”政策的变化. 民族研究，1988（5）：97～106

Huang Fu-ch'ing（黄福庆）.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晚清时期日本的中国学生》）. Trans. Katherine P. K. Whitaker. Tokyo：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1982

黄光亮. 清代科举制度之研究. 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6

黄光赟，陈金铭. 宁夏民军起义. 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 5 集，497～503

Huang，Ray（黄仁宇）. *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万历十五年》）.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1

黄彰健. 戊戌变法史研究.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

黄中兴. 杨度与民初政治（1911—1916）. 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86

湖北通志，1921

Hummel，Arthur W.（恒慕义）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清代名人传略》）. Washington，D. 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1944

Hunt，Michael H.（韩德）. “The Forgotten Occupation：Peking，1900－1901”（《被遗忘的侵略：1900—1901 年的北京》）.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太平洋历史评论》），1979，（48）：501～529

Jansen，Marius B.（詹森）. *The Japanese and Sun Yat-sen*（《日本人和孙中山》）. Reprin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

Jen Yu-wen（简又文）. *The Taiping Revolutionary Movement*

(《太平天国运动》).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蒋介石. 中国之命运. 见：张其昀编. 蒋总统集，118～170. 台北："国防研究院"、中华大典编印会，1960

姜相顺. 近代沈阳满族的经济生活和民族资本的发展. 满族研究，1987 (3)：33～37

江宁府志，1880

金启孮. 京旗的满族. 满族研究，1988 (3) —1991 (1)

——. 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三家子屯调查报告.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金祥瑞. 我是怎样侦破谋炸摄政王一案的. 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8集，469～474

荆州府志，1880

金梁. 光宣小记. 台北：学生书局，1973年重印

Johnston, Reginald F. (庄士敦). *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 (《紫禁城的黄昏》). London: Victor Gollancz, 1934

Jones, F. C. (琼斯). *Manchuria Since 1931* (《1931年以来的满洲》).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Kendall, Elizabeth (伊丽莎白·肯道尔). *A Wayfarer in China: Impressions of a Trip Across West China and Mongolia* (《一位旅行者在中国：穿越华西和蒙古的印象》).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13

Kent, Percy Horace (肯德). *The Passing of the Manchus* (《满洲人的消逝》). Reprint, Washington, D. C.: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77

Kessler, Lawrence D. (凯思乐). "Ethnic Composition of Provincial Leadership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 (《清朝各省大员的种族构成》).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亚洲研究杂志》), 1969, (28): 489～511

Keyte, J. C. (凯特). *The Passing of the Dragon: The Story of the Shensi Revolution and Relief Expedition* (《龙的消逝：陕西革命和救济的故事》).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13

Kinross, Lord（金鲁斯爵士）. *Ataturk: A Biography of Mustafa Kemal, Father of Modern Turkey*（《阿塔图尔克：现代土耳其之父穆斯塔法·基马尔传》）.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1965

Kodansha Encyclopedia of Japan（《讲谈社日本百科全书》）. Tokyo and New York: Kodansha, 1983

Kuhn, Philip A.（孔飞力）. "Political Crime and Bureaucratic Monarchy: A Chinese Case of 1768"（《政治罪恶和官僚君主制：1768年的中国》）. *Late Imperial China*（《晚期中华帝国》）, 1987, 8 (1): 80～104

桑原骘藏. 中国辫发史. 苏乾英译. 东方杂志，第31卷第3号，"妇女与家庭栏"，15～21

Kwong, Luke S. K.（邝兆江）. *A Mosaic of the Hundred Days: Personalities, Politics, and Ideas of 1898*（《百日维新的碎片：1898年的个人、政治和思想》）.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4

Laitinen, Kauko（高歌）. *Chinese Nationalis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Zhang Binglin as an Anti-Manchu Propagandist*（《晚清中国的民族主义：反满宣传者章炳麟》）. London: Curzon Press, 1990

老吏（化名）. 奴才小史. 见：陆保璇编. 满清稗史. 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重印

老舍. 正红旗下. Trans. Don J. Cohn. Bejing: Panda Books, 1982

——. 茶馆. Trans. John Howard-Gibbon. Be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0

Lattimore, Owen（拉铁摩尔）.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满洲：冲突之源》）.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32

Lee, James（李中清）, Cameron Campbell（康文林）, and Wang Feng（王丰）. "The Last Emperor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Demography of the Qing (1644－1911) Imperial Lineage"（《最后

的皇帝：清代皇族人口统计》). in David S. Reher（戴维）and Roger Schofield（罗杰）eds. *Old and New Methods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历史人口统计学的新旧方法》），361～382. 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

Lee，James（李中清），and Robert Y. Eng（罗伯特）. "Population and Family History in Eighteenth Century Manchuria：Preliminary Results from Daoyi，1774-1798"（《十八世纪满洲的人口和家庭历史：道义屯的初步考察，1774—1798》）*Ch'ing-Shih Wen-T'i*（《清史问题》），1984，5（1）：1～55

Lee，Robert H. G.（罗伯特·李）. *The Manchurian Frontier in Ch'ing History*（《清代满洲边疆史》）.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雷方圣. 荆州旗学的始末及其特点. 民族研究，1984（3）：57～59

李贵连. 沈家本与中国法律现代化.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李国祁，周天生. 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递现象之量化分析.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 1974（2）：301～383

李红. 清代笔帖式. 历史档案，1994（2）：89～92

李惠民. 吴禄贞殉难新探. 中国近代史，1989（1）：130～136

李剑农. 武汉革命始末记. 见：辛亥革命，第5册，169～184

——. 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 台北：学生书局，1974年重印

Li Jieren（李劼人）. "*Ripples Across Stagnant Water*"（《死水微澜》）. Trans. Hu Zhihui. *Chinese Literature*，Nov. 1981：3～76；Dec. 1981：3～71

——. 死水微澜. 香港：新文学研究社，1975

李廉方. 辛亥武昌首义记. 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1年重印

李林. 从家谱中探讨满族文化发展. 满族研究，1987（4）：64～70

李守孔. 段祺瑞与辛亥革命. 见：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6期，277～297，1974

——. 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与辛亥革命，见：吴相湘编. 中国现代史丛刊，第3册，321～373. 台北：正中书局，1961

——. 政闻社之成立与停闭. 见：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07，626～633

李一. 荆宜施鹤光复记，见：辛亥革命，第5册，245～285

李治亭. 爱新觉罗家族全书.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李宗一. 袁世凯传. 北京：中华书局，1980

梁启超. 饮冰室文集. 林芝均编. 台北：中华书局，1970

梁旭毅. 良弼传. 首都博物馆丛刊，1982（1）：28～32

廖宇春. 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 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2编第2册，419～477

林家有. 辛亥革命前后广州满汉民族关系史料. 见：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史料专辑，下册，204～218.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

林竟. 伊犁革命始末记. 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2编第5册，428～435

林述庆. 镇军援宁记. 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2编第4册，41～81

林献炘. 载洵萨镇冰出国考察海军. 见：张侠等编. 清末海军史料，846～850. 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

岭南半翁（化名）. 温生才刺杀广州都统兼署将军孚琦. 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2编第13册，697～704

历史档案. 北京

刘凤翰. 清季自强运动与军事初期改革（1861—1895）. 见：清季自强运动研究讨论会文集，343～393.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

——. 武卫军.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

——. 袁世凯与戊戌政变. 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

刘厚生. 张謇传记. 上海：上海书店，1985年重印

刘庆华. 满族姓氏述略. 满族研究，1983（1）：64～71

刘通. 辛亥福建光复回忆. 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453～468

Lo，Jung-pang（罗荣邦）. *K'ang Yu-wei：A Biography and a Symposium*（《康有为：传记与专题》）. Tucson：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67

Lowe，H. Y.（卢兴源）. *The Adventures of Wu：The Life Cycle of a Peking Man*（《吴氏探险记：一个北京人的生涯》）. Reprin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3

吕鉴. 关于熊成基烈士的新史料. 历史档案，1982（3）：120～123

Lui，Adam Yuen-chung（吕元骢）. *The Hanlin Academy：Training Ground for the Ambitious，1644-1850*（《翰林院：雄心训练场，1644—1850》）. Hamden，Conn.：Archon Books，1981

骆宝善. 关于章炳麟政治立场转变的几篇逸闻. 历史研究，1982（5）：56～62

罗炳绵. 总理衙门与满族本位政策，见：清季自强运动研讨会论文集. 163～183.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

罗正纬. 滦州革命纪实初稿（节录），见：辛亥革命，第6册，333～360

Ma Feng-ch'en（马奉琛）. "Manchu-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Conflicts in Early Ch'ing"（《清初的满汉社会经济矛盾》）. in E-tu Zen Sun（孙任以都）and John De Francis（约翰·德弗朗西斯）eds. *Chinese Social History：Translations of Selected Studies*（《中国社会史论著选译》），333～351. Washington，D. C.：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1956

马协弟. 八旗制度下的满族. 满族研究，1987(2)：28～34

——. 刘显之先生与《成都满蒙族史略》. 满族研究，1989(1)：43～47

——. 浅论清代驻防八旗. 社会科学战线，1986（3）：192～196

——. 清代广州满族述略. 满族研究，1988（1）：61～65

——. 驻防八旗浅谈. 满族研究，1985（2）：18～24

马涯民. 南京光复见闻琐记. 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256～262

MacKinnon，Stephen R.（麦金农）. *Power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Yuan Shi-kai in Beijing and Tianjin，1901－1908*（《帝国晚期的政治与权力：袁世凯在北京和天津，1901—1908》）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

Malone，Carroll Brown（麻伦）. *History of the Peking Summer Palaces under the Ch'ing Dynasty*（《清朝北京颐和园史》）. 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1934

满族简史. 北京：中华书局，1979

满族社会历史调查.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

Menzies，Nicholas K.（孟泽思）. *Forest and Land Management in Imperial China*（《清代森林与土地管理》）.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94

Millward，James A.（米尔沃德）. *Beyond the Pass：Commerce，Ethnicity and the Qing Empire in Xinjiang，1759－1864*（《越界：清代新疆的种族与商贸（1759—1864）》）. Ph. D. diss.，Stanford University，1993

Min，Tu-ki（闵斗基）. 戊戌变法时期的满汉关系——一个修正的看法. 见：中华民国开国史讨论集，第1册，380～388. 台北：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编辑委员会，1981

民报. 东京，1905—1907，1910；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重印

民国人物传. 北京：中华书局，1978—1996

Morrison，G. E.（莫理循）. *The Correspondence of G. E. Morrison，1895－1912*（《莫理循通信集（1895—1912）》）. Lo Hui-min（骆惠敏）e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

Moseley，George（莫斯利）. *The Party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China*（《中国的党派与民族问题》）. Cambridge and

London: M. I. T. Press, 1966

Muramatsu, Yuji (村松佑次). "Banner Estates and Banner Lands in 18th Century China-Evidence from Two New Sources" (《十八世纪中国的旗产和旗地——两种新例证》). *Hitotsubashi Journal of Economics* (《一桥经济杂志》), 1972, 12 (2): 1～13

Naquin, Susan (韩书瑞), and Evelyn S. Rawski (罗友枝). *Chinese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十八世纪中国社会》).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内阁官报. 北京, 1911—1912;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65 年重印

Ning Chia (贾宁). *The Li-fan Yuan in the Early Ch'ing Dynasty* (《清初的理藩院》). Ph. D. dis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91

Norman, Jerry (罗杰瑞). *A Concise Manchu-English Lexicon* (《简明满英词典》).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8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Weekly Edition of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字林周刊》). 上海, 1907—1913

Oxnam, Robert B. (安熙龙). *Ruling from Horseback: Manchu Politics in the Oboi Regency, 1661-1669* (《马背上的统治: 鳌拜摄政时期的满族政治, 1661—1669》).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潘崇雄. 端方与预备立宪. 思与言, 第 22 卷第 5 期, 425～444, 1985

潘洪钢. 辛亥革命与荆州驻防八旗. 满族研究, 1992 (2): 21～28

Pomerantz-Zhang, Linda (琳达). *Wu Tingfang* (1842-1922):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伍廷芳 (1842—1922): 近代中国的改革与现代化》).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2

Powell, Ralph L.(拉尔夫·鲍威尔). *The Rise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 1895－1912*(《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5

Presseisen, Ernst L.(普瑞森·尔斯特). *Before Aggression: Europeans Prepare the Japanese Army*(《侵略之前:欧洲人造就的日本军队》).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65

溥杰. 清宫会亲见闻. 见:晚清宫廷生活见闻,36～47. 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Pusey, James Reeve(浦嘉珉).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中国与达尔文》).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3

溥伟. 让国御前会议日记. 见:辛亥革命,第8册,110～115

钱安靖,周锡银. 辛亥革命时期四川少数民族反帝、反封建、反奴隶制的英雄斗争. 见:四川保路风云录,108～121.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钱实甫. 清季新设职官年表. 北京:中华书局,1961

——. 清季重要职官年表. 见:杨家骆等主编. 新修清季史卅九表. 台北:鼎文书局,1973

秦国经. 清代的八旗制度. 历史教学,1981(4):13～17

——. 清外务部部分主要官员履历. 历史档案,1986(4),40～43、79页

清代人物传稿,下编.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1993

清末部分八旗都统履历. 历史档案,1989(4):36～45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 北京:中华书局,1979

清末汪兆铭被捕后的供单及有关史料. 历史档案,1983(2):21～24、20

赵尔巽等编纂. 清史稿. 北京:中华书局,1976

邱远应. 赵尔丰发动"成都兵变"说质疑. 华中师院学报,1982(5):127～133

旗族月报. 北京,1914. 中国国家图书馆有收藏

Rankin, Mary Backus (冉玫烁). *Early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Radical Intellectuals in Shanghai and Zhejiang, 1902-1911* (《早期中国革命者：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The Manchurian Crisis and Radical Student Nationalism, 1903" (《1903年的满人危机和激进学生民族主义》). *Ch'ing Shih Wen-T'i* (《清史问题》), 1969, 2 (1): 87～106

Rawski, Evelyn S. (罗友枝). "Ch'ing Imperial Marriage and Problems of Rulership" (《清代皇帝的婚姻和统治问题》). in Rubie S. Watson (华屈若碧) and Patricia Buckley Ebrey (伊沛霞) eds. *Marriage and Inequality in Chinese Society* (《中国社会中的婚姻和不平等》), 170～203.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清代宫廷社会史》). Berl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再观清代：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亚洲研究杂志》), 1996, (55): 829～850

Reynolds, Douglas R. (任达). *China, 1989-1912: 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 (《新政革命与日本》). Cambridge: Council on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3

Rhoads, Edward J. M. (路康乐). "The Assassination of Governor Enming and Its Effect on Manchu-han Relations in Late Qing China" (《暗杀恩铭对晚清满汉关系的影响》). in Etō Shinkichi (爱图) and Harold Z. Schiffrin (史扶邻) eds. *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 (《中国的共和革命》), 3～24.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94

——. *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 The Case of Kwangtung, 1895-1913* (《中国的共和革命：1895年到1913年间的广

东》).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Merchant Association in Canton, 1895-1911"《广州商会，1895—1911》. in Mark Elvin（伊懋可）and G. William Skinner（施坚雅）eds.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两个世界中的中国城市》），97～11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Self-Strengthening and Manchu-Han Relations"（《洋务运动与满汉关系》）. 见：郝延平、魏秀梅主编：《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1007～1038.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

Rigger, Shelley（任雪丽）. "*Voices of Manchu Identity, 1635-1935*"（《满洲身份的争论，1635—1935》）. in Stevan Harrell（郝瑞）ed.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中国少数民族边疆的文化遭遇》），186～214.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荣铁耕. 清代北京的健锐营. 满族研究，1987（2）：35～36

荣祥. 略谈辛亥革命前后的家乡旧事. 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25～36

Rozman, Gilbert（饶济凡）. *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Rummel, R. J.（拉梅尔）. *China's Bloody Century: 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中国的血腥世纪》）.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1

Saishin Shina kanshin roku（The Latest Directory of Chinese officials and notables）（《最新支那官绅录》）. Comp. Pekin Shina Kenkyukai. Tokyo, 1918

桑兵. 癸卯元旦留日学生排满演说史实考辨. 学术研究，1984（3）：73～77

三民主义词典. 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6

Scotland, Tony（托尼·苏格兰）. *The Empty Throne: The*

Quest for an Imperial Heir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空缺的皇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时的皇室后裔寻找》）. London: Viking, 1993

Scott, A. C.（斯科特）. *Chinese Costume in Transition*（《中国服饰转变》）. New York: Theatre Arts Books, 1960

陕西通志稿. 1934

尚秉和. 辛壬春秋. 香港：文艺书局，1970 年重印

商衍鎏. 清代科举考试述录. 北京：三联书店，1958

沈家本. 沈寄簃先生遗书（甲编）. 台北：文海出版社，1964 年重印

沈云龙. 北洋之"狗"——冯国璋. 传记文学，1976，28(51)：47～54

——. 徐世昌评传. 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

——. 掌握晚清政柄之奕劻. 见：近代政治人物论丛，第 1 册，70～80. 台北：自由太平洋文化实业公司，1965

Sheridan, James E.（奚瑞丹）. *Chinese Warlord: 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中国军阀：冯玉祥传》）.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Shi, Mingzheng（史明正）. "From Imperial Gardens to Public Parks: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Spac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Beijing"（《从皇家园林到公园：二十世纪初北京城市空间的转变》）. *Modern China*（《现代中国》），1998（24）：219～254

时报. 上海，1909—1915

Shina shobetsu zen shi（Complete provincial gazetteers of China）（《支那省别全史》）. Tokyo: Toa Dobunkai, 1917～1920

Shirokogoroff, S. M.（史禄国）.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anchus: A Study of the Manchu Clan Organization*（《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 Shanghai: Royal Asiatic Society, North China Branch, 1924

舒新城. 近代中国留学史. 台北：中国出版社，1973 年重印

舒乙. 再谈老舍先生和满族文学. 满族研究，1985（1）：62～67

舒仲玑. 辛亥革命时广州八旗军投诚经过，见：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史料专辑，下册，219～223.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

顺天时报. 北京，1908—1912. 1908—1909 年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1910—1912 年收藏于微缩胶卷（Washington，D. C.：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Sigel，Louis（路易斯·圣戈）. "Revolution by Diplomacy：A Re-examination of the Shanghai Peace Conference of 1911"（《外交革命：1911 年上海和平会议的再审视》）.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远东史研究集刊》），1979，（19）：111～143

Smith，Richard J.（司马富）. *China's Cultural Heritage：The Ch'ing Dynasty，1644－1912*（《中国文化传统：清朝，1644—1912》）. 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83

Spence，Jonathan D.（史景迁）. *God's Chinese Son：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 New York and London：W. W. Norton & Company，1996

——. *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Bondservant and Master*（《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6

Stary，Giovanni（斯达里），Nicola Di Cosmo（狄宇宙），Tatiana A. Pang（庞晓梅），and Alessandra Pozzi（亚历山大·波齐）. *On the Tracks of Manchu Culture，1664－1994：350 Years after the Conquest of Peking*（《满族文化的轨迹，1664—1994：占领北京之后的 350 年》）. Wiesbaden：Harrassowitz Verlag，1995

Strand，David（戴维·斯特兰德）. *Rickshaw Beijing：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北京人力车：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

Struve, Lynn A.（司徒琳）. *The Southern Ming：1644－1662*（《南明史，1644—1662》）.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

苏精. 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 台北：苏精，1985

苏云峰. 湖北新军（1896—1912）. 历史学报，1976，(4)：345～380

苏报. 上海，1903；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8年重印

Sun，E-tu Zen（孙任以都）. "The Board of Reven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十九世纪中国的户部》）.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哈佛亚洲研究学报》），1962—1963，(24)：175～228

——.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al Missions of 1905－1906"（《1905—1906的中国立宪运动》）.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近代史杂志》），1952，(24)：251～268

田原天南. 清末民初中国官绅人名录. 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重印

Tan，Chester C.（谭春林）. *The Boxer Catastrophe*（《拳祸》）. New York：W. W. Norton & Company，1971

汤志钧. 戊戌变法人物传稿. 北京：中华书局，1982

Tao Jing-shen（陶晋生）. "Barbarians or Northerners：Northern Sung Images of the Khitans"（《蛮族或北人：北宋时期的契丹形象》）. in Morris Rossabi（罗萨比）ed. *China Among Equals：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10th－14th Centuries*（《十至十四世纪的中国及其边邻》），66～86.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

陶菊隐.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北京：三联书店，1957—1959

Telford，Ted A.（特尔福德），and Michael H. Finegan（芬根尼）. "Qing Archival Materials from the Number One Historical Archives on Microfilm at the Genealogical Society of Utah"（《中国第一历

史档案馆关于清朝宗族社会微缩胶片档案》). *Late Imperial China* (《晚期中华帝国》), 1988, 9 (2): 86～114

滕绍箴. 满洲满族名称辨析. 满族研究, 1995 (3): 45～53; 1995 (4): 47～54

天嘏. 满清外史. 台北: 广文书局, 1971

佟佳江. 清代八旗制度消亡时间新议. 满族研究, 1994 (5): 101～108

佟加、庆夫. 新疆锡伯族的语言和文字. 满族研究, 1991 (3): 87～96

Torbert, Preston M. (陶博). *The Ch'ing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A Study of Its Organization and Principal Functions, 1662-1796* (《康雍乾内务府考》).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77

Tsou Jung (邹容). *The Revolutionary Army, A Chinese Nationalist Tract of 1903* (《革命军, 1903年—位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宣传册》). Trans. John Lust. The Hague and Paris: Mouton & Co., 1968

"The Tungus Race in Manchoukuo" (《满洲国中的通古斯人》). *Contemporary Manchuria* (《当代满族》, 1939, 3 (2): 47～72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Decimal File, 1910—1929. National Archives, Record Group 59. Microfilmed (美国国务院年度档案, 1910—1929)

——. Department of State, Numerical File, 1906-1910. National Archives, Record Group 59 (美国国务院数字档案, 1906—1910)

——. War College Division of the General Staff. National Archives, Record Group 165 (美国总参谋部档案)

Vohra, Ranbir (沃拉). *Lao She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老舍和中国革命》). Cambridge: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74

Vollmer, John E. (沃尔曼). *Decoding Dragons: Status Garments in Ch'ing Dynasty China* (《解码巨龙：中国清朝的身份性服饰》). Eugene: Museum of Art, University of Oregon, 1983

Wade, T. F. (威妥玛). "The Army of the Chinese Empire: Its Two Great Divisions, the Bannermen or National Guard, and the Green Standard or Provincial Troops..." (《中华帝国军队：旗兵或国家卫队，绿营或各省驻防》). *Chinese Repository* (《中国丛报》), 1851, (20): 250～280、300～340、363～422. Reprint, Tokyo: Maruzen Co., Ltd., and Vaduz: Kraus Reprint Ltd., n. d

Wadley, Stephen A. (斯蒂芬·瓦德雷). "Altaic Influences on Beijing Dialect: The Manchu Case" (《阿尔泰语对北京方言的影响：以满语为例》).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美国东方学会杂志》), 1996, (16): 99～104

Wakeman, Frederic, Jr. (魏斐德).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洪业——清朝开国史》).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Waley, Arthur (亚瑟·威利). *The Opium War Through Chinese Eyes* (《中国人眼中的第一次鸦片战争》).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58

万向春，邓祥麟. 新伊革命史略. 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2编第5册，421～423

王道瑞. 新发现的徐锡麟刺杀恩铭史料浅析. 历史研究，1991 (4): 100～103

王德昭. 清代科举制度研究.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

王笛. 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的兴起. 近代史研究，1987 (3): 245～270

王尔敏. 断发、易服和改元——变法论之象征旨趣. 见：中国近代的维新运动，59～73.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

王火．清代八旗中高丽人名字的语言和民俗特征．满族研究，1995（2）：43～49

王家俭．清末民初我国警察制度现代化的历程（1901—1928）．台北：商务印书馆，1984

——．中国近代海军史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

王均．1908年北京内外城的人口与统计．历史档案，1997（3）：103～108

王庆祥．毛泽东、周恩来与溥仪．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王寿南．辛亥武昌起义后清廷之困境与清帝退位．“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986（4）：73～108

王树枏．武昌战纪．见：辛亥革命，第5册，229～241

王右瑜．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前后见闻，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68～73

王云英．试论清人关前的衣冠制．辽宁大学学报，1981（5）：71～74

王锺翰．关于满族形成中的几个问题．见：满族史研究集，1～16．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国语骑射”与满族的发展．见：满族史研究集，195～20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清代八旗中的满汉民族成分问题．满族研究，1990（3）：36～46；1990（4）：57～66

——．清代旗地性质初探．文史，1979（6）：127～137

汪宗猷．二百年来广州满族经济生活的变化．见：广东文史资料，第35辑，249～262

——．广州满族简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

王缵成．辛亥首义阳夏光复纪实．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集，17～46

魏秀梅．从量的观察探讨清季驻防副都统之人事嬗递，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4，（13），387～428

——．从量的观察探讨清季驻防将军都统之人事嬗递．“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1，（10），187～225

——. 清季职官表.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

隗瀛涛. 四川保路运动史.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文公直. 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 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重印

Williams, Edward Thomas（卫理）. *China Yesterday and Today*（《中国的昨天与今天》）. London: George G. Harrop & Co., Ltd., [1923?]

Williamson, Alexander（韦廉臣）. *Journeys in North China, Manchuria, and Eastern Mongolia*（《华北、满洲和蒙古东部游记》）. London: Smith, Elder & Co., 1870

Wong, Young-tsu（汪荣祖）. *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 Zhang Binglin and Revolutionary China, 1869-1936*（《寻找现代民族主义：章炳麟和革命中国，1869—1936》）.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Wright, Mary Clabaugh（芮玛丽）. "Introduction: The Rising Tide of Change"（《绪论：高涨的变革潮流》）. in idem, ed.,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革命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1～63.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 2nd printing, with additional not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吴次藩. 镇江光复回忆，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263～268

吴方. 仁智的山水——张元济传.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

吴天任. 梁节庵先生年谱. 台北：艺文印书馆，1979

伍廷芳. 伍先生公牍. 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重印

——（笔名：观渡庐）. 共和关键录. 台北：文海出版社，

1981 年重印

Wu，Wei-ping（武卫平）. *The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the Eight Banners*（《八旗的发展与衰落》）. Ph. D. diss.，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1969

Wu Wo-yao（吴沃尧）. "A Bannerman at the Teahouse"（《茶馆中的旗人》）. Trans. Gloria Bien. *Renditions*：*A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Magazine*（《译言：中英翻译杂志》），1975，(4)：148～150

吴相湘. 清帝退位与出宫经过，见：晚清宫廷与人物，111～119. 台北：文星书店，1965

吴友如. 晚清社会风俗百图，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吴元丰，赵志强. 锡伯族由科尔沁蒙古旗编入满洲八旗始末. 满族研究，1984 (5)：60～66

吴兆清. 清末禁卫军. 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 (2)：12～23

——. 袁世凯练新军改军制及其历史地位. 历史档案，1987 (1)：105～111

吴志超. 略论"新满洲". 满族研究，1987 (1)：92～95、72

吴忠亚. 吴禄贞是"立宪派"吗?. 历史研究，1982 (3)：66～82

乌拉熙春. 满族的语言和文化. 满族研究，1992 (2)：52～58

戊戌变法.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 台北：鼎文书局，1973 年重印

宪均. 肃亲王善耆的复辟活动. 见：晚清宫廷生活见闻，308～315. 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萧一山. 清代通史. 台北：商务印书馆，1962—1963 年重印

忻平，胡正豪，李学昌. 民国社会大观.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中国史学会编. 辛亥革命.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熊秉坤. 武昌起义谈. 见：辛亥革命，第 5 册，85～98

熊克武. 蜀党史稿. 见：辛亥革命史丛刊，第 2 辑，167～182. 1980

许炳堃. 杭州光复之夜的一次官绅紧急会议. 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165～166

许崇灏. 辛亥镇军起义克服南京经过记. 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2编第4册，36～41

——. 镇江新军起义和镇军会攻南京纪实. 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247～255

薛笃弼. 太原和河东光复的片段. 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169～178

巡警部主要官员履历. 历史档案，1994（2）：63、79

严寿华. 海容等舰在辛亥革命中经历. 见：张侠等编. 清末海军史料，704～711. 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

杨廷纲，林舜藩. 长江舰队响应辛亥革命的回忆. 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7集，56～66

阎向东. 新疆锡伯语保存之原因. 满族研究，1990（2）：67～72

Yan，Yunxiang（阎云翔）. *The Flow of Gifts：Reciprocity and Social Networks in a Chinese Village*（《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杨东平. 城市季风：北京与上海的文化精神.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杨度. 杨度集. 刘晴波编.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杨逢春. 伊犁辛亥革命概述. 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510～522

杨庆贞. 海容、海筹、海琛三舰参与辛亥革命经过. 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99～103

杨树森. 清代柳条边，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78

杨天石，王学庄编. 拒俄运动，1901—1905.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杨霆垣. 记鄂军政府的初期外交活动. 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7集，42～55

杨学琛，周远廉. 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

阳曲县志. 1843

洋务运动.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姚以价. 辛亥太原革命军记录. 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2编第4册，266～268

叶豪. 从“长毛”谈太平天国的发制. 南京史志，1987（6）：50～51

衣保中. 试论清代满族士兵土地所有制的演变. 满族研究，1987（4）：26～29

有关川岛浪速的几件史料. 历史档案，1993（4）：67～71、66

Young，Ernest P.（杨欧纳）. *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Liberalism and Dictatorship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袁世凯与民初之自由与独裁问题》）.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7

——. “Problems of a Late Ch'ing Revolutionary：Ch'en T'ien-hua”（《清末革命问题：陈天华》）. in Chün-tu Hsüeh（薛君度）ed. *Revolutionary Leaders of Modern China*（《中国现代革命领袖》），210～247.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

喻大华. “清室优待条件”新论；兼谈溥仪前往东北的一个原因. 近代史研究，1994（1）：161～177

袁世凯. 养寿园奏议辑要. 沈祖宪编. 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重印

——. 袁世凯奏折专辑. “国立故宫博物院”编. 台北：广文书局，1970

恽宝惠. 辛亥冯国璋接统禁卫军后的活动. 文史资料选辑，1960（9）：119～120

载沣. 醇亲王使德日记. 见：近代史资料，1989，(73)，138～168

载润. 隆裕与载沣之矛盾. 见：晚清宫廷生活见闻，76～78. 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载涛. 禁卫军之建立与改变. 见：郑怀义，张建设. 末代皇叔载涛沉浮录，237～242. 北京：群众出版社，1989

——. 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 见：晚清宫廷生活见闻. 79～83. 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查时杰. 清末的宗社党. “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1978，(5)：125～139

张秉铎. 张之洞评传. 台北：中华书局，1972

章伯锋编. 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等年报. 见：杨家骆等编. 新修清季卅九表. 台北：鼎文书局，1973

章伯锋、李宗一编. 北洋军阀（1912—1928）. 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

张存武. 伍廷芳与辛亥革命. 见：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6辑，94～122. 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6

张德泽. 清代国家机关考略.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

张国昌. 满族教育在清代. 满族研究，1986（3）：56～63

张国淦. 清末禁卫军. 见：章伯锋，李宗一编. 北洋军阀（1912—1928年），第1卷，22～24. 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

张国淦编. 辛亥革命史料. 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

张謇. 啬翁自定年谱. 见：张孝若. 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 台北：学生书局，1974年重印

张佳生. 我读《丹东满族》. 满族研究，1994（4）：40～41

张杰. 清代东北满族文化教育简论. 满族研究，1995（2）：30～32

张敬媛. 满族的骑射. 满族研究，1987（4）：71～73

章开沅. 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

张立瀛. 镇江光复史料. 见：近代史资料，1957（6），75～80

张枏，王忍之编.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 香港：三联书店，1962

张朋园. 立宪派与辛亥革命. 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

会，1969

张其卓．满族在岫岩．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

张天路．中国少数民族社区人口研究．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3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

张怿伯．辛亥海军举义记．见：辛亥革命，第7册，471～477

张一麐．故代理大总统冯公事状．见：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卷四，14a～20b．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重印

张樾生．追记八旗代表章福荣所谈南北议和的一鳞半爪．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427～428

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

——．清季的立宪团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

张宇天．晚清旗营的变迁和没落述略．见：满族论丛，55～76．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

张羽新．清代前期各民族统一观念的历史特征．清史研究，1996（2）：30～38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重印

赵焕森，唐学凯．蓬勃发展的宽城满族自治县．满族研究，1994（4）：42～43

赵书．北京城区满族生活琐记．见：北京文史资料，第55辑，202～239

——．从一张洪宪元年批示看当时北京满族状况．满族研究，1986（3）：32

——．建国前后的北京满族人．满族研究，1992（2）：32～37

——．"文革"前后的北京满族人．满族研究，1993（1）：52～56

——．辛亥革命前后的北京满族人．满族研究，1989（3）：15～19

赵中孚．清代东三省的地权关系与封禁政策．见："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1，(10)，283～302

郑川水．论清朝的旗饷政策及其影响．辽宁大学学报，1985 (2)：76～80

——．清末满族社会特点初探．学术月刊，1982 (2)：60～66

——．辛亥革命与八旗制度的崩溃——略论辛亥革命对满族的影响．辽宁大学学报，1982 (1)：30～35

郑怀义，张建设．末代皇叔载涛沉浮录．北京：群众出版社，1989

郑权．福建光复史略．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 2 编第 2 册，314～321

郑天挺．探微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

郑云山．杭州与西湖史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政治官报．北京，1907—1911；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 年重印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和国际统计局人口统计司编．中国 1982 年人口普查资料（电子计算机汇总）．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

中国近代的维新运动——变法与立宪研讨会．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

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台北，1962—1965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1981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从 1894—1897 到 1928 年．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1—1983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长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

中央大同日报，1908—1909．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

“中央警官学校”校史．台北：“中央警官学校”校史编修委员会，1967

周馥．周悫慎公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年重印

Zhou Qiuguang（周秋光）．“Modern Chinese Educational Phi-

lanthropy: Xiong Xiling and the Xiangshan Children's Home"(《近代中国的慈善教育业：熊希龄和香山慈幼院》). Trans. Edward A. McCord. *Republican China*(《中华民国》), 1993, 19(1): 51～83

周武彝. 陆军第三中学参加武昌起义经过. 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7集，10～18

周锡保. 中国古代服饰史.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

周轩. 志锐初论. 满族研究，1988(4)：49～54

朱金甫，周文泉. 从清宫医案论光绪帝载湉之死. 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3)：3～13

朱兰亭，徐凤晨. 熊成基谋刺载洵辨析. 近代史研究，1988(6)：56～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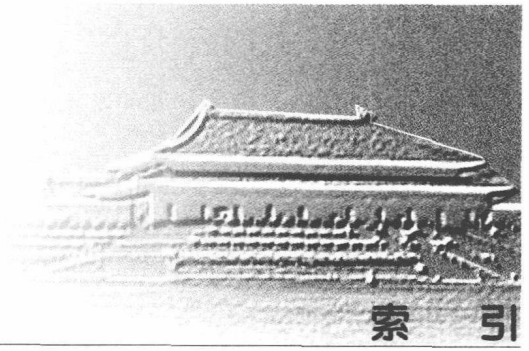
朱叙五，党自新. 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 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1～49

朱英. 唐绍仪与辛亥南北议和. 广东社会科学，1989(2)：73～81

庄吉发. 京师大学堂. 台北："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1970

邹容. 革命军. 见 Tsou Jung(邹容). *The Revolutionary Army, A Chinese Nationalist Tract of 1903*(《革命军，1903年一位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宣传册》). Trans. John Lust. The Hague and Paris: Mouton & Co., 1968

邹身城. 乍浦战役史实补遗. 历史教学，1980(8)：39～40



索 引

（英文版页码）

abdication，退位
  negotiations leading to，退位谈判，210—226，229—230
  terms of，退位条款，226—227
Aihun（garrison），瑷珲（驻防），72，263
Aisin Gioro，爱新觉罗。See imperial clan，见宗室
Alliance，同盟会，12，13，155—156，216
anti-Hanism，排汉
  allegation of，排汉主张，17—18，97，105，106
  denied，拒绝排汉，71，76，106，208
  criticized，批评排汉，106—107，115—116
  rumored in 1911 Revolution，辛亥革命中的排汉谣言，194，195，196，201，208
anti-Manchuism，排满
  rhetoric of，排满的说辞，3—5，9—18，97，105，172，188，189，191，229
  violent acts of，排满的暴力行为，58—59，97，104—105，

172，187—204
proscribed，禁止排满，266，280
in early Republic，民国初期的排满，268
Army of the Green Standard，绿营，23，49，58，89
Articles of Favorable Treatment，优待条件
term of，优待条件的各款，226—227
implementation in early Republic，优待条件在民国初年的实施，231—251
and Chiang Kai-shek，优待条件与蒋介石，271
Association for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宪政公会，127，128，129
Association for Constitutional Preparations，预备立宪公会，127，128，129
Association for the Common Advancement of the Manchus，满族同进会，267—268

Banner Affairs Office，旗务处，138
in Fengtian，奉天旗务处，139—140
Banner Duty Office，值年旗，24，256
Banner lands，旗田
exempt from taxes，旗田免税，49
prohibition on transfer of，旗田禁止买卖，49，77，126
Banner people，旗人
prohibition from marrying civilians，旗民不通婚，16，41—42，65，76，99，109，137，186，262，263，270
preferential political and legal treatment for，旗人的政治、法律优待，17，42—50，75，110，118，125—126，171，264。See also enthic slots，亦见官缺制
as synonymous with Manchus，与“满人”同义，18，67，68，278，290—293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旗人的地理分布，26—33

population of，旗人的人口，34
so classified，as opposed to civilians，与汉民相对的旗人等级，35
governed separately from civilians，旗民分治，36，76
prohibited from outside employment，禁止旗人外出谋生，36，65，66，227，260
segregated residentially from civilians，旗民分居，36—41，262—263。See also Manchu Cities，亦见满城
as a hereditary military caste，作为军事世袭阶层的旗人，36，67，290—291
bound to their garrisons，旗人被限制居住于驻防地，36—37
economic hardship among，旗人的经济困境，49—51，75，80，259—262，263。See also Eight Banner's livelihood problem，亦见八旗生计问题
schemes for resettlement of，重新安置旗人的计划，66，71，80，110—112，122—124，139，259
alarmed at possible disbandment，旗人可能被解散的警示，66，122，138
vocational training for，旗人的职业培训，81，139，259—260。See also Manchus，亦见满人
Banner Reorganization Office，变通旗制处，129，137—138，167，186。See also Office to Manage the Eight Banner's Livelihood，亦见筹办八旗生计处
banner soldiers，旗兵，25—26，27，29—30
decline of，旗兵的衰落，9，57—58
stipends of，旗兵的薪饷，48—49，257—259
training of，旗兵的训练，57
modernization of，旗兵的现代化，57，71，82—90，139，145—149
in combat，旗兵的抗击，58—59，72
banner women，旗人妇女，26，62，81，92—94，139，259—260

in 1911 Revolution，辛亥革命中的旗人妇女，189，192—193，196，203，204
Banners，《旗族月报》，267，268
Barga，巴尔虎，23，30，31
Beijing，北京
Inner City，北京内城，24—25，27，37，38，262，263
Boxer Rebellion in，北京的义和团运动，72
police reforms in，北京的警政改革，86—88，97—98，261
schools for banner people in，北京的旗人学校，91，92，93，95。See also individual schools，亦见各个学校
new court system in，北京的新审判体制，126
vocational education for banner women in，北京旗人妇女的职业训练，139，259—260
Manchu in，北京的满人，205，257—258，261—262，263，281。See also Metropolitan Banners，亦见京旗
Beijing Manchu Language School，北京满文学院，282
Beijing Women's News，《北京女报》，77，93—94，114
Beiyang Army，北洋新军，83，103—104，143，175。See also First Division；Sixth Division，亦见第一镇、第六镇
bondservants，包衣，18—19，23—24，26，51
Boxer Rebellion，义和团运动，71—72
Bureau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宪政编查馆，128，159，167

Cai Chengxun，蔡成勋，261
Cai Tinggan，蔡廷幹，207，209，216
Cai Yuanpei，蔡元培，253
Cangzhou (garrison)，沧州（驻防），59
Cao Kun，曹锟
with First Division，第一镇曹锟，84，103
in Shanxi，曹锟在山西，207，209

as warlord，军阀曹锟，242，244，247
Central Great Harmony Daily，《中央大同日报》，127—128，140
Chahar（garrison），察哈尔（驻防），88，123，258
Chahar（Mongols），察哈尔（蒙古），23，30
Changfu，长福，87，127，136
Changgeng，长庚，158，220
Chen Baochen，陈宝琛，162—163
Chen Baozhen，陈宝箴，133
Chen Bi，陈璧，120
Chen Jiongming，陈炯明，225
Chen Kuilong，陈夔龙，152，158—160，249
Chen Mingxia，陈名夏，60
Chen Tianhua，陈天华，12—18，87
Cheng Dequan，程德全，76—77，108，110，179
Cheng Jiacheng，程家柽，155—156
Cheng Yunhe，程允和，174
Chengdu（garrison），成都（驻防），32
  Manchu City，成都（驻防）满城，38，39—40，263
  poverty of，成都（驻防）的贫困，51
  vocational training in，成都（驻防）的职业教育，81
  military training in，成都（驻防）的军事训练，89
  unrest in，成都（驻防）的不安，122
  resettlement of banner personnel，成都（驻防）旗人的重新安置，122—123
  and 1911 Revolution，成都（驻防）和辛亥革命，201—202
  in early Republic，民国初期的成都（驻防），258，260
Chiang Kai-shek，蒋介石，251，261，271
  ethnic policy of，蒋介石的民族政策，275
China，中国
  concepts of，中国的观念，293—294
  as composed of five ethnic groups，中国的五族构成，116，127，

156，226，265—266，275。See also ethnic policies，亦见民族政策
Chongen，崇恩，148—149，235
Chonglin，崇林。See Chongen，见崇恩
Chun，Prince（1840—1891），醇亲王。See Yihuan，见奕谖
Chun，Prince（1883—1952），醇亲王。See Zaifeng，见载沣
Chuohabu，绰哈布，122
Chuohatai，绰哈泰，258
Cixi，慈禧太后
and Hundred Days of Reform，慈禧太后与百日维新，67，70—71
and Boxer Rebellion，慈禧太后与义和团运动，71—73
reform of Metropolitan Banners，慈禧太后对京师八旗的改革，71
reform proposals solicited by，慈禧太后征求改革建议，73—74，106，108
reform of Manchu-Han relations，慈禧太后改革满汉关系，76—78，80，117—118，122，125
and reimperialization of power，慈禧太后和加强帝制，78—80
and *Beijing Women's News*，慈禧太后与《北京女报》，94
constitutional reforms of，慈禧太后的宪政改革，96，118，128，129
administrative reforms of，慈禧太后的行政改革，100，101
death of，慈禧太后之死，129—132
and recentralization of authority，慈禧太后与加强中央集权，142—143
funeral of，慈禧太后的葬礼，152
tomb desecrated，慈禧太后陵墓被毁，251
Committee of the Readjustment of the Qing Household，清室善后委员会，250
Communists，中国共产党

and Qing imperial household. 中国共产党与清皇室. 273—274
and Manchus. 中国共产党与满人. 277—283
Confederation of Provincial Assemblies. 谘议局联合会. 168—269
Constitutional Outline. 宪法大纲. 129. 143—144. 162. 170. 182
constitutional reform movement. 宪政改革运动. 96—102. 115. 118. 126—129. 134—137. 157—163. 166—170. 179—185. 205
Wang Jingwei's criticisms of. 汪精卫对宪政改革运动的批评. 102. 155
Consultative Assembly. 资政院
decreed. 资政院的政令. 118
first session. 资政院第一次会议. 134. 157—163. 165—167
Manchu representation in. 资政院中的满人代表. 136—137
second session. 资政院第二次会议. 178. 179—180. 184—186. 205. 209
Court of Colonial Affairs. 理藩院. 46. 209. 264. 293
Cuizhen. 崔镇. 136

Dai Hongci. 戴鸿慈. 96. 98. 120
Dashou. 达寿. 209
Daur. 达斡尔. 20. 31. 32. 279. 283
Deji. 德济. 200
Deng Yuanpeng. 邓元彭. 245
Derui. 德锐. 192
Dezhou (garrison). 德州 (驻防). 32. 80. 122
Duan Qirui. 段祺瑞
in late Qing. 晚清的段祺瑞. 103. 177. 206. 221. 225
in early Republic. 民初的段祺瑞. 239. 241. 249. 250. 258. 264
Duanfang. 端方. 43
Han ancestry. 端方的汉族血统. 55. 202

as provincial official，作为地方大员的端方，88，89，91，92
as constitutional reformer，作为立宪改革派的端方，96，98
on Manchu-Han relations，端方关于满汉关系的见解，99，106，107，109，110—111
opponent of recentralization，端方反对中央集权，100
target of anti-Manchus，作为反满目标的端方，105，106
dismissal of，端方被解职，151—152
recall of，端方被召回，152
murder of，端方被刺，202—203
dyarchy，满汉共治，45，65，77—78，99，101，109，264。See also Manchu-Han ratio among officials，亦见官员中的满汉比例

Eastern Miscellany，《东方杂志》，76，114，138，168
Eastern Times，《时报》，153，164，166
Eight Banner system，八旗制度
origins of，八旗制度的起源，18—19
structure and composition of，八旗制度的结构和成分，19—21，23—33
Han appointees to，汉人在八旗中任职，46，75，76—77，256—257
proposals for disbandment of，解散八旗的提议，110—112，116，140
in early Republic，民初的八旗制度，256—257，258
disbandment of，八旗制度的解散，258—259
demilitarization，八旗的废除，264
as basis of Manchu identity，作为满人身份基础的八旗制度，278—279，289—291
Eight Banners Association for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八旗宪政会，167
Eight Banners' livelihood problem，八旗生计问题，50，66，75，137—138，227。See also banner people；economic hardship a-

mong，亦见旗人的经济困境
1898 reforms，1989 年变革。See Hundred Days of Reform，见百日维新
Enhua，恩华，264
Enming，恩铭，104—105
ethnic policies，民族政策，293—295
  of Qianlong，乾隆皇帝的民族政策，116
  of Nationalists，国民党的民族政策，275
  of Manchukuo，“满洲国”的民族政策，276
  of Communists，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277，283
ethnic slots，官缺制，45—47，65，78，99，101，109，241，264
Evenki，鄂温克，279，283。See also Solun，亦见索伦

Feng Guozhang，冯国璋，77，83，253
  at Nobles Military School，陆军贵胄学堂的冯国璋，85
  on army General Staff，陆军军谘处的冯国璋，144，145
  in command against revolutioniaries，冯国璋指挥军队对抗革命军，176，177，178，207，265
  as head of Palace Guard，作为禁卫军统领的冯国璋，206，218，226，235，238，244—245
  disagreements with Yuan Shikai，冯国璋与袁世凯意见相左，207，219
  during abdication negotiations，退位谈判中的冯国璋，215，218—219，221，222，225
  rivalry with Duan Qirui，冯国璋与段祺瑞的对立，221，222，239
  opposed to Yuan's monarchical scheme，冯国璋反对袁世凯的称帝计划，239
  support for Puyi，冯国璋支持溥仪，240
  opposed to Zhang Xun，冯国璋反对张勋，241
Feng Xu，冯煦，112—113

Feng Yuxiang，冯玉祥，242—243，247—250，254，260
Fengshan，凤山，44，83，84，103，143，201
Fengtian，奉天，139—140，159—160，281
First Division，第一镇
  origins of，第一镇的缘起，83—84
  centralization of control over，集中控制第一镇，103—104，143
  as palace guard，作为禁卫军的第一镇，145，149
  and formation of Palace Guard，第一镇与禁卫军的组建，146，147
  and 1911 Revolution，第一镇与辛亥革命，175—176
  and murder of Wu Luzhen，第一镇与刺杀吴禄贞，208
  and Qing abdication，第一镇与清帝退位，218，219，226
  in early Republic，民初的第一镇，261
Fong，George，邝佐治，156
footbinding，缠足，94，204，254。See also under Manchu-Han differences，亦见满汉差异下相关条
Fraser，Everard，法磊斯，75
Fuqi，孚琦，44，172
Fuzhou（garrison），福州（驻防），32，38，89，258，262
  and 1911 Revolution，福州（驻防）与辛亥革命，194—196

Gangyi，刚毅，17，18，71，72，97
Gao Lingxiao，高凌霄，186
Gao Youtang，高友唐，271
General Staff，军谘处，144—145，167
Germany，德国
  mission of apology to，向德国道歉的外交使团，73
  as model for Zaifeng，载沣以德国为榜样，144，171
Gong，Prince（1832—1898），恭亲王。See Yixin，见奕䜣
Gong，Prince（1880—1937），恭亲王。See Puwei，见溥伟

Grand Council，军机处，100，101
princely participation in，军机处的亲王干政，78，79，120，153
membership of，军机处的大臣，101，117，151，160
condemned by National Assembly，备受资政院谴责的军机处，160—162
replaced by cabinet，军机处被内阁取代，167
Great Harmony Journal，《大同报》，114—116，127，156
Guan Zhonghe，关忠和，148，235，238，241，245
Guangfu，广福，202
Guangxu emperor，光绪皇帝
and Hundred Days of Reform，光绪皇帝与百日维新，63，67
edict on Eight Banner's livelihood，光绪皇帝颁布八旗生计的法令，66
flight to and return from Xi'an，光绪皇帝逃亡西安并从西安返回，72，73
death of，光绪皇帝之死，129—130
burial of，光绪皇帝的葬礼，234
Guangzhou (garrison)，广州（驻防），32，38，39，42
poverty of，广州（驻防）的贫穷，51
and First Opium War，广州（驻防）与第一次鸦片战争，58
difficulties with resettlement of，广州（驻防）安置的困难，122，123
and 1911 Revolution，广州（驻防）与辛亥革命，201
in early Republic，民初的广州（驻防），258，260，262，263
descendants of，广州（驻防）的后代，274，278
Guards Army，武卫军
Center Division of，武卫中军，71，72，81
Guifu，贵福，277
Guilin，贵林，93，200
Guixiu，贵秀，108—109，110

Ha Hanzhang，哈汉章，144—145，146
Han，汉人
as non-banner civilians，作为非旗人的汉人，8，35，68，278，290，293，295
terminology for，用于汉人的术语，14，15，68，275，291，293
land expropriated by Manchus，被满人剥夺了土地的汉人，37，40
immigration into Manchuria，移民满洲的汉人，41
Han culture，汉文化
Manchufication of，汉文化的满化，15，59—62，255
differences from Manchu culture，汉文化与满文化的差异，52，54，60—63
Hangzhou（garrison），杭州（驻防），30，32
and Taiping Rebellion，杭州（驻防）与太平天国运动，59
and late Qing banner reforms，杭州（驻防）与晚清旗人改革，89，92，93，138
and 1911 Revolution，杭州（驻防）与辛亥革命，200
in early Republic，民初的杭州（驻防），258，262，263
Hanjun，汉军，19，20，23，50，55
He Zonglian，何宗莲，84，103，261
Headland，Isaac Taylor，何德兰，132
Hebei，河北。See Zhili，见直隶
Heilongjiang，黑龙江，59，123，124，281
Heinrich，Prince，亨利亲王，73，144，318 页注 75
Hengjun，恒均，114—116，127，128，238，267
Hengling，恒龄，200
Hezhe，赫哲，20，32，279，283
Hillier，E. G.，熙礼尔，132
Hong Taiji，皇太极，11，18，19，52，272
Hu Egong，胡鄂公，260

Hu Qian. 胡潜. 109
Hu Shi. 胡适. 248—249
Hu Weide. 胡惟德. 219
Hu Yufen. 胡燏棻. 86
Hua Zhenji. 华振基. 149
Huang Fu. 黄郛. 247
Huang Fusheng. 黄复生. 154—156
Huang Xing. 黄兴. 207. 217. 233. 265
Huiyuan. 惠远。See Yili. 见伊犁
Hulan (garrison). 呼兰（驻防）. 47. 53
Hundred Days of Reform. 百日维新. 63—67. 68—69
  leaders purged. 百日维新领袖被逐. 70—71
  pardon for leaders. 百日维新领袖被赦免. 74. 133—134. 162—163. 180. 182

imperial clan. 宗室. 20—21. 55—56. 65
Imperial Clan Court. 宗人府. 21. 24. 46. 65. 101
  jurisdiction challenged. 挑战宗人府的权限. 125. 141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内务府
  in Qing. 清朝内务府. 23. 24. 16. 101
  in early Republic. 民初的内务府. 237. 244. 246—247
imperial kinsmen's cabinet. 皇族内阁. 167—170. 179—183
imperial lineage. 皇族. 20—21. 125. 140—141. 227
imperialism. 帝制.
  fear of. 对帝制的忧虑. 4. 12. 63. 64. 65. 114—115. 159—160. 207

Japan. 日本
  as model for reform of hair and dress code. 作为发式和服装改革样本的日本. 64—65. 163. 165
  and military modernization. 日本与军事现代化. 82—83.

85—86，89
and police reforms，日本与警政改革，86—88，89
Chinese political activism in，日本的中国政治激进主义，87，127
and educational reform，日本与教育改革，92
as model for constitutional reform，作为立宪改革样本的日本，98，118，128，159，180
as model for banner reform，作为旗人改革样本的日本，99，111—112
as model for reimperialization of authority，作为加强中央权力样本的日本，167，171
hostility toward 1911 Revolution，日本对辛亥革命的敌视，212—213，218
support for Qing royalists，日本支持清朝保皇党人，236
and Manchukuo，日本与“满洲国”，271—273
Japanese Army Officers School，日本陆军士官学校，85—86，89
graduates of，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82，84，97，133，144—145，146，148，180，277
Jiang Chunlin，江春霖，113，133，153
Jiang Guiti，姜桂题，82，226
Jiang Shuzi，姜叔子，64
Jiangning，江宁。See Nanjing，见南京
Jiaqing emperor，嘉庆皇帝，53，57，58，61—62
prohibition on prince's participation in government，嘉庆皇帝禁止亲王干政，78，169，180，182，240—241
Jilin，吉林，59，128—129，281
Jin，晋朝，52
Jingkou，京口。See Zhenjiang，见镇江
Jingzhou (garrison)，荆州（驻防），29—30，32，38
as “language island”，作为语言孤岛的荆州（驻防），42

and study of Manchu language，荆州（驻防）与满语学习，53，95
and late Qing banner reforms，荆州（驻防）与晚清旗人改革，80，88—89，91—92
detachment of troops in Wuchang，荆州（驻防）在武昌的分遣队，88，188
and 1911 Revolution，荆州（驻防）与辛亥革命，198—200
in early Republic，民初的荆州（驻防），258，260，263
Jinliang，金梁，93，137，139—140，220，264，277
Jinzhou（garrison），锦州（驻防），77，139，279
Johnston，Reginald，庄士敦，244，246，248
Jordan，John，朱尔典，151，152，213
Jurchen，女真，18，20，52，60

Kaifeng（garrison），开封（驻防），32，38，122，124
Kang Youwei，康有为
and Hundred Days of Reform，康有为与百日维新，63，64—65
purge of，康有为被驱逐，71
no pardon for，未赦免康有为，74，133—134，162，180
contacts with Shanqi，康有为与善耆联系，155
pardon of，赦免康有为，182
as Qing loyalist，作为保皇党的康有为，240，250
Kawashima Naniwa，川岛浪速，87—88，236
Ketteler，Baron von，克林德，72
Khorchin，科尔沁，23
Kiakar，库雅喇，20，32
Koreans，朝鲜人
in Manchu banners，满八旗中的朝鲜人，20
Kungang，昆冈，74
Kunming Lake Naval School，昆明湖水师学堂，48，150

Lao She 老舍
family of，老舍的家庭，24，50—51，53，66
death of father，老舍父亲之死，72
as representative of Manchu，作为满族代表的老舍，274
attitude toward Manchu ancestry，老舍对其满族祖先的态度，276，280
Li Chengyin，李承荫，270，283
Li Guojie，李国杰，76，77，122，152
Li Hongcai，李鸿才，107，109，110
Li Hongzhang，李鸿章，72，74
Li Jiaju，李家驹，179
Li Kuiyuan，李奎元，103
Li Shangwen，黎尚雯，186
Li Shengduo，李盛铎，98
Li Weiran，李蔚然，109
Li Xieyang，李燮阳，245
Li Yuanhong，黎元洪，174，199，206—211，239，260
Lianfang，联芳，78
Liang Dingfen，梁鼎芬，107—108
Liang Dunyan，梁敦彦，167
Liang Qichao，梁启超
on Manchu-Han relations，梁启超对满汉关系的看法，3—5，70
no pardon for，未赦免梁启超，74，133—134，162，180
and constitutional movement，梁启超与立宪运动，127
contacts with Shanqi，梁启超与善耆联系，155
pardon of，赦免梁启超，182
Liang Shiyi，梁士诒，233
Liangbi，良弼，21，23，87，175
as target of anti-Manchus，作为反满目标的良弼，97，105
and Palace Guard，良弼与禁卫军，148，206

as opponent of abdication，反对退位的良弼，218，222
Liangzhou (garrison)，凉州（驻防），123，258
Liankui，连魁，198—200
Liaoning，辽宁。See Fengtian，见奉天
Liaoyang (garrison)，辽阳（驻防），139
L'Impartial，《大同报》，94—95，105，134
Lin Shaonian，林绍年，101，103，117
Liu Cheng'en，刘承恩，206—207，208，209
Liu Kunyi，刘坤一，74，75
Liu Zhenyu，刘震宇，61
Longyu，Empress Dowager，隆裕太后，132，152，153，206
and abdication negotiations，隆裕太后与退位谈判，213，216，221—226
in early Republic，民初的隆裕太后，233，236，266
Lower Five Banners，下五旗，19
Lu Chuanlin，鹿传霖，74，116，117，313 页注 122
Lu Runxiang，陆润庠，120
Lu Zongyu，陆宗舆，161
Lü Haihuan，吕海寰，114，118
Luanzhou armed remonstrance，滦州兵谏，180—185
Luo Wanzhang，罗万章，268

Manchu banners，满洲八旗，18—23
Manchu cities，满城，37—40，51，186，190，193，198，262—263
Manchu culture，满文化
Sinicization of，满文化被汉化，9，53—58，89—90，275
imposed upon Han，强加给汉人的满文化，15，59—62，163—166
core elements of，满文化的核心因素，52，57，95
influence on Han culture，满文化对汉文化的影响，61，255

dethroned in early Republic，民初满文化的式微，252—255
Manchu language，满语，52—54，61—62，95，109—110，254，281，282
Manchu Studies，《满族研究》，281
Manchufication，满族化。See under Han culture，见汉文化下相关条
Manchu-Han differences，满汉差异，63，68，126，172，204，288
in legal classification，法律分类中的满汉差异，35，65，75，200，268—269，270
in Chinese-speech accent，汉语口音上的满汉差异，42，189，192
in length of mourning period，丁忧期限上的满汉差异，47，118，141
in language，语言上的满汉差异，52
in men's names，男子姓名上的满汉差异，54—57，108—109，113，137，186，196，268—269，270
in men's hairstyle，男子发式上的满汉差异，50。See also queue，亦见辫子
in men's dress，男子服饰上的满汉差异，60—61
in women's hairstyle，女子发式上的满汉差异，62
in women's dress，女子服饰上的满汉差异，62，186，192，196
in footbinding among women，女子缠足上的满汉差异，62，110，192，196
in terms of self-address by memorialists，自称上的满汉差异，63，109，141—142
Manchu-Han ratio among officials，官员中的满汉比例
under dyarchy，满汉共治下的满汉官员比例，45—48
under Cixi，慈禧太后统治下的满汉官员比例，78，101—102，117，119—120

under Zaifeng，载沣统治下的满汉官员比例，151，167
in Yuan Shikai's Qing cabinet，袁世凯内阁中的满汉官员比例，209，327 页注 97
Manchu-Han relations，满汉关系
and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满汉关系与洋务运动，47—48
and Hundred Days of Reform，满汉关系与百日维新，64—66
under Cixi，慈禧太后统治下的满汉关系，74—81，106—114，116，117—118，122—126
debated in provincial assemblies，谘议局中关于满汉关系的争论，136
under Zaifeng，载沣统治下的满汉关系，137—138，140—142，163—166，185—186，209
Manchukuo，“满洲国”，271—273
and Manchus，“满洲国”与满人，276—277
Manchuria，满洲
banner garrisons in，满洲的八旗驻防，31—32
as a Manchu preserve，作为满人保留地的满洲，40—41
governmental administration，满洲的官制，46—47
banner stipends in，满洲的旗人薪俸，49
Manchu land ownership in，满洲的旗地，49
livelihood of banner people in，满洲的旗人生计，51，80，260
extent of spoken Manchu in，满洲说满语的范围，54
and Boxer Rebellion，满洲与义和团运动，72
ban on Han immigration lifted，废除禁止汉人移民满洲的禁令，77
administrative changes in，满洲行政制度的变化，77，101，140
in 1911 Revolution，辛亥革命中的满洲，205
as possible refuge for Qing court，作为清廷可能庇护所的满

洲，220
Manchu population in，满洲的满族人口，277，281。See also Fengtian；Heilongjiang；Jilin，亦见奉天、黑龙江、吉林
Manchus，满人
terminology for，关于满人的术语，8，14—15，67—68，269，278，289—293，295
population of，满人人口，34，276，279，280，282—283
Republican reassurances to，民国对满人的承诺，155，210，212，214
in abdication agreement，退位协议中的满人，227，256
in early Republic，民初的满人，256—270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of，满人的政治代表，264，267，276，279—280
political activism in early Republic，民初满人中的政治激进主义，267—268
attitude toward ancestry，满人对其祖先的态度，268—270，276，283
under Nationalists，国民党统治下的满人，275—276
in Manchukuo，“满洲国”中的满人，276—277
in People's Republic，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满人，277—283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满人的地理分布，281。See also banner people，亦见旗人
Meng Sen，孟森，135，144
Metropolitan Banners，京旗，26
composition of，京旗的组成，19，27
resettlement scheme for，京旗安置计划，71
military modernization of，京旗的军事现代化，71，81，82—84
military education of，京旗的军事教育，84—86
and police reforms，京旗与警政改革，86—88
and educational reforms，京旗与教育改革，91

and Palace Guard，京旗与禁卫军，146—147
in early Republic，民初的京旗，257—259
Metropolitan Banners Standing Army，京旗常备军。See First Division，见第一镇
Metropolitan Banners Training Office，See Office for the Training of the Metropolitan Banners，见京旗练兵处
Metropolitan Military Primary School，京师武备小学堂，84—85
Metropolitan Training Office，京畿督练公所，103，143
Metropolitan University，京师大学堂，92
Military Preparatory School，武备学堂
at Tianjin，天津武备学堂，72，84，85
at Baoding，保定武备学堂，84
Military of Foreign Affairs，外务部，77—78，79—80，101，209
Miyun (garrison)，密云（驻防），30，84，258
Mongol banners，蒙古八旗，19，23
Mongols，in Manchu banners，满洲八旗中的蒙古人，20
Mou Lin，牟琳，185—186
Mukden，谋克敦。See Shengjing，见盛京
Mulan (garrison)，木兰（驻防），30，58

Najin，那晋，148
Nanjing (garrion)，南京（驻防），30，32，38
and Taiping Rebellion，南京（驻防）与太平天国运动，59
and late Qing banner reforms，南京（驻防）与晚清八旗改革，81，89
and 1911 Revolution，南京（驻防）与辛亥革命，196—198
in early Republic，民初的南京（驻防），258，276
National Assembly，See Consultative Assembly，见资政院
Nationalists，国民党，242
and Puyi，国民党与溥仪，251，271
and Manchus，国民党与满人，275—276

Natong，那桐，43，76，141
as a metropolitan official，京官那桐，86，102，120，137
as grand councilor，军机大臣那桐，151，160
as associate prime minister，内阁总理大臣那桐，167，174，183
navy，海军，149—150，174—177
Manchu officers in，海军中的满人官员，150，176，203
Navy Yamen，海军衙门，48，79，149
Nayantu，那彦图，217，219，220
New Manchus，伊彻满人，20，279
Nineteen-Article Compact，十九信条，184—185，213
1911 Revolution，foreign intervention in，外国势力对辛亥革命的干涉，189，199—200，212—213，324 页注 42
Ningxia（garrison），宁夏（驻防），38，203，258
Niuzhuang（garrison），牛庄（驻防），139
Nobels Military School，陆军贵胄学堂，85，145，147—148，166
North-China Herald，《北华捷报》，151，234
Nurhaci，努尔哈赤，11，18

Office for the Training of the Metropolitan Banners，京旗练兵处，82，86
Office of Governmental Affairs，政务处，74，116—117，123—124，125，159，167
Office of Military Training，练兵处，82，84，85，88，89，97
Office to Manage the Eight Banner's Livelihood，筹办八旗生计处，259
Old Manchus，老满人，20
Olot，厄鲁特，23，30，31
Opium Wars，鸦片战争，58
Oroqen，鄂伦春，20，31，279，283

Palace Guard，禁卫军，145—149，175—176，206
during abdication negotiations，退位谈判中的禁卫军，218，219，222，226
in abdication agreement，退位协议中的禁卫军，227
in early Republic，民初的禁卫军，234—235，238，241，244—245，261
disbandment of，禁卫军的解散，245，248
palace guard，宫廷待卫，27，82，84，237。See also Palace Guard，亦见禁卫军
Peking Field Force，神机营，27，48，54，57，72，81
People's Journal，《民报》，12，13，155，156
police，警察
in Beijing，北京的警察，86—88，97—98，261
in provincial garrisons，各省驻防的警察，89，124
Political Information Institute，政闻社，127，128
political storm of 1907，1907 年的政治风波，103—104，117
Princes participation in government，亲王干政，181，186—187
dynastic tradition against，清朝祖制反对亲王干政，78—79，168—169，180
under Cixi，慈禧太后统治下的亲王干政，78—80，102，120，153
under Zaifeng，载沣统治下的亲王干政，153，167—169
reenactment of dynastic tradition against，再次重申反对亲王干政的祖制，182，185，240—241
provincial assemblies，谘议局
authorized，批准设立谘议局，118
Manchu representation in，谘议局中的满人代表，134—135
in Guangdong，广东谘议局，136，225
in Zhili，直隶谘议局，135
in Shandong，山东谘议局，136
in Zhejiang，浙江谘议局，136

in Hunan，湖南谘议局，160
in Guangxi，广西谘议局，161
in Yunnan，云南谘议局，161
in Fujian，福建谘议局，194—195
provincial garrisons，各省驻防
structure of，各省驻防的结构，27—30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各省驻防的地理分布，30—32
numerical strength of，各省驻防的兵力，33
vocational training in，各省驻防的职业培训，81，124—125
military reorganization of，各省驻防的军事振兴，88，124—125
and reform of military education，各省驻防与军事教育改革，88—89，124
and police reforms，各省驻防与警政改革，89，124
and educational reforms，各省驻防与教育改革，91—93，124
proposals for disbandment of，关于解散各省驻防八旗的提议，99，101—102，117，122—124，186
disbandment in early Republic，民初驻防八旗的解散，258
See also individual garrisons，亦见各地驻防
Pu Dianjun，蒲殿俊，201
Public Works and Patrolling Bureau，工巡局，86—87，98
Pujie，溥杰，273，274
Pujun，溥儁，71，72—73
Puliang，溥良，102，120，126
Pulun，溥伦
as President of National Assembly，资政院总裁溥伦，118，128，157
as possible successor to Guangxu，光绪皇帝的候选继承人溥伦，130
at Banner Reorganization Office，变通旗制处的溥伦，137
charged to draft constitution，受命起草宪法的溥伦，159，180，182

as member of Yikuang's cabinet，奕劻责任内阁成员溥伦，168，183
and abdication negotiations，溥伦与退位谈判，211，213，216，218
as representative of Qing to Republic，作为清廷派向民国的代表溥伦，233—234，237—238
out of favor with Qing court，失去清廷信任的溥伦，238，240
as banner official，八旗官员溥伦，256
Pushou，朴寿，194—195
Puting，溥颋，102，120
Putong，溥侗，146
Puwei，恭亲王溥伟，168
as possible successor to Guangxu，光绪皇帝的候选继承人溥伟，130
and abdication negotiations，溥伟与退位谈判，219—220，221，223
in early Republic，民初的溥伟，235
and Manchukuo，溥伟与“满洲国”，271—272
Puyi，宣统皇帝，溥仪
birth of，溥仪的出生，100
chosen to succeed Guangxu，溥仪被选继承光绪皇帝帝位，130—131
issue of edicts of apology and denial，溥仪颁布罪己诏，181—182，186
and Zhang Xun，溥仪和张勋，240
wedding of，溥仪大婚，245，246
expulsion from Forbidden City，溥仪被逐出紫禁城，247
and Nationalists，溥仪与国民党，251，271
and Manchukuo，溥仪与“满洲国”，272—273
and Communists，溥仪与中国共产党，273，274

Qianlong emperor，乾隆皇帝，56，60，63，116
desecration of tomb，乾隆皇帝陵墓被破坏，251
Qing，Prince，庆亲王。See Yikuang，见奕劻
Qing emperor，清朝皇帝
fate of compared with other rulers，清朝皇帝与其他统治者的命运比较，155，289
attempts to restore，复辟努力，235—236，237，240—241，272—273
Qing imperial tombs，清帝陵，30—31，32，281
desecration of，对清帝陵的破坏，250—251
Qingrui，清锐，138
Qingzhou（garrison），青州（驻防），32，38，80，81，122，258
Qiu Jin，秋瑾，104—105
Qu Hongji，瞿鸿禨，78，100，101，103，117
Queue，辫子
cutting of，剪辫，12，113—114，166，246，252—254
denunciation of，对留辫的谴责，15
required，要求留辫，60，118
abolition of called for，号召废除辫子，64—65，163—166，169，186，209
modification of，对辫子的改变，113
made optional，对留辫与否做出选择，209
retained in early Republic，民初仍然留辫，240，253—254

recentralization of authority，中央集权，142—143，170—171，100，286，287—288
Reconstruction Plan，善后办法，237，241，244，245，248
Rehe（garrison），热河（驻防），89，122，124—125，258
Reid，Gilbert，李佳白，210，220
reimperialization of authority，加强帝制，143—145，153，167，

171，286—287
reversal of，地方分权，186—187，206，287—288
Restoration Society，光复会，97，104
Rockhill，W. W. 柔克义，132—133
Ronglu，荣禄，44，71，74，79，152，191
Rongqing，荣庆，95，102，116，118，120
Rongxun，荣勋，264
Royalist Party，宗社党，215，235，236
Ruicheng，瑞澂，127，158，174，188，190
Russia，俄国
as model for China，中国的榜样俄国，64
Manchuria occupied by，俄国占领满洲，72
protests against，拒俄，87，104
as negative example，反面榜样俄国，180
Russians，in Manchu banners，满八旗中的俄国人，20

Sa Zhenbing，萨镇冰，149—150，174—178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洋务运动，47—48
Seminar on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宪政讲习会，115，127。See also association for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亦见宪政公会
Shang Qiheng，尚其亨，98
Shanqi，肃亲王善耆
and Boxer Rebellion，善耆与义和团运动，71
and police reforms，善耆与警政改革，86
and educational reform，善耆与教育改革，91
as metropolitan official，京官善耆，120，153
and navy reform，善耆与海军改革，149
and Wang Jingwei，善耆与汪精卫，155—156
in Yikuang's cabinet，奕劻责任内阁中的善耆，155—156，183
during abdication negotiations，退位谈判中的善耆，213，220

in early Republic，民初的善耆，235—236，271
Shaoying，绍英，96—98，139，237，246，247
Shen Guifen，沈桂芬，35，66
Shen Jiaben，沈家本，110，125，137，157
Shengjing（garrison），盛京（驻防），31，62，89，139—140
Shiduo，礼亲王世铎，79
Shixu，世续，164
as grand councilor，军机大臣世续，101，117
as president of National Assembly，资政院总裁世续，168，179
as representative of Qing in early Republic，民初清廷代表世续，233—234，237，239，240，243，246
Shoufu，寿富，64，72
Shouqi，寿耆，102，120
Shuangcheng（garrison），双城（驻防），49
Shunzhi emperor，顺治皇帝，60
Sinicization，汉化。See under Manchu culture，见满文化下相关条
Sixth Division，第六镇，82，84，143，208
Socialist Party，社会党，225
Society for Monarchical Constitutionalism，君主立宪赞成会，215，218，219，226。See also Royalist Party，亦见宗社党
Society for the Education of a Militant Citizenry，军国民教育会，87
Society of Comrades，同志会，159，162
Solun，索伦，20，31，32。See also Evenki，亦见鄂温克
Songshou，松寿，44，158，194—195
Songyu，松毓，128
Sterkendries Marcel，马塞尔，199—200
Study Society to Know Shame，知耻学会，64
Su，Prince，肃亲王。See Shanqi，见善耆
Su Liangbi，苏亮弼，198

Suiyuan (garrison), 绥远（驻防）, 32, 37—38, 73, 89, 124, 203, 258
Sun Baoqi, 孙宝琦, 169
Sun Jia'nai, 孙家鼐, 100, 116, 118, 128, 131, 157
Sun Yat-sen, 孙中山, 12, 99, 106
  no pardon for, 未被赦免的孙中山, 74
  return from exile, 孙中山流亡归来, 213
  as president, 临时大总统孙中山, 215, 253
  and abdication negotiations, 孙中山与退位谈判, 215, 217, 218, 224, 228
  and Qing court in early Republic, 孙中山与民初的清廷, 233, 248, 253
  and early Republican politics, 孙中山与民初政治, 236, 242
  ethnic policy of, 孙中山的民族政策, 275

Taiping Rebellion, 太平天国运动, 58—59
Taiyuan (garrison), 太原（驻防）, 32, 38, 124, 258
  and 1911 Revolution, 太原（驻防）与辛亥革命, 193
Tan Renfeng, 谭人凤, 225
Tan Wenjiang, 谭温江, 251
Tang Jingchong, 唐景崇, 166
Tang Shaoyi, 唐绍仪, 211—214, 216, 217, 242, 248
Tang Shouqian, 汤寿潜, 127, 163—164, 169
Tang Wenzhi, 唐文治, 210
Tang Xizhi, 唐牺支, 198, 199, 200
Tian Xianzhang, 田献章, 146, 149
Tibetans, in Manchu banners, 满八旗中的藏人, 20
Tieliang, 铁良, 30, 85, 88, 96
  relationship with Yuan Shikai, 铁良与袁世凯的关系, 76, 100, 102—104, 107, 218
  and banner reform, 铁良与八旗改革, 82—83, 116, 117

target of anti-Manchu，作为反满目标的铁良，97，105
as metropolitan official，京官铁良，101，118，120
and Palace Guard，铁良与禁卫军，145—146
and naval reorganization，铁良与海军重建，149
relationship with Zaifeng，铁良与载沣的关系，151—153
during 1911 Revolution，辛亥革命中的铁良，196—197，218
in early Republic，民初的铁良，235
Tiezhong，铁忠，188，190
Tiger Spirit Division，虎神营，71，72，81
Tingjie，廷杰，122
Tongmenghui，见同盟会
Tongzhi emperor，and reform of Eight Banner system，同治皇帝与八旗制度改革，35
Translators College，同文馆，48，54，92

Upper Three Banners，上三旗，19
Urumqi（garrison），乌鲁木齐（驻防），38

Wang Guowei，王国维，253
Wang Jilie，王季烈，196
Wang Jingwei，汪精卫，102，242
assassination attempts of，汪精卫的暗杀努力，154—156，185
and abdication negotiations，汪精卫与退位谈判，207，211，226
Wang Tingzhen，王廷桢，84，148，235，238，241，245
Wang Wenshao，王文韶，74，78
Wang Yujia，王遇甲，176，177
Wang Zhanyuan，王占元，177
Wanrong，婉容，246
Wen Shengcai，温生才，172
Wen Zongyao，温宗尧，210，211，242
Wenbin，文斌，123

Weng Tonghe，翁同龢，133
Wenhua，文华，146
Wenkai，文楷，194，195
Wenpu，文溥，161
Wenrui，文瑞，191，192
Wenxiu，文绣，246
Wilhelm II，Kaiser，威廉二世，73，144
Willow Palisade，柳条边，32，40—41
Wright，Mary，芮玛丽，9，10，35，68
Wu Luzhen，吴禄贞，133，181，208
Wu Peifu，吴佩孚，242，247，250
Wu Tingfang，伍廷芳
  and queue-cutting，伍廷芳与剪辫，163—164，166
  call on Qing to abdicate，伍廷芳要求清廷退位，210
  and abdication negotiations，伍廷芳与退位谈判，211—212，214，216—218，222，224—225，232
  and abrogation of abdication agreements，伍廷芳与废除退位协议，242
Wu Yue，吴樾，97，98
Wuzesheng，乌泽声，114—116，128，222，238

Xi'an (garrison)，西安（驻防），32，38—39，42，89，258，263
  and 1911 Revolution，西安（驻防）与辛亥革命，190—193
Xianjun，宪均，273
Xibe，锡伯族
  as New Manchu，作为新满人的锡伯族，20
  and Manchu language，锡伯族与满语，53，54，277—278，282
  in Yili region，伊犁地区的锡伯族，202，277
  as recognized ethnic group in People's Republic，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被认定为一个民族，279，283
Xiliang，锡良，23，43，139，158—160，220

Xiong Chengji，熊成基，154，155
Xiong Xiling，熊希龄，111—112，116
Xiqia，熙洽，277
Xiuyan (garrison)，岫岩（驻防），36，41—42，56，281
Xiyan，熙彦，268
Xu Shichang，徐世昌
  in Manchuria，徐世昌在东北，77，124，133，139
  and constitutional reforms，徐世昌与立宪改革，96，98，116
  at Ministry of Police，徐世昌在巡警部，97
  as grand councilor，军机大臣徐世昌，151，160
  as member of Yikuang's cabinet，奕劻责任内阁成员徐世昌，167，183
  secret conference with Yuan Shikai，徐世昌与袁世凯的密谈，177，322 页注 12
  on army General Staff，陆军军谘处的徐世昌，183
  in early Republic，民初的徐世昌，240，241
Xu Shoupeng，徐寿朋，78
Xu Xilin，徐锡麟，104—105
Xu Zhishan，徐致善，146
Xuantong emperor，宣统皇帝。See Puyi，见溥仪

Yan Fu，严复，134，137，146
Yan Xishan，阎锡山，208，209
Yang Du，杨度
  and agitation for constitutional reforms，杨度与鼓动立宪改革，115，127，128
  on banner reform，杨度关于旗人改革的意见，116
  as Qing official，清朝官员杨度，129
  during 1911 Revolution，辛亥革命中的杨度，207，211，222
Yang Sen，杨森，254
Yang Shixiang，杨士骧，81

Yang Wending，杨文鼎，160
Yigu，贻穀，124
Yihuan，醇亲王奕譞，79，131
Yikuang，庆亲王奕劻
family background of，奕劻的家庭背景，21
and banner people's livelihood，奕劻与八旗生计问题，71
and Boxer troubles，奕劻与义和团问题，71，72
and Office of Governmental Affairs，奕劻与政务处，74，116
and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奕劻与外务部，78，79—80，102，167
and princes' participation in government，奕劻与亲王干政，78，79—80，120，153
as grand councilor，军机大臣奕劻，79，101，117，151，160
and Office of Military Training，奕劻与练兵处，83，85
and Nobles Military School，奕劻与陆军贵胄学堂，85，148
and police reforms，奕劻与警政改革，87
administrative reforms of，奕劻的官制改革，100
and Ministry of Army，奕劻与陆军部，103，145
impeachment of，奕劻被弹劾，133
and naval reorganization，奕劻与海军重建，149
as target of assassination attempt，奕劻成为暗杀的目标，157
as prime minister，内阁总理大臣奕劻，167—169，177
and outbreak of revolution，奕劻与辛亥革命的爆发，174
resignation of，奕劻辞职，183
and abdication negotiations，奕劻与退位谈判，211，213，216，218，222
Yili (garrison)，伊犁（驻防），32，92，258
and 1911 Revolution，伊犁（驻防）与辛亥革命，202
Yin Changheng，尹昌衡，201—202
Yinchang，荫昌
and Boxer diplomacy，荫昌与义和团外交，72，73

as army minister，陆军部尚书荫昌，152
and queue-cutting，荫昌与剪辫，164
as commander against revolutionaries，荫昌指挥清军对抗革命军，174—178
as republican official，民国官员荫昌，243，265
Ying Lianzhi（Vincent Ying），英敛之，94
Yingrui，英瑞，125
Yixin，恭亲王奕䜣，21，54，78，79
Yongzheng emperor，雍正皇帝，42，53
Yu Liansan，俞廉三，104，125
Yuan Chang，袁昶，66，71，73
Yuan Shikai，袁世凯
entry into officialdom，袁世凯进入官场，44
and Tieliang，袁世凯与铁良，76，82，102—104
and reform of Metropolitan Banners，袁世凯与京旗的改革，82—84
and constitutional reforms，袁世凯与立宪改革，96，100，116—117，179，322页注12
on Manchu-Han relations，袁世凯关于满汉关系的看法，106—107
as grand councilor，军机大臣袁世凯，117
as metropolitan official，京官袁世凯，120
dismissal of，袁世凯被解职，129，133
in retirement，赋闲在家的袁世凯，169，176
recall of，袁世凯被召回，174—175，177
in command at Hubei front，在湖北前线指挥的袁世凯，178
designated prime minister，袁世凯被任命为内阁总理，183，205—206
negotiations with republicans，袁世凯与共和派进行谈判，206—207，209—211，215—216，217，223—225
and murder of Wu Luzhen，袁世凯与刺杀吴禄贞，208

and queue-cutting，袁世凯与剪辫，209，253
negotiations with Qing court，袁世凯与清帝谈判，213，216，219，221
attempted assassination of，暗杀袁世凯的努力，216
and Liangbi's assassination，袁世凯与良弼的暗杀，222
and Qing abdication，袁世凯与清帝退位，226
elected president，袁世凯被选为总统，228
dealing with post-abdication Qing court，袁世凯与退位后的清廷交涉，232—234，236—239
and republican attire，袁世凯与共和国的服饰，254
dealings with Eight Banner，袁世凯处理八旗事务，256，259，264，266
Yukun，玉昆，202
Yulang，毓朗，141，309 页注 39
and police reforms，毓朗与警政改革，86，87，89，97—98
and Palace Guard，毓朗与禁卫军，145，146
and army General Staff，毓朗与陆军军谘处，145，152，167，174，183
as grand councilor，军机大臣毓朗，151，153，160，168
during abdication negotiations，退位谈判中的毓朗，213，219
Yulu，裕禄，152

Zaifeng，醇亲王载沣
mission to Germany，载沣出使德国，73，144
and constitutional reforms，载沣与立宪改革，99—100，134，158—162，182—185
as grand councilor，军机大臣载沣，117，120
named regent，被任命为摄政王的载沣，130—133
and leaders of Hundred Days of Reform，载沣与百日维新的领导人，133—134
and elimination of Manchu-Han differences，载沣与消除满汉

畛域，137—138，140—142，167，171—172，186
reimperialization of authority，载沣加强中央集权，143—145，149—150，171
and Manchu ascendency，载沣与满人特权，150—151，153
attempted assassination，载沣成为暗杀目标，154—156，185
and queue-cutting，载沣与剪辫，165—166
and imperial kinsmen's cabinet，载沣与皇族内阁，167—168，169，170
compared with Cixi，载沣与慈禧的比较，170—171
response to outbreak revolution，载沣对革命爆发的反应，174—176，177
resignation as regent，摄政王载沣辞职，206
and abdication negotiations，载沣与退位谈判，213，222
in early Republic，民初的载沣，237，241，247
and Manchukuo，载沣与“满洲国”，273
death of，载沣之死，274
Zaifu，载搜，146，149
Zaimu，载穆，193，194
Zairun，载润，148
Zaitao，载涛
Zaifeng's reliance upon，载沣与载涛的联盟，143，151，153，168，174
and army General Staff，载涛与陆军军谘处，145，152，183
and Palace Guard，载涛与禁卫军，145—149，206
sympathy for reform，载涛同情改革，162，164
as commander of Third Corps，第三军指挥官载涛，175
during abdication negotiations，退位谈判中的载涛，213，219
in early Republic，民初的载涛，240
and Manchukuo，载涛与“满洲国”，273
in People's Republic，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载涛，274
Zaixun，载洵

Zaifeng's reliance upon，载沣与载洵的联盟，143，151，153，174
and navy reforms，载洵与海军改革，150
as target of assassination attempts，作为暗杀目标的载洵，153—154，156—157
in Yikuang's cabinet，奕劻责任内阁中的载洵，168，183
during abdication negotiations，退位谈判中的载洵，213
in the Republic，民初的载洵，246，274
Zaiyi，端亲王载漪，71，72，79
Zaize，载泽
and constitutional reforms，载泽与立宪改革，96—97，98—99，159
as metropolitan official，作为京官的载泽，120，151，153
and banner reform，载泽与八旗改革，137
and naval reform，载泽与海军改革，149
on queue-cutting，载泽关于剪辫，166
in Yikuang's cabinet，奕劻责任内阁中的载泽，168，183
and abdication negotiations，载泽与退位谈判，213，219，220，221，223
in early Republic，民初的载泽，251
Zaizhen，载振，96
on ethnic slots，载振与官缺，78
as metropolitan official，作为京官的载振，78，80，102，120，131，153
in early Republic，民初的载振，248
Zeng Guofan，曾国藩，59，152
Zengyun，增韫，123，200
Zhalafen，扎拉芬，149
Zhang Biao，张彪，174，176
Zhang Binglin，章炳麟，12—15，156，229，248
Zhang Fenghui，张凤翙，190，191

Zhang Furong，章福荣，211，212
Zhang Ji，张继，13
Zhang Jian，张謇，127，168，169，179，210，226
Zhang Renjun，张人骏，158，196—197
Zhang Shaozeng，张绍增，180—181，182—185
Zhang Xun，张勋，196—197，240—241，245，253
Zhang Yuanji，张元济，65—66，71，74
Zhang Yujun，章遹骏，146
Zhang Yunshan，张云山，191
Zhang Zhanyun，张展云，93
Zhang Zhidong，张之洞
  on Manchu-Han relations，张之洞关于满汉关系，74—75，106，107
  in Hubei，张之洞在湖北，89
  and constitutional reforms，张之洞与立宪改革，96，116
  as grand councilor，作为军机大臣的张之洞，117，129
  opposed to pardon for 1898 reformers，张之洞反对赦免戊戌变法的改革派，133—134
  concerned about Zaifeng，张之洞关注载沣，144，151
Zhang Zuolin，张作霖，221，242，247，249，250—251
Zhao Bingjun，赵秉钧，97—98，109，111，133
Zhao Erfeng，赵尔丰，23，44，122，201—202
Zhao Erxun，赵尔巽，23，43，158，220，264
Zhapu（garrison），乍浦（驻防），32，58，59
Zheng Xiaoxu，郑孝胥，127，246—247
Zheng Yuan，郑沅，109
Zhenjiang（garrison），镇江（驻防），32，38，58，81，93，258
  and 1911 Revolution，镇江（驻防）与辛亥革命，193—194
Zhili，直隶，30—31，40，281
Zhirui，志锐，123，202

Zhonghe，忠和。See Guan Zhonghe，见关忠和
Zhou Enlai，周恩来，274
Zhou Fu，周馥，74，75—76，80，96
Zhu Panzao，朱泮藻，103
Zhu Qinglan，朱庆澜，201
Zhuanglang（garrison），庄浪（驻防），123，258
Zongli Yamen，总理衙门，48，77—78，79。See also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亦见外务部
Zou Fen，邹芬，245
Zou Jialai，邹嘉来，167
Zou Rong，邹容，11—18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已出版书目

1.《中国近事报道》
［法］李明著，郭强等译，大象出版社，2004
2.《中国新史》
［葡］安文思著，何高济、李申译，大象出版社，2004
3.《清初扬州文化》
［美］梅尔清著，朱修春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4.《八国联军占领实录：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上下册）
倪瑞英等译，刘海岩校，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5.《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
［美］曾小萍著，董建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6.《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
［德］余凯思著，孙立新译，刘新利校，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7.《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
［英］赫德著，叶凤美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8.《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英］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9.《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
［美］罗威廉著，江溶、鲁西奇译，彭雨新、鲁西奇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0.《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
［美］魏若望著，吴莉苇译，大象出版社，2006

11.《奉天三十年（1883—1913）——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与回忆》

［英］杜格尔德·克里斯蒂著，［英］伊泽·英格利斯编，张士尊、信丹娜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12.《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

［比］高华士著，赵殿红译，刘益民审校，大象出版社，2007

13.《明治前期日中关系史研究》

［日］安冈昭男著，胡连成译，王晓秋审校，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

14.《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

［日］佐藤公彦著，宋军、彭曦、何慈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15.《东正教在华两百年史》

［俄］尼古拉·阿多拉茨基著，阎国栋、肖玉秋译，陈开科审校，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

16.《美国政府解密档案：美国驻中国广州领事馆领事报告（1870—1906）》（影印全25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组织整理，程焕文审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7.《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

［美］何伟亚著，刘天路、邓红风译，刘海岩审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18.《压力下的生活：1700—1900年欧洲与亚洲的死亡率和生活水平》

［瑞典］托米·本特森、［美］康文林、李中清等著，李霞、李恭忠译，史建云审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19.《扬子江上的美国人——从上海经华中到缅甸的旅行记录（1903）》

［美］威廉·埃德加·盖洛著，晏奎、孟凡君、孙继成译，沈弘、吴乃华审校，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

20.《中国十八省府》

［美］威廉·埃德加·盖洛著，沈弘、郝田虎、姜文涛译，沈弘、李宪堂审校，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

21.《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

［美］罗威廉著，鲁西奇、罗杜芳译，马钊、萧致治审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2.《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年以前）》

［苏］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著，宿丰林译，徐昌翰审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23.《过失杀人、市场与道德经济：18世纪中国财产权的暴力纠纷》

［美］步德茂著，张世明、刘亚丛、陈兆肆译，［美］步德茂审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24.《清代水利与区域社会》

［日］森田明著，雷国山译，叶琳审校，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

25.《中国丛报》（影印全21册）

张西平主编，顾钧、杨慧玲整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6.《清代田赋刍论（1750—1911）》

［美］王业健著，高风等译，高王凌、黄莹珏审校，人民出版社，2008

27.《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

［丹麦］龙伯格著，李真、骆洁译，张西平审校，大象出版社，2009

28.《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

［德］柯兰霓著，李岩译，张西平、雷立柏审校，大象出版社，2009

29.《耶稣会士张诚——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五位数学家之一》

［法］伊夫斯·德·托玛斯·德·博西耶尔夫人著，辛岩译，陈志雄、郭强、古伟瀛、刘益民审校，大象出版社，2009

30.《清代宫廷社会史》
［美］罗友枝著，周卫平译，雷颐审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1.《清代森林与土地管理》
［美］孟泽思著，赵珍译，曹荣湘审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2.《中国：糖与社会——农民、技术和世界市场》
［美］穆素洁著，叶篱译，林桑禄校，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33.《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上下卷）
［美］司徒琳主编，赵世玲译，赵世瑜、杜正贞审校，三联书店，2009
34.《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1911）》
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辑，张士尊译，苑洁审校，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35.《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
［日］岸本美绪著，刘迪瑞译，胡连成审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36.《清末中流日关系史研究》（上下册）
［日］西里喜行著，胡连成等译，王晓秋审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by Edward J. M. Rhoads

Copyright © 2000 by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 2010 by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6—2573号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

【美】路康乐 著

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此书是关于满汉关系的前沿研究，对清末的分析具有很高创新价值和重要意义，叙述极为精彩。

—— 盖博坚（R. Kent Guy），华盛顿大学

策划编辑：谭徐锋
责任编辑：李 霞 吕鹏军
封面设计：陆智昌

ISBN 978-7-300-12795-8

ISBN 978-7-300-12795-8

定价：39.80元